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爲什麼失去大陸

陳孝威著

(民國五十三年)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為甚麼失去大陸

陳孝威著

總目

第一篇	前言	一
第二篇	你怨美國人嗎	七
第三篇	戰時通貨膨脹與戰後經濟崩潰	四二
第四篇	剿共軍事著名戰役之回溯	四四
第五篇	蔣總統引退與復任	五六
第六篇	結論	六四

爲甚麼失去大陸

二

為甚麼失去大陸（上冊）

陳孝威著

目 錄

第一篇 前 言	一
第二篇 你怨美國人嗎	七
第一章 中美外交關係	八
第二章 中共破壞抗戰紀實	一三
第三章 華萊士三見蔣主席	二四
第四章 美駐華大使高思之報告	四七
第五章 史迪威堅持裝備共軍	五二
第六章 赫爾利錯在那裡	六三
第一節 偏執國共合作忽略中美同盟	六三

第二節	赫爾利先入莫洛托夫之說	六五
第三節	赫爾利面臨史迪威事件	七〇
第四節	赫爾利飛延安晤毛澤東	七四
第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之由來	七七
第六節	雅爾達協定鑄成大錯	八二
第七節	高估國共合作低估中美同盟前後如出一轍	九四
第八節	赫爾利反對以武器支援中共	一〇二
第九節	赫爾利清除大使館內親共份子	一〇五
第十節	魏德邁證實中共並未出力抗日	一〇七
第十一節	美參院調查「太平洋關係學會」	一〇八
第十二節	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	一三三

第七章 從德國無條件投降說起

第一節	邱吉爾來函保證擊潰日本	一五三
第二節	論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政略戰略戰術	一五七
第三節	邱吉爾重視戰略區艾森豪却不重視柏林	一六一
第四節	對德結束軍事贏得戰爭失去和平	一六七

第五節	從魁北克之會經德黑蘭雅爾達以至波茨坦會議……………	一七〇
第六節	史達林堅持「中俄條約」……………	一七六
第七節	「中俄條約」之談判宋子文力爭主權……………	一八〇
第八節	蔣經國為外蒙主權舌戰史達林……………	一八四
第八章	「中蘇友好條約」簽訂之經過……………	一九〇
第九章	日本無條件投降……………	二〇一
第一節	中美未同盟中俄共先合流……………	二〇一
第二節	中美英三國提出投降書……………	二〇六
第三節	原子彈之擲擊……………	二〇八
第四節	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	二二三
第五節	日本投降及接收經過……………	二二四
第六節	共黨篡奪勝利果實……………	二三六
第七節	贏得勝利實非容易……………	二三六
第八節	十六年前曾作善意之建議……………	二三六
第十章	毛澤東來渝故作和談姿態……………	二四〇

第一節	中共攔發七道命令提出六項要求	二四〇
第二節	參政員組團訪問延安	二四三
第三節	毛澤東來渝	二四四
第四節	毛澤東堅持紅軍獨立劃區統治	二四六
第五節	毛澤東會晤魏德邁	二五〇
第六節	毛澤東三呼 蔣委員長萬歲	二五二
第七節	毛澤東破壞「雙十會談紀要」	二五三
第八節	毛澤東供認叛國	二五九
第十一章	蘇俄藉參戰與中共滙合	二六五
第一節	俄軍三路進入東北	二六五
第二節	中共進佔東北陰謀	二六八
第三節	蘇俄目標佔領東北孤立美國	二七二
第四節	國府派大員赴東北接收	二七六
第五節	蘇俄阻撓國府接收	二七八
第六節	國府不得已始採軍事接收	二八六
第七節	史達林突邀蔣經國訪俄	二九四

第八節	蘇俄視東北物資為戰利品·····	二九八
第九節	蘇俄要求東北經濟合作·····	三〇一
第十節	蘇俄將東北移交予中共·····	三〇五

爲甚麼失去大陸

為甚麼失去大陸（下冊）

陳孝威著

目錄

第二篇 你怨美國人嗎.....	三三
第十二章 馬歇爾來華使命因何失敗.....	三三
第一節 寇德邁建議三國托管東北.....	三三
第二節 赫爾利辭職插曲.....	三七
第三節 馬歇爾來華.....	三八
第四節 「三人小組」之協議.....	三〇
第五節 國府頒發第一道停火令.....	三三
第六節 「軍事改編協定」之締訂.....	三六
第七節 派遣「軍調小組」赴東北.....	三八
第八節 中共違反自簽之停火令.....	三九
第九節 馬歇爾偏袒中共.....	三一
第十節 中共偷襲四平街、長春.....	三四

第十一節	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整編部隊·····	三三八
第十二節	中共慣施邊談邊打狡計·····	三四九
第十三節	國府再頒第二道停火令·····	三五二
第十四節	馬歇爾偏信中共謠言·····	三五三
第十五節	先談恢復交通·····	三五五
第十六節	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	三五八
第十七節	安平事件·····	三六〇
第十八節	馬歇爾三上廬山·····	三六一
第十九節	戰爭重起馬歇爾五上廬山·····	三六五
第二十節	蔣委員長答杜魯門函·····	三六六
第二十一節	馬歇爾七上廬山·····	三六八
第二十二節	馬歇爾擬退出調停·····	三七四
第二十三節	因收復張家口馬歇爾停止軍援·····	三七七
第二十四節	馬歇爾始發覺中共詭詐·····	三八〇
第二十五節	國府頒第三道停火令並發表聲明·····	三八三
第二十六節	馬歇爾退出調停離華回美·····	三八九
第二十七節	魏德邁奉命來華調查·····	三九一

第廿八節 馬歇爾何如宋爾典……………三九四

附錄 美國人自我批評：「我們為何失去中國」……………三九六

第三篇 戰時通貨膨脹與戰後經濟崩潰……………四二一

第一章 通貨膨脹循環不已……………四二一

第二章 物價管制與搶購狂潮……………四二八

第三章 金融市場之混亂……………四三三

第四章 新通貨——金圓券之發行……………四三九

第五章 國府宣佈「經濟改革計劃」……………四三四

第六章 通貨貶值與金銀自由兌換……………四三七

第四篇 剿共軍事著名戰役之回溯……………四四一

第一章 陝北延安之戰……………四四一

第二章	孟良崗之戰	四五〇
第三章	南麻之戰	四六二
第四章	山東與東北兩戰場之呼應	四六六
第五章	西北宜川之戰	四七二
第六章	民卅七年春季後之軍事形勢	四七九
第七章	東北白旗寨之戰	四八五
第八章	濟南之戰	四八九
第九章	錦州之戰	四九六
第十章	瀋陽外圍遭遇戰	五〇一
第十一章	徐蚌會戰	五一〇
第十二章	平張鐵路之戰與津沽秦守	五四四
第十三章	太原保衛戰	五五五

第五篇

蔣總統引退與復任

五六

第六篇

結 論

六四

為甚麼失去大陸 上冊

陳孝威著

第一篇 前言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氏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訪問中華民國臨時首都之臺北，我中華民國 蔣總統伉儷於是夕款以國宴，禮隆誼重。席與艾總統致詞，語甚誠摯。惟其中有一段，尤為誠摯之誠摯者，茲謹錄之於左：

「總統先生，本人對閣下所敘述的白美兩國歷年以來友好合作的紀錄——十分長久的一項紀錄，深為感激！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永不忘記有效而成功的合作，能賴相互的了解，過去合作之所以成功，無疑係由於當時的真正了解，而竟至於其中不大成功的部份，則是由於此方或彼方對該問題未獲有與對方相同的了解。我認為如果我們經常有問題面對我們，我們務必要使此種對本身，對對方，以至對各項共同問題的了解，能如此之明確，以致在判斷上不發生任何錯誤，俾於真正合作追求我們雙方的共同理想之處，毫無任何其他後果。現在在總統閣下允許之下，本人還要對閣下最可感的演說，作一更深切的應答……」

是言也，藹然仁者之言也，出於友邦元首如美國總統者之口，何若是其誠懇、明白，而中肯綮耶！是誠難能可貴也已。夫國與國之間，莫要於親仁善隣，講信修睦。中、美兩國，國體同，思想同，所追求民有民享民治之目標亦同。在歷史上向無任何特殊污點與戰爭缺點塗抹其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中、美兩國各為太平洋兩岸之第一等強國，以美國之土地、人口、資源、生產、科學與中國之土地、人口、資源及刻意追求之生產、科學，互

相聯結配合，實足爲全世界奠定永久真正公道和平之磐石，事固若然，人同此願，而莫或否認之也。詎知中美二國能比肩作戰於戰時，而未能互相諒諒於平時，遂使兩國朝野咸受國際共產集團欺騙，而兩國政策，竟墮共黨離間之狡計。美國國務院有潛伏之共黨，以制訂對華政策，而中國之共黨，則公然作刁詭之談判，以掩飾其擴軍略地之實，卒致中華民國因此失去大陸，而淪陷于共黨。美國在西太平洋彼岸強大與國失去廣大版圖，誰知會幾何時，使美國領導世界確保和平之態勢失去其憑藉，而蘇俄反從戰爭廢墟中重建起來，迎頭趕上美國，益張併吞世界征服世界之野心，今且叩美洲後院之古巴，歐洲後院之剛果，亞洲後院之寮國。凡茲主客優劣強弱形勢之變易，如此物換星移，中、美兩國及自由世界有心人士能不深切反省也耶？能不追究其所以然之故，以挽既倒狂瀾也耶？能不痛定思痛，毋蹈前轍之感也耶？

前事不忘，後事師也，積百年友誼以申兩國之好，固難，因一朝之忿而犯一筆勾消之過，則易。現在，中美兩國之和好如初未改也，而兩國受敵之威脅，中則前門有虎，美則後門有狼，日加而未已也。既失東隅，而未收之桑榆，艾總統在國宴上所指稱：「過去合作之所以成功與竟至於其中不大成功的部份之兩者史實，均有深切檢討之必要。」善哉善哉，其言之能一針見血，而發人深省也。顧當世之士輒多諱疾忌醫，未肯將不成功之由和盤托出，或自承一部份之差錯，思有以自我矯正之，或各承其應負之責任，互相推諉以改善之。向使抱此胸懷與雅度，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尤何患乎大敵當前，而不共同奮起而殲滅之乎？故不憂敵之強橫兇狠，而憂本身之不能兩者合一，努力對付。艾氏不成功部份，在於策出兩歧，議不一致，鑒於昔日之弊，應有今日之新，則庶幾其符於艾氏之意歟？

徵諸中國大陸淪陷十有一年，祇聞美國國務院根據檔案編輯：「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一冊及美國參議院司法、軍事兩委員會「調查報告」出現。私家著作，祇有司徒雷登大使之「五十年中國回憶錄」，與「魏德邁將軍報告」，而在中國方面，公家私家，皆未見有何公告著作，有之其惟蔣總統所著之「蘇俄在中國」。其他如張君勱博士所著之英文版「第三勢力在中國」(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一書中之第六、第七、第八、三章，凡此編輯著作，皆未能鑒世人欲知詳確內容之望。國家治亂興替之史實，豈獨供後人研究及殷鑒，亦以本身大難未靖，而此所謂不成功部份，何以不成功，奚止不成功，且反貽中國失去大陸是誰之過歟，而不一檢討之耶！

王聿修博士序「美國政府內的共產黨」一書稱：「由於美國國會的調查，顯示出近年來制訂美國亞洲政策的人物，全是親共的或是有共產黨嫌疑的。一九四九年美國務院的白皮書說：中國大陸的淪陷，是由於中國政府的腐敗，對此，美國無能為力。現在許多美國議員與美國人都已認識到，中國大陸的變色，美國對華政策受共產黨暗中操縱，以致有利於中共，實應負更大責任。現在美國人在問：『中國是自己倒下去呢？還是被人推倒的？』」（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第二二至二三頁一頁文章的標題）。『

「中國是自己倒下去呢？還是被人推倒的？」這發問是不夠周衍的，應易以「為什麼失去大陸？」為較合邏輯。外國人替中國人答覆這問題，或不如中國人為自己答覆這問題為正確。中國人中答覆此問題，如挾有政治色彩或國際關係傾向，難免不無有所偏袒之處。昔人寫歷史，求之於當事人，雖不失事實，但難免有所偏。求之異代人，事實難免於挂一漏萬，但不至於十分偏，兩者各有利弊，而美國以科學方式對於每一核心問題，儘量發表檔案資料，誠足以補救兩者之失，但檔案資料之選擇，不無亦有高下其手之處，摘錄去取，憑愛憎而定，果若是，則不足使

受指摘者之俯首自承，甚至反唇狡辯，轉失以古爲鑒之義。孝威不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向羅斯福總統首先條陳作租借法案建議，且以德有進攻蘇聯之謀，日本有乘隙南進企圖，預作爲敵情判斷，獨議上達之後，租借法案即見實現，雖不能謂由此促成，然貢獻於美國及自由世界，似不無微勞堪述，更不能謂爲對美國有偏見與成見者也。本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四個月（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八日）曾以「贏得戰爭失去和平」爲戒懼，向是時美國駐重慶大使赫爾利將軍建議擬訂中美聯盟五十年，附以中美互惠十具體條款。該備忘錄節記如左：

「將軍深知，苟欲贏得和平，必先使我國於八年抗戰，犧牲慘重之後，得到領土主權行政完整（包括滿洲、蒙古、新疆、西藏在內），否則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然則我國將何由得到強盛安定者耶？竊意以爲必須中美兩國，密切合作，方克臻此。中美二國如能訂立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互助同盟協定，庶幾未來世界大戰可免。」

依據右舉兩段史實，本人雖非受美國教育，或美國國籍之妻子，但對於美國朝野上下，只有好感，向無惡感，可以得到保證。更係無黨無派脫離政海越三十有五年以上如余者，秉筆寫「爲什麼失去大陸」一問題，至低限度可視爲非對美國清算，更非挾有疏遠離間及中傷中美二國國交之意向，當爲中美兩國朝野上下所共信共諒者也。

我駐美大使葉公超博士，於本年七月十八日，在費城美國全國商業聯合會及職業婦女聯誼會兩年一度的第十五屆大會，作獅子吼的的演說，首稱：美國和自由世界在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邪惡敵人的共同努力，應該具有遠見與勇氣，「追求勝利而不是追求和平。」

又曰：「鑒於古巴的情勢，現在應是將共黨當初如何竊據中國大陸的經過，告訴各國聽衆的適當時候。因爲今

日世界上許多地方，共黨正在進行着同樣方式的滲透及顛覆。」

本人搜集「爲什麼失去大陸」資料有年，因受葉大使是次演說之鼓勵，不自禁將已獲資料，加以整理成編，先行披露於報端，冀獲拋磚引玉，得曾經身與其役者之共鳴，加以補充與糾正，是爲本人迫切虔誠之企求。

我政府當局低估共產集團及中共，高估自己軍事力量而忽略八年久戰疲敝軍紀風紀倫理道德之低落，因而軍事失敗，財經崩潰，演成惡性循環，不能謂爲不負若干責任者也。

「爲什麼失去大陸？」一問題，因主觀觀念之不同，而客觀結論則各異。美國有美國自己的看法，美國人因各階層利益不同，看法各異。中國人有中國人自己的看法，因有在朝在野之不同，而看法亦各異。共產黨有共產黨自己一套之辯證說法，正在改寫中國五千年以道德倫常爲社會秩序之冊籍而歪曲之。對於「爲什麼失去大陸？」一問題，不特無真話可說，且必多方抹煞事實，歪曲事實，以求有利於共黨，其荒謬妄誕，吾知共黨亦不能自信其說，彼固壞事做盡，好話說盡者，尙何能取信於正義之世界。予有感於萬語千言之鼓辭諛辭詭辭遁辭，事過境遷之後，將變成眞實，引以爲誡。後人不察而竟信之，則是非顛倒，善惡混雜，眞僞不分，邪正不明，斯不僅攸關於國史，抑且關涉於國際，予烏可默爾而不言，言之有罪，予不計焉，但求其眞耳。望世人作稗官讀可也！將野史觀可也！即與國史對校而參證也亦無不可！愛國者其勿責其多事耶，則幸甚矣。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陳孝勝自序於香港。

爲甚麼失去大陸

第二篇 你怨美國人嗎？

關於最近三十年來中美兩國的合作，有成功的部份，有不成功的部份。不成功的部份，甚於成功的部份。因是之故，成功部份所獲之善果，不足以抵消不成功部份的惡果，因而有中華民國政府被迫而退出中國大陸播遷臺灣的悲劇發生。

此中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僅將困惱後世的史家，即在局中人亦有自難瞭解之處，蓋因整個世界，大變特變，複雜微妙，史罕其匹。即以有關文件，掛一漏萬，觸目皆是。重商世界，惟利是圖，限於時間，不讀書報，遍地珠皆是也。況精於此者而粗於彼，精於彼者而粗於此。例如就中美合作不成功部份而論，祇讀美國白皮書（即美國與中國之關係），而不讀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便難對中美合作不成功部份，作持平之論斷，有效之補救。祇讀右舉兩種巨著，而未着眼八年抗戰之經過——中美合作篇，亦難使美國廣大人民作心悅誠服之自承，大覺大悟，亟思有以矯正前失。此皆面臨中美兩國二度合作亟待解決之課題，未可掉以輕心者也。

美國白皮書與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中英文本皆有，讀者比較普遍，毋須特別介紹。而八年抗戰之經過——中美合作篇，讀者似不甚多，而美國知識份子，或尙不知有此書，亟摘錄要點如左，倘因美國軍政機構，因重視本報介紹之故，而譯成英文，印成單行本，則中美二國二度之合作，可以保證成功部份多於不成功部份矣。

第一章 中美外交關係

「中美兩國，基於傳統的友好關係，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美國政府即一貫堅持對日本之譴責，有名之『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可爲我抗戰前美國政府對中日兩國外交政策之寫照。乃至蘆溝橋戰端既啓，美總統羅斯福於是年十月發表防疫演說，呼籲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聯合起來維護和平，對破壞國際秩序者，應如防疫一樣，予以強制隔離，此實爲美國政府正面聲援我國之始。當中日作戰初期，敵軍即迅速向我內地推進，美國輿論多以惋惜語氣，預測我抗戰前途必迅速失敗。乃開戰一年以後，我抗戰精神反愈戰愈奮，於是對我乃由普遍之同情，進而發生尊敬心，願予我以實際之援助。」

「二十八年七月，美國即通知日本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翌年一月以後，更嚴格限制汽油、廢鐵、機器及其他軍事物資運往日本。三十年七月正式凍結日本在美資金，此爲美國對日所實施之經濟制裁。至對我財政方面，則盡力穩定我國之通貨，成立平準基金委員會維持國幣與美元之經常滙兌比率。此外復由其進出口銀行對我國予以信用貸款，前後四次共美金一億二千萬元。」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美國即商同英國，於翌年（一九四一年）同時通知我政府，廢除在我國的治外法權，及過去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有關特權，並依平等原則，改訂互惠新約。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月，美國會又通過廢止排華法案，並在法律上准許中國人有歸化爲美國公民的權利，凡茲種種措施，足見美國政府與其人民維護正義、主持公理之信念，實與我國『興滅繼絕』之傳統精神，甚相吻合，而尤爲吾人所永誌不忘者也。」

右爲我國國民政府之正式紀錄文件。此外可作補充者，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南京汪偽政府誕生之時，美國即以明朗態度發表聲明，繼續承認播遷重慶領導抗日之國民政府，而斥汪偽政府爲傀儡組織。翌年（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宣佈中國得按租借法案，請求援助。

先是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成立。國際論壇，咸目爲攻美之先聲。余則判斷爲德不攻英而攻蘇，日本必進窺南洋及太平洋。且以此爲理由，撰成一文，題曰：「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內對英對美對蘇作戰案之蠡測」，英譯建議美國政府以「民主國家兵工廠」自任，擴大是年（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五月英美二國所簽署之大西洋「售艦租地」協定於全世界及西南太平洋，以抵抗德義日三國同盟侵略。書既上，羅斯福總統首先省覽，獎譽有加。國務卿赫爾先生、海軍部部長諾克斯先生、陸軍部部長史汀生先生，亦先後有函見稱。史汀生且函稱：「讀之甚饒興趣，願予保存，作爲陸軍部之借鏡」等語。

翌年（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正月，羅斯福連任總統職，即向國會提出「租借法案」，辯論四月，才經國會通過，成爲法案。而中國國防供給品委員會亦於四月中旬成立，是爲中國得按「租借法案」請求援助之始，亦即拙編「太平洋鼓吹集」之所由產生者也。羅斯福總統政策，是否即受吾說之啓示，雖不可知，而吾言固終爲盟邦戰勝之奠基石也。

據「八年抗戰之經過」載稱：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春，美國國會通過對我「租借法案」。美政府遂組成一軍事顧問團，於是年十一月到運我國，負責裝備及訓練我國新軍，惟因當時交通困難，運輸工具缺乏，故美國租借之裝備甚少運達。但對我空軍

之援助，則較爲成功。蓋自三十年初，美政府批准美國戰鬥機，得由美國志願飛行員駕駛，爲我對日作戰。以是美國空軍志願隊，在陳納德將軍指揮下正式爲中國武裝部隊之一，此批志願空軍，曾予我國西南部以有效之空防。

「三十年五月、美政府復根據租借法案與我正式簽訂租借協定，首先着重於滇緬路之加強運輸，是項租借物資，大部包括滇緬公路所用卡車、零件、汽油、滑油以及拓展公路所需之物資，並曾派遣交通專家，勘察滇緬公路，而作諸種之改善。到同年十一月底，滇緬路之運輸量，已自每月四千噸增至一萬五千噸。當滇緬公路運輸效率提高之際，美政府復計劃以一千五百萬美元之租借款項，用以建築緬甸至中國之鐵路，俾經由仰光運往我後方之物資數量，得以大量增加。但由於日本在緬甸軍事上之勝利，故此一企圖未獲實現。

「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事爆發。三十一年元旦，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在華府簽訂共同宣言，表示一致對軸心國聯合作戰。一月四日，盟國推舉蔣委員長爲二十六國聯軍在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及泰國）之最高統帥。於是成立中國戰區統帥部，爲同盟國在東亞大陸上之最高戰略執行機構。其後美國政府復應我國之請，派遣史迪威將軍來華。史迪威將軍除統率在中印緬戰場上之美國軍隊及一部中國軍隊外，同時並爲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參謀長。陳納德將軍所轄之飛虎隊亦於此時改爲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仍駐紮中國境內對日作戰。於此中美兩國軍事合作，更益臻完善。

「三十一年三月日本突入緬甸後，我軍之軍事形勢，益增困難，作戰物資極端缺乏，此際盟國正集中全力計劃首先擊敗德國，一切戰略物資之供應，均以歐洲戰場爲優先，可用於中國戰區者已屬寥寥無幾。而我國對外交通線，又只有印度阿薩密與雲南高原間經喜馬拉雅山之一條極薄弱之空運補給線，且時遭暴風雪襲擊，致每月輸入之物

資，僅能供應陳納德將軍指揮下之美第十四航空隊，以汽油、炸彈及火藥等。至對中國最感需要之物資如汽油、汽車器材、火車器材、大砲、戰車與其他重型裝備，均無法供應。此種惡劣形勢，直維持至三十二年一月、同盟國始在北非卡薩布蘭卡開會時，決定恢復通往中國之陸上交通，並加強駝峯之空運。同年五月、華盛頓會議開幕，皆以我國之抵抗萬一失敗，則影響於盟軍在亞洲所處之形勢，將極端嚴重。於是一再考慮，結果同意予空運總隊以優先權，俾駝峯之空運量每月可以增至一萬噸。同年並決定於三十二年秋間雨季結束後，即發動緬甸攻勢，此攻勢計劃旋於魁北克會議時詳細擬定之一。

「魁北克會議中，盟國決定盡當時所有手段打通通往中國之陸路交通線，俾予我國以充份之援助，使亞洲戰場能獲致最大之效果，於是成立東南亞盟軍統帥部，以英國蒙巴頓海軍上將為統帥，而以史迪威將軍為副，至中國戰區之軍事則仍歸 蔣委員長指揮，並以史迪威任參謀長，在緬甸作戰之英美空軍合編為東方空軍總隊，由美國斯特朗將軍任司令。此時我國駐印軍正協同美國工兵迅速伸展雷多公路，並於公路平行敷設油管，俾不久可以大量增加往中國運輸之汽車燃料，此際駝峯之空運量已增加為每月二萬噸，我國又於四川雲南各地建立空中堡壘基地，以備美空軍轟炸日本本土之使用。

「三十二年十月，我駐印軍第廿二師及新三十八師，依同盟國既定之計劃，由雷多公路前端進入胡康河谷與美軍密里爾准將之叢林部隊會合，企圖將日軍驅出緬北，重開滇緬路，此際中美兩軍在極端惡劣之天候中，穿過極端困難之地形，首將攻陷新加坡之日軍精銳第十八師團殲滅，我為擴張戰果，即以第十四師及第五〇師，由美方負責空運，在雲南起飛，經駝峯，前後八日全部到達印度蘇克瑞丁之空運基地，重裝美械裝備後，即加入胡康河谷之戰。

門。並於三十三年八月攻入密芝那機場，同時我國境內之遠征軍各部亦越過薩爾溫江，於是中美兩軍之部隊，乃於是年夏季會師騰衝。」

竭中美二國之共同努力，旨在使美國物資化爲中國戰場作戰力量。孰意中共之行動，則與此適爲絕對的相反，不打敵人以保全自己力量，專襲國軍以擴張自己力量，甚且要求與國民政府平分美援，史迪威且支持其說，於是涸絲益莽、舉措失宜，殊失本人當年建議租借法案之本意也。

第二章 中共破壞抗戰紀實

中國共產黨利用外患（日本軍閥侵略）以顛覆中華民國，與日本軍閥利用內亂（中國共產黨武裝作亂）以侵略中華民國，兩者夾攻中華民國，至「九·一八」事變而表面化，西安事變而戲劇化，蘆溝橋事變而實質化。終抗戰八年，迄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日在中國共產黨與日本軍閥夾攻之中，內亂外患，交相迭乘，難乎其為最高統帥者矣。凡茲實況，不僅與我比肩作戰之美國總統羅斯福氏以次朝野人士未之瞭解，即生於斯、長於斯之中華民國最高級知識份子，亦懵然罔覺。鄙以下更無論矣。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共以與國民政府聯合抗日為名，於九月廿二日發表一其赴國難之宣言，向中央政府及全國人民提出四項諾言如左：

-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需，中國共產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 （四）取消紅軍番號名稱，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於是最高統帥部乃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將陝北之共軍殘餘部隊，依其人槍數量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任命朱德、彭德懷為該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林彪、賀龍、劉伯誠為師長，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

歸閩錫山長官指揮，並規定開入晉北游擊。

右舉四點，在日本軍閥狂肆驕橫，無止境侵略威脅之下，竊以爲內亂可消，合力以抗拒外患，無人不殷切其實現。即有一二高瞻遠矚者，看破中國共產黨是舉「爲製造內亂外患雙重壓力，使困在陝北奄奄一息之中國共產黨殘餘獲得自救」。不意死灰從茲復燃，復假由復燃而燎原以至坐大。削弱中華民國國力，斷傷中華民國元氣，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取而代之。但在羣衆瘋狂抗日心理支配之下，雖揭穿其爲中共狡計技巧之一，當時亦無人肯予置信。況中華民族，在儒家洗禮之下，忠恕愛人爲第一，從無不與人爲善者，即使明知中共是舉爲製造內亂外患雙重壓力之陰謀，亦難予以峻拒。蓋因彼挾名正言順之「愛國之道」而來，雖有上智者，亦難以訕訕之聲音笑貌，拒之於千里之外，况君子可欺以其方者耶？

中共共赴國難之四項諾言，是否大說謊？吾不能任意指摘。今據魏德邁將軍報告，引述毛澤東於是年（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僅後於發表共赴國難及提出四項諾言之一個月）對其黨徒與部隊所發的祕密指令，百分之百可證其爲世界最大說謊者。茲錄之於左。

毛澤東的祕密指令：

「中日戰爭給予我黨一個上佳的擴展機會。我們的固定策略應該是：百分之七十作本黨的擴展，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執行此項固定政策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折衷時期；在這時期我們的犧牲應該表現我們表面上對中央政府的服從，及信託三民主義（孫逸仙博士所提倡的民族、民權及民生主義），但，實際上，這是爲了本黨的存在及擴展的烟幕作用。」

「第二時期是鬥爭時期，在這時期內，我們應該在二年或三年的時間來建樹我黨的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基礎，擴展我們的軍政力量到我們足以匹敵及摧毀國民黨的階段，而掃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正當等待一個非常的轉變時期，我們應該給予日本侵略者若干讓步。」

「第三時期是反攻時期；在這時期，我們的軍隊應該侵入華中，割斷中央政府軍隊的交通線，使之孤立而予以消滅。等到我們的準備就緒，來全面反攻，從國民黨手中奪得領導權。」（載在魏德邁將軍報告英文本第二八三頁）

魏德邁將軍為此毛澤東指令而加言曰：

「這一種共產黨的策略的後果：凡共產黨的游擊活動之處，受損害者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的人民。日軍為報復中共的破壞，焚毀無抵抗的鄉村。中共又殺死與他們不合作的鄉民，說這批鄉民是『叛國者』或『賣國賊』。實際上，中共紅軍既不能、也不願嘗試，為保護人民來抵禦日軍；而日軍更無意於保護中國人民來攻打共軍。介乎水火之間，龐大數額的中國人民簡直是無路可走，除了在兩個屠夫之間盲目地選擇一個。」

「在日本投降之前後，中共所佔最大的便宜就建築於毫不顧及中國人民的命運之上。國民政府却為自由中國的戰後餘燼而努力保護，雖然效果甚微，中共只劫掠日本及中國政府軍的佔領區，他們所扮的角色是童話中的胡狼與班狼（替獅子覓食），來對付受傷的中國大象，事實上，這匹傷象却倔強地不肯對敵人屈服。」

「在中日戰事中的任何一次大戰役，中共軍隊從未參與過——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上海之役，固未有份。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台兒莊之役，亦未有份，李宗仁將軍在徐州予日軍以大敗。同年保衛武漢戰事，

中共未嘗加手。長沙幾次大戰，甚至後來的緬甸及緬南薩爾溫江的戰役，中共都無隻兵參加。連親共的美國人也都口供證實。中共軍隊，在整個中日戰爭中，從未攻擊過任何一個日軍的重要據點或日本統治下的火車路線。所以，比如，忽侯脫在他的與傑柯勒合著的暢銷書『中國怒吼』中也承認：『中共軍隊只當他們有機會可予極少的敵軍以突襲時才出戰……在各次出色的戰役中，這是中央政府的疲竭的兵士去迎戰，咬住敵人而死。』

毛澤東發佈秘密指令後之二十三年——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十月毛澤東選集第四集開始發售。中有「勝利後我們對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內稱：「抗日戰爭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我黨目前的情況和一九二七年不同了，在八年中，我們靠自己的力量，現在得到了大小城市一七五個，組織了一百萬的正規軍，二百廿萬的民兵，在十九個省區內，建立了十九個大塊解放區。我有這擴展的成果，爲了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所以要『寸權必奪，寸利必得』。『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是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八月十三日說的。迨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立即以十八集團軍名義，篡奪受降權。而在八月十日起，兩星期內即又多佔領了五十九個城市。並聲言：「能爭得者全力爭取，即使暫時控制也好。」則其利用抵抗外患，以求坐大。及憑藉外患，以造成其內亂，更假調停與和談，達其目的，毛氏之陰謀，誠險矣哉！

魏德邁將軍報告，發表於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距抗戰結束，迨一十有三年。該報告對於中共軍隊在中日戰爭中的任何一次大戰役未曾參預，作肯定而公平的敘述，允稱知彼知己。惟中共之食言，若僅止於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已非吾人所能忍受。其奈自抗戰開始，迄於抗戰結束，時歷八年，除平型關爭奪戰八次，中共參加一次外，其餘悉皆不打敵人，專襲友軍，終抗戰八年之經過，日以擴充自己力量爲事。共軍襲擊友軍，最初係從地方

團隊及游擊隊入手，迨勢力膨脹，即公然進襲正規軍。姑以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月間止一年爲例，最高統帥部據各戰區正式文電報告，總計被共軍擾亂襲擊而發生戰鬥之次數，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平均每日不止一次。至於事態嚴重，而使抗戰形勢遭受極惡劣之影響者，除一面由晉北轉進蘇北，一面由江南打至江北，復竄擾鄂皖等地，一意併吞我留置敵後之部隊及其根據地外，而直魯豫晉等省之省政府所在地，無一不被其襲擊，不但抵消抗戰力量，而且幫助敵人加強淪陷區之統治。茲再摘要舉出，分述於次：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年），第十八集團軍已自由開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賀龍、趙成金、呂正操等部，及東進縱隊、青年縱隊等，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氏、鎮金市等處地區，次第解決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部及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尙中義、楊玉崑、趙天清等部。於是中央所編或在河北之抗日民軍，悉被摧殘，減輕華北敵軍所受之後方牽制。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年），第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竄至山東，遂在山東到處圍攻團隊，如長清之第一區保安司令部，濰光之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台、鉅野、萊蕪、蒙陰等縣團隊，不被解決，即遭襲擊。九月以後，山東保安部隊被共方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第八旅、魯東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鄒縣、萊蕪、東平、嶧縣等保安隊，及鄆城區常備隊，此外各地之民衆自衛組織，被解決者不可勝數，山東省政府馴至無法行使職權。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殲滅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敵軍。乃第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勾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成勝伍等叛變，達十餘團之衆。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加以收編，致北戰場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第十八集團軍在河北方面，又集中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並分調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季峯等部，分途向冀中冀南之國軍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及孫良誠、朱懷冰、高樹勛等，均以被攻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殘，乃忍痛退出冀察。孫良誠、高樹勛等向黃河以南魯西轉進。鹿鍾麟、朱懷冰等部向晉東南轉進。而第十八集團軍仍復節節進逼，經統帥部迭電制止，然爲時無幾，而孫高兩部又復被其數度圍攻，此第十八集團軍消滅河北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之暴行也。

民國二十九年六七月間，河北十八集團軍又移兵南岸，時彭明治、楊勇、楊尙志、蕭華、陳再道、趙金城等及一一五師主力，對孫良誠、高樹勛攻擊，激戰數旬，孫高兩部不得已，又退回黃河以北。該軍於佔領魯西之後，又逐漸伸張其勢力，以侵擾豫東皖北，並與擅自江南渡過江北之新四軍互相呼應，向魯蘇皖豫邊區節節進逼。致河北之敵，得以舒其喘息，在華北方面積極佈置軍事，發展交通，建設經濟，開發資源，其新建橫斷河北之德石鐵路，於二十九年六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阻礙，竟於十一月十五日迅速完成，舉行通車典禮，是爲該軍不專心對敵作戰，一意襲擊友軍，破壞抗戰之又一明證。

共軍迫走鹿鍾麟、朱懷冰等部後，使敵軍在華北從容建設交通，發展經濟之情形如下：

一、敷設鐵路——四二五公里。

東路線（東觀鎮——沁縣——長治）

德石線（德州——衡水——東鹿——石家莊）

侯寶線（侯馬——曲沃——翼城）

塘大線（塘沽——北平——門頭溝——涿鹿——大同）

二、開闢公路——四四〇九公里。

津浦幹線（沿津浦鐵路）

平南幹線（北平——南宮）

平漢幹線（沿平漢鐵路北段）

同蒲幹線（沿同蒲鐵路）

白晉幹線（白奎——沁縣——晉城）

平綏幹線（沿平津平綏鐵路）

津高幹線（天津——魏縣——高碑店）

津保幹線（天津——任邱——保定）

滄石幹線（滄州——獻縣——石家莊）

禹邢幹線（濟南——臨清——邢臺）

徐汴幹線（沿隴海東段）

石井幹線（石家莊——井陘）

三、整理河道通航者：

衛河（新鄉大名接運河）

小清河（濟南——渤海岸）

子牙河（石家莊——獻縣——天津）

大清河（保定——青縣——天津）

由於以上諸項交通建設之完成，不僅使敵軍運增強，便利作戰，而且可以吸收各沿線地區之物資，充實軍需，其效果之大，實難於形容。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佔據魯西之第十八集團軍，又分兵魯南，協同山東縱隊徐向前部，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魯主席沈鴻烈爲避免衝突，率部後撤，魯村遂於八月十四日被其佔領，但彼仍繼續進迫，經最高統帥部嚴令退出魯村，迄未遵令。迨敵向魯村進犯時，彼等又不戰而退，拱手讓敵。旋敵退去，彼等又復進佔，打擊山東省政府使之無法行使其政權。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蘇北方面，又發生黃橋事件。先是第十八集團軍進佔魯西後，八月攻奪魯村，九月移兵南下。而江南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則於七月間擅自渡過江北，襲擊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八月佔據泰興東之黃橋，九月陷泰州東之姜堰，十月初旬乃聯合北線第十八集團軍對韓德勤部包圍攻擊。當時南路新四軍有陳毅、管文蔚、王劍、李潛等部，北路第十八集團軍有一一五師一個旅，及彭明治、羅炳輝、黃克誠、張愛萍等部。韓德勤突受襲擊，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以下殉職者不下數千人。此後韓德勤即陷於共軍與敵軍之四面包圍中。十一月二十九日淮安寶應之敵向韓部進攻，共軍竟於同時亦向韓部猛攻，戰鬥至十日之久，雖經韓部拒止，但共軍及淮寶一帶之敵軍，仍環繞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之興化外國，截斷韓部補給線，企圖消滅江蘇

省政府使之不能行使政權。

此時統帥部以共軍自由行動，任意侵犯友軍，不打敵人，此種反游擊、反抗戰行爲，如不加以防止，則影響抗戰至鉅。但爲顧慮團結，愛惜國力起見，又不能不予寬容，乃根據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之先後請求，作成一提示案。此案內容，大半係採納葉劍英之意見，其最重要之部份，則爲允劃一極廣大之作戰地區，但須將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悉數調赴該地區之內，確實對敵作戰。

國府當局，以國家處於日寇共黨兩相交迫之下，爲安定後方，鞏固國本，完成抗戰建國之使命，不得不採取外抗強寇，內防奸匪之措施，令各戰區司令長官於部署軍事外，督促所屬各省黨政機關嚴密防止共軍共黨之不法活動。並以胡宗南、馬鴻逵、馬步芳各部，沿陝、甘、寧邊境之共區，封鎖交通。國府與中共對立之尖銳，又恢復不可並存之情勢，此時之中共，仇視國府之心理，實惟恐政府之軍隊不敗，而政權不倒也。

當時國府之此項措施，實有不得已苦衷，而美國執政者受其內部共黨之影響，反認國府爲不當，不以軍隊與中共軍共同抗日，而反以大兵圍堵中共。國府斯時，確有四面受敵之處境，外有日寇，內有中共心腹之患，復有親共民主同盟之斥責，而又有友邦中之共黨份子暗中作祟，其難於處置，實與抗戰相始終。

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於面臨珍珠港事變之後，仍以正常的想法，折衝中華民國之正常外交。安知中國大陸有不正常之戰場，美國國務院有不正常之份子。祇知美國面臨東西南方面作戰，爲求美國在西南太平洋逐島越島苦戰，早日獲得勝利，及減少美軍在太平洋作戰之傷亡數字，不得不切望中國戰場，能對日軍提早反攻，施展攻擊壓力，驅逐日軍，打通國際通路。或以反攻收復若干富庶區域，以裕戰時中國之財政經濟。有一於此，皆對美國有利，

亦對中國有利。足以克服美援物資之運輸困難，不惜出以全力，已詳於「中美軍事合作」章內，於是乃有卅三年（一九四四）夏季中美兩軍會師騰衝之勝利。詎料中共貌爲和善而陰施狠毒，不爲外人識破所珍，轉使國府解釋，不易爲他人所取信。

國府之圍堵政策，終因和談而失效。而現在之美國之圍堵政策，對蘇俄是否有效，尙在不可知之數。但鑒於過去中國之前轍，而目前中東、北非、南美將均爲蘇俄踏破。若不重予檢討，恐難免於中國圍堵之失之重演。今日美國之執政當局，原非昔日之執政當局，其必有對策，以弭共產主義之蔓延，萬一有失，則今日世界之局勢，不啻爲當日中國大陸之翻版，加以放大而已矣。

美國以大規模援助國府，使能改進軍事，增強戰力，穩定財政，鞏固政權，爭取抗日之最後勝利，此於中共之所望相反，自難漠視而忽然置之。蓋一旦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府以龐大之現代化軍隊，轉用於救平內亂，則非僅粉碎共產赤化中國之陰謀，抑且威脅中共之存在，蘇俄、中共對此同感不安！爲謀消弭未來此危機，達到赤化中國之目的，認爲須爭取美國之援華政策，對國共作平等待遇，以免彼此之力量懸殊。爲獲得美援之平等待遇，則須破壞中美政府間親善關係，引起華府對中共發生好感，於是蘇俄、中共狼狽爲奸，針對中美人民愛好民主政治之心理，撙拾國府若干失當之弱點與一部官吏瀆職之事實，作爲宣傳武器，向國內外展開對國府之政治攻勢。

蘇俄中共打擊國民政府，破壞中美關係之陰謀，分工合作之活動，約如下述：

（一）蘇俄對美國活動：

甲、指示美國共產黨，連絡社會之左傾學者、名流，發表言論，詆毀國府爲一政治獨裁，官吏貪污、思想對日

妥協之落伍份子集團；宣稱中共爲追求民主自由，實行土地改革，代表廣大農民之進步份子組織，而非與蘇俄有關之共產黨徒，藉以改變美國朝野對國共之觀感。

乙、令蘇俄駐美間諜，運用經已收買之美國親共官吏，對援華方案之實施，暗加掣肘，並建議白宮與其上峯，重視中共力量，對援華措施，應予國共平等待遇，俾得根本限止國府力量，增強中共條件。

(二) 中共對國內活動：

甲、勾結民主同盟中之親共份子及失意政客，結成反政府陣線，提出開放政權，組織聯合政府，改革政治之主張，爲中共鋪平奪取政權之道路，同時滲透社會各階層，發展領導作用，煽動人民反抗征兵征糧，以擴大反政府聲勢，打擊抗日軍事之進展，使華府對國府失望，重新考慮其援華之對象。

乙、收買不滿現實之報紙、刊物，擴大宣傳陣容，響應中共主張，以淆惑國內外觀聽，困擾同盟國之對華政策。

丙、對盟邦駐華使節展開拉攏工作，尤其對美國駐華外交官吏及其軍事代表人員，力求建立良好關係，期獲同情助力，影響其政府修正對華態度，同時宣揚國府過失，散播中、日秘密媾和消息，以中傷國府信譽，挑撥盟邦情感，使蘇俄離間中、美關係之活動，在美收效。

右述各項活動，由於國府當局謀慮不周，防範未及，蘇俄中共竟得順利進行，而獲預期之效，良可慨也。

孰知共黨宣傳竟爾得手，而美國遂被賺蔽，因此中美兩國之意向似有若即若離之勢，羅斯福總統欲矯此弊，始派副總統華萊士東來，而對駐華大使高思，及駐華盟軍首長史迪威亦迭令其加意焉。

第三章 華萊士三見蔣主席

羅斯福派遣華萊士訪華之原因

羅斯福總統以國際輿論與外交報告，漸多同情中共，不滿國府，謐口鑠金。日久，對國共之觀感，因亦轉變。認爲一黨專政之國府，不改革政治，將失去人民支持，代表農民之中共，不達到目的，將採取極端行動，倘內戰爆發，不僅打擊中國之抗日前途，抑且粉碎盟國之遠東戰略，至爲不利。爲防患未然，有及時解決國共糾紛，消弭內戰危機之必要。加以民國卅三年自三月至六月中旬，平漢路南段，粵漢路北段各戰役，國軍迭次失利，同時通貨亦告膨脹，加深華府對中國局勢之關懷，羅斯福總統益感非調解國共爭端，促進恢復團結，轉移雙方對內之軍隊，用於對日作戰之前線，不足以扭轉中國之軍事頹勢。中國非戰力增強，軍事好轉，不足以克復富庶區域，確保現存領土，改善經濟生產，支持抗戰至終極階段，策應盟軍獲最後勝利。因派遣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考察中國全般情形，商討改善局勢意見，敦促國府當局忍讓爲國，與中共謀致協議解決爭端，以利抗日軍事。並囑華氏乘便應蘇俄邀請參觀中亞細亞農業之約，順道赴俄，一晤史達林總理，觀其對中國之態度。

蔣主席與華萊士第一日會談

華萊士副總統受命後，先赴蘇俄，後來中國，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廿日抵達我戰時首都重慶。

翌日華萊士副總統（以下簡稱華氏）與中國政府蔣中正主席（以下簡稱蔣氏）舉行會談，美方參與者有駐華大

使高思、公使艾哲遜，華氏隨員文森、范宣德及駐華軍事代表團人員等。我方參與者有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外交部長宋子文、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副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軍令部長徐永昌、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周至柔、政治部長張治中、交通部長張嘉璈、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後勤部長俞飛鵬等。首由華氏要求各部說明當時之軍事、財政、經濟、交通、補給各情形，隨後商討改善上述各項意見。

華氏在談話中着重中國之軍事與經濟，表示美國對中國之軍事逆轉，通貨膨脹，異常關懷。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在獲得美援後，於軍事方面，必能增強戰力，放棄過去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消極戰略，而採積極行動，改變戰局。於財經方面，必能擴展生產，增加收入，消除赤字，穩定貨幣。詎意事實表現，與吾人之理想未符，良深遺憾。設當前之軍事、經濟情勢，不予及時改善，則對盟國之軍事計劃影響至大。要求中國政府迅採有效措施，扭轉軍事頹勢，阻止通貨惡性膨脹，以利共同對日之軍事行動。

蔣氏解釋：（一）關於通貨膨脹，由於抗戰不能結束，軍費必須支出，而國課收入緊縮，盟邦援助有限，為適應事實需要，惟有增加發行。（二）關於軍事失利，由於精銳部隊多在緬甸戰場，國內軍隊，以連年轉戰，甚少整訓時間，尤多陳舊武器，在戰鬥技能與火力動力方面，不及敵軍，以此作戰，勝算自少。加以防線遼闊，戒備須嚴，缺乏有力部隊可資抽調為戰略預備兵團，適時增援，挽回戰局，惟有針對敵軍消滅我野戰軍之企圖，依其狀況，轉進至有利地帶，待機反攻。然此皆係不得已者，今盟邦却要求我政府採取措施，阻止軍事、經濟繼續惡化，吾人自當縝密考慮，若盟友能提供有效意見，則更當樂於接納。

華：經濟惡化，既係受軍事之影響，則防止通貨膨脹當先求軍事好轉；設軍事獲勝，規復若干富庶地區，增加

經濟生產，充裕國課收入，自能減少財政赤字，無須乞靈於增加發行矣。然軍事好轉，首須具有充沛戰力，故增強戰力，實爲扭轉軍事頹勢之先決行動。目前中國境內之國軍，槍械不良，訓練不足者固多；但裝備犀利，訓練有素，控置未用者，亦復不少。如西北方面現有武器精銳，戰力充沛之師甚衆，中國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監視共軍。延安受封鎖之威脅，亦以其武力不用於抗戰，而以對付國軍，同室操戈，相互牽制之兵力達數十萬人，曷勝惋惜！設中國政府以此強大軍隊，轉用於抗日途徑，增強前線戰力，則軍事好轉，可操左券！

蔣：中共居心叵測，時思乘國家抗戰艱苦之機，發動叛亂，赤化中國。我爲完成抗戰使命，必須安定後方，鞏固國本，乃以必要兵力置於西北，監視共軍行動。倘爲改善戰局，抽調此項兵力，增強前線，則西北各處防務空虛，門戶洞開，恐國軍朝撤，夕即成爲蘇維埃區域矣，此危及國本至大！國本危殆，中國政府何能抗戰到底，實現盟國之遠東戰略？

華：國共之爭，各執一詞，究竟真相如何？非外人所宜置評。惟吾人以爲延安對中央之反動，可能因其改革政治之要求，未爲中央所採納，乃趨橫決，企圖循軍事途徑實現主張。設中央採納其若干建議，並准其參加政府，共同致力於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則延安當會改變其反中央之態度，而與政府團結合作。既已團結合作，當毋庸再以兵力監視對方，則此項軍隊可依情況之要求，轉用於前線，增強戰力矣，寧非有裨於軍事之好轉？故國共息爭，恢復團結，即可增強戰力，扭轉軍事之頹勢。

中國丁此抗戰艱苦階段，分散對日力量，牽制軍事行動，而予強寇以可乘之隙，殊非明智所取，中國政府何不因時制宜，忍讓爲國，採和內攘外之決策，求抗戰建國之完成？以此，吾人建議中國政府，修正對延安之策略，稍

作讓步，俾由談判途徑解決爭端，恢復團結，消弭中國之軍事、經濟危機。

蔣：國府對與中共之談判，非不讓步，且迭作重大讓步，奈中共以國難時期，爲其發展勢力之良機；視談判場合，爲其奪取政權之捷徑，不就所爭執之問題，覓致協議，而按其竊國之陰謀，肆行勒索，迫使政府無從接納其條件，放棄解決爭端之希望，破壞團結，咎實在彼！

雖然，今談判之門，政府迄猶洞開，如彼有和解誠意，可以隨時舉行，否則，雖致府讓步，亦無裨於事。

華：國共談判，未獲結果之原因，依吾人觀之除雙方不願讓步外，缺乏公正第三者充作調人，居間斡旋，亦有關係。茲吾人建議，以後談判，應邀一第三者參與，以證明曲直，折衷偏差。若以中國人士不宜扮此角色，則邀一外國友人出任調人，或有助於消除僵局，達成協議也。

蔣：尊意良佳，吾人至表贊同，所慮者，不易覓此友耳。

華：倘不以此爲干預內政，吾人願任勞怨，且實告閣下，當余離華府前，羅斯福總統諄諄語余曰：「國共兩黨，不宜延續內爭，務須促其團結，一致抗日，倘兩黨不能直接商談合作，則可邀一友人從旁促成，吾人願任此一友人。」

蔣氏當表歡迎，并約次日（廿二）詳盡商討中共問題。

廿二日，蔣主席與華副總統舉行第二次會談，美方參與者與昨日同，我方參與者有何應欽、宋子文、張羣、白崇禧、張治中、陳果夫、吳鐵城、王世杰、陳布雷等（餘略）。

蔣：昨承華副總統相告，貴國不憚煩難，願參與國共雙方之談判，調解爭端，此種熱忱，殊可感佩！吾人與中

共談判，經已三次，均以中共勒索過份，態度頑強，致無結果，此後得盟友參與調解，或可使其改變態度，達成協議，吾人拭目以待，並願聞盟友對此問題之解決高見。

華：承閣下接納吾人參與國共談判之建議，並表歡迎，實感榮幸，吾人深知調解國共糾紛之任務，相當艱鉅，惟以貴我兩國爲同仇敵愾之盟邦，在遠東有休戚相連之關係，當此貴國進入抗戰艱苦時期，而有併發內戰影響共同對日軍事之危機，豈能漠視，無動於衷？因此，不避艱難，擬效排解之勞。至於解決辦法，無人居調人地位，似不宜預有主觀意見，將根據國共雙方所提之條件，衡情酌理，折衷斡旋，謀致協議。以此，目前余無調解腹案，當請閣下與政府其他領袖發揮高見，俾增進吾人之了解，而資調處之借鏡。

蔣：共黨問題，本一政治問題，中國政府素主以政治方法尋求解決，但以中共年來之行爲及迭與談判均無結果之事實視之，吾人對中共有新認識，即：（一）中共無意與政府再談判解決糾紛；（二）中共已放棄對日作戰之任務，展開奪取政權之陰謀，並企圖乘國難時機，完成其必備條件；（三）中共展開之陰謀，非一孤立問題，而爲國際共黨世界革命陰謀之一部，且獲國際共黨之支持，有既定之步驟與預定之目標，非到達終點，不半途廢止；（四）政治談判與軍事行動同爲共黨爭取利益，達到目的之手段，絕不以政治談判予對方爲解決糾紛之途徑；（五）除非國民政府將統治中國之政權交其掌握，則糾紛永無止境，而內戰難免爆發。以此，吾人對解決中共問題之方法，認爲須重新考慮，由談判妥協之決策，已失時效，而非對症之藥。

華：閣下所謂談判妥協，已失時效，是否對中共之問題，將以武力解決？

蔣：余意，在將徹底了解中共情形之看法，提供閣下，使閣下明瞭政治談判不能解決國共糾紛，而非即謂中國

政府改循軍事途徑，解決中共問題。倘中共繼續行動越軌，以武力實現其陰謀，中國政府爲伸張紀綱，而無法避免用武時，則將被迫予以軍事制裁。

華：若此，則內戰爆發矣！勢將削弱對日作戰之力量，設日寇乘隙進犯，恐國軍不及救平內亂，而先爲強寇擊破矣！挑動內戰，不亦危乎？

蔣：然聽任中共圍攻國軍，打擊抗戰力量；倡亂後方，動搖國本安全，則中華民國亦不待日寇征服，而先爲共黨傾覆矣！一味姑息，不亦殆乎？

華：主席閣下認爲國共糾紛難由談判解決者，無非以中共有奪取政權，赤化中國之企圖也；設中共無此企圖，國共糾紛可否由談判解決？

蔣：苟中共無此企圖，吾人相信根本無國共糾紛，即有糾紛，亦早已解決，決不僵持迄今！

華：據中共聲稱，彼等無奪取政權之企圖，僅要求政府接納其建議，開放政權，改革政治，使國家趨向進步而已。此種要求，在民主國家爲人民應有之權利，而未可厚非，中國政府何不考慮其建議，而與協商合作，同謀國家之進步？

蔣：君所述中共之言，係其欺人宣傳之詞，中共對外之宣傳，與其實際之行爲，絕不一致，不可依票面而計值。倘其行爲與宣傳相稱，則與政府之間，根本無爭執發生。政府對其建議，自當盡量接納。無如彼之開放政權腹案，企圖以其本身及親共份子爲領導中心，控制政府，操縱政令，進而奪取政權；彼之改革政治腹案，企圖在操縱政令之後，依共黨方式，建立蘇維埃政府，施行暴力政治。此實一經由政治途徑，達到奪取政權，赤化中國目的之陰

謀。中國政府同意開放政權，但反對中共奪取政權；同意改革政治，但反對中共施行蘇維埃式政治。因此，中國政府考慮其建議後，拒絕接納。

華：中國政府拒絕中共之政治建議，並以武力封鎖其邊區，監視其行動，施用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之壓力，是否可使中共就範，遵從政府意旨，解決彼此糾紛？

蔣：擺在面前之事實，已證明中共之不就範；況彼之行動爲實現國際共黨陰謀之一部，即使中共迫於情勢，意欲就範，國際共黨亦將不許；倘國際共黨領導者令其改變態度，則將作例外接受。

文森：主席閣下迭謂中共行動，爲實現國際共黨之陰謀，此國際共黨，是否即爲蘇俄？

蔣：若國際共黨之領導者，非蘇俄而爲其他國家，則余所指當非蘇俄；否則，當非其他國家。

文森：當吾人訪問蘇俄時，聞我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先生云，史達林總理曾向其表示，願在對日抗戰期間，支持蔣主席領導之國府，并對國共糾紛之未解決，極表關切；然此關切乃由於史達林希望中國對日作戰實際有效之想，而非由於其思想與某方相同之原因；同時彼以爲在遠東方面美國應佔有領導地位。

蔣：史達林作此表示，在不明中蘇關係之人士聞之，或爲吾人欣慰；在深明中蘇關係之人士聞之，或爲吾人失笑，蓋蘇俄年來對中國邦交之表現，僅有出賣中國主權，掠奪中國領土，製造中國內亂，而鮮有利於中國之事實，可爲支持我國政府之明證，其詞實違心之言也；彼或深知美國政府爲增強中國對日軍事之效力，意將調解國共之糾紛，爲免美國與其與中共有關，特對哈里曼先生作此表示藉以逃避負中共行動之責任耳！其實中共事無大小皆由其幕後指導，彼應負中共一切行動之責任，倘調解國共糾紛，而不責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將不僅徒勞，且屬大

錯！

華：史達林此項表示有無任何用意，吾人未便揣付，惟閣下之高見，當列紀錄，以便參考。至於調解國共糾紛，實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之建議，未悉閣下能否提出證據，以證明其與中共之行動有關？若有證據，自當向其交涉。否則，殊難迫其負中共之行動責任也。余意國共爭端之解決，仍應求諸國共本身之決定，而不必涉及蘇俄也。

蔣：蘇俄繼承馬克斯、列寧之野心，領導國際共產黨致力於世界革命，此為舉世皆知之事實，既舉世皆知，即足為明證，貴國有何不可向其交涉，科以負中共行動之責？且蘇俄除使中共赤化中國外，其本身亦作侵華行動，中國今日不僅外有日寇壓境之患，內有中共竊國之禍，而復側有蘇俄窺邊之憂。中國政府於防日、防共以外，更須防俄。倘盟國為求對日軍事勝利，須以吾人監視中共之軍隊，轉用於抗戰前線，以增強戰力，而調解國共之爭端，則應同時調和中蘇之關係。否則，吾人內顧之憂難除，而側顧之慮猶在，為防蘇俄侵略，仍須以重兵防衛邊陲也，所可抽調轉用於前線之兵力，恐無裨於軍事之好轉。同時中共以我撤軍有限，兵防仍嚴，企圖莫明，亦必按兵不動，保持對峙狀態，則盟友調解之努力，豈非徒勞？以此，調解國共糾紛，須與調和中蘇關係同時進行，同時解決，方期於事有濟。吾人歡迎盟邦調解國共糾紛，更歡迎盟邦調和中蘇關係。

華：閣下之意，孰難遵命！因（一）國共糾紛與中蘇關係，實為兩事，而情形不同，前者現有爭端存在，且僵持不下，影響盟國共同對日之軍事，美國基於切身利害，不容忽視，有敦促解決，參與折衝之必要。後者，過去雖有不愉快之事影響中蘇邦交，但現未爭端發生，與美國利害無關，吾人殊未便過問。（二）關於實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一事，因閣下所舉蘇俄與中共有關之證據，係屬過去之事，須知蘇俄曾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二日，宣佈解散共

產國際，已與各國共產脫離組織關係，即或藕斷絲連，暗中尚有連繫，但事屬秘密，而非公開證據，不能遽謂其有指使中共行動嫌疑，除非中國政府，能提出蘇俄在解散共產國際後，公開與中共恢復關係之證據，則吾人實難向其交涉也。余意中蘇關係之調和，應由中國政府逕向蘇俄洽商改善，國共糾紛之解決，擬請中國政府作必要讓步，與中共繼續談判，謀致協議。

蔣：閣下之意，似在避免對蘇交涉，吾人不以爲然！因此二問題，蘇俄皆係主角，必須向其交涉，方爲正確目標，亦惟有美國向其交涉，方臻有效解決；否則，解決困難。倘謂中蘇之間，現未發生糾紛，於美國無利害影響，美國未便過問，則中國爲防止蘇俄侵略，保留邊防重兵，不以增強前線，改善戰局，致妨害盟國之軍事計劃，豈非對美國有利害影響？美國將否過問？倘謂無公開證據，證明蘇俄與中共有關係，不能問其負指使行動責任，則蘇可恃此無恐，放膽指使各國共產奪取政權，實現其世界革命陰謀矣！各國共產亦特有蘇俄支持，肆行叛亂，不達目的不止矣！安能尙望中共於談判席上解決國共之糾紛？後果嚴重，擬請閣下重新考慮爲幸！

華：尊意顧慮周到，見解卓越，當予保留，容後考慮。

華：解決國共糾紛之關鍵。據吾人觀察，不在蘇俄保證中共之就範，而在國府捐棄對中共之主觀；因中國政府對於中共持有基本之主觀，堅決認定中共爲蘇俄在華之支部；中共之行動，係實現蘇俄赤化中國之陰謀，中共之言論，係絕無信用之謊詞，並基此以處理中共問題，採步步爲營之態度，不問中共提出之主張，是否公平合理，皆以爲中有陰謀存在，不願接納，以致彼此關係加深惡化，累積糾紛，無由解決！

設中國政府對中共問題，改變此種基本主觀，而以中共一切與蘇俄無關，視中共之行動在求政治刷新，國家進

步；中共之言論，出於衷誠表現，平心靜氣，考慮其建議，或亦覺其主張，不無有裨於國是。然後擇其公平合理者，採納，至當可行者，實施。則中共將無所藉口，反對政府所有糾紛可迎刃而解矣。中國政府，何不改變對中共之基本主觀？

蔣：余意最好請君先勸中共放棄其現有野心，終止其越軌行動，而切實履行提出之諾言。因政府對中共之態度，係根據中共之行爲而反應，設彼無竊國野心之行動，而履行其提出之諾言，則政府對彼根本無戒備之必要。先生何不勸中共先作洗心革面之悔改？

高思：要調解國共糾紛，吾人自當與中共接觸，勸其終止促起政府反感之行動；然中共亦嘗否認政府指摘之事實，並指摘政府一貫對其歧視，企圖將其消滅，而謂其行動係不堪政府之威脅，被迫採取者。以此，吾人亦敦請中國政府改變對中共之主觀意識，以便解決彼此之糾紛。

蔣：國共糾紛，誰啓釁端，孰爲戒首，有昭昭之事實在人耳目，固不容中共信口雌黃，顛倒是非也。意請按事實以定曲直，依曲直而主公道，持公道進行調解，則得其平矣！否則，惑於片面宣傳之詞，或存先入爲主之見，不顧事實，主觀折衝，則將失之偏頗矣！

范：閣下所言良然，調人自當如是以進行調解，然關於中共所作所爲之事實，據吾人所聞，與閣下所述者，殊有出入，是非誰屬，頗難評定，且感困惑！

蔣：是則盟友對國共糾紛之真相，尙欠明瞭也。調人不明糾紛真相，則折衝難期得其平，若此，吾人尙須將糾紛原委作必要之說明，午後會談，當爲君等述之。

上午會談終。

午後，蔣華會談繼續舉行。

蔣：由於上午之交談，發覺盟友對國共糾紛之真相，尙欠充分了解，茲爲使盟友徹底明瞭此項真相，以利折衝，特將中共違反諾言之事實，居心叵測之行爲，敘述如次：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年），中共實行與國府聯合抗日之時，曾於九月廿二日發表一「共赴國難之宣言」，向中央政府及全國人民提出四項諾言：（一）孫中山先生所倡之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中共願爲其實現而奮鬥。（二）中共取消以武力及一切蘇維埃式之運動，推翻政府之國策，並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之土地。（三）中共取消現在之蘇維埃政府，根據民權，推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中共軍隊取消紅軍名稱，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番號，隸屬國府軍委會，待命出動，對日軍作戰。

當時全國上下，以中共能改過自新，團結禦侮，亦國家不幸之大幸！莫不望其實踐諾言，以贖前愆。

不意當宋德率領第八路軍（後改爲第十八集團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軍隊講話，即謂「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黨中央的決策，是七分發展力量，兩分應付國府，一分對付日軍。決策的實施，分三階段，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本身生存與力量發展；第二階段，求與國民黨力量平衡，而與抗衡；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建立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奪取政權。」

同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抗戰前途與黨的路線問題」，亦決定如下方針：（一）擴大戰線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祕密而公開，由局部而全面，爲黨爭取合法平等地位。（二）武裝力量，決定取

治前途，在抗日期間，盡量擴充武力，以爲未來奪取政權之資本。

爾後，中共之行動，遂按上述各項策略實施，積極在各省展開活動，發展組織，吸收黨員，膨脹力量。同時朱德抵山西後，即建立晉冀豫與晉冀察兩軍區，並於年冬及廿七年春季後，以所屬各股分向冀、魯、豫三省流竄，到處摧毀地方團隊，以擴充其武裝力量。其竄至冀中之徐向前股，並圍攻河北省政府；呂正操股，圍攻博野、安國一帶之抗日民軍張蔭梧部。竄至冀魯邊區之邢仁甫股，圍攻埔山之中央第五三游擊支隊孫仲文部。竄至魯西之劉伯誠股，圍攻山東省政府。而在武漢之共黨，則領導三個外國組織之民衆團體，在支援抗日名義掩護下，計劃暴動。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七年）中共之野心更熾，除於延安方面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外，並於三月以後令朱德在五臺成立魯冀察綏邊區政府，又煽動晉南國軍韓鈞所部叛變。其山東縱隊則竄至蘇北暴動。

六月十八日，蔣委員長召見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飭其轉告延安須遵守諾言，及時糾正共軍之行動。廿九年一月間，何總長亦囑葉劍英轉告延安撤銷擅自擴充之軍隊與邊區組織。但中共不遵，反要求擴大邊區範圍與共軍編制。並於春夏期間，其在河北之共軍，進攻河北省府鹿鍾麟部與朱懷冰部；在山東之共軍，進攻國軍孫良誠、高樹勳部；在山西之共軍，進攻國軍趙承綏、王靖國各部。

政府與最高統帥部，爲平息內爭，遏止變亂，提出一解決方案，對中共之擴大邊區要求，准以延安附近及以北共十八縣屬之，對中共之擴充軍隊要求，准第十八集團軍擴至三個軍，六個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擴至兩個師。同時劃定黃河以北地區爲其新作戰地境，命將竄過黃河及長江以南各省之共軍，全數開入黃河以北，對日軍作戰，以免與國軍鄰接，發生糾紛。

七月十六日，何總長與周恩來、葉劍英等商討右述方案，經獲同意，當由周恩來携返延安，轉交朱德、葉挺飭屬遵照；同時最高統帥部亦通令國軍避免與共軍衝突，國軍固奉命唯謹，然共軍則猖獗如故！

八月間，魯西共軍劉伯誠股，再攻山東省府所在地之魯村，蘇北新四軍葉挺股，則乘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寇激戰之際，進攻省府基地之如皋、泰興，省政府轉進東臺，新四軍復攻陷東臺。

最高統帥部以共軍之不法行動，雖應嚴厲制裁，然爲顧全大局，猶予最後容忍，除由何總長於十月十九日電令共軍邊限開入防地外，最高統帥部亦於十二月九日親令朱德、葉挺，將黃河以南之十八集團軍所部，在十二月卅一日前，開入黃河以北防區；長江以南之新四軍所部，在十二月卅一日前開至江北，并於翌年（民國卅年）一月卅日前，開入黃河以北防區。

詎意該兩部抗令到序，而新四軍更向南竄，企圖控制京、滬、杭三角地區，深入皖南與浙西山地，建立據點，竟於卅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圍攻駐於皖南郎溪之國軍第四十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剿滅，解散該軍。最高統帥部，爲整飭紀律，將拿獲之首犯葉挺，由軍法審判，并明令取消新四軍之番號。

共軍經此懲戒後，其越軌行動，較前斂跡，在德蘇戰爭爆發迄俄軍屢戰屢敗期間，未有滋事，而延安對中樞態度，亦稍溫和。但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俄軍反攻獲勝，克復高加索後，中共之態度又趨猖狂。其殘留江北，擅自恢復新四軍番號之陳毅股，又乘江蘇省韓主席率部與日寇激戰之際，進攻蘇省抗戰基地之漣水，並攻國軍戰略預備隊第一一二師。而在山東之共軍，即襲擊國軍于學忠部。

迨最高統帥部嚴電詰責，延安反提出四項要求：（一）予中國共產黨以合法地位。（二）朱德所部，擴編爲三

個軍，九個師；陳毅所部，恢復新四軍番號，並擴編爲三個師。（三）黃河以南之共軍，俟抗戰結束後，開入黃河以北之防區。（四）陝甘寧邊區，改爲行政區；其他邊區，另改名義。其索價之昂，較前倍增，得寸進尺，實難接納，以致雙方之糾紛，迄今猶未解決。

以上所述，爲中共違反諾言，居心叵測之行爲，亦即國共糾紛之真相。願我盟友以第三者地位與客觀態度，公允批評，究竟數目誰啓，咎應誰尸？如曲在我，當接納盟友建議，先改變對中共之主觀，苟曲在彼，又將如之何？

華：依閣下所述，中共之行爲，誠足令人扼腕！但在吾人詢問其以前，暫時保留批評。

蔣：不過余須促請盟友注意者，即中共對內之態度，係依蘇俄之情勢爲轉移。當歐戰初期，英法處境危殆，德義未遑東顧，蘇俄獲德蘇互不侵犯之協定，保障西陲，利於實施西守東進，赤化中國之陰謀時，中共即行動猖獗，態度狂妄，積極徇陰謀而擴張。在德蘇戰爭爆發後，蘇俄屢戰屢敗，自救不遑，無力赤化世界時，中共即歛束非法行爲，僞裝和遜態度，極力求政府之諒解。迨蘇俄得盟國援助，反攻獲勝，局勢好轉，對反法西斯戰爭與赤化世界任務，可以同時進行時，中共又拋棄和遜態度，恢復叛亂行爲，由此以觀，足證中共之動靜，皆基於蘇俄之指導。縱然第三國際在名義上業已解散，而國際共產黨仍歸蘇俄統率，遂行世界革命之陰謀。中國人民亦深知中共之傾向國際主義之成份，較多於傾向祖國政府之成份。

華：中共此種行動，對抗戰官兵之影響如何？

蔣：予前方將士之影響甚爲不利！因彼等以中共如此行爲，政府不予嚴厲制裁，伸張綱紀，而與談判，謀致妥協，甚表不滿，且感困惑！深恐中共在蘇俄支持下，竊取政權成功，彼等身家財產，將無安全可言，赤色恐怖，威

脅其抗日門志，以此，士氣沮喪，軍事失利。

范：目前蘇俄本身之情勢，尙難樂觀，似不致指使中共放棄抗戰任務，執行其他陰謀，而破壞國府抗戰建國之成功。蓋日寇征服中國後，納粹勢必要求其北進以攻俄，蘇俄陷於兩面作戰之情勢，危險孰甚？中共賴於此時期望蘇俄支持其奪取政權，實難想像。

蔣：中共自美參戰後，已堅信日寇無力北進，遼東戰局，無須中國抵抗，日本亦將失敗。因此，彼等目前積極進行赤化中國之陰謀，而希望政府抗戰失敗，俾增強其自身之地位，以利奪取政權也。

范宣德：中共以外若干進步人士曾告吾人，中國共產黨乃一實行土地改革之民主集團，彼等無意奪取政權，且亦無此力量，惟以政府忽視廣大農民之困苦，未行土地改革，致懷不滿，其目前之行爲，不過爲促起政府實施改革制度之積極表示耳。倘國府能接納其建議，而許其參加政府組織，則彼將樂於與政府合作。

蔣：此一說法，當爲依附共黨之份子歪曲宣傳，殊非事實。因中國共產黨（一）擁有足以叛亂之龐大武力。（二）依以往與現在共區之事實，終年對人民鬥爭、清算、沒收、殘殺、而人民則長期恐怖、饑餓、囚禁、奴役、死亡。即貧僱農階級者，亦勞作所獲不足征獻，流盡血汗不得果腹，較之非共區農民之生活，相差天壤。（三）就其軍事準備及行動觀之，係積極向世界革命之途徑邁進。凡此種種，絕不類一愛國家人民、求政治進步之民主組織，而適足反證其爲一實現馬列主義之共產黨徒，其共產化之程度，較蘇俄人爲尤甚。且彼等之土地改革，主張以革命手段達成，此乃一無人道之殘酷行爲，不合本國情勢之需要，惟一適合中國之所需者，乃我國父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所示之平均地權政策。中國政府原期循序實施，奈自底定全國之後，即遭共匪叛亂，倭寇侵略，國無寧日，妨

害實施！然抗戰結束後，即予實行，至許中共參加政府一事，在其改變行為及達成協議前，暫不考慮。

華：抗日戰爭，關係國家民族之存亡禍福，竊以為國府應多予人民以陳述意見之機會，國民黨應多予效忠政府之其他黨派以參加政府，共濟時艱之機會，俾全國團結，上下一心，以利抗戰之前途。

蔣：尊意良然，凡有利於國家之建議，效忠政府之人士，國府自當虛懷接納，延攬贊助，以收羣策羣力，一德一心之效，倘中共如此，亦一視同仁。

華：主席閣下以為中共應當如何，方可解決國共間之問題？

蔣：中共如履行其所發『共赴國難宣言』之諾言，衷誠擁護政府，而充分表現於所接受之軍政任務，則彼此之爭持，解決實極簡單。

華：吾人極願如此，但根據閣下之所述，恐不易為！

蔣：彼等對貴國殊感興趣，余意由貴國曉以大義，勸其接受政府意見，或樂於從命也。

華：吾人固願竭盡棉力，居中斡旋，倘彼堅持成見，則將如何？

蔣：此余所以前向閣下建議，須資成蘇俄保證中共就範，方於事有濟也。

華：無論缺乏迫使蘇俄負此責任之充分理由，且蘇俄當局亦曾表示中共與其無關，即相強亦殊無益也。

蔣：若然，則請盟友對國共之爭執，暫轉超然態度，彼等或將於無人理會之下，願與政府謀致解決，然此非吾人謝絕盟友調解之謂也。

至是外長宋子文發言：吾人有一申明者，即中國政府雖然要求中共服從政令，但無意干涉其地方行政，或罷免

其願與政府合作之軍政人員。

華：此固良佳，然吾人尤望國府作更大之讓步，俾早日獲致協議。因國共之不合作，非僅削弱中國抗戰之力量，抑且影響盟國整個之局勢，羅斯福總統所關懷者，在於此耳，而非有恙于涉他國之內政也。今閣下等以爲吾人超然旁觀可促使中共願與政府謀致解決，吾人當予考慮，惟須鄭重爲閣下等告者，目前中國抗戰情勢之發展，至堪焦慮，中國政府切勿過於求取有利條件，延宕解決時間，致增大軍事危機，妨害美國在遠東之行動，幸甚！

蔣：羅斯福總統及閣下之意，吾人已深切了解，在當前之世界情勢下，吾人唯一迫切而神聖之任務，爲增強作戰力量，協同盟國擊敗侵略之日寇。余當悉力以赴，求其達成。對中共之爭端，如其具有誠意謀致解決，政府決不苛刻要求，俾易迅速達成協議，且決循政治途徑進行，此可請閣下轉達貴國總統及朝野人士釋其疑慮也。

華：善甚！

范宣德：中共之真相，人言而誅，吾人擬派一軍事觀察團及其他人員赴共區一行，實地考察其軍事、政治之情形，以明究竟，主席以爲如何？

蔣：余以爲此舉，將對君等之目的毫無裨益！因貴國之人員抵達共區後，一切行動將由彼等支配與監視，絕難自由深入民間及軍中明察暗訪，所得見聞者，僅爲毒藥外表之糖衣，將被其眩惑、利用作義務之宣傳，以增吾人解決問題之困難，共區之行，似以勿去爲佳。

是日會談終。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蔣主席與華萊士繼續會談。

蔣：副總統閣下，昨日貴方提出派一軍事考察團前赴共區考察，余未表贊同，閣下等或以爲憾，因而是益信彼等之宣傳。余經一再考慮，以爲證實中共之真相，無過實地觀察，倘貴方認爲有此必要，而感興趣，儘可派人前往。

華：良佳！俟必要時，派遣之。不過吾人對調解國共糾紛之事，經審慎考慮，決定尊重閣下意見，保持超然態度，暫不介入，願閣下好自爲之。

蔣：倘此決定非誤會吾人有拒絕盟友調解之意，而係出於審慎考慮之結果，則吾人當尊重閣下之意志。其實中國政府歡迎盟友調解國共爭端，尤其歡迎盟友斡旋中蘇關係。因中蘇間問題，如得美國居中斡旋，改善關係，較易實現；否則，吾人對俄殊少信心。閣下此次來華，道經蘇俄曾與史達林晤談，彼對中蘇關係，當對閣下有所表示，意見如何？願聞梗概。

華：蘇俄當局曾告吾人，彼之人民在華旅行、居留或營正當商業，皆爲中國政府及其人民以間諜或匪人視之，而嚴密監視其行動，未能享有他國在華僑民之待遇，殊表憤懣！尤特別指稱在新疆省內曾與地方政府簽訂合法條約，合作發展經濟資源之利益，未獲中國政府之承認；有數十萬居留新省之俄僑，具有悠久之歷史，未獲中國政府之保障，蘇俄政府殊難漠視。爲維護其僑民安全與條約之權益，必要時，將採取有效措施，以爲外交後盾。

蔣：蘇俄當局如此說法，顯係爲其未來之挑釁行動而辯護，中國政府對入境外僑，除有共黨或間諜行爲者必須監視外，其他外僑，皆依外交條約予以保護。蘇俄人民在各國行爲如何，世所共知，彼對我西北邊省覬覦已久，外蒙、唐努烏梁海，由其導演獨立後，皆置於掌握。年來復在新疆發展共黨勢力，勾結不肖官吏，簽訂非法密約；並

組織軍隊，供給軍火，挑撥民族感情，煽動叛亂，種種不法行爲，中國政府確有確證；幸指示地方當局處置適當，未生事變，今欲藉口保僑，重演外蒙獨立之歷史，則其行爲與日寇侵華之罪行並無二致。中國政府爲維護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對來自日本之侵略既予抵抗，不能對來自蘇俄之侵略則予忍受也。

華：閣下之意，竊期期以爲不可！蓋盟國反攻伊始，正宜增強戰力，擴張戰果，以期擊敗軸心，若中蘇兩國發生衝突；以其用於擊敗日寇之兵力，轉而用於攻擊同盟之友邦，是摧毀盟國勝利之果，而資敵以可乘之隙也，不智孰甚！

蔣：此非不知，無如蘇俄將欲侵略何！

華：上述之不利，非僅中國已也，蘇俄亦復如之。余會以此勸蘇俄，蘇俄頗有同感，尤爲重新考慮，然此並非已改變態度之謂也。茲余建議，中蘇不愉快氣氛，亟宜終止，不可加深惡化。中國政府應循外交途徑與蘇俄舉行商談，在會議席上廓清彼此之疑慮，務致改善關係之協議，同時對新疆各民族之政治要求，多予考慮，而力求遂其願望，俾免爲蘇俄利用，則善甚矣！

蔣：閣下之意，吾人至願考慮，中國政府對改善中蘇邦交及實現新疆各民族之願望，在無損中國主權及政府威信之原則下，任何可以避免衝突之措施，不惜委曲求全。惟蘇俄對中蘇關係之態度，似存極大陰謀，懷有領土野心，可能乘中國無力西顧之時會，提出苛刻要求，除非美國政府參與會議，協助解決，則中蘇會談殊難望獲致協議也。

宋子文：吾人茲重申前議，歡迎美國政府參與中蘇會談，協助調整兩國邦交。

華：中蘇商談涉進邦交，純係兩國間之事，與其他國家無關，美國參與，殊感尷尬。設蘇俄對華政策，果如蔣主席所言，存有其他企圖，而力求實現，則美國居間折衝，亦難促成協議，況美國不能非份干預盟邦之外交乎？中國政府欲望美國對中蘇問題參與任何會議，殊不可期。

不過就余之觀察，蘇俄在作戰期間，尙不致對華有何不遜行動，若在擊敗軸心國之後，而中國之形勢懸殊，則難逆料，余意中國政府宜及時與其尋求解決，事較易爲，遲則難矣。

蔣：中國政府，殊願從速與蘇俄商談，如美國未便正面參與折衝，亦請從旁斡旋，促進中蘇兩國早日會談，和諧改善彼此之關係。

華：余對此未便擅作承諾，願以尊意轉達羅斯福總統，請其考慮，再行答覆。

蔣：善甚。

上午會談終。

午後會談，商討事項多爲雙方同意改進之各項實施技術。最後，華副總統致詞，表示此次會談，彼此皆以坦白誠懇態度交換意見，使其對國共問題及其他實際情形，增進了解，收穫良多，深爲滿意，並表感謝。蔣主席答詞對華氏不辭勞苦，萬里來華排解內爭之熱忱，亦表感佩；並請其轉告羅斯福總統，如美國願居間斡旋中蘇關係，並促成兩國從速舉行代表會議，將極表歡迎。

六月二十四日，華萊士副總統離渝返美，蔣主席夫婦親赴機場送行，三人曾娓娓續談，後據美國國務院透露消

息，當時談話之要旨如次：（一）蔣主席對於華副總統訪蘇時，曾以羅斯福總統代表資格，致力改善中蘇關係，一再表示謝意。（二）中共問題雖屬內政問題，中國政府實歡迎美國協助解決；不過中共乃一全無信義之黨徒，羅斯福總統出任調解將有啼笑皆非之苦，但總統甘願冒險任之，中國政府決不以此爲干涉內政也。

右錄華萊士三見蔣主席，爲對話體，是乃吾國外交檔案中之資料，已成爲中華民國歷史的文獻矣。

美國國務院檔案，亦有同類的記載，惜略焉不詳，惟亦有參考的必要。蔣、華二氏對談爲一事，實際紀錄又爲一事，事後發表又爲一事，後人記載又爲一事，欲求信而有徵，誠有兩者並存的必要。

中、美兩國檔案，關於華萊士使命的記載，彼此相差距離，並不甚大。「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一書，編訂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關於蔣、華兩氏談話的結論，作如左的評述：

「十七年來之慘痛內爭，以及嗣後在外患之下勉強之合作，造成根深蒂固之仇恨、猜忌、觀點與目標之不同，以及不願忘懷往事，凡此皆使可作爲有效供獻之局外協助，大受限制，其嚴重之程度，有爲當時所未能完全見及者。」

右列結論作於事後，字裏行間，祇有惋惜之意，尙未十分瞭解共產黨非美式生活的政黨，乃國際侵略之大集團，以蹂躪全人類人權，達到征服世界而後已，昏亡齒寒，美國亦不例外，惜美國人未早見及此也。茲將美國白皮書關係於華萊士之使命記載錄之如左：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春，羅斯福總統遣派副總統華萊士前來中國研究如何加強中國抗日戰爭之努力，華萊士先生趁機往訪蘇聯之中亞細亞，短期考察農業發展情形，並於六月下旬抵達重慶。在訪華期間，華萊士曾

就彼此有關事件與委員長數度長談。于此數次談話紀錄中，可見討論問題之範圍甚廣，惟大半與本書所述之事件及問題無關。

「于六月二十一日與委員長談話中，華萊士先生贈總統會向其表示如國共不能合作，彼等可『邀一友人』，總統並表示彼可能即係此友。文森於次晨談話中述及史達林會對駐莫斯科哈里曼大使表示，願在作戰期間支持委員長，並對國共問題之解決極表關切。此乃由於其對實際有效對日作戰之關切，而非由於任何思想上之考慮，彼以爲美國在遠東應佔有領導地位。」

「在六月二十二日午後談話中，委員長對中共作長篇之指摘。彼謂共產黨行動對中國士氣會予不利影響。彼並謂縱然第三國際在名義上業已解散，中國人民仍認共產黨傾向於國際主義之成份多於中國人之成份。彼更堅言共產黨希望中國對日抗戰失敗，庶可增強其自身地位。彼等對此種發展並不願慮，因彼等堅信無需中國抵抗，日本亦將失敗。委員長力斥共產黨宣傳所謂彼等僅爲土地改革之民主份子之一說，並謂彼等共產化程度較俄國人尤甚。彼謂如共產黨能同意擁護政府，在政府行政方面接受和平及政治之任務，則共產黨問題之解決實極簡單。彼敦促美國對共產黨維持『超然』態度，則可促使彼等更願與國民黨獲致解決。」

此次談話時外交部長亦在座，談話至此，即插言政府雖然要求共產黨服從其職權而並無意干涉地方行政或免除其願與政府合作之官員與軍官。最後委員長謂彼了解羅斯福總統之政策，並請轉達總統彼對共產黨問題，極願以政治方法解決之。

「委員長于次晨六月二十三日談話中，突推翻拒絕美國人赴共區之前議，並同意美國軍事觀察團可以前往。其

後談話中復提出俄國問題。華萊士先生強調中國境內，不應許可興起與俄國發生衝突之情勢一點，委員長表示同意。並謂凡無損中國主權，任何可以避免此項衝突之事項皆可做到。華萊士先生復謂殊難期望美國參加任何談判，委員長亦表示同意。並謂，中國願儘早尋求機會與俄國商討。

「在當日另一次談話中，委員長請其將下列意旨轉告總統，『如美國能改進中蘇關係並能促使中蘇兩國代表會議，蔣主席對此項友誼協助，將極表歡迎。』」

「六月二十四日委員長於赴機場時，對於華萊士先生以羅斯福總統代表資格致力於中蘇關係之改善，曾兩度表示謝意。委員長且謂共產黨問題雖屬內政問題，惟彼仍歡迎總統協助解決。彼謂堅決表示共產黨乃無信用之人，但如總統甘願冒險協助，他自樂於接受此項協助，而並不認爲干涉內政。」

「結論

「一九四四年九月，當赫爾利將軍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資格擔任調和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將軍關係之使命，並負責執行其他有關軍事物資之任務時，談判又進入一新階段。時距赫爾利將軍原負任務終止後，不及數月，由於美國之參預及進行抗日戰爭之需要，國共鬥爭即轉向國際方面。此乃自一九二七年蘇俄顧問團被逐返國以來所未有之現象。十七年之慘痛內爭，以及嗣後在外患之下勉強之合作，造成根深蒂固之仇恨、猜忌，觀點與目標之不同，以及不願忘懷往事，凡此皆便可作爲有效供獻之局外協助，大受限制，其嚴重之程度有爲當時所未能完全見及者。」

第四章 美駐華大使高思之報告

當華萊士來華訪問之際，美國總統羅斯福但知美軍在太平洋對日軍逐島越島作戰犧牲的慘重，而未瞭解中國國民政府以劣勢裝備對高度工業化國家如日本作長期抗戰的艱苦。只知國軍與共軍比肩聯合對日作戰，有利於太平洋美軍逐島越島作戰之進展，而未瞭解共產黨對於抗戰決策爲以百分之七十擴張自己勢力，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政府，百分之一對付日本（簡言之百分之九十對國民政府，百分之十對日本，此係毛澤東民國廿六年十月之密令）。祇知國軍胡宗南所部數十萬圍堵延安蘇區爲兵力使用不經濟，而未瞭解國軍居於日軍與共軍兩面夾擊的絕對不利地位。

有此「三不瞭解」橫亘於羅斯福總統——的胸中，重以國際共黨宣傳攻勢，爲全面滲透組織網。莫斯科、倫敦、華盛頓、巴黎、延安爲互相呼應，互相配合者，而國民政府之宣傳或解釋，無論對美、對英、對法或對其他國家，均爲單線之宣傳與解釋。夫以單線宣傳與解釋，對全面滲透組織網的宣傳攻勢作戰，鮮有不屈居下風者，而國民政府亦難例外。美國政府對於併肩作戰之國民政府之誤會，與日俱甚，誠爲無可如何者也。使華萊士此行，能因實地觀察而有若干瞭解，以消除上列之「三不瞭解」，則中美二國之隔閡，不難化除，決不至有爾後「一筆勾消」之悲劇出現。華萊士來去匆匆，不能消除「三不瞭解」，情有可原。倘有「使於四方不辱使命」之皇華大使，以彌縫缺憾，仍有挽救之餘地。其奈是時美國駐華大使高思爲深受左翼分子與所謂「開明人士」之包圍，對於上列「三不瞭解」，仍然如故，故其所發報告，無一對國民政府有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上所已經披露者，已有數點如下：

美國駐華大使高思，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提出重要報告於其國務院，報告書中之要點，謂：彼曾應蔣委員長之招，商談中共問題，達一時半之久，委員長謂「美國政府對此問題不甚了解，高思大使實負有促進此項了解之責」，委員長除對中共之缺乏信義及狡猾善變外，並進而指出「美國政府勸令中國政府與中共妥協之態度，適足以加強中共之頑抗」，「中共所提條件，不啻要挾政府向衆所周知而接受外國支配之政黨，無條件投降」，委員長又云：「美國應令中共與國民政府妥協，並服從國民政府」。

高思答謂：「美國政府對於中共之主張，係毫不感興趣，國共雙方現正互相爭雄，反將共同抗日之努力，視爲次要，故美國不得不於此一中國內政問題求解決，對日抗戰，茲已屆嚴重階段，故此一問題之解決，極關重要。」高思對蔣委員長所負艱鉅責任，表示同情，並作如下之結論：

「吾人並未建議中國政府接受中共條件，吾人所重視者，僅爲中國之統一，及目前危急之安然渡過，吾人深望此一問題，能由中國以和平方法，自行解決。」

據高思報告，彼於聆蔣委員長痛斥中共缺乏信義之言論後，即向蔣委員長面陳稱：

「美國大使館亦常聽到中共之同樣論調，謂國民黨缺乏信義，彼認爲此種互不信任之心理，應設法予以消除，高思之個人意見，以爲中國各黨派最有希望之代表，如能參加政府，並分負政府責任，則此一問題，或能獲致解決，彼固知國民黨之理論，爲一黨專政，但仍熱望此種困難，得以早日克服，此時若不於廣大基礎上，使各少數黨派，均有參加政府機會，則由各黨派，或特殊團體，遴選得力代表，應邀出席重要作戰會議，決定並實施作戰計劃，以應付中國面臨之危機，或亦不失爲部份解決辦法之一」。

高思認為上述共同負責，或能發展為中國統一之合作基礎。

蔣委員長謂：「此項建議，至少有研究價值」。

高思報告其國務院另有重要一頁，內及：

「立法院院長孫科博士，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與美駐華大使館某官員談稱：『彼曾與蔣委員長坦白論及中國軍隊必須重建情勢，始有力量，彼同時指出，有效進行重要阻礙之一，為以三十萬政府最優良之軍隊監視中共，中共大量軍力，亦因之受牽制，此等軍力，前曾用之抗日，成績斐然，現必仍具有此項效用。』孫博士謂：彼曾告知委員長：『中共無意赤化或統治中國，且亦不能赤化或統治中國；中共此時所欲者，厥為與國民政府合作共同抗日。』孫博士補充說：蔣委員長習於自作決定，而不聽勸告。孫博士承認彼之言論，對委員長有若干影響，且委員長心中，亦正自謀變換其若干意見之道。美方意見，如不以高壓方式出之，對於上述變換進程，當有助力。」

右之孫博士對美國駐華使館的談話，載於白皮書第四三頁。證以該白皮書披露後，孫博士不僅未作任何否認，而且默認到底，不能使人無那個思想。孫博士時任立法院院長，位非不高，責非不專，對於國民政府處日軍與共軍夾擊之中，一似毫無聞見，故對政府以三十萬最優良之軍隊監視中共，未能作有利於國民政府之解釋，殊為失望。此外又述彼曾告知蔣委員長：中共無意赤化或統治中國，且亦不能赤化或統治中國……云云，驗之事後，無一不與事實背道而馳。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後之知識份子繼孫博士而起者，應知所擇言矣。

美國務卿赫爾據報後，即通知高思謂：總統及國務院業已慎重研究其報告，並同意高思之意見，並着高思再向蔣委員長作一關於政府及軍事情形，明確坦白表示，國務卿提出委員長所建議美國應令中共與政府妥協一節，與委

員長前向副總統華萊士所提意見相類似，鑒於委員長自願與中共妥協，並鑒於非中共控制區域，對政府亦存有異見，國務卿授意高思大使，向蔣委員長表示：

「如委員長能召開一會議，則大使可將其本人及美國副總統，已向委員長提出之意見，轉向重慶中共代表提出之。」

高思大使並將下述各點，向中共代表提出之：

- 一、無論在進行戰爭方面，抑準備和平方面中之統一，均屬急需。
- 二、寬容精神及基於互讓之好意，對於完成統一，實屬重要，政治思想不同之人士，皆應合作，以抵抗日本，各方如能以勝利爲第一要務，則所有異見，自不難予以消除。

高思大使向蔣委員長表達意見：

- 一、美國總統與國務卿以爲高思先生所建議之聯合會議，應予以慎重考慮。
- 二、國民黨不獨對中共問題不能解決，即對其他地區非中共人士之異議及不滿，表示關懷。
- 三、彼等對於中共及其他不滿政府之處境如何，無所容心。

但熱望中國人民，能在真正代表民意並富有容忍態度之政府領導之下，對其自身所有物質上精神上之資源，予以自由發展及利用，以謀對日制勝，及永久民主和平之爭取。

高思大使雖將上述美國國務院之指示，轉達蔣委員長，但頗懷疑委員長是否願採或能採必要步驟，予以實施。高思大使鑒于國共雙方，積漸猜忌，且對現實，均乏認識能力，故於國共雙方磋商前途，頗表悲觀。高思大使甚至對

日戰爭進行中，中國有無與美國通力合作之誠意，亦表懷疑，因斯之故，美駐華大使館於是年十月及十一月上半個月期間，所迭次向其國務院報告，充滿悲觀氣氛。其所描述者，總不外於中國內部失和，情緒低落，所招致之惡劣局面而已。

是年十一月一日高思辭駐華大使職，於十一月卅日赫爾利奉派繼任，於翌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呈遞國書。

第五章 史迪威堅持裝備共軍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四月，中華民國抵抗日本侵略既將七年。日軍爲欲打通平漢鐵路，開始渡越黃河發動攻勢。至五月十八日，洛陽失陷。湯恩伯部受日軍壓迫轉移陣地之際，橫遭共軍之襲擊，此出於突然未能預防之打擊，終至閉封不守，其一一零師師長江川，因人馬墜崖，被日軍所俘，禁閉於北平集中營。

前項橫截國軍者，爲共黨聶榮臻部，而美國方面之報告其國務院，則謂「爲當地民衆所乘」，若果據報云云，則中國民衆願爲日軍所征服，反不樂於國軍之抗戰，即此一端，可見美國國務院竟爲少數親共份子所朦蔽，懵然無覺。

五月廿七日日軍長驅入湖南，沿粵漢鐵路南進，於六月六日沅江淪陷，長沙西翼，頓失屏障，遂至六月十八日長沙失陷，日軍乘勝進窺衡陽，國軍苦守，迨八月八日亦告陷落。當時國軍以桂林爲空軍基地，深受威脅，雖奮力抵禦，卒於九月中旬日軍直搗廣西。同時，日軍於浙江沿海，發動另一攻勢，麗水棄守。

日軍窺伺桂林，具必得之心，於十一月十二日終被攻佔。

此時盟軍在緬甸境內，薩爾溫一帶，亦遭挫敗。一般戰局，益形複雜，美國國務院認爲：「中國作戰能力，已不復成爲中國戰場之主要因素。」先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向蔣委員長發致如下文件，擬任命一位美國將領，統率中國三軍，以爲解救軍事失利之最佳辦法，原文節稱（註：羅斯福來函在衡陽未失陷之前）：

「余以爲現今局勢，已極危殆，爲拯救此危局計，所有在華武力，包括中共武力在內，亟須交一將軍，全權予以調度……余擬擢升史迪威爲將官，並建議閣下，自緬甸將其召回，置於閣下直接管轄之下，授以統率中美各部隊之全權，課以阻遏敵軍深入之全責。余甚感中國局勢，已甚危殆，倘徹底及即時之補救辦法，不能立予完成，則其影響於吾人共同目標之達成，誠非淺鮮。」（註：查此時美國未有部隊駐華，各部隊多延擱軍事專家爲顧問，即顧問團所指派之人員大都協辦後勤事務。）（就此函言，主動者爲羅斯福，彼只見到軍事失利，而不顧到中國之國體與國格。）

蔣委員長復函，其大意謂：「羅斯福之上項建議，原則上贊同，惟實施建議之第一步驟，應由羅斯福先派一熟悉中國政治軍事情況，而足以獲得羅斯福信任之美國大員，邀來重慶，商討進行。」等情。羅斯福又於七月十五日致函蔣委員長，略稱：

「余甚樂聞閣下，在原則上已接受史迪威將軍，置於閣下直接管轄，授以統率所有中國軍隊之絕對權力……予今物色一具有政治遠見及政治能力之私人代表，以協助閣下……同時余謹再度促請閣下，立採必要步驟，俾史迪威將軍於短期內能就新職。」

及至八月十日羅斯福總統，又復致函蔣委員長：

「余謹建議，余委派赫爾利將軍爲余個人代表……關於閣下與史迪威將軍關係之調整，余信其必有貢獻……」

同時，羅斯福又建議，加派納爾遜先生偕同赫爾利將軍來華，處理關於租借辦法，及其他經濟問題，對此建議

，蔣委員長亦表同意。

八月廿三日羅斯福函蔣委員長，催促授權史迪威統率中國全部軍隊，其函略開：

「對於赫爾利將軍與納爾遜先生代表美國，所任重大使命，閣下已表同意，無任欣慰。余派往閣下之個人代表人選，現既已決定。余認爲目前所需軍事積極步驟，亟應予以採用。余謹促請閣下，立採必要措施，俾史迪威將軍能於短期內在閣下直接管轄之下統率所屬中國部隊——余深信赫爾利將軍及史迪威將軍，對閣下所面臨之政治問題，必當有一適當瞭解。至余之所以堅請閣下迅授史迪威將軍以指揮全權者，無非因此事如進行過遲，對於中國及其他盟國，早日擊敗日本之計劃，或有嚴重影響。」

余又以爲劃由史迪威將軍統率下之軍隊，不應有何限制。舉凡用以保衛中國攻擊日本之部隊，均應由其指揮（此指中共部隊亦包括在內）。當敵人正迫近吾人，且有釀成嚴重後果之時，凡能協助吾人殺敵之人，吾人不應拒予借重。

余相信赫爾利將軍必能促進閣下與史迪威將軍之關係，從而對於史迪威將軍執行職責，及其對有關政治問題之瞭解，有所裨益……。」

前函所述，蔣委員長頗感爲難，蓋中國對日抗戰，而統率三軍之權竟交予外國軍人，此對於國體國制與國家主權，均有所損，雖然美國與我國同盟抗日，委員長對史迪威之委派，根本仍在未確定之間，試觀羅斯福七月十五日之第二函件，彼便自行證實，謂委員長已同意其委派史迪威統率中國三軍，其實委員長僅於原則上贊同其意見而已。八月十日則更進一步，似說成委員長贊同於前，而延宕委派史迪威於後，如此翻覆陳辭，再三解釋，則委員長實

未允許羅斯福之片面建議也，甚爲明顯。至於中國部隊包括中共在內，美國國務院始終認中共爲土地革命者，雖經我方解釋，甚至提出證據，美國終不置信，以爲國民黨不欲奠立民主，故予毀之。即若此次湯恩伯部一一零師確保中共背側兩面突襲，亦不之信。同時史迪威滿以爲可以作中華民國之掌握實權者，忽被委員長拖延扼煞，其內中怨忿委員長，乃更造作種種之謠言，向羅斯福報告。

至九月初旬，羅斯福又致函於委員長：

「關於中國戰局之最近報告，使此間參謀長官與余個人，深信閣下將於最近面臨一余向引爲憂之重大危機……余於最近數月內，曾一再請求閣下迅採激烈行動，以消弭此一迫近中國及閣下之危機，事至今日，閣下尚未授予史迪威將軍以統率中國部隊之全權，致使華東重要區域，相繼失陷，其可能後果，誠難設想。」

羅斯福總統一再而三推薦史迪威於蔣委員長：「置於閣下直接管轄之下，授以統率中美各部隊之全權（所有在華武力，包括中共武力在內）。」在聯合作戰上彼此協商，原爲無可非難之事。惟美國的看法，與中國的看法有天淵之別。美國誤認爲國軍與共軍同等裝備，有利於太平洋戰爭與及抗戰勝利之遂行，而未知共軍自始挾有顛覆政府之企圖，且叛跡昭著，若予裝備，不啻養寇兵而資盜糧，後更難制。美國誤認撤除邊區封鎖，可以使圍堵與被圍堵部隊，能轉用於對日作戰，恢復若干重要城市，以聲援美軍在太平洋越島逐島之攻勢，而未知圍堵部隊倘轉用於其他戰線，難保不爲日軍吸住，而被圍堵的中共部隊，素來陽奉陰違，不服調度，難保不乘隙抵瑕，以襲取川陝而有之，此中複雜微妙，危機重重，在抗戰時代言之，無人置信，況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史迪威將軍者乎？

先是魁北克會議中，盟國決定盡當時所有之手段打通通往中國之陸路交通線，俾予我國以充份之援助，使亞洲

戰場能獲最大之效果，於是成立東南亞盟軍統帥部，以英國蒙巴頓海軍上將爲統帥，而以史迪威將軍爲副。至中國戰區之軍事則仍歸蔣委員長指揮，並仍以史迪威將軍任參謀長。在緬甸作戰之英美空軍，合編爲東方空軍總隊，由美國斯特梅耶將軍任司令，此時我國駐印軍正協同美國工兵迅速伸展雷多公路，並於公路平行敷設油管，俾不久可以大量增加輸往中國之汽車燃料。

史迪威將軍因是獲以中國戰區蔣委員長之參謀長地位，向蔣委員長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並將邊區封鎖解除，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是爲史迪威將軍事件的癥結。

本年（民國四十九年）十月國防研究院印行「蔣總統集」中有關史迪威事件之記載如左：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同我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共黨的陰謀毫無了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之初，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右列「蔣總統集」記載，可以補美國白皮書之闕漏，而史迪威將軍事件，亦因此而昭然若揭矣。

中國私家戰籍有此記載者無多，有之，其惟張君勳博士「第三勢力在中國」英文本中，現其點滴，而附以史迪威事件之當時環境與背景，見仁見智，雖各不同，然究不失為近代史資料之一，茲譯之於左：

「自重慶繼漢口南京之後，成為戰時之第三都市，廣西省會桂林，以戰時第四都市之地位而告陷落，四川原係華西首善之區，能供前方百萬大軍之糧糈，因此一般人士俱以重慶苟告淪陷，政府將不知應播遷何地為慮。西陲之西康，可能為政府避地之所，然其地多山，五穀不生，且尚有較戰時首都尤為重要之問題，亟應加以考慮。即：如何通過民主方式，使軍隊及政府機關獲得新的生機，如何能使國共兩黨衷誠合作，及如何能探悉蘇聯將來可能支持中國共產黨之態度。此三項問題複雜綜錯，若非同時尋求其它兩項之答案，幾不可能獲致任何另一問題之解決。種種困難。使蔣介石氏之精神，似陷於迷宮之中，無以自解。軍隊及政府機關新的生機，意即考核及改組政府，應使其成為一容納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之聯合政府抑或戰時內閣，但因蔣氏堅持聯合政府僅能於中國政治發展至行憲階段始能組成，以致此一民主方式不能實現。至於共產黨方面，則堅謂政府一日不民主化以保障基本之自由，即表示蔣氏一日不放棄大權獨攬。因此，共產黨不擬將軍隊交與政府，或集中其力量以擊敗日本，同時，在克里姆林宮政

策未澄清之前，中國共產黨政策之本質，及其究係獨立抑或僅係蘇聯之工具，亦無法斷定。

「正值種種因惑問題尚未解決之際，另一煩擾之因素又告發生。即蔣氏與史迪威將軍間之矛盾，羅斯福總統要求蔣氏對史迪威予以指揮所有中美軍隊之地位，並予以在抗敵工作中所需調度及指導之全部權責，此意是否可行，或事實是否因此變質，頗難臆測，蓋似此美國政府對中國情勢之處理，未免過於直接，但蔣氏對供應共產黨以美式裝備之問題，終於與史迪威氏公開破裂，而渠等二人遲早攤牌之不可避免，已至爲明顯。史氏認爲：戰爭之主要目標，係擊敗日本，故所有軍隊，無論是否共產黨，爲了抗戰，一律應予以訓練及裝備。然蔣氏對問題之看法則有所不同，在蔣氏心目中，敵人有二：一爲日本，一爲共產黨，若將美式裝備供應共軍而令其強大，則渠可能爲其打倒。

「某日，蔣介石氏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領袖人物至官邸談話，余亦側身其間，但不知何事將付諸討論。會議以談河南問題開端，然後蔣氏突將目標轉向史迪威，並告余等以渠二人對武器分配問題上之歧見。繼謂：『余爲總司令，史迪威則係余所任命之參謀長，何能未經余之批准，即建議將武器配與共產黨？渠對於中國及共產黨一無所知，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爲余之責任，渠絕對不能過問。』此一番言詞，頗令余等驚異。余等僅能謂對美談判，務必頭腦冷靜，態度公平，但此後二人間之磨擦顯然達於頂點。正如前章所述，在蔣氏以內政爲理由，而不將武器配與共軍，藉以維持其最高權力意念之下，共產黨在華北之力量大爲增長，史迪威將軍雖賦性朗爽，對蔣氏之措置並不存芥蒂，然此衝突之結果，美國終於委派魏德邁中將接替其職務。」

張君勛博士筆下之史迪威將軍，爲爽朗而無芥蒂之人物。是否如是？殊費定評。史迪威將軍身任東南亞盟軍統帥部副統帥及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之參謀長，而對於共軍更有甚於「游而不擊抗而不戰」之專以襲擊友軍與國軍

以償其軍事擴張政策是務而毫無所知，不能謂非昧於知己知彼之甚者也。以昧於知己知彼之幕僚長，來自美國，熱中過問複雜微妙之中國內政，難免更陷於迷惘，其不作中美合作不成功部份之犧牲者，未之有也。史迪威將軍，因未克遂其所欲，遂有下述之報告，於其政府。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史迪威向華盛頓參謀總長報告其對蔣委員長行動之估價，其報告全文稱：

「蔣介石現仍採行其素行之政策，彼在最初，立即同意本人所為關於委派統帥之建議，此一同意，在推論上，不啻允許余對於中共軍隊，亦得予以指揮，此後忽採拖延行動，迄今無稍變更，其所持申辯，為此等牽涉問題至多，解決頗費時日，實則彼相信吾人在太平洋之進展，已極迅速而有效，毋須彼個人再作努力，至承認中共，及將中國軍隊，置於外國人之手，由於上述進展，更非彼所樂為。」

九月二十六日再報告其參謀總長：

「蔣介石無意對戰事推進再作努力，任何人勸其作此努力，或竟予摒除，……………」「蔣介石相信，彼能繼續運用，如不對其支持，則將拆夥之故技，以榨取美國金錢與軍火，彼相信太平洋戰事將近結束，由其拖延之技術，彼可將整個負擔加於吾人，彼無意創立民主政體，或與共黨組織聯合陣線，彼已成為中國之統一及抗日合作之主要障礙。」……………「基於上述理由，美國不能於蔣介石當權之日，自中國獲得真正合作。余信彼將繼續運用其故技，一味拖延，藉以換取貸款及戰後援助，而維持其現有地位。至其現有地位，固假手於一黨政府反動政策，及以特務人員壓制民主思想等以予維持者也。」

在史迪威離華前，續向其參謀總長報告，與蔣委員長關係，其文曰：

「吾人此時所需選擇者，並非攔斥予個人，或放棄蔣介石之問題，本案癥結所在，厥爲吾人倘允許蔣介石遂行其罷免主張（註：未經委派何來罷免），則中國之作戰潛力，亦且一併消失，余信此一問題之解決辦法，端在堅持吾人之建議，同時對於蔣委員長之威望，亦予顧及，能無損於其本人顏面及國民黨精神之狀況下，接受吾人之建議。」

史迪威只知其個人權位，從未計及中國之國體與主權，只知顧全本身顏面而連帶想及委員長顏面，殊不知委員長始終未爲本人利害打算，但求有利於國家民族，任何犧牲都肯擔受。若以泱泱大國而將軍政大權授予昧於知己知彼之外國軍人，古今中外當無是理。

史迪威於離華前，向陸軍部作最後報告，就以彼爲中心人物之爭執，作如下之評論：

「軍事指揮地位之提高，往往牽涉國家政策及政治，即使誠意與合作，反見減退，除在印度之中國軍隊，由史迪威直接指揮者外，美國人之在中國軍隊，大抵無指揮權能，各戰區司令官，均乏發號施令之權，對全面戰爭，既無力控制，自無從致力於戰略之計劃與戰術之指揮。一般言之，美國之在中國軍隊，實僅具顧問身份，時遭禁忌，吾人之誠摯努力及公正行爲，表現無私精神，時亦博得若干戰區司令長官之尊敬信任，然在重慶，則吾人所獲反應並非全然如此，中國高級官吏往往視吾人爲狡黠之外來人，廣作口頭布施，而于後則未必盡能兌現。」

「對華援助，一旦付諸實施，即應積極推行，鑒於中國政府之可被收買，其經濟之紊亂，軍事之積弱，吾人應先與中國成立一書面協定，協定中應載有一計劃，明定中國應於吾人之監督及物質援助之下，承擔努力作戰之義務。」

，在此協定業經簽訂後，吾人始可開始對其援助。

「吾人如能改採更坦白積極之對外政策，當能獲致中國之真正合作，並使其明瞭，吾人對其援助，係視其自身之決心努力如何以爲斷，此點現已日趨顯然，我政府雖曾對中國政府屢作苦口婆心之規勸，然仍不能使其中央政府領袖承認其政敵，美國政府雖認爲此項承認，當大有助於戰事之進行，然中國政府竟不屑就此問題，對我有何讓步，此外，尙有其他若干因素，亦與援華問題有關，吾人所應併與澄清者，厥爲政治上之遷就，空虛之諾言，與夫對於某項游移政策之破碎支持，凡此均屬謬誤，如不一一予以澄清，惟有徒耗公帑。」

「中國原存有種種見解不同之份子，彼等正就中國之未來發展，應循民主途徑，抑極權途徑一問題，互相鬥爭，而蔣介石則爲其中最強有力者，日本之進侵，促成中國之統一，而蔣氏成爲此項統一之象徵」，……中略……

「克勞塞維茲有云：『戰爭僅爲政治另一方式之繼續』；此一名言之表現於中印緬戰區者，實遠過於其他地區，當吾人對此戰區之不定局勢予以應付之時，自始即不應對蔣氏爲過於肯定之諾言，而於中國問題，改採更現實之態度，吾人對蔣氏政權之作風，予以支助，所獲甚微。倘吾人能對蔣氏施行壓力，使其與吾人通力合作，以完成中國之統一，則其收效必甚大，倘蔣氏無力負擔此一任務，則吾人儘可支持其他份子之能完成此一任務者。」

美國務院接上項報告後，立即促赫爾利任羅斯福總統特使偕納爾遜起程來華，其後赫爾利覺得非史迪威離去現職，則中美裂痕、將愈見深刻。於是美政府召回史迪威而以魏德邁將軍承乏。由此對羅斯福所建議委派美國軍人爲中國之三軍統帥事件，亦隨之擱置不提。

右之資料，多摘自美國國務院檔案。史迪威將軍誹謗蔣委員長不只若是，尙有一二篇越份之言，特予割棄。足

見美國白皮書所搜集資料，未能窺其全豹，殊爲惋惜！史迪威將軍事件的癥結，私家記載中能條分縷析如是篇者，尙未多觀。

國民政府官文書關於史迪威將軍解職之記載，詳於「八年抗戰之經過」者，只有數行，茲錄之於左：

「史迪威將軍爲一極具堅強性格之軍人，尤富有熱烈之責任感，在華期間，對擊敗日軍所作之貢獻，固足稱述。惜其對東方之特殊情形，未能深刻瞭解。美國政府遂於三十三年秋開釋其重負，召回美國。」

史迪威將軍解職之後，中印緬戰區乃劃分爲印緬戰區與中國戰區，蓋期其便利爾後之作戰。印緬戰區由美方索爾登將軍指揮。中國戰區之美軍，則由魏德邁將軍指揮，正計劃南下中緬，直逼瓦城。蒙巴頓上將則由南部發動兩棲攻勢，以便攻佔仰光。

第六章 赫爾利將軍錯在那裏

第一節 偏執國共合作忽略中美同盟

赫爾利將軍奉羅斯福總統之命，以特使前來中國，奉有特定之使命，調查及調解史迪威將軍事件，固為許多使命之一也。惟當時同盟國與軸心國仍在作戰中，關於戰後敵友如何變化？西方除英國首相邱吉爾氏，東方除我中國蔣委員長外，鮮見有人預見及此或預籌及此。尤其美國總統羅斯福氏以雄才大略領袖世界，自以為世界無不可感化的人，共產黨與史達林亦非例外。於是美國白宮在羅斯福總統任內從無美、俄在戰後不能並存的先見透露。而美共轉得在白宮或國務院逐漸伸張起來，縱有智者，亦無可如何者矣。

戰後美俄不並存在，白宮雖無人先見及之。而戰後蘇俄將代日本而侵入遠東與亞洲，白宮確曾預見及之，而且日思應如何協助蔣委員長善後及救濟中華民國，使中華民國成為遠東亞洲統一富強民主自由繁榮的大強國，以與戰後蘇俄相頡頏相制衡。但因不得其人，不得其道，不得其法，遂使善意變為惡意，好心變為惡果，殊為惋惜！按其原因，美俄基本上無共存性，與中俄基本上無共存性質同，中國領袖知之，而美國領袖未之知也。若以邏輯言，中、美二國各有共同敵人如蘇俄者虎視眈眈於其旁，宜能緊密攜手，推誠合作，互相依存，作為太平洋兩岸之安定力。然因美國人挾經援軍援之優越感以領導世界，凡事不求甚解，難免以一時次要事件之誤會，而抹殺基本的國策。恩讎易位，輕重倒置，遂使中、美兩國之共通點化為不共通點，無法昇華至於至大至剛，以克服俄國所加於美國及中國之災難與共產黨所加於美國及中國之災難，中國當局，固當負其一部責任，而美國當局所負之責任為尤重也。

赫爾利將軍之以羅斯福總統特使來華也，先取道莫斯科探詢史達林、莫洛托夫對中國的態度，是乃以正常外交處之。殊不知共產黨爲世界著名說謊者，以赫爾利將軍之天真無邪，墜紅色陷阱之中而不自覺，皆因無「美俄不並立」。與共產黨爲顛覆集團乃爲蘇俄代理人而非普通政黨之預見與先見有以使然。因是之故，赫爾利將軍之使華，不成功部份多於成功部份。或謂：赫爾利之爲人，係一坦率而直言無隱之士，故羅斯福總統派其來華作爲解決政治糾紛之人物。以是渠爲美國官員自重慶前赴延安充任國共居間調停之第一人，而包含國共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的聯合政府之談判僵局，亦爲渠首先打破，初期不無若干自信心也。

赫爾利大使邁返華府前不久，另一問題發生。此即美國武器與配備供給中國境內國民政府以外之各團體問題。渠建議：「所有是項請求，除由中國政府及美國政府准許者外，無論其請求表面上如何合理，均應一概絕拒。」渠維持一堅定立場，即爲使中國具有統一之軍隊武力與統一之政府計，所有一切軍閥武力，武裝游擊隊及共產黨軍隊均須悉隸於國民政府之控制，有助於爾後「軍隊國家化」協商的談判，以與共產黨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提「政治民主化」之口號相抗衡。

「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原爲現代式民主國家必具的條件。但因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多半爲國際共產黨所利用爲顛覆民主政府之武器，驗之於東歐衛星國家，無不如是。因之，政治協商會議有無結果？在共產黨以利害爲依歸，用「民主措施」的要求，而可以顛覆非共產政權，則務求聯合政府的實現。反之，不必經由「聯合政府」，祇須因「聯合政府」之不克實現，使非共產政府爲其盟邦所唾棄而自陷於孤立，仍對共產黨爲有利。兩者雖極端相反，而伸縮性則極大。國民政府當局明於容共聯合政府之害，而昧於因容共聯合政府之無成，

而觸盟邦之怒，形成孤立，其害更大。美國政府當局祇望中華民國統一民主自由富強對戰後世界安定和平爲有利，而未知有國際共產黨滲透其間，既不得免於分裂，更無「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統一可能。中美二國可謂兩失之矣。

雖然，當國共兩黨以「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爲口實互相要求之際，而國民黨履行「政治民主化」之諾言，尙有幾分誠意，證以張敬內閣，網羅民青兩黨及無黨無派多人入閣可謂信而有徵。而共產黨履行「軍隊國家化」，遍徵非紅色國家歷史，罕有其例。赫爾利大使建議美國不應援助中共，爲衷於至當者也。

「衷於至當者也」。此乃軍事常識之處置，未足語於百年大計，所謂百年大計者，莫急於以俄國爲假想敵之中美聯盟五十年，可以作爲戰後世界和平安定礎石，與白宮戰後輔助中華民國統一民主自由強大，以抵補日本退出大陸後之真空及預防俄國軍佔遠東亞洲之腹案，深相契合。當赫爾利將軍二度抵達重慶國門之際，東西兩戰場戰鬥，仍在激烈進行中。本人曾以「贏得戰爭失去和平」爲理由，向赫爾利將軍建議：簽訂中美同盟五十年，附以互惠十條款。在當時不能不目爲冒天下之大不韙者。顧赫爾利將軍蒞華之前，迂道莫斯科，惑於莫洛托夫、史達林之甜言蜜語，誤信中共非蘇俄的工具，於是以國共合作促成中國之統一，代替拙見：「求中美同盟杜絕外國之覬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輕重倒置，本末顛倒，失一子而全盤皆輸，是乃「爲甚麼失去大陸」之主因，孰能謂非人謀不臧者哉？

第二節 赫爾利先入莫洛托夫之說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赫爾利將軍奉到美國總統羅斯福之訓令，其要點如下：

一、任赫爾利將軍爲羅斯福總統與蔣委員長間之私人代表；二、促進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將軍間之和諧關係，並便利史迪威將軍對其所轄中國軍隊之指揮；三、擔負關於若干軍隊方面之補給工作；四、與美駐華大使高思維持密切接觸。

當赫爾利偕同納爾遜連袂飛渝時，先取道莫斯科，並與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談及中國情勢，依據納爾遜向美國務院報告稱：彼曾先向莫洛托夫外長說明：「納爾遜在華主要任務，乃關係於經濟方面，而赫爾利則關係於軍事方面，中國之合作，對戰爭極爲重要，美國爲實現合作，必須支持蔣委員長，並助成中國之完全統一。」

納爾遜請俄外長莫洛托夫對該事表示意見，而莫洛托夫認爲在華盛頓與莫斯科判斷中國局勢均極困難，惟亦願發表若干意見，但要求不將此項意見與談話，予以紀錄：

「莫洛托夫首就一九三六年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劫持之事件，詳加敘述。繼謂：中俄間關係，其時雖甚緊張，然蘇聯政府對於張學良及汪精衛所領導之革命團體，並未理會，實則該集團，包括多數共黨份子在內，渠等雖一再央求蘇俄政府予以同情及援助，並曾發表一聲明，大意謂：西安事變及中國之其他事件，率皆導源於對日憤慨，由於蘇聯政府所給政治上及精神上之支持，蔣委員長始得重回首都，而革命領袖（張學良）又反被扣留，蘇聯當時深望由於蘇聯此舉，則中蘇之關係。當獲相當改善，詎中國政府未嘗注意及此，反使中蘇關係每況愈下，轉遜於前時。」

莫洛托夫復謂：「蘇聯政府雖常被認爲與近年來中國所發生各種事故有關，實則蘇聯政府對於中國內務與其發展，不負任何責任。」

莫洛托夫又謂：「中國若干地區之人民，確甚貧苦，彼等因不滿現狀而自稱為共產黨員，根本與共產主義毫不相涉，一旦經濟環境有所改善，彼等必將其目前政治傾向，完全置諸腦後，蘇聯政府不應與『此類共產份子』有所聯系，且從任何方面而言，亦不能任此情勢之咎，整個局勢之解決，端在使中國政府能為大眾利益服務，具有擔當艱鉅之能力，並給予人民以正常之生活。」

莫洛托夫最後稱：「倘美國能助成中國之統一，軍事及經濟情形之改善，及選擇最佳人選換任是項工作，則蘇聯方面，將至感欣慰。」

上述均係莫洛托夫對赫爾利、納爾遜所述之言，赫、納二人對中國事件向其就商，莫洛托夫頗甚滿意，但未提供意見，惟再證實其作此聲明，即蘇聯政府深盼美國政府能在中國之經濟、政治及軍事方面，居於領導地位，莫洛托夫更明白表示：

「在蔣介石氏尚未變更其政治作風，圖就中蘇關係予以改善以前，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之內政，將不感任何興趣。」

厥后，赫爾利調解國共糾紛，其對中國共產黨，認係『為民主原則而奮鬥，並非實際共產黨』，因赫氏對上述莫洛托夫之辭有先入之成見，故圖入國共合作死胡同而不知返。即美國務院之為共產黨服務者，得到納爾遜之上項報告，遂根據為擬定對華政策之藍本，益見此次談話之重要，赫、納二氏不直接飛華，乃竟就教於共產黨則又不能測其用意所在焉。此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事也。

在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大使高思與蔣委員長之會談中，蔣委員長告高思大使謂：

「中國對共產黨之內政問題，極願接受美國之全力支持及同情。美國之態度如何：對中國之後果至爲嚴重。但對於策動解決對共產黨之爭端，美國政府今日之態度，適足以助長共產黨之頑抗。要求中國滿足共產黨之需求，無異要求中國對一個在外國勢力支持下之黨派無條件投降。自從美國觀察員抵達延安之後，共產黨即妄自尊大，拒絕繼續談判。美國應告知共產黨放棄歧見，服從國民政府。」（錄自張君勱著，英文版「第三勢力在中國」一二四頁）

但三閱月後，赫爾利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對美國政府提出如下之論述：

「當余初抵重慶之時，蔣介石認定中共爲蘇聯政府之工具。蔣氏現已相信，蘇聯除否認中共爲真正共產黨外，並有如下態度：（一）不援助中共；（二）不望中國有內戰或其他內部糾紛；（三）願與中國保持和諧關係。上述各事實，對蔣氏影響至大，而能使其相信：中共並非蘇聯之工具。蔣氏現在認爲：中共既爲中國政黨之一，與外國並無牽連，中國政府自不妨與其成立協議。在余初抵重慶之時，吾人認爲：中國內戰，將繼對日抗戰而起，甚或在對日抗戰尚未結束以前，即已爆發。今則蔣氏已漸相信：與中共妥協，（一）可統一中國一切抗日武力；（二）可避免內戰。」

白皮書又載稱：關於赫爾利將軍所採步驟，其報告稱：「渠於獲接蔣委員長及其閣員之同意意見及指導，並經由中共對渠發出邀請後，已與中共及其軍事領袖開始商談。商談之目標，自爲對於中國一切武力，予以改編、調整及完成其統一，俾可對日制勝。赫爾利將軍續稱：「吾人之第一目標，自爲擊敗日本；但吾人同時了解：中國之兩大武力組織，如不能及早成立協議，則內戰必將接踵而起。」

是年八月三十一日蔣委員長告高思大使，雖未有國共談判不啻闖進一個死胡同之露骨表示，但有美國政府今日

之態度，適足以助長共產黨之頑抗之言，可謂凌厲之至。不料三個月之後——十二月間，而有峯迴路轉之報告如右列云云者，不能使人無疑。余遍覽羣籍，藉知史迪威將軍之解除中國戰區蔣委員長之參謀長，不啻爲中美今後合作去一障礙物。促成此糾紛順利解決者爲赫爾利特使。繼史迪威將軍之後之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及蔣委員長之參謀長魏德邁將軍在其所著報告中稱：

「從重慶機場到市區的途中，我向赫爾利傾訴我的驚奇，自從上次訪華迄今，司令更換頻繁。赫爾利說，這是他向總統報告，史迪威必須他去。他說中國方面無法與史迪威合作。雖然赫爾利對史迪威，以個人而言，十分欽佩，他說他歡喜他的人格，但這是顯然的，他對蔣委員長表同情。赫爾利告訴我他曾私人推薦我做史迪威的候補者。到今日，這是一樣有趣的事，不妨一提，據漢第將軍對我談，馬歇爾將軍提出我的名字，後來，我從一本雜誌上讀到華萊士副總統所寫的文章內，他述及他曾保薦我任中國戰區總司令。」（摘錄魏德邁將軍報告二七七頁）

依據右列魏德邁將軍報告，史迪威將軍之解除中國戰區蔣委員長之參謀長要職，使羅斯福總統與蔣委員長間的誤會得以消釋，赫爾利將軍任特使時確有莫大的助力。因之蔣委員長與赫爾利將軍間之私人友誼，必甚深厚，上意易回，亦在人情之中。同時赫爾利將軍亦必乘間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對赫爾利、納爾遜兩人之所說之門面話，亦必從頭至尾，報告蔣委員長，甚至以偏於樂觀的心情，予莫洛托夫的談話加以強調。形成一時中俄國共間假融洽之氣氛。羅斯福總統是時方渴望國共兩黨能比肩作戰以擊敗日本，故於是年十月任命赫爾利繼高思爲駐華大使。（翌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呈遞國書。）課以左列的使命：

一、防止國民政府之崩潰。

第二篇 第六章 第二節 赫爾利先入莫洛托夫之說

二、支持蔣介石爲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隊之統帥。

三、調和蔣委員長與美國司令長官間之關係。

四、增進中國之軍需生產，並防止經濟崩潰。

五、爲求擊破日本計、統一中國之所有武力。

右列五項新使命，以第五項——「爲求擊破日本計，統一所有之中國武力」爲美國最迫切之要求。中國政府，何嘗不持此要求，但因過去經驗，瞭然中共無「軍隊國家化」之紀錄。

是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國民政府亦不加以阻止。赫爾利將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携有毛匪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定」雖導致美國與中國間入國共合作死胡同的錯誤，但赫爾利大使個人在當時鮮不自視爲「馬到成功」者也！因有十二月之過份樂觀報告，差以毫厘，謬以千里，其在此乎！

第三節 赫爾利面臨史迪威事件

赫爾利將軍與蔣委員長之友誼，建立於赫爾利將軍任羅斯福總統特使時，以公正無私的光明正大的態度，協助解決所謂「史迪威事件」者。其間曲折，不詳於史迪威將軍篇，而載於赫爾利將軍篇，蓋示非赫爾利將軍的直言無諱，無由消釋此中美兩大元首之誤會與排除中美兩國並肩作戰之障礙者也。

先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當中國戰事正陷於浴血苦戰之際，竟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人事爭議，這就

是以後所稱的「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將軍 (T. W. STILWELL) 爲馬歇爾元帥的親信部屬。其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時，或已受親共人士的影響，因此對華盛頓的報告，曾云：「中共於抗日戰爭如何努力，而以蔣委員長所統率之國軍與之比較，認爲頗有遜色。」這報告係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其死後，始在美國檔案中被人發現。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史迪威將軍奉羅斯福總統命重返中國，將就任東南亞盟軍副統帥，指揮美國在中國、印、緬部隊。三月十日，蔣委員長因羅斯福總統之推薦，任命史迪威將軍爲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及入緬遠征軍之指揮官。但是，斯時已懷有偏見，且其心目中已充滿了親共的印象。所以對最高統帥的命令，不僅不服從，而且每事事橫，任意支配美援物資；甚至要求爲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依據美國前陸軍部長史汀生 (H. H. RY T. STIMSON) 的回憶錄，述及史迪威將軍不喜歡蔣委員長的其他理由。當其離開華盛頓以前，在其和史汀生與馬歇爾的簡短會談中，曾經明白表示俟其抵達中國後，將要求蔣委員長把中國國軍的最高統帥權改由其掌握。（詳見董顯光博士著蔣總統傳）

（一）關於權限問題，當史迪威將軍初次與蔣委員長會晤時，曾聲言其有權統率在中國、緬印之美軍，並代表美國政府參加中國舉行之一切國際會議，監督管理美國對中國之一切軍援，包括「租借法案」物資，並於中國戰區內聯合各國一切軍隊之統率上擔任蔣委員長的參謀長。簡言之，其以中國戰區美國代表的資格，得隨意漠視該戰區統帥的命令；又以美國租借物資分配人的資格，其如認爲美國利益所關，亦將扣留任何一批物資不交付於蔣委員長

。...

(二)關於緬甸戰役問題：依照規定，重要戰略之決定，理應先詢蔣委員長之意見。然而，後來事項進展中，史迪威將軍對此均予完全漠視。例如緬甸作戰問題，蔣委員長所持之意見，如果海軍不在南緬登陸，破壞日軍後方，切斷日軍交通線的話，則要用他微薄的軍火來源，去從事緬甸戰役，實在是一種不值得的投資……。

因史迪威將軍與我政府的爭議，羅斯福總統乃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派前陸軍部長赫爾利將軍，及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NELSON）來華協商軍事、經濟等問題。

當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赫爾利將軍來華時，負有特殊使命，已有列舉如上所云云者。並曾持有羅斯福總統致蔣委員長要求一個文件。但是，赫爾利將軍於晉謁蔣委員長時，僅以友誼地勸請蔣委員長賦予史迪威將軍指揮權。在史迪威所不能收效者，赫爾利却努力使此計劃將達於成功的階段。

九月十九日，當蔣委員長正與赫爾利將軍商談時，詎料「缺乏風度的」酸納瑟·史迪威將軍不期而至，宣布接到陸軍總部轉來羅斯福總統給其的一個文件。……據嗣後國務院非正式說明，那個文件是要求蔣委員長允許史迪威將軍各項要求……全部軍隊指揮權、全盤管制租借物資、有權裝備和使用共軍。否則，取消「租借法案」。於是，蔣委員長將已正在考慮對赫爾利將軍的種種讓步概行收回。是爲「史迪威事件」的險惡最高潮。

九月廿一日，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離渝返美前，蔣委員長設宴餞別贈言云：「納爾遜先生：現在乘閣下回國之便，本人有點意見托致羅斯福總統。中美合作，比肩對抗侵略者，中國所受的犧牲與災難，遠大於美國，而中國仍將忍受一切磨折，直到完全勝利。中國希望美國人爲永久的朋友，我們且願爲朋友盡最大的道義。可是，有

三點應該請羅斯福總統了解的：第一、凡有損及中華民族的尊嚴的任何事情，我們必堅決反對；第二、凡有損及中華民國主權的，我們必堅決反對；第三、凡有損及我個人人格的，我必堅決反對。我們抵抗日本就是要維護上述三點，中國人願做美國人忠實的朋友，我個人亦願做羅斯福總統忠實朋友，但我們不願為美國人奴隸，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壓迫性和威脅性的作法，因此，請納爾遜先生代表我告訴羅斯福總統，我要求他撤換史迪威將軍，因為我不能和這樣一個美國將軍合作。」

九月廿五日，蔣委員長為史迪威在華任職兩年，對於中美合作極少貢獻，以備忘錄致美總統羅斯福代表赫爾利將軍，拒絕昇予史迪威以指揮全部華軍的重職，並要求另派富於友誼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國將領，接替史迪威職務。蔣委員長在要求此項撤換史迪威時，說明其在原則上與華盛頓並無歧異，只是對於史迪威的性格有問題。

美總統羅斯福深識大體，乃電覆蔣委員長同意召回史迪威。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史迪威被美總統羅斯福調返美國，另派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繼其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

當史迪威被撤回美國後，美總統羅斯福曾於十月卅一日對美國記者稱：「史迪威之更調，因彼與蔣主席之意見相左。其起因由史本人負責，此事並不涉及戰略，亦與中美兩國之政治關係無關。」十一月四日，我外交部長宋子文氏亦對美記者云：「史迪威之返美，純為人事問題。關於各種政策，中美意見完全一致，深信今後兩國關係，將更密切瞭解。」

右的資料，摘錄自陳錫璋編：「蘇俄在中國名詞索引及註釋。」

第四節 赫爾利飛延安晤毛澤東

魏德邁將軍報告關於史迪威事件如左：

「我（魏德邁自稱）於十月廿九日下午抵新德里，立即驅車至薩爾敦將軍的辦公處。薩爾敦將軍是西點軍校畢業生，有上佳的從軍紀錄，一位極高的能力及忠誠感者。他以史迪威的副司令的地位，曾赴華數次，對於中國的複雜情形相當熟悉。然而，他告訴我史迪威處理中國事務，對策略方略的措施，保持祕密，一切均獨人包辦，不與人商榷，亦不告人。但薩爾敦對於史迪威與陳納德及蔣委員長之間的種種困難知道得很多。正與我自己一樣，他對於史迪威突然辭職並無正面的情報，不過他的結論是：史迪威堅持他統率所有的中國軍隊，不僅在緬甸，連中國境內也在內，是促成解職的主因。」

白皮書對於「史迪威事件」，無專題記載，僅附於赫爾利少將之使華一章之中，錄入羅斯福總統致蔣委員長各函件及史迪威將軍之報告文件，而作左列評述：

「當此之際，赫爾利將軍顯已察覺：蔣委員長與史迪威將軍間之關係，既已惡化至此，除將史迪威將軍調往他處外，任何第三者之干涉，均失其補救作用。又在美國尚未另派一最高級司令官來華以前，其他重要問題，均將懸而不決。羅斯福總統接受其見解，魏德邁將軍因奉派爲史迪威將軍之繼任人。至關於授予魏德邁將軍以指揮中國軍隊之全權一節，此後似未積極進行。於此有應注意者，即在是年年底（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日軍顯無自桂林直搗重慶之企圖，而在是年初夏，緬甸之戰局，亦已日有起色也。」

赫爾利將軍在是時確有美國羅斯福總統與中國蔣委員長之交相信任，是乃人生大有爲之秋。倘能知己知彼，知現在，知過去，知未來，預知戰後世界之一切分合三因素如左：

(一) 因蘇俄於戰後繼續並擴大侵略世界，美俄絕對不能和平共存。

(二) 因蘇俄於戰後繼續並擴大侵略鄰國，中俄絕對不能和平共存。

(三) 中國共產黨與蘇俄爲不可分之一體，變本加厲執行蘇俄的侵略與擴張戰略與戰略。

由於右列三大因素，則中國與美國爲位於太平洋兩岸面對蘇俄侵略渴求共同生存之第一等大國，是否得一結論如左：

(一) 國共決難並立。

(二) 中美必須同盟。

任執中美兩國三尺童子於途而問之，無不曰然。顧是時世界主動在美國，而美國朝野間有爲共產黨或共產黨同路人所滲透者，對於右列三因素兩結論，一無所知。而赫爾利將軍自華府蒞臨中國迂道莫斯科，與莫洛托夫作長談，誤信莫洛托夫之僞裝爲真，誤信中共與莫斯科沒有關係，於抵滬重慶後不久，應毛澤東之邀，於十一月七日飛往延安，祇留兩日，與毛澤東簽署「協定」五項而返，周恩來與之偕來，是乃聚九州之鐵以鑄大錯不足以況之也。蓋封鎖中美同盟的大道路，陷入國共談商的死胡同，斯兼之也。而國際共產黨分化中美二國之詭計大售特售，而本人向赫爾利將軍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亦不值一哂，束諸高閣。事過一十有七年，痛定思痛，創痕猶新，余安能自己於控訴者耶？

毛澤東與赫爾利將軍共同簽署的「協定」內容如左：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爲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爲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右列「協定」，充滿宣傳性、誘惑性、策略性，一望而知。蔣委員長復於「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曾追記其事而評述之於左：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看來，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爲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爲條款。當然在這表面上看來，不失爲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是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

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三十三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第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之由來

赫毛協定草案五原則，乃由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名義簽署其上。白皮書對此五原則協定草案未作任何詳述，惟有一赫爾利將軍認為上項五原則協定草案，不失為解決中共問題之實際辦法」之記載。實則所謂共產黨者，乃外來武裝顛覆集團之組織，未得與於本國愛國合法政黨之列。四十年來，共產黨的界說，十分模糊，天下未亂，是非先亂，其在此乎！

國民政府對於五原則協定草案所持之態度，除蔣委員長於「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已有明確指示外，而見諸私人載籍者，張君勱博士著「第三勢力在中國」，曾經道及，茲錄之於左：

「據赫爾利報告，該協議係由渠協助起草，但國民政府表示不能接受。國民黨反對之意見，係認為該黨乃立於政治監護之地位（註：即訓政之意）。準此，則國民黨如一校長，人民及其他各黨派如所有學童。共產黨又為最頑劣之學童，須加以鞭笞，此為國民黨員一般之態度，故渠等不能同意『赫毛草案』。蓋以為該項協議，無異致令學童與校長立於同等地位而辦理學校也。」

國民政府依其理由提出「三原則協定」之對案。

一、國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國內武力之統一與集中，俾能從速戰勝日本，且對中國之戰後改建，寄其厚望，故願將中國共產黨之武力，於改編後收爲國軍之一部份，此後該共產黨武力，在津餉、軍火及其他配備方面，即取得與其他部隊之同樣待遇；國民政府並願承認中國共產黨爲一合法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應在抗戰建國各方面竭誠擁護國民政府，並經由軍事委員會將其所有部隊，交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國民政府願就中國共產黨之高級軍官中，遴員派充軍事委員會委員。

三、國民政府願遵孫中山先生所倡導並經中國共產黨表示擁護之三民主義，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國政府。國民政府並願採取政策，以策進步而促進政府之民主程序。

茲依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權利，予以保障，各該自由權利，僅受抗戰期間軍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三原則協定」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與周恩來。周氏即返延安。直至次年元月二十四日，經赫爾利大使一再勸說，始返重慶。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王世杰將下述之草案交與赫爾利大使：

「爲增強本國對敵作戰之力量並促進中國統一起見，吾人同意國民政府應邀國民黨代表、其他各政黨代表及無黨無派領袖參加一協商會議。此會議定名爲『政治協商會議』，其會員不得超過若干人。

「此會議之任務在考慮（一）從事結束訓政時期，以建立憲政政府之步驟；（二）將來共同遵行之政治決策及

軍隊之一元化；（三）國民黨以外各黨各派參加國民政府之方式。

「如政治協商會議獲得全體一致之結論，是項結論將提交國民政府考慮並執行。惟於政治協商會進行期間，各政黨間必須停止一切責難。」

次年召開之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即係由此而產生。

先是周恩來于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抵渝，隨即舉行多次會議。在各該會議中，國民政府代表為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宣傳部部長王世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中共代表為周恩來；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徇國共雙方邀請，亦列席該項會議。王世杰首先宣稱：除其已往所為三項建議外，國民政府並準備再作如下建議：

「（一）政府將於行政院之下，附設一機構，該機構之性質，與戰時內閣頗相類似，其組成人員，為由七人至九人；該機構為行政院之決策機構。中共及其他政黨，均將被邀派員參加。

（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將委派中國軍官二人（其中一人由共軍司令官充任）美國軍官一人，就中共軍隊之改編、裝備及給養等問題負責擬定建議，呈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核定之。

（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將委派一美國軍官充任中共軍隊之直接司令長官。該司令長官應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政府所頒行之軍事法令及非軍事法令，統由該司令長官就其所轄軍區之範圍內，負責予以遵行。」

赫爾利大使當即聲明：關於美國軍官能否參與政府所建議之工作一節，彼尚未奉到本國政府授權，因此無從表示同意。周恩來隨即表示異議，謂王世杰對中共之根本主張，似尚無所知。蔣委員長前於元旦訓詞中曾聲稱政府應

從速制定憲法，還政於民；然王世杰所宣讀之建議，自周氏觀之，實僅代表國民黨之若干讓步，而於控制政府之權，則仍以之專屬於國民黨一黨。周氏再三說明：當中共與赫爾利將軍商訂五原則協定草案之時，毛澤東及渠本人曾就中共立場，剴切闡明。即中共雖準備於國民黨既已放棄一黨專政制度，國民政府既以改組爲包括各黨派在內之聯合政府以後，將其軍隊交與該政府，但不願將其軍隊置諸國民黨指揮之下。彼認爲：該項聯合政府成立後，應設一軍事委員會，就所有中國軍隊，概予改編，而不得僅就中共軍隊，予以改編。總之，整個中國軍事機構，均應改組，彼深盼美籍人員一員能於此時參加該軍事委員會之工作。

中共上項立場，係於某一會議中報告委員長，與會者爲赫爾利大使、宋子文及王世杰。根據大使報告，蔣氏曾於會內宣稱：彼決恪遵孫中山先生遺囑，於五月四日召開一會議，俾便制定憲法，還政於民，並結束國民黨之訓政工作。委員長並有一明確表示。謂連同國民黨在內，中國各政黨黨員總數，尙不及全國人口百分之二，渠因相信：將政權交與任一政治團體或各政治團體之聯合組織，均非中國之福。渠本人職責所在，認爲應由一制憲會議，爲中國人民制定一民主憲法；此一會議，應由全民參加，而不應僅以代表少數人民之現成政黨爲限。委員長相信：中共在事實上，並非一民主政黨，僅爲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起見，佯作民主。赫爾利大使至是發言，謂委員長如此立論，適足以耗費寶貴時間，並再度向委員長建議，謂爲求取得對中共軍隊之控制起見，委員長可於此時向中共作政治上之讓步，並設法縮短過渡期間。以彼觀之，中國之主要目標，應爲下述四者：（一）統一全國武力，以擊敗日本；（二）統一全中國，以防任何外力圖將中國分化；（三）預防內戰；（四）在全民制憲會議所制憲法之下，造成一「統一、自由及民主之中國」。對中共讓步，實爲實現各該目標之第一要着。

右爲赫爾利大使所持政治協商會議的理由，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外來顛覆武裝集團與本國愛國合法政黨有天淵之別。祇以「統一全國武力以擊敗日本」之第一點而論，驗之過去與當時，較緣木求魚爲尤甚。但赫爾利大使在事前曾協助蔣委員長解決「史迪威事件」，且其本人對中國確具熱情，並無惡意，證以爾後赫爾利大使建議美國不應援助中共以武器益爲信而有徵。國民政府當局曲徇其意，故有三世杰二月三日之草案提出，如上文。

王世杰的草案中首先提出，而開啓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及民主同盟多年來所期望的談判之門。周恩來於接獲此項文件之時，告赫爾利大使，彼已將是項草案電達延安，並謂彼感覺此係首次獲致一合作基礎。赫爾利大使亦因此頗受恭維。

赫爾利大使並報告渠於二月四日與蔣委員長討論是項草案，蔣委員長謂彼已同意此項建議，惟彼感覺共產黨茲已獲得該黨歷年努力爭取的目的。

赫爾利大使以極坦白之態度告蔣氏曰：閣下今可與共產黨合作之惟一書面根據，厥爲五原則協定草案。閣下如於協定草案提出時加以修改，共產黨當時或可接受合理之修正。該項協定草案迄仍係經共產黨簽署將其武裝力量交予國民政府之唯一文件。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赫爾利大使簡述中國政府代表於此項討論中提出之意見。據渠報告，中國政府代表稱：中國共產黨之真正目的不在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而實在推翻國民黨之政權，而建立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之政體。由共產黨過去之一切策略可見此點。國民黨欲制定憲法以還政於民，處此多難時間，國民黨不願捐棄其政權於所謂「聯合政府」之各黨各派集團。國民黨可成立兩黨聯合之戰時內閣實操政策決定之權，俾民主憲

法制定後始還政於民。蔣委員長謂彼希望共產黨接受政府最近提出之誠摯建議，對於共產黨武裝力量不予消滅或歧待，并已提供一切可能之保證。渠謂中國共產黨之目的，在以政變之方式取得國民政府之控制權，從而造成一類似蘇聯政府之共產黨獨裁政府。並謂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希望，係基於一旦蘇聯在亞洲參戰，必將援助共產黨對抗國民政府。惟政府仍願不顧一切，大胆從事於戰時還政於民之計劃。今政府邀約共產黨及其他黨代表團享旅行絕對自由權，以平等的身份，前來會商國家團結，增強抗戰力量，結束訓政，及建立民主憲法政府之大計。

二月十六日，周恩來離渝返延安。臨行彼對赫爾利大使說：渠相信彼黨將同意國民政府提議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赫爾利大使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離渝返華府述職。

赫爾利將軍始以羅斯福總統特使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底蒞臨重慶，迄於翌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離渝返美述職，將屆六個整月。余詳讀白皮書——赫爾利少將之使華篇——個人之努力章，因知赫爾利將軍與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往返函件與談話，無一而非向中國武力之統一而努力，不失爲正規軍人出身者也。

第六節 雅爾達協定鑄成大錯

在赫爾利將軍初度使華六個月期中，日軍已無自桂林直搗重慶之模樣，印緬戰區，亦有相當之好轉。但美軍在太平洋逐島作戰，遭遇日軍之堅強抵抗，傷亡頗大。羅斯福總統以全面勝利在望，爲美國利益起見，始則寄厚望於中國共產黨能與國軍比肩對日反攻，以加速日本之崩潰。故不惜以函電信使相望於道，促成國共兩黨合作。迨知國

共兩黨合作之可能性不大，於是轉而寄厚望於蘇俄部隊參加對日作戰，直搗日軍之背，俾收夾擊之功，固為謀國者之所應爾，吾人實無間言。但戰後之敵友變化如左：

(一) 蘇俄於戰後繼續並擴大侵略世界，美俄絕對不能和平共存。

(二) 蘇俄於戰後繼續並擴大侵略鄰國，中俄絕對不能和平共存。

(三) 中國共產黨與蘇俄為不可分之一體，變本加厲執行蘇俄的侵略與擴張政略與戰略。

依據預想戰後世界形勢，因急不暇擇之故，乞援於蘇俄參加對日作戰，是為世之笨伯者矣。使蘇俄為德軍所膠住無暇東顧，雖許以整個滿蒙權益，無暇及此也，倘有餘力，雖不必邀請，亦必自動參加對日作戰，何必餽以滿蒙厚利，作法自斃者也？

當雅爾達會議之際，羅斯福總統病體支離，已感不支。是時以原子彈研造尚無成功模樣，而東西兩戰場戰爭結束，悠悠無期。蘇俄武裝部隊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確有英勇表現，羅斯福總統為之傾心。重以史達林之陰險，利用羅斯福總統病裏不耐煩的弱點，故作疲勞談判以困擾之，遂有雅爾達協定之簽訂，而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首受犧牲矣。

蔣委員長後於「蘇俄在中國」著作中，追記其事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畫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

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國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赫爾利大使六閱月之中國武力統一之努力，雖明知最後必無若何成就，但在雅爾達會議之前夕，即王世杰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所提之草案，爲爾後政治協商會議之基礎，竟未能爲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張目，以拒絕史達林爲參加對日作戰之無理要求，是誠可惜也哉。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之雅爾達協定，是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悲劇之一。其後果之悲慘，謂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大陸，雅爾達協定，實爲厲階，決非過甚其詞。赫爾利大使適逢其會，有無直接責任？言人人殊；但其間接責任，不能謂爲絕無。赫爾利大使之智慧，不克洞燭蘇聯中共爲不可分之一體，更昧於蘇聯中共在戰時實充滿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之兩面作戰行爲，在其任內致華府一切報告中，可證此指責並非過當。身爲美國駐中國大使，並此大前提一無所知，不僅差之毫釐失諸千里已也。雖然，在當時遍美國國中知蘇聯中共爲不可分之一體者，知蘇聯中共在戰時實充滿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之兩面作戰行爲，共有若干人？自問亦當然失笑。吾安能以此專責赫爾利大使者耶。（中共在抗戰中專與中華民國爲敵，囊括大陸之後專與中美兩國爲敵，視蘇俄更爲狡猾。）

因美國人士對蘇聯中共爲不可分之一體，及蘇聯中共在戰時實充滿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兩面作戰行爲，茫無所知，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立即成爲蘇俄中共最大的敵人，美國立即成爲蘇俄中共不公開宣戰之敵對體，爲自然之邏輯。惜美國朝野在戰時狃於物力充沛科學發達，故於第二次大戰期間絕無以兩面作戰對蘇

聯中共兩面作戰之戒心，更無任何言動。此疏忽之後果，立即釀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禍機與敗徵，雅爾達協定為其最顯著之一例者也。孰此一例以論赫爾利大使，安能謂為無間接責任者焉？

所謂雅爾達協定者原文如左：

羅斯福、邱吉爾及史達林，代表美國、英國及蘇聯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在雅爾達簽訂一項協定，包括蘇聯加入對日作戰之各項政治條件（註四），該協定原文如次：

「三大國領袖——蘇聯、美國及英國——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事結束後兩月或三月內，蘇聯應加入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為：

（一）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應予保持（註五）。

（二）俄國前於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襲侵害之權利應予恢復，即：

甲、庫頁島南部及其附屬各島嶼應歸還蘇聯；

乙、大連商港應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之優越利益應予妥保（註六），並恢復旅順租予蘇聯為海軍根據地（註七）；

丙、通達大連之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應由中蘇合設之公司共同管理，並經諒解，蘇聯之優越權利應予保障（註八），中國保留在東北主權之完整。

（三）庫頁島應交還蘇聯。

協定中關於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鐵路，應得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根據史達林元帥之建議，總統將採取步驟

以獲得此項同意。

三張元首同意於日本擊敗後，蘇聯各項要求，應無異議予以履行。蘇聯方面表示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俾以武裝力量援助中國使中國自日本桎梏中解放。」

美國政府白皮書於雅爾達協定原文之後，加以（四）至（八）的附註，無非力圖解釋當時所處之環境，有與原文併讀之必要，茲錄之於左：

（註四）：關於雅爾達協定之背景，請參閱第一章關於開羅宣言部份及第二章關於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與蔣委員長在重慶之各次談話。當時蔣委員長請求美國協助，以期改善中蘇關係。該項談話經由副總統隨行人員摘要記錄，在德黑蘭會議第一次正式會議時，史達林元帥曾聲明「一俟德國戰敗」蘇聯即加入對日作戰。至於大運作爲「國際擔保下之自由港」問題及蘇聯利用東北鐵路事，則曾在德黑蘭會議時非正式予以討論。

（註五）：蘇聯基於有「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語，嗣即聲稱該項條文之意義爲獨立。中國之立場則係根據一九二四年中蘇條約，該條約業已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關於此項討論之結果，請參閱第七五面。

（註六）：關於此處措辭，嗣後發生爭執，至其來源及主筆者迄今仍未知悉。參加此次談話之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哈立曼其後聲稱：「由雅爾達會議以前之談話中，並無理由假定『蘇聯優越利益』之保障得超過蘇聯進出口貨物自由通過之權利。……」

（註七）：關於此項條款，哈立曼先生作如下之批評：「余相信羅斯福總統對旅順之租借爲海軍基地，視同美國與他友邦爲共同安全而讓與之特權。」

(註八)關於此項條款，哈立曼亦聲稱彼深信羅斯福總統心目中只在貨物自由通過權，而無蘇俄在東北之一般權益。

美國政府白皮書對雅爾達協定之評述如左：

「就各方證件而言，雅爾達協定之主要動機，顯然為軍事原因，此節可見於當時羅斯福總統會告國務卿史退丁紐斯先生，謂此事既顯係軍事性質，即應由本人（總統）及哈立曼先生主持談判。嗣後哈立曼先生會述及海軍上將金氏亦知悉此項籌劃，並認之為雅爾達會議中最重要之結果。」

「雅爾達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及史達林元帥關於遠東問題之一段談話中，後者提出關於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之政治條件。在談話過程中，史達林元帥表示政治條件須予同意，因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須對蘇聯之『輿論』『表證其為正當』。」

「一般而論，蘇聯之條件已予以承認，吾人應確記當時原子彈尚非有把握之事實，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可能之力最似甚雄厚，而在抵達日本本島之中途島戰役中，美國人所付之生命代價已達驚人之程度。顯然因軍事之迫切需要，蘇聯於擬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發動之「奧林匹克軍事行動」（攻擊九州）前，參加對日戰爭，以牽制在東北日軍，使之不能移轉至日本本島。」

「雅爾達協定之詳確規定，曾有歷史先例，而其後一九四五年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有關協定亦曾追給以適當之法律保障，然而不幸者，厥為事先未曾諮詢中國。羅斯福總統與史達林元帥所以沉默不言者，蓋以由戰爭摧殘與破壞之影響，使中國方面消息易於洩漏於日本，此乃衆所週知且日形增加之危險。軍事上之迫切需要實為此處之

必要考慮。羅斯福總統從未認爲彼會犧牲中國重大之利益。」

雅爾達協定之主要動機，基於軍事原因，吾人雖爲身受其害者，實無閒言。惟美國政府當局於被迫簽訂之後，尙未發覺史達林侵略真面目而加以提高警覺或亟謀補救，或簽訂中美同盟協定以彌縫雅爾達協定的缺口，不能謂非人謀不臧者也。

先是美國國務卿赫爾氏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參加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閉幕之後，史達林設宴招待與會代表於克里姆林宮喀德鄰女皇廳。赫爾氏位列上座，是乃第一位貴賓，坐在史達林右首，因擁有較長的時間談話。談話內容，包括甚廣。惟在盟國擊敗德國後，蘇聯將無條件參加擊倒日本，乃完全由史達林自己提出，事前完全無人要求過，而史達林也未要求報償。直至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國務卿因病辭職之日，猶保持如此常態。不料赫爾國務卿於辭職之後，不及三個月，而有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之雅爾達協定產生，不僅史達林推翻莫斯科歡宴時之諾言而判若兩人，即赫爾本人亦驚疑「這是那種情勢的變遷，使這些讓與成爲必要。」茲摘錄赫爾回憶錄一段如左：

「可是接着他（指史達林）却真正作了一項極具重要性的談話，叫我又驚又喜，他說：在盟國擊敗德國後，蘇聯將參加擊倒日本。他說得的確確，清清楚楚。」

「這問題完全由史達林自己提出，雖然他腦裏或想到先前跟李維諾夫大使關於這件事談話。他結束時說：我可以用極秘密的方式把這意思通知羅斯福總統，我由衷地謝了他。」

「史達林關於這一決定的談話，是直截了當的，說時認真有力，事前完全無人要求過，而他也未要求報償。」

「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用書面向總統提供同樣的諾言，可是這次却是總統同意蘇聯在亞洲取得許多領土的讓與的結果，這些領土包括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的一部份在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已辭職，因此我不曉得是那種情勢的變遷，使這些讓與成爲必要——但當日史達林提出諾言要我轉達總統，是沒有附什麼條件的。」

右爲赫爾回憶錄有關雅爾達協定記載的一段，這是那種情勢的變遷，使這些讓與成爲必要？當時固無人能解答此問題者。時歷一十有六年之後，陵谷滄桑，如是其劇且大，使自由世界領袖如能作正確的解答，猶未爲晚，否則整個人類，殆難免爲共產黨所俘虜矣。

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始終包藏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之兩面作戰心理以指導其行動。因蘇自由國家亦如自己一樣蘊藏有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共產陣營之兩面作戰心理。因是之故，在德軍長驅深入俄境之際，固須表示澈底解散第三國際，以取得美國及西方國家之大量援助，而加強俄國境內之節節抵抗。是時自由國家如有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共產陣營之兩面作戰心理存在，則不如先門俄德兩國於俄國國境之內，時間愈長愈好，德必垮臺，俄亦不振，而自由世界或可有百年以上之和平與安定。不得已而思其次，德軍既爲俄軍驅逐出境，已非一鼓作氣之武裝部隊，使俄德互鬥於德國及東歐境內，譬如兩虎相鬥，一死一傷，德必垮臺，俄亦不振，而自由世界亦可有半世紀之和平與安定。右舉先門俄德兩國政戰兩略，爲史達林所熟知亦爲最長忌害怕者，故在西方主力未投入諾曼第登陸之前，蘇聯必多方僞裝馴伏，以示無他，更力求表達無偏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之兩面作戰行動，以堅美國相與之赤誠。故史達林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歡宴赫爾國務卿席上，特別強調在盟

國擊敗德國後，蘇聯將無條件參加擊倒日本，乃詭道也。蘇聯實將以是言結美國之好，計誘美軍早日登陸歐洲夾擊德軍，使俄軍獲得早日脫離戰爭桎梏以執行其對美國爲不公開的宣戰也。

迨入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以美軍爲基幹之盟軍於諾曼第登陸之後，德軍立陷於兩面作戰之大不利，而蘇軍於一夜之間，減輕壓力，六臂在手，左右逢源，仍是一面對德作戰。而美軍則於諾曼第登陸之後，在太平洋須對日本逐島作戰，而在大西洋又須對德國作主力戰，陷於兩洋作戰。美俄主客易勢，勞逸異形，始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之諾曼第登陸時也。

自是日起，迄於翌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之雅爾達協定簽字，史達林在德國各戰場均有巨大收穫，已完全暴露侵略真面目，不諱言一面對軸心集團一面對自由國家之兩面作戰矣。羅斯福總統以病骨支離之軀，面臨史達林霸道無比之壓力，同時中國大陸戰場於是年（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之後不及半年國軍盡失洛陽、長沙、衡陽、鄂水、桂林等諸省市，相形之下比重頓失。證以英國首相邱吉爾氏在雅爾達會議席上爲法軍爭取佔領區並在聯軍管制委員會佔得一席，經強烈討論後，始通過法軍在英、美佔領區內分得佔領區，並取得聯軍管制委員會委員，是皆會上有人仗義執言有以使然。而吾國在雅爾達會議既無代表出席，而一切有損中國主權行政完整之議決案，原可不予追認。縱使因中美傳統友好關係，不便過拂美國之意，兩害相權取其輕，亦當以中美聯盟五十年，作爲雅爾達協定勉強承認之代價，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今計不及此，是否錯誤？敢懇以質賢明當局。

該雅爾達協定陰險狠辣，隱種蘇聯於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前夕，宣布對日作戰，既獲得日本在東三省之生產

設備，復繳獲關東軍之裝備軍械，掩護林彪在東北設立紅軍新基地，收編偽滿洲國武裝部隊數近七十萬人。爲爾後席捲中國大陸之另一枝紅軍。另於國軍赴東北接收時，蘇聯遠東元帥馬連諾夫斯基，利用雅爾達協定既得權益，再加以任意曲解，造成種種有利於中共擴張的條件，使國軍始則無法在東北行動，終則無法在東北立足。

證以麥克阿瑟元帥於事後在美國國會作證稱：「共產黨得雅爾達協定的便宜，蘇聯控制東北，羽翼中共滋長起來，中間又因我們調停國共和談，擬組織聯合政府，乘此間隙，中共就到處伸展勢力，士氣動搖，而我們又不予援助，假使該時能給予援助，擊敗中國共產黨，便不至於造成共產黨奪得政權。這是我的觀念。」等語，足知雅爾達協定爲禍之酷，雖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之也。

赫爾回憶錄所稱：「我不曉得是那種情勢的變遷，使這些讓與成爲必要？」本人已代爲解答如上矣。美國白皮書於公佈雅爾達協定原文之後，附以解釋，初則曰：「雅爾達協定之動機，顯然爲軍事原因。」終則曰：「軍事上之迫切需要，實爲此處之必要考慮。羅斯福總統從未認爲彼會犧牲中國重大之利益。」略述原心，余不能無違言。羅斯福總統逝世前半年，知己知彼之智慧，不足副其大任，今若起羅斯福總統於地下而問之，彼亦必自承者也。

其後若干年，美國總統甘迺迪任衆議員時，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國國軍準備退至臺灣。同月廿五日甘迺迪在衆議院率先起立要求發言一分鐘，其情辭至爲慷慨激昂，一反尋常冷靜超然的常態。甘迺迪氏之言曰：「議長先生，週末以來，我們獲悉了降臨中國與美國的災禍的嚴重程度，我們對遠東外交政策的失敗，白宮與國務院咎無旁貸。」

「不斷地堅持如不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即行停止援助，對國民政府是一個極嚴重的打擊。」

「我們的外交官員與他們的顧問——拉鐵摩爾與費正清之流——祇斤斤計較於二十年戰亂以後的中國民主制度有欠妥善，以及高級人員貪污的傳說，而漠視了我們在非共產中國鉅大的利益……」

「本院現在必須負起責任，阻止共黨洪流淹沒整個亞洲。」

當時衆議院繼續處理一般案件，對此未予置評。幾天以後，甘迺迪在麻塞諸塞州薩蘭市演說時，重提上述論旨，並加以引伸。他主張查究應對這一悲劇負責的人。然而在雅爾達，抱病的羅斯福在馬歇爾及其他參謀首長建議下，却將千島列島及其他戰略地點「給與」蘇聯。政府曾企圖強迫蔣總統將共黨納入一個聯合政府。杜魯門總統甚至對蔣夫人「漠視」——如果不算「蔑視」的話。「這就是中國的悲劇。」甘迺迪結論說：「我們曾爲維護它的自由而作戰。我們的青年所保持的，却被我們的外交官員和我們的總統浪擲了。」

右文所稱：「在雅爾達抱病的羅斯福在馬歇爾及其他參謀首長建議下，却將千島列島及其他戰略地點「給與」蘇聯。」更可以證明當時羅斯福總統對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爲了本身生存，被迫與盟國站在一起對抗德國，可是它永沒有忘記同時它也與西方在作戰中的兩面作戰，爲一無所知者。而馬歇爾元帥等參謀首長，只以當前之軍事態勢爲想題，而未涉想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情勢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禍胎與敗徵，故有此雅爾達協定的過失。

先是赫爾國務卿辭職之後，繼任者爲史退汀紐斯，亦爲羅斯福總統智囊團之一。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呈羅斯福備忘錄一份，以「未來三國會議中所將討論之政治問題」爲事由，茲錄之於左：

國務卿史退汀紐斯呈羅斯福總統備忘錄（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

事由：未來三國會議中所將討論之政治問題。

職（史退汀紐斯自稱）今日上午在鈞座辦公室內之黑皮卷宗中，曾呈備忘錄一份，詳列國務院所希望於未來會議中能圓滿解決之十項問題，爲便於鈞座參考核閱，謹再將同樣備忘錄一份呈送。

附錄：美國對三國會議所要求解決之政治問題（機密）

- 一、謀取俄、英兩國對安全理事會投票程序問題之讓步，以贊同美國所提建議。
- 二、謀取俄、英兩國同意建立緊急應變之歐洲高階層委員會，其中包括美、英、俄、法四國。
- 三、謀取蘇俄同意參加擬具一項盟國對解放歐洲之共同政治計劃，以作爲該緊急應變之歐洲高階層委員會之工作準繩。

四、謀取俄、英兩國同意，美國所擬議之對戰後德國之政治及經濟短期、長期處理辦法。

五、謀取蘇俄同意解決波蘭問題，保證建立一自由、獨立、民主之波蘭，爲達成此目的，亟須在波蘭設立，普遍代表波蘭人民，且將爲各主要盟國同意接受之臨時政府。

六、謀取蘇俄同意，聯合國救濟總署在俄軍解放區內執行其發放及監理救濟物資之任務。

七、謀取蘇俄同意，對美國在該等向俄軍投降之敵國內盟軍管制委員會中之地位及責任，作一確切闡釋及保證。

八、謀取蘇俄同意，爲保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伊朗宣言之精神，應尊重伊朗政府所作決定，對所有外國政府或公司之石油開採權談判，將延至戰爭結束及盟軍自伊朗國境撤出後舉行。

九、謀取俄英兩國同意，爲增進各方共同利益，應促進中國達成最大限度之統一。蘇俄應使用其影響力，一如赫爾利所作之努力，促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

十、決定三國對戰後西歐各民主國家重新武裝問題之一致政策。

右列史退汀紐斯致羅斯福總統之備忘錄一份，爲雅爾達會議紀錄全文之一部份。時間在雅爾達會議之半個月前。中附十項問題，關於遠東亞洲或中華民國者，只有第九項，茲錄之於左：

「謀取俄英兩國同意，爲增進各方共同利益，應促進中國達成最大限度之統一。蘇俄應使用其影響力，一如赫爾利所作之努力，促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

除此之外，並無涉及蘇俄參加對日作戰之鱗爪，不難證明是時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政策，仍側重於中國武裝之統一以協助美國進軍日本本島擊倒日本。王世杰之政治協商會議草案，適於是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提出，確在雅爾達會議開始之前夕，宜能發生政治及外交攻勢作用，爲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打氣，以粉碎史達林的蠻橫要求。乃事竟有與此相反者，據赫爾回憶錄載稱：「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用書面向總統提供同樣的諾言，可是這次却是總統同意蘇聯在亞洲取得許多領土的讓與的結果，這些領土包括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的一部份在內。……」

第七節 高估國共合作低估中美同盟前後如出一轍

雅爾達協定斷送中華民國滿蒙的主權，爲「贏得戰爭失去和平」之禍胎，本人將於另章詳述之。惟中有一款，

爲九州萬國協定之所無，其陰險狠辣，較一石二鳥爲尤甚，古人所謂作城下之盟者，亦無此苛酷條件！若非羅斯福總統病體支離，精神分裂，鮮有不噬史達林以鼻者。茲錄雅爾達協定最苛酷者一項如左：

「協定中國於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鐵路，應得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依據史達林元帥之建議，總統將採取步驟以獲得此項同意。」

因有右列一項，美國總統羅斯福一經簽字其上，便須負有促其實現之不可逃避責任。無可逃於兩面夾攻者也。國民政府無論同意與否？均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無法自我解脫者也。例如同意此協定，則抗戰八年所得之戰果，無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何以對陣亡與勞苦功高的將士及天下後世之子孫！不同意此協定，立中史達林挑撥離間疏遠之詭計，使中美二國儼成水火，怒目相視，中華民國陷於孤立，不必俟馬歇爾使華調解國共和談無功中了詭計才「一筆勾銷」中華民國者也。是時國民政府權衡利害，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原則，以同意代不同意，委曲求全，不顧後果，無非旨在爭取美國，得道多助，求戰後中國之統一、民主、強大、繁榮。必不寄希望於「蘇聯方面表示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訂立中蘇友好條約」，更不寄希望於「蘇聯以武裝力量援助中國使中國自日本桎梏中解放」（兩者皆雅爾達協定成語），爲顯而易見者也。蓋因當時中英美三國元首中，雖然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爲了本身生存，被迫與盟國站在一起對抗德國，可是它永沒有忘記同時它也與西方在作戰中的兩面作戰，蔣委員長爲首屈一指，英國首相邱吉爾氏次之。況蘇聯視國際條約並紙面價值之不如，蔣委員長以次知之最早且最深，對於爾後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所承擔之諾言，當亦必無甚信心。當此之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何以竟無一人想到以中美同盟作爲中華民國同意雅爾達協定之最低代價，是誠吾所

未解者也。

羅斯福總統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被迫簽訂雅爾達協定，携之返美。赫爾利大使亦於是年二月十九日携回王世杰二月三日之政治協商會議草案遊返華府。因之中俄與國共兩問題，在美國對蘇聯中共只有友誼而無敵意之狀況下，鮮不目中俄與國共兩問題爲兩事者。實則蘇聯中共爲不可分之一體。兩者對美國只有敵意而無友誼，與中國朝野對美國只有友誼而無敵意者截然不同。但因有美共居中策應支持中共蘇俄，詆譭國民政府，挑撥離間，造謠惑衆，譸張爲幻，無不各盡其極，冀使美國朝野疏遠國民政府使陷孤立而崩潰，是乃蘇聯與中共聯合詭計之一。蔣委員長本其北伐時與蘇俄中共合作一段期間之苦痛經驗，知其不可易與之處甚深。今因美國大使赫爾利之善意斡旋，不便過拂其意，不無勉徇其請者。因是在全盤上，只有以外交影響內政，未能以內政決定外交，只有消極的步步爲營，穩紮穩打，本還政於民天下爲公之意，力戒與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尤其共產黨私相授受政權，爰於三月一日在憲政籌備委員會公開演說中，重申解決共產黨問題，必須循政治途徑之信念，並列舉政府關於解決此項問題之步驟。其言曰：

「余已久持一信念，即共產黨問題必須以政治方法解決之，政府已竭力使此解決方法爲一政治性者。關於政府最近從事於與共產黨獲得一解決方法之努力，國人仍未盡熟稔，今余應闡明實況，以正視聽。」

「吾人皆知與共產黨談判爲多年來一不斷之問題。吾人之一貫經驗係每當一項要求滿足後，共產黨必提出若干新要求，其最近之要求乃立即結束國民黨以黨治國之政權，將其政權讓與各黨各派之聯合政府。政府之立場是願容納各黨（包括共產黨及無黨派領袖）參加政府，惟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國民黨不能放棄其最後決策權及其最後責

任。吾人建議成立一包括共產黨及其他各黨派之機構，其性質略似外國所謂「戰時內閣」，逾此限度以應允共產黨之要求，非但公然違背孫總理遺教，抑且造成國家不可克服之種種實際困難。

「對於共產黨所提出之問題，政府均會以負責態度加以考慮。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近日來渝時，即已告以政府準備於行政院之下籌設一決策機構，名曰戰時政治會議，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均可遣派代表參加。并曾告以政府亦願組織三人委員會以籌劃收編共產黨軍隊於國軍，該委員會以政府軍官一人，共產黨軍官一人及美國軍官一人（如美國政府同意遣派軍官一人參加服務時）組織之。美國政府如不願派員參加服務，當可另籌妥法，以圖保證共產黨軍隊之安全與不受歧視待遇。」

「凡關切吾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之前途；且深覺未來歷史之裁判者，決不願陷祖國於內戰。政府已表示其決心，隨時均願與共產黨會商，期得一垂久之解決。」

「關於政府對共產黨問題所取之立場，余闡述不憚冗繁者，乃因欲圖團結及實現立憲政府，此實係主要之先決問題。」

「現余願簡述政府為實現立憲政府準備採取之具體步驟：

「（一）憲政時期將由本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八十冥壽）召開之國民大會宣佈開始。該大會將取決於五月舉行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

「（二）憲政開始後，各政黨均有合法地位並享受平等待遇。政府已建議，一俟共產黨同意改編其軍隊，並交還其地方政權於政府，即可予以合法之承認，此項建議迄今有效。」

「（三）下屆國民參政會即將召開，該會將擴充參政員名額及權力，政府將與該會商討國民大會之召開及其他有關事宜。」

右文乃蔣委員長以國民政府主席地位所發還政于民之聲明。若發於二月三日王世杰提出政治協商會議之前，共產黨雖亦必橫肆攻擊，咆哮不已，但可以間執譏諷之口。今乃發於赫爾利大使回美述職之後，不特反爲譏諷所聞執，且令共產黨得抵隙以遂其詆毀政府疏離中美之惡意宣傳，竊爲惜之！

談判在共產黨爲軍事手段以外之另一種戰爭行爲。故以「得寸進尺」爲百變而不離其宗者。與自由世界傳統上求兩造之折衷與調和截然不同。故以自由世界之傳統思想及方式與共產黨作談判，爲百害而無一利者。縱使共產黨一時屈於現實環境而簽字於雙方同意條約之上，伊亦可以作不同之解釋而取消之，或不宜布理由而撕毀之，其價值並紙上價值尙且不如，然自由世界養尊處優，有戰爭歇斯志里亞的弱點，祇有借談判以自我陶醉，故趨之若鶩。自由世界不斷送於談判者幾希！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請求美國大使館轉遞渠三月九日致在華府之赫爾利將軍一函。其文曰：

「二月二十日大函敬悉。奉本黨中央委員會與毛澤東主席之命，本人已於三月九日致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一函，包括下列二點，尤願奉告將軍：

（一）本黨中央委員會原欲答覆王世杰博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之建議，俾能利於談判。不料三月一日蔣主席竟公開反對一黨專政之廢止，召開黨際會議，建立聯合政府，反而宣稱將以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之一黨控制，欺騙

人民，分裂中國之國民大會代替國民黨之專制政府。該項國民大會剝奪人民之自由與各政黨之合法地位，且促使中國廣大淪陷地區中之多數人民失却參與之權利。

此足顯示國民黨政府堅持其專橫態度。一面證明該黨毫無從事民主改革之誠意，另一方面證明該黨決不留予共產黨以及其他各政黨繼續與國民黨政府談判之餘地。本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已無答覆王世杰之必要。

(二) 本黨中央委員會及毛澤東主席咸認為此次參加舊金山會議之中國代表團，為充分代表全國民意計，應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三方面組成。英美均已宣稱其代表團將包括其國內各重要黨派，而貴國總統尤助稱美國代表團之名額將由民主黨及共和黨平均分配之。惟當中國政局不統一之時，如國民黨欲獨佔代表團全額名額，實係不公平、不合理之措置，其目的即在分裂中國。本黨已正式要求國民黨政府，並建議由本黨三位中央委員周恩來、董必武與秦邦憲為代表。如國民黨不予接受，本黨將堅決反對國民黨之分裂政策，並獨佔性之國民黨代表團於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中所有擅自發表之意見與行動，加以保留，不予承認。

茲將上列兩項提議轉陳貴國總統，並祈對渠關切中國統一之熱情，敬申謝忱。順向將軍申致余個人之敬意。」

右述文件，乃周恩來針對蔣委員長三月一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聲明而發出指責。一則曰：「本黨中央委員會原欲答覆王世杰博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之建議……繼則曰：本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已無答覆王世杰之必要。」將政治協商會議之破壞責任，轉嫁於國民政府雙肩之上。其中所用宣傳字句，如「蔣主席公開反對一黨專政之廢止」，恰與蔣委員長三月一日鄭重聲明：「憲政時期將由本年（指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八十冥壽）召開之國民大會宣佈開始。」形成強烈之對照，謂非盲目說謊而何？此外「欺騙人民」、「分裂中國」、「

剝奪人民之自由與各政黨之合法地位」、「毫無從事民主改革之誠意」的醜惡名詞。充滿於字裏行間，極挑撥離間詆毀之能事。驗之於一十六年後之今日大陸，既無自由，又無生活，更不民主，無一而非自我供招不諱，不必再作其他評述者也。

去年美國新出版之「長期戰爭」(PROTRACTED CONFLICT)一書，中有一段如左：

「另一項爲我們必須認識的事情，便是共黨所使用的武器，是千變萬化的。西方認爲是追求人類進步或和平的國際關係的工具，在共產黨眼中，便是武器。這個實例：共產黨自始即認爲聯合國是一項武器。因此外交活動、科學、新聞事業、藝術、財政和經濟，都被共產黨用作武器。上述等等，加上宣傳、間諜、破壞和顛覆活動，都與他們的外交政策相關係。」

「甚至在心理學上的最新發明，也被他們改變爲東西方戰鬥中的武器。在他們的宣傳中，他們實用伎倆誘發西方對於財富、建軍、外國基地以及以前殖民地等，發生一種犯罪感，藉以癱瘓西方採取堅定立場的意志。」

周恩來致在華府之赫爾利大使書，除惡毒詆毀國民政府外，無其他內容，其所承之衣鉢，即以宣傳爲武器之一，然非讀過「長期戰爭」一書而融會貫通之，仍難免狃於積習，無法如共產黨之深入也。

先是年二月十一日，羅斯福、邱吉爾及史達林代表美國、英國及蘇聯在雅爾達簽訂一次協定，包括蘇聯加入對日作戰之各項政治條件。赫然在目者，蘇聯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事結束兩月或三月後，蘇聯應加入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但是時德軍尙無崩潰跡象，德國投降與歐洲戰事結束，渺不可期。而日軍在太平洋各島作戰，抵抗美軍甚力，而美國總統羅斯福是時所期待於中華民國者，「統一全國武力以擊敗日本」爲第一。爲求達到此目的，不

惜冒任何危險說服國民政府對共產黨讓步。庸詎知共產黨本質一切爲擴張自己力量。在對日作戰期中，共產黨不願自己爲煽動抗戰者，用百分之九十力量，擴張自己地盤與兵力，質而言之，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對國民政府作戰，用百分之十力量與日軍交綏。視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爲了本身生存，被迫與盟國站在一起對抗德國，但是它永沒有忘記，同時它也與西方在作戰中的兩面作戰，加上中國古老一套，更爲陰險狠，安肯爲美國在太平洋逐島苦戰之故，放棄自我擴張，加入對日作戰？因是之故，美國期待中共或蘇俄協同對日作戰者，無一而非緣木求魚。（日本宣佈投降前一星期，蘇俄宣佈對日作戰爲例外）願美國朝野有此先知遠見者，真如鳳毛麟角，不可數觀。即以哈里曼（時任美國駐俄大使）與肯南等之傑出人物，僅能確實判斷：「史達林元帥將不至與蔣委員長作永久合作。倘一旦蘇聯參加遠東戰事，彼必儘量利用及支持中共，且在該時如國共糾紛猶未解決，則彼（指史達林）甚或不惜在東北乃至華北建立傀儡政府。」而未能先機燭照國共註定不克成立協議，共軍註定不協同國軍或美軍對日作戰者也。

在此註定本質之下，倘因美國當局，昧於時勢，加壓力於國民政府，促其對共產黨讓步，已犯不可饒恕之過失。倘使因國民政府不曲從美國之意，予以「一筆勾消」，是乃「唇亡齒寒」，實犯史無前例之錯誤。亦猶今日如有人誤信兩大陣營可「和平共存」者，若非爲虎作倀，便是自掘墳墓，二者必居一焉。

美國白皮書於錄周恩來函後，附以左列評語：「自此項共產黨之強烈反應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間之統一前途已瀕於無望，直迄次年（指一九四六年）始告恢復。」是項評述，作於一九四九年發表白皮書之前夕，而非實錄一九四五年周恩來致函時在華府赫爾利大使之情趣。足見美國當局高估國共合作低估中美同盟，前後如出一轍，

實犯不可饒恕之過失者也。言下不無埋怨國民政府者。

第八節 赫爾利反對以武器支援中共

赫爾利將軍評此次談判經過曰：「余由此煩冗之紛爭階段內，察悉下列兩項事實：（一）共產黨實際並非共產黨，而實際係爲民主原則而奮鬥；（二）一人專政之國民黨實際亦非法西斯蒂，而實際係爲民主原則而奮鬥。雙方均尙須長期繼續努力，如吾人知悉應採之途徑，持冷靜、容忍且忍耐之態度，則可望有助於中國。惟在美國作戰之力量急需中國統一軍事武力之支援之時會，繼續忍耐，實多困難。」

觀上述赫爾利結論之尾句，吾人深知美國之所以急於使國共合作，是爲其本身作戰力量，找尋助力，故並未推究中國之國家體制，全國人民對共產黨之意向，即就共黨控制地區之人民，對共黨之好惡，亦不採取實據。只知共產黨有武力，此武力可以利用，故欲派一美國軍官來作中國之全部三軍統帥，使共黨部隊，亦列入控制。此計不售，乃轉而拉共產黨與國民政府合作，本係寇匪，尊之爲革命，原屬俄共工具，譽之爲民主鬥士，尤其「共產黨實際並非共產黨，而實際係爲民主原則而奮鬥」一語，乃赫爾利之基本的錯誤，亦即美國政策據赫爾利報告而作決定之基本錯誤。所幸赫爾利大使出身軍人，對於美援物資之分配，始終持「美國不應援助中共」之堅決主張，終其駐華大使任內，功雖不足以抵過，但其對中華民國愛護之赤誠，固不因其有「共產黨實際並非共產黨而實際係爲民主原則而奮鬥」之基本錯誤，而視爲有意與中華民國爲敵者也。

當赫爾利未返美前，即發生一美國援助武器與配備應供給於中國境內國民政府以外之各團體（即指中共軍隊及

其他地方武力與游擊隊之抗日部伍）問題。赫爾利決定：「對所有此項請求，除由中美兩國政府准許者外，無論其請求表面上如何合理，均應一概拒絕。」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共黨軍司令朱德，要求美方借貸二千萬美元，充作策動汪政權之偽軍官兵投降來歸，及鼓勵偽軍毀壞敵後之工作之用，赫爾利即以上述之堅定答復。旋朱德續向魏德邁將軍申其前請，並保證對日作戰勝利，共軍負全責償還，並提出文件，徵信共軍會函獲偽和平軍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七人，步槍、手槍、迫擊砲、野戰砲、共二萬零八百五十件，該文件指出，倘得美國財政援助，一九四五年偽和平軍投誠，估計將增至九萬人。魏德邁二人對此項朱德之申請借款，其決定意見稱：

「朱德所要求之財力援助，竟或較由美國對日作戰，供給中國政府以同量之軍火及器械為經濟，但此項援助無異於供給軍火，給予一武裝之共產黨，因此將開一危險先例，蓋美國之既定政策為避免國民政府之崩潰，及支持蔣委員長為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大元帥，若接受朱德之要求，則美國既定之「租借法案」金錢援助，即遭失敗！

赫爾利返美後，駐華大使館代辦艾哲遜則與赫爾利持相反意見，該代辦於二月二十六日報告國務院，竟提出「以軍火武器接濟中共軍隊」，茲節錄其大略：

「吾人拒絕國民政府以外之黨派，並與之接洽，在外交上雖屬正確，用意亦善，然其結果，必將加速中國內戰之發生，而混亂之局不可抑阻。」

「吾人無法與東南方面之李濟深、蔡廷鍇之武力合作，就軍事觀點言，為一障礙與不滿情勢，足以危害美國利

益。

→美國決策。僅支持國民政府，即接濟其他武裝單位，亦必以國民政府爲橋樑，凡此均足增強蔣委員長之自信心，其結果必爲失去其他黨派之協調。

→現在此間（指重慶）對共黨除擬創立各黨間之顧問機構外，別無讓步，此種機構，在政府中既無地位，復無權力，近日在重要戰區中，並任命反動人物，擔任軍事政治之高級長官，例如，以前憲兵司令賀國光爲臺灣省政府主席及戴笠舊部陳策海軍中將爲廣州市長。

→共產黨之意，在把握時機，利用日本打通粵漢鐵路之華東孤立形勢，於蔣委員長在雲南訓練新軍尙未完成之前，儘可能以鞏固其本身地位，而使吾人於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時，是否接受共黨援助一點，深感困難，因共黨預示「如該黨仍未得到重視，該黨即不願國民政府名義上之控制，自願擴充其武裝部隊，積極向南擴大地盤，以達中國之東南區。」何況，中共此時已有尋助於蘇聯之議，而且正謀獨立之游擊政府，組成一共產黨爲首之統一會議。

→基於軍事上需要，初步擬由美國總統以確切語句通知蔣委員長，吾人須與共黨及其他抗日武力合作，並支援之，吾人正採取直接步驟，但支援不包括非實際從事抗日之武力，如四川之各部隊是也。

→吾人保證，並不因支援共軍及抗日武力，減少國民政府之原有援助，又此項給予共軍及其他抗日武力之援助形式及數量，將先通知國民政府。同時聲明，美國將利用此項援助，藉可限制其地區，阻止其侵略性之單獨行動。

「吾人確信，美國支援中共比較中共直接或間接受蘇俄之支援與干預，實爲有益。」

上開步驟中共之建議，經赫爾利堅決反對，魏德邁認爲不可嘗試，因此國務院不用其言。

第九節 赫爾利清除大使館內親共份子

艾哲孫代辦乘赫爾利大使回美就職，居然作違反美國利益有利於中共有害於國民政府的建議。並謂國民黨中之孫科，贊同其議。此種片面報告，或出於艾哲孫之杜撰借意，或孫科之贊同並非武器支援中共，均不得以徵其實，故略而不載。

先是赫爾利大使就任後，發現美國大使館內充滿了同情中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甚至有若干官員擅將與其本人意見相反的「祕密報告」送往蔣府，而且並將該「祕密報告」副本抄送中國共產黨。其後若干日，迫不獲已，將大使館內十一位親共館員解職送回美國，其中包括有謝偉士(John S.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及積格瓦(Arthur Rjugwale)等人。

據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美國政府內的共產黨幫助中共侵襲了中國大陸，太平洋關係學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與轉變最大。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間，一些和太平洋關係學會有關的人物，企圖改變美國政策，使之對共產黨的目的有利。並從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起，使美國的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對蘇俄有利，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等實為首腦。

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之間，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公開的確定的幫助中國國民政府，並供應中國軍隊，使之抗禦中美那時共同敵人——日本。但是，就在這時期，這政策受到了很顯明的破壞。

經過三次不同的方式，美國政府對中國國民政府使用壓力，使有主權的中國改變它的政策。這就是：（一）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美國在華外交官的壓力，（二）華萊士的來華，和（三）爾後給馬歇爾元帥的指令及其後的調處工作。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二年），中共周恩來要求美國政府使用壓力，以求改善「情況」。根據謝偉士自己的報告，大約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國外交官文生和謝偉士與中共周恩來和林彪會晤。在會晤時，這兩個共產黨告訴文生和謝偉士，他們希望美國對中國「情況」作如下之努力：（一）用美國力量影響國民黨，使之改善當時的情況。（二）美國在對中國交涉上與對中國的宣傳方面，強調世界衝突的政治性，即「民主對抗法西斯」。（三）重申美國希望中國有真正的「民主」。（四）承認中共軍隊爲對法西斯作戰中的夥伴。（五）將美國對華的軍援分配一分與中共。謝偉士又加上一個第六項，即遣派美國代表去延安，在他的公文上他沒有說明這一項是否中共的要求。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春間，文生和周恩來見面後，就由重慶電美國國務院說，周恩來希望美國領袖派員到華北視察。

文生在作證時，承認美國終於強調了中國戰爭的政治性。他又承認，美國對華政策改爲明白表示希望真正的民主能在中國實現。并且他承認這個說法對當時的中國政府是一種打擊。因有這就含有「中國政府並不民主」的意思。這時共產黨正在宣傳要中國「民主」，所以共產黨的需要正好和美國的需要配合起來。

美國在華的外交官，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的「民主」起源十分熱心。這些美國外交官強調以民主制度爲永久政治制度的好處，他們並且要求，在各處擴充美國戰時新聞處，去宣傳周恩來和林彪所要求的事情。謝偉士明白表示

，要多來一些像白濟德和魏爾斯所合擬的宣言，而謝偉士知道這宣言爲中國政府所禁止。這樣，共產黨的需要，和美國在華外交官的需要，也配合起來了。

第十節 魏德邁證實中共並未出力抗日

安全小組委員會在調查期間，發現戴維斯（John P. Davies）和謝偉士在中國作的報告，他們兩人都是替太平洋關係學會工作的。謝偉士在回到美國之後，和太平洋關係學會有很多的往來，特別是謝偉士的報告在那個時期，對華盛頓的決策人影響最大。陳納德將軍是戰時中國空軍的首領，同時也是美國在華軍事首領之一，關於一九四四年美國對華政策，他這樣寫着：

「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美國政府的政策仍舊支持重慶政府，但大家都取笑說，史迪威的總司令部是實行一個私人的外交政策，戴維斯便是主持這個政策的國務卿。」

謝偉士和戴維斯的報告，多方主張干涉中國內政，他們暗中破壞蔣主席，他們以需要民主爲藉口，來損害中國政府的權力。他們說中共是「民主」的，並說中共在民間有基礎，是真正抗日者，他們誇張國民黨的弱點，誇張說中國如何不安，政府經濟如何不穩固。謝偉士並且說，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即使有過聯繫，亦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魏德邁將軍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遠東的美國總司令，他在作證時說，他當時的使命是：支持中國國民政府，助中國對日作戰，並支持戰場上的美軍。當安全小組委員會問到他的顧問，戴維斯、謝偉士和魯登Juden（這些人也都是他前任史迪威的顧問）所作的政治報告時，他說：他們的報告故意誇張「國民黨領袖的缺點、批政和

貪污」與中共在延安的「有秩序和潛在力」。魏德邁更進一步反證謝偉士和戴維斯的報告說，中共事實上對於抗日出力很少，在牽制日軍方面，中共的貢獻簡直是無所謂的。

謝偉士和戴維斯向華盛頓所作的建議，很明顯的和周恩來、林彪以前的要求相吻合。

一九四四年六月，謝偉士對華盛頓有以下的建議：（一）停止援助蔣主席；（二）美國高級官吏應宣揚美國政府的目的是要「中國統一民主」；（三）美國戰時新聞處應指出「以民主政治（在中國）爲永久政治制度的價值，以及民主政治對於極權政治作戰的幫助」。美國戰時新聞處並應承認和鼓勵中國的「自由和進步的力量」；（四）我們應對「中國的自由分子」及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五）應請宋慶齡來白宮；（六）「我們應對中共表示有興趣，……並且公開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封鎖」；（七）我們應對蔣主席使用壓力，使他同意派人到華北視察；（八）我們應訓練並裝備各省的軍隊，使之對日作戰；（九）我們應宣揚美國官員的聲明，……例如魏爾斯給白洛德備忘錄等，這聲明是國民政府所反對的。

這些報告，非但和周恩來、林彪的要求相吻合，並且還有其他巧合的地方。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戰爭」上，引用毛澤東的話，促使共產黨人支持蔣主席，但須要求更多的「民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在「工人日報」上，費爾德撰文，要求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這些都是共產黨既定步驟。

第十一節 美參院調查「太平洋關係學會」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戴維斯的報告說：「我們現在不應該捨棄蔣主席，因爲現在這樣就會得不償失，在

目前我們必須繼續承認國民政府。

「但是我們一定要現實些，我們決不能無限期的支持一個在政治上破產的政權。並且，倘若蘇俄一旦加入太平洋戰事，我們必須盡力在政治上掌握中共，不要讓他們因我們的冷淡而完全倒向蘇俄。我們更應該明白，因為我們承認了國民政府，我們無形中被一個沒落的政權所牽累，以至對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一個中國聯合政府，使中共有滿意的地位，是最合我們的願望的解決這困難的辦法。這樣，我們可以保證有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獨立和友好的中國——這是我們在太平洋及亞洲的基本戰略目標。假如蔣主席和共產黨能成立一個互相滿意的協定，從我們的立場看，這將是最圓滿的可能的解決辦法。假如他們不能妥協，我們就應該決定，究竟應該支持那一方面。」

由於戴維斯、謝偉士二員受太平洋關係學會之驅使，為蘇俄作違反美國利益及中國利益的工作。益足證明蘇俄對德作戰期內宣稱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實為說謊之尤。謂為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為了本身生存被迫與聯軍站在一起對抗德國，可是它永遠沒有忘記同時它也與西方國家在作戰中的兩面作戰，為有特別鐵證者。

戴維斯被赫爾利大使清除送回美國之後，仍服務於美國國務院，為國務院政策設計局的一員，負有審訂對外政策之影響力。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特列一款以專紀其事，題目：「戴維斯關於他建議中央情報局任用和借助某些與共產黨有關的人一點曾作偽證。」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美國參議院的安全小組委員會得到孟生（Lyle H. Munson）所寫

的備忘錄的副本。孟生曾在中央情報局任職。其備忘錄的內容如左：

「本人茲自願向聯邦調查局特種人員，赫登 (Albert C. Hayden, Jr) 和海德 (William S. Hyde) 兩人，作以下的陳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曾參與國務院戴維斯先生的會議。會後我寫下留作紀錄的備忘錄，報告戴維斯意見的內容如下：

(一) 關於任用中國人員，對政治諮詢處 (O.P.C.) 最有幫助的是有美國太太或丈夫的中國人，因此他們和美國有密切的關係。

(二) 戴維斯曾經和政治諮詢處的其他職員討論過借助某些人的問題，戴維斯說了關於遠東的活動，這些人的意見經過合適的居間人，可以作爲政治諮詢處的參考和指導。

(三) 戴維斯介紹給政治諮詢處可以借助的人，是薛渥芝 (Benjamin K. Schwartz)，史諾，史萊特莉，史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和費朋克教授夫婦。……

因爲這備忘錄內戴維斯所薦的六個人中，有五個人（以及他自己）被證實和太平洋關係學會有關係，因此安全小組委員會覺得應研究這件事。

安全小組委員會根據這一切證據，建議司法部交大陪審庭審查是否戴維斯對安全小組委員會作偽證。這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爲這案件的被告是國務院的高級官員，而且他是美國駐德專使副顧問，在他在本會作證的時候，他是國務院政策設計人之一。他所推薦任用或借助的六個人中，有四個已經證實與共產黨有關係，另一個在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正在爲他推薦之時候，被人指出是國際共產黨的特務。安全小組委員會認爲，爲了美國的安全，應該立即對這些事情，進行司法步驟。

蘇俄本其一方面對軸心集團作戰，另一方面未嘗片刻忘記也對民主國家同時在作戰中的既定策略，用各種間接又間接的譎詭手段，滲透美國朝野各階層，無所不用其極，利用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的固有組織，因其散漫，遂易控制，置諸共產黨及共產黨同路人主宰之下，進行間工作，是最主要的一環，也是最具效果的一環。

在戰後公開史料——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顯示：太平洋關係學會各國會員不僅在加速促成日美太平洋戰爭一事上盡最大努力，尤其是在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使其轉變到有利蘇俄一事上更發生了使人不能置信的最大效果。羅斯福總統對於中華民國及蔣主席爲夙具信心者，支持中國使成爲「世界警察」以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定，乃羅斯福總統的始計，不料亦被改變。證以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與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總統言行的後先矛盾，判若兩人，就是「被改變」的結果，也是蘇俄乘虛而入走向獨霸中國征服世界路途的一大步驟。世之致力研究爲甚麼失去中國大陸者，不可忽視太平洋關係學會之沿革與組織。茲述之於左：

共匪同路人控制下的太平洋學會

太平洋關係學會（Institution of Pacific Relations）原由美國的慈善機關創立並供給經費，和柯立芝（Coolidge）基金會是同樣的性質，從事客觀研究的一種教育機關，其目的在促進國際和平，並增進太平洋國家的相互瞭解及友誼的關係。後來它獲得很大的名望，並成爲影響美國輿論界一個極重要的機關。可是，從一九三〇年

以後，共產黨徒及其外圍份子，還有被其利用的昏庸之徒，就逐漸滲透進去了，並在實際上掌握了這個機關。

太平洋關係學會親共人物簡介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行政權操於執行委員會手中。該委員會共有委員八人，另設主席一人，祕書一人，均由理事中選出。一九四〇年後的理事有華萊士（Henry Wallace）、希斯（Alger Hiss）、格雷弗斯（Mortimer Graves）、德柯格斯（Len Decaux）、杜克斯柏里（Donald G. Tewkesbury）、活里（Lauchlin Currie）及司徒華德（Maxwell S. Stewart）等人。此外該會執行委員會另有四名委員係卡特爾（Edward Carter）、兼祕書長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費爾德（Vanderbilt Field）、及穆爾（Harriet Lucy Moore）。茲簡述上列各人親共事蹟如下：

一、希斯——早在一九三八年，其就擔任遠東事務局長的助理。不久就逐漸控制遠東事務局，並將該局許多祕密文件供給共產黨。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其會爲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的隨員，並懷他人之慨將中國東北奉送給我國。

二、格雷弗斯——其會爲華盛頓援華委員會的主席，並經美國政府正式認其爲共產黨的傀儡。

三、居里——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曾被拉鐵摩爾推薦爲今總統蔣公政治顧問。

四、司徒華德——其會任莫斯科研究所教師，其名會列於美政府當局認爲陰謀推翻政府的五十二種不同的機關中之一。

五、卡特爾——曾經接受過史達林親自頒發的俄國勞工紅旗勳章。

六、費爾德——是聞名已久的「共產黨豪富」，爲「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的事關作家。

七、穆爾——爲美亞雜誌經常撰稿的人，並且與其他許多共產黨所經營的機關，有密切的關係。

八、拉鐵摩爾——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五月，已故美總統羅斯福推薦於今總統蔣公，充任政治顧問。七月，當其抵達重慶後，一切多與共黨冀朝鼎接洽。九年後，一個覺悟的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布登士在美國國會的泰定委員會中，指證其確是美國共產黨的幹部。又如一九五〇年韓戰，美軍擬由韓國撤退而使韓國可能遭受攻擊時，美國務卿艾契遜曾以此問題徵求其意見，其在回復國務院的祕密備忘錄中就建議：「韓國應護其淪陷，但不要讓這件事看起來彷彿是美國促成的。」這是多麼毒辣的陰謀！

九、華萊士——一八八八年生於美國依阿華省，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總統競選獲勝，任其爲農業部長。一九四〇年美國大選結果，羅氏三度連任總統，其當選爲副總統。一九四四年五月，羅氏派其以美國最高特使的身份來華，在其留華的短期內，曾與左派人士及總統蔣公晤談時，其偏見即被發現。當其與今總統蔣公晤談時，曾堅持蔣公和中共解決國「共」問題，並於中蘇之間獲致一種普遍諒解。蔣公對此之答覆，則謂「余所要求於中共者，祇是遵守法律和紀律，從事有利於抗戰的行動，並不採取壓迫他們的措施。」可是，當華萊士返抵華府，即同羅氏報告稱：「蔣總統的政府將於三個月內崩潰，中國的遠景至爲黑暗。」其受共匪包圍及美駐華使館親共人士之影響，發生錯誤之偏見，由此可證之。

親共的僱用機關

太平洋關係學會在共產黨控制之下所慣用的宣傳方法，從該會出版的「遠東季刊」(Far Eastern Survey)

，在一九四三年所發表的美共同路人之畢生（T. A. Bisson）惡意撒謊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這篇文章裏面有謂：「現在有兩個中國，一個是我們所稱的國民黨中國，另一個就是共產黨中國，然而這僅僅是黨的招牌而已，講得更清楚一點，一個可叫做封建中國，另一個可叫民主中國。」這就是太平洋研究學會親共的鐵證。誠如季特陸（Benjamin Gitlow）所說：「共產黨利用太平洋學會鑽進了我們的國務院，太平洋學會將所挑選的人物都放進了美國政府中處理中國問題的高級職位，的確是獲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個學會可說是卡特爾和格雷弗斯爲親共份子而特設的一個真正的僱用機關。」

（錄自陳錫璋編：蘇俄在中國名辭索引及註釋）

祇知戴維斯、謝偉士二人以美國外交高級官員出賣中華民國及出賣美國國家利益，未足以燭照蘇俄與美國並肩作戰時執行滲透、賄賂、顛覆盟邦陰謀之如何澈底。祇舉露太平洋關係學會之組織與人物，而未有美國司法機關經年積月之調查報告，證據鑿鑿，未足以使發假誓者俯首認罪，同時使美國過去及現在執政當局對於爲甚麼失去中國大陸至低限度應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惟力之是求，才不失爲泱泱大國。因是之故，本人特將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關於美國政府內的共產黨幫助中共侵奪了中國，作有系統之敘述，每篇標題，悉仍其舊，惟內容則取精用宏加以整理，使讀者一目瞭然：「中國自己倒下去呢？還是被人推倒的？抑或爲美國中了共產黨詭計而把中國推倒的？」是爲作者之本旨。茲分類述之於左：

太平洋關係學會對美國外交政策之影響

一：在一九四一至四五年之間，與太平洋關係學會之有關人物，希圖改變美國政策俾有利於共產黨。故自一九

四五年起美國政策即起重大變化，俄共反受其益。

先是俄共史達林與納粹德國締約聯盟，復與軍國日本簽約修好，俄共駐美大使奧滿斯基，邀卡德爾、拉鐵摩爾二人午餐，此爲俄共利用太平洋關係學會之啓發性開始，時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也。越十一日美總統羅斯福因聽從其行政助理及遠東問題特別顧問居里之策劃，推薦拉鐵摩爾往任中華民國蔣委員長之顧問。時拉鐵摩爾正任太平洋關係學會所出版之「太平洋評論」總編輯，乃於七月間偕同冀朝鼎同機飛至當時中國之陪都重慶。冀朝鼎原爲「美、英、華貨幣基金穩定會」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Fund 之祕書長。（按冀朝鼎對拉鐵摩爾自行暴露其身份，爲共產黨員）

初卡德爾任太平洋關係學會祕書長，本與冀朝鼎相友善，時一九四一年二月，居里以美總統代表身份來中國，卡德爾致函冀朝鼎徵詢：「是否可致電於在中國之居里，向居里建議，假如利用報紙之報導，謂美總統代表居里曾經與中共周恩來會晤。則此項宣傳，無異使中國輿論明白於中共軍隊同躋於抗日陣線。」

居里回美，仍任原職，一九四二年二月拉鐵摩爾亦返美，即於國務院大廈之居里辦公室中另設一桌，並撥予一白宮內之電話分機，拉氏代居里處理日常信件，即拉氏本人對外通函皆用白宮之專用箋封，儼然成爲居里之助手矣。拉鐵摩爾利用居里，而居里則利用白宮，太平洋關係學會以高級顧問視居里，居里亦隱受而密任。

同時居里辦公室中除拉鐵摩爾外，尚有格林伯（格林氏爲英國共產黨，以移民身份來美，繼拉鐵摩爾任太平洋關係學會之「太平洋評論」總編輯）任經濟作戰局事，而其辦公則指定與居里同室，亦以白宮之信箋對外。復有費朋克者，任事於「情報局之研究分析組」，曾調任主持「美國戰時新聞處中國分處」，旋又回原職，彼雖不與居里同

室辦公，然而亦假白宮之信箋，對外行使以爲共黨利用之資。

「美國和平運動委員會」爲共產黨之煽動機構，亦隸屬於太平洋關係學會，其行政祕書費爾德尙由太平洋關係學會之祕書所調任。卡德爾與拉鐵摩爾全力向居里推薦，擬將費爾德安插於美國陸軍中任情報員，蓋欲爲共黨作反間也。

迨一九四二年十月，居里主張召開「美國對華政策會議」，出席者有美副國務卿威爾斯及共產黨黨員白洛德。諾邁。結果，威爾斯副國務卿交共黨白洛德備忘錄一份，略云：

(一) 美國願意中國中央政府與中共聯合；

(二) 美國認中國之內爭是不幸的；

(三) 中國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同在對日作戰；

(四) 美國對於「共產主義威脅中國」一說，係危言聳聽，取懷疑態度。上述備忘錄於十月十六日在「工人日報」全文發表，於是共產黨員充份利用該備忘錄以增其聲勢。

至同年十二月太平洋關係學會在加拿大之蒙屈白朗開會，該會議之籌開早於六月間居里與卡德爾所洽商而定。

美國務院方面出席者：漢密爾登（美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哈里遜（美國對菲事務特別顧問）；杭伯克（美國務院政治顧問）；柏司伏爾斯基（美國務院特別助理）；雷默爾（美國情報局遠東組組長）；居里（美國務院主理遠東事務）；祁茲（太平洋關係學會美國分會代表）；吉塞普（太平洋關係學會理事會主席）；卡德爾（太平洋關係學會祕書長）。

此次會議，注重於戰後問題，其目的則欲扶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組織聯合政府。

二、太平洋關係學會發行小冊子，毀謗中國政府，而在美政府中工作的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人物，更加以鼓勵。太平洋關係學會本其有「太平洋評論」之出版，更進而寫成小冊子，藉以影響美國政府及人民。如史蒂華所著之「戰時中國」，竭力宣揚中國共產黨為要求民主之土地改革者，類似美國歷史上之人民黨運動，使美國人民對中共發生好感，俾假輿論而促成美政府主張中國組織「聯合政府」。另有羅生哲著「亞洲現狀」、「中國的危機」及「中國戰時政治」三書，均替中共作宣傳，而對中國政府則毀謗詆毀，無所不用其極。

拉鐵摩爾復著「亞洲問題的解決」一書，當時一紙風行，愈認拉鐵摩爾為亞洲問題專家，不知其事事為共黨開闢道路，件件為共黨掩飾瞞拂。獨美副總統華萊士，以特使來遠東，竟為共黨張目，且為共黨利用，實作共黨傀儡。其所署名為著作者之「蘇維埃亞洲」乃史德吉所代筆而由拉鐵摩爾校定。又「我們在太平洋之任務」，亦署華萊士為作者，其實出自艾蓮娜、拉鐵摩爾手筆，史德吉為太平洋關係學會之柱石，而艾蓮娜、拉鐵摩爾為美共黨員，華萊士以副總統之尊，而竟懵懵若是，害人國而自累其名，惜哉！

至於華萊士訪華報告，尤屬悖謬，故其後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時，故意摒棄而未錄，但在「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所主辦之「遠東要事」已刊登其訪華摘要報告，其中一段有云：

「戰後中國之領袖，實由演進或革命中產生成份比較大。」

蓋其批評蔣委員長為無政治才幹，視作「美國之短期政治投資」。所謂「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係屬共產黨之宣傳機構。又易卜士丹（美共特務）著有「中國未完成之革命」，書由卡德爾（太平洋學會秘書長）介紹予「李度

白朗公司」出版，該公司主持人福特女士，立即印行，並設法運至中國，欲影響國務院之決策者。

一九五〇年美國務院有「戰後外交之準備」一書之出版，係自一九三九年至四五年戰後所設計者，安全小組委員會爲此書寫一備忘錄，指述該書之編輯與內容之審定，全仗太平洋關係學會諸人之精心傑作。

總之，太平洋關係學會滲透於美國務院之中，甚至左右美國對遠東之政策。其對華政策部份，不外下列各點作其範疇：

- (一) 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大；
- (二) 中共擴張其地區，並非藉武力佔領，乃係人民之擁護；
- (三) 中共佔領區之人民基本生活，較國民政府統治下爲優裕；
- (四) 中共之徵兵與收稅，亦較爲公平；
- (五) 進步之中層階級中國人，有越封鎖線而逃至共區，但人數不多；
- (六) 中共之政治制度，較國民黨爲民主；
- (七) 小政黨認爲托跡於中共，較有人權及政治自由，且得中共之武力保護；
- (八) 在中共軍與政府軍合併前，應先有政治協定；
- (九) 上項政治協定，以組織各黨派「聯合政府」爲唯一條件。

拉鐵摩爾在當時成爲「中國問題」之專家與權威，彼任中國蔣委員長之顧問，又爲美國務院助理居里之同僚，華萊士副總統之隨員，美國戰時新聞處之官員。因是而影響至「國務院主理中國事務」之文生，而居里則成爲傀儡

，被其牽引，於是對亞洲政策，遂成爲一局殘棋，處處受共產黨所掣制矣。而對華政策，直迫使中華民國退駐臺灣，促成中共掩有大陸，今日五億人民挨饑寒而遭奴役，真誰爲爲之，孰令我之哉？

拉鐵摩爾與其妻艾蓮娜，另著有「中國之過去與現在」一書由太平洋關係學會出版，其要點著重於解釋中共非一般之共產黨，仍許人民保持私有財產與企業，其目的在改善農村生活，普遍給予人民以選舉權，儘量容納不同黨派，組織「聯合政府」。此爲拉鐵摩爾移轉美國人對中共印象之傑作，且係其第一部著述。

三、由於太平洋關係學會、拉鐵摩爾、文生的影響，使美國於一九四五年改變對華政策，有利於中共。

美國對華政策，當時雖經太平洋關係學會想盡方法，冀美國最高決策當局有所改變。但因該時對日作戰，需要中國軍隊抗日，使吸住百萬以上之日軍駐守中國淪陷區，故直至一九四四年仍未便更易對華政策，而對中國之內政問題，僅作友誼之建議，爲排解之調處，並不作露骨而直接之干涉行動。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拉鐵摩爾致函美總統，提出「美國援華租借法案之物資，應分一部份給予中共」，藉免中共接受俄共援助。至七月三日晉謁總統面呈備忘錄一份，詳述中國應組織「聯合政府」包括共產黨及各黨派在內。

文生擬訂對華政策大綱，即援用拉鐵摩爾之備忘錄建議：「中國政府軍與中共軍及不聽命政府之軍隊，宣佈休戰，只要美蘇同意，蔣委員長必能與中共合作，組設『聯合政府』」等情。共黨之一貫伎倆，先行「稱兵作亂」，繼而「取得合法地位」，進而組織「聯合政府」，終至排除異己，「攫奪政權」。至十二月十五日美總統發布「對華政策宣言」，其意旨即依據文生所擬之「大綱」，即馬歇爾使華之三大訓令，亦即以此「大綱」與拉鐵摩爾「備忘錄」爲其訓令之一。不啻顯示中國共產黨與俄共不相關涉，非真正之共產黨，乃要求民主之土地改革者，其訓令

中有云：

「美總統派馬歇爾將軍赴中國，其目的是美國要影響中國之內政。……馬氏應將竭力影響中國政府，使之召開各黨派會議，使中國統一，同時使內戰停止，特別是在華北地區。……」其給予魏德邁將軍之訓令，亦與上述相同，但恰與魏德邁之建議相反。凡此皆係對有自主權之國家，使用壓力，希圖迫該國變更其國策，改易其政制，以達美國所欲達之目的。此即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之實行開始。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美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現任美國務卿）致杭伯克（一九四四任助理國務卿一九四七調任駐荷蘭大使）一函，中稱「現爲對華政策轉捩點與政策之改變」。而杭伯克復函，內略稱：「自一九四五年起，美國對華第一次不依照傳統與條約，開始干涉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內爭，美國對其有條約義務之國家，居然在其內政上表示其贊成或反對之態度，美國施行壓力，此壓力是助共而非反共，有利於共黨而有害於中國政府。」美國雖獲軍事勝利，然而全世界即瀰漫共禍，尤其在亞洲之中國，受禍最烈，美國亦竟失去了世界之最大市場，追原禍始，太平洋關係學會爲作俑者。

四、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間，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人物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使之有利於共黨在中國之目的。太平洋關係學會是依據共產黨之基本計劃：

（一）阻撓美國援助中華民國政府；

（二）鼓勵美國援助中國共產黨，以促成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組立「聯合政府」。

按太平洋關係學會領袖之一費爾德與美國共產黨主席丹尼斯，合流結成一「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作爲該二

會之喉舌，而以葉甘爲該會之輿論主持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由費爾德、畢生、易卜士丹，卡德爾夫人、薩利司伯萊、史諾夫人、休士等簽名致函美總統杜魯門，呼籲「停止裝備中國政府軍，以消弭中國內戰。同時對於魏德邁將軍及赫爾利大使以飛機及武器，資助中國政府軍，表示痛心」。

中國政府經馬歇爾之調停，終未能與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此爲未曾達到美國所欲達之目的，所謂助華之「軍援」固已停止，即中國早經向美訂購之武器及器材，亦被禁止運出。據馬歇爾在衆議院證詞：「對華禁運是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執行，迨至一九四七年五月解禁。」陳納德將軍證詞：「全面禁運後之第一次到上海之軍火，係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柯克上將（一九四五——四六美第七艦隊司令）證稱：「中國有許多師團是美國武器裝備的，所以美國軍火禁止運華，使此等裝備之師團斷絕彈藥供應，致失去火力而被擊敗，甚至第八十屆國會通過以一億二千五百萬援華，運輸每次延誤，及至最後將大砲運送至華北將領手中時，竟爾是空炮而並無炮彈，豈不貽誤軍機。」柯克上將續稱：「彼在華時曾由馬歇爾將軍告知：美國從前裝備中國軍隊，現在等於解除中國的武裝。」再據美國防部報告書指出：「八十屆議會通過軍援，其運華之確實數字中，僅有一千七百九十萬元之物資，此外只有美陸戰隊在中國所留下之軍火四百三十萬元而已。」

一九四七年美國縮減海軍，柯克上將預備將美國不需用之裝備，移給予中國政府，詎爲當時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文生所反對，幸馬歇爾、魏德邁立主，始行點交予中國接收。

一九四六年秋文生以遠東司長身份，作成備忘錄，八月十日美總統致蔣委員長函，引用該備忘錄，其中指責蔣委員長以武力對付中國之「自由份子」，並譏刺其不諳「現代自由趨勢」，且用威嚇口吻：「除非中國政府與中共

妥協，否則，美國將另行制訂對華政策。」這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文生於康乃爾大學演說稱：

「美國應避免依靠維持中國現狀，美國以它的力量來支持現狀，實是短視的。」

至於「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由吉塞普所編輯（太平洋關係學會理事會主席）。吉塞普反對柯克上將援華之建議。而陳納德將軍於白皮書將發表前，勸止吉塞普切勿將白皮書公開，吉塞普終於送呈艾契遜轉呈杜魯門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發表。

這一九四九年中共之與俄共一鼻孔出氣，已因事跡昭彰，而無從隱諱，拉鐵摩爾乃又著「亞洲情況」，書中以假定「中國國民政府業已完結」作論據，書中共爲「民族主義革命精神」，「農民革命之人民運動」，並揭示中共可能產生「狄托主義」，但不爲將「中國受俄共控制」。要求美國政府，勿存幻想，「支持殘餘地區或殘餘政府，便可在亞洲保持立足點。」至論及中共及准許加入聯合國問題：拉鐵摩爾認爲「中共將要求中國在聯合國五強之一之地位與否決權。」「美國使用否決權可以阻延中共取到這個位置——但是美國如果如此做法，就將誤認臺灣小島即是中國。」

結尾則強調「亞洲人充滿希望，不自知身在亂世，不應以美國之政策而使亞洲人失望，亞洲人因爲已得到了和平自由，但仍盼望美國合作，美國應站在希望一邊，則是有利可圖」。蓋拉鐵摩爾主張美國承認中共及准加入聯合國，其所謂亞洲人希望，直是陷害亞洲人於饑餓奴役之戕賊者也。

五、與太平洋關係學會有關人物，在一九四九年影響了美國政策之制定，並使之便利共產黨之目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掩有半個大陸，美國務卿艾契遜宣佈擬發布「美國對華政策之回顧」。任命吉塞普爲上述

三人委員會主席，而以克司，福司迪克輔佐之。吉，克二人係太平洋關係學會之主持人，而福氏則係洛克斐勒基金會。因太平洋學會曾得洛克斐勒會之數次贈予，於是「對華政策之白皮書」遂告發表。

迨至十月中共佔據大陸幾及十分之六，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亞洲情勢緊急。美遠東司令部情報官福迪亞少將，認為「中共軍事地位鞏固了，必將威脅遠東安全，倘使承認中共，等於在這邊上及政治上提高中共之地位」云云。而前述所謂「三人委員會」隸屬於國務院，專司研討對華問題之政策，乃遴選所謂遠東專家二十五人，會同國務院主持遠東事務官員，連續開會三天，其會議紀錄內之意見：

(一) 承認共產中國；(二) 美國與中共作正常貿易關係；(三) 鼓勵日本與中共間之貿易；(四) 經濟援助中共；(五) 承認亞洲醞釀革命，共產主義係偶然色彩；(六) 承認中國國民政府已被戰敗。

其另一項主張，則應承認既成事實：

(一) 准許共產中國加入聯合國；(二) 停止援助臺灣；(三) 越南胡志明為民族革命之愛國者；(四) 中國國民政府對共禁運，不予批准。

該會議所作之意見與主張，適與拉鐵摩爾所著之「亞洲情形」所陳述者一般無二。

與拉鐵摩爾之同路人羅生遮送一備忘錄予該「三人委員會」所召開之專家會議，其主張：

(一) 停止援助中國國民政府；(二) 將臺灣交予中共政府；(三) 不要阻礙對中共之正常貿易；(四) 不作任何行動以助長國民政府對中共禁運；(五) 發展日本與中共之貿易；(六) 在法律上承認中共政府。

拉鐵摩爾更有：「停止維持韓國生存之努力」。「接受賴依（聯合國秘書長）所提議之准許某些國家（包括中

共）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在美國務院召開遠東問題專家會議之後六星期，艾契遜對「中國政府攔截美船飛要號不准駛往大陸起貨」一事，提出抗議。同月廿九日吉塞普告知柯克上將，美國將不再以軍火供給中國政府。十二月三日艾契遜聲明：「不承認中國政府之海上封鎖爲合法。」同月二十三日國務院致其駐外各國使節一備忘錄，說明臺灣對美國在遠東之地位並不重要，此即美國即將放棄臺灣之預先安排。至翌年一月五日杜魯門宣稱：「美國無意給予中國政府以軍援，按照開羅會議決定，臺灣應該交予中國」（中共）杜氏意指國民政府偏促臺灣已非中國之正統合法政府而言。當時美國對華政策，全被太平洋關係學會所壟斷，艾契遜信任該會之吉塞普，選請專家二十五人，有十七人全係該會之有力活動份子，斯於後來國會安全小組之各人證供紀錄，可以徵實。

六、拉鐵摩爾自一九三五年左右起，即是蘇俄陰謀之一個自願的積極的工具。

關於太平洋關係學會能左右美國務院之遠東政策，而該會之董事拉鐵摩爾尤爲把持該會之最有聲勢之人，拉鐵摩爾被推崇爲「亞洲問題」最佳權威之一。

拉鐵摩爾任「太平洋評論」總編輯，在該評論中自一九三四——五〇年，彼曾撰寫文章七十三篇，並在「遠東觀察」中亦有拉氏文章刊載，合計有二百九十一頁之多。拉氏又另爲共產黨員之著作，寫其書評，彼以褒揚與批評之技巧，凡遠東問題之書籍，一經品題，行銷驟廣。如爲羅生邁、史騰、費朋克、易卜士丹、培爾登等計作廿一篇書評，無在不爲共黨宣揚與噓拂。即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皮集拉氏所著之書計四十一種，及論文四十篇。是拉氏意圖以文字而潛感美國人，且影響於國務院對亞洲之決策，縝而持續者久矣。

拉氏以親近美總統之遠東事務助理居里及結好國務院遠東事務主持人文生，復作副總統華萊士隨員陪同訪問俄、華兩國，且參加「保萊賠款團」在日本爲該團起草報告書，更以美國戰事新聞處副處長身份，負責「太平洋方面」事務，兼資緣而任中國蔣委員長顧問駐重慶十八個月。依據其經歷與事後之徵實，拉氏無非假借「遠東問題專家」之名，而實踐其爲俄共與中共之工具。卽於其對外蒙古指爲「自由獨立之國家」，自一九三六年起迄至二次大戰結束，堅持不懈，又進而爲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而努力。況冀朝鼎原爲中共黨員拉氏知之甚悉，因與冀氏密切合作，共同爲共產主義而奮力從事。

不僅此也，費爾德爲美共黨員，拉氏亦與之共同工作。梭奇是俄共特務，太平洋關係學會委爲日本分會祕書，拉氏在日本時相與勾結行事。在該俄共間諜網中，尙有史騰以太平洋關係學會之記者身份，偕史沫特萊女士在重慶與拉鐵摩爾狼狽爲奸，採取中國之機要情報，爲延安之中共預鋪組立「聯合政府」之路。當拉氏跟隨華萊士訪俄時，拉氏與俄共特務接觸頻繁，經「俄共部長會議」決定：「使拉鐵摩爾向民主世界宣傳」。拉氏向美駐俄大使蒲立德建議：「承認外蒙爲獨立國」，蒲立德認爲外蒙乃俄共之附庸，反對其說。拉氏則堅持，要求蒲立德致電美總統提出其承認之建議。又於拉氏派赴中國任蔣委員長之顧問之前，拉氏先與俄駐美大使奧滿斯基討論關於中國事務。如此蹤跡，無非皆爲執行俄共命令，力助中共起家，其非共黨工具而何？

至於拉鐵摩爾之交往人物，如中國之馮玉祥，明知其爲俄共使錢僱用之特務，拉氏則延至其家，並與馮氏一同旅行。共產黨員馬吐素指明拉氏所著「亞洲問題之解決」一書，係受共黨所指示，經共黨批准爲「共黨路線」之書。「工人日報」編輯共黨高級幹部蒲坦滋謂：「拉鐵摩爾在共產黨政治局經歷過五次事件，拉氏確爲俄共陰謀之積

極參與者」，「俄共軍事情報處」職員巴明少將，曾任蘇新將軍助手，蘇新告知巴明：「拉鐵摩爾是我們自己人」。而俄共西歐情報主持人克亞夫斯基將軍，亦告以「拉氏爲一家人。」拉氏與俄共特務羅果夫及俄駐美大使館官員高克曼作密切聯系與相互商洽，有祕不可宣之交結關係。則拉鐵摩爾以美國人而害美國，其貽害於亞洲者復何如耶？竊怪當時美國當局之爲其隱飾而不知又何故耶？

七、戴維斯關於他建議中央情報局任用和借助某些與共產黨有關的人一點，曾作偽證。

戴維斯、謝偉士二人初任職於國務院，旋調至駐華之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處爲政治顧問，嗣魏德邁將軍接任後不久，復調在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處任職，而謝偉士曾派駐延安之軍事聯絡站一短時期。戴、謝二人本爲太平洋關係學會而工作；在華期間所作對國務院之報告，其目的——是以「打擊中國國民政府」，「鼓吹延安共產黨之民主與得到人民之擁護」，強調中國之內戰要求民主之政治性，以扶植中共攫取政權爲唯一企圖。其詳情已在魏德邁將軍之回憶錄陳述無遺，而陳納德將軍亦另有如下之紀述：

「一九四四年夏季，美國政府之政策，仍是支持在重慶之國民政府，但大家都趣笑說：史迪威將軍之總司令部是實行一個私人之外交政策，戴維斯便是主持這個政策之國務卿。」上述之描寫，乃史迪威受戴維斯主張之影響，誤以爲中共爲「民主」，而譏中國國民政府爲封建、腐敗、貪婪、無能，使中國組成「聯合政府」，俾中共得到滿意之地位，可保證成爲統一、民主、獨立、強盛及友好之中國，則抗日力量，匯成一大主流，正合美國之所需求與願望。假使國民政府不能達成此項協議，則美國應選擇支持何一方面。

其後衆議院安全小組委員會爲太平洋關係學會事件，澈底調查，得到孟生所作之備忘錄，其中涉及戴維斯之事

，簡錄如次：

時戴維斯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局高級官員，孟生任中央情報局任事，戴氏向孟生，意欲推薦薛澐芝、史諾、史萊特萊、史特恩、費朋克六人於「中央情報局政治諮詢處」工作，認為「借助此輩則對遠東活動，得到參考與資料」。並謂：此輩所獲得之消息正確，此輩並非共產黨，不過對「政治有所瞭解」而已。戴氏強調薛澐芝教授係「俄國問題專家」，指撥其所推薦之六人以一室或數室之辦公處，另派一幹員居間聯絡，辦公處不必設於華盛頓等情。但該項薦舉，中央情報局並未執行。

戴維斯所薦舉之六人，有五人被證實為太平洋關係學會之關係人，且有雙重特務嫌疑。而史萊特萊女士與史特朗女士是以共產黨員身份被推薦，其薦舉理由，則為可作指導與諮詢。戴維斯對安全小組之證供，頗與上述備忘錄諸多出入，而安全小組復得到可資證實「孟生備忘錄」之可靠資料，則戴維斯殊有偽證之嫌，以國務院政策設計局之高級官員兼駐德專使之政治顧問，竟明知其所薦舉者為共產黨員，而公然推薦於中央情報局，其用心已昭然若揭矣。

右列七篇要點，乃自「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一書中，保存原有分篇，擷其精華，力求簡潔，使不失真，相讀者請看當能明鑒之也。

溯自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美國參議院鑒於美國對國際共產黨之鬥爭，發覺遠東政策之錯誤，而瞭解俄共史達林早於二次大戰期間，作其兩面作戰手法，一面固對納粹軸心作戰，此為世人共見之陽戰，而另一面實際上又與自由世界作戰，此為不易為人發現之陰謀。但美國究緣何因而制訂政策，至於若是錯誤？則知為受太平

洋關係學會之影響，而太平洋洋關係學會被共產黨所把持，藉學者、專家之姿態，混入國務院，遂被暗中操縱對共政策，尤其對華政策。

美國參議院基於上述論據，乃組織「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公舉參議員麥加錫主其事，專司調查共產黨如何利用太平洋洋關係學會爲掩護，而使國務院之政策瀕於錯誤？安全小組委員會在太平洋洋關係學會搜集文件重達數噸，經十七個月之整理與研究，傳喚證人六十六人，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寫成報告。

安全小組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題名曰「美國政府內之共產黨」COMMUNISTS IN GOVERNMENT (REPORT BY U. S.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而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審查，簽署而付印。自該報告公開後，美國朝野，愈認爲中國大陸之變色，係美國對華政策被共產黨偽裝得以壟斷把持之所致。是書於分篇敘事之外，附有結論，乃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對太平洋洋關係學會之判定書，即美國政府自承：「太平洋洋關係學會的活動，是對國際共產黨有利，對美國有害。」之官文書，亦即爲甚麼失去大陸之第一原因。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國際共產黨滲透、顛覆、賄賂等手段，雖層變疊出，但百變不離其刻板一套文章。倘使有心人士，熟讀「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則吃一虧，長一智，智慧賢不肖，機會均等，何至屢中共黨詭計而不知返者耶？茲將該書原結論全文錄之於左：

「太平洋洋關係學會沒有保持客觀的、學術的和研究的機構的立場。

「太平洋洋關係學會在美國共產黨和蘇俄官員眼中，是共產黨的政策宣傳和採取軍事情報的一個工具。

「太平洋洋關係學會散佈並傳播謠言，包括由蘇俄及其他共產黨發出來的假消息。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主要活動是由少數核心人物及職員主持，該會的行政及政策亦是由他們指導的。

「這些核心人物與職員都是共產黨員或親共份子。

「至於支持該會的大多數會員，除為推進該會的研究和學術的目的外，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有其他企圖。

「多數會員和多數董事都不很活躍，他們顯然對該會的政策與活動，都不能有任何影響。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活動得以推進，全靠美國的企業家、大公司和各基金會對該會作經濟上的資助。但是大多數資助者對該會內部工作情形，都不十分清楚。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真正負責人，常是設法將該會的真實活動情形，對資助者和支持者加以隱瞞。

「太平洋關係學會本身和該會的行政負責人、董事、或資助人，對該會被告發有共產黨員滲入，利用該會作親共和親俄工作一事，都沒有作真正的與客觀的調查。

「太平洋關係學會利用大人物的名字，常作該會核心分子活動的幌子，遇到該會的活動被調查時，即用這些大人物作擋箭牌。

「拉鐵摩爾從一九三〇年代起，就已經是一個自動情願的和積極的蘇俄陰謀的工具。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領袖人物，在一九三四年終與共產國際遠東組負責人伏挺史基（G. N. Volinski）有了正式的聯繫。

「太平洋關係學會成立了蘇俄分會以後，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的領袖人物曾設法和蘇俄外交人員和官員作經常的聯繫。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美籍職員，雖然十分明瞭蘇俄分會事實上受蘇俄外交部的指使，但是他們同時都受到秘密訓令：須「假裝」認爲蘇俄分會是獨立的。」

「關於太平洋關係學會與蘇俄的關係，該會負責人員在參議院安全小組委員會作偽證。」

「拉鐵摩爾在安全小組委員會，至少對五項不同的事件作偽證，這些事都是對審查有關而且是重要的。」

「戴維斯在安全小組委員會作偽證，他否認他曾向中央情報局推薦去任用，借助和信賴一些與共產黨有關的人物。此點對審查有關而且是很重要的。」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領導人不斷努力與政府人員在外交決策方面積極建立合作與機密的關係。」

「文生是該會對美國國務院發生影響與壓力的主要人物，前後共有數年之久。」

「太平洋關係學會一向在設法把與該會有關以及由該會主持人所選擇的人物，介紹到美國政府中任職。」

「太平洋關係學會與國務院有了機構上的關係，該會所利用的方式是：交換人員，邀請國務院官員參加該會會議，並經常交換情報和社交來往。」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主持人利用該會的聲望，在美國增進蘇俄的利益。」

「太平洋關係學會本身的和與該會有關的一些人物，對美國的遠東政策發生很大的影響。」

「共產黨利用太平洋關係學會，使美國遠東政策適合共產黨的目的。」

「在一九四一與一九四五年之間一些和該會有關的人物試圖改變美國政策，使之對共產黨的目的有利，並且做準備工作，預備使美國政策在一九四五年有重大的改變，藉以對蘇俄有利。」

「拉鐵摩爾和文生頗影響了一九四五年的美國政策的改變，使之有利於中共。」
「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與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一些人，竭力設法使美國政策保持對共產黨在中國的目的有利。」

「這一些人在一九四九年影響了美國的遠東政策，使之幫助了共產黨的目的。」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一個主要工作，是影響美國的輿論。」

「在太平洋關係學會以內和與該會有關的許多活動人物，其中最顯著如拉鐵摩爾、卡德爾、費爾生、畢生、羅生遜、史蒂華，用盡心思去利用他們所寫的或編的書籍與文章的親共或親俄的內容，去影響美國一般人。」

「太平洋關係學會的活動對美國輿論的影響，其結果是對國際共產黨有利，對美國有害。」

基於右列結論，我們有十足理由十全證據，提醒美國朝野上下，須對中華民國失去大陸負有道義上之責任，須對陷身中國大陸之共產黨政組織下之六億同胞，負有道義上之共同解救責任。蓋因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自身雖因久戰疲敝，而有許多缺陷，應食其果。但在抗戰期間，迄於勝利，蔣委員長所策定之外抗侵略內防共黨之兩面戰線為十分正確。大戰結束之後，因蘇俄勢力侵入東北取日本勢力而代之，中共頻添不可數計之外援。美國對華政策，因太平洋關係學會為蘇俄作奸細而作有利於共黨有害於中華民國之轉變，使中華民國於這次之聞陷於極端孤立，形成一面倒之傾斜而失去大陸。美國對中華民國失去大陸，有無責任，責任大至如何程度，但讀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及其結論，便可昭然若揭。因中國大陸之淪陷，美國在太平洋彼岸不特失其屏障，而且身受太平洋彼岸與日俱增之中共侵略威脅，謂非太平洋關係學會置美國於亡地而何！噫！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附有結論之外，尚有建議，而建議未必能強政府以必行，但行政機構不能不予特別考慮者也。

建議分爲立法、調查、司法部的工作三大部份，茲錄之於左：

「(A) 立法：本參院司法委員會建議，迅速制定法律，准許國會內的委員會有權使證人作供，如遇供詞極重要時，並有權對作證人保證不因他的供詞而陷他自己於有罪。

「(B) 調查：本司法委員會建議：

「(一) 司法委員會與司法部合作，對間諜法案及其他有關的法律詳加研究，是否有必須修訂處，使對當前的安全問題，得以作有效的處置。

「(二) 國會內的調查政府行動委員會，應研究一個立法的範圍與需要，使政府的行政各部門，對國會委員會所需各部門檔案內的資料，得以隨時供應。

「(三) 考慮指定適當機構調查下列五點：

「甲、共產黨對財政部及其他制定及執行美國財政金融政策之事務的機構，可能滲入或發生影響。乙、希司在國務院任內時，對處理美國的外交和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他對國務院的人事任用上所起的作用。丙、政府一切部門聘用了若干與太平洋關係學會親共核心有聯繫的人物，以及現仍在政府機構任職的這種人的活動與影響的情形。丁、美國的各慈善、科學和教育基金會，對美國共產黨及親共活動資助的情形。

「(C) 司法部的工作：本司法委員會建議：

「（一）司法部將拉鐵摩爾是否對安全小組委員會作偽證一問題，提交大陪審團審查。」

「（二）司法部將戴維斯是否對安全小組委員會作偽證一問題，提交大陪審團審查。」

右列建議，未有一字提及受害國——中華民國，是為美國立法機關思想精神之大漏洞，更未足語於亡羊補牢者也。

第十二節 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共和國，為太平洋兩岸廣土衆民蘊藏豐富之姊妹兄弟大國，且為整個世界之和平安全柱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為併肩作戰之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聯合國之共同支柱。二者之中，如有其一，為國際共產黨所吞噬而去，其他之一，必須擄冠往救，義無返顧。倘使二者之一，非自己倒下去，乃因其他之一受第三者之縱橫捭闔，加以推倒與落井下石，是否負有「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負其責」之全部責任！因中西文化之不同，或對責任問題，有不同之解釋。但在結論與建議中，不能無一語及於責任問題。苟真如是，是乃自行委棄自由世界盟主地位於弗顧，安足與共產黨陣營作殊死之鬥爭者耶？國際間交涉方式，素有懲兇、道歉、賠償保證以後不再有此事實現之要求方式。中國大陸淪陷之責任問題，我中華民國固不願以泱泱大國委過於其他國家。惟以世界領導者自居之美國，則不能不引中國大陸之淪陷為其過失之一，力求彌縫缺陷，便不再有此事出現，是為最低限度之要求，亦即哀兵必勝之所由來。

吾輩讀全書，不能無遺憾者，即因無此引咎負責語也。

又以安全而言，國際共產黨既抄襲戰國秦滅六國之故智，秦之客子（今之特務），遍於山東之諸侯，諸侯客子，不能入函谷關一步。于是有鐵幕與竹幕之所由來，但蒙其不利者，爲民主自由體制之國家，以美國爲尤甚。竭若干人士若干歲月之努力調查，雖經編成報告，附以結論與建議，既未懲奸，又乏防諜，謂非虎頭蛇尾而何！或謂美國爲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民主制度。立法機關最大之權限，只能出於建議之一途，行政司法如何執行其建議，各有其不同角度，誠如所言，非美國立即刷新制度與其組織，鮮有不爲紅色俘虜者！噫！

太平洋關係學會一名稱，間或散見於報章雜誌，求其以系統記載其事者，當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報告」爲首屈一指。但除結論與建議外，多半錄自各有關人士供詞，零落錯亂，前後不能啣接，經本人加以悉心整理，琅琅可誦，足爲爲甚麼失去大陸之初步答案矣。

中國戰籍中商及太平洋關係學會者，以蔣總統著之「蘇俄在中國」一書，從羅果夫通訊，說到「兩個」中國，即爲太平洋關係學會怪異產物。其幽靈迄今仍爲祟於自由中國與自由世界，痛定思痛，彌足警惕！茲錄之於后：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Vladimir Rogov）批評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裏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積極爲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其他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

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T. A. Bisson）『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也就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於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右為「蘇俄在中國」第二十六節之全節，詞簡意賅，皎若日星，足為中華民國對「太平洋關係學會」之定讞，本人不願再贅一辭矣。

因赫爾利大使卸任後，發現美國大使館內充滿同情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甚至有若干官員擅將與其本人相反的「祕密報告」，送往蘇府，而且並將該「祕密報告」副本抄送延安共產黨。因此迫不得已，將大使館十一位親共館員解職，遣返美國。包括有謝偉士、戴維斯、基格瓦等高級官員，皆與蘇俄控制下之太平洋關係學會有極密切的關係。於是不免因赫爾利大使而述及太平洋關係學會。又由太平洋關係學會回述赫爾利大使。在太平洋關係學會祕幕幕未被揭穿以前，世但知美國大使館充滿同情共產黨及其同路人，而未知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尤其主理遠東事務如

文生等，悉已透過太平洋關係學會爲蘇俄所控制。夫以事後證據證明歷史成敗得失事件比較顯而易見，故將太平洋關係學會祕密組織經過，插入「赫爾利錯在那裏」一篇之內，既以彰赫爾利大使能以大刀闊斧手段解除大使館內親共官員十一人爲衷於至當。再以示赫爾利大使不克完成出使中國使命，乃因錯估國共和談中俄妥協而未致力於中美同盟有以致之也。明知中美同盟方案，無論由美國或由中國方面提出，必爲太平洋關係學會所多方阻撓全力破壞，無或置疑。但夷考當時情勢，除中美同盟方案外，實無其他有效籌策可以消弭蘇俄中共共同協力離間中美孤立中國之詭計。只有經由赫爾利大使之手，號召中美同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造成既成事實，定可挽中華民國失去大陸之浩劫。特惜是時居中美兩國高位者，皆無此遠見，甚且並中美同盟呼聲亦未之聞，不亦痛哉！

赫爾利回華府述職後，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啓程返抵重慶。在未蒞渝前，更道出倫敦轉至莫斯科，當莫洛托夫之面，與史達林晤談，同時美駐俄大使哈立曼亦在座，事後赫爾利報告美國務院，其原文譯稱

「余向史達林元帥分析，莫洛托夫於上次會談中，謂中共事實上絕非共產黨，其目的，在獲得彼等所視爲中國需要之公平改革，蘇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蘇聯不願見中國分裂與內戰，蘇聯政府願對華關係日臻密切與和諧，蘇聯對新疆及他處所發生事故極爲關切，並堅持中國政府制止對蘇聯人民之歧視。」

「予與史達林莫洛托夫分析中國政府與中共之目前關係，予坦白表示個人曾促成中共與中國政府之商談，並將商談綱目及進展之程度與現狀，摘要報告。予告史達林云：

「中國政府及中共，雙方均稱：『遵照 孫中山之三民主義建立中國之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雙方均堅強反

對日本，其共同目的在驅逐日本於中國之外，中共與中國政府間爭執頗多，自無疑義，惟雙方目標均在於擊敗日本，建立一自由民主與統一之政府於中國，由於已往之衝突，雙方對於細節方面，皆各持己見，予明白表示，美國堅決主張中國應由中國人領導，自己決策，自己負責，本於此意，美國已贊同中國建立一自由統一政府之抱負，並支持達成中國各武裝力量統一之一切努力。

「予又告以羅斯福會授權於本人，與邱吉爾首相商討此問題，邱氏與外長艾登均贊同美國政府之此項行動。

「史達林坦白表示：『蘇聯政府願支持此一政策』，並謂：『樂與英美合作，以期中國軍事力量之統一。』

「史達林表示：『國民政府官員中，不免有貪污發生，惟蔣氏本人大公無私，爲一愛國志士，故蘇聯已往曾與之友好。』

「予復告史、莫二氏稱：『中共要求派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予於離華之前，曾告中共，舊金山會議，乃一政府間之會議，而非政黨會議，如欲參加舊金山會議，須透過中國國民政府。羅斯福總統支持此項要求，已告蔣委員長，最好由國民政府允許中共參加中國國民政府派赴舊金山會議之代表團，蔣氏已將該代表團分出一席予中共，該項任命已被接受，此實爲有希望之象徵，一中共要員，將充任代表隨赴舊金山會議。』史達林讚譽此項發展，意義重大，並表同意。予亦告以羅斯福總統邱首相均表欣然同意。史達林續表示，鑒於一般局勢，渠（指史達林）完全支持中國統一軍事武力立即行動，並完全承認蔣介石領導下之國民政府。

「總之，史達林已無條件贊同，此次會談中所申述之美國對華政策。」

以上係赫爾利對史達林會談之報告，時在四月中旬，其時美駐蘇大使哈立曼適在華府，對於赫爾利報告，與國

務院遠東司史丹敦作下述評語，其原紀錄稱：

「上述談話紀錄中載稱，哈立曼大使感覺，赫氏之報告，雖然事實正確，但對史達林元帥之反應，予人以過份樂觀之印象。」

哈氏確信史達林元帥將不至阻蔣委員長作永久之合作。倘一旦蘇聯參加遠東戰事，彼必儘量利用及支持中共。且在該時如國共糾紛猶未解決，則彼（指史達林）甚或不惜在東北乃至華北建立傀儡政府。哈氏曾向赫氏表示史達林關於吾人在華努力之種種言論，並不足以說明「俄國人將不採取彼等所認爲對其最爲有利之任何行動。」哈氏深恐赫氏將史達林談話過份樂觀同蔣委員長報告。哈氏以爲最好勸赫爾利大使慎重，不要引起無根據之期望。

當時美國參事史退汀紐斯於四月二十三日指示赫爾利大使，其文曰：

「吾人促進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從事軍事與政治之統一計劃，此時能由史達林立即贊助，本人深表重視。但同時，本人感覺，必須認清史達林元帥之承諾，可能針對目前直接之環境，而此項環境或不致維持過久，想費大使必有同感。蘇聯現正集中注意力於歐洲，其在戰後亞洲之地位，根本上未因國共問題而受影響，由於此種情形，本人深能瞭解史達林元帥何以願尊重吾人之領導地位，而支持美國尋求中國軍事政治之統一努力，蓋此事絕非蘇聯所不能接受者，倘一旦蘇聯積極參加遠東戰事，中國內部統一猶未完成，而蘇聯認爲其與國共兩方中之某一方合作，所獲之利益，將對其未來在亞洲之地位有重大影響，則本人深信蘇聯勢必重新檢討其政策，并依照其最高利益，修正其政策。因此，本人認爲有一點很爲重要，即貴大使於告知蔣委員長關於史達林元帥各項聲明時，將一般意見同時轉達，俾蔣委員長能完全認識局勢之緊迫。並懇切告知蔣委員長，必須及早軍事與政治之統一，以期對日戰爭得

以早日結束，且能建立一基礎，使中蘇間終能產生和好無間之關係。」

赫爾利對史達林似已失之過信，而美駐俄大使館代辦肯南有報告致哈立曼，寄往華府，蓋哈立曼亦曾參加與史達林之晤談也，時哈達返華府述職，哈氏即將肯南報告轉呈國務院參考：（上略）……

「未來蘇聯對華政策，仍將繼續其近若干時之所採用者，即一種流動而有彈性之政策，其目的在對於蘇聯境外之亞洲大陸各地，用最少之責任，取得最大之權威，對於有戰略重要性，及與蘇聯接壤之地區，自將施以壓力，莫斯科將致力於下列各事：

一、對於沙皇時代，俄國在亞洲大陸上所據有之一切外交土地利益，縱不在形式上，亦將在實質上予以恢復。
二、控制中國在中央亞細亞與蘇聯接壤之數省，此一行動，係為適應在外國保護蘇聯工業重心之戰略上需要。
三、對於現受日本統治之華北各地，取得充份控制，以防其他強國，重演日本之侵略。（對俄國而言，此舉係對外來勢力，侵入該區域，作大力之排斥，美英勢力亦在被排斥之列）……

倘吾人在此一階段，亟欲取得俄人之支持，加以以史達林所用之言辭，對各種不同之人，有不同之解釋，及其內懷戒心，而表面和藹，欲使吾人對俄援助，甚或默許美國對華長期目標之達成，作過份依賴，則為可悲痛之事。」「上述肯南代辦之報告，可謂切中蘇俄之真正企圖，不能謂美國無人也。

赫爾利大使所挾以俱來之美國外交政策為何？言人人殊。惟雅爾達祕密協定內容，雖未直接通知我國民政府，但外間傳者鑿鑿。余是時適在重慶，深以戰後中國孤立為慮，憂心忡忡，怒焉如搗！忝以平日與羅斯福總統有魚雁往返之雅，而又自恃先後判斷蘇俄政策蘇俄與日本進侵西南太平洋兩大事件億而有中，至條陳「租借法案」尤不無

微功，猥以自信之深，乃決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締結中美同盟五十年，以期贏得戰爭，並贏得和平。不料函件方經脫稿，而羅斯福總統竟於四月十二日與世長辭，此歷史性之建議不幸乃爲之擱置。對羅斯福之喪，以蒿目時艱，哲人其萎，成五律三首並附序以哭之，茲錄之如左：

「余既主天文臺半週評論筆政之明年，日寇來犯，始啓釁於蘆溝橋，繼稱兵於淞滬，舉國無甯土。余口誅筆伐之餘，即以爭取美蘇二國同情自任。越三年，民國廿九年九月廿七日，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成，舉世咸目爲攻美之先聲。余則謂攻蘇先於攻美。爲美國計，應以擴大舊艦租地於南太平洋。廣被於世界每一民主國家，並以物資援助中國，抵抗侵略，爲適時適切。書既上，先生賜函稱是。未幾有租借法案之成立。凡屬民主國家，皆蒙其庥。孝威感激之餘，爰徵詩永誌不忘。作者吳稚暉先生以次三百餘人，詩三百六十三首，題曰：太平洋鼓吹集。既寄美京，先生顧而樂之。今戰爭勝利，左券可操，而和平勝利，猶待努力，而先生竟棄吾人而長逝矣，嗚呼痛哉，是誠世界人類不可補償之損失。況公誼之外，電以私交，豈言語文字所能誌吾之悲，然又不可無言，勉作輓詩三章，含淚寫成，不知所云。」

「並世推盟主，哭公寧私爲。噩音疑是誤，病訊抑何遲。文字空知己，和平已盛基。再兵成定策，後死詎能辭。」

「大矣今元首，彌縫百代醇。止戈宜九武，明德在新民。兵合存吳蜀，隣孤恤晉秦。淵衷容外論，舉世哭斯人。」

「併力輸文化，何期有大難。詩成猶待譯，書至忍重看。冠劍開羅盛，林泉海德寒。誰言功未竟，頑寇已凋殘。」

。」

右詩第二首腹聯：「兵合存吳蜀，鄰孤卹晉秦。」句，指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書成未發而羅斯福總統作古因而不果也。（右序及詩，載在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廿二日重慶天文憲報）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杜魯門以副總統繼任爲美國總統。余因素欠淵源，未敢冒昧，不得已將擬致羅斯福總統原作，加以修改，逕投新自華府述職事畢，取道英倫、莫斯科分謁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與蘇俄委員長史達林回任重慶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交淺言深，智者不取，而心所謂危，乃急不暇擇，將奈何？函曰：

赫爾利將軍勳席：

下走菲材，猥以軍事評論受知於貴國故總統羅斯福先生，頃者欣悉台從取道英蘇，平安抵渝，謹將愚見所及爲將軍一陳，幸垂察之。

竊意以爲世界性政治軍事之策略，自迥異於局部之策略，羅斯福總統曾謂吾人不僅須贏得戰爭，更須贏得和平，然則吾人將何以達成此一理想之目標歟？下走以爲最善莫若先行進軍東京，次及柏林，最低限度亦應對歐亞兩戰場，同時並重。三年之前，僕曾著「會師東京」一文，有所論列。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又著「開闢第七戰場」一文，強調盟軍應即督促蘇聯，發動對日作戰，與盟軍登陸歐洲同時並進，而以全力向滿蒙進擊。良以吾人苟欲贏得和平，務必對敵四面合圍，包圍作戰，蘇聯亦當知與其他盟友，同時兩面作戰，捨此則戰後或戰事行將結束之時，將發生不可思議之後果。茲者，柏林將陷，東京指日可下，然而吾人距贏得和平途程，似仍遙遠，將軍高瞻遠矚，斷事卓越，對此未悉所見何似？

二十年來，下走未聞政事，然服膺真理，企望和平之心，則未嘗或已。近年於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教育各方面之改進，對我國政府多所建議。復不斷呼籲「盟軍會師東京」，蔣介石主席亦常以此訓勉國民，以東方主力戰自任。我國雖不幸因戰事而與外間隔絕，然貴國無限之援助，誠使吾人感奮不已。

將軍深知，苟欲贏得和平，必先使我國於八年抗戰，犧牲慘重之後，得到領土主權行政完整（包括滿洲、蒙古、新疆、西藏在內），否則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然則我國將何由得而強盛安定耶？竊意以爲必須中美兩國，密切合作，方克臻此。中美如能訂立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互助協定，庶幾未來世界大戰可免。

茲將主張協定之要點，慨陳如次：

- （一）美國儘速登陸中國沿海。
- （二）美國訓練並裝備我國陸軍至少九十個師。
- （三）美國協助中國，建立強大之海軍。
- （四）美國協助中國，擴充空軍力量。
- （五）美國協助中國，從事經濟之復興。
- （六）美國協助中國，穩定貨幣。
- （七）美國協助中國以必須之戰略物資。
- （八）中國供應美國以必需之原料。

(九) 中國協助美國，在太平洋及亞洲大陸，建立軍事基地。

(十) 中國盡力提高國民之購買力，增進對美貿易。

以上各點，雖芻蕘之見，然以一愛國者身份，不能不爲將軍一陳，惟執事實圖利之，倘有一面之緣，得聆所言，不勝欣幸之至！專此祇頌

助安

天文臺週報社社長陳孝威敬啓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八日

右錄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建議簽訂中美同盟五十年一函，包括幾個特點如左：

(一) 指責重歐輕亞戰略之失當，隱伏戰後世界失其均衡之禍機，因而即使贏得戰爭，亦將失去和平。

(二) 指出當面敵人——德國與日本于久戰疲敝之餘，已成爲強弩之末。惟蘇俄與中共相勾結，將成爲戰後世界最恐怖之敵人。

(三) 暗示爲求中美二國免於彼此孤立，不得不曲徇美國之意忍痛追認雅爾達祕密協定，但須以中美兩國同盟五十年協定爲交換條件。

(四) 確言中美兩國同盟必須以絕對平等互惠爲原則，以我所有，供彼所需；以彼所有，補我所無，蔚成太平洋兩岸兩大國互相依存之體系。

(五) 斷言戰後中華民國將失去滿洲、蒙古、新疆、西藏。

(六) 直言戰後世界，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

(七) 面對上述情勢，只有中美兩國締結同盟五十年，才能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作爲結論。今事過一十有六年矣，當茲赤禍蔓延於全世界每一角落之際，重讀前函，深覺本人之不幸而言中，爲之低徊靡已。而是函之發出不得其人不得其時不得其地，遂成爲痛定思痛之痛史。人謀不臧歟？氣數使然歟？吁！可慨矣！

是函自構想、起草、翻譯、發出，歷時頗久，徒爲愛國心所驅使，而以誠惶誠恐之心理處之，故未敢輕以示人，但當時知者仍有力其人者在。惜發出日期，雖早于納粹德軍投降前十日，而已在英法聯軍諾曼第登陸之後，失之稍遲，至未能產生預期效果。假使對手爲羅斯福總統，雖不敢必其接受。但以「太平洋鼓吹集」之心聲，與「租借法案」建議之末見，或不至忽然置之，斯則本人之所敢以自信者也。

蓋以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局，史達林一面對德義軍作戰，一面片刻不忘于對美英作戰，未爲羅斯福、杜魯門先後兩總統所識破，故獲包藏禍心，朦朧世界。自日軍向珍珠港突襲之後，羅斯福總統對於太平洋戰爭，始寄厚望於國共兩軍併肩出擊以與太平洋美軍逐島作戰相呼應，以共軍不聽國民政府調度而失望。故自德黑蘭會議（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史達林僅表示對日宣戰有可能，頗使美英的參謀部人員又驚又喜，重以其狡猾心腸，極盡義形于色之能事，開口閉口無不以擊潰德軍三個月後立即對日宣戰爲演技。于是華府、重慶不無沉浸於國共協商，中蘇訂約氣氛之中而不能自拔，是爲該時代之悲劇。是時共軍仍作並肩抗戰姿態，中美英蘇仍爲一體，若非爲「苟利國家生死以之」之愛國心所驅使，孰肯冒天下之大不韙，向被國際共產黨滲透已深之美國大使館投遞是函供人話柄者哉？是時美國務卿史退汀紐斯接獲赫爾利大使回任報告後所批答之指示，頗有許多與是函共同之點，宜足爲赫爾利大使述職後重返重慶任所斡旋國共協商中蘇友好之新棒喝。不料赫爾利大使方陶

醉於其個人之幻想，對是函並未予以任何考慮，是乃本人條陳「租借法案」獲售後之初次挫折，默蘊于心，未嘗語人者，殆有數年之久。直至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美國國務卿杜爾斯與我國外交部部長葉公超簽訂中美共同防衛協定於臺灣，時間雖後於余之建議者凡九年，空間雖由整個中國縮小至臺灣金馬諸島，然東帛受性，猶足資為現階段中美二國共同安全之基石。撫今思昔，雖未敢以曲突徙薪自居，猶且為之爽然若失者也。憑此一紙建議，未能發為中美二國安全共循之道路以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乃竟貶價為「為甚麼失去大陸？」之資料，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去贏得和平之途愈遠，不亦痛哉！

中美同盟，能否挽大陸之沉淪，見仁見智，或有不同。顧中華民國面臨中俄共內外夾攻之下，欲從孤立中搶救回來，不以中美同盟而竟代之以國共協商與中蘇友好，不僅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實則南轅而北其轍，抱薪以救火者也，其理由容當另述之。

吾友何敬羣教授，今之經師人師也，讀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一函，題七古長句於其後，語重心長，足以發人深省，茲錄之於左：

太平之局何由臻。太平洋上當準繩。泱泱對岸兩民族，直等世界之權衡。黃炎華胄四萬萬，人力物力皆成城。互相提挈即倚賴，坐視劫制生棘荆。坤維傾陷失其正，世界坎坷安得平。誰能見微發此意？吾友陳侯會早計。殷殷箴借張子房，耿耿書貽赫爾利。目光如炬照何遠，人事回天原可致。東西交利約十章，休戚相關溯百世。不徒主客共清爽，乃為乾坤扶正氣。如何曲突無人聽？遂使亡羊枉階厲。中朝衰衰昔充耳，華府紛紛今短氣。陳侯赫使同扼腕，天下蒼生已顛顛。螳螂未可語春秋，世人輕亞方重歐。豈知狼自後門入，噬哉肉食空優優。竈炎熊熊漸及暮，

柔過方公墓尼約。是非得失決一言，猶自如著難下着。士當先急天下憂，我亦有緩久在喉。秦人不聽繞朝策，魯國終須曹劌謀。陳侯赫使幸不綏，馳書再計桑榆收。長歌爲君一鼓舞，苦口或可回天休。

針對中共蘇俄協以謀我，離間中美，以孤立中國之詭計，除得道多助爭取與國，以固吾國外，尙有何其他長策，以善其後乎？美國內有太平洋關係學會爲共產黨作內應，外有駐華大使赫爾利昧於中共蘇俄之確爲一體，而浪費精力於促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國共政治協商會議之實現，此二者因中共與蘇俄，雖外示疏遠而內實一體，先天上即註定中蘇同盟友好條約爲必不可靠，國共政治協商會議爲決無成就，而赫爾利大使對此竟懵然一無所知，故不能於危疑震撼之秋，對本人中美同盟五十年之建議，予以善意之考慮。因赫爾利大使對於中共與蘇俄實際關係之失察，於是錯覺乃隨之而生，至以國民政府不肯對共產黨讓步，便視爲不對美國讓步，不對美國讓步，更視爲對美國之不友好，此其一。國民政府不對蘇聯讓步，甚且視爲不對美國讓步。不對美國讓步，又視爲對美國之不友好，此其二。況此所謂讓步者，迹近削弱自己一切以屈從對方亦不贊強人以投降而已。然美國僅爲縮短對日作戰之時間着眼，只求蘇俄對日宣戰，中共能併肩出擊，一切嚴重之效果均非所計，此爲中美二國因美國之昧於知己知彼而中挑撥離間各個擊破之詭計也。

倘使以中美同盟取中俄談判國共協商而代之，或將中美同盟置於中俄談判國共協商之上，則美國朝野心理，定必豁然貫通，鮮不以中美利害一體爲着眼，中國受蘇俄或中共陰謀之削弱，等於美國受蘇俄或中共之陰謀而削弱。在此正確觀念之下，蘇俄對日作戰中共比肩出擊之重要性雖未消失，但有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之校計案情，至低限度，不至中中共蘇俄挑撥離間各個擊破之計。

倘使中美同盟在東昂受性之下順利宣告成立，結爲不可分之一體，以形勢比人強之故，則中共與蘇俄之外裝疏遠內實一體，游離須臾有待，而中共內部分歧且立至，而有利形勢自將屬於中美同盟之一方。方諸中國以孤立當美、蘇、中共三方面之衝者，其利害相去爲何如耶！

在德軍未投降之前，國民政府所受美國政府之壓力，只限於以迅速擊破日本爲理由，迫令國共兩黨政治協商條款早日成立，而國民政府，面臨此友邦壓力之下，尚可應付裕如。但在德軍投降之後則情勢一變，全面勝利，雖已在望，而全面危機，則與日俱來。蓋以蘇俄因德國之崩潰，當面敵人之壓力消失，以爲天下自此將莫予毒也已。而美國則與中華民國仍須持續並肩作戰。據美國參謀首長估計，德國投降之後，對日作戰須再持續十八個月（原子彈試驗成功與否是時尙不可知。）於是以蘇俄之參加對日作戰，視爲必要。因此是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之雅爾達祕密協定，於六月十五日由美國總統杜魯門訓令赫爾利大使通知我國政府，並限令七月底以前與蘇俄政府正式簽訂條約，名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則被迫承認雅爾達祕密協定而已。因是之故，國民政府於德國投降之後所面臨之國際壓力，對內國共政治協商之外，更添有中蘇友好同盟談判之困擾。兩者有一不忍痛讓步，或忍痛犧牲，而美國鮮不目爲與其所謂「美國利益」者相違反，而將被認爲出於「不友好」之態度。此時美國實已深中蘇俄與中共反間之毒。益以太平洋關係學會親共份子在美國國務院之推波助瀾，而美國外交歷史上最大錯誤之「一筆勾消」政策，踵之而來，有互相爲因果者。

倘使美國參謀首長腹案，能以羅斯福總統「不僅須贏得戰爭更須贏得和平」爲至高無上之信條，則蘇俄出兵滿洲夾擊日本以呼應美國，應視爲戰後世界危機之一，惡因先種，自當力求其避免。蓋以蘇俄與中共相勾結，將成爲

戰後世界最恐怖之敵人。倘蘇俄無出兵滿洲機會與口實，則中共與蘇俄雖屬一體，尙未能連接一氣，雖威脅戰後世界之和平，必不至如今日之甚者。

善哉！金氏海軍上將語杜魯門總統之言曰：「儘管蘇俄參戰是合宜之事，但在軍事觀點上，並非『不能或缺』。美國可無須過事催促蘇俄參戰，擊敗日本之代價雖然大，但美國確有單獨承擔太平洋戰役之力量。美國必可擊敗日本，並不需要外力援助，希望總統瞭解此一事實。」誠如金氏所言，則蘇俄在遠東作戰之重要性，雖不全部消失，亦必居於次要，而國民政府在戰後所受蘇俄中共相勾結以禍中國之害，亦必不至如今日之甚者也。

特借此函甫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八日發出），不及旬日，而德國於五月八日投降。一夕之間，形勢驟變，蘇俄頓成爲對日作戰必不可少之一角，徒爲贏得戰爭，自不無若干好處。若爲贏得和平則顯伏無數之禍機。凡此，本人悉已於函中詳敘之矣。猶幸天假自由世界以緣，是年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三國首長會議之第一日，杜魯門總統已得到原子彈於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州爆炸試驗之成功消息。翌日（十八日）復收到關於原子彈爆炸的詳細報告。邱吉爾與杜魯門咸視爲原子彈的成功，一方面可縮短對日作戰的戰爭，他方面可以減輕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之重要性，而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函中所指稱：「捨此則戰後或戰事行將結束之際，將發生不可思議之後果。」等亦可減少若干矣。史達林於杜魯門述及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報告，邱吉爾回憶錄謂其毫無驚異的表情。史達林說：他贊成美國使用原子彈以轟炸日本，他似乎對於原子彈的重要性還不會意識到。後來他也不再問到過。實則史達林當時茫然若喪，出之故示鎮靜而已。

原子彈之成功，雖能縮短對日作戰之戰爭與減輕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之重要性。但美國因錯覺所加於我國之對

蘇俄與中共沉重之壓力，與日俱甚，並不因原子彈轟炸日本成功而稍轉緩和，此是否應歸咎於中美兩國當局彼此認識之不夠，任憑蘇俄中共之玩弄挑撥與離間。美國因有「一筆勾消」之可怕可恥之外交政策出現，使並肩作戰之盟友——中華民國陷於極端孤立而終至失去整個中國大陸。而美國之安全，亦因太平洋彼岸失去可靠與國——中華民國，而有唇亡齒寒禍且及己之痛。痛定思痛，是否因在德國投降以前或在日本投降以後未曾作中美同盟五十年之努力，以替代永不可靠之中蘇友好同盟與決無成議之國共政治協商會議實尸其咎，中美兩國當局撫衷自問，亦必啞然而為之失笑者也。

赫爾利大使自美述職於四月返渝後，先有史退汀紐斯國務卿之訓示，後有本人中美同盟五十年之建議，所予赫爾利大使之影響如何，頗為有趣之問題。

遍覽白皮書所載，只有赫爾利大使檢討蘇聯與中共之關係一則，係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七月初發出報告，蓋在德國投降之後與日本投降之前。時勢已經大變，而觀點是否隨之而變，堪資研究。茲錄全文於左：

赫爾利將軍返渝後，關於中國政府與中共之交涉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初報告稱：「吾人深信蘇聯勢力將控制中共之行動，中共不信史達林已同意或將同意支持蔣委員長領導下之中國國民政府。中共仍完全期望蘇聯支持中共對抗國民政府，除由蘇聯作公開行動外，任何事將不足以改變中共對此問題之見解……在雅爾達會議之前，本人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一項計劃，強使中國政府作較寬大之政治讓步，俾可以與中共求得解決，總統未曾採納該項建議。」

「本人相信，蘇聯對中共之態度係去年九月本人所報告總統，且迄已報告數次者。此事亦可由史達林對霍布金斯與哈立曼之談話中證明之，雖然如此，但中共仍信彼等係受蘇聯支持。除非中蘇訂立條約，蘇聯同意支持國民政府，

府，任何事皆不足以改變中共對此問題之意見。苟中共確信蘇聯不予支持，而國民政府又能採取現實態度，給予寬大政治條件，則彼等將與國民政府和解，國民政府與中共現時之談判僅係拖延時間，以待莫斯科會議之揭曉（註：此係指宋子文與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之談判，此談判於七月初開始舉行，在七八兩月內，會間斷予以廢續，最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相關之協定。）

「中共之領導者至爲聰慧，如有明白表示，彼輩將能領會，任何論辯均不足以改變其立場，祇有鐵石一般之事實始可改變其態度，中共之軍事力量，中共所控制之區域，以及中國人民贊助中共之人數，凡此皆曾受誇大之宣傳。國務院官員、陸軍軍官、報紙及廣播界，對於中共之軍事及政治力量大多數接受共方領袖之聲明。不過，如有蘇聯支持，中共實能發動中國內戰。倘無蘇聯支持，則中共終將以政黨身份參加國民政府。」

右赫爾利大使檢討蘇聯與中共之關係，錯在昧於蘇聯與中共爲不可分之一體。惑於莫洛托夫及史達林之說謊，謂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無關而深信不疑。

庸詎知蘇俄立場，支持國民政府之所得，孰若支持中共所得之多且大？

庸詎知中共立場，依附國民政府之所得，孰若依附蘇聯所得之投且合？

基於右墨第一事實，蘇聯不支持中共而支持國民政府，雖有雅爾達協定諾言，但爲詭道之一，不足置信。

基於右墨第二事實，中共不依附蘇聯而依附國民政府，雖有政治協商會議姿態，但爲詭道之一，不足置信。

依此兩既定事實，則赫爾利大使所稱：「除非中蘇訂立條約，蘇聯同意支持國民政府，任何事皆不足以改變中共對此問題之意見。」等語，可謂爲不切實際不合邏輯之甚者也。所謂「中蘇訂立條約，蘇聯同意支持國民政府」

者，並紙上價值猶且無之，蓋蘇聯以「世界革命」爲國策，揆諸鄰厚君薄之義，中華民國之強大，乃其尅星之一。在利害上，孰肯捨旅伴之中共而支持尅星的國民政府？天下決無是事。苟其有之，乃某一短暫時間內，別有作用別有居心，借「支持國民政府」爲詭辭，以騙取雅爾達祕密協定之簽訂，取得進一步便利中共奪取政權之條約憑藉。因是之故，中蘇訂立條約，只有助中共之猖獗，並非如赫爾利所稱：「倘無蘇聯支持，則中共終將以政黨身份參加國民政府」者，因假定事實爲否定，故其結論亦必爲否定。赫爾利大使既昧於中共蘇俄爲不可分之一體，侈作檢討蘇聯與中共之關係，不亦將使中美兩國共蒙其害者歟！

針對蘇聯中共協以謀我，離間中美，孤立國民政府以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作爲紅色版圖之詭計，祇有一個途徑。以中美二國互相依存爲基礎，使中共內部恍于中華民國與美國之強大互相游離，傾向中華民國。同時以中華民國之強大以制衡蘇俄孤立蘇俄，使蘇俄與中共無從啣接得上，以贏得和平，是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之最低要求。然非美國朝野先機識破蘇俄在對德作戰期中永不鬆弛英美之地下作戰實況，無由生中美同盟五十年之興趣。特惜羅斯福總統以次祇知對德日作戰，而對蘇俄之戒心，可謂爲絕無。此所以中美同盟五十年在當時爲曲高和寡，人謀不臧乎？氣數使然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第七章 從德國無條件投降說起

第一節 邱吉爾復爲保證擊潰日本

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一函既發出之十日，而納粹德軍五月八日以無條件投降聞，元兇希特勒等自殺之消息，同時傳出，西歐各國聞此捷訊欣喜欲狂。余爲首倡「會師東京」於珍珠港事變之後數月者，且爲不僅須贏得戰爭且須贏得和平計，大聲疾呼：會師東京必須先於會師柏林。故是函乃有：「下走以爲最善莫若先行會師東京，次及柏林，最低限度亦須做到歐亞兩戰場，同時並重。三年之前，僕曾撰「會師東京」之語。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又撰：「開闢第七戰場」一文，強調盟軍應即發動對日作戰，與盟軍登陸歐洲同時並進，而以全力向滿蒙進擊。良以吾人必須贏得和平，務必封敵四面合圍，包圍作戰，捨此則戰後或戰事行將結束之時，將發生不可思議之後果。」等語，當時似屬故作危言，以聳人視聽，若將日本投降，俄軍參戰，我中華民國國軍被俄軍所困阻而不克利用大連與旅順港口登陸滿洲，接收東北，及爾後國軍在長春、四平街、瀋陽之悲劇，互相印證，則本人函中所稱「不可思議之後果」者何在？今日已不復需候之再事喋喋矣。

本人因有此「不可思議之後果」橫梗於胸，故對德軍之無條件投降，未嘗稍有喜色，當時德軍崩潰實況，因不在其位，莫得而詳，事後讀邱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略悉其梗概，但仍無補於當時私衷之激越。此後應如何縮短對日本作戰時間一點，尤覺迫不容緩，是時亦且舉世同此心理，竊以爲會師東京，少一英國不如多一英國爲有利，多一俄國不如多一英國爲有利。會德軍於宣佈投降之前一星期，德軍西歐總司令倫斯德特上將於五月一日

在巴伐利亞被俘後，語前線記者曰：「德國之所以進攻蘇聯而不進攻英國，因深知對於海軍強國作戰之危險。德國即因英國具有強大之海軍力量，故從未敢作進攻英倫之企圖。……」乃更證實本人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四日天文臺報所刊布：「論不大列顛之戰之政略戰略戰術」一文，斷言德軍以海軍居于劣勢，從無渡海攻英之作戰計劃，爲信而有徵者也。其經過如左：

先是一九四〇年五月，英軍從鄧肯克退却回英，作堅守英倫三島之計。希特勒日以萬計的飛機狂炸英倫，三島震動。戰時首相邱吉爾氏於是年九月十一日在下議院宣稱：「自今之後一星期，即爲大英帝國有史以來最嚴重之一週。……」爲英國歷史上最有名之偉大演說，可以鑄軍魂延國脈。時余方病正劇，因口述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政略戰略戰術一文，由吾弟洪平書之，先刊登於香港天文臺半週評論。漏夜譯成英文，附以一長函，航寄英倫，逕呈邱吉爾首相。函中鑄辭，較論文尤爲堅決，不作任何保留，惜該函底稿於日本進攻香港時夾在其他文件中焚燬。時邱相日理萬幾，每日在公，逾一十八小時，而能好整以暇，省覽拙作，且加以適當處理，是真非常人也。是函及拙文內容與邱相九月十一日在下議院所宣佈之觀點，完全相反，謂爲捋虎鬚也可。而首相竟能休休有容，能受盡言，或謂對英國繼續作戰有特大之鼓勵。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英首相私人特別秘書柯維來（一九五三年三月俄國總理史達林逝世于莫斯科。柯維來代表英國首相邱吉爾氏前往俄國駐英大使館弔喪，即其人也。）覆函稱：

「首相囑鄙人致書將軍，申謝九月二十日惠寄之大札及內附之九月十四日天文臺評論報之社論一文，竊惟首相對高見不便有所置評，惟首相對將軍惠書雅意，實深感謝也。」

德軍西歐總司令倫斯德特上將既證實余之五年前的判斷爲十分正確。而聯軍參謀首長馬歇爾元帥於是年六月報

告書第一款——德國之弱點……德國最高統帥部作戰參謀長約特爾上將稱：「德軍所以進行法蘭西之戰，因估計法國失敗之後，英國將不再繼續作戰，但法國失敗，意外的迅速，而英國竟意外的繼續作戰。」等語。足證是文與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意外的繼續作戰，不無輕重足輕重添流之助。

余因有此一段意外貢獻之故，深維迅速擊潰日本，不可無英國參加，乃於六月十四日致書邱吉爾首相繼續與我中華民國國軍及美軍會師東京，其函曰：

當大軍自鄧荷克倉皇撤退（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日）納粹德國閃電達最高潮之際。全世界兵略家、政略家、觀察家，共有若干人，曾作肯定判斷：「德國參謀本部自始無渡海攻英之作戰案與準備」一如德軍西歐總司令倫斯德特氏於今日兵敗被俘後所證實者？余未之知，但余固不得不失爲不自諉爲肯定判斷諸人中之一人。或爲

首相所未忽然或忘者歟！今於德軍無條件投降之日，願以此文作者之資格，謹致書

大不列顛帝國首相邱吉爾先生閣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春間，奉讀

教答。欣悉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敝報論「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攻略戰略戰術一文」曾作最肯定之判斷：「德國海軍爲劣勢，自始無渡海攻英倫之戰案。」時人或未之與信，惟

首相於軍書旁午，日理萬幾之際，省覽及之。重承

獎飾逾恆，不期慚感交併！竊愧無以爲報，會賦詩一首，以誌不忘，願筆墨拙劣，不足以稍揚

盛德。復聘請張書旂教授繪「雲霄一羽圖」一幅，引用唐代名詩人杜甫詠漢丞相諸葛亮「萬古雲霄一羽毛」詩句，以名其圖。名詩人楊雲史先生（已故吳佩孚上將之秘書長）更作長句以張之，爲民主勝利之左卷。圖詠既成，

於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月間，交由香港郵局逕寄倫敦，方候

德晉，而日寇突於十二月八日奇襲太平洋。孝威僑居香港，適當其衝。三萬國書盡燬兵火。間關返國，一身之外無憂物。翌年（一九四二）四月一日抵桂林，倡論會師東京，以張方挫之士氣。邇後瘴居養病，音候久曠，輒念此圖此事，不能釋然於懷者，三年有餘。今者行抵重慶，會同盟軍柏林會師，希墨伏法，捷音所播，八表同歡，痛定思痛，不自意四年前敝報「論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戰略戰略戰術一文」，證以德軍西歐總司令倫斯德特於五月一日巴伐利亞被俘後，語前線記者曰：「德國之所以進攻蘇聯，而不進攻英國，因深知對於海軍強國作戰之危險。德國即因英國具有強大之海軍力量，故從未敢作進攻英國之企圖。」事隔五年，若合符節。凡茲所舉，如謂非中國人民對世界大戰貢獻之一，殊非公允之論。雖然，非首相虛懷若谷，獨具隻眼，劍及屣及，心同此理，安能一如所預期而實現？蔚為民主勝利之佳話。重讀來書。且慰且賀！若夫遠東方面，頑寇猶張，國土未復，匹夫有責。美軍既舉而東，我蔣主席鄭重保證：「凡屬中國所可貢獻的，中國必能盡其所能，貢獻一切。」而首相復重申「以全部物力人力，擊潰日本。」古語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四強共赴一的者歟！時不我與，稍縱即逝。所望早踐金諾，爭取時間，移師而東，會於扶桑，以完成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之使命。是則孝威九頓首以購者也。筆天在望，心與神馳。順請

崇安。並祝

大捷

天文臺週報社長陳孝威謹上

第二篇 第七章 第一節 邱吉爾復為保證擊潰日本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右函發後，于八月二日收到重慶英國大使館來函如左：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余奉全權大使命，謹率書孝威先生閣下：先生前致邱吉爾先生六月十四日函，已經收悉。邱吉爾先生對閣下之懇切來函，深爲感動。並向閣下保證迅速擊潰日本必如所願也。祇頌撰綏 英國大使館秘書艾爾益（譯音）」按邱吉爾首相於七月十七日出席波茨坦會議，波茨坦會議的正式名稱爲柏林會議，於七月十七日開始，八日二日閉幕。七月二十五日，邱吉爾首相返英倫。二十六日，英國國會改選結果揭曉。艾德禮所領導的工黨竟獲大勝。而領導英國戰敗德國的邱吉爾首相，反爲選民所擯棄。因此邱吉爾立即下野，終止他五年多的首相生活。是函判行當在邱相出席波茨坦會之前，到達余手時，邱相已下野矣。

據馬歇爾元帥轉述德國最高統帥部作戰參謀長約特爾上將之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英國的意外繼續作戰，實佔最主要的成份。當德國日以萬數飛機狂炸倫敦之際，拙作論大不列顛之戰略戰略戰術一文，適獲及時上陳於邱吉爾首相之前，猥蒙欣賞有加，是否有助於英國繼續作戰？一如本人於熟悉德軍投降後所函詢：「當大軍自鄧布克倉皇撤退（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日）納粹德國閃電戰達最高潮之際，全世界兵略家、政略家、觀察家，共有若干人曾作肯定判斷：德國參謀本部自始無渡海攻英之作戰案與準備一如德軍西歐總司令倫斯德特於今日兵敗被俘後所證實者？余未之知。但余固不失爲不自諛爲肯定判斷諸人中之一人。此或爲首相所未想然或忘者歟！今於德軍無條件投降之日，願以此文作者之資格，謹致書於大不列顛帝國首相邱吉爾先生閣下」者，邱吉爾首相對此自必瞭然于胸。讀邱相之復函，有「深爲感動」語，可信是篇論文已獲得歷史的評價矣。茲錄之於左：

第二節 論大不列顛之戰應使用之政略戰略戰術

本月十一日（編者按：指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廣播演講，以相當肯定之言辭，聲言希特勒即將進攻英倫，並進以警告全國國民，自今之後一星期，即為大英帝國有史以來最嚴重之一週，吾人相信邱吉爾首相之言，當係根據德軍軍事行動之情報而發，決非普通警惕國民之辭。自邱氏發表演講以後，德國準備攻擊英倫之軍事，報不絕書，甚重要者，有德國空軍之加緊空襲英倫；有北海德艦在砲空火力掩護之下向南移；有戈林與伯魯徹之聚集於法國北部某地商討攻英軍事；有一部法艦之北駛。凡此消息，若再證以一般中立軍事觀察家所謂：「德國鑑於惡劣天候之轉瞬來臨，即將展開對英攻勢」，吾人似未可謂德軍無立即發動「不列顛之戰」之可能。

從英美德蘇關係中看英政略形勢已逐漸有利

至於德軍是否必定於惡天候來臨之前，發動「不列顛之戰」？使英國無法長久生聚，以抗德國？吾人不能加以確定之判斷。但吾人根據雙方情勢，可以斷然者，「不列顛之戰」延宕至於今日，英國之有利條件，顯有隨時間之演進而逐漸增加。英國今日在戰略上，雖仍不能轉移攻勢，以戰德國，但於戰術上，採取防禦，則可以居於不敗之地位，倘希特勒平日之精神均衡不因感情作用而消失，則彼心目中之「不列顛之戰」，謂為未必有立即發動之可能，亦未始不可。記者不敏，請述其詳。

以政略戰略上之形勢言，英國今日最惡劣之條件，無過於大陸上無一同盟國家之一着。回憶三百年來，英國所從事之大陸爭霸戰，並不以今次之「大不列顛之戰」為首次，今日之前，如十七世紀末葉之戰路易十四；十九世紀

初葉之戰拿破崙；二十世紀初期之戰威爾第二，皆爲諸國逼而從事大陸爭霸戰者。但在過去數戰役中，無論對路易十四、對拿破崙、對威爾第二，英國在大陸上皆有強固之同盟者，與其並肩作戰，以至戰爭結束之日。是以每經戰役一次，而英國在大陸上之霸權亦隨之加強一度，縱無如此次之抗希特勒，而流於單獨作戰者。此爲英國今日致略戰略上之最大弱點，本報前已言之屢矣。英國之致戰兩略形勢，雖有上述之不利，但因最近三個月來英國外交形勢之好轉，亦逐漸減少其不利之程度，其中最爲重要者，即英美兩國之緊密合作。英美兩國爲同文同種之國家，平日政治協調，經濟互相提携，國交原極敦睦，且自本月二日簽定海軍新協定以後，美國之人力、財力、戰力，事實上皆可供英國之用。此較德國有同盟之名，而未能收同盟之利者，殊有上下床之別。至於歐洲大陸，今日已幾爲德勢力所席捲，今後唯一可以牽制德國者，厥爲蘇聯一國，而英國苟圖借助大陸國家之力以抗德國者，亦厥爲蘇聯一國。

目前英國外交雖不足以語此，唯因蘇德兩國之妥協性，因巴爾幹之一弛一張，已日見薄弱，在無形中，亦已挫制德國一百萬兵力於東部國境，今後蘇德關係，若逐漸由疏而離，或英蘇關係由疏而親，其牽制德國之力量更不只此數。回憶一八〇七年，拿破崙與俄皇亞歷山大泛舟於尼門河，拿破崙告俄皇曰：「倘法俄兩國同心合作，則直起烏拉山，西迄於庇里尼斯山皆歸爾我共有矣。」自是乃相約平分歐洲權益。當時英國所受之威脅，亦不減於今日，後賴於英國之奮力爭取對俄外交，終使俄法關係變於一旦。是後拿破崙於無可奈何中，揮兵深入莫斯科，而有一八一二年之大敗，葬霸圖於維杜拉河水之中，此種形勢固未可譬諸今日之英蘇德關係，但有蘇聯之巍然雄據東歐，德國決未能傾其全力于「不列顛之戰」，則當爲舉世人所共承。德國在大陸之受制於蘇聯者已若此，而英國在海洋上所

獲美國之源源援助又若彼，是則英國在政略形勢并未絕對惡化，固昭昭明甚。進言之，此種政略戰略形勢，雖不能使英國之對德軍事採取攻勢，但使英國以守勢自居，在現階段中僅以保衛英倫爲目的，則政戰兩略形勢之運用，固不次於德國採取攻勢中之政略戰略形勢也。

弱勢海軍國決難在優勢海軍國作敵前登陸

他若由戰術形勢而言，德國若發動其渡海攻英之軍事，其優利之勢，絕對在英而不在德。蓋一部戰術，最難之動作，無過於敵前登陸，在海軍絕對優勢之條件下，欲求登陸成功，已非易事，上次歐洲大戰，英法海軍曾以雷霆之勢，數次達達尼爾海峽，終不免於數戰而數挫，是皆雖於強烈火力下，一度登陸，旋因土軍之猛烈反攻，復不能不逃歸艦上，損失無算。凡此一段戰史，已可作爲殷鑒。在絕對優勢之海軍力下，尙且如此，至於雙方同等海軍力之國家，欲求登陸之成功，其困難更在上述之上。若夫一方爲劣勢海軍力之國家，以求於擁有絕對優勢之海軍力國家之領土上，作敵前登陸之企圖，而成功之，此爲中外歷史所未見，今若有一國，能破歷史之先例，創立其奇蹟，則一部戰術殊須作重新之訂正矣。此爲吾人述德國之攻勢戰術前，不能不有之認識也。

以今日德軍渡海攻英之軍事言，其困難之要點有二，一爲如何登陸，一爲如何保持後方聯絡線，在大軍作戰上，後者毋寧較前者益爲重要。欲克服此困難，德軍應首先具備者，爲優勢之海軍，但今日德國之海軍力原不及英方四分之一，試問德國將何所持而發動此軍事？發動之後，復何所持而能達到目的？今有聳人聽聞者，曰：「德國空軍已能控制海峽天空，而空軍之威力，亦能代替海軍之任務，掩護大軍前進。」德國空軍是否已獲得海峽制空權，吾人於英德空戰之電訊報導中，可以獲得其答案，不必討論，至於空軍足以代替海軍任務之說，殊無確鑿之證據。

據一般海戰論家言：時至今日，因空軍威力之突飛猛進，海面不能制空，空亦不能制海，此中之關鍵，繫於空軍轟炸戰艦之缺乏命中率與空襲之持續性。空襲之缺乏持續性，人皆可想像而得，暫且不論；至於空軍轟炸之命中率，按現有飛機在一萬尺以上轟炸航行中之戰艦而言，最爲準確者不能超過一千分之五之紀錄，若求於一萬尺以下，低飛轟炸，則有爲艦上之火網擊中之虞。其命中率之低微已若此，倘謂德軍可於空軍掩護之下，衝破英倫海峽之英方海上防禦陣線，進襲英國，殊非如通常之易易者。

若以細部動作而論德軍行動處處皆暴露弱點

吾人倘不否認上述之戰術原則，則今日德國攻英之難，如敵前登陸，如確保後方聯絡線，皆可推想而得。以敵前登陸言，首先應研究者，德軍以何等船隻載運？速率最捷者，以爲平底艦艇，然此類艦艇不特不能防禦敵方砲火之轟擊，且一遇狂濤濃霧，卽失其控制之性能，其次，應研究者，爲：德國即使能逃過英艦之監視線，而登陸前後之有利時間，屬於德方抑英方，按一般登陸情形，運輸艦靠近海岸時，登陸部隊須換乘小艇登岸，由運輸艦而小艇，由小艇而登岸，即使不遇抵抗，亦須二十分鐘。登陸之後，又須立即建築簡單之防禦工事，並設置起重機以搬運重兵器，無論如何敏捷，亦需兩小時，至於部隊之展開時間，猶未計算在內。此二時又二十分之時間，在德國爲武力失效之時間，縱使因新兵之發明，可以克服武力失效，但亦不能完全克服之。至於英方則反乎是，縱使對於德方行動事先一無發覺，僅於德軍準備登陸之時，由海岸監視哨之發見，亦能於二時又二十分之內，由控置於登陸點最近之部隊，出動阻抗，更不難乘其部隊猶未展開，立腳點猶未鞏固之際，利其優秀之海軍之協同，一舉而殲滅之。以上所述，不過就敵前登陸一點舉其兩事，以見德軍發動攻勢之困難，他若保持海上運輸之安全，以德國海軍力

之薄弱，更不可想像。海上聯絡線不能保持，則敵前登陸縱獲成功，亦無異驅士卒而就絕境耳。

苟強行之其結果將演成海上滑鐵盧滅戰觀

爲德國謀者，未始無其心目中克服此種困難之方案。第一、德國可以利用降落部隊；第二、可以選擇防禦力最弱之愛爾蘭而襲擊之。降落部隊，已如吾人過去所論，僅有協助陸上部隊進攻之性能，決無決定之力量。陸上部隊進攻若得手，降落部隊固可便利其推進，確保其戰果，反乎是，則唯有歸於殲滅。此於蘇芬戰爭中已可概見，今因英國防範之周到，信其更難倖致。至於襲擊愛爾蘭，其登陸之難容不若英倫沿岸之甚，但挪愛間之海上交通線之確保，其困難更千百倍於英倫海峽。他若動員國內所能使用之兵力，利用海岸之廣正面，同時作多數點之登陸，或爲主登陸，或爲助登陸，或爲佯登陸，以亂守方之耳目，以分其兵力，容或可使登陸易於成功。然成功之後，其不能保持後方聯絡線則與前者同。

總而言之，德軍不發動攻英軍事則已，若發動，非有強大之海軍力不爲功。使戰術上空軍可以壓制海軍，空軍可以代替海軍之任務，以上判斷自不能謂爲正確，但在過去之戰術理論猶未推翻以前，吾人謂德軍渡海攻英之難亦同於英寇之渡海攻德，亦不爲過。德國若強行之，勢將演成海上之滑鐵盧。當年拿破崙之敗於滑鐵盧也，史家列其重要原因有三：一爲天候惡劣；二爲交通困難；三爲聯絡屢斷。今德軍若發動「不列顛之戰」此種困難一一俱備，法國敗降以來，世人固以拿破崙第二稱許希特勒，豈希特勒亦必經滑鐵盧之役而後快耶？吾且覘之！

第三節 邱吉爾重視戰術區艾森豪却不重視柏林

當英美聯軍擊敗德軍於阿特勒之後，其次一進攻目標則爲德軍之西格佛利德防線，該防線北起萊茵河與瑪斯河之交流處，南迄薩爾盆地，其建築工事之堅強，無異天塹。英美聯軍原擬分路進兵，一自萊茵河下流之杜斯堡，沿魯爾工業區，直入德國北部平原，至佔領布萊門、漢堡以達波羅的海。另一路則自加塞爾、加魯斯路，最後之東向或北進，則視當時情形而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英美聯軍分三線進攻，行動前對西格佛利德防線，予以猛烈轟炸，該防線已失其防衛作用。聯軍北線由英美加軍隊擔任，由蒙哥馬利將軍率領，企圖越過瑪斯河以攻西格佛利德防線北端。中線由美之十二軍團擔任，布萊德雷將軍率領，以攻西格佛利德防線之中部。南線則由美、法軍隊擔任，德維爾斯將軍率領，攻薩爾盆地。中線美軍擊破西格佛利德防線後，於三月六日渡基路河，及埃爾夫特河。翌日下午進佔萊茵河西岸之勒馬根。察看魯登道夫大橋，雖經德軍於敗退時毀壞，但可用作搶渡之需，報經統帥艾森豪核准，遂冒險過大橋而至萊茵河東岸，建立橋頭堡。迨德軍重來炸毀該大橋時，美軍已有四師渡越矣。至三月二十二日夜十時，美第三軍第五師亦在梅茵茲南十五里乘黑暗而偷渡萊茵河。北線先於二月二十三日發動渡越萊茵河攻勢，二十四日邱吉爾首相親至前線，目視蒙哥馬利將軍以十個不同地點正欲渡過萊茵河，遭德軍猛力抵抗，德軍終至不支敗退，美英聯軍乃在章塞爾附近，新築大橋以通萊茵河兩岸，橋上鋪軌以通火車，僅十一日而告完成通車。

聯軍既越萊茵河，乃對魯爾工業區，採取包圍形勢。三月二十八日艾森豪電致史達林，告以魯爾工業區形成孤立，其前進路線，擬沿埃爾福特、萊勃齊城、恩勒斯頓東行，而其側面，將由勒根斯堡直趨林茲，且願與蘇俄軍隊在此路線上攜手。

邱吉爾首相對於艾森豪之直接致電，頗滋不滿，邱氏認為「西歐聯軍總司令不應向盟國政府首長直接行文」，此其一。「艾森豪將聯軍主力放於中部平原，無異放棄北路之加緊進攻，更不啻放棄其以柏林為最後進攻目標」，此其二。「在雅爾達會議中，英、美、俄三國，對於何國佔領柏林、維也納，及捷克之布拉格，顯無硬性決定，何國軍隊攻入柏林，即可予以佔領」此其三。

艾森豪對於上開指摘，曾提出答辯：「史達林雖係蘇俄政府首長，但亦為該國軍事之統帥」。「柏林固為德國首都，但已成為破碎廢墟，無軍事價值，且德國本身亦已有遷都於萊勃齊墟之準備」。「集中於中部平原，而與俄軍會師，冀德軍之提早崩潰，而柏林、路北克自然包括於佔領之列」。艾森豪此項辯釋，邱吉爾仍認為理由不甚充份。邱氏謂：「羅斯福亦係美國軍事統帥，何以艾森豪不得直接致電於羅斯福，而必須電達參謀首長馬歇爾，然後轉呈」。「至於柏林之軍事價值，無可置疑，攻陷柏林，對德軍之士氣與人民鬥志，影響至大，希特勒雖曾一度考慮遷都於南部，但終決定堅守柏林」。

當魯爾工業區因轟炸而破損不堪，又以四面交通截斷，德軍不於美軍進攻前撤退，乃堅守不移，致為美軍包圍，德軍卅二萬五千人投降，時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也。同時，布萊德雷所統率之第十二軍團，浩傑斯、柏登、辛普森等軍隊約四十八師，為美國最龐大隊伍，先行佔領萊勃齊墟，從此東向進攻，迄未遇德軍頑強抵抗，亦於四月中旬進佔至易北河西岸。而蒙哥馬利所率領之第廿一軍團循北行，德維爾斯率領之第六軍團循南行，與布萊德雷第十二軍團，互相協助，三線幾同平行前進。而美國第九軍團於早四月十二日自麥格德堡附近，渡越易北河，僅距柏林六十里耳。美國之第三軍於四月十九日進抵捷克邊境。

基於上述軍事進度，如果美國有意佔領柏林與布拉格，則可不費若何力量，儘可由其佔領！乃艾森豪認爲柏林無若何軍事價值，且過於重視未來佔領地區之劃分。艾森豪認蘇俄在德國之未來佔領區，已經劃定在西柏林之西陸二百里地方，美國軍隊不必進攻至俄軍之佔領地區。艾森豪且曾作下述之主張：

「一旦美英聯軍與蘇俄軍隊會師之後，任何一方，可以根據未來佔領區之劃分，要求對方後撤。」

邱吉爾首相則以爲不然，認爲目前之進展，應視爲「戰術區」，迨德國投降後，則始視作「佔領區」。戰術區與佔領區是不能混合而論。斯何以故？

一、奧地利之佔領區，尙未經英、美、俄三國作最後之劃定，蘇俄軍隊其所已經佔領奧地利之地區，顯然遠過於蘇俄軍隊所可佔領者爲大。

二、從雅爾達會議決定之後，蘇俄不獨未履行其義務，更迭次違反雅爾達會議之精神與文字，則英、美方面，殊毋庸嚴格恪守，而片面負擔其義務。

三、英美聯軍所進展之戰術區，其能得之廣袤區域，將可用作與蘇俄磋商之交換條件。譬如蘇俄之未來佔領區，應協助英、美佔領區之糧食需要，即其例也。

前述艾森豪所提出未來佔領區劃定後，要求對方後撤一點，未能遂得英、美參謀長混合委員會所採納。該委員會所決定者爲：

「英美聯軍與蘇俄軍隊會師以後，應各自守住陣線，即形成對峙狀態，則亦無妨。」

此外，艾森豪預感於將來——在德國巴維利亞南部、奧地利西部，及意大利北部之山嶺地帶，深恐發生曠日持

久之游擊戰，爲先事防範計，故無意於佔領布拉格（捷克）。艾森豪下令美國第三軍，沿著一九三七年之捷克邊境南下，以肅清德國南部。

四月十三日蘇俄軍隊攻克維也納。至十六日俄軍結集二百五十萬人，發動向柏林總攻，戰線長達二百里，奮力攻擊，卒於廿五日柏林已趨於俄軍包圍之中。同日美軍在柏林迤南七十五里之托高，與俄軍會合，緣此形勢，德國遂被腰切爲南北兩部，德軍頓失聯絡呼應，而各自應戰，以圖堅守。

先是，德軍參謀部早料有此著，爲避至聯軍包圍，擬放棄柏林，遷都南部，全師後撤，以爭取戰略上主動，并立新堅強防線，企圖死守。但此項建議，終爲希特拉所否決，乃釀成今日德國之土崩瓦解局面。致德軍隨地隨時遭遇聯軍攻擊，致各自應付之不暇，於是受聯軍夾攻及空中轟炸，潰不成軍。是時也，德國土地已半數以上被聯軍佔領。即新召之丁壯亦無法建訓成軍矣。

希特拉決定與柏林共存亡，其左右，如希姆萊則在路北京，戈林則遷走南部，並要求繼承希特拉之職位，而翻受希特拉之黜免。希姆萊請託瑞典紅十字會會長柏納多德公爵，邀其代達英美當局，表示求和意見。旋由瑞典外長波希曼，轉告美駐瑞典公使約翰生，及英駐瑞公使瑪勒。惟因希姆萊強調「只投降於英、美，但不投降於蘇俄。」故英、美加以拒絕，和談不成。而希姆萊終爲英軍俘獲，乘機服毒自殺以殉。

德國政府各首腦，鑒于覆亡無日，乃分別走向丹麥邊境佛倫斯堡，或遷入亞爾卑斯山之內堡，冀圖集中原有之挺進隊、保安隊、青年團、黨衛人員、政工人員、暨特務人員，擬即於內堡，堵著峽口，作長期堅守，以爲游擊戰之計劃。奈以英美聯軍，進展神速，與柏盧勃登炸爲平地，無法實現。

四月廿九日自知無望，柏林必將陷落，乃寫定遺囑，指定德利滋海軍大將繼承其職位。復因獲墨索利尼被抗德游擊隊於火車中截獲，即行槍決之消息，使希特拉更爲激動，與柏林共存亡之志，遂決。希特拉與戈培爾、波爾曼等同午餐，握手散席，即入私室，與其結婚才數日之艾娃布勞恩相談，至三時半，希特拉即發槍自殺，彈從口入，艾娃亦服毒自盡，屍骸即於天井焚燬。一代英雄，遂爾結束其生命，足爲窮兵黷武者作炯戒焉。波爾曼以希特拉遺囑，傳達德利滋後，逃逸無踪。戈培爾則先毒死子女六人，然後令其衛隊槍殺其妻及其本人。而德利滋將軍，深以繼承希特拉認爲出於意料之外，然斯時德軍亦已分別陸續向聯軍投降矣。

五月二日俄軍佔領柏林。同日，在意大利戰線上之德軍一百萬人，由維丁霍夫率領向亞歷山大投降。五月四日在德國北部、荷蘭、丹麥等地約一百萬人，由佛利德堡爲代表，在路恩堡，向蘇聯馬利投降。

德利滋第一項任務係如何簽訂整個德國之停戰協定，派約德魯、佛利德堡向聯軍統帥部接洽投降事宜。艾森豪派參謀長史密斯與之洽商，德國無條件投降文件，於五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由德國代表約德爾、聯軍代表史密斯簽定，以法國及蘇俄代表作證。德國與聯軍於五月八日午夜停戰。五月九日凱特爾代表德國，特德爾代表英、美，朱可夫代表蘇俄，復舉行投降文件之簽字儀式，以完成德國最高指揮部批准該項文件之手續。五月廿三日英國軍隊解散德利滋領導之德國政府。自此無復有其中央機構存在矣。

前項記述，取材於英前首相邱吉爾爵士之回憶錄，其間對聯軍統帥艾森豪無意佔領柏林、維也納、布格拉有詳情之敘述，由此知首相之政治觀點，確非近代世界任何人所能企及。

第四節 對德結束軍事贏得戰爭失去和平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之結果，其勝利果實，殆為蘇聯所獨佔，墨柏林一大部與東德、東歐國家及巴爾幹半島，悉為蘇俄所囊括而去，成為附庸國。而美、英、法聯軍所得者為何，自問亦當啞然失笑矣。美國因無殖民地之故，故亦不受任何威脅。而英法二國不僅一無所得，且因蘇俄進一步以及殖民地主義相侵略，使英法二國於戰後失去許多市場與資源地帶，歐洲均勢與世界均勢悉為打破。亞洲遠東不免受其波及，而中國大陸因有共產黨武裝之故為尤甚。推原其故，羅斯福總統不及目覩會師柏林而於四月十二日先柏林之捷而逝世。邱吉爾首相不及躬與會師東京而於七月二十六日英國大選落選下野。之二人者，皆應運而生之人傑，一則逝世，一則退休，極盛之後難為繼。杜魯門總統與艾德禮首相，繼羅斯福、邱吉爾之後，分掌美英二國之政，各以生手，與陰鷲深沉之史達林相周旋，難免為其所乘。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之盛氣凌人，可以想見杜魯門非其敵手。而中國大陸之因杜魯門受太平洋關係學會份子之包圍，誤友為敵，以敵視友，是為中美兩國互陷孤立之主因。中美二國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其在此乎！

當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諾曼第未登陸之前，邱吉爾首相數向羅斯福總統建議，聯軍登陸，舍英法海峽而取道巴爾幹半島，以期與蘇俄平頭共進直搗柏林，計出萬全，莫逾于此。惜羅斯福未之採用，遂使東德、東歐、巴爾幹半島許多國家陷於奴役，羅斯福總統實尸之也。不僅此也，德國火箭基地，座落東德境內，距成功發射已不在遠。時為英國偵知位置，針對該火箭基地予以轟炸摧燬殆盡。德國元首希特勒下令停止進行，功虧一

實。這蘇俄大軍，深入德境，搜索無所不至，遂將該火箭專家及工廠設備圖書儀器與將成未成之製成品，掃數運往裏海，頗成爲蘇俄獨佔之俘獲品。倘使美英法聯軍改變計劃，取道巴爾幹登陸，不僅東西方可以平分東歐與巴爾幹春色，抑亦德國火箭專家不至爲蘇俄所獨佔矣。

祇有德國火箭專家爲蘇俄所獨佔，而未有史達林的演技，而德國火箭專家未必肯爲蘇俄賣死力。今因史達林以承受希特勒遺產自計，不以俘虜視德國火箭專家，階下囚陞爲座上客。史達林且留居裏海數月，紆尊降貴，與德國火箭專家，同飲食，共臥起，稱兄道弟，以買其歡心，歷數年如一日。是年十一月八日爲戰勝德國後之初次蘇聯國慶，史達林視紅場閱兵爲次要，仍居裏海陪伴德國火箭專家如故，莫斯科紅場閱兵，竟無史達林其人者以此。世或有傳其被刺失踪者，世界各國雲集俄京之使節與記者，有無關心其事，或報告於其政府促使注意，雖未可知。惟我國前駐莫斯科大使楊杰（耿光）上將，於被邀參加蘇聯國慶典禮返抵重慶，會面告本人以史達林結歡德國火箭專家的經過甚詳。且語余曰：十年之後，自由世界其將爲沼乎！本人因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一史達林效法彼得大帝一爲題，透露其事，惜世人爲勝利冲昏頭腦，未之注意也。今事過一十有六年，而蘇俄太空人上天，安全返回地球聞於世界。此可怕武器入於魔鬼之手，凡屬當時執政與記者，均有責任，而美國當局責任尤重，倘使美英法聯軍併頭向柏林齊進之際，美國總統、參謀總長，或聯軍統帥等中有一人熟讀蕭何入關先取秦戶口圖籍史例，不以柏林爲無軍事價值，而以科學圖書儀器爲更富有軍事價值，羅致德國第一流科學家爲進軍最大任務。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足與蘇俄在東德所已獵取之火箭專家相抗衡，美蘇外太空比賽落後，不至如今日之甚者也。

因美英法聯軍對於結束德國軍事，未能做到盡善盡美，馴致大戰結束之後不及五年而使中國失去大陸。不及一

十有六年，使美國對蘇俄之外太空比賽躍乎後矣。謂爲贏得戰爭失去和平，誰曰不然？

先是日本於民國卅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美國在太平洋海軍基地之珍珠港，因之太平洋軍事情勢，日趨危急，美國獨立擔當此一沉重任務，於是始有希望俄共參加對日作戰之擬議。美國爲本身利益著想，依據戰略形勢，當然有其必要措置，不獨可以縮短戰爭時間，且可減少美軍之傷亡數字。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於接見俄共駐美大使李維諾夫時先行示意，徵詢俄共政府意見。美國務卿赫爾並與李維諾夫商酌討論。同時蔣委員長亦向俄共政府提出建議。而美遠東陸軍統帥麥克阿瑟則有電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其電文節稱：「敵方（日本）龐大空軍與海軍之實力，移集於星洲、菲島以東地區，其本土防禦力似見薄弱。刻獲確切情報：敵所畏懼者，厥爲蘇俄參戰，其有利時機，正在目前，如果蘇俄從北面進攻日本，不但敵人將遭受嚴重打擊，即其南進行動，必被牽制而頓成鬆弛。」等情。

馬歇爾據報，召開參謀首長會議，並與美陸軍部長史汀生研討。然而俄使李維諾夫，始則以口頭表示：「蘇俄政府盼望在遠東戰爭中，維持中立地位。」繼則復以正式通知謂：

「蘇俄尙未能與美國合作以對付日本，因正在對德作戰時期，不能冒爲日本所攻擊之危險。」（見赫爾回憶錄）就當時情勢觀之，俄共以「正在對德作戰，未能東顧」，復有「翻啓日本攻擊西伯利亞之漸，致受兩面夾擊之慮。」

自是而後，美俄兩國關於對日參戰一節，雙方商討，迄未停止。並談及使用西伯利亞作爲美軍空軍基地，但以

美國供給重轟炸機五百架作爲條件，迄未成議。原因由於史達林不肯供給西伯利亞軍事資料，故懸未能決。及英首相邱吉爾訪俄，史達林表示：「蘇俄將於歐戰結束後三個月左右，開始對日作戰，其代價爲固體燃料八十六萬噸，液體燃料共廿萬六千噸。」惟此項承諾，雖經英國通知美國，而史達林窺破美國意圖，乃乘機施其詭計陰謀，冀達成其政治勒索願望。茲將蘇俄參加對日作戰事件，在德國投降前後之會談經過情形，縷述于后。

第五節 從魁北克之會經德黑蘭雅爾達以至波茨坦會議

魁北克羅邱之會與莫斯科外長會議

先是英、美二國於民國三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爲盟國對軸心國之全盤戰略，舉行會議於華盛頓。會議中所通過之盟國戰略：認爲「蘇俄對日參戰，實屬相宜。」其第二項第二節決議案：「與其他之太平洋國家合作，維持及擴大對日本不斷努力，以冀削減其軍事力量，達到能以迫使日本最後投降之地位。」

迨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會晤於魁北克，軍事計劃人員，曾重申上次華盛頓會議所通過之戰略原則，及俄日戰爭之可能性問題，提出詳晰研究，乃作如下之估計：「蘇聯與日本皆欲避免其相互之戰爭，以便致力於對付各自之敵人，蘇俄可能在某一階段，參預對日作戰，但在德國威脅未消除前，將不至如此。必待德國戰事結束，蘇俄將根據其本身利益，作其決定，惟尤須加以估計，倘能以微小代價，而可擊敗日本，蘇俄始肯參加對日本作戰」。

魁北克羅，邱之會，並未討論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之步驟問題，即羅、邱二氏致史達林函中，亦未提及要求蘇

俄參加太平洋戰爭之語。而史達林則建議：「在莫斯科舉行一次外長級會議」。預定於十月間舉行，美國羅斯福總統，派哈里曼爲駐俄大使，另派狄恩爲駐俄軍事顧問團團長，並兼會議時爲出席代表。

英、美、俄外長會議在莫斯科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開始。狄恩之報告簡稱：

「蘇俄對於日本之態度，在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以及其他私人談話中，均表示：蘇俄將於擊敗德國後，立即參加太平洋戰爭。」

赫爾國務卿於出席莫斯科外長會議中，致其總統報告中謂：

「史達林以一種毫不含糊而明確語句，告赫爾云：在盟國擊敗德國之後，蘇俄即將參加協力擊敗日本。」此項面談，並未紀錄於議定書中，而俄外長莫洛托夫亦曾以同樣語意，向哈里曼保證。故哈里曼亦有同樣報告。（見國務院檔案）嗣後，雖經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蘇俄對於參加太平洋戰爭問題，仍持其一貫游移延宕態度，故對日本表面上亦保其中立姿勢。

德黑蘭會議

在德黑蘭會議之前，哈里曼大使與狄恩團長報告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蘇俄完全有意於德國戰爭結束後，參加美、英二國對日本作戰。惟蘇俄深恐在準備未完成前，即與日本破裂。」因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擬就問題，列舉之以與蘇俄討論，其涉及日本者：

- 一、要求蘇俄供給關於日本之作戰情報，如獲同意，則經由駐莫斯科之軍事代表團，提出具體問題。
- 二、要求蘇俄表示，蘇俄可以允許何一港口以備美國使用，並供給該港口之資料，俾便美國海軍派遣其何種類

型與編制之特遣艦隊。

三、要求蘇俄表示，如果可能對北千島羣島發動攻擊時，蘇俄能提供若何之直接或間接之援助。

四、要求蘇俄表示，蘇俄能否允許美空軍使用何處基地？以供對日作戰，以及能否供應空軍設備？包括汽油與炸彈，並指明航線以通往基地。

在德黑蘭會議中，雖未要求蘇俄對日參戰，但經羅斯福於檢討盟國戰略及說明美國在太平洋之行動後，史達林即興詞而言曰：

「羅斯福總統所說之第一部份，蘇俄歡迎美國成功，可惜蘇俄迄今仍不能有所效力。因爲蘇俄需要用於西線之部隊太多，不能在此時發動任何軍事行動，所有在東方之部隊，僅堪作爲防衛而已，倘欲用作攻擊性之軍事行動，除非增強三倍於現在之兵力，方足濟事。故在德國投降之前，將無可能移西線部隊於東方。想於德國擊敗後，吾人定能藉聯合陣線而獲勝。」

經過此次會議，美國對於蘇俄對日參戰問題之觀念，修正而爲：「不以蘇俄實際參戰爲條件。」哈里曼與狄恩雖與史達林、莫洛托夫頻頻接觸，其所討論，大抵爲使用俄國之海空軍基地問題。旋又由史達林提出對日參戰關於蘇俄之任務問題，美國誠意與之洽商，而蘇俄始終游移其詞，或另生枝節，或借端稽延，卒至徒費唇舌，空勞無益。

雅爾達會議

一九四五（民卅四）年二月四日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蘇俄共史達林相會於雅爾達。關於蘇俄對日參

戰問題，業經俄方承諾於德國戰敗後履行實際參戰。其所宜討論者：

一、爲蘇俄參戰之政治問題；

二、爲蘇俄作戰活動，配合美國計劃之軍事問題。

關於第一點在二月八日羅斯福與史達林於一次談話中解決。當時在座者，美方哈里曼大使、俄方莫洛托夫外長，權充譯員。其雙方同意之條件，與史達林早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向哈里曼所說明者，大致相同；

一、保持外蒙現狀（即准許外蒙獨立）；

二、恢復俄國在中國東北所享之權利；

三、中國之旅順大連國際化；

四、歸還俄國被日本佔領之南庫頁島，及併入千島羣島。

於二月十日哈里曼與莫洛托夫擬具該項協議之最終聲明，其中並涉及覓致中國蔣委員長同意與諒解。翌日，將該項聲明，由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共同簽署，此即世所指責之雅爾達秘密協定是也。亦即美、英出賣中國，斷送中國之賣身契是也。俄共未盡義務，而先取得政治權利，中國大陸之失，起源於此，亞洲之擾亂，禍根亦植於此，而世界之板蕩，何莫非造因於此。獨怪美國當日之計劃者與決策者，僅顧及其本身利益，而罔顧他國損害，與夫影響與後果。美國決策者：以爲攻擊日本本土，若再得俄共一敲後門，出兵東北，則日本關東軍受到掣肘，不能移轉，同時有中國國軍之反攻，使散佈於中國大陸之日軍，更無法抽調，緣此觀點，便可一鼓而逼令降服，最側重者則爲減少美軍之傷亡犧牲，詎知竟因此協定，釀成至今日紛亂之局面，寧非錯誤之尤也哉！

雅爾達協定，既於二月十一日簽訂，至五月廿一日美國務院認爲政治觀點而言，宜於美國履行雅爾達協定之前，對遠東問題蘇俄政府方面關於下開事項取得承諾與闡明。

一、蘇俄政府應同意利用其對於共黨之影響力量，協助美國政府致力促成中國蔣委員長所領導之國民政府達成統一。在美國政府根據雅爾達協定與中國政府有所洽商之前，蘇俄政府應認中國達成統一爲最適宜，而新疆問題，應由中俄兩國自行解決。

二、開羅宣言，關於中國恢復東北主權問題，及韓國將來地位規定，蘇俄政府應確切遵守。

三、蘇俄確實同意，韓國一經解放，應即由美、英、中、俄四國託管，四託管國應爲選擇韓國政府之單一當局。

四、在蘇俄取得千島羣島之前，美國應向蘇俄取得該地區民航機迫切降落權。

美國陸軍部對於其國務院所提出前項之問題，提供其意見：

「蘇俄之對日參戰，將依據其本身之軍事、政治考慮，而始作決定，對美國之政治行動，將甚不重視。蘇俄雖將尋求及接受美國之政治敦促，作爲其對日參戰之條件，事實上，決不影響蘇俄對日參戰之實行時間。以其參戰自能影響軍事，其將縮短戰爭從而保全美國人生命，殆無疑義。」

「蘇俄將等待美國已盡最大努力，業已摧毀日軍力量時，蘇俄於此時方肯出而參加對日戰爭，以奪取其所欲得之目的物，因其代價少而獲得多故也。」

「美國無多大軍事性法寶，可以節制蘇俄。倘得重行考慮雅爾達協定，將有助於諒解及協調，美國鑒于佔領德國與蘇俄相處之經驗，還不如以美國自己軍隊，實行單獨佔領爲上策。」

「若果中國內部繼續紛歧，同時蘇俄軍隊進展至與中共軍隊密切接觸地區，除非於事前達成滿意諒解，否則，美國對中國問題必將愈趨複雜。美國雖然與蘇俄諒解，中國政府與其中國共產黨間之諒解，更屬重要。」

綜上各節，乃美國與蘇俄因對日參戰事件之談判紀錄及經過情形，凡此皆可於美國國防部檔案中，關於蘇俄對日本參戰所彙輯之報告書內，撫要敘述。係在德國未投降並羅斯福未逝世前之可徵信之史實，非敢斷章取義也。

波茨坦會議

美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四月十二日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副總統杜魯門正位總統，而歐洲戰事獲得勝利，德國於五月八日投降。惟太平洋戰事尚在酣烈進行之際，杜魯門擬踵事羅斯福，欲與史達林作戰後之問題商洽，經徵得英首相邱吉爾同意，將在波茨坦三巨頭會晤地址。美總統為準備前項會議計，乃先邀集參謀首長討論歐洲各項善後問題，並太平洋戰略。迨研討至蘇俄對日參戰問題上，金氏海軍上將即席發表意見，云：

「儘管蘇俄參戰是合宜之事，但在軍事觀點上，並非『不能或缺』，美國可無需過事催促蘇俄參戰，擊敗日本之代價雖然大，但美國確有單獨承擔太平洋戰役之力量。美國必可擊敗日本，並不需要外力援助，希望總統瞭解此一事實。」

杜魯門派遣霍浦金斯為特使前赴莫斯科，會晤史達林，俾預作三巨頭波茨坦會議之安排。五月廿八日史達林向霍浦金斯提出保證謂：

「蘇俄軍隊，將於八月八日陳兵中國東北邊境，並將發動攻擊。但此項軍事行動，必以中蘇兩國簽訂條約為條件。」

史達林所稱簽訂「中蘇條約」，意即指中國應先承認雅爾達祕密協定，蘇俄方肯對日攻擊。於是史達林又復重述其雅爾達會議之結果情形。

第六節 史達林堅持「中蘇條約」

史達林更對霍浦金斯續稱：

「蘇俄準備派遣軍隊於八月八日列陣於中國東北邊疆，雖然蘇俄人民有良好之參戰理由，惟必視乎中國蔣委員長先行同意雅爾達建議之意願，方可決定。」

史達林旋又向霍浦金斯道：

「蘇俄歡迎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前來莫斯科，蘇俄人民願意與宋子文直接談判雅爾達建議問題，希望此一外交部長能於七月一日以前會晤；同時盼望美國與蔣委員長同樣談商此項問題。」

稍後，史達林復鄭重聲明：

蘇俄已決定八月出兵，因此，應請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必於七月前來莫斯科談妥雅爾達建議問題，本人準備與宋氏隨時會晤。」

史達林繼稱：

「本人將盡其所能，促進蔣委員長領導下之中國政府統一。蔣委員長應在戰後繼續領導中國，更因無其他人選有此力量，即中國共產黨首腦中，亦無一人有統一中國能力，所以蘇俄願意支持蔣委員長，雖然對蔣委員長有若干

保留。」語至此，史達林更重複陳述雅爾達經過情形後，再申言謂：

「蘇俄希望中國穩定統一，希望中國控制東北，東北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份。蘇俄對中國並無領土要求，凡蘇俄軍隊爲與日本作戰而進入之地區，蘇俄將尊重中國主權。」最後，史達林告霍浦金斯云：

「蘇俄出兵東北之際，蘇俄軍隊歡迎蔣委員長派員與蘇俄軍同進東北，以便東北地區立即由中國成立行政當局。」

上述云云，錄於霍浦金斯之報告書，存於國務院國防部之檔案中。

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之三巨頭杜魯門、邱吉爾、史達林會晤。七月廿四日蘇俄參謀人員在會議中表示：「八月下旬蘇俄將向中國東北進攻日軍，惟此日期，要待與中華民國協商後決定。」

波茨坦宣言前，杜魯門接獲報告，知原子彈試驗已告成功，遂與邱吉爾及美陸長史汀生將目標、時間，並可能影響，經充分研討後，於七月廿五日授權美國陸軍戰略航空隊，准予拋擲日本本土，並通知史大林。（見波茨坦紀錄）

蘇俄於美國拋擲原子彈之後，日本表示投降，始行進兵東北，佔據偽滿新京之長春。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德國投降後之第四天，英首相邱吉爾提議舉行英、美、俄三國首長會議，以解決「關於結束歐洲戰事」與「贏取太平洋戰爭」之種種問題。經美總統杜魯門授權在莫斯科磋商波蘭問題之霍浦金斯，與俄首腦史達林洽商。另派戴維斯（即太平洋關係學會）往倫敦，徵求邱吉爾意見。因杜魯門擬先單獨會晤史達林後，再會邱氏，邱吉爾予以峻拒。其後史達林決定會議地址，爲柏林「波茨坦宮」，日期由杜魯門決定，而得邱吉爾

之同意者。

波茨坦會議之正式名稱爲：「柏林會議」，於七月十七日正式開始，至七月二十五日邱吉爾因英國大選返英，保守黨落選，其後二十七日參加該會議之英國代表乃改由艾德禮首相、貝文外相擔任，會議於八月二日閉幕。當邱吉爾之回英也，曾面謂杜、史二氏曰：「姑勿論英國國內政局如何演變，但此次會議，不宜匆匆結束，鑒于雅爾達會議之草草了事，致貽今日之患，自應從長計議爲是。」

第一次會議，杜魯門提出：「設立中、美、英、法、俄五國外交部長會議」之議案。惟依據雅爾達會議中，美、英、俄三國同意三國外長互相諮詢，以便利解決各項困難問題。克里米會議紀錄之議定書第十三節（而現在美國所提者，係一正式而較有永久性之外長會議，由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說明解釋中華民國應同參加之理由後，史達林對於中國參加外長會議，提出反對意見，史達林謂：

「一九四三年十月之三國莫斯科會議，已經設立『歐洲諮詢委員會』，至雅爾達會議又設立三國外長會議，則『五國外長會議』應否設立，及中國是否應當討論歐洲問題，頗有研究餘地」。杜魯門則謂：

「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自應在被邀之列。」

會議結果，「草擬和約國家，以會簽字於敵國投降條款之國家。」

其最後決議：

英、美、俄三國同意設立一外交部長會議，以從事於和約之必要準備工作。」

一、外交部長會議由中、美、英、法、俄五國之外交部長組成之。

二、外交部長會議，經常在倫敦開會，其秘書處設於倫敦，至遲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以前舉行。

三、略（係專指意、羅、保、匈、芬等國和約草擬）。

四、前設「歐洲諮詢委員會」撤銷。

初，杜魯門於蒞波茨坦時，携有「宣言」稿一件，係對日本之最後「招降書」，擬由中、英、美三國聯名發出。七月二十四日杜氏將此稿件交邱相過目，一面急電赫爾利轉呈中國蔣委員長，徵其同意，嗣得駐華大使赫爾利電復稱：

「電文到過，經翻譯完竣，於次晨由外次吳國楨陪同往謁蔣委員長於官邸，旋王世杰（已繼宋子文任外長）亦至，蔣委員長對該招降書立即發出，皆予首肯。」惟列名應為美、中、英循序排列，杜邱二氏均表同意。

邱吉爾對於日本宣言之文稿，擬按照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薩布蘭加會議所決定之「無條件投降」，公式予以溫和化。按此項「招降書」乃根據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所提出之備忘錄所寫成，邱吉爾則稱之為「最後通牒」，遂由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長名義，向世界及日本宣布，是七月二十六日也。蘇俄於參戰後，始正式加入此項文告。

在波茨坦會議中，史達林提出報告稱：

「俄國會接得日本駐俄大使轉呈之函件，函中述及：『日本將派遣一位親王率領代表團，代表日本天皇，前來莫斯科，商討日俄兩國友好關係問題，並盼能共同設法，使戰爭早日結束。』等情前來。所以蘇俄之答覆：『在獲悉日本來俄商談何事之前，無法表示應否同意。』云云」。史大林最後續稱：『蘇俄將拒絕日本代表團來俄。』」

波茨坦宣言發布後，日本駐俄大使佐藤，建議日本政府立刻下令軍隊作無條件投降。但七月八日日本鈴木首相

向記者發表談話謂：「波茨坦宣言不足重視」，美國於是對日本有用原子彈決心。使用原子彈事，美國早於七月四日商得英國同意，故美總統對於准用原子彈之命令，在波茨坦閉會後之大西洋返國途中也。

第七節 中俄條約之談判宋子文力爭主權

一九四五年（民三十四）二月十一日美、英、俄三國簽訂雅爾達祕密協定，以中國之並未參與其議也，殊無拘束中國以必須遵行該約之理。五月間舊金山聯合國大會，外交部長宋子文率代表團出席，並持有擬對俄談判之方案，係按照民十三年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民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所沿襲兩國應守之權義，作爲根據，藉謀兩國和平共存之途徑。而蘇俄方面認爲雖已簽有雅爾達祕密協定，深感不能約束中國承諾，故不惜用盡種種方法，壓迫美國，強使中國必須與俄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即等於中國承認雅爾達之既定條款。（按蘇俄壓迫美國，強使中國簽訂「中蘇條約」已從美國國防部所發表之「蘇俄對日參戰」之檔案中摘錄其經過於前篇。）

六月九日美總統杜魯門接見宋子文，杜氏面告宋氏曰：「史達林表示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並表示將協助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完成統一，史達林希望恢復俄國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前太平洋區之權益，並希望在蘇俄參加對日作戰前，能與中國就此事項，謹致協議。」云云，同時並將前項蘇俄要求電致駐華大使赫爾利，囑「必於六月十六日前與蔣委員長商談，並盡力謀取蔣委員長之同意。」宋子文於六月十四日將返重慶前，再度與杜魯門洽談，杜氏透露霍浦金斯與史達林會談內容之若干重點。宋氏答稱：

「總統能坦誠相告，表示欣慰，惟有幾點事實必須加以澄清。雅爾達協定中『蘇俄要求恢復在東北之權利』，

但此項權利早於一九〇四年喪失矣。（按指民國十三年中俄條約，俄國放棄在中國之不當得之權利。）宋氏續稱：

「根據一九四二年所簽訂之兩項條約中，蘇俄政府原已放棄其在中國之所有租界、租借地及各種特權，包括治外法權在內。」宋氏復表示：「當彼赴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時，將特別提出此數點，同時蘇俄所要求旅順港之特權一項，一併加以澄清。中國政府及人民對於任何國家，企圖在中國恢復舊有之港口租借一事，必將堅強反對，對於蘇俄所提之此項要求，萬難承認。」杜魯門見宋子文如是堅決，乃解釋說：

「吾人所以必需蘇俄對日參戰者，無非為縮短戰爭，及減少中美兩國兵員之傷亡。美國絕對無意損及遠東盟友——中國之權益。」繼又稱：

「我絕對力圖避免在遠東或歐洲佈種任何禍根，以致釀成來日之糾紛與戰爭」各等語。宋子文乃謂杜氏曰：「但願如是，美國係中國最重視之朋友。」（見杜魯門回憶錄第四章第二節）。

宋子文於六月三十日抵達莫斯科，即與史達林會晤，史氏首先堅持外蒙古獨立。宋子文答謂：

「中國絕不同意割讓任何領土，同時承認外蒙古獨立之後，將使西藏問題更趨複雜，任何中國政府，假如放棄外蒙，其政權必將動搖。」宋子文並向美駐俄大使哈里曼解釋云：

「此係一項原則問題，在中國人民之內心已經根深蒂固。雖然，中國人民亦知目前無法在外蒙行使國家政權，但中國人民絕不願意擁護其永遠放棄外蒙主權之政府。」

復據哈里曼報告於杜魯門稱：

「宋子文謂：『史達林建議，訂立一項中俄秘密協定，承認外蒙獨立，此協定俟日本戰敗後再行公佈。』宋子

文即表反對，但曾致電 蔣委員長請示，並向哈里曼探詢羅斯福生前對此問題，所作協議，究竟爲何？宋氏要求哈里曼急電華府，請美國政府確實說明對此問題之態度。」

「宋子文與史達林談商間，在海港及鐵路問題上又生波折，史達林變本加厲，較本來要求更爲擴大，對於「中東及南滿兩鐵路之所有權，應屬於蘇俄，由蘇俄直接經營，惟予中國得以共管」而已。」

「然宋子文則堅持該中東、南滿兩鐵路，主權屬於中國，但可由中、俄兩國組織公司管理，分擔責任，在經營上亦由兩國共同負責。」

「史達林表示：俄國所注意，只是幹線，對於分支線路並不關懷。」

「莫洛托夫提出在該兩鐵路經營上之燃煤管制問題。」

「史達林表示蘇俄只能在戰爭期間或遭遇到戰爭威脅時，在該兩鐵路上運送軍隊。蘇俄不得在東北駐留軍隊。」

「關於大連問題：『史達林對「國際化」一詞之解釋，係專指中、俄兩國共管，並不包括其他國家在內。』蘇俄對大連享有永遠之權益，該處港口業務，應歸蘇俄獨自經營。港口捐稅收益，由中、俄兩國平分。」

「宋子文則堅決主張大連港應保持中國主權，由中國自行管理下之自由港。但可接受蘇俄之技術協助。同時，准許蘇俄享受自由使用該港口之權。」

「對於旅順港問題：『史達林同意取締「租借」一詞，但須由兩國取得協議。中蘇兩國均可在旅順港建立海軍基地設備。』」

「史達林建議，關於上項有關鐵路與港口之協定，其有效期限為四十五年。」

「至於中國對東北主權問題：『史達林向宋子文保證，俄軍進入東北時，由中國政府派遣代表隨軍行動，俾隨進展地區而組織地方政府。請中國儘速派遣有關人選。』」

「史達林曾向宋子文探詢中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之態度」。宋氏答稱：「蔣委員長已同意共產黨派代表參加政府，但政府之控制權當然屬於現在之當局者。」

「對於韓國問題：史達林向宋子文重申其所擬議之『四強託管』制度之方案，莫洛托夫補充道：『此乃史無前例之特殊安排，因此，在各項細節上必須詳晰瞭解。』」

「史達林表示：韓國境內絕不能駐有外國軍隊，韓國亦不能擬具任何外交政策。」

「宋子文確知蘇俄正在西伯利亞訓練兩個韓國人之師團，此項由俄訓練之韓人軍隊，戰後必將返韓。同時，經過俄國訓練之政治人員，亦必將趁機回韓活動，在此種情形下，宋子文認為：縱使實行四國託管，蘇俄終將獲得韓國之統制。」

「厥后：史達林向宋子文提出四份草案：其一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另一項關係於外蒙獨立；一項關於大連、旅順；又一項則為兩綫鐵路之經營與管理。」

對於蘇俄所提之外蒙要求：中、俄雙方互不相讓，幾已僵持。宋子文請示於國民政府，當經政府電復：「蘇俄必須絕對承認中國在東北主權，並同意撤回對中共及新疆叛亂份子之物質及精神支持。然後，中國於戰爭結束後，在外蒙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外蒙之地位。」

「七月十日史達林接受中國對外蒙之主張，史達林並保證對中共及新疆叛亂份子不再支持。史達林表示：堅決擁護中國中央政府，中國所有軍隊應由中央政府統一指揮。惟對於旅、大港口及鐵路之軍事控制一節，迄未協議，因蘇俄必欲控制兩港口城市之市政，並有直接控制權，有效期爲四十年，中國方面堅予拒絕。最後史達林對鐵路管理最高機構中，蘇俄代表應佔多數。並堅持蘇俄軍事控制區應包括旅、大港口在內，宋子文僅同意旅順及大連南部地區。」

「至七月十二日宋、史會談，尙未取得協議，宋子文告知史達林將回國述職請示，倘貴國仍願談判，自可應邀重來。」於是宋子文回國報告其經過。

上述之談判經過，係摘錄於「杜魯門回憶錄」，而此回憶錄又根據於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之報告，當爲真實可信之史實。「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始有簽訂之議，固出於蘇俄覬覦破美國弱點（要求俄國對日參戰）而施加壓力，美國則轉加之於中國，中國亦有其種種不得已苦衷，而與之談判。事後，中國人士對此協定之訂定，頗加非議，而尤不諒於談判者之宋子文。其後，雖經繼任外長王世杰之簽署，觀於上項談判經過之記載，則可證明當時宋子文如何爲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而激烈辯論，力爭不屈，是皆足供國人之參證，而稍明在國際壓力下，秉政者如何之艱苦。宋子文在杜魯門總統、哈里曼大使之回憶中，既不失爲現時代傑出之外交人物。尤其宋氏對韓國之預斷，據杜魯門事後之敘述，尤極佩服其卓有遠見也。

第八節 蔣經國因外蒙主權舌戰史達林

當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氏往莫斯科與史達林會談時，蔣經國亦爲團員之一，相隨前往。據蔣經國對該次會談，於其「我的父親」一書中，有極詳盡之談話紀錄，足見中、俄談判之艱難。惟其間敘述奉蔣委員長電，命以個人資格，往見史達林時之情形，更可作將來史家之採取而徵信。

宋院長等一行，抵達莫斯科後，首次與史達林會見，史達林和顏悅色，頗盡賓主之禮。及談判正式開始，一翻其態度，而顯露其猙獰面目。史達林一見宋院長，即以手持之紙張，擲於宋氏座前桌上，并發言：「你看見這東西了沒有？」其舉動之粗率，意態之倨傲，殊非一國領袖所宜出此，即論外交壇之儀節，更不應出此。宋院長具涵養工夫，若無其事，徐取此紙略視之而復置於桌上。知爲「雅爾達協定」，乃答之曰：「此事余僅知其梗概。」史達林以堅決口吻強調其主見謂：「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作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等語。但宋院長暨各團員，對史氏之傲慢與凌厲氣概，心滋不懌，徒以國是爲重，既已來此，不得不抱極大容忍，故對此有虧禮貌，皆淡然置之。惟關於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問題，則不畏強禦，不受威迫，與之折衝，多費唇舌。其爭執最烈之點，則爲「雅爾達協定」原文中有「租借」二字，奉蔣委員長指示，以「租借」二字，爲帝國主義者侵略他人之一貫用語，經堅持辯爭，史達林卒允廢除「租借」二字。至中東鐵路、旅順、大連諸問題，史達林亦願稍予讓步。獨於外蒙古獨立問題，雖幾次用劇辯，用解釋，用洽商，甚或爲俄共設身處地，曉以利害，而史氏表示「非達到外蒙獨立，必不已。」談判生此癥結，形成僵持莫決狀態。而中國之外交形勢與環境，倍覺險象叢生。

奈當時美國人士，渴望中、俄兩國早日妥洽，俾使俄共儘速對日參戰，抑若俄共出兵，所以免美兵之傷亡者然，因而催逼頻仍。且謂「要結束對日戰爭，必須俄共參加，如需俄共參加作戰，俄共要求有利條件，固屬情理之平

，俟其提出條件，中國政府應予以考慮，並給予利益。」云云。此種只見其自身利便，而不惜加它人以禍害之論據，又連續不已。於是，蔣委員長致電其長公子經國，囑以個人名義去見史達林，冀假私人立場，避免外交上之種種扞格，使可暢所欲言，打開僵局。

史達林接見蔣經國，開口第一句直截了當而詢問謂：「你們對外蒙古，爲甚麼這樣堅持，不讓它們獨立？」蔣經國遂答之曰：

「請你諒解，我們中國之所以作七年之長期抗戰，其目的在於收復失去之土地。今日日本尚未驅逐，東北、臺灣尚未收復，失土正握於敵人之手，翻將偌大平安無事之土地，先已拱手讓人，豈不有悖於抗戰之本旨？中國國民豈不同聲責備政府出賣國土？則抗戰之士氣，勢必立見瓦解，更促使國民反對政府。試問，尙能支持此抗日任務？故萬不能同意外蒙歸併於俄國！」

史達林聆聽之下，立時置答稱：

「足下之論據，頗具理由，余非不知也。然而足下應明白者，乃在於——今日非我俄國有求助於中國，而係中國有求助於我俄國。即使中國自身有驅逐日本之力，則何待於俄國之拔刀相助，即俄國亦無從提其要求。今日中國既無自身擊潰日本之力量，翻作前述之言論，豈非等於廢話？」

蔣經國覺得史達林已暴露其「帝國主義」真面目，遂亦遺以閉門見山之語：

「然則，俄國堅持外蒙獨立，究竟存何意向？外蒙僅幅員稍廣耳，人口既少，物產無多，交通又極不便，請言其故？」

史達林則以簡爽之語見告曰：

「實告君，我方之所以堅持外蒙者，純係基於軍事觀點，將視外蒙為戰略要地。」言畢，出之地圖，以指點關
蔣氏：

「假使有一軍事力量，從外蒙而進攻蘇俄，則西伯利亞鐵道立被切斷，俄國完矣！」
蔣經國於是解釋說：

「君所憂慮者為未來事也！現在，倘使你對日參戰，則日本敗北之後，斷無立時重行崛起佔領外蒙，而作為進攻蘇俄之根據地之理。況使用外蒙以作侵犯蘇俄之基地，除日本外，厥惟中國。但中俄兩國既訂友好協定，君所憂者為二十五年，中國願示君以誠，可再加五年，則此卅年間，儘可高枕無憂。萬一認為中國不足信，有攻襲之慮，則中國究竟有無攻擊俄國之足夠力量？是君知之深矣，烏足就憂？」

史達林深以蔣經國之言為不然，乃復申前說：

「君言，但就目前而論，據君之意——以為日本敗後，無可能再行佔領外蒙，進攻俄國云云，在短時間內可能如此，必非永久如此，雖然，日本遭一時之敗，其奈日本民族，必將復振而仍萌故態。」

蔣經國乃詢其理，請廣其說，史達林稱：

「宇宙間任何力量，均可消滅，惟民族力量，無從消滅，尤以日本之民族性，更無消滅可能。」

蔣經國再向史氏發問道：

「德國現已降服，俄軍居佔領之一，然則，德國將重興歟？」

第二篇 第七章 第八節 蔣經國因外蒙主權舌戰史達林

史達林答以「當然要再起。」蔣氏續問：

「日本敗後重起，斷無若是快速，在最近將來，殊毋庸防備日本之再興，而亟亟攻俄。」

史達林云：

「勿問日本再興之遲速，總之日本之重振無疑！倘使日本交由美國管理，吾見其五年之期，必可復其舊觀。即交俄國經營，亦不過延長五年而已。」至此，史達林表示不耐，遂直向蔣經國作其總括之意圖相告曰：

「總而言之，俄國非將外蒙古握於掌中，必不休止。」

「我未嘗視足下爲外交人員，故談話大都率直。國與國之間之條約，豈可作爲憑藉？」

「足下自言——中國無力可以進侵俄國，此語亦不無然！若使中國能够統一，其進步之速，非任何國家所能比擬。」

蔣經國聞此言後，發覺上述談話，確爲史達林肺腑之言，彼既欲侵略中國，又不欲中國強大，故千方百計，施其分化離間狡謀，蓋惟恐中國之統一，而躋於強盛也。

須臾，史達林復續言：

「剛聽足下之言——謂中國或日本，在最近將來，無力足以進攻俄國。但是，不能說沒有第三者之巨大力量，亦出而作進攻之圖。」語已，稍頓。

蔣經國詢以——所謂第三巨大力量，是否指美國而言？史氏答云：「當然。」由此益見史達林心目中，當前大敵，即爲美國。中俄友好條約，經多次磋商，終於簽訂。

在條約未簽訂前，俄方忽節外生枝。俄外交部遠東司主管人，要求條約上附地圖一張，並於旅順港之沿海一帶區域，添劃一道黑線，約離港口二十海里，依照此黑線地區，歸旅順港管轄等情。將此意向蔣經國提出，蔣氏毅然予以拒絕。而俄方則提出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之舊地圖，而該圖上確劃有一條黑線，所以援此舊案。

蔣經國不覺譁笑而譏之曰：

「此乃沙皇時代之舊物，俄國早經宣佈廢止一切條約，放棄一切權益，如此廢物重用，此無異於承認已打倒之沙皇。」

俄方之遠東司主管，指蔣氏侮辱蘇聯政府。蔣經國辯稱：

「若果據此以爲談判，不啻昭告世界，現在之蘇聯政府與從前之沙皇政府一般無二。」

因此，條約雖附有地圖，但此黑線未曾添劃。本篇係依照蔣經國所著之「我的父親」一書中所據錄者，爲欲存事跡之真，不敢少有損益也。

第八章 中蘇友好條約談判經過

美國白皮書載：「宋子文博士、史達林元帥及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之第一星期，在莫斯科開始談判。談判因柏林會議（波茨坦會議）而停頓後，旋復於八月間繼續舉行，由中國新任外交部部長王世杰博士代替宋博士爲全權代表。在八月間之談判，宋博士仍襄助王博士。在開始時，美國以雅爾達與會者之地位，通知雙方，希望能在中蘇條約簽字之前，與之諮詢。美國立場以爲此項條約必須遵照雅爾達協定——不得超越亦不得減少。

美國白皮書又載：「雅爾達協定條款之解釋，因蘇聯以利於其本身目的之態度解釋該項協定，開始即發生困難。蘇聯解釋雅爾達協定之偏頗，既已日漸明顯。美國認爲不得不通知雙方，謂蘇聯若干建議已超越雅爾達條款。談判開始，蘇聯要求：（一）中國中東及南滿鐵路蘇聯之控制權益；（二）大連及旅順租借地之界限應爲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前遼東半島租借地之界限；（三）承認外蒙古獨立。中國人民相信，而美國亦同意，此種提議超越雅爾達之條款。貝爾納斯國務卿經總統同意，當時勸告中國政府不作任何超過雅爾達協定條款之讓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哈立曼先生奉命通知宋博士作爲紀錄，謂美國政府認爲彼所提出之提案，業已符合雅爾達協定，如更有任何讓步，則應認爲係中國政府所爲以獲得蘇聯在其他方面支持。哈立曼先生報告稱，宋博士「充份瞭解並接受此項正確之立場」。

美國白皮書又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同時並交換各種個別有關問題之協定，

此項條約保證互相尊重彼此主權及互不干涉彼此內政。在換文中蘇聯允諾給予國民政府（即中國中央政府）道義及軍事上之支持，並承認中國在東北之主權，中國並同意在擊敗日本後，如經公民表決，證實係外蒙古人民之願望則承認外蒙古獨立。依照關於大連之換文，中國同意宣佈大連為自由港，對所有各國商業及航行開放，並規定中國在該港之行政權，但准許蘇聯租借該港設備之一半，此點實超越雅爾達範圍。此項協定并未生效，蓋因俄國及中國共產黨之態度，國民政府軍官及文官被阻執行其在遼東半島之任務。旅順港換文規定該區作為海軍基地，由兩國共同使用，並延長該區域之邊界超過美國所預料之限度，雖尚不及蘇聯所欲一九〇四年前之邊界，鐵路協定規定共有及共管中東及南滿鐵路，屬於大連及旅順及鐵路之協定其有效期為三十年。」

美國白皮書中所稱換文者，乃新外交部部長王世杰氏之傑作，冀以換文補正式條約文字拘束之所不及。張君勱在英文「第三勢力在中國」一書中，曾亟稱王世杰氏處理措置咸宜，茲譯述張氏原作一段如左：

「一九四五年在莫斯科召開之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談判正在進行之際，當時之中國外長王世杰曾企圖使蘇俄受明文條款之約束，使蘇俄只對國民政府進行援助而勿對中共援助。故在條約之外，雙方進行多次換文，在此等照會中可看到下列數條款：

「一、根據上述條約（按：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精神，並為使此條約之目標得以實施，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同意給予中國之精神支持及物質援助，全部皆給予作為中央政府之國民政府。」

「二、在關於大連旅順之談判及關於中長鐵路（按：前稱中東鐵路）聯合管理之談判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確認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份，並重申保證尊重中國對東三省之充份主權，及承認中國對東三省之領土及

行政之完整性。

「三、關於新疆之最近發展，蘇聯政府保證一如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所述，無意干涉此項屬於中國之內政事務。」

此三點僅係重申中蘇條約第五條中已有明確規定之原則。蓋王世杰懷疑蘇聯政府之真誠及善意，故要求在換文中再強調此數點，以便更有力地約束蘇俄，並有力約束其對中國政治事務之干涉。但如衆所週知，蘇俄從不受「文件」、「協定」或「條款」之約束，正值蘇俄正式簽訂支持國民政府的條約之際，却正在秘密陰謀推翻該政府。蘇俄一手簽訂條約，另一手則在指導其馴順之工具——中共——在滿洲整軍經武。蘇俄之兩面手法，使彼得以公然宣稱對東三省未有任何作爲，甚至在中共受彼援助之下已控制東三省之後，彼仍謊言此點。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對蘇俄讓步，以及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與蘇俄簽訂此條約，皆係被蘇俄玩弄於股掌之上，蘇俄於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間在滿洲之行動，翻遍歷史難以找到較此更罪惡昭彰地背棄國際信義或違反尊嚴條約之行爲。對上述三階段之經過情形加以研究，可使此種惡行一覽無遺。」

張氏右列數行，對於王世杰氏之多次換文，可謂推重備至矣。蘇聯始用延宕國民政府接收東北手段，次用討價還價詭計，終則以整個東北交予中共，是乃既定計劃之一。中蘇兩國商談簽訂「友好條約」，因美國原子彈於八月六日投下廣島，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過於意外迅速，而國際形勢之轉變，出乎意外劇烈。若非如本人所建議之中美同盟五十年的簽訂，以爲實際力量的對付，則任何中蘇友好談判與國共政治協商，適如治絲益棼，徒使共產達到其陰謀之目的以及予以喘息之機會而已。

中蘇兩國商談簽訂「友好條約」之內容條款，因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等之努力，終告實現，中美友好，因之維持下去，不至因雅爾達協定而引誤會，厥功誠不在小。史達林背約食言，塗毒中國，爲另一問題，非宋、王、蔣諸人所能肩負其責者也。

先是史達林爲欲達到雅爾達祕密協定所取得之利益，使美國篤信其有對日作戰之意圖起見，故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經蘇俄外長莫洛托夫突以照會通知日本駐俄大使，聲明廢止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所簽訂之「日俄中立條約」。其照會略稱：

「德國進攻蘇俄，日本曾以盟邦地位協助德國致力戰爭。同時，日本又與蘇俄之盟友英、美兩國作戰，在此情勢下，『蘇日中立條約』顯已失去意義，爲此根據該約第三條之規定，向日本政府聲明廢棄上開中立條約。」

蘇俄之手段，就表面觀，似係實踐其「雅爾達協定」之第一步驟，其實係企圖急速攫取該「祕密協定」所允許之權益。但美國方面忽爾省識該「雅爾達協定」將導致另一惡果，在羅斯福總統未逝世前，曾告赫爾利：「雅爾達協定若干特點，與汝所懷懼與就憂者已相吻合。」旋即命赫爾利於返華途中，順道先過倫敦，莫斯科意圖改正該「祕密協定」，赫爾利既晤邱吉爾首相，陳述羅斯福總統意向，在赴莫斯科途中，即驚悉羅斯福噩耗，但此一任務，在杜魯門接任後，仍繼續執行。詎由於美國務院親共份子，乘國務卿易人之際，逕有電致赫爾利謂：

「美國有執行『雅爾達協定』之義務，無可更變。」因此，赫爾利所負改正該「協定」之使命，遂爾終止。（見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合衆社華盛頓電訊於廿三日刊載於香港之星島日報）故蘇俄之廢棄蘇日中立條約，殊爲窺知美國意向後而始斷然出此，以堅美國之信。

史達林出席波茨坦會議，史氏業已深知日本無可能繼續戰爭，必將投降。但史氏諱莫如深，未曾稍露，但又恐情報洩漏，復故意提出日本將派代表至俄，而爲俄方拒絕等情以掩飾日本乞降請俄轉圜之事實，此乃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動亂」一書中，可證明史達林之詐僞。重光葵敘述如下：

「日本接獲蘇俄『廢止中立條約』之照會後，當時東鄉茂德外相仍相信蘇俄，會晤中委託親俄派廣田前首相，與俄駐日大使接觸，試探和平。七月十一日近衛文麿晉謁日皇，決定赴蘇求和（按即史達林向波茨坦所提之代表團）之後，東鄉電令駐俄大使佐藤，接洽近衛赴俄之事。蘇俄必欲先知近衛至俄任務？佐藤以要求調停和平相答。莫洛托夫云：『我將要旅行，正式答覆，需要遲些。』云云。」

由此可見史達林於波茨坦會議，經已洞悉日本乞降事實，彼誠恐日本投降後，中、美兩國將不願履行雅爾達條款，其種種向美國施行壓力，實出於其焦急心理之所使然。

迨史達林自波茨坦會畢返國——中國則由新任外長王世杰、外次胡世澤、亞西司司長卜道明前赴莫斯科，駐俄大使傅秉常協助，於八月七日繼續商談。史達林態度較前稍變，對於「大連問題」：提出「組設『大連行政管理董事會』，董事由中俄兩國選任，主席可由中國人士擔任」。時中國方面已接獲貝爾納斯特電：「說明『波茨坦會議中美國對大連所持之立場』。」於是決予拒絕。至十日晚會談時，史達林自行放棄上日所提之主張，承認大連爲一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

至於旅順地位問題：在「雅爾達決定」中規定爲「蘇俄租用之海軍基地」，史達林「要求軍港由蘇俄管理，旅順口外約一百里之繆烏，雷島不設防，旅順附屬區之行政官吏，須徵得蘇俄同意。」此項要求立即爲中國方面拒絕。

，但格於「雅爾達協定」，終于「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爲海軍根據地，民事行政權屬於中國，惟該根據地之防衛由蘇俄負責」。因此蘇俄有權於該地駐紮海陸軍。

關於中東、南滿鐵路之經營問題：「兩國協議：該兩鐵路爲中、俄兩國所有，共同經營。其兩幹線以外之支線及附屬事業與土地，應歸中國政府所有」。（按與宋子文所協議者爲鐵路主權屬於中國，史達林又提出而堅持鐵路共有致有此決定。）但史達林復提出「經營撫順煤鐵問題」遭中國代表一再堅拒，始寢其說。而史達林更提出「利用兩鐵路運送俄軍及鐵路保護問題」，雙方對此問題，爭執頗烈，蘇俄要求最低限度須運輸一師兵力，中國則只允於進攻日軍時及撤退時許予運兵，平時則不准使用。至於護路應由中國警察負責。

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在莫斯科簽訂：

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八條（內換文一、二兩項）

二、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

三、關於旅順口之協定（附議定書）

四、關於大連之協定（附議定書）

當簽訂該約時，適爲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日。中國當局既已明知日本投降，則要求蘇俄對日參戰已無需要，爲何不停止簽署此協定，而另作商議？致貽今日淪陷大陸之患。

據曾參加莫斯科談判之中國外交部亞西司司長卜道明解釋稱：

「……原子彈於八月六日投下廣島，而蘇俄於八月八日對日參戰。翌日俄軍數十萬即全線進入東北，十四日日

本宣佈投降，俄軍迅即佔據整箇東北，在此情形下，蘇俄只憑武力即可實現其整箇願望。於是中俄間便發生種種權益與領土糾紛，不難想像。……我若提出交涉，美國將認我拒絕其願望，對我不予援助。美國對蘇俄因雅爾達協定之存在，翻有支持蘇俄實現其全部要求之義務。我國在國際上孤立，將注定我交涉之失敗。……蘇俄勢必利用我之孤立狀態，根據雅爾達協定籠統之規定，乘勢更進一步分裂中國領土，在東北、內蒙、華北、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權，因此而造成更混亂之局面，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將更無其他途徑。而當時我無一兵一卒派駐東北，抗戰八年後，殊無力與蘇俄作戰……反之，我國若與蘇俄先訂一項條約，用條約以限制雅爾達協定之弊，約束蘇俄之侵略行動，並對日後蘇俄可能違約之行動，預先把握一種提出交涉之政治立場。那時不但我們進退有所依據，而且美國對中蘇間可能發生之糾紛，亦不能坐視無觀，自可根據道義與公理之立場，予我以聲援。……因此於日本投降之前夕，決定簽訂此約。」

上開云云，亦可視為官方之意見，本人亦寄以深切之同感。

美國白皮書，起草於中國大陸將次淪陷之前夕，對於其一手促成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作結論如左：

「當雅爾達條約及有關協定訂立時，一般均對該約予以有利之觀察，認爲此項條約將爲兩國間樹立和平及協調關係之堅強基礎。雅爾達協定之訂立，基於軍事必要及保證蘇聯在一九四五年秋季盟國預訂開始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參加遠東戰爭之重要性，日本抵抗雖出乎意料提早崩潰，使雅爾達條款似爲不需要，但該協定及嗣後之中蘇條約，事實上對蘇聯所可採取之行爲加以法律限制。在雅爾達時史達林不僅贊成在對德戰爭勝利後二或三月內對日宣戰，並限制其在東北取得之實際『代價』於恢復蘇聯一九〇四年以前之地位。更有進者，在中蘇條約中，蘇聯同意給予

中國國民政府道義上及軍事物資之支持，並正式保證不干涉中國內政。觀諸對日作戰結束以來，尤以最近數年之國際情勢，若謂缺乏是項協定，即可限制蘇聯追求悠久傳統之目的，殊無跡象證明。蘇聯政府實際上對於其所簽訂條約雖未忠實履行，然此等條約之存在固為國民政府所承認，對於該政府仍有其道德及法律之利益。」

右為美國白皮書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下之結論。該結論起草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出于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之手，乃中國整個大陸淪陷之前夕。蘇俄與中共相勾結構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最恐怖之敵人，已經暴露無遺。而蘇俄於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間在滿洲之行動，翻遍歷史難以找到較此更罪惡昭彰地背棄國際信義或違反尊嚴條約之行爲，亦已暴露無遺。美國為雅爾達協定簽字國又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證國（白皮書自己承認，在開始時，美國以雅爾達與會者之地位，通知雙方，希望能在中蘇條約簽字之前，與之諮詢，美國立場以為此項條約必須遵照雅爾達協定——不得超越亦不得減少）。對於中華民國在東北之領土行政主權完整，負有絕對無限責任。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蘇聯背棄時，美國義應劍及履及聲罪致討，以維持戰後世界新秩序，乃不失為以泱泱大國負世界盟主者之責任。夷考當時美國杜魯門總統、艾契遜國務卿對華政策，對於中華民國應承擔之義務，漠不關心，而對於雅爾達協定所可能造成之惡果，一無所知。更無對雅爾達協定惡果，預作特別措施，如中美同盟五十年等意識以防彼此互陷於孤立。迨蘇俄藉口對日宣戰進軍東北與中共軍事力量匯流成為一體時，二者聯合力量之總和，已駕日本侵華所使用兵力之最高峯而上之，殆非抗戰八年精疲力竭後之國民政府所能單獨應付。卜道明司長於解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亦曾強調及之。美國政府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不僅不採取與我中華民國永遠站在一起之外交政策，以圖補救，乃背道而馳，以「一筆勾消」政策，代戰時比肩作戰，咄嗟之間，輕

重倒置，中共俄共由萬里隔離而治爲一體。中國美國由比肩作戰而變成棄越，世之失策，孰有甚於此者也！

簽訂中俄友好同盟條約，在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之七點理由中，其第三點曰：

「爲求中美二國免於彼此孤立，不得不曲徇美國之意忍痛追認雅爾達協定，但須以中美兩國同盟五十年協定作爲交換條件。」並非寄任何希望於蘇聯，更非寄任何希望於中共，乃寄希望於中美二國不至彼此在陷於孤立者也。

美國白皮書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下之結論，將國際責任與國際義務，推得一乾二淨，殊爲不當。雅爾達協定則該過基於軍事必要及保證蘇聯在一九四五年秋季盟國預訂開始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參加遠東戰爭之重要性。中蘇條約則視爲有限制蘇聯自由行動之法律作用，更能限制其在東北取得之實際代價。積極方面，蘇聯同意給予中國國民道義上及軍事物資之支持，並正式保證不干涉中國內政。凡茲云云，無一實現，無一不與神聖條約者反其道而行之。美國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公證國，若以國際責任與國際義務而言，能袖手旁觀寬縱蘇聯背誓食言，使戰後世界失其法律與秩序者乎？況此風一長，此端一開，弱肉強食，伊于胡底！一葉知秋，不必俟中國失去大陸而知第三次世界大戰爲不可避免者也。

白皮書又謂：「觀諸對日作戰結束以還，尤以最近數年（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國際情勢，若謂缺乏是項協定，即可限制蘇聯追求其悠久傳統之目的，殊無迹象說明。」是言也，出諸路人之口，倒無所謂，出諸與中華民國比肩作戰，爲美國政府者之口，未免爲中共蘇俄所竊笑而令人寒心者也。

查門戶開放領土完整，自始爲美國對遠東之國策。縱使不作雅爾達協定之簽字國，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公證國，美國亦有限制蘇聯追求其悠久傳統目的之責任與義務，況以一身兼簽字國與公證國兩重資格，安能置身事外。

如若置身事外，便犯不可饒恕之過失。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固無法執此以繩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契遜，但後世史家必不爾恕者也。況蘇俄侵入我東北與中共滙流，孰令爲之？孰令致之？追中共與蘇聯兩大力量既經滙流之後，我國政府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予中共在東北之基地以無情之粉碎。不幸又爲政治協商會議詭計所蒙混，而有接二連三之停戰令使中共獲有補充整理喘息之餘裕，轉被動爲主動，擊破我在東北之精銳部隊，美國不當獨尸其責耶？安可以「殊無迹象說明」而輕輕卸責耶？

此外白皮書又指出：「蘇聯政府實際上對於其所簽條約雖未忠實執行，然此等條約之存在，固爲國民政府所承認，對於該政府仍有其道德及法律之利益。」國民政府因雅爾達協定階之爲厲，而失去整個中國大陸，除收復整個中國大陸外，無論任何補償，皆屬廢話。美國白皮書所指稱：此等條約之存在，對於該政府仍有其道德與法律之利益。何所據而云然！國民政府失去整個大陸之後，一切皆完蛋，無論任何所得決不足以償所失。況所謂「道德及法律之利益」者，在弱肉強食之今日世界中，不值半文錢，烏可與整個大陸相提並論者耶？

美國之不負責態度與蘇聯視條約如廢紙之不如，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流行之通病，兩集團相映成趣。蘇聯視條約如廢紙之不如，專對敵國。而美國不負責態度，乃專對友邦，此又同中有異者也。因美國不負責態度專對友邦，受益者爲敵國，受害者爲友邦，友邦雖未與日俱少，但離心力多於向心力。蘇聯視條約如廢紙之不如專對敵國，受害者爲敵國，受益者爲友邦（指衛星國與傀儡國），于是友邦日以多，且向心力多於離心力。因是之故，倘使美國不及時矯正其不負責態度，不僅使中華民國失去大陸，且將令整個人類失去自由，美國人民得天獨厚，擁有世罕其匹之土地人民資源生產科學，未能爲人類解除自由之威脅，不當以贖罪心情向全世界人民自劾罪己者耶！今讀

美國白皮書，對於每一節目之結論，充滿似是而實非之不負責態度，令人掩卷不能卒讀。噫！

第九章 日本無條件投降

第一節 中美未同盟中俄共先合流

日本無條件投降，誠爲中華民國抗戰八年之勝果，亦即中華民族高度民族性之最光榮表現。不料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後，因政治協商會議，演變爲美國對華政策，一筆勾消之溫床。中蘇友好條約變爲中共蘇俄兩大力量匯合之三角洲，及至中華民國失去大陸，美國始發覺太平洋彼岸——友邦中華民國失去大陸使世界失其均衡而陷於孤立。揆厥原因，是否因缺乏中美二國互相依存之一念有以致之？中美二國當事諸君子，今皆一一健在，是否承認這一理由，本人未敢相強。但因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夕，世界已暴露至列七點徵象，亦即本人於德國未投降前夕，向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之七點理由，茲不厭求詳，再錄於左：

(一) 指責重歐輕亞戰略之失當，隱伏戰後世界失其均衡之禍機，因而即使贏得戰爭，亦將失去和平。

(二) 指出當面敵人——德國與日本于久戰疲敝之餘，已成爲強弩之末，惟蘇俄與中共相勾結，將成爲戰後世界最恐怖之敵人。

(三) 暗示爲求中美二國免於彼此孤立，不得不曲徇美國之意忍痛退讓雅爾達協定，但須以中美兩國同盟五十年協定爲交換條件。

(四) 確言中美兩國同盟必須以絕對平等互惠原則，以我所有，供彼所需，以彼所有，補我所無，蔚成太平洋

兩岸兩大國互相依存體系。

(五) 斷言戰後中華民國將失去滿洲、蒙古、新疆、西藏。

(六) 直言戰後世界，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

(七) 面對上述情勢，只有中美兩國締結同盟五十年，才能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作結論。

依據右列第二點，中共蘇俄互相勾結構成戰後世界最可恐怖之敵人，則中美各自孤立爲兵家之大忌。倘有仇隙，亦必捐弓而哭，締爲生死患難之交。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中美二國爲對抗日本而併肩作戰者。由併肩作戰進一步而締結友好同盟，其勢甚順。祇有在公佈雅爾達祕密協定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以戰後安全爲藉口，向美國政府要求簽訂中美同盟五十年作爲追認雅爾達協定之交換條件，合情合理，無逾於此，孰敢議其非是？

祇要有此中美同盟五十年在先，則政治協商會議，縱令中共如何狡詐，挑撥離間，充其所至，不過流產而已。調停人馬歇爾元帥任何固執，任何優越感，太平洋學會人物爲共產黨作內應，任何猖獗，亦不能妄認爲中華民國對美利堅合衆國不合作，而目爲不友好，一潰而不可收拾。更不至演變爲美國對華政策「一筆勾消」之怪嬰。

祇要有此中美同盟五十年在先，中華民國雖經八年抗戰元氣大傷，可不至陷於孤立。而蘇聯與中共兩個力量狡猾的利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參加對日作戰的機會，進入我東北，而迅速滙流，形成一體，視日本侵華所使用兵力之最高峯猶且過之。顧因蘇俄對德作戰之消耗與中國對日作戰之消耗有相彷彿之處，蘇聯與中共兩力量之總和決難超過中美二國構成努力之協成力。蘇俄經事校計素情，雖面臨任何誘惑，不得不自制其奪取我東北之傳統的企圖，更不敢明目張膽悍然無忌背棄國際信義撕毀神聖條約，與我中美努力之協力成爲敵，而與中共公開滙流，彼中俄共

運用其一唱一和，遂使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于彈指之間，翻變質而爲中共蘇俄兩力量匯流之三角洲。

凡茲理由，能否成立？首先要問本人致赫爾利大使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之七點理由，是否從是日起世界形勢變化跟着這七點理由展開？倘其答案爲是，則中美同盟五十年之觀點，不能不視爲絕對正確者也。

其次要問現行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是否對中美二國有所幫助？是否能使中美二國互相免於孤立？是否可以構成爲遠東亞洲之安定力？是否可以爲爾後全面或局部戰爭取得勝利之左券？該現行條約之時間，視本人所建議時，恰後十年，該條約之空間，視本人所建議時，由整個中國縮小至臺灣金馬諸島，其所構成中美努力之協成力，尙且如此充沛，倘使開始於本人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前）之時，是否可以使大陸免於赤化！倘其答案爲是，則中美同盟五十年之觀點，不能不視爲絕對正確者也。

日本無條件投降如能與中美同盟五十年相結合起來，則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獲得勝利之歷史光輝，殆非任何時代歷史光榮所能媲美。今因一子之差，使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獲得勝利之歷史光輝，暫時蒙着一層暗影，凡曾參加八年抗戰獲得勝利之中華民國男男女女老少，無不怒焉心傷！故於敘述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不得不忠誠報導贏得戰爭失去和平之真正原因，使今之男男女女，後之子子孫孫，瞭然於抗戰勝利換來痛苦且失光輝，美國政府所負之責任大於中國政府若干百倍者也。美國政府與人民應以贖罪心情補償中華民國人民之損失，才不失爲興滅國，權經世之泱泱大國。其理由至爲簡單，赫爾利將軍爲美國駐華大使，乃美國的國家最高代表，中國人民向其提出中美同盟五十年之建議，爲事關中美二國免於兩相孤立者，而赫爾利大使未予採用，因欠此一着，使政治協商會議與中蘇友好條約，只有反作用而未有正作用，因而使中國人民失去大陸，美國政府是否須負完全責任？國民政府失去中國

大陸在全面許多政策上亦須負有相當責任。但其錯誤所致之後果，永不至失去中國大陸，此非代中國政府當局辯護卸其責任者也。中國失去大陸之最大原因，乃中共蘇俄利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俄軍對日宣戰機會所匯流，二者匯流之力量大於日本侵華使用兵力之最高峯。祇有中美二國努力之協成力，才能與其抗衡或瓦解之。倘使欠此一着，不僅政治協商會議與中蘇友好條約發生反作用副作用，而國民政府凡百措施，皆因欠此中美二國努力之協成力原素，而不能產生預期之良果，徒爲親者所痛讐者所快而已。

日本無條件投降，乃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八年抗戰獲得勝利之歷史光輝。海可枯，石可爛，而此歷史光輝，永在天壤之間。決不因中華民國政府暫時失去中國大陸而有所貶損，更不因毛澤東改寫歷史，謬稱：「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參戰。百萬紅軍進入中國的東北，這個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失去歷史的光芒。世之恢復反共抗俄必勝必成信心者，必由自我以抗戰八年獲得勝利的驕傲始。

日本無條件投降，宣布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但其遠近二因則昭焉若揭。論遠因應列襲擊珍珠港爲顯著之錯誤。蓋日軍於侵略中國四年有餘陷入泥足之後，復樹兩個大敵如英美二國者，備多力分，猶其餘事，而經事校計案情，無一衷於至當。本人於緊接珍珠港事變之後，以「會師東京」爲題，在韶關、桂林、柳州演講若干次數，刊有單行本，文長一萬二千餘言，以「戰勝則變遷而禍大」爲全篇骨幹。開頭語一段如左：

「回想蘆溝橋事變初起的時候，在我們是以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來和一個準備了四十多年的敵人來抗戰。仰仗領袖神武忠勇，指揮若定，諸將帥同心協力，前後方前仆後繼，迄今將近五年，越打越強，不特奠定了勝利基礎，而且步上勝利之途。這勝利屬於我國形勢之確定，去年（指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瘋狂

的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這一天，更得着無限的保證了。所以有了這一天，謂爲吾人已踏進勝利之門，也未嘗不可。」等語，足爲日本無條件投降遠因之佐證，時民國三十年四月廿四日也。

論近因則因義德兩國先後失敗投降；日本陷於完全孤軍作戰。自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之日起，迄於是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日止，日軍實無繼續作戰之任何理由。但爲取得較寬大的投降條件，背城借一，亦有其片面理由。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曾請蘇俄出面斡旋和平。蘇俄非特未將日本求和之事轉達英、美兩國，而且反乘日寇之危，踵美國投擲原子彈於廣島之後，對日宣戰，極世界軍事投機之陋事。此雖日本失策，亦可證明蘇俄陰狠毒辣。

是年七月底波茨坦會議，二十六日美國以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之名義，向全世界與日本發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宣言之勸降文告，促日本無條件投降。此非係一紙空洞文告，乃有試驗成功之原子彈爲波茨坦勸降宣言發出後之決定性行動，使日本不得不立即屈服。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對於迫使日本投降是否具有重大影響？馬歇爾元帥的回答如下：

「我認爲日本的投降，實由于全般情勢的絕望——琉球之敗，中國海、黃海、日本海全部運輸船舶的摧毀，海軍的被消滅等。由於失去海上控制權，及俄軍的參戰，使在華北的日軍陷於孤立，關東軍亦被摧毀。海爾賽將軍（美第三艦隊司令）所轄艦艇對日本地面設施的轟炸，美國空軍對日本城市的恐怖轟炸，以及最後原子彈對廣島與長崎的轟炸等。而最後一項因素，我認爲加速了日本政府投降的決定，使日軍投降提前數月。」是乃最公允之結論，此乃日本無條件投降之近因者也。

基于右舉遠因近因，重以我國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元月，雷多公路（以後稱史迪威公路）已通至中國境內，因此陸路之運輸則有大量增加，由油管輸入之油類每月則爲五萬四千噸，而駝峯之空運量每月亦增至四萬六千噸，由于此項物資之供應，使我國得能裝備三十五個步兵師及若干特種部隊，迅速恢復戰力。凡受美械裝備之部隊，亦由美方派遣其軍官先後在桂林昆明兩地訓練，可稱爲節制之師，足與世界任何饒勇善戰之武裝部隊媲美矣。

自是中美兩軍加諸敵人之壓力，已使敵軍爲之震撼，而對全般情勢頓萌絕望之念。不久美國陸軍部又令其新在德國及義大利擊敗軸心之第五軍與第九軍，加入中國戰區之序列，此時美械裝備之中國陸軍部隊，在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與駐華美軍作戰司令部（由麥克魯將軍主持），直接密切合作之下，亦經裝備編訓完成。其龐大戰力將使好戰之日本皇軍自食其果，乃中美兩軍正準備全面開始反攻之際，而敵軍已接受盟國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降矣。

第二節 中英美提出招降書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夏，日軍在中美兩面夾擊之下，已呈土崩瓦解之勢。七月二十六日，我國蔣委員長，美國杜魯門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對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促其宣佈無條件投降，否則吾人將應用三國巨大之陸海空全部軍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毀滅，此含有歷史意義之公告原文如下：

一、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爭。

二、美國英帝國及中國之龐大陸海空部隊，業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即將予日本以最後之打擊，此項武力，受所有聯合國之支持及鼓勵，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國無效果及無意識抵抗全世界所有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結果，彰彰在前，可爲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之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殘殆盡，但現在集中對付日本之力量，則較之更爲龐大，不可衡量，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爲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日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終將全部摧毀。

四、現時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是否仍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使日本帝國，已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爲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遲延，更爲吾人所不容許。

六、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侵略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新秩序，勢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之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

十一、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上述目的達到，乃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

十三、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有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日本於接獲中美英促其無條件投降之最後通牒後。立即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曾一度企圖拒降，並謂「日本政府決心戰至最後悲慘結果」，旋以大勢已去，又廣播籲請聯合國採擇更寬厚之和平條件，則日本即可停止作戰。盟軍則緊隨東京方面廣播之後發表公告，予以嚴厲拒絕，但對於無條件投降之含意，重申解釋，所謂「無條件投降者，並非消滅日本種族，奴役日本人民之謂」。

第三節 原子彈之擲擊

正在八月六日上午八時十六分後一刹那，日本廣播公司的東京控制室的技術人員，曾經發覺通至廣島廣播臺的

電話突然斷了。他極力設法接通，但他無法辦到。二十分鐘後，東京火車站的信號臺發覺主要的電報線也已經不通。斷線的地方好像是正在廣島北部。靠近廣島的火車站已有報告傳來，說廣島發生一次爆炸。鐵路上的信號手立即將消息報告陸軍總部。已經快近十點鐘了，東京的朝日新聞總編輯紙川在家裏接到了報館打來的電話，說廣島已經被敵機投彈「幾乎完全毀滅」了。大約在同一時間，第二軍團的參謀平野蔭正在東京陸軍總部。他接到了從大阪的中央軍區司令部來的電話，說司令部與廣島及其西部一線的交通聯絡，完全斷了。

東京的陸軍總部會一再試圖與廣島方面取得聯絡，但未能接通，而且無法查明原因。後來從無線電臺，從鐵路上的信號臺，從朝日新聞的編輯部和大阪方面陸續傳來的消息，證明了確已發生了某項嚴重的事故，但沒有人能够查明究竟是什麼事故。

後來，約在下午一點鐘後不久，陸軍總部最後總算得到來自第二軍團的消息，僅僅簡短的兩句：「廣島被一顆炸彈所燬滅，大火正在蔓延燃燒中。」這一個緊急消息，是來自廣島水上陸軍流動軍火庫。這個軍火庫是遠離爆炸地區。

報告繼續傳至。到了下午，陸軍方面已經知道僅有三架敵機在炸彈爆炸時，飛過廣島上空。更有報告說，其中兩架飛機並未投彈。後來東京的五家大報的總編輯訪問政府的新聞情報局。一位陸軍發言人對五位總編輯發表了下面的談話：

「我們相信投下廣島的炸彈，比普通炸彈不同。我們一俟得到正確的報導，立即發表正式聲明。在目前，諸位可籠統地發表這個消息，視它爲一次普通的空襲加以報導好了。」換句話說，當局還是想欲蓋彌彰，不肯說真話。

陸軍方面已懷疑投下廣島的炸彈，可能是一顆原子彈。日本的海軍情報會在一九四四年末報導過美國正在研究製造原子彈，並指出美國政府正在搜購全世界所有鈾礦砂。但日本陸軍致力於繼續作戰，準備同美國軍隊在日本本土上來一次白刃戰，就決定盡可能保留這個消息，不讓日本人知道。

不過，有關廣島被炸的真相，馬上透露出來了。在東京郊外的埼玉縣，日本半官通訊社同盟社設有一個空中監聽站，雇用了五十個工作人員，其中大部份是出生於美國的雜種女子，專負監聽美國的廣播。八月七日上午一點鐘（華盛頓時間爲八月六日正午），這個監聽站站長木下給一個年青監聽員叫醒。這個年青監聽員報告說，所有美國的廣播電臺都播送杜魯門的聲明，指出投擲於廣島的炸彈，就是「一顆原子彈。」

木下站長靜聽這個青年的報告後，立刻報告他的上司長谷川。但長谷川根本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立刻趕回他的辦事處所，當他親自看到發自東京郊外監聽站的報告原文後，他即將情形向內閣文官長清水報告。清水立刻將情形報告首相鈴木。首相聽了報告後說：「如果美國的聲明是可靠的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繼續作戰。沒有原子彈的國家，不可能繼續同擁有原子彈的國家進行戰爭。結束戰事的時機已經到了。用不着埋怨軍部、生產工人或別的方面——只因爲原子彈罷了。這是最好的解釋。」

可是軍部方面却不願接受這種態度。將軍們在八月七日召開的緊急內閣會議席上，曾引用一則日本的古老故事，說，有一個軍官聽到一羣飛鳥展翅飛過的聲音，誤以爲敵人逼近，趕快逃跑，鬧成一個大笑話。他們認爲炸彈並不是原子彈，只不過是一顆大一點的普通炸彈罷了。他們堅決拒絕外相東鄉的提議，立即依照波茨坦最後通牒，考慮投降的可能，反而主張暫將杜魯門有關原子彈的聲明保留不讓日本人民獲悉，靜待軍部先對廣島作實地的調查。

軍部方面事實上已經開始這項調查。來東京公幹未返廣島的第七軍參謀平野少將，曾訪日本著名核子科學家西銘。他將社會門的廣播告訴西銘，請西銘搭乘一架聯絡軍機趕赴廣島，調查真相。西銘當允親去。

當西銘所乘聯絡軍機抵達廣島上空，大約正是晚上七點鐘。但天色仍未黑，所以他可以看到觸目驚心的景象：「因為我會是一個軍人，我的眼睛從那時起即慣於審視轟炸的結果。可是這一回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種景象。映入我的眼簾裏的，在殘垣頹瓦之間，並未見到一條道路，這是我第一次所見到的景象。凡在普通空襲之後，道路總是仍可識別。可是在廣島，一切都被毀滅了，所有道路都被破碎的東西所掩蓋。」

當西銘從軍機走下時，他所看見的第一個人，是一個空軍軍官，派來迎接調查人員的。這個軍官的面孔正中劃下了一道傷痕。面孔的一半完全未曾受傷，另一半受到爆炸的灼傷，已成焦黑。調查人員在瓦礫中尋着路走到第二軍團司令部，司令部已被炸燬，裏面空無一人，最後他們才找到司令部的幾個軍官被困在山邊的岩洞裏，不能出來。他們不必等到第二天早晨開始去調查，早已明白一切真相。事實上，平野少將從他在軍機上所見到廣島的慘狀，早已明白一切，正如美國的飛行員卡倫在轟炸後所見到的完全一樣。

在華盛頓官方，一致認為投擲原子彈的消息，應該立即公佈，讓外間明白。官方發表了一次有關投彈的公報，消息立即傳遍全世界。這份由白宮發表的公報，首先簡單地敘述原子彈的性質和力量後，繼續下去就是下面一段：

「七月二十六日發表波茨坦宣言，目的是在使日本人民不至於遭受完全的毀滅。但他們的領袖立即拒絕那份最後通牒。如果他們現在仍不接受我們的條件，則他們將遇到來自空中的毀滅，這將是亙古未見的毀滅。」

爲了加速日本帝國的投降，華盛頓方面曾發動熱烈的宣傳，向四十七個日本城市投下了一千六百萬張傳單。他們更準備從八月九日至十一日投第二次原子彈，理由是加速進行，可使日本領袖認清廣島被炸一事並不是造物的不仁。

第二次投擲原子彈的飛行，一開始就倒楣，到了投完爲止，一直就不很順利。這一顆原子彈却是在墨西哥試驗過的同型原子彈，與投下廣島的一顆不同，投彈的飛機由斯威納少校駕駛，原來的目標是四國，但飛到上空時，天氣惡劣，濃霧彌漫，無法找到目標。當斯威納轉飛另一目標長崎時，也是被雲層所掩。阿希華斯海軍中校是機上的兵器專家，却下令如果必要的話，可憑雷達投彈，這雖是違反華盛頓的命令，但因汽油不夠，不得不如此，因此投下長崎的原子彈完全憑雷達指示而進行的，轟炸手最後雖在雲層裏看到地面一些地方，但炸彈投下去時，仍離開目標約叁哩。雖是如此，破壞仍是驚人。第二天，日本內閣同意通過瑞士遞送了一份咨文，接受波茨坦最後通牒的條件，但附帶一項雙方「默契」的條件，仍讓天皇保有王位，除了尚未舉行形式上的投降手續外，戰事實已經結束了。

（註：本節係摘錄自柳青——「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前因後果」一文）

第四節 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

八月十日下午七時五十分，日本政府請降書，已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日本願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爲日本元首。其照會之大意如次：

日本天皇，切望促進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戰爭，俾天下生靈得免因戰爭之持續而陷於浩劫，日本政府爲服從天皇陛下之聖旨起見，已於數星期前請當時仍處中立地位之蘇聯政府出面斡旋，俾對諸敵國得恢復和平，不幸此等爲促進和平之努力業已失敗，日本政府爲尊重天皇陛下恢復全面和平，希望戰爭造成之不可言狀痛苦，能儘速告終結起見。乃作下列決定：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爲至高統制者之皇權，日本政府竭誠希望。

八月十一日，美國代表聯合國，由國務卿貝爾納斯送交瑞士公使館代辦葛拉斯理，託其轉致日本政府之對日本投降建議覆文，如次：

「代辦閣下：八月十日之照會奉悉，茲覆者，美國大總統已囑鄙人代表美英蘇中四國政府致函閣下，俾經由貴國政府轉達日本政府，關於日本政府來電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條款，然有下列一點：『附以諒解曰，上項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日本天皇陛下爲至高統制者之皇權。』吾人所採立場如下：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制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最高統帥將採取其認爲適當之權力實施投降條款，日本天皇，必須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能簽字於必須之投降條款，俾波茨坦之宣言規定能實施，且須對日本一切陸海空軍當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隊（不論其在何處），發號施令，停止積極行動，交出武器。此外並須發佈盟國最高統帥在實施條款時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以後，應立即將戰俘及所扣僑民，運至指定之

安全地點，俾能迅速登同盟國之運輸船隻，並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同盟國之武裝部隊將留於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所規定之目的達到爲止。」

此項覆文，於十二日上午四時十分由瑞士轉達東京，初敵方尙無表示，而美英艦隊則嚴陣以待，如敵拒降，即全力進攻。

八月十五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佈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

蔣委員長在日軍宣佈投降後，特對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全文另錄）：希望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要加速密切聯合起來，成爲家人手足，發揚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起互信互任的關係，使我們這一次的大戰成爲世界最末一次之戰爭，對於日本，我們將「不念舊惡」，不願企圖報復，我們將以戰時同樣巨大力量，完成我們戰爭停止以後的艱巨工作，我們要向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來共同維護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第五節 日本投降及接收經過

日本宣佈投降後，我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所劃分之受降區規定，中國戰區管降範圍，應爲中華民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投降代表爲日軍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其所轄投降兵力計有：華北方面軍：三二六·二四四人，華中第六方面軍：二九〇·三六七人，京滬地區第六第十三軍：三三〇·三九七人，廣東第二十三軍：一三七·三八六八人，臺灣方面第十方面軍：一六九·三〇一人，越

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第三八軍：二九·八一五人。

以上各地區，總共敵軍投降之兵力，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至其指揮機關及部隊單位如左：總司令部一個，方面軍三個，軍十個，師團（內戰車師團一，飛行師團二）三六個，獨立旅團（內騎兵旅團一）四一個，獨立警備隊守備隊及支隊一九個，海軍特別根據地隊及陸戰隊六個。

八月十五日，我最高統帥，致電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示其六項投降原則，原電如左：

「急，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鑒：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二、該指揮官應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三、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并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四、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但長江內之船艦應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壞任何設備物資。

六、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及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爲要。」

八月十七日下午五時三十二分，接獲岡村寧次之覆電如次：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閣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賜電敬悉，今派今井總參謀副長、橋島參謀二人，率同隨員三人，準於本月十八日乘機飛至杭州等候命令再起飛玉山。敵處使用雙引擎發動機一架，並無特殊標

職，並請客照玉山飛機場派員接見，仰賴照料爲感，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印。

委員長接獲岡村寧次大將上述覆電後，因玉山機場於天雨後跑道損壞，不能使用，臨時決定改爲湖南芷江機場，遂於八月十七日，電飭岡村寧次遵照，旋即決定日投降代表來芷江日期及其應遵守事項。

乃於次日（十八日）再電岡村如左：

限即到，南京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鑒：未獲亥電計達，今井總參謀副長可於八月二十一日來湖南芷江，希遵照下列事項：

一、代表人數不得超過五員（內須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機場情形之飛行員一員），於八月二十一日晨，坐日本飛機一架自漢口附近起飛，逕飛湖南常德上空，此時高度須五千英尺，時間爲重慶夏季時間上午十時（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爲上午二時），屆時在六千英尺上空當有盟軍戰鬥機三架迎接之，如雲層過低，該日機應在雲層下一千英尺，盟機高度則在雲層下五百英尺。

二、日機標誌，在機翼上下各漆帶有光芒之日本國旗一面，並於兩翼末端，各繫以四公尺長之紅色布條一，以資識別。

三、盟軍戰鬥機三架，將護送該日本飛機至芷江機場着陸，着陸順序，第一架爲盟機，第二架爲日機，第三及第四架爲盟機。

四、今井總參謀副長，須隨帶駐中國臺灣及北韓十六度以北，安南地區內，所有日軍之戰鬥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揮區分系統等表冊。

五、如因氣候惡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飛行時，須於次日依照上項規定之時間與方式實施。

六、日本飛行員以波長5850KC收發用英語呼號KING ABLE AIRGROUND CONTROL REPEAT KING ABLE AIRGROUND CONTROL與芷江之空中地面指揮部隊取連絡，此種呼號，在距芷江一百英里時開始，以後每隔七分鐘一呼叫，直至望見芷江機場為止，芷江無線電降落站用波長425KC其英語呼號KING ABLE在望見芷江機場時，日本飛行人員即停止與KING ABLE空中地面指揮連絡，立以波長495KC收發與KING ABLE指揮塔聯絡之。

七、接到此電後，須於八月十九日重慶夏季時間午後六時至八時在南京無線電臺（XON）以波長5400KC答復。同時賦予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之任務，規定如下：

- （一）承本委員長之命令，處理在中國戰區內之全部敵軍投降事宜。
- （二）指導各戰區，各方面軍，分區分期辦理一切接受敵軍投降之實施事宜。
- （三）秉承本委員長之意旨，對中國戰區內之敵軍最高指揮官發佈一切命令。
- （四）秉承本委員長之指示，與中國戰區美軍人員密切合作，辦理美軍佔領區，盟軍聯合佔領區交防接防敵軍投降後之處置。

（五）收復區內難民救濟，交通通訊運輸之恢復諸事宜。

（六）指導各戰區，各方面軍，分區分期辦理接受偽軍投誠編遣及剿辦不聽命令之偽軍事宜。

（七）負責迅速處置南京偽組織政府，恢復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敬待國民政府遷都。

(八) 在辦理接受敵軍投降期間，秉承本委員長之指示，調動部隊，佔領中國戰區內各軍事政治經濟交通要點及要港，構成處理敵軍及恢復全數秩序之有利態勢。

(九) 對於非經政府指定之受降隊，如有擅自接受敵軍投降，企圖擾亂我受降計劃者，得呈請本委員長下令懲罰云。

(十) 敵軍應對本委員長所指定之部隊受降，如對非指定之部隊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讓防，或於投降期間不遵我軍命令實施者，得由陸軍總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並對不遵命令之敵部隊長，或敵軍最高指揮官，直接予以處置。

(十一) 指導監督並得全權處理收復區內一切黨政各事務。

(十二) 指揮各戰區所有向收復區挺進，及原在收復區各部隊，組各戰區在後方留防部隊，仍歸各戰區秉承本令之指示指揮之。

八月廿二日上午十一點十五分，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飛抵芷江，即由陸軍總部蕭參謀長毅肅召晤，並代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授予第一號備忘錄，指出日軍投降應準備之事項。備忘錄原文如次：

一、本人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之地位，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之地區內，日本高級指揮官，及全部陸海空軍與其輔助部隊之投降。

二、日本駐華最高級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應自接受備忘錄之時起，立即執行本總司令之一切規定，在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軍，亦同此規定，並應由岡村寧次將軍負責指揮該項日軍之投降。

三、岡村寧次將軍，於接受此備忘錄後，關於下列事項，應立即對日本陸海空軍下達必要之命令：

(一)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即第二條所屬地區內以下同），所有之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為。

(二)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之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立即各就現在駐地，及指定地點，靜待命令，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

(三)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所有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武器、彈藥、航空器材、船艦、商船、車輛、及一切交通通訊工具、飛行場、海港、碼頭、工廠、倉庫、物資、與一切建築物暨軍事設施，以及文獻、檔案、情報資料等，應立即妥為保存，不得移動，並應絕對保持完好狀態，由岡村寧次將軍負其全責，聽候本總司令派員接收。

(四)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所有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各就現駐地，負責維持地方良好秩序，直至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及負責長官到達接收為止，在此期間內，絕對不得將行政機關，移交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行政或代表人員。

(五) 對本總司令所轄地區內，同盟國被俘人員及被扣官民，應立即恢復自由，並充分供給其衣食住所及醫藥等，並準備遵照本總司令之命令送到指定地點。

四、為監視日軍執行本總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見，特派本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先到南京，設立本總司令前進指揮所，凡冷欣中將所要求之事項，應迅速照辦。

五、岡村寧次親自向本總司令接受有關日本陸海空軍投降實施之正式手續，及蔣委員長之命令，其時間及地點，俟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接受日本總投降後另行通知。

九月八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往南京，九日上午九點，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其降書如左：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述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爲，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備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材及飛機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

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官佐士兵，均須負有完全履行此類命令之責。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長官及違犯命令者，願受懲罰。

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簽字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

昭和二十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點×分簽字於中華民國南京。

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分在中華民國南京。

中國戰區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為迅速辦理投降事宜，恢復全般秩序起見，當即遵照最高統帥之指示，策定分十五個區投降，指派就近之最高軍事長官分別接受日軍之投降，其區分如左：

一、第一方面軍盧漢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 38A (21 D. 22D 1 部) 及 34BS 等部隊，集中地點越南北部，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為土橋勇逸，辦理投降地點在河內。

二、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 23A. 129D. 130D. 23BS. 81BS. 131BS. 等集中廣州，22BS 1 大隊 23BS 1 大隊，集中雷州半島，海南警備隊集中海南島，日軍投降代表為田中久一，辦理投降

地點在廣州。

三、第七戰區余漢謀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04D，汕頭支隊 130D 之砲兵一大隊，與步兵兩大隊半，集中汕頭，日軍投降代表爲 23A 田中久一，辦理投降地點在汕頭。

四、第四方面軍王耀武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20A、64D、81BS、82BS、2KS 集中長沙，但 68D 集中衡陽，11D、17BS 集中岳陽，日軍投降代表爲 20A 坂西一良，辦理投降地點在長沙。

五、第九戰區薛岳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71BS 集中南昌，但 11A、13D、38D、84BS、87BS 集中於九江，日軍投降代表爲 11A 笠原幸雄，辦理投降地點在南昌。

六、第三戰區顧祝同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33D、62BS、91BS，集中杭州，海軍陸戰隊集中廈門，日軍投降代表爲 13A 松井太久郎，辦理投降地點在杭州。

七、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3A、27D、60D、61D、69D、89BS、90BS 等，集中上海，但 6A、3D、34D、40D、161D、13FD 集中南京，日軍投降代表在南京爲 6A 十川次郎，在上海爲 13A 松井太久郎，分別在京滬辦理投降事宜。

八、第六戰區孫蔚如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6HA (132D、31BS、85BS、11BS、51BS) 集中漢口，組 121BS、86BS、88BS 集中武昌，辦理投降地點在漢口。

九、第十戰區李品仙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65A 集中徐州，70D、1KS 集中蚌埠，131D、61BS 集中安慶，日軍投降代表爲 6A 十川次郎，辦理投降地點在徐州。

十、第十一戰區：（子）孫連仲爲平津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18D. 9BS 及華北特別警備隊，集中天津，華北及蒙疆方面軍及 3TKD 2BS. 8BS. 3KS 集中北平，7KS 集中保定，1BS. 21BS 集中石家莊，日軍投降代表爲華北方面軍根本博，辦理投降地點在北平。（丑）李延年爲濟南青島德州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5BS, 12KS, 11BS 及海軍陸戰隊，集中青島，43A, 47D, 9KS, 11KS 集中濟南，日軍投降代表爲 43A 細川忠康，辦理投降地點在濟南。

十一、第一戰區胡宗南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10D，集中洛陽，6KS 及 22D（大部）集中新鄉，12A, 10KS 集中鄭州，日軍投降代表爲 12A 電團長應森孝，辦理投降地點在洛陽。

十二、第五戰區劉峙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15D, 14KS 集中鄭城，92BS, 13KS 集中許昌，4KB 集中商邱，日軍投降代表爲 12A 唐森孝，辦理投降地點在鄭城。

十三、第三戰區閻錫山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A, 114D, 3BS, 101BS, 1441BS, 5KS 集中地點由閻錫山決定，日軍投降代表爲 1A 澄田徠四郎，辦理投降地點在太原。

十四、第十二戰區傅作義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21KS, 24KS, 二個大隊及熱河省內部隊，集中地點由傅作義決定，日軍投降代表爲蒙疆軍根本博，辦理投降地點在歸綏。

十五、臺灣澎湖列島陳儀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0HA, 8FD, 9D, 12D, 50D, 66D, 71BS, 75BS, 100BS, 103BS, 102BS, 112BS, 及澎湖守備隊，集中地點由陳儀決定，日軍投降代表 10HA 安藤利吉。

當陸軍總部奉命之際，我主要受降部隊（正規軍），多偏處西南各省，而我對廣州、長沙、武漢、南昌、九江

、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鄭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峯、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包頭、大同、太原、石家莊等二十四處戰略要點，須於解除日軍武裝之同時，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順利進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復。當時陸軍總部遂根據全般情況需要，策定受降計劃，其主要着眼，暫保持日軍之建制指揮系統，使其擔任聯絡傳達，亦擴大其聯絡範圍（按臺灣及越北與日本駐華海軍原不歸岡村寧次之指揮亦一併歸入聯絡）使岡村寧次在統一聯絡狀況之下，始終能有秩序的接受並奉行我最高統帥及陸軍總部之命令，實施投降。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我軍遂依照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我軍到達後即逐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器。

關於解除武裝之辦法，係使已到達集中地之日軍，在我軍監視之下，先就集合位置，再依我所指定之倉庫，自動卸下一切武器，納入庫內，造冊呈報，由我點收，而所有俘虜，則隨即送入集中營管理。

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繳械集中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惟蘇北山東華北方面，因受共軍阻礙及破壞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然經陸軍總部極力設法排除困難，終於本年二月初旬，除一小部份日軍被當地武裝部隊包圍繳械外，（如隴海東段瓦礫砲兵一個中隊山東泰安車站一百人），其他日軍，均已由國軍繳械完畢，所有要點，除張家口及古北口等地，因爲共軍先我軍佔據，未能接收外，其他各要地，已均爲我軍次第收復，截至三十五年四月中旬止，我軍共繳獲日軍主要武器車輛飛機艦船數量如左：

甲、主要步兵輕武器：

步騎槍，六八五、八九七枝，手槍，六〇、三七七枝，輕重機槍，二九、八二二挺。

乙、主要火炮：各種主要火炮，一二、四四六門。

丙、各種彈藥：

步槍彈，一八〇、九九四、〇〇〇餘粒，手槍彈，二、〇三五、〇〇〇粒，各種砲彈，二、〇七〇、〇〇〇顆

丁、主要車輛：戰車，三八三輛，裝甲車，一五一輛，卡車，一五、七八五輛，（包括特種車輛）。

戊、馬匹：七四、一五九匹。

己、主要航空器材：各種飛機：一、〇六八架。（內：可用者：二九一架，待修者：六二六架，不堪用者：一五架。）炸彈：六、〇〇〇噸。飛機用汽油：一萬餘噸三一〇一九二七加倫。

庚、海軍主要艦艇：艦艇船舶共一四〇〇艘，計共五萬四千六百餘噸。（每艘平均不及五十噸）內主要艦艇計有：

軍艦一九艘（九十至一千一百噸，僅有三艘可出海。）

驅逐艦七艘，每艘約百噸，內有六艘可用。）

魚雷快艇六艘（十五噸至廿五噸各三艘，均可用。）

小型潛艇三艘（五十噸內兩艘可用。）

小砲艇二百艘（每艘八至二十五噸，大部不堪用。）其他多係小艇帆船，且多損壞待修，或不堪使用。

應行遣送之日俘日僑，共爲二百零三萬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另有韓籍俘虜及韓僑及臺胞十餘萬人，內中計有：日俘——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人，日僑——七八四、九七四人，韓俘及韓僑——六五、三六三人，臺胞——四四、一八八人。

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臺灣海南島越北各地，並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十二個港口，出港歸國。海運部份，由美方負責，使用登陸船八十五艘、自由輪一百艘，及一部日本船隻擔任。內運至港口，則由我方負責，全部遣送運輸，由三十四年十月底開始，至次年四月中旬已遣送百分之八十強，至六月底，即可全部遣送完畢。

在中國戰區之日本戰犯之逮捕，悉依照戰犯處理委員會所審定之名單，由軍委會分送各地軍政機關及港口司令實施逮捕，逮捕後送交各地軍事法庭審理，其經營地軍民檢舉或告發者，各行營、各戰區長官，亦得逕行下令逮捕，其已返回日本本國者，則轉請外交部照會美國政府，轉飭美佔領軍統帥部，逮捕交付。

第六節 共黨暴發勝利果實

右文爲日本無條件投降及我國國民政府受降經過，乃一代之史乘，決未可加以抹煞與改寫。惟去年（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出版之毛澤東選集第四集，以「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爲第一篇，自註寫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首一節赫然在目如左：

最近幾天是遠東時局發生極大變動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大勢已經定了。日本投降的決定因素是蘇聯參

戰，百萬紅軍進入中國的東北，這個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不能繼續打下去了（註一），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已經取得了勝利。抗日戰爭當作一個歷史階段來說，已經過去了。」

註釋（一）云：「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從海空兩方面，進入中國東北和朝鮮，迅速擊潰了日本的關東軍。蘇聯聯軍越過內蒙古沙漠，進入熱河和察哈爾，日本政府被迫於八月十日發出乞降照會，十四日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關東軍是日本陸軍最精銳的主力，是日本的戰略總預備隊，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妄圖依靠這支軍隊，憑藉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有利戰略地位，進行長期的戰爭，蘇聯的參戰，使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一計劃，徹底破產，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認失敗，接受投降。」

是篇又有一節如左：

「蘇聯出兵了，紅軍來援助中國人民驅逐侵略者，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這件事情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可估計的。美國和蔣介石的宣傳機關，想拿兩顆原子彈把紅軍的政治影響掃掉，但是掃不掉，沒有那樣容易，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假如原子彈能够解決戰爭，為什麼還要請蘇聯出兵？為什麼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們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志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勳爵，叫蒙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這些同志比蒙巴頓還落後，這些同志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麼影響呢？是資產階級的影響。……」

右列毛集兩主文一註釋，乃篡奪抗戰果實改寫抗戰歷史罪浮于毀人墳墓者也。本年（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

年）六月十五日蘇俄總理赫魯歇夫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擊敗日本軍隊主力者爲蘇俄軍隊。」同時，赫氏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地位比同德國。赫氏於是晚對蘇俄全國發表演說時出言如上，在此篇演說中，渠曾舉出自認應即締訂對德和約及應使西柏林成爲「自由市」之原因。照蘇俄「塔斯社」宣佈之演辭，赫氏謂：「吾人以前曾與美國合力對付日本，吾人與美國人曾一併流血。日本陸軍之核心力量（駐中國東三省之關東軍）係遭蘇聯軍隊擊潰。蘇聯會同其他對日作戰各國，曾參加草擬有關管制日本戰後發展事宜之措施。其後，有一遠東委員會之機構設於華盛頓，並有一稱作盟國處理日本問題委員會之機構出現，全部設於東京。在此兩機構中，蘇聯代表以與人相等之地位極積極地參與工作，後來出現締訂對日和約之問題，吾人之盟國竟不顧蘇聯之意見，而單獨簽訂對日和約。」等語。識者對此二人所言，無不嗤之以鼻，目爲白日夢囈，是乃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因有此出人意外之白日囈語，故不得不延長本篇篇幅，將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對於抗戰所下之結論全文錄之如左，使魑魅魍魎無所遁逃其形者也。

第十節 贏得勝利實非容易

綜觀八年來抗戰之經過，可知此勝利之獲得，實非容易亦非倖得，其間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

自九一八敵佔我東北四省以後，其侵略我國，征服世界之野心，暴露無遺，至長城戰役以迄二十四五年間，日本軍閥對我之壓迫，尤無所不用其極，吾人固早知非備戰不足以圖存，非備戰不足以維護公理與正義，惟其時環顧國家情況，財力薄弱，工業落後，一切國防建設，雖已著着進行，大部尚未完成，又深知非加強準備，不足以言戰。

，故政府及全國同胞，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一面愈益加緊整理軍隊，充實國防一切措施，作應戰之準備，至蘆溝橋事變發生，乃振奮哀兵，以百折不撓之精神，與敵周旋，終乃突破難關，獲得勝利，而當時應付之艱難，亦可知矣。

自七七以至武漢會戰，日人初以估計我國力過低，使用不充份之兵力，企圖速戰速決，繼已知我之不可輕侮，而又犯逐次增加兵力之忌，且其軍部計劃不良，不能與其政略配合，圖逞一時之威，輕率廣開戰場以致兵力分散，失却戰機，我則在最高統帥高瞻遠矚，精密籌劃之下，首先決定持久抵抗之方針，且深知敵我強弱之異勢，乃策定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戰略，於淞滬南京武漢徐州平型關忻口各會戰，及南北各戰場要點，予敵以嚴重打擊之後，逐步轉進，使敵愈深入，愈益困難，終於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我遂利用時間，整理部隊，恢復戰力，加強部署，以備不斷之會戰。

第二期抗戰開始後，吾人一面仍本既定之方針，努力邁進，一面更遵最高統帥之啓示：「向敵後前進，變敵人之後方爲前方」，如山西河南安徽各戰場，至我軍不能固守時，皆於消耗敵人之後，向敵之側後撤退，使敵處處皆有腹背受敵之感，此爲吾人軍事上最妙之運用，而收效最宏者，自此時起，我作戰部隊不僅數量逐漸增多，其素質亦由於作戰之經驗與教育訓練之改進而日益優良，敵軍二十八年在南京參謀長會議，亦承認我軍質與量均有驚人進步，且曾不斷修正教令，告誡部屬，對我勿存輕視。至抗戰末期，我軍隊之戰力，尤有極大進步，如滇西緬北芷江桂柳諸役，皆有優越之表現。

二十九年初，敵乘法國在歐戰中新敗無力東顧之時，出兵強佔越南，威脅我國西南，並趁我調兵增防滇桂之際

，陷我宜昌，又復利用納粹攻英之會，壓迫英國一度封鎖我滇緬路線，使我作戰物資之內運與物資出口，完全斷絕。自此以後，國家財政困難，通貨日增，物價日漲，官兵生活，日益艱苦，一切軍需補給，亦遂因物資缺乏，交通不便，不能充裕籌給，自此時以迄三十三年秋，實爲我抗戰最艱苦之階段。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吾國由獨立作戰，變爲與英美並肩作戰，在戰略上之收獲固極宏偉，但吾人軍事上所遭遇之實際困難，並未減輕，蓋英美之基本戰略決策，乃先以全力擊敗德國，次及日本，故在遠東方面，乃賴吾人在最高統帥堅定意志領導下，以自身力量，艱苦支持，其後美國開闢中印空運，而初期僅供美軍第十四航空隊之需要，直至三十三年春季以後，始略有噸位，運濟我軍用物資。至於美國援助我國物資，空運方面，僅有數百架之飛機及配件油料，陸軍僅有六十九個輕裝備師之裝備，其價值共約合五億美元，此項援助，雖於馬歇爾將軍所報告，美國供應盟邦之武器約可裝備五百八十八個裝甲師或二千個步兵師，其價值共約二百億美元之數，所佔極微，但在吾人抗戰末期之幫助，誠屬不少，且美國除代表訓練空軍海軍人員，並直接派遣空軍協同我軍作戰外，於抗戰末期，復派軍事人員，直接協助我軍訓練與作戰，俾能收復滇西國土，尤以中國陸軍總部成立後之中美密切合作，使我新生強大部隊，得以養成，良好之後勤機構，得以建立，乃於湘西之役，予敵以最後攻勢之徹底打擊，更進而收復桂柳。雖其後大規模之反攻，因敵人之投降而未能表現，然美國予吾人之情與實際之援助，實有令吾人感激不能忘者。

當敵軍進攻香港，侵襲緬甸時，我國會出兵廣九及緬甸，應援英軍，尤以緬甸之役，表現極多，此種不避艱危，對盟邦盡我應盡之義務，足以顯露我中華民族之篤守信義，富有道德，有足多者。

在抗戰開始以迄三十二年十一月，應欽兼任軍政部長，部隊裝備保育，皆屬職責，對於官兵生活之艱苦，非不欲盡量改善，對於國軍裝備之補充，非不欲盡量完滿，然以限於物力財力，實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蓋國家收入短絀，欲盡量提高官兵待遇於一時，勢必大量增加國家預算，徒使通貨膨脹，影響物價，而官兵生活，終不能追縱物價，轉瞬又復困苦如前矣，故在此八年之間，關於官兵之薪餉與給養，以及服裝彈械器材之補給，只能就國家財力許可之預算內，勉求增加，艱難應付，雖當日各負責部門，籌謀支持此六百萬兵員之一切作戰補給，已屬克盡厥職，煞費苦心，惟應欽對我全體將士之共體時艱，忍耐物質之缺乏，艱苦用命之精神，迄今仍不勝其歉疚感佩！茲錄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之軍費預算於後，以與三十四年一年之軍費預算八千餘億元相比較，則當時艱苦情形，可以想見。

二十六年——	一、三七七、四九九、六一五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六十五點四八。
二十七年——	一、七三一、六七三、三〇〇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七。
二十八年——	一、五七八、四二六、三二一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五十一點八三。
二十九年——	三、九〇四、一九四、三四四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七十一點九七。
三十年——	七、四一二、九三四、六八一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六十八點零九。
三十一年——	一五、七八七、七七二、一〇〇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五十四點三五。
三十二年——	三八、三八六、六二〇、八四〇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五十八點一二。
三十三年——	一〇一、二九六、三一四、八九一元，佔國家總支出百分之六十六點九五。

此次抗戰中，軍民犧牲之大，財產損失之鉅，爲空前所未有，其經過之艱難與危險，及今思之，猶有餘悸，所以能轉危爲安，轉弱爲強，終獲最後勝利者，唯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認識之明確，決心之堅定，而尤足稱道者，則爲吾國統帥權之專一，乃使陸海空軍運用自如，政略戰略配合一致，故能戰勝強敵，造成我中華歷史上罕有之偉績，同時我全軍將士之忠勇效命，全國同胞之一致努力，其功績亦足與抗戰史冊同垂不朽。今在此追述八年戰歷之際，吾人對我賢明之領袖，更當致最高之崇敬與愛戴，對我忠勇效命及爲國犧牲之將士與同胞，表示無上之感佩與懷念！

此次代表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簽署降書之岡村寧次大將，即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在上海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之日方代表，亦即二十二年長城戰役後於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之日方代表，當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之際，日人正企圖策動所謂華北特殊化，對我方極盡壓迫之能事，其時梅津美治郎爲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岡村任關東軍參謀副長，自均爲策劃主持之人，不意十二年後，日本終因無止境之侵略，自食其敗亡之果，而岡村大將，則以昔年侵略之代表，一變而爲正式代表日本國家向我投降之降將，梅津大將，則爲日本向我中英美蘇等聯合國投降之代表，亦足證強權之不可恃，而公理之終必伸張也。

本人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日，適在重慶，以「勝在那裏？」爲題，延伸爲「爲何而戰？」「爲誰而戰？」「戰勝爲誰？」「勝在那裏？」提出戰勝國風氣與紀律問題及其他有關內政八點，倘與中美同盟五十年之建議，相輔而行，是否能免於失去大陸，雖未敢言，願不至若是之速者也。

本人在抗戰中犧牲之重且大，以日本侵入香港之際，三萬卷圖書一無所有爲其最，未曾得一分一毫之賠償。但

能得到抗戰勝利，任何代價，決非所計。不幸以全國人士不可數計之犧牲代價，贏得勝利，竟未能享其勝利之果實，則國民政府當時還都之初政，值得檢討。合乎「勝在那裏？」本文所要求者，不能謂絕無，然亦僅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今之後，收復大陸，重建中國，而本篇所陳各節，猶足仰供參考，故亟錄於左：

吾人戰勝日本軍閥矣！吾人已確實戰勝日本軍閥，打垮法西斯日本矣！吾人痛定思痛，首應對領導全面抗戰之主席蔣公，致敬崇高之敬禮。對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先生，默念三分鐘。美英蘇現在首長及邱吉爾先生致敬禮。同時不能不對全國人民致感謝支持抗戰勝利之至意，及前後方諸將士致慰勞之赤忱。此外不能遺忘者，文化界及無名英雄奔走呼號，爭國際之同情，懾敵奸之胆魄者，所在皆是，亦在吾人衷心禮拜之列。

吾人勝矣！如問：「勝在那裏？」感極而悟，而熱情之眼淚，鮮有不奪眶而出者。除非大家昧着良心，自承爲幾個貪官污吏而戰，爲幾個土豪劣紳而戰，爲幾個小組利益而戰，爲幾個腦滿腸肥之巨腹賈而戰，則吾人至少須能答下列幾個問題，即「爲何而戰？」「爲誰而戰？」「戰勝爲誰？」「勝在那裏？」

不僅吾人須如此自問自答，而負責當局於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尤須自問自省，使此勝利之成果，公諸全國國民，不爲少數特權階級所獨佔，則筆者敢大咀提出：「天下爲公，與民更始」八個字，以貢獻於最高當局之前，誠如是，則所問：「爲何而戰？」「爲誰而戰？」「戰勝爲誰？」「勝在那裏？」皆有不答而答之明確答案矣。

吾人戰勝之目標爲何？吾人既不以奴役日本人民爲快意，更無戰勝之後，反而奴役中國人民之理。然則吾人戰勝之目標爲何？曰：「子子孫孫永久繁榮強大之保障。」

如何可以達到：「子子孫孫永久繁榮強大之保障？」曰：「天下爲公，與民更始」是爲首着。於是在政府方面，首應注意者如左：

(一) 戰勝國政府氣象。

(二) 戰勝國官員風度。

(三) 戰勝國工作人員操守。

在國民方面，首應注意者如左：

(一) 戰勝國國民心理。

(二) 戰勝國國民風度。

(三) 戰勝國國民水準。

在平時，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自遠而近，或自近而遠，或由外而內，或由內而外，皆爲慣性所支配，有積重難返，事百倍而功不半，革新之難，有如登天。在戰時，貨幣膨脹，物資缺乏，國土日蹙，交通阻滯，人心陷溺，物價日昂，是非顛倒，黑白不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無論在政治、軍事、財政、經濟、金融、交通、教育、社會、文化各部門，無處能滿人望，無處不露破綻，若非戰勝，鮮有不淪爲革命對象者，是以革新之難，較平時尤甚。

惟自戰時轉入平時，尤其以戰勝國之立場，自戰時轉入平時之最短促時間，爲歷史上之黃金時代，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商周漢唐宋元明清八朝開國歷史，與周宣漢光兩帝之中興故事，可爲黃金時代之參考教科書，把握並擴

大戰勝國之勝果，無不事半功百倍者，其祕訣只在「天下爲公，與民更始」八個字。

當此之時，收復失地十數省，一念之差，容易誤入爲少數人找地盤之歧途。形而上應有之百年大計，形而下應有之五年計劃，兩相配合，屹然成爲自上自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百年戰鬥體，轉無人過問。抑或有之，僅爲少數中之最少數，等於鳳毛麟角，安能擴大戰果，把握戰果！

然則爲創造並養成戰勝國政府氣象，戰勝國官員風度，戰勝國工作人員操守，必自開誠心，布公道，勵節操，負責任始，齊桓公忘鉤射而相管仲，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特效劑。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僞。惟天下之至治，能化天下之至亂。草上之風必偃，投諸所往，無不如意。

現代戰爭，以兵器決定戰鬥，以戰鬥決定戰術，以戰術決定戰略。原子炸彈之破壞力，爲戰爭與科學之革命，此利器握在真正愛好和平與爲世界服務習與性成之國家手裏，不可謂非人類之福音。有此兵器，可以贏得戰爭，可以贏得和平，可以決定友軍之行動，不得不提前實施，無觀望之餘地。可以決定敵人除無條件投降外，別無其他思想。大哉原子彈！大哉製造原子炸彈之科學家！

自八月六日美軍公佈使用第一顆原子炸彈，越四十八小時，蘇聯對日本宣戰。再越四十八小時，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再越四十八小時，美英中蘇政府接受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歷史上未曾有之大事，逐一演出，以時計不以日計，任何眼明手快之大政治家，鮮有不作「一切落後」之感。

吾國政府當局，面臨此歷史未曾有之偉大場面，內有統一團結之問題，外有中蘇修好之談判，集內政、外交、交通、軍事、財政困難於一身，欲求每一措施，均適合形而上百年，形而下五年凝結而成之經濟整體計劃之要求，

不無有過度要求之感，然不過度要求，又當如何？

以會師東京之參加戰列部隊而論，至低限度，須具五條件如下：

- (一) 人人有戰勝國風度。
- (二) 有真正卓著之戰功。
- (三) 有良好之裝備。
- (四) 熟悉日本語言文字風俗地理人情。
- (五) 曾與美國軍隊並肩作戰而相互了解者。

政治是否已按此標準選出，用空運輸送適中地點集中。此其一。

日本政府既由裕仁無條件投降，在中國大陸（包括東三省）之日本軍隊與偽軍，均須向中國政府繳械投降。而中國政府須定整齊劃一之步驟，通令遵行，不可自亂統一，轉予投降者以「奇貨可居」之地位。而監視投降繳械之部隊，尤須以空運緊急集中。此其二。

第八節 十六年前曾作善後之建議

收復區之行政長官人選，東四省淪陷最久，善後亦最難，雖各有主席負責，惟因與蘇聯密邇之故，同時又爲日本「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互相虎視之特殊地域，非有威望卓著，關係良好之大員，先期特派，授以全權，飛往海參威或哈爾濱隨同俄軍前進，不易使行政系統早日恢復，如能由莫斯科史宋談判中，予以解決尤佳。此其三。

臺灣淪陷，較東四省尤久，屈指計來，已五十有一年。臺人重見天日，狂喜可知，聞政府亦已內定人員，前往接收，幹部亦已訓練有素，此一着比較有準備，惟應如何創造新氣象，培植新風氣，則事在人為，還須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此其四。

南京、北平兩偽組織，及各地方省市偽組織，統計起來，人數並不算少，當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時，鼠竄失所憑依，勢必多方陰謀生存，而中國政令，又不統一，縱橫捭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府為針對此現實，應有明確公開之不縱不濫政策，分別首從輕重，從天空宣布傳單，以安定人心，勿令地方當局，借此捉放自肥，或故入人罪等行為，釀成恐怖世界，有失與民更始之意。此其五。

對於機械來歸之日本官兵與中國偽軍，於放下武器投降後，應當予以國際法規俘虜良善之待遇，似應通令各軍切實遵行，不可有殺戮報復之行爲，惟未放下武器者，則不在此例，如頑抗者，則格殺勿論。以期普及，又俘虜如何給養管理不令飢餓，俾合人道，尤須早定計劃，確定經費，俾免臨事周章。此其六。

每一城市之收復，於運兵、運糧、運械之外，尚須供給收復區日常用品之米鹽與燃料，是以物資之分配，交通工具之運用，各戰區司令長官與方面軍司令官及後勤部當地省政府須維持最密切之合作，必要時，請求盟軍後勤部予以便利。此其七。

關於收復區之紙幣問題，財政當局須認真考慮財政金融緊急措施政策，配合與民更始之政，使收復區人民重見天日之際，不無物物交換之媒介，受不當受之損失與紛擾。而沒收逆產，補償此項財政之損失，則法無可恕，此其八。

凡茲八點，皆就臨時記憶，與過去體驗所得，置身於接受無條件投降時，可能發生之正反兩面事件，予以設想補救，公開建議於當局，此外無家可歸之難民，無論前方後方，不止盈千盈萬，尤在救濟與善後之列，星一漏萬，在所不免。惟政府當局，如能舉一反三，予以認真周密之措施，再以言論自由，補耳目之所不及，則與民更始之誠意已立，一切無不迎刃而解，再從把握而擴大之，導入政治民主軍事統一之康莊，則所問「爲何而戰？」「爲誰而戰？」「戰勝爲誰？」「勝在那裏？」得所解答矣，惟當局實圖利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早晨四時重慶）

右錄拙作，刊在天文臺報渝版新十六期，是否爲曲突徙薪之謀，未敢自必。惟本書既以「爲甚麼失去大陸？」命名，不能專歸咎于國共談判破裂之後，美國對國民政府軍火禁運及「一筆勾消」政策之錯誤，而本國內政措施包括軍政財政在內之未能盡如人意，亦有不能辭其咎者在。祇歸咎美國，不批評自己，不足以開執美國朝野人士之口，但過度苛酷批評自己，容易流入爲敵人張目，非計之上者也。是篇插入，在距今一十有六年之前讀之，不失爲善意建議。在一十六年後之今日讀之，謂爲饒有客觀總評意義，未嘗不可。凡事舉其犖犖大者，不願一一吹毛求疵，徒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同時抑或以證毋謂衆人吾謀適不用，想讀者當能鑒茲苦衷也。

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遍於全國之後，中國人民因歷受儒家洗禮，以德報怨，充滿於每一中國人民心坎之中，故對日軍無任何之報復，此則中華民族美德堪以自豪者也。而日本佔領軍官，亦知侵華理屈，自反而不縮，痛自懺悔，但能保持命令與秩序，亦未可低估。證以上海彈丸之地之所表現，舉一反三，不難思過半矣。

蔣伯誠上將奉派爲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駐滬代表，亦抗戰史料之一。何著：八年抗戰之經過，未曾敘入，用特

補誌於左：

上海自得日軍投降消息後，舉市歡騰，日軍則皆垂頭喪氣，一改往日驕橫狀態，於是街頭見日軍走過常有被投石漫罵者，記者親見以西瓜皮擲在日軍頭上，而該日軍人作俯首以避不敢計較。彼時上海雖有偽警，然似難控制，幸而重慶發表蔣伯誠為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駐滬代表，派何其鞏為駐北平代表，電報到滬，人心始定。時蔣伯誠因在滬地下工作已久，血壓高，又被日人破獲，患中風病，幸得日醫治好，但仍臥床，既得渝電乃即成立委員長代表公署，聘黃伯樵、李北瀾兩人為祕書，主理一切。旬日後，日軍統帥岡村寧次在南京特派駐滬之川本少將代表，隨帶副官繙譯等趨轅正式拜謁致敬，當由蔣代表接見，坐于床上，由黃李二人傳話，先囑川本少將轉達岡村總司令兩事：一、所有各地治安，在中央軍隊未到以前，仍應由日軍負責維持；二、中央軍隊陸續派赴各地隨時有中央命令或何應欽總長之命令傳達，否則任何隊伍前來，日軍不得讓路換防。其時已聞江北之新四軍有蠢動過江消息，並令日軍注意。川本唯唯，旋由其代陳岡村總司令之意：一、此次承中國蔣委員長之寬大，謹代日本軍民表示感謝；二、中國之大患為共產黨，此後有須日人相助之處無不竭力效命；三、中國今後復興端在工業，查日人在華所辦各種工業，卓有成績者甚多，而技術人員均係優秀分子，甚願中國接收時，速此等技術人才與各機關原盤接收，同時繼續轉運，俾可工作不致停頓，蓋有許多重工業或鑛井工作不可中途停止，否則雖只停數小時，即會招致重大損挫，有莫大之損失，此層務請注意，不獨敝國一部份技術人才可免回國失業，而於貴國工業前途不致凌亂損廢，關係重大務祈轉致中央是幸。以上一席話蔣代表用專電轉致重慶，詎是時重慶方面充滿勝利氣氛，且以為日人技術已落後，此議不值得研究置之不理，但後來各處重工業機構接收，果然凌亂不堪，言之可痛。

第十章 毛澤東來渝故作和談姿態

第一節 中共擅發七道命令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秋，當美國以原子彈擲擊於廣島長崎之後，日本投降之說，已經播傳，中共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名義，即於八月十日由延安發出命令於其部屬，其原文曰：

「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基礎上，將會商投降辦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出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及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之保障。

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部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繳出武裝。

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收，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

「八月十一日延安總部又連續發布六道命令。命令「晉綏解放區」賀龍同志領導的武裝部隊，「晉察冀解放區」聶榮臻同志領導的武裝部隊，「冀熱遼」的武裝部隊，向內蒙和東北推進。命令「山西解放區」的武裝部隊肅清同蒲路沿線和汾河流域的日偽軍。命令「各解放區」的武裝部隊向一切敵佔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迫使日偽軍投降。（以上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三九頁）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佈投降，中共以朱德名義，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其簡旨如下：

一、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投降協定，和約時，須事先和「解放區」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商得一致意見。

二、中國「解放區」淪陷區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投降辦法，接受所包圍之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裝材料。

三、「解放區」及淪陷區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派代表，參加接受敵人的投降，及處理敵人投降後之工作。

四、「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選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五、請蔣委員長制止內戰，其辦法是「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投降。國民黨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國民黨軍隊受降。

六、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一切政治經濟等民主改革。

上述中共朱德所發布之七道「命令」，與六項要求，其目的在於收繳日偽武裝，佔據要衝，把持交通，以自固其佔據地盤。尤其依附俄、蒙軍割據東北及熱、察、綏各地，不但違抗最高統帥命令而自由行動已也。況復以民主為幌子，以聯合政府名義政治鬥爭手段出之。總之，此係顛覆政府，攘奪政權之陰計。

第二節 參政員組團赴延安訪問

先是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六月下浣，國民政府依照國民黨六全大會所通過之辦法，擬派定七人委員會之延安訪問團，包括國民黨、民主同盟，及無黨派人士，以與共黨談判。據「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之白皮書所載：

「政府致書毛澤東及周恩來，提議由七人委員會與中共商討國家之武裝勢力之統一問題，以便快速擊敗日本。政府同意承認中共爲一政黨，但拒絕承認中共爲一武裝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而中共之延安廣播，『語頗挑釁，且表示不願參加七七所舉行之國民參政會，及稍後十一月十二日將舉行之國民大會。』然而政府所收到之毛澤東、周恩來之答復，則謂：『中共願與政府恢復談判。』」

「赫爾利大使報告其國務院稱：『中共上述兩歧之作法，企圖促使國、共兩軍發生衝突，係毫無疑義者。』」

該七人委員會於六月廿七日訪晤赫爾利，告以延安訪問團之成立，爲在討論中國統一問題，七人皆由參政會所遴選，兼請大使予以協助。

赫爾利答云：「本人建議——委員會應檢討國、共雙方在過去六個月來所有雙方提出之建議及對案，設法由此中產生一雙方均可接受之方式。本人樂於供給飛機，本人希望各黨派捐除各自之身份，而以純愛國人士立場謀求統一民主之中國。」

中共駐渝之王若飛向赫爾利提出謂：「周恩來會要求政府接受彼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所提出之四點計劃。」赫爾利答稱：「政府已由北方撤出軍隊約六萬之衆，言論出版皆有相當自由（共黨報紙已在重慶發行），爲應付

保密起見，秘密警察乃戰時必需者，美國之聯邦調查局，英國倫敦之首都警察廳亦有擔任此項工作。」

按七人委員會——延安訪問團之選道前往，當時實基於政府祈求中國和平統一之真誠表現，以為由第三者之愛國人士，出而斡旋，使商談周轉靈活，不致僵持或甚至破裂，具見各方之一片苦心，其能否和洽成議，則全視乎中共如何耳！無奈中共一心以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為其唯一目的，故此縱使政府委曲求全，卒至空勞跋涉，無補於事。此豈訪問者之所能為力耶？實中共又施其一體兩面之故技。歡迎之來，以見中共之樂於談商，企求和平。不參加全民黨之國民大會，而必欲成立一黨團少數人之政治會議，以爭取其共黨之控制。其不為國民著想，而但為其一黨私圖而堅持，居心尚可問乎？

參政員褚輔成、左舜生、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王雲五等七人，組織「延安訪問團」。由赫爾利聯絡雙方，中共表示歡迎，赫氏乃安排交通工具，於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七月一日，直飛延安。臨行，王雲五因病未往，赫氏殷殷致意於訪問團，希望能為國共合作開一蹊徑。而中共駐渝代表王若飛亦同機陪往，以表迎接之意。

參政員駐延安五天，舉行會談二次，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為議題。中共方面則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祖涵、葉劍英、張聞天等出席。雖雙方談論，未著邊際，但為後來產生政治協商會議，及毛澤東赴渝，實做其鋪路工作。訪問之談話紀錄，既乏實際結果，惟左舜生先生則有如下一段記載：

「當我們飛機轉過秦嶺一萬四千公尺之高空而抵達延安機場的時候，共方人物，如毛澤東、朱德以次，幾乎是全體出迎，態度相當親切。機場一些沒有戒備，有二三百個老百姓，都遠遠的站著，以好奇的眼光，歡迎我們這一

羣自天外飛來的遊客。還有幾個小孩，看見毛澤東走來，高舉右手，叫一聲毛主席。我還是廿年前和毛在上海見過兩面的，沒有想到他居然有了這一股子神氣。看了那樣一種排場，我腦子裏忽然聯想到另一位老朋友——宋公明先生。」斯尙在日本投降前事也，惟其結尾聯想云云，誠有深長意義堪味焉。

第三節 毛澤東抵渝

褚輔成、左舜生等延安訪問團，於七月五日飛回，其洽談結果，僅携來中共之新提案一件，據當時政府宣傳部部長王世杰稱：

「該新提案主要包括下列二點：

一、政府取銷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之議。

二、政府召集一政治會議，以平等基礎，由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主同盟各派三人，再由獨立之政黨或組織選派三人，共同組成之。」

赫爾利報告其美國務院稱：「此係共方等待宋子文在莫斯科會議結果時，拖延時間之辦法。」

「中共爲蘇俄政府之工具」——此一語爲赫爾利到任伊始，蔣委員長所面告赫爾利者。而赫氏偏聽莫洛托夫、史達林之面告——中共非隸屬於蘇俄之真正共產黨。一、不援助中共；二、不望中國有內戰或其他內部糾紛，願與國民政府保持和諧關係；以否定蔣委員長之見解。惟七人訪問團飛赴延安之日，即宋子文由美飛往莫斯科之日，迨訪問團七月五日返至重慶，而宋子文尙在與史達林、莫洛托夫洽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至七月十二日因史達林

欲於十四日赴波茨坦出席會議，宋氏先行離莫斯科而回渝。若謂中共係等候莫斯科會談結果，則俄共與中共原屬一體，不過幹枝之分，其所以貌離神合者，是即共產黨故示對立矛盾以欺世者，赫爾利調停實頗費精力，但腦中有先入史、莫之說之毒，致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於彼者，彼認為不適合而棄置不用，遂至一棋之失，滿盤全輸，可勝慨哉！

此七月中事也。旋不一越月而日本投降，俄軍在東北，即揭開其假面具，竭盡可能使中共擁有東北。而中共一面賴俄軍之掩護，裝備，迅速進兵東北，佔據地盤，擴充軍隊，獲得武裝與物資，與俄軍聯系一氣，以阻撓國軍接收東北。一面藉赫爾利之調和，作為拖延時間擴展地盤討價還價。當時國民政府為表示與中共誠意談商，曾以三次電邀毛澤東來重慶面談。亦經赫爾利之安排，於八月廿七日由赫爾利偕張治中先飛延安相迎，以翌日毛澤東偕迎接者安抵重慶，即下榻於上清寺松園（或作喻園）張治中宅。據目擊其事者云：毛澤東甫抵張宅，主人照例獻茶。毛氏似不經意，失杯落地。或謂毛氏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氣概。何至有此未聞雷先失箸之失常耶，此為毛氏訪問重慶趣事之一，或較雙十會談為更引人入勝者也，故附於此。

毛澤東駐重慶計四十一天，至十月十一日仍由張治中陪同送回延安。

毛澤東在重慶正為統一中國政令軍令而商談，赫爾利大使忽有回美述職之行，是時，雙方談判之已達成協議者，據美國白皮書記錄：

- 一、雙方同意合作建立一民主之政府，以從事中國之建設，並防止內戰。
- 二、雙方同意擁護中華民國主席蔣委員長之領導地位。

三、雙方更同意孫中山之主義，並合作建立一強大而民主之政府。

四、共黨同意承認國民黨爲控制政府之支配黨並願在由現行政體進入民主政體之過渡期間內與之合作。

其他如地方政權及軍隊之數量與佈防，未達協議。惟此會議將繼續舉行，毛澤東仍留重慶，蔣委員長向毛氏以人格擔保彼等一行之安全，並同意如毛氏等不願開會，蔣委員長可隨時供給交通工具送彼等返延安。

赫爾利以談判中細節過多，須由雙方當事者詳細耐心討論。但經雙方留駕，原定於九月十八日起程回美述職，乃延至九月二十四日方始動身。

第四節 毛澤東堅持「紅軍」獨立劃區統治

赫爾利爲毛澤東來渝謁見蔣委員長之原動力。毛澤東來渝與蔣委員長面對面商談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又爲國共協商之高潮兩者不可以分。只記毛澤東而略赫爾利，或只記赫爾利而略毛澤東，皆失之於偏，本人遍覽中外有關此類戰籍，破爛朝報，赫然在目，求其如董穎光博士所著英文本 蔣總統傳之具有國際高度出版事業水準者，百不得一。該英文本 蔣總統傳，語無虛發，事皆足徵，繁簡適中，足垂百世。關於赫爾利致力國共和談經過敘之特詳，爲世界任何戰籍之所未有。茲逐譯是書第二十八章以「勝利與共產黨變亂」(VICTORY AND COMMUNIST REVOLT)爲題中之一段如左：以證赫爾利對於中國之統一強大繁榮，確具無上之熱情，惟其智慧不足以副之，故爾後雖以去就爭對華政策之重訂，甚且以貝爾納斯國務卿書面訓令與口授內容前後不同而憤然辭去駐華大使一職，而尙未能喚醒美國朝野人士之注意，謂非美國痼疾而何！

在日本投降之前，赫爾利竭盡全力試探重慶、延安戰時協定之可能性。自從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王劉會商破裂之後，赫爾利前往莫斯科，實在莫斯科得到蘇俄居間協助以打破國共僵局。他發覺史達林在那時雖保證勝利，惟對於有關中國共產黨問題，顯然表示冷淡態度，見莫洛托夫時亦然。莫洛托夫重申共產現行路線，矯稱：中國共產黨乃是土地改革者，利用之以欺騙美國。赫爾利在莫斯科因無所得。

當赫爾利大使離華之前，曾一再致力於聯合計劃。日本投降之後，美國國務院一再勸請蔣委員長試與毛澤東作一度面談。因而疊發三電邀請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討協定的可能條款。最後毛澤東同意前來。赫爾利及張治中相偕飛往延安，陪同毛澤東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飛來重慶。

是次蔣委員長與毛澤東面對面會談乃一十有八年以還之第一次。毛澤東留重慶凡六個星期，與蔣委員長商談。當次一級會議舉行時，張羣、王世杰、邵力子為政府代表，周恩來、王若飛為中國共產黨代表。

赫爾利率領毛澤東與政府直接談商。嗣後赫氏告政府與共產黨代表曰：伊定於九月二十四日偕返美國述職，並表示希望雙方能於是日以前達到協議。

此會談直至赫爾利預定離開重慶回國是日之早晨猶在僵持中，赫爾利座機於九月二十四日起飛之前，偕同張羣守候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諾。祇須毛澤東同意，所準備之聯合公報便可宣佈。但是諾終未實現，赫爾利起飛返美，他的使命尙無結束的後果。

毛澤東致赫爾利函，祇要求赫爾利展期至伊目覩毛氏安返延安時返美。蔣委員長對赫爾利保證毛澤東安返延安。但是毛澤東堅持赫爾利須給彼以書面保證。赫爾利甫離重慶。共產黨對彼大肆攻擊。赫爾利良心，致力於予共產

黨以公平交易，但共產黨無助於中，只有接受他們的全部條件，才能使他們滿意。

總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間四十有四日的間歇性談商，總兩利所促成者，僅有左之一點：

「雙方同意，必須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並共同認蔣主席所倡導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等，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但協議範圍並未伸展至於中共武裝部隊之合法化與中共控制地區之行政權力。關於右舉的目標，中共堅決要求如左：

(一) 中國共產黨及地方獨立武裝集團，務須參加軍事委員會及所有分枝機構。

(二) 現在所有各級官吏於改編後予以加委照舊領導其原有部隊，退除役軍官須由政府給予訓練。

(三) 在「解放區」所有軍事單位一律編入地方防守部隊。

右之要求，與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大相逕庭。不過使中國共產黨之私有武裝部隊合法化而已。蔣委員長現實的以此爲談商之要點，堅決拒絕接受紅軍在國民政府中佔有特殊權力。

蔣委員長就其立場發表談話如左：

「在國家國境之內，絕對無私有的部隊，更不許任何政黨保留有武裝部隊。只有武裝部隊不再受私有利益及個人利益指揮之際，不再受政治黨派私有志願之保護，國家統一才有保障。」

中國共產黨部隊在國軍中應保留若干爲一最顯著的問題。共產黨始要求保留四十八師，稍後同意減少至四十三

師。赫爾利大使居間折衷曾建議於蔣委員長核准編爲二十或二十四師。蔣委員長重提舊事告赫爾利曰：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月，獨山未失陷之前，共產黨祇希望得到十二至十六師的軍隊番號。

蔣委員長又曰：假使共產黨接受一切條件，伊可勉予同意共產黨擁有二十師的尺度。此非一新穎而又不現實的事件。蔣委員長飽經政治變故，鑒於中國因受私有軍隊不斷所加之禍害而延阻其進步。彼雖削平軍閥之割據，但實現三民主義之工作，終因之梗阻多年。迄今彼又重親來自共產黨所加於中國將來之威脅，更有甚於昔日軍閥之挑戰，彼不能與其相調協者以此。

經過與毛澤東、周恩來之全般會談，國民政府深覺共產黨武裝部隊之隸屬問題，爲無法克服之障壁。共產黨用歪曲及游移不可捉摸的態度，如璣之無端，以建議代終結，該建議意味着中國紅軍繼續維持其獨立性。

關於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行政問題，中共代表堅持保留共黨行政的獨立統治，如在陝甘寧邊區已經建立者，及其他十八「解放區」。這等要求經歸納後形成左列建議之形式：

- （一）政府派遣共產黨所指定者爲陝甘寧邊區、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等省主席及委員廳長。
- （二）政府派遣共產黨所指定者爲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省政府爲副主席及委員廳長。
- （三）政府委派共產黨所指定者爲北平、天津、青島等特別市副市長。
- （四）共產黨得提名參加西北各省政府之行政人選。

右列四種建議，顯然不是政治民主化的計劃，而乃共黨控制地區進一步合法化之詭計。

凡茲要求，不難一望而知共產黨的真正企圖。只有妨礙統一，製造混亂，加速中國政治與軍事全面之分裂。爲

共產黨此等狡猾要求所弄僵，因之，四十有四天之馬拉松談商毫無結果而散。

此次談商唯一成果，雙方得到一個協議，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作爲常設機構，爲未來之國民大會制訂國家新憲法而作安排。這談商彼此協議而閉幕，毛澤東遂於十月十一日過返延安。

和平協商雖繼續舉行，但在各戰略要區之共產黨武裝部隊陰行從事叛亂。舉一個例，揚子江以南之紅軍立即集結於蘇北。

隨毛澤東回抵延安之後，共產黨展開全國性叛亂。澈底破壞交通線，阻礙國軍前赴魯南、豫北、晉南山海關等處接受日本投降，企圖包圍駐在綏遠的歸綏及包頭的國軍。循環式之災難，因之開始。

第五節 毛澤東會晤魏德邁

毛澤東在渝期間，曾與中央方面會談五次，其態度平正易與，一反桀驁氣概。其間曾偕周恩來同訪魏德邁將軍於魏氏寓邸，茲錄魏德邁回憶錄中之記「毛澤東周恩來談話」一節於次：

「在重慶我（魏德邁自稱）的家中，與毛澤東周恩來談共產主義，我問毛周二位說：『爲什麼你們和你們的黨徒，不能由你們自己主動及不採取外國的主義？來完成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極佳目標。』周恩來答道：

「中國的解放者不能與社會主義國家相分離，也不能無國際無產階級的助力。」魏氏又問道：「然則你們必須獲得蘇維埃聯邦的助力？」周氏復毫不猶豫而答云：

「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蘇聯的助力，美、英、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的助力。否則，我們不能推翻小資產階級的

獨裁政權而獲得勝利。」

此時毛澤東惟靜聽而未發言，忽有一女性譯員插口道：

『中國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中不可或缺之一部。我們必須爲中國的政治、經濟革命而奮鬥。』

至此魏德邁提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在中國，蔣介石及他的政府也曾努力，達到同樣目的云云。而毛、周二氏均不表同意。魏氏續言：『共產黨在未得政權前，似乎是人道主義的建設性。及其既得政權，變爲騙人的陷阱，剝奪了人的自由。』語至斯，周恩來似欲啓口，魏氏故作不見而續謂之曰：

『共產黨爲了獲得政權，所用的方法：說謊、威脅、謀殺、剝奪、奴役，造成了共產黨奪取政權及維持政權的招牌。』

周恩來感覺激動，乃慢慢地說出一句：『這個世界反動勢力太大了！』繼復引申列寧的話：『無產階級必須繼續鬥爭，反抗資本主義，一直到資本主義，全部消滅爲止。』

待毛、周及譯員辭出，魏氏立即紀錄，以證實史迪威、赫爾利、甚至馬歇爾認中共係爲爭取中國人民的利益而非國際共產黨之同路的錯誤觀念。」

另據魏德邁回憶錄，其中於不同時間，而與中共相接觸之事件，又記其對日反攻計劃中，擬進攻東海岸，要求中共同時在華北對日軍施壓力，使日軍無法南調。中共方面贊同魏氏之議，但中共却提出條件，需索器械、槍砲，及軍需先行運到延安，始肯照辦。

「某次，中共延安疫病流行，魏氏立於人道立場懇請蔣委員長撥給醫藥十一噸給中共，以急救華北的民衆。又另一次，毛澤東忽提出邀請魏德邁爲中共軍隊的總司令，語似誠意且表示鄭重而懇切。魏氏自謂不解其用意所在，但立即予以禮貌而和諧拒絕之。魏氏答中共方面，謂：『我就任中國戰場總司令，在同一戰場同一中國，我但知執行我所奉到之命令，是竭力支持中國國民政府。』」（以上見魏德邁回憶錄）

由是以見毛澤東在重慶，雖僅六周時間，其所進行之手段，單就魏德邁而言，則其技術之險毒狡毒，亦可知之矣。至其以不同時間與魏德邁所商酌者，更見其一行一言，靡不出以刁詐刻厲，甚矣，難乎其與共產黨人之商談，苟非語語警惕事事防範，其不墜其陷阱者幾希哉！

第六節 毛澤東三呼蔣委員長萬歲

國民參政會中，原有共產黨參政員：如毛澤東、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王明（即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徐特立等。毛澤東到渝後，國民參政會因係同事，乃由主席團張伯苓、莫德惠、吳貽芳、王雲五、江庸等發起招待毛澤東茶會。按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民國廿七年七月七日，原爲團結全國各團體各黨派一致對日而設，等於戰時之國民議會，每年開會二次，而中共參政員，初則部份不出席，繼則全不出席，僅由董必武一人作爲點綴場面而出席，其實爲搜集情報資料而已。

國民參政會原借軍事委員會大禮堂爲會場，此次招待會約到參政員二百五十人左右，毛澤東由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陪同蒞場，經大家寒暄握手，即由王雲五致歡迎詞，旋請毛澤東講話。毛氏之言簡單無幾，惟時因欬嗽而暫停

，及毛氏語畢。乃高聲向全場云：「讓我喊——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喊時高舉右手，身軀向上高聳。當時在場之人，無不爲之激動，愈以爲毛澤東此來，抱有誠意合作之衷忱，尤以蘇聯大使最爲確信而不疑。此毛澤東表現絕好演技之一次也。（以上見參政員陳紀澄記「參政會招待毛匪之一幕」文內）

「當毛澤東於返延安之先一日，張治中亦假軍事委員會大禮堂歡送毛氏，毛氏出席致答詞並表謝意。其面色蒼白，聲音急促，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三聲而去，當時我（按陳啓天自稱）在場，親見其怪狀，感其言不由衷，後患堪虞。」（見陳啓天「政治生活的回憶」第五章）此爲毛澤東表現其絕好演技之又一次也。

「十月十日晚——毛澤東離渝的前夕，在重慶大樑子一個戲院，毛澤東陪同蔣主席及中外顯要看平劇，戲貼羣英會，演畢時毛澤東起立欲行，向蔣主席及諸在座者道別畢，遂振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三聲而離院。毛氏於戲劇中而作其戲劇性表演，而高喊萬歲之頃，抑若具有無限熱誠，此毛氏表現其絕好演技之另一次也。」

第七節 毛澤東破壞「雙十會談紀要」

毛澤東在渝四十二天，其與政府所會談者五次，至十月十日發表「雙十會談紀要」，其重要事項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甲、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

第二篇 第十章

第六節 毛澤東三呼蔣委員長萬歲
第七節 毛澤東破壞「雙十會談紀要」

乙、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 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三)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

關於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憲法草案等問題，未獲協議，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 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共提出政府應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區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之下，中共原由現有數目縮編爲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並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臨海以北及蘇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正在進行，對於中共軍隊縮編爲二十個師，可以考慮。「爲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五) 關於受降問題：

中共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共軍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

毛澤東離重慶之前一日發表演說，依中共新華日報十月九日的記載，有如下語句：

「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爲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

「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以上錄自「蘇俄在中國」第一三九——一四一頁第四章第六節「毛澤東的重慶會談」，其結論云：

「毛澤東口頭上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麼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餘了。」

按「雙十會議紀要」，「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所紀述者係重要之點，（從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重予補正，藉可窺其全豹）

（六）關於人民自由問題：

一致認爲政府應保證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所享受身體、信仰、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的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七）關於黨派合法問題：

中共方面主張：政府應承認一切黨派平等合法地位。

政府方面主張：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爲憲政常軌，今即可承認。

（八）關於特務機關問題：

第二篇 第十章 第七節 毛澤東破壞「雙十會議紀要」

雙方同意政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九) 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中共方面主張：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

政府方面主張：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人員提出名單。

(十) 關於地方自治問題：

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十一) 關於奸偽問題：

中共方面表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政府方面表示：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懲治漢奸以法律行之，解散偽軍更須妥慎辦理，以免影響當地治安。

(十二) 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

中共方面主張：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

政府認爲「解放區」名詞應成爲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

中共方面又提出方案：依照現有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及行政區，並即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統一。

政府方面表示：重劃省區變動太大，必須統盤籌劃，非短時可決定，茲依據蔣主席向毛澤東表示：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以後，中央可考慮中共的推荐人選。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成績與能力，酌量

使其繼續爲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

中共方面復提出第二種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的人員爲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六省，以中共推選的人員爲省府副主席。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委任中共推選人員爲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容許中共推選人員參加行政。嗣中共方面，又就上述提議修改重提：

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爲陝甘寧邊區、冀、魯、熱、察四省。

請委任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爲晉、綏兩省。

請委副市長者：爲平、青、津三特別市。

政府方面：認爲中共此種要求，並非真誠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但中共在政治上具有能力的人員，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如由中共推薦某某主席、副主席等似欠合理。

中共方面再提議：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方案：即由「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投票，在政治協商會議，派員監督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回鄉參加選舉。凡一縣有多半鄉區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縣級民選。凡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省級或行政區級民選。選出的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的統一。

政府方面表示：此種省區加委方式，亦非謀政令統一辦法，惟縣級民選，須待憲法頒佈，省的地位確定後，才可實施。目前祇由中央任命省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得恢復常態。

中共提第四種方案：「各解放區暫維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秩序的恢復，同時中央可將此項問題交「政協」解決。

政府方面：認爲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應爲和平建設之障礙，仍盼能商得具體方案。中共當亦同意商談。

中華民國卅四年國慶日於重慶。

雙十會議紀要簽署者爲王世杰、（下留空隙備張羣補簽）張治中、邵力子、王若飛。

當毛澤東未至重慶之前，彼對其部屬作「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對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之講話——略稱：

「我們（毛自稱）『解放區』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國民黨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土必得』；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反我亦反，他停我亦停』，『他們（指國府）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按毛澤東以本身之「寸土必爭，寸權必奪」，以其自己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而其語則先加之於國民政府，而意謂：彼乃被迫而由此。殊不知國民政府爲合法之正統政府，固何用其「奪權」與「爭土」。中共不特不抗日，反假抗日之名以側擊國軍之抗日部隊，事實俱在，豈容諱飾，況復十八集團軍之番號，亦純出於抗日而始畀予，奈中共儼然成國軍一部之後，竟不抗日而轉襲國軍，迨日本將降，俄共進軍，毛氏自得蘇軍蒙軍之助，造成有利地位，蓋其言，只知有其「共產黨」，豈尙知有國家耶？

第八節 毛澤東供認叛國

「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出去打，敵僞就不繳槍。蘇聯紅軍來援助中國人民驅逐侵略。這事所發生之影響還是無可估計的……假如原子彈能够解決戰爭，爲什麼還要請蘇聯出兵？爲什麼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毛氏歸功於俄共，就其本身言，尊崇其主子，然而事實豈若是乎？若謂中共出兵而僞滿軍始肯繳械之說，僞軍豈有抗繳事耶？何歪曲乃爾！

「我們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敵人三次圍剿之後，江西中央區聯合起來只有廿一個縣城，但只是僻小城市，依靠著這些，奮鬥那樣久的時間。現在，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目下我們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眼前形勢顯然壯大了，與前不同了。國民黨要建國，我們就是爲了『建什麼國』的鬥爭。」

「赫爾利大使。要我們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我對他說：「我們要自由自在，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

「國民黨黨棄抗戰勝利的果實，我們要發動全國性規模的內戰，但國際國內的形勢，可能把內戰暫時限制於局部範圍，必須都要準備好。」

按毛澤東囑咐其部屬作「國內鬥爭」，即使國民政府是建國，中共亦必起而鬥爭，且命令「發動全國性規模之內戰，」此無異於自認：「我將赴重慶會談，會談亦係國內鬥爭之一種手段，我之如何說法可以不必過問，但黨內軍隊必須準備內戰。」所謂「內戰」者，乃中共向國軍進攻之謂，蓋當時國民政府既准許中共部隊爲抗日部隊，稱

之爲「第十八集團軍」，則斷無向中共攻擊之理。中共如服從最高統帥命令，自應靜候調遣，奈該共軍一聞俄軍進入東北，急不及待，火速隨之而開往東北，更提出六項要求，如此跋扈，顯然係執行毛澤東所謂「發動全國規模之內戰」之命令。觀此紀述，究竟係中共造反作亂歟？抑顯懷懷奪政權歟？誠恐國人入毛氏之說而不察，故指而出之。

上述摘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篇」在民國卅四年（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時在日本八月十日宣布乞降之後，八月十四日正式投降之前一日也。

至八月廿六日毛澤東將赴重慶之前二天，毛氏通知其共黨全體，其略謂：

「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廿二日三次電邀毛澤東前往重慶進行和平談判。該時日寇投降，整個形勢改變，國民黨壟斷了整個受降權利，但在華北方面，我們要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鎮等處。我軍配合蘇軍、蒙軍造成了我黨有利之地位。」

「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儘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道清路。切斷北平、山海、膠濟、平漢、滬甯、津浦各鐵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暫時也好。同時使用必要力量，廣佔鄉村和府城縣城及小市鎮。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間的許多縣城，和江淮間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好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份，察熱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上開云云，係毛澤東於將離延安赴重慶之前，安排其軍事佔領，爭取受降，以擴大其地盤，增加其實力。即作

爲一面會談，一面打仗之企圖，則可見其赴渝會談，完全爲一種僞裝和平，以給美國醉心於國共和談而受其玩弄，藉會談以掩飾其侵入東北，佔據華北。假軍事侵略，以爲會談之討價還價之張本。甚矣！毛氏之刁蠻也。且毛澤東別有企圖，以爲「國民政府受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假如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後，我黨應學會合法鬥爭之一切方法，加緊在國民黨區域的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在談判中，國民黨必要求我方縮小「解放區」的土地，「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我發紙幣，我們必要予以讓步。

基上紀錄，則毛澤東在會議前，已有此項準備，其目的意欲打擊國民政府之主動地位，使中共能獲得國際輿論之好感，和博得各黨派之同情。所謂「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之原則。吾人於事過景遷之後，中共實乘日本投降，蘇俄進兵之便，遂崛起而作其稱兵造反之舉。觀其對軍事之佈置步驟，與將赴重慶談商，純出於兩歧，其實皆出於擾亂顛覆之行徑，乃一體之兩面手法。使一面讓華受降權利，竊據地方政權；一面則高呼萬歲，以卑躬求和態度以欺世人，其計之狠毒與狡詐，孰有高於斯者，即翻古今中外歷史，似找不出若是先例，窺其用心，真可謂黃巢不丈夫矣。

以上乃毛澤東將往重慶之前之準備，簡言之，重慶會談是一件事，中共「全國規模之內戰」是另一件事，故在毛澤東四十二天之會談中，東北、華北、蘇北、淮北等全面展開對國軍攻擊。及至十月十一日毛澤東安返延安，即於同月十七日中共召開幹部會議，毛澤東之報告詞，節稱：

「國共兩黨在重慶會談，其談判結果，已在報上公佈了，但「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解放軍」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其已經達協議的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和平這一條雖寫在協

定上面，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實現，現在有些地方的打仗，打得相當大，例如山西的上黨區、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那個腳盆中有魚有肉，閻錫山派出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這樣的仗，還要打下去……」

試觀毛澤東於未離延安前，早已作軍事步緒，故會談之間中共之進攻，與會談後之益加劇烈，其欲奪取政權，顛覆國民政府，毛氏固毫不遁飾，其所以蔑視國民政府，實出於國民政府該時處於孤立地位，因美國未考慮建立中美軍事同盟故也，假使有新中美同盟，則雖屬內戰則軍需裝備之補給不虞缺乏，國軍之士氣提高，中共則畏懼與顧慮交并，其尙能若是胆大妄爲耶？而國軍亦不致因美國之居中斡旋，而束縛其手足矣。且毛氏指「雙十會議紀要」爲「紙上東西」意謂紙上東西，任他如何，中共必須得到現實權益，由是可知與共產黨簽訂任何條約，及與共產黨商談若何事件，均屬「手持太阿，予人以柄」，不徒無益，更自束縛耳。

毛氏又稱：

「國民政府從來不肯承認我黨（中共自稱）爲合法與平等地位，現在只好承認了，我們『解放區』的工作，已影響到全國，全世界了。……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我們拿『雙十協定』（即會議紀要）堅定要國民政府兌現……這『紀要』上說要和平團結，而實際上在打仗，就把他們（指國府）澈底消滅……我們爲了解決『爭取和平』，要『和平』就打。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引伸毛澤東之言，係一面用「雙十會議紀要」壓迫國民政府實踐，而其自己則任意攻城略地。并且必至國民政府被消滅而後始休。

至於毛澤東對其幹部解釋「雙十會議紀要」稱：「我們對這『會議紀要』爲什麼要讓出八個『解放區』？（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中共軍根據地。）我以爲讓出爲好，使在全國人民面前及全世界人民面前，知是中國共產黨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是好戰的，我們忍讓一步，正所以是談發展。」

「這次我去重慶去得好，可是國民政府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談判的結果，國民政府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如果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及全世界面前輸了理了，我們的理由是自衛戰爭。」

此一段話，毛氏對縮小其佔領地區一點，指明乃「以退爲進」方法，而將中共自己所發動之戰爭，冠以國軍來進攻之帽子，其言雖巧，識者孰不知其狡計。試將毛澤東未赴重慶前之布置，及其既至重慶後之舉動，與「會議紀要」中毛氏對地方政權以軍隊國家化兩問題，堅持不稍鬆弛，直至其返延安後之談話，前後與之對照，自可恍然於共產黨之商談、簽約，顯屬一無好處，今日猶有人欲與共黨和平共存者，鑑此紀載，其亦知所警惕也乎！

本篇紀載，自民國卅四年八月至同年十月，係紀毛澤東到重慶，及未來前之若何準備？既來時之若何情形？既返後之若何作爲？與夫簽訂「雙十會議紀要」之若何協議？并及政治協商會議之若何產生？瞻其前，顧其後，察其中，其玩弄之伎倆自可推究，尋索以得之，不再贅辭。

惟正當毛澤東在重慶會談而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之時，適在日本正式投降之後二週，觀乎朱德於日本投降消息透露之日，於八月十日十一日兩日之間，即急不及待，搶先發佈命令至七道之多，又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至毛澤東於八月廿八日抵渝之日，中共部隊已從多方面進入東北，與俄軍會合滙流，東北遂淪於中共之手。

凡此皆在同一時期，故表而出之，先述毛澤東之會談，再紀東北之攘奪。篇章雖分，其所進行者則適在兩線進行。一則持其經典，一則奮其實劍，其亦一體兩面，縱橫捭闔之技也歟？試觀下列接收東北之事實！

第十一章 蘇俄藉參戰與中共滙合

第一節 俄軍三路進入東北

蘇俄利用其進兵東北之機會，立即與中共軍隊取得聯系，滙合而成巨大之洪流，並培養中共將東北發展爲一強大之軍事基地。蘇俄之行動，概括言之，其扶植中共攘竊東北，有下列三階段之方法：

一、蘇俄阻撓中國接收東北；

二、與中國討價還價；

三、把東北交與中共。

蘇俄在東北之如此行動，早在美國總統之「執行祕書檔案」中。於「雅爾達會議紀錄說明書卷」內，所有敘述蘇俄對華政策，其原文曰：

「有人已經提及，惟恐蘇俄利用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及華北，建立一獨立、自治之管區。蘇俄官方，目前表示之態度，並無可以證實此種憂慮之虞。然而，假如蘇俄參加遠東戰爭，或國民黨與共產黨公開分裂時，蘇俄極可能放棄其一九二四年所宣稱：不干預中國內政之政策。」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如此記載，必有其可信佐證，茲果於參加對日作戰，進兵東北，遂得實行其決策，終得逞其慾望。

至於美國對華政策：則僅爲「協助中國建立一堅強、穩定、統一政府，使成爲遠東之主要安定因素。」而已。竊不解美國政策制訂者，既洞悉蘇俄有扶植中共，建立東北、華北政權企圖。且明白於國民政府能成爲遠東安定因素，乃竟片面只求如何說服蘇俄，使其對華政策，接近美國。惜該時並未想到，及查閱本人所建議之「中美同盟五十年」一卷。若果美國與中華民國先訂同盟友好之約，則團結中、美兩國之力，蘇俄在當時，決不敢如此明目張胆，橫肆無忌，乃斷斷於中俄條約之簽訂，失之先，失之後，致貽患於今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俄共宣佈於八月九日起與日軍進入戰爭狀態。事實上，俄軍已於八日分三路進入中國東北之領土：

第一路：由外蒙庫倫大道，進烏得二連、德王府、德化、張北、直抵張家口以入東北，此爲右翼兵團。

第二路：由外蒙推進至熱河，主力經圍場、隆化、游駐承德；

另一支經赤峯、占平泉，此爲中央兵團。

第三路：由滿洲里、綏芬河，沿中東路直達哈爾濱，南下長春、瀋陽，然後分兵南下放順、大連，及東向安東推進；

另一支則由瀋陽西下錦州，直達山海關，此爲左翼兵團。

從此三路進入東北，不啻將東北全部地區均被俄軍囊括。況復日軍一無抵抗，任由浩浩蕩蕩順利行軍，如入無人之境。而交通工具，亦任憑其隨意徵用，故其迅速佔領，自可爲所欲爲。

蘇俄既迅速佔領東北，初以爲國軍斷無法於短期內到達東北，劫掠物質，搬取機械，繳除偽滿部份軍隊軍械。

導致中共建立根據地盤等等，任意妄爲，無所不用其極。但當美國爲欲遣返日軍工作易受控制起見，決定以海、空兩面，運送國軍前往東北、華北之際，蘇俄受驚非淺。蓋美國此舉，使國軍早得收復東北之領土、主權，並使中共失去優勢。但東北究屬於中國，則蘇俄與中共自不可公然反對，於是傾其全力以阻撓國軍開臨東北。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委派熊式輝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下設四部份：除熊氏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外，以張嘉璈任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以杜聿明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以蔣經國任東北外交特派員。同時將東北劃分爲九省，各省主席及各市市長均經分別委任公佈。

熊主任抵任後，（初設行營於錦州）與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則駐于長春）第二次會談時，提出國軍將在大連登陸，當遭馬林諾夫斯基拒絕。馬氏根據「中蘇友好條約」，大連爲「自由港」，據其解釋：「自由港」係指純粹之商港，任何國家之軍隊，在此港口登陸，均屬違反「中蘇協定」。

國軍無奈，乃退求其次，擬在營口登陸。詎俄方竟以「營口盜匪充斥，如果國軍在該地區登陸，萬一遭受襲擊，俄方不負任何責任。」以爲推托之辭，而終拒國軍開抵東北。

因此稽延時日，使中共軍隊，在俄方保護下，將東北之重要城市，均被中俄共合作竊據。

經濟委會主席張嘉璈返重慶向國府報告經過情形，同時與在渝之中共領袖之一董必武商談。中共此時，在東北既立定脚跟，而又詳悉國軍派赴東北，當然無龐大強盛之部隊，力不足以控制整個東北，董必武同意讓國軍在營口登陸，（按董必武之允諾自必經克里姆林與延安之指示）就談商結果言：國軍始可在營口登陸進入東北。

當時國民政府對於接收東北事件，所以一再與蘇俄外交接收洽商者，蓋因東北已經俄軍控制故耳。而俄方則陽

示若不理會，陰則實施阻撓。惟據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稱：

「史達林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曾向美駐俄大使哈里曼表示：蘇俄政府同意公開發表聲明，支持中華民國包括東北在內之門戶開放政策。同時希望不久之將來，國民政府派遣軍隊至東北，以接替俄軍。而蘇俄軍隊並不在東北境內發現共產黨之游擊隊。」

詎至九月初旬，哈里曼再度與史達林接觸時，不圖其態度自始即甚勉強。故九月十日哈里曼報告國務院電報中，則明白指出：

「根據最近廣播，中國共產黨軍隊，曾奉共產國際命令，開入東北，與俄軍會合，接受日軍投降。蘇聯當局及其同情者，在蘇軍撤退以後，將在東北鼓勵利用此種中共部隊，治理東北。」

觀上述紀錄，則俄共之「拒國章」、「迎中共」，固爲其一貫陰謀主張。於是中共部隊，分數路順利而入東北。據「蘇俄與中國」第一三一頁所載：

第二節 中共進佔東北陰謀

「中共違抗最高統帥部之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於八月十日發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共軍全部暴動。命令中所指使之共軍動向如下：

一、爲配合俄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

(甲)「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乙)「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而直趨遼寧。

(丙)「萬毅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丁)「李運昌部」由河北、熱河現地，向遼寧、吉林進發。

(戊)「韓共軍」隨同進入東北。

二、「爲配合外蒙軍隊進入內蒙分在察、綏、熱等地作戰。」

(甲)「賀龍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

(乙)「聶榮臻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三、山西省之共軍由賀龍統一指揮，進據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

四、「爲佔據及破壞交通要道」：

所有沿北甯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甯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河路等鐵道線，及其他一切交通要道兩側之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

又據張君勛「第三勢力在中國」一書，其第八章，「赤黨在東北之陰謀」一篇中，其言有曰：

「俄方圖阻撓國軍登陸東北之同時，俄軍與延安共黨秘密勾結，允許中共駐重兵於山海關至瀋陽之交通線上，以封閉國軍向東北推進之門戶。日本投降之際，中共在俄軍掩護保庇之下，分批經內蒙、察哈爾及熱河，滲入東北，於國軍未抵達前，捷足先登。更甚者，俄軍在黑龍江、吉林、安東、哈爾濱，以及韓國交界處，建立『民主聯軍』。由東北籍青年，即組織繳械解散之偽滿部隊改編組成，以中共軍官爲之統率，而以俄共軍官任教練。」

由上開所紀述者而言？俄共與中共之所以橫行無忌者，實起於盟軍總部將中華民國之領土——東北所駐之日軍，劃歸俄軍受降所致。事實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聲明乞降，俄軍始於八月八日宣佈進兵東北，即於九日起聲明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此無異於日本乞降後，請俄軍作爲戰勝國之姿態，而執行受降。復使俄軍獲得日軍全部裝備與軍路物資，併得掠奪東北工業器械與生產原料，真所謂不勞而獲之鉅大利益。不寧惟是；其所以能援引中共至於東北，堵塞國軍從山海關至東北之路，「民主聯軍」橫梗其間，致國軍不得不改海道由大連登陸，俄共則假格於「中蘇條約」所規定，大運爲純粹商港。乃改由營口，俄則藉口盜匪充斥，迭次見拒。不得已直趨山海關，遂遭「民主聯軍」反抗。迫至隨戰爭、隨收復、隨接管。曠日廢時，消耗實力，中共遂得立足於東北。

按中共部隊之至東北者，大多數孑然一身，俄共即以向日軍偽滿軍繳得之服裝、槍械、彈藥，重予以裝備。並將重要據點，由俄軍讓予中共駐守。

依照中共方面關於進入東北之紀載；

「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東北局』指示，內稱：

「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以後，我黨（共產黨自稱）現時在東北之任務，爲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軍事政治的鞏固根據地」。該指示之註釋云：

「中國人民解放軍立即派大批幹部和部隊，進入東北，領導東北人民，消滅日寇（指受降）和偽滿的殘餘（指未經俄軍繳械之偽滿部隊），建立各級地方民主政府。但是這時國民黨在上帝援助之下，經過陸海空三路向東北大舉運兵，並攻佔了已被我方解放之山海關、錦州等地，東北的嚴重鬥爭已不可避免」。指示中：預見鬥爭的艱苦

性，提出了東北的工作重心放在國民黨距離較遠之城市和廣大鄉村方面，『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以便認真積蓄力量，發動反攻。

「東滿根據地：中長路——瀋陽至長春線以東吉林、西安、安圖、延吉、敦化等地區；」

「北滿根據地：哈爾濱、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區；」

「西滿根據地：中長路——瀋陽至長春以西，齊齊哈爾、洮安、開魯、阜新、鄭家屯、扶餘等地區；」

「此外『黨』還在『南滿』建立根據地，『南滿』是指：中長路——瀋陽至大連以東的安東、莊河、通化、臨江、清源、和瀋陽西南的遼中地區；」

堅持「南滿」為對敵（指國民政府）鬥爭根據地，「東滿」、「北滿」為建設根據地。

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分「軍區」和「軍分區」，將軍隊劃分為「野戰軍」與「地方軍」，將「正規軍」的相當部份，分散到各「軍分區」去。從事發動羣衆，消滅土匪，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民兵」、「自衛隊」，與人民結合起來，建立鞏固根據地。

「此次我軍（中共自稱）十餘萬人，進入東北、熱河，擴大者又得二十餘萬人，還有繼續擴大之趨勢，加上政工人員，估計在一年內將達四十萬人以上。」（見毛集四卷一一八〇頁）

綜上關於中共進入東北及其分據地區與人數，皆摘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自較第三者觀察或傳聞所得者為真實性。但從此項紀述，可以見到「偽滿軍隊」除一部份不願為俄共或中共所改編者而遁入山區外，則中共增加之二十餘萬之部隊，無非均為「偽滿舊部」。假使無俄共為之掩護，加意培植，則中共何能從容不迫而先建立其根據

地？「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固屬共黨狡計，試研討中俄共如此做法——俄共對國府表示尊重領土主權之完整，按其實際，則故施其阻撓國軍進入東北，使無法執行其政治權力者，即所以安排中共在東北立定基地。而國民政府明知俄共之詐詭，乃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外，誠恐東北被俄共佔領後，其接管必生困難之戒懼，不得不再圖補救，再與俄共簽訂「東北俄共佔領軍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協定」。以爲有此協定，俄軍當不至過於扶持中共使在東北生根。此與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時，外長王世杰希望俄共不援助中共，及對中國行政人員與事務之干涉，註明於換文，俾俄共有所約束之要求，同一作用，奈卒至統歸無用，不啻廢紙。其「俄佔領軍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其第二條第五條規定：

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員若干人在業已收復之領土執行左列任務；

(甲) 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並指揮之。

(乙) 協助在已收復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與蘇聯軍隊之合作。

五、一俟收復地區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負擔管理公務之全權。(見蘇俄在中國第一四四頁)

第三節 蘇俄目標佔領東北孤立美國

對付共黨者而恃條約或協定以爲可以約束共黨，予今以事實證明其全出於誑騙迷惑手段，共黨已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史達林向美使哈里曼面稱：「尙謂『迄至現在（八月三十日），紅軍並未與中共取得接觸』。又說：在東北

之紅軍，並未發現有何共軍游擊隊。」等語。哈里曼以之報告美國務院，轉致駐華大使赫爾利以達於國府。以若是衆目昭彰之事績，當面撒謊，而美國終不之悟。蘇俄之手段實係對美作戰，認美爲俄之大敵。其鬥爭之目標，爲「孤立美國，佔領中國」。若以俄共爾時全部兵力，加上中共現有分佈各地之衆，其總和實已超過日本侵華兵力最高峯時之力量。中國既未計算及此，而中國亦未聞有此打算，蓋「中蘇友好條約」及其後「東北軍政有關協定」，其所獲睹之結果，顯與原意相反，共黨之狡刁已明，依然一味與俄交涉，卒至淪失東北。倘能於斯時，鑒於俄共與中共相會合之力量，如是其大，且虎視眈眈有併吞中國之企圖。而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力量如果亦相與會合，所謂以力量對力量，兩相比較，則美與中國之力量，實優越於俄與中共。彼俄共欲孤立美國者，翻足以孤立俄國。彼俄共欲扶持中共者，反可以瓦解中共。俄共認美國爲大敵，而美國却視俄共爲盟友。苟當時美國毅然與中華民國簽訂「軍事同盟五十年」，則俄共必生顧忌，況俄此時確無撼美之力，當不敢觸美之怒，而鳴鑼擊鼓以助中共，即欲助之，亦必更爲隱諱以從事，所有已建之根據，勢必無從久佔。故簽「中俄友好條約」，說者有以爲不必簽訂，俄固先已陳兵東北矣，即不簽訂，俄亦進入東北。竊以「中俄友好條約」之簽訂，不僅爲保持中美兩國之友誼，且以防杜俄共佔領東北後，藉口不撤，或胡作妄爲，捧出傀儡，致釀成另一中俄糾紛。故合法與否，尙不足重，實在使俄共有所約束耳！簽訂何嘗非是。獨惜美國爲雅爾達協定故，既已預見將生惡果，（見本書一七三頁至一七五頁）乃必促成「中蘇友好條約」，且已見中共進入東北與俄共合流，將使中共治理東北，（九月十日哈里曼報告美國務院）意即指將成立偽組織，不於斯時力圖挽救，簽訂「中美軍事同盟」以爲抗衡，徒使馬歇爾奔走駭汗，彼共黨玩弄於掌股之上。若果「中美同盟條約」成立於曩日，則今日之共黨斷不至如此猖獗猖獗，亞洲局勢亦不至如此枕隍素亂矣。

距俄共一方面阻撓國軍進入東北，國軍尙未有一兵一卒踏上東北土地。而俄共竟於十月一日由俄駐華大使彼得洛夫通知國民政府謂：「蘇俄政府決於十月上旬開始撤去在東北之軍隊，請中國派員於十日前到長春，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接防辦法」。彼得洛夫致送行政院備忘錄一份，內稱：

一、蘇俄統帥部業已開始將俄軍自東北部份撤退。

一、蘇俄軍主力將於十月下半月開始自東北撤退，以便於本年十一月終撤退完畢。

一、蘇俄政府已派馬林諾夫斯基爲全權代表，進行有關蘇聯軍隊自東北撤退問題之談判代表。

熊式輝等一行之自重慶起飛前往東北接收，始於九月三十日，距蘇俄軍隊藉對日宣戰爲名，開入我東北，歷時將五十天。距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恰爲四十五天。在此五十天中，中共大批幹部與徒手兵，由山東取道煙臺、龍口等地，以帆船橫渡渤海至大連，旅順登陸，日以萬千數計，而自冀察熱綏等省取道多倫、赤峯、古北口前往東北者，亦然。凡茲中共先國民政府滲入東北，皆在俄國佔領軍掩護之下，進行其建立政權與軍事基地之工作，併日而圖。未嘗稍懈。而毛澤東在熊式輝未赴任之前，猶在重慶，僞裝和平，以示無意染指東北，殊不知整個東北，在俄軍暴力佔領與毛澤東在重慶僞裝和平煙幕之下，不及五十天，滄海變爲桑田，生米煮成熟飯，無復本來面目，雖有智者，亦必事百倍而功不半矣。

先是，中國政府爲尊重「中蘇友好條約」及「蘇俄佔領軍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協定」，乃決定依循外交途徑，以達到接收目的，即所謂「外交接收」政策是也。因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特派熊天翼（式輝）氏爲行營主任，主持規劃所有有關東北接收善後諸問題。同時更將原有之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改劃爲遼寧、安

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等九省。又爲求接收後地方治安之確保，政治設施之規劃，經濟建設之推行，乃于行營下分設：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熊氏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而以東北宣撫使之莫德惠先生以及鄒作華、萬福麟、馬占山，馮庸諸人爲委員。張嘉璈任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家珍、張振鸞等爲委員，杜聿明任保安司令長官。此外，中央更派有特派員四人，蔣經國爲外交特派員，馬博、王公亮（陳儀之弟）爲財經特派員，潘公弼爲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惟因此次接收東北大計。乃以「外交接收」爲主。故蔣經國氏雖與潘陳馬三人同爲特派員，而其地位人望，以及所負任務之艱鉅，遠非馬陳僅備諮詢者所可比擬。事實上，爾後有關接收大計，皆取決于熊張蔣三氏。蓋蔣氏實以全權外交代表身份，負責就近與蘇俄遠東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現任蘇俄國防部長）進行「外交接收」之折衝大計也。

熊式輝氏于拜命後，即積極籌備一切，至九月卅日，諸事已告就緒，乃派外交特派員蔣經國、政務委員莫德惠、鄒作華、馮庸以及行營方面副參謀長董彥平以次文武高級幕僚共三十餘人。東北行營參謀長一席，原已明令由何柱國將軍擔任，何氏籍廣西，然爲張學良東北軍之老將。當首批人員啓程前，蘇俄駐華大使彼得洛夫，爲伴示中蘇兩國友好起見，特邀請新任有關東北要員，作禮貌上之宴會，何柱國以行營參謀長身份，亦在被邀之列。詎於宴後之次日，何氏兩目突告失明，既急救無效，檢驗亦不明病源。于是，蘇俄大使館下毒酒中之傳聞，遂哄動于國際壇站間，但終無法證實如何下毒？所下毒藥屬于何種藥物？卒成疑案。故終東北接收之局，何氏始終未克到任，而以副參謀長董彥平負其全責也。

第四節 中央派熊式輝赴東北接收

第一批接收人員，於是日凌晨，由重慶分乘專機三架，飛赴北平，當日下午三時左右即已抵達。當首批接收人員出發時，無論中央大員乃至各人親友，莫不歡欣鼓舞，以此淪陷已越十四年之東北，指日重歸祖國版圖，故送行場面特別熱鬧，行將送者，皆欣欣有喜色，當時中央要員爲陳誠、白崇禧、熊式輝、羅卓英諸人以及新任東北九省主席與三市長，皆在白市驛機場送行，于是首批人員乃在祝賀聲中起飛矣。

蔣經國等一行，于抵達北平後，與有關方面接洽聯繫，小作勾留，復于十月二日清晨八時半原班人馬，再飛長春，至中午十二時半即行抵達。此一淪陷多年之土地，遂爲我首批接收人員首次踐履，斯時彼等心情之興奮，不言而喻。乃事有出人意外者，當我國接收人員首次降臨長春時，歡迎人員除馬林諾夫斯基僅派其遠東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聯絡官、翻譯官以及衛兵等十餘人外，其他僅長春臨時市政府市長曹某率領幕僚十餘輩前來歡迎，至于當地各界民衆，各公法團體，一若毫不知情者，其場面之冷落，恰與重慶送行時成一對比，是則蘇俄故弄狡獪，有意隔離我人民與政府間之感情，製造矛盾之一貫詭計也。

馬林諾夫斯基見我方首批人員到達後，即由聯絡官撥給「新京市公館」爲我方人員臨時下榻之招待所，我方人員在忍辱負重之心境下，于次日（十月三日）清晨，集合「新京市公館」門前，由莫德惠領導，舉行第一次莊嚴肅穆之「升旗典禮」，於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乃重復飄揚于長春。而我國八年抗戰所獲之代價，至此得一象徵式之安慰。惟我方首批人員選定長春爲行營駐節之地者，蓋因長春既爲偽滿洲國首都，又爲蘇俄遠東軍總司令部駐在

地，不僅便于就近進行「外交接收」，且欲以長春爲接收起點，實寓有深圖取珠之意義也。

我方首批先遣人員到達長春後，經過兩日周旋，蘇俄遠東軍最高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始作外交禮貌上之聲明，向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口頭提出：「關於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將軍，前來長春進行接收工作一事，當極表歡迎。……」于是熊氏乃于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由北平飛抵長春，親自主持一切接收大計。但當熊氏等飛降長春之際，機場歡迎場面，一如三日前，所不同者，僅多出首批到達二三十人而已。先是我方先遣人員，原已計擬發動長春各界民衆及各團體，舉行一個盛大之歡迎儀式，蓋爲國家體面、政府威望計，非同于普通官式應酬也。但當派人與臨時市政府商酌之下，雖深表同意，但須商請俄軍總司令部後方敢作主，結果蘇俄方面，又以「長春秩序尚未恢復，誠恐發生意外」爲詞，狡詐加以拒絕。基于上述種種跡象，此時我方人員，已深感于東北接收問題，將是一個極艱鉅任務，絕不如初時之樂觀也。

熊氏一行人員中，有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中央黨部特派員潘公弼，東北九省主席，（遼寧主席徐箴，安東主席高惜冰，遼北主席劉瀚東，吉林主席鄭道儒，松江主席臧吉玉，合江主席吳瀚濤，黑龍江主席韓駿傑，嫩江主席彭濟羣，興安主席吳煥章。）暨三市市長趙君邁、董文琦、楊綽庵，以及各大報社所派之記者計四十餘人。除此之外，則爲警衛人員，憲兵司令一員，憲兵十人而已。而此十名憲兵，遂成爲我方唯一象徵式之武力，蓋此時雖已設有保安機關，然爲尊重「中蘇友好條約」，編制上雖有此機構，尙未調集兵力，以避免刺激蘇俄也。

熊氏官邸，經選定長春新市區內之「南新京」，原爲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之住宅。熊氏下機後，稍作應酬，即召集所有高級文武人員，舉行「臨時會報」，參加者，除熊氏本人外，有張嘉璈、蔣經國、莫德惠、郝作華、

馮庸、潘公弼、黃彥平、鄭道儒、楊綽庵、劉多荃、劉瀚東、趙君邁、高惜冰、吳煥章等約三十人。會報開始，首由蔣經國氏報告與蘇俄方面初步交涉經過：「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再三表示，彼一切聽命于莫斯科，對于我方人員進行接收一事，表示歡迎，但有關外交交涉問題，仍主張由莫斯科與重慶方面，直接折衝。……」次由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報告：「蘇俄軍隊紀律極壞，奸淫婦女，無所不爲，日本婦女首當其衝，據初步統計，日本婦女遭俄軍強姦者殆佔五分之四以上，至于我國婦女，亦嘗有受其凌辱者，東北婦女爲免遭受俄軍強暴，因而剪去長髮，改扮男裝，長春市上，隨處可見。……」繼之馮庸報告：「俄軍進駐東北以來，所有民間糧食，工廠機器與設備，甚至各機關之傢具，亦併劫掠囊括以去，真所謂以暴易暴也。……」此外，有報告行營內部情形者，有報告所見所聞者，有提出如何展開接收工作之意見者，然對于俄方態度與俄軍行爲，莫不表示憤慨情緒。

熊氏聽取各人報告後，乃戒慎勉勵于衆曰：「吾人此次任務，爲根據中蘇友好條約，從外交談判中以接收東北，吾人尊重中蘇友誼，幸勿感情用事，致因小費而誤大局，無論有何重大問題，吾人不能解決者，儘可報請中央依循外交途徑交涉，持以忍耐，以赴事機。余于臨行時，主席（指蔣先生）曾鄭重相囑，對于敦睦中蘇邦交，必須格外注意，願以主席詔我者，提請大家注意，且以相勉。……」最後，熊氏復宣佈兩項臨時決定：（一）從六日起，每日下午三時，所有到達長春之高級人員，舉行會報一次，以便隨時商討有關接收進行事宜。（二）所有各單位接收人員，在未正式接收視事前，起居飲食，一律在行營中統一辦理，不得單獨行動。

第五節 蘇俄阻撓國府接收

十月七日，熊氏率領張嘉璈、蔣經國、董彥平等，乘蘇俄遠東軍總司令部拜會馬林諾夫斯基及以次各將領。馬氏親率僚屬至頭門相迎，並以元帥禮節，隆重接待，于檢閱儀隊時，高奏「崇戎樂曲」，鳴放禮砲，以示崇敬。是日下午三時，馬林諾夫斯基，亦偕同僚屬約十人，親至熊氏官邸，作官式之回拜，是為熊、馬二氏，第一次外交禮貌上之接觸。

按東北行營除設置「政務」、「經濟」兩委員會，一個「外交特派員」公署及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外，內分秘書廳、以及八大處——參謀、交通、軍務、總務、軍法、軍需、會計、外事。另設二個警衛中隊，一個汽車隊。

以上八處除主管人員外，其辦事人員，儘量起用偽滿時代之事務人員，因此辦事上之推動力加強而又迅速。如此龐大組織之開支，經由張嘉璈主委向長春中國銀行交涉，撥用偽滿幣三億六千餘萬元，充行營經費。時國幣尚未確定，仍沿用偽幣以安定東北人心，惟該時偽滿幣值，計黃金一兩需偽幣一百二十餘元。

至行營辦事，實感困難，俄軍除指撥空無一物之房屋外，僅撥吉甫車三輛，轎車乙輛。所有其他需要，與之接洽，必以自用尙感不敷為辭。但行營終能成立一汽車隊，而汽油亦不虞有缺者，乃得東北人民之助力，將已拆之汽車（恐俄軍征用自行藏匿者）重行裝置，將祕密貯藏之汽油，源源出售與行營。其後俄方之司機且偷取汽油，利其高價，暗中向汽車隊兜售。即此一端，具見行營所處之環境為何？

先是，熊式輝與馬林諾夫斯基於十月七日談商國軍接收東北，將自大連入東北，遭俄方拒絕。十三日續談改在營口，又被托故推諉。至二十七日國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即遭岸上共軍射擊，不能登陸。國軍至此，只得轉往

棄皇島登陸。循北寧路向山海關前進。不意一出關，即被中共攻擊，蓋中共之「民主聯軍」（即毛澤東所稱「東滿」根據地之中長路防線）。

——自榆關至瀋陽，早已佈防駐守。爾後國軍被逼至於一面作戰，一面接收，實屬不得已而採取的手段也。同時國軍空運少數衛隊至長春、瀋陽兩地，先行成立軍政機構，而長春之大屯機場發現中共部隊數千人，另有二千人進入長春市區，向東北行營示威。在若此俄共、中共雙方相互之阻撓下，東北接收情形，委實難於進展。國民政府乃改謀在東北就地收編保安團隊，以利接收事宜，但亦爲俄方所拒絕，不允許在東北地區從事收編軍隊工作。甚至先派聯絡員接洽接收地方政府事宜，俄方亦不同意。

旋以東北經濟問題，蘇俄提出要求，意欲獨佔東北全部經濟利益，實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國策相背，談判愈談愈遠，（詳見後篇）而蘇俄之阻撓國軍，與引領中共軍隊源源開入東北，（詳見另篇）致行營不得不大事縮編，將上述八大處縮爲八組，另設一總處以爲統馭而承上級，其正副處長，則爲金典戎與林家訓。

在俄軍如此陰謀阻撓之下，接收工作，實無法展開。國府乃決定放棄外交接收東北工作，於十一月十五日照會蘇俄駐華大使；申述「接收工作，遭遇種種障礙，中國政府決定將東北行營人員，自十七日起，由長春空運至北平。」

東北行營，自十月六日開始辦公，至十一月十二日熊式輝奉中央電召，回重慶述職，爲時一個月又六日。十六日在長春之行營，一度險被中共軍包圍，用於警衛之保安中隊一隊，同日突被俄軍繳械，另由俄軍派來一批雜牌軍隊，續任警衛工作。是日午間，自來水、電燈、電話、亦均斷絕，行營已瀕於危絕邊緣。正於此時，接熊主任電達

行營，略以奉中央命令，東北行營，除留一「軍事代表團」與紅軍保持繼續接觸外，其餘人員，一律撤往北平待命。東北局勢，益感棘手，此即中國派軍赴東北第一次之略情。因蘇俄紅軍之軍事牽制，使不能展開工作，俾中共勢力得藉此罅隙時間，日漸滋長。其惡毒計劃，固早有預謀也。惟于是日撤退人員於長春機場行將起飛時，蘇俄統帥部副參謀長巴佛洛夫斯基，趕來機場作口頭表示：「遵奉莫斯科命令：蘇軍在未得其他命令之前，不得撤兵，並將加強幾個城市之防務，以便中國政府在東北樹立政權，並鞏固其基礎，以協助中國政府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之條約。」

蘇俄大使彼得洛夫，亦以照會送交行政院；辯白對於東北之中共軍並未予以任何幫助，並聲明，倘中國政府希望蘇軍從綏自東北撤退，則蘇俄政府可命令其駐東北隊伍，予以展期一個月或二個月。

先是，十月中，美艦數艘在大連港口外巡弋，有數名美國水兵，登岸遊覽，此種極平常事件，凡美艦所能到之口岸，水兵登岸觀光，視為慣例。奈俄共竟假端渲染，謂：「國軍在美國艦隊支援下，即將以武裝登陸」云云。一時局勢，突告緊張，蓋俄共有此項畏懼心理存在，一見美國海軍，便以為協助國軍登陸，其實，該時如果真的如此做法，俄共固亦無可如何，俄共所最感無法應付者，厥為國民政府與美國之聯合行動，俄共倚靠美國之力，始獲解德國之圍困，欲與美國抗衡，彼亦自知無力。巨耐極共有中、美聯合登陸之想像與預測，而中美兩國乃均未考慮此「五十年軍事同盟」之妥善一着，浩劫之不可逃，有若是者。

同時，俄共就中共人員中，選委長春市市長，故長春之大坑機場及長春之行營總部，皆有中共隊伍。而毛澤東已委派在東北之張學詩（張學良之弟）以張氏隊伍作基幹，正擬籌備組織中共之東北偽政權。

綜上以觀，俄共一面培植中共，樹立偽政權；一面又不能任從國民政府人員撤退，因此就近由俄軍出面用動聽美好之詞句，使國軍不致撤退，一面在南京則由俄共大使詭辯解釋，「願意暫緩撤兵。」其所以用此兩面手法：

一、就表面上觀：中蘇友好條約簽訂未幾，而中國軍政人員不能接收東北，甚至退出東北，則必引起國際間之責難，並可能引起美國之出面干涉。俄共雖衷心不欲國軍在東北行使職權，但若果國軍拒絕再在東北留駐，則俄共處於異常不利之地位。

一、就內在而觀：俄共之所以急急表示撤兵，初認爲國軍決無若是快速進入東北，自行準備俄軍一面撤退，一面讓中共部隊接應填防，使東北不費一兵一彈，全被中共佔據。無奈國軍到達快速，乃實行其建立一獨立之「偽滿政府」計劃，而利用張學良爲過渡。當時張學良已籌備就緒，準備召開民衆大會，當衆宣佈成立「新滿洲政府」，並宣佈成立「滿洲銀行」發行紙幣。詎於「民衆大會」召開之日，國民政府行營有撤退聲明之後，突有自莫斯科飛抵之專機，携來重要文件，數分鐘後，「民衆大會」立即宣佈取消舉行。此項文件，其內容固非局外人所知，然而文件到後即取消「大會」，「偽政權」亦無從建立，想保克里姆林改變政策所致。

、就他方面觀，保俄共之另一陰謀，即當時中共之軍事佈署尚未完成，而俄共在東北劫奪之物資，尚有部份留置未及運出，故延遲撤兵日期。

東北行營及其有關機關人員 既於十一月十七日奉令撤至北平，迫不得已，而採一面作戰，一面接接收之權宜辦法，其曲固在蘇俄與中共者也。

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之設置，早已明令發表時駐雲南之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蓋以輩份而論，長城之役

，關麟徵以第二十五師師長英勇抗戰於南天門，享譽全國，杜聿明實爲其副師長。迨抗戰中期，杜聿明以第十五裝甲兵團團長、而第二〇〇師長、而第五軍軍長、而第五集團軍、而遠征軍副司令長官代理司令長官。麟徵應亦次參與南口、江西亭子山、長沙第一二三等會戰，洊陞至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駐節雲南，實副其名之常勝將軍。關麟徵與杜聿明，戰功雖相伯仲，而聿明所領者，爲中國惟一機械化部隊，摧堅陷陣，當之者破。屢戰屢勝，威震麟徵而上之。然因東北淪陷久，對於麟徵耳熟能詳。兵先聲而後實。以麟徵充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人地固相宜也。

惟聿明於日本投降後駐軍昆明，會中樞於戰後厲行統一政令整飭紀綱，電調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入京供職。雲有抗命意。聿明爲確保此一地區安全，迫而採取主動，進攻龍雲總部，市廛無驚，順利結束。而雲亦應召飛重慶，爲軍事參議院院長，厥功甚偉。同時又因與雲所部有一度軍事衝突，久成雲南，人地頗不相宜。于是中樞爲求杜、關二將各得其所，遂以聿明代麟徵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而麟徵則晉陞雲南全省警備總司令，移節昆明。

有此人事更動，聿明直至十月廿七日，由滇而渝，而京而滬，而北平。設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於北平外交大樓。聿明本人則在前門外東車站停一列車，經常往來秦皇島與北平間，區劃一切。有時乘坐軍艦，遊弋葫蘆島與秦皇島間之海面，指揮一切。

從秦皇島登陸，經由山海關推進至於錦州，開始於十一月廿六日，其間經過，官書殊少記載，茲錄瀋陽金氏關於此役之片段記載如左：

當民國卅四至卅五年的歲尾年頭，二次外交接收東北，中俄雙方尚在敷衍之際，當時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却留在北平，籌劃另一個接收的步驟，對於這種外交接收，已不存任何幻想！

不但蔣氏如此，就是中樞方面，也不再堅持外交接收原則，而開始進行軍事部署，外交接收，儘管進行，實際方面，已偏重在軍事工作上面。

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于民卅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初，正式成立。司令長官人選，是原任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參謀長是趙家驊，總參議是張學良介弟張學銘。

那時我方準備進入東北部隊，都是美式裝備，曾經遠征過印緬的勁旅，如孫立人、廖耀湘、陳明仁等部，先空運至廣州、上海等地，然後由船舶運輸，分別在天津、塘沽、秦皇島登陸。因此，有許多較爲笨重一些的武器，都未能攜帶前往，以致使國軍在戰鬥力方面，大打折扣。

原來在東北勝利之初，由于東北問題複雜，曾有人向蔣先生提出建議，要求他「放棄東北」，或是把「東北交給國際共管」。

前者是「以退爲進」；後者是想利用國際間的壓力，以制止蘇俄的侵略野心。經蔣先生考慮的結果，認爲這樣做非但有損國家的主權，而且也喪失了國家的體面，終於嚴正的加以拒絕！那時蔣先生曾感慨的說：「十四年來我們的忍辱負重，以及八年來的浴血抗戰，究竟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爲的收復東北失地嗎？如果抗戰勝利之後，叫我們放棄了東北，那不等于八年抗戰全無意義了嗎？」

蔣先生又說：「沒有東北，就沒有華北；沒有華北，就沒有中國。這個放棄東北意見，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杜聿明于在昆明接收東北新命的次日——民卅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就率領了一部高級幕僚，乘專機飛往南京，分謁最高當局及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參謀總長陳誠等，請示機宜。十三日早他即飛往上海，當日下午，又匆匆繼

抵北平。

杜聿明，爲人精明，有魄力、敢擔當、有大刀闊斧的作風。以國軍出關而論，那時的東北幣制，既不能沿用舊滿的紙幣；而「東北流通券」又尚未印就。但是國軍出關之後，又不能一日無錢使用。於是，便由他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名義，把法幣蓋官章，暫作「流通券」使用。

因他有敢作敢爲的精神，解決了這個大困難。

十四日——也是杜氏抵北平的次日——他就派趙家驊到秦皇島去設「前進指揮所」，以便推進軍事工作。那次國軍出關的部隊，計有石覺的第十三軍，王鐵漢的第四十九軍，趙公武的第五十二軍，周福成的第五十三軍，曾澤生的第六十軍，陳明仁的第七十一軍，盧漢泉的第九十三軍，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李鴻的新七軍，以及羅友倫一個二〇七師的青年軍等。

總計那次出關的部隊，是十個軍，一個青年師，兵力不下三十萬人，而且都是美式裝備，出國遠征過的勁旅。這許許多多部隊，並不是一次出關，而是先先後後，分別投入東北戰場的。最先由山海關正面進攻的部隊，有五十軍、九十三軍、六十軍三個軍；由北古線進軍的部隊，有十三軍一個軍；打出山海關以後，由葫蘆島登陸的部隊，有七十一軍、新六軍；攻克錦州後由營口登陸的有新一軍、新七軍兩個軍。

以這些勇敢善戰的部隊，去打那些武器殘劣的共軍，無論量與質，對方自然都不堪一擊，所以，國軍初展身手，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共軍此時節節敗潰的情形，和以後國軍失敗的情形，完全沒有兩樣！

這些精銳部隊，何以在後期作戰中，變成不精銳了呢？這除了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種種因素以

外，其中還有兩項祕聞，一向未爲外人所透露的，值得在此一提：

以廖耀湘的新六軍來說，它是機械化部隊，曾經遠征印緬，蜚聲國際，但是當它空運到上海的時候，因爲限於飛機運輸力的關係，完全是輕裝，所有笨重一些的機械化武器，並沒有隨同運來。

加以遠征軍將領們因爲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回來，既驕且縱，那裏又把區區的中共軍隊，放在眼裏！

任人皆知，我軍既然是美式裝備，當然是需要美式彈藥補充，我們的兵工廠，是造不出來這種彈藥的。可是，自日軍投降以後，美軍對於我們的軍火援助，就一律停止了，外援既告中止，我們祇有靠僅存的那點彈藥，同共軍作戰。戰事既經展開之後，僅存的那點成品，又能經得住幾次戰役的消耗呢？

第六節 國府不得已始採軍事接收

在我們初次出關進行外交接收時，自然是以東北行營爲主體。現在軍事接收，當然重心又轉在東北保安司令官部方面去了。在軍事接收的初期，東北行營已沒有隨軍行動的必要，所以行營就留在北平，暫時辦公。

保安司令官部，爲了便于指揮軍事行動起見，已推進到秦皇島，杜聿明本人，也于十五日那天，便乘專車抵達該島，坐鎮指揮。

秦皇島是華北不凍港之一，港灣內海水極深，可以停泊巨大船隻，開闢礦務局運出之煤，大多由此港運出。該島從一九〇一年開爲商港後，街市商業，日臻繁榮，儼然爲一組具規模的現代化港口（它的位置，在山海關以南）兩者相距不過三十里，就軍事意義上說，它的形勢，是極爲重要的。

至于山海關，原名「榆關」，爲河北省臨榆縣治所在地，更是歷代用兵的地方。

山海關南臨渤海，北接燕山，此外再以長城之險，扼制着關內外的咽喉，正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地方。但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中，它的價值雖已與以往不同，但仍不失爲在軍事上「易守難攻」的所在。那時守山海關的共軍，是「冀、熱、遼邊區司令員」李運昌部。它們一共有三萬多人，又徵集了一部份民兵，就憑藉着長城上的「義院口」、「九門口」、「角山寺」這幾處險要的地方，構築工事，準備阻擋國軍的出關。

其實，共軍進入東北的部隊，還有張學詩、呂正操、萬毅等部。都到北滿佳木斯、嫩江、北安等地，接受蘇俄武器，和擴充軍隊。只留下李運昌這幾萬人，叫他們分守山海關、錦州、葫蘆島這幾個比較重要的城市，企圖阻止國軍向東北進軍。

當時共軍在戰略上的最高決策，是採取拖延的，專守防禦的戰術，其目的不外乎爭取時間，以掩護它們新軍裝備訓練的完成。

所以，當國軍一戰而擊敗李運昌的第一線守軍之後，它們連第二線的接應部隊都沒有，就一敗而不可收拾的潰退下去！

山海關之戰，從攻擊開始到佔領，也不過半天功夫，首先，國軍左翼攻佔了九門口、角山寺；以致影響到共軍的正面，也無法防守，不得不放棄陣地，倉皇退出山海關，所有市內的各種設備，都來不及破壞！

此一不世的雄關，就于十六日那天正午，被國軍輕而易舉的克復了。這一戰役，可以說是國軍軍事接收勝利的「第一聲」。

所以當國軍攻佔山海關之後，可以用「所向披靡」四個字來概述一切。十八日克復綏中，廿日攻佔葫蘆島、錦西，廿四日再克復錦州。沿途的共軍，並沒有大規模的抵抗，根本就未發生過激烈的戰鬥。此後的進展，不過是行軍，搜索和掃蕩戰的延長而已。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參謀長趙家驊，詩酒風流，不失儒將本色（按：趙氏在前年中共砲轟金門中殉職），當國軍攻佔山海關之際，他曾賦七絕一首，以誌所感，一時傳誦軍中，那首詩的原詞是：

渤海月明夜不波，角山依舊傍沙河；

重臨無限興亡感，親領雄師夜渡過。

打出山海關，乃是一件大事，十四年被日僞竊據的東北，算是又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捷報傳來，舉國歡騰。

軍事形勢已發展到了關外，此時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也率領高級幕僚多人，以及東北各省主席等，趕到前方，隨同作戰部隊，一致行動。

擔任作戰的部隊，輕裝進擊，行動上當然比較快捷，即使沿途橋樑有些破壞部份，也阻礙不了它們的行動。祇有輜重部隊，都是大小車輛，攜帶笨重，無法追隨前方部隊。因爲前後呈現脫節之象，無形中就影響到了國軍的補給問題。

當錦州被攻克之後，國軍所攜帶的隨身彈藥，也就大致用光了，輜重部隊，一時之間又追不到，唯一補救的辦法，便是要由北平方面空運彈藥，才不致誤事。但經錦州前線部隊和北平連絡的結果，始知北平方面無飛機可派。

這一個難題，確使杜聿明爲難萬分。

恰好，那位號稱「中國之友」的美國海軍西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柯克上將，那天上午忽然飛臨錦州機場。柯克本來駐節青島，因爲聽說國軍在葫蘆島和營口登陸成功，所以才親自到前方來看看的。他的從空而降，熊式輝和杜聿明自然大表歡迎、熱情接待。在晤談之間，杜氏就和柯克提到了這個彈藥補給問題，請他加以幫助，最好是借重美國的軍用飛機，代爲空運，以應急需。

杜氏當時並告訴柯克上將說：「目下如果彈藥接濟不上，萬一共軍乘夜反攻，局面非常危險！」

柯克將軍於悉這情形後，非常關心，便立刻用電話和北平的美軍取得連絡，果然，在幾小時之後，北平的美國軍用機，便把彈藥送到了錦州，因爲限于錦州機場的設備不佳，每次只能降落三架，先後一共八次，才把彈藥轉送完畢。

錦州是走出山海關後第一個重鎮，也是遼寧和熱河省的咽喉，有鐵路線四通八達，東去瀋陽，西到山海關，南至營口，北去熱河。另外還有一條支線至葫蘆島。此外，尚有大小虹螺山、小凌河、女兒河，相縱貫，實在是軍事上必爭之地。因爲錦州形勢重要，所以國軍於攻下葫蘆島及錦西之後，席不暇暖的，即展開對錦州的攻勢戰。十一月廿四日開始進攻，廿六日清晨，即完全加以克復。共軍潰退後，被國軍俘獲和向國軍投降的，也在萬人左右，經加訊問。據大多數的口供，都說是被裹脅而來的陝北老百姓。

國軍既進駐錦州，遼寧省的地方，已經算是收復了一半，該省省主席徐箴，便公告宣佈就職。這是在軍事接收下，東北九省中第一位先到任的省主席。

說起來，也是軍事接收中一個遺憾，那位身負指揮東北軍事全責的杜聿明將軍，於到達錦州後不久，正在計劃另一軍事行動的時候，不料腰疾忽然發作起來，而且病勢很猛。腰疾原是他的老毛病，因爲疼痛得非常劇烈，迫得杜氏非請假到北平去就醫不可。此後的軍事責任，便又落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的肩上，所以國軍在以後入瀋陽、進鐵嶺、堅守四平街這幾次要戰役裏，在他指揮下，各部隊都能圓滿的達成了任務。

（據隨西李氏稱：杜聿明將軍于攻克錦州後，正擬部署下一軍事行動，竟因腰病復發，不得已，乃請病假赴北平中央醫院開刀，越兩月而告痊愈，即重返錦州，繼續指揮軍事，其間克遼陽，下鐵嶺，前鋒直薄松花江畔，以及四平街之捷，皆杜氏親任指揮。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陳辭修將軍以參謀總長身份兼東北行營主任，杜氏以舊病復發，再請病假離開東北，其司令長官職務，即交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兼代，但不久，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也就裁撤了。其後，杜氏復奉派爲冀熱遼邊區總司令，惟因形勢漸變，亦未有大展佈也。

上述情形，與金氏所記者略有出入，未知何者正確，亟盼當代諸公會參與此役者，不吝賜教而指正之。謹此附註。）

這一段時期，大約前後有五個月之久，而且在軍事接收中，是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由於共軍的望風披靡，熊式輝這時就和人們說笑話，把共軍叫做「豆腐軍」！隔了不久，共軍由於吸收了東北的壯丁，把它們投入戰場中去，戰鬥力忽又轉弱爲強，並對國軍迭次發動攻勢。熊氏這時又改變了調侃的語調，他說：到底是東北的氣候冷，「軟豆腐已經凍成硬梆梆的了！」妙語解頤，聞者捧腹。

這兩個月裏，正值隆冬時分，東北的氣候經常都在零下廿度左右，由南方調到東北去的部隊，實在有點吃不消。

有一次，熊式輝集合新一軍的軍官們講話，看到許多人凍得咳嗽不止，另有好多人的臉皮都凍青了。熊氏知道這是他們身上衣服單薄，抵抗不住關外的嚴寒，於是馬上命令兵站人員，把運到錦州的皮大衣，趕快發了下去。但兵站機構是屬於聯勤總部的，他們在未接到上級命令以前，竟不肯接受熊氏的命令。

熊氏當時氣憤得很厲害，認為這是軍事時期，那容得這樣拘泥形式。便把兵站主管人員找來，當面申斥了一頓，最後還說：「發錯了由我負責，如果你再延遲，我就殺你的頭，以為違抗命令者戒！」

在熊氏盛怒之下，兵站人員又焉敢違抗他的命令，只得勉強「遵命辦理」。

在國軍進行軍事接收期間，只有瀋陽一地，未經過戰事，是由蘇軍手中和平移交過來的。

瀋陽是東北的工業區域。可是，當國軍由蘇軍手中接收過來的時候，這裏的工業設備，已全部被蘇軍搬走一空。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外壳！

兩天後，今總統蔣公，飛臨東北巡視，在瀋陽駐節了三天，對東北的現狀，表示極端關切。除了親自視察以外，還召見了地方耆宿，垂詢一切。熊式輝就利用這個機會，痛陳收編東北地方武力的必要。蔣公諦聽之餘，也深以為然，當即面允暫先收編五十三個保安團，人數暫定七萬，並允撥步槍七萬枝。

這種數字，同林彪後來爭取到的百萬東北子弟兵，雖不可同日而語，但總算是慰情聊勝於無，沒叫他們全部走到共黨陣營裏去！

熊式輝又根據東北的地理環境，認為騎兵是東北很需要的一種兵種，他的意思是請求在東北編制三個騎兵軍，以供東北戰場上使用。但當他的公事呈到中央之後，中央認為在目前「摩托化、機械化」的裝備情況之下，我們的

成立「騎兵軍」，豈不是開倒車？於是，便在毫不考慮的情形下，批駁了他的計劃。

因此，終東北全部變色之日爲止，在東北的廣野中，並沒有一個騎兵部隊出現。

東北行營以撤退長春之際，雖應俄方之請緩執行，但留駐東北者僅軍事代表團一部份而已。惟我方始終無法執行其對東北各省之外交接收，乃要求俄方重新擬訂接收辦法，提出下列要點，徵俄方同意：

一、解除長春、瀋陽市區及飛機場附近未經政府承認之武裝人員之武裝，以便國軍能安全運至長春與瀋陽。

二、對於國軍經由北寧路及東北港口運輸時，予以便利。

三、對於中國政府派遣之接收人員，給予各種道義上及物資上之協助（尤其對各地編組地方團隊之工作。）

以上辦法，經雙方同意後，原定俄軍自東北撤退之時間延長一個月，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爲俄軍撤退完成之期。

俄方之答覆，避重就輕，極盡狡猾，對於第一項答：「因中國之任何非政府軍隊，從未開入長春，過去中國軍隊在長春降落，未遭阻礙，現在亦不存在。」第二項答：「蘇軍已撤離瀋陽以南地區，無法協助中國軍隊接收」。

第三項：「未予置答」。

（按俄方之政策，爲使中國控制權，局限於中長路及其沿線之狹長地帶內。簡言之即國軍之活動，僅爲保護該條鐵路線。蘇俄政策之錯綜複雜，由於下列事件，可見一斑。）

俄方在東北對國府重政之態度。

東北行營既已暫留，並推行與俄方協調及合作，行營主任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致俄軍備忘錄，其要旨爲：「中國

將派五個軍至東北，計駐長春一個軍，駐瀋陽兩個軍，駐哈爾濱兩個軍。此外在九個省份，每省派駐一保安部隊計二萬人。

並聲明：中國政府無意在東北境內保持足以肩負國防重任之軍事力量。

俄方在馬林諾夫斯基，對中國此項辦法外貌表示滿意，並同意中國軍隊在營口登陸。（此項建議，早經張嘉璈及董必武同意在先，惟至今始得俄方同意，方可實施。）馬林氏復下令共產黨軍撤出山海關至新民府沿線地區，允許國軍進駐。由於此項措施，瀋陽復入國軍掌握，而長春、哈爾濱、吉林四城市，亦統歸國民政府所委派之市長治理。

至於東北九省省政府之行政權力，行營主任要求俄軍總司令解散所謂「民主聯軍」，允許省市人員赴任時攜帶少數警憲，並得編組保安團隊，以維治安，蒞任時，俄方派連絡官。凡未經中央政府承認之政權，在省市人員蒞任後，必須一律取銷，如有反抗，俄軍協助解決之。俄方表示：除編組保安隊及派連絡官必須請示莫斯科外，餘則均可負責，關於解放「民主聯軍」一節，蘇俄表示無能為力。同時並提出一附帶條件：即俄軍必需延期撤退，不能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撤退完了。當時國民政府允許俄軍展期一個月至二月一日為撤退完了日期。

洽談只管洽談，而俄方對國軍之進入及政治之接收，不但未加協助，反而橫加阻撓。如當一月五日國軍一部進駐營口時，遭遇中共七千餘名之襲擊，其間並有俄軍參雜，抗拒接收。初，俄軍洽定於一月十五日由瀋陽撤退，而國軍一師至期乘車開往瀋陽接防，列車抵瀋陽站外五公里處，中共軍突出襲擊，迫車抵市區，俄軍以撤退工作尚未完成，指定國軍駐紮於鐵路西面地區。而同日午夜，中國在長春所編組之保安隊第四總隊，俄軍竟包圍該隊總司令部。

，將保安隊繳械。（見「馬歇爾使華紀實」一書「東北之悲劇」一篇中，及董顯光著蔣總統傳。）

第七節 史達林與蔣經國訪俄

至於中央派赴東北之各省省長、行政專員、市長等均羈留於瀋陽，無法前往接收。窺俄共用意，旨在阻延中央政府接管各該省市行政權，以待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共兩軍之駐區問題。某次，行營要求俄方協助接管省市行政權時，俄方之答覆，爲：「若經濟合作問題能獲解決，則地方行政問題亦可順理成章，獲致解決。」俄方一味拖延，以維持現狀，意欲等待在重慶所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之結果。若會議成功，中共當然知道，如何保護其自身利益。若會議失敗，則俄方將東北各省成爲中共之囊中物。至政治協商會議，不問其會議結果如何，總之俄方必欲將東北，移交予中共接管，毫無疑義。

至是，東北行營與俄軍總部洽談經濟問題，一面由俄駐華大使與國民政府外交部洽商。而史達林忽亦採取行動，邀請蔣經國赴莫斯科訪問，此爲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由此可以明瞭蘇俄對東北之政策，係一種玩弄兩面交易之複雜手法。基於「中俄條約」已經簽訂，俄方對國民政府之地位，必須尊重。且就正式外交觀點言，蘇俄根本上從未正式承認中共在東北境內之政治地位。俄方與東北行營交往洽談時，當提及「中共」，則稱之謂：「地方武力」，甚或稱之謂：「土匪」。蓋俄共但求達到目的——使整個東北落於中共之手，並不計較其所使用之詞句，只知取得與談者之悅耳與好感，以掩飾其扶植中共之真實觀念。而其所洽談之情形，觀於蔣經國之「一段紀載，即可知其梗概；（見「我的父親」一書之反共奮鬥三十年一篇中第十二頁）蔣經國稱：「在雅爾達協

定中，規定東北行政權及一切主權，均歸中華民國政府。可是，蘇俄軍隊來了，一切都等於廢紙了。他用一切力量來掩護和培植林彪的部隊，直到林彪部隊的力量可以支配整個東北，纔開始撤退。他們向我政府口口聲聲稱道『友好關係』，但是日本關東軍繳來之武器就不肯交給我國，經過一再交涉，至其無法抵賴與游移延宕時，乃答以『應該照辦，惟俟一星期後再來』。這番話聽去，則謂：『再遲兩天』。兩天瞬息過去，則托詞謂：『關東軍武器，原置於車站，詎為裝貨錯誤，致此項武器，已運至莫斯科』云云；最後，俄方答復行營函件：『現在根據兩國同盟友好關係，所有關東軍武器，點交與貴國，計開：

步槍，三千枝；

馬刀，一百四十八把；

上項武器，現存哈爾濱，請即派員前去提取可也』。試以投降日軍之百餘萬之數而與上列之數相比，則非裝備中共，即據為己用，故共黨之言與共黨之行，是素不相同，必觀其行而後聽其言，否則，未有不墜其術中者也。

蔣經國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國，當三十四年十二月，東北問題之交涉，發生最後最大困難，而史達林之邀請適至，蔣委員長准許經國以其私人代表資格前往莫斯科。據蔣經國所述：史達林謂經國曰：

「美國欲利用中國作其滿足自己利益之工具，至必要時，難保美國不犧牲中國」。

「蘇俄願將本國所生產之機器、汽車，以及中國所欲得之物資，供給中國。同時，亦希望中國能將自己所生產之礦物、農產品，供給蘇俄」。

「蘇俄可以協助建立中國之重工業於東北」。

「蘇俄並可協助發展新疆經濟」。

「但是我（史達林自稱）有一個最大要求：中國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卒一兵來至中國；如果有美國一兵一卒來中國，則東北問題，便更難解決矣」。

史達林繼續：

「蘇俄經濟顧問將有長春之行，已囑該經濟顧問與君會晤，並知照該顧問云：中國政府能提出保證——今後美國不在東北佔得利益——則蘇俄將作必要之讓步。」

「蘇俄並不反對中國和美國建立關係——因爲美國亦能幫助中國經濟上之建設；但切望中國不要信賴美國」。蔣經國於節錄此段談話中有云：其本人除不同意史達林之建議外，認爲史達林之意圖，乃係俄帝征服中國，欲壟斷整個東南亞之經濟市場入其掌握控制。而且具有離間中、美兩國關係之陰謀，故澈底予以拒絕云云。（見我的父親）

史達林與蔣經國二次談話中，史氏表示其對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和平共存」之意願。並表示：贊同中、美、蘇三國之合作。但反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尤其反對第三勢力進入東北，而力勸中國採取不偏不倚之獨立政策。（意指中國應一面倒向蘇俄）

據「蘇俄與中國」一書所載：對於此次蔣經國被邀訪俄，並非爲解決中國東北問題。史達林向蔣經國表示：希望蘇委員長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上適當地點會晤；於是知史氏之邀蔣經國實在此而非在彼。

蔣委員長云：「我會以此事，徵詢馬歇爾特使意見，馬歇爾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邦交，無不贊同』。於是

，我對他亦未便再道其詳，否則，他或許以爲我有「挾俄自重」心理，我乃決定婉謝史達林之邀請。」

至五月五日，俄駐華武官羅申接莫斯科來電，欲見蔣經國，登門造訪，不遇，焦急萬狀。數天後，羅申（或作羅遜）出一莫斯科來電以示蔣經國，其電文大意：

「蘇俄政府歡迎蔣委員長訪問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倘使蔣委員長認爲在莫斯科見面爲不妥，史達林同意指定蘇俄國境內任何地方」。

蔣委員長得經國報告後，未即表示。而羅申迭次詢問答復何詞。翌日，委員長指示經國云：「汝可告知羅申，我（委員長自稱）在此幾個月內，忙甚，無暇離開自己的國土」。又關照說：「關於此事，汝但答復此數語，不必多說。」而羅申纏繞詢問不休。

此事本已告一段落，稍後，美使赫爾利突接美國駐俄大使來電，轉以電詢蔣委員長云：「委員長要與史達林會面，究爲何事？」委員長答云：

「俄員非正式先來問我，有否與史氏會晤意？余答以——目前無暇，余亦無意出國——」。

據蔣經國陳述：

「此事，據父親（蔣委員長）推測，必係俄國事先故意告知美國，反指父親要求與史達林會晤；使美方對父親發生疑忌，以期達到其離間中、美兩國邦交之狡計。後來，俄方或因恐怕以前向我方非正式接洽，要求父親與史氏會晤一事，告知美國。或因美國已將父親告知赫爾利之語，向俄提出詢問！於是，惱羞成怒，發動佔領新疆之伊寧」。

觀乎上述紀載：史達林之手腕，凡可以離間中、美兩國邦交者，無所不用其極；美國身歷其事，宜乎可以明白蘇俄之用心。倘使該時已訂有中美同盟，則徒見史達林之心勞日絀。奈雙方均忽略中美同盟一點，可以打擊中共俄共聯合滙流而有餘，但求正面着想，如何以對付共黨之方法？而不回顧，則中美兩國合力，以自壯陣容，即足以抗禦共黨勢力之擴張。蔣委員長對於此事，其日記中有云：

「余至此，更覺國際情形之複雜與陰謀之險狠，決非余直率率性所能應付。惟余予以誠實篤敬，不懼不詐，中道而行，所謂以誠制偽，以拙制巧，則一時雖受冤曲，而終久必能了解。蓋余在國際外交所持者，爲精誠與道義」。

俄共在東北。與中國行營方面洽談至於技窮，無可拖延時，乃由莫斯科方面發動上開之插曲，藉以轉移其目標。惟俄共在東北欲鞏固其經濟地位；就當時軍事情勢之分布言之，雖俄共欲將東北交予中共，似不可能。退而就其現狀欲造成暫時之均勢，以避免國際之責難與美國之干涉。擬將國軍之控制權只限於點或線，中共則獲得廣大之地區，但此項現勢所造成於中共者，固未能滿足俄共之野心。彼自居於東北控制中之重要角色；應保有優先利益，並要求東北各省工礦企業之共同管理與控制權。因此，行營經濟委員會所與洽商者，縱使中國方面若何讓步，終未能得到一個結論。蓋討價還價之相去懸殊也。

第八節 蘇俄攫東北物資爲戰利品

按日本投降之初，中國爲處理東北產業，曾向美、俄兩國提出備忘錄，表明中國對於東北接收公私產業之立場

。該備忘錄中略稱：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損失。爲抵償此項損失之一部份起見；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本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本在華之一切事業。擬請貴國予以支持，並在中國政府接收之前，令飭貴國在中國收復地區之軍隊，對於日方公私財產及其經營之商業、工廠、礦業、交通、通訊事業、及其他資產，暫予保護，以防日方之破壞隱藏，或運往他處」。

按俄共蓄意掠奪東北之經濟，早於商談「中蘇友好條約」時，史達林曾提出「戰利品」問題；認爲俄軍佔領區內之若干日本財產，包括一部份日本公司之股票在內，應視爲蘇俄之「戰利品」。宋子文向史達林詢問對「戰利品」之確切意向，但史達林避不作答，僅謂「此事留待他日商討」，美駐俄大使知悉此事，認爲蘇俄對「戰利品」之解釋，如果亦如德國物資問題之主張，將日本之公司企業之股票亦包括在內，則東北之工業建設，必被攫取殆盡，并取得全部工業之永遠控制權。遂與「戰後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洽商，哈里曼電請杜魯門指示：擬以東北工業建設應給予被害者，予以適當之分配」。（見杜魯門回憶錄）

由此足見俄共企圖掠奪東北之經濟，其處心積慮，固非出於一時之需索。及其既已佔領東北之後，其真實掠奪情況，此於諾爾曼、克利夫蘭之調查報告，可以明瞭！（按杜魯門總統派其私人代表鮑萊爲賠償調查團團長，克利夫蘭即該團團員之一，前來東北履勘查察）

克利夫蘭略稱：

「據蘇俄報告：蘇俄在東北所攫取之物資機器價值美金八千萬元而已——但此係良好器材，依照戰前價值計算

，至低估計亦值美金二十億元。」

「我所見到者，蘇俄人在東北之作爲，是任何文明人所不屑爲之事，而竟公然爲之。其在東北唯一之建設，則惟見一塊大石造成之紀念碑而已。」

鮑萊圖長報告稱：

「東北之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南滿，實際上蘇軍開至之時，日軍未曾抵抗，故其工業完整無損，即拱手以讓俄人……蘇俄隨軍人員到達後即作有系統之攫取，如糧食、儲存品等。由九月初旬起，開始作選擇性之拆遷重要工業機械……除將儲存品之重要物資及主要工業設備（指軍火設備）運回蘇俄外，並將動力機械、發電與輕電設備、電機、實驗廠、試驗室、主要醫療設備，亦俱作選擇性之拆遷運走……所遺留者僅爲少數之舊損與不堪使用者……因此工業系統之最大部份，以蘇軍佔領期間，全被破壞。」（見「蘇軍駐留期內東北工業損失報告書」——「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經濟委員會」譯文。

由於鮑萊之初步報告，東北工業中心，已變成空無所有。迨民卅五年（一九四六）「東北工業會」會同「東北日僑聯絡處」組織調查團，查閱原始帳表以求真實確數字，結果查得總損失在美金二十億元左右。

依照各報告所查得，俄共對東北物資之欲輸往西伯利亞，雖加緊搶運亦未獲全部清運，積壓甚多，爲避免爲外界所知，因有謀殺張莘夫案發生。張莘夫奉經濟部命派往東北任東北工礦特派員，民卅五年（一九四六）張氏與中長鐵路俄籍副理事長等一行，由俄軍護送，自瀋陽至撫順，翌日公畢，仍由俄軍護送，在俄軍防戍區登車回瀋。當日下午八時，車至李兒站（距撫順廿五公里），張莘夫被共軍李兆麟部屬強迫下車，即在該處以槍柄痛擊而死，其

慘酷殊甚。蓋懼張莘夫目見俄共掠奪事狀，恐其對外宣揚，而竟出此手段。

民卅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廿七日蘇俄大使彼得洛夫提出「中蘇經濟合作建議」草案一份，遞送至外交部，表示蘇俄願與中國談商經濟問題，共同合辦東北之企業。其內容約略如下：

中、俄兩國共同經營煤礦企業；計開：——密山、撫順、林西、恆山、梨蘭屯、鶴岡、阜新。

中、俄兩國共同合辦工廠；計開：——鞍山製鐵廠——煉鋼廠，遼陽鑄鐵廠、鞍山火磚廠、鞍山機械廠。

大連煉油廠、大連及哈爾濱洋灰廠、天之川發電廠、遼東半島鹽場。

中、俄兩國共同經營民航事業；計開：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牡丹江、佳木斯，各飛行場之民航業務。

俄共欲將東北經濟全部受其掌握，絕對不願有美國染指其間，故史達林一再表示：希望中國背棄美國。其目的在於俄共本身在對德戰爭所破壞之機械工具，急待補充。此其一，俄共欲在西伯利亞建立軍需工業，冀於遠東有戰事發生之預備。此其二，俄共為欲杜絕中國政府得到東北之全部工業，俾免除西伯利亞之威脅，故於未移遷者加以破壞，使短期不能恢復。此其三。

綜上種種，遂不擇手段，必欲達到目的而後已。（見聯合國蘇軍駐留期內東北工業損失調查報告書）

第九節 蘇俄要求東北經濟合作

先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馬林諾夫斯基之經濟顧問史拉特科夫斯基，向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

提出一份列有一百五十四家企業之名單。認爲東北企業須由中蘇兩國合作管理，該項企業幾遍及全東北企業百分之八十。經張嘉璈向馬林諾夫斯基表示：爲避免在強迫之下進行談判之嫌，最好在於蘇軍撤退後，進行談判。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國公布處理東北敵僞產業條例，旋於一月廿一日，彼得羅夫向中國政府提出書面建議，其內容略稱

「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於一月十三日發表公告謂——中國政府業已頒布關於支配敵產方式之命令，依照此項命令，凡在東北諸省境內之一切敵產，均歸中國政府所有，根據公告之意義，上述中國政府之命令，對於曾在關東軍服務之日本在滿洲諸企業亦有效力。而此種企業，現係蘇俄之財產，因其爲紅軍之「戰利品也。」（按「戰利品」一名詞，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曾要求史達林解釋，見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文內）蘇俄政府訓令本人通知中國政府，因爲此事既涉及會爲日本關東軍服務之諸企業，而此種企業現爲紅軍之「戰利品」，故蘇俄政府對於中國政府之命令認爲無根據，且無效力。蘇俄政府因顧及中蘇間現存之友好關係，故向中國政府提議組織一些中蘇合股公司，以經營會爲關東軍服務之日本在滿洲諸企業，同時蘇俄政府會同意將此種企業價值之一半，讓與中國政府。不僅如此，蘇俄政府依照蔣經國先生所轉達史達林致貴主席之願望，又會同意將日本企業之一大部份劃出，全歸中國政府所有，蘇俄政府期望爲兩國之利益，對此問題儘可能迅予處理。」（按該照會「史達林以貴主席之願望」一語，係指本文上節史達林要求中國反美排除美國利益於中國之外，對蔣經國訪問莫斯科時所當面表示者。）

蘇俄此一文件之建議，其涵義實欲中國從事反美，與蘇俄合作。倘使中國能與蘇俄携手合力以反美，則蘇俄願以已得之「戰利品」——日本企業之大部份，歸中國所有以爲餌。甚至將命令中共服從國民政府作爲交換條件。其

目的在於分裂中美友好關係，使中、美各處孤立，然後培植中共奪取政權，冀達其兼併之目的爲止。

當時國民政府接得此項文件後，於二月一日即蘇俄軍隊自東北最後撤退期限，向蘇俄大使鄭重指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倫敦外長會議時，莫洛托夫對於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本在中國境內之公私產業，作爲賠償中國損失之辦法，並未反對。僅謂：此一問題須在管制日本委員會中討論。」

然而蘇俄對於中國方面之意見，不予理會。至二月一日亦並不撤兵，自食約言。且以「中蘇經濟合作」，作爲撤兵之交換條件。一面掩護中共，裝備訓練，使中共得在東北建立政治基礎，令其接收全面性之地方政權，中共生根於東北，已牢不可拔。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三日駐東北俄軍慶祝紅軍節，公然作威脅性之公開聲明：

「蘇俄向中國提出之『東北經濟合作建議』，其目的不在金錢利益之報酬。而係以蘇俄國防安全爲宗旨」。

「蘇俄在東北之任務，係以恢復中國之主權，及解決經濟合作問題。在此項問題解決之前，是無法決定蘇俄紅軍撤離東北之日期」。

上述聲明，無異於明告中國：「東北經濟合作問題不解決，蘇軍是不爲撤退」！語近威脅性與要挾性。

俄方建議之經濟合作方案，其原則：「凡東北方面可以列爲國營之經濟資源，皆設置建設性之聯合公司，或礦廠，由兩國共同管理，以期利益均沾。」

當談判繼續進行之際，蘇俄方面會將某些小型工廠、發電廠，交還中國。其他工礦企業，蘇俄所認爲應共同經營管理者。經三個月談判後，仍有二十家企業列於蘇俄所提出之合作經營名單之內。該等大企業，遍佈於各省，蘇

俄此舉亦足以控制整個東北之經濟。

中國方面經幾次研討，認爲此項原則，大體上尚可洽談，惟公司鑛場之主權必須屬於中國所有，俄方之合作僅在企業之經營方面！因此，因經營所得之利潤必須中國方面較優厚於俄方。

經過雙方數度商洽，作出初步之協議：

(一) 組織方面：設立各種建設公司及鑛廠；

(二) 人事方面：(甲) 如果中國方面擔任董事長，則俄國方面擔任總經理，反之，如果俄國方面擔任董事長則中國方面擔任總經理。(乙) 其他人事制度均設正副二級制，由中、俄人員分別擔任。(丙) 技術人員一概雇用俄方人員，不得延聘其他國家之專家與技師。

(三) 利潤方面：中國方面得百分之五十一，俄國方面得百分之四十九。

三月廿七日蘇駐華大使提出正式照會。爲東北經濟問題，擬有方案，送達國府外交部。而張嘉璈因就地與蘇軍當局洽商，獲得初步協議草案。張氏回渝述職，報告洽談經過及蘇俄意向等。俄方照會及張氏報告，經呈奉最高當局批示，略開：「原則可行，交由王部長世杰、翁部長文瀾詳加研究，並與蘇俄大使進行談商。」等因。時王世杰任外交部長，翁文瀾任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而翁詠霓（文瀾）正在華北視察，電速回渝。迨翁氏抵陪都，而蔣主席已出巡貴陽，惟留長函予翁氏，指示得失利害，翁氏乃據函中提示與王部長及俄使同作商量。而雙方對此案均非常重視，中國方面不肯輕率予以允諾。兩造在植物油公司密談，以避免消息外洩。

當蔣委員長接獲該經濟合作之照會與報告，自始至終非常重視，認爲依此原則與蘇俄方面商談細則問題，即能

決定。故批交外交、經濟二部負責洽商。迨翁文灝到渝，經研討後，認為依照俄方所提，在經濟觀點，似可辦理。而外長王世杰認為經濟合作，儘可同意，但提出另一項對案，務須蘇俄撤回有關東北問題之某項照會。蓋王世杰瞭解蘇俄有急欲達成協議之弱點，遂堅持其主張。而俄方則以撤回某項照會，可從長考慮，但為顧到國家體面，不允撤回。因此東北經濟合作問題，演成僵持。

總之，該案牽涉國際關係，及本國主權利益問題，尤以東北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為國際所公認，假使予蘇俄以獨佔，難免引起其他國家反感，尤以中共在東北方面受俄軍裝備訓練，東北局勢，異常惡劣，故中央對此東北經濟合作問題，迄未作最後決定。而是時重慶、南京、上海各地學生，發動反蘇示威遊行，中蘇友誼，顯已趨於低落。在張嘉璈以為蘇俄所提出合作企業為一百五十餘家，現在洽談減至十餘家，滿以為可邀上峯核准而順利著手接收工作。況自行營成立，雙方為接收東北經濟，即已開始談判，而合作問題，亦已在就地商量，不過至三月廿七日始見正式公文而已。在張嘉璈立場，固已克盡職守。張嘉璈延未返任，在渝會接蘇方電報，謂：「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將在哈爾濱逗留至三月底，若張氏能及早趕返東北，馬林諾夫斯基願予接見。」此即意味蘇俄仍希望中國政府對合作問題，獲得更多讓步。雖然蘇俄容許中共佔有東北，斯乃欲體兩面手法！嗣後張嘉璈返瀋回任，但對蘇俄經濟合作問題，不再有接觸矣。

第十節 蘇俄將東北移交予中共

自俄共軍隊開入東北，以劫奪移運東北之機械物資，作有系統而循序之北遷為入手。復將日本投降之武器，陸

續裝備進入東北的中共部隊，作爲其攘攫權力之護衛力量。同時以威迫利誘企圖獲得整個東北之經濟命脈。並挑撥離間中美關係，排擠美國於東北之外。當時有一部份之見解謂：「假使，爾時我國政府如能接受俄共之建議，則俄共將命令其附庸之中共，暫時服從國民政府亦得苟安於一時。」云云。此說似未盡然！鑒于中俄共之合力謀取東北，則共產黨所謂條約也、會議也、商談也，無一而非誑騙與陷阱，其唯一目的，則爲顛覆以至赤化。故接受建議，徒屬無益而加害速耳。

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其會議結果，未能達到俄共之願望。而與國民政府所談商之東北經濟共管之建議，發覺國民政府無意相與合作。而俄軍允諾撤退之期，漸已逼近。蘇俄以爲欲誘致國民政府入彀，已告失敗，乃決心實施第二步辦法，遂暴露其獍豸面目。於是更積極以裝備中共，訓練中共，扶植中共，將整個東北移交予中共。

當俄軍首自外蒙推進熱河時，即敞開華北與東北之走廊，使中共盤據關內之李運昌部及林彪部，分由河北、察哈爾，經多倫、赤峯、古北口等地進入東北。故初時將日軍武器先行裝備中共此種先遣隊伍。其後如負責哈爾濱松江區之販附中共李兆麟部（李兆麟本名張壽篪，係抗日部隊李杜將軍之部屬，後因日軍追擊，退入俄境，爲俄繳械，施以思想改造，此次隨俄軍進入東北）負責齊齊哈爾、黑龍江區之中共王明貴部，與自山東渡海而來之中共「山東兵團」，均予以嶄新之裝備。

俄軍之撤退也。故意不使中國政府知悉！而密與中共勾結，故俄共未去，中共已先來佈防。卅五年（一九四六）四月十四日，俄軍撤離長春市，讓中共有計劃佔領，凡俄軍將撤之際，必先移交於中共軍而始退。而俄軍總司令並聲明稱：「蘇軍撤退，無法等候國軍到達，因此，長春以北地區，蘇軍惟有交予地方武力（指中共部隊）加以佔

領。」且謂：「蘇軍之遷撤原因，乃因中國政府之要求，欲蘇軍駐留至中央軍抵達時為止」。但俄軍所說者若是，惟是其所作所爲，適得其反，翻而在贛蔽中國當局，允許中共部隊於一個月內，在東北可佔領一百另五個城市，斯即意味整個東北百分之九十地區，已被中共所竊據。按中共部隊到達東北，既統屬徒手，則俄共予其裝備，究屬若何？據中共方面所提出者，有下列二例：

一、中共黑龍江軍區警備旅第四團作戰參謀果征夫供述：「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奉派赴海拉爾接收蘇軍自滿洲供給之日式武器，計砲彈十二萬八千發，三八式步槍一千二百箱。」

二、「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蘇軍將黑龍江安達縣及萬小之保安隊繳械後，用電話通知十九旅及黑龍江軍區警衛旅第四團，於十六日晨接收該二縣武器，此爲蘇軍駐安達之衛戍司令官畢羅諾夫，給團部供應處長劉品生的正式通知。」

依據上列二例推測，則下列國民政府所統計蘇俄共軍在東北虜獲之戰俘及武器之概數，乃相當正確者，（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期間）：

戰俘（包括婦孺） 五十九萬四千名。

飛機 九百廿五架。

坦克車 三百六十九輛。

裝甲車 三十五輛。

野戰砲 二千六百六十二門。

爲甚麼失去大陸

三〇八

機關鎗	一萬三千八百廿五挺。
步鎗	三十萬支。
無線電機	一百三十三座。
汽車	二千三百輛。
拖車	一百二十五輛。
騾馬	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
彈藥及補給品倉庫	七百四十二所。
手榴彈	一萬一千另五十二顆。
卡車	三千另七十八輛。
馬	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
補給車	二萬一千另八十四輛，
特種車	八百一十五部，
指揮車	二百八十七輛。

上開軍需裝備，中共自俄軍手中獲得，遂得逐漸擴充，更收編偽滿之潰散部隊。例如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六日，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光林及「政委」康凱，率部六百餘人，自錦州乘火車至瀋陽，次日奉俄軍司令員之命，即接收「地方維持會」「保安司令部」之指揮權，並將日軍及偽滿部隊之武器繳收

，同時大事招募散兵游勇與失業工人，旬日之間，便編組成五萬人之軍隊，以本溪湖爲據點，其勢力遍及於遼南與遼東各地。

九月十六日，中共「冀熱遼軍司令部」李運昌，又率部至瀋陽，則從蘇軍佔領之日軍倉庫中提出大量軍需品，予以新裝備。

中俄共以佳木斯爲根據地，設立「軍事學校」及「訓練營」分別施以現代化及機械化之軍事訓練，同時在齊齊哈爾與俄境之伯力，設立「航空學校」。在俄境之史巴斯克，設立海軍及水陸兩棲部隊訓練機構。其重要人員，則再至莫斯科接受特殊訓練。以上陸、海、空之訓練均由俄人教導。於是列寧之赤化世界由亞洲而中東而北歐之迂迴路線，遂得實現而開其先河。奚止顛覆中國一國而已耶？

就上述之背景資料觀之，便可瞭解「雅爾達協定」及「中俄友好同盟條約」之後果。誠然，蘇俄未達他國之允准，何嘗不可以攫取東北。但由於通過連串條約之協定，得美、英及中國之同意，使其得東北臻於合法化，並使簽約國無可奈何。既有此「條約」之根據，則與暴力攫取，究屬不同！今則以對日參戰爲其大義，公然進入東北。陽與國民政府討價還價以商談，陰則培植中共，使其力足以控制東北，俾中俄共之力量，滙合而成大河，再以其支流而分佈於東北全境。故其初則以亟欲撤兵相要脅，及國軍迅速開抵東北，則反以經濟權益之談商，故意作討價還價之拖延，凡斯皆爲培養中共之陰謀詭計也。

俄共以一手製造此東北之局勢，中美兩國政府雖對此嚴重之趨勢，互作商討，但均無正面對付蘇俄之決策，遂使中共勢力日益坐大。魏德邁將軍曾建議東北交由聯合國暫時託管，其計良左。而馬歇爾將軍醉心於國共「聯合政

府」之建立，認爲東北問題由聯合政府之途徑可以解決，故東北始終在三人小組、軍事調處執行部週旋之下，致演成談談打打，邊談邊打之不生不死局面，而我方處境遂愈陷於不利。國軍見令而遵行，中共見令而破壞，拖延時間，反而造成中共強大之機會。國軍處於被動之劣勢。

茲就各家紀載，所彙集之資料已如上述，則所謂「雅爾達協定」、「中蘇友好條約」，所欲約束共黨者而共黨反利用之，以掩飾其併吞東北之野心。然而事實昭彰，於條約協定之訂與不訂，又有何尤。向使馬歇爾之調解，感於東北嚴重之局勢，急起直追，亦如俄共之與中共力量匯流，合中美兩國之力量，亦同樣予以匯流，俾建立強大之中、美軍事同盟，以支持國府。則不必美國士兵實行參戰，國府藉此聲勢，未始不可挽此狂瀾。蓋俄共之與中共必出以贖贖遮蓋，而美國基於國府之要求，可以公然行之。倘當日有此軍事匯流之中美聯盟，確信東北決不會輕易斷送。惜此「聯盟五十年」之建議，未寄發於羅斯福在生之日，卒至投於不知運用者之赫爾利大使之手，於今思之，可勝扼腕。

俄共撤軍之說，最初爲十月一日，旋展至十二月三日，又稽至二月一日仍未有撤退行動。而中共人員之呂正操、張學詩、萬毅、林彪、彭真、陳雲等進入東北後，即成立「中共最高領導機構」，並在佔領區召開「人民大會」，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於是中共繼軍事行動，而又出現政治組織矣。

民卅五年（一九四六）中共正式提出四項原則，要求國民政府接受：

一、改組東北接收機構；

二、承認東北抗日武裝（民主聯軍）；

三、承認地方自治政權；

四、限制開入東北國軍；

因此，東北問題，本係中、俄兩國之外交上交涉。一變而爲國民政府與中共之內政問題。中共「新華日報」二月十八日社論，有云：

「由於蘇聯紅軍的協助，『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部隊』（指民主聯軍）之努力，已經在東北肅清了敵僞，逐漸在許多地方建立起『民主政府』……」

此段記載，無異於承認俄共之裝備中共，扶植中共，此乃共黨之一貫策略，今欲與共黨談商者，其鑒諸。

至四月一日，俄共以中共已佈置就緒，蘇俄共軍乃於十三日開始撤退，東北戰略要點遂落入中共之手。據莫洛托夫聲明：「俄共軍隊於五月卅一日方始自東北撤退完了。」但俄駐華大使照會則謂：「俄軍已於五月三日自東北全部撤退。」自俄軍移交後，中共更從事於建立政權，因是東北絕大部份爲中共盤據。亞洲今日之赤禍，基因於東北，亦即開始於東北，盱衡現局，迴想往轍，固不止爲——「爲甚麼失去大陸」之胚胎，抑亦爲赤化世界之濫觴，書至此，實不勝感慨系之已。

為甚麼失去大陸 下冊

陳孝威著

第二篇 你怨美國人嗎

第十二章 馬歇爾來華使命因何失敗？

第一節 魏德邁建議三國托管東北

中共藉蘇俄之盡力支持，而佔據東北。而國民政府因受美國對華政策之影響，卒至在各種複雜因素之交織下，淪失大陸。吾人對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奉行其總統之訓令，努力於國共合作其詳情已縷述於前篇。惟在日本投降之際，赫爾利開始發覺美國對華政策——促使組織——「聯合政府」係屬錯誤！認為此種政策，其唯一後果；為破壞美國戰時盟友蔣委員長及其政府之權威！赫氏於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十一月回華府述職，決心欲使美國務卿貝爾納斯重新檢討美國之遠東政策。

赫氏將遠東局勢及中國之國共雙方情形，提出利害得失之意見，並條陳新政策。當時貝氏表示願即考慮其新政策之建議。迨赫氏接奉國務院新訓令時，其內容為依舊促成中國「聯合政府」之實現，係繼續執行其原定政策，對於赫氏之新建議，並未採取。赫氏認國務院係堅持錯誤措施，提出抗議。然國務院仍不欲變更其對華政策，於是歸

爾利於十一月廿八日提出辭職。

赫氏於稍後時期，獲得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有發表聲明機會，對中國之共產黨詳加分析，而舉事實以證「國共聯合」政策之非計，並建議必須變更對華政策。經貝爾納斯駁覆赫爾利之批評後，參院外委會主席康諾利終於表決——「對中國局勢，不再作進一步調查」。

按美國對華政策，在珍珠港突襲之前，已傾向於「安撫」中共。當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羅斯福總統交其特使居里面呈蔣委員長一函，已可窺見。其函內稱：

「中國共產黨之本質，與真正共產黨相距甚遠。在我國則稱之爲『社會主義』，吾人贊賞彼等對農民、對婦女，及對日本之態度，我認爲此等所謂共產黨人，與國民政府相同之點，多於歧異之點，吾人希望國、共雙方能消弭歧見，密切合作，以符合吾等對日作戰之共同目標之利益。」

由此以後，美國對華，迄未改變其觀點。直至戰後，美國身受打擊，方始醒悟。稽考一九五〇年美國共黨首領——布勞特向美國會泰丁斯委員會所作之證供透露：

「羅斯福政府於第二次大戰期間，曾全力執行——促使蔣委員長停止鎮壓中共——之政策。」

「因此，美共已無必要再進行此項活動。蓋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間，美國對華政策——係爲促使中國建立由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民主力量之「聯合政府」。

綜上以觀，則赫爾利大使當初之努力於國共合作，乃一意執行其政府之命令。迨既拉攏「雙十會談」，毛澤東尙在重慶之際，於九月廿二日回國述職，始向其國務院有——重新檢討對華政策——之要求，甚至有不改變對華政

策，寧願辭去大使職務之舉措，其意志之堅決，定必有所見而後出此。赫爾利誠具有政治家之高尚品格矣！猶記不才於該年四月廿八日，建議中美同盟五十年備函送致赫爾利，（事詳本報本年三月廿二、廿四日），或者受不才此項建議之影響，如攬手觀弈者之偶然指點。於是赫氏因旁觀者之提醒，而使當局者悟解中共之本質，以印證美國對華政策之錯誤。赫氏之王張，與國策不合，則去。赫氏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且足以抵銷其過去執行錯誤政策之失云。

一九四五年秋，中共對國民政府所發布關於接受敵偽軍隊投降之命令，拒絕承認，中共更逕自單獨受降，扣押日軍物資，佔據淪陷區土地，此顯示中共藉談判而遂行其陰謀，意欲達成其奪取政權之目的。

至十一月十四日，中國戰地司令魏德邁向美國務院報告，略謂：「國民政府面臨中共之反對，對於佔領東北，國府毫無準備，魏氏曾向蔣委員長建議，政府應立即採取政策，在進入東北以前，必須鞏固長城以南長江以北之地區，並穩定該區內之陸上交通線。」

十一月廿日，魏德邁重向其國務院報告：

「予曾向蔣委員長建議，應集中其力量，以建立其華北之控制，並立即實施政治及吏治之改革，以消除官吏之貪污行為，並廢除寓禁於徵之稅捐」。

魏氏續稱：「中共之行動，如可視為可靠之實力表現，則中共游擊隊與交通破壞者，實具有阻撓國軍行動，從而造成犧牲重大之長期戰爭之任務。」

「蔣委員長及其參謀人員，對於東北之政府軍隊，其合理與安全之措施，並無充分認識，益以適當軍隊及運輸

之缺乏，因此，予又勸告委員長應在企圖佔有東北之前，集中努力，使華北之軍事與政治之形勢日臻穩固，而委員長亦以予言爲然」。

最後魏氏綜結稱：

一、如委員長接受外國行政及技術人員之協助，並經由誠實幹練之文官、從事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則華南之局勢先得穩定。

二、除非獲致與中共圓滿解決，或依照上述第一點辦法，否則政府縱經過數年，亦無法穩定華北局勢。

三、除非與蘇聯及中共獲致圓滿解決，否則，即經過若干年，亦不能佔有東北。

四、實際上蘇聯亦正爲實現中共或其本身在華北及東北之計劃，製造有利於共黨之情勢。此種行動，蘇俄實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

五、國共雙方，獲至圓滿解決，似尙有待。」

魏氏最後建議，即爲建立：

「英美蘇三國對東北之託管制度，直至國民政府堅強穩固，足以負擔對東北全區之控制爲止。」

魏氏之所以有此建議，國民政府之腐敗無能，已在收復區內之人民心中，引起不滿，甚至在對日戰爭甫經結束，即使人對國府之同情銳減。

魏德邁此一報告，著重於五點計劃中之第一點，以爲在華北之公務人員腐敗無能，擬請外國之政治人員從事改革，當是時，汪偽政權之和平軍方始改編，一切尙在擾攘複雜之際，以中國土地之廣大，人材之缺乏，來自自由區

者自矜其能，自伐其功，不覺驕橫傲岸。而在淪陷區者，因遭受歧視，其原有之自卑感，一變而為趨附奉承，於是政治導向於日偽統治之舊路，而美國務院據魏氏之報告，乃有馬歇爾使華之命，其出發點，固不僅為調解國共紛爭已也。

第二節 赫爾利辭職之插曲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之政策聲明，於十六日公布，其重要之點謂：「一強大團結及民主之中國，對世界和平，極關重要；鑒於美國及其他所有聯合國之重大利益，中國人民切勿放棄機會，以和平談判之方法，立即調和其內部紛爭，」並呼籲：「國共雙方立停武裝衝突，但保證美國對於中國內亂，不作軍事干涉，」同時「敦促中國各主要政治份子，迅即舉行一全國性會議，藉此以達到全國統一，而主要政治份子亦得參加政府工作」，其結論稱：「中國如走向和平統一，美國將協助中國善後工作之推進，工業土地及經濟之改善，及軍事機構之樹立，足使中國在維持世界和平與秩序方面，履行其國內及國際義務」。

杜魯門先於十一月廿七日批准赫爾利辭職，先一日杜魯門公佈派馬歇爾將軍為其駐華特別代表。於十二月十六日馬歇爾（到達上海），其訓令中，飭馬歇爾儘量利用美國地位，完成美國所持以「和平民主之方式統一全中國」之目的，設法促成國共雙方之停戰，等情。其另一部份，即以上項政策聲明，作為訓令，交馬歇爾執行。

基本上聞美國之意圖，簡括言之：

一、迫使國民政府容納共黨份子及其他各黨派人士，召開全國性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二、限定黨

派擁有之武力，使其成爲國家化之武力。並立即設法，停止軍事衝突，恢復國內交通。此兩大任務，第一目標：希望中國達到政治民主化之要求。第二目標：希望中共之武裝部隊接受整編，逐步達到軍隊國家化，並使中共之武裝叛亂，能立時停止。如是，國民政府之剿共計劃，自然放棄，則一切問題，可均由政治商談途徑，而求得合理之解決。

馬帥欲完成上項任務，又依據杜魯門之指示：

「與蔣委員長及其他中國首腦人士接談時，可以用坦白之態度出之。尤以涉及中國希望貸款或經濟及技術援助，并軍事援助等問題時，准用直截而堅定之語氣以答之。謂：既不團結，又起內戰之分裂之中國，休想成爲美國援助之對象。」：（見司徒雷登「旅華五十年」回憶錄）。胡適博士對此紀錄，曾作下列之批評：

「他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或干預，而是停止美國對華援助。」「但是此一武器，祇能致命性打擊中國政府，對於中共却不能發生絲毫效用。那時中共的軍隊，正由陸海兩方面趕往東北，以便在那裏獲取蘇俄佔領軍或蘇俄政府的無限量之援助。東北已成爲中共最接近蘇俄和堅強之軍事基地。因此，在馬歇爾出使之整個期間，中共代表就不斷地和成功地，逼迫馬歇爾停止或暫停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而馬歇爾和美國政府也因中共的大聲抗議，而真的有許多次停止了或暫停了美國一切對華援助。」胡適博士此言，可謂一語中的。

第三節 馬歇爾蒞華

按馬歇爾於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二月十六日到達上海，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南京，翌日轉飛重慶，蓋週

時國府機構，尙未全部遷都故也。至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八日，馬帥以談判無成而返美，爲時一年零二十天。其間曾參加大小會議至三百餘次。其所至地方，及於北平、張家口、集寧、濟南、徐州、新鄉、太原、歸綏等處。並曾蒞延安會晤毛澤東，由漢口而過返重慶，計逾一萬七千里之天空行程。最後又往廬山，八上八下，其忍氣耐勞之排解精神，實堪欽佩。惜乎其所持之主旨，爲強迫國民政府容納中共，以防止其歸附於蘇俄，而不知先訂立中美聯盟，以遏制中共之擴張。而蘇俄史達林則深謀遠慮，伴與國民政府合作，堅欲簽訂中俄協定，而暗中羽翼扶植中共。此真所謂一著錯，滿盤輸者是也。

馬帥與國府領袖及中共代表初步談商後，發覺國共雙方，互不信任，其所瞭解者，有如下列二種之相對性之觀念：

甲、國民政府方面：國民政府深信蘇俄已不願一九四五年八月所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規定，對國府所作控制東北之努力，加以阻撓。國府視中共爲蘇俄共黨之工具。國府領袖不願允許中共在放棄武力之前，參加政府。

乙、中共方面：中共則對國府懷疑，相信國民黨之目的，在於消滅中共。

中共相信其政治地位，如無法律保障，不啻自取毀滅。當時美國對華政策，其聲明中指出：

「美、英、蘇三國，曾與中國政府締結若干協定，規定將東北之全部領土與主權歸還於中國。馬帥之調解，自應根據聲明，爲覓致解決之方法。故解決方法，必須與各國與華所簽訂之各項協定相符，而必將中國之東北領土，歸還於中國國民政府。」

馬帥抵重慶後之二旬，由辦兩利商洽促成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民三十五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

（該項會議，確獲得五項協議，（包括政府組織問題，施政綱領問題，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問題，憲法草案問題）是項成就，與馬帥之希望相符，於是益堅其調解之信心。

馬歇爾抵華後，鑒於赫爾利大使之辭職，其權任人選，已向社魯門推薦魏德邁將軍承其乏。魏氏爲蔣委員長所信任，馬氏於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將此內定計劃透露，但要求記者們暫不發表，惟終爲中共周恩來等所知，立即向馬氏反映，提出反對意見，並以堅決而強硬之語氣，告之曰：「魏德邁之任命，爲中共所無法接受者。」

馬氏之方至渝也，中共代表大獻殷勤，時以悅耳動聽之言詞相灌輸，使馬氏發生好感而予以同情。同時「民主同盟」份子，如張瀾、羅隆基以民主人士自相標榜，雖與中共一鼻孔出氣，然而偽裝爲中立者，不偏附任何一方，亦日奔競於馬氏之門，其實，唯以攻訐國民政府爲務。如此親承日久，馬氏耳濡目染便生「先入之見」，認定中國非組織「聯合陣線」，不足以擔當自由民主之實現。故中共，「民盟」提出反對魏德邁接任大使，馬氏立即致電華府，請求撤回魏氏新膺駐華大使之任命。

第四節 「三人小組」之協議

一面復與周恩來等磋商，何人可被接受爲大使時？於是一位德高望重之教育家司徒雷登，得被提出。司徒對共黨之強權政治，固不甚了了，中共所布之棋局若是，馬歇爾無形中墜其術中而不知，反成爲中共之庇護者。中共之狡計在於使馬氏誤信——中共係企求國家之統一——有合理解決之希望——中共不欲掀起內戰有歸併軍隊可能，引起美國之不倦調解。其目的，在使美國不給予國民政府之大量軍援，使馬氏對蔣委員長起不良感覺，卒之軍援停止

，中共坐大！究誰之過歟？

而美國則強迫中國接受其調解建議，否則，連經濟援助亦將停止，挾以相脅。美國此種錯誤，適與中共所希求者相符。當時中國人士認為：此係提出兩種自殺方法，由中國任擇其一。但中國政府在八年抗戰後，精疲力竭，百廢待舉，逼使蔣委員長必須儘可能依照此等條件，進行談判。

馬歇爾作調人開始談商，適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聖誕節前後，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方正式開始邀請國、共兩方派遣代表，作三方面之會議。在起首會談時，中共代表在會議席上佯作熱誠祈求和平之姿態，同時各地中共部隊則到處分頭進攻，冀圖多得戰略據點，藉可以作為既成事實而佔優勢。

在河北省則新佔玉田、豐潤。

河南省新佔孟縣、考城。

山西省新佔侯馬、福山、寧鄉。

江蘇省北部破壞隴海鐵路數段。

山東省新佔泗河、界首。

至此共黨佔據地區愈益擴大，至有八十一個縣城。

在會談中，周恩來首先提出，堅持內蒙邊界之赤峯、多倫，應於停火令中規定，交由中共控制。該兩城市扼察哈爾、熱河之咽喉，為入東北之要道，若果該兩城市為國軍掌握，則現已竄入東北之中共部隊，其後路截斷。反之，該兩城落入中共手中，中共便可從此而蠶食東北，惟在該時之赤峯、多倫，尚被俄軍佔據，未經撤退，俄軍雖默

許中共借道，且中共已經假道而往東北，但仍堅持明文規定——赤峯、多倫於俄軍撤退後由中共控制。蔣委員長爲使停火令順利執行，乃接受此項要求。當停火令簽署時，中共即藉此據點控制熱河全省。而扼察、綏東北之咽喉之赤峯、多倫，遂由俄軍移交予中共。

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前，擬先成立三人小組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各派一人，而以馬歇爾爲主席。國民政府派遣張治中出席，中共派周恩來出席，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舉行首次會議。

一月十日，三人小組議定停戰協定，國民政府及中共均分別對其部屬頒發明令，着各停止武裝衝突及軍事調動，馬歇爾前於一月四日面告周恩來，謂「美國政府曾承允協助國民政府軍隊開入東北」周氏表同意，乃於協定中，並附載例外條款，并附帶聲稱：「國府軍隊之開入東北，係與美國政策，及一九四五年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觀點相符。」其例外條款大意如下：

「國民政府得將其軍隊開入東北，俾可恢復中國在東北之主權，並得依照其所擬定之軍事改編計劃，在長江以南作軍事之調動。」

第五節 國府頒發第一道停火令

該項協定及其例外規定，經作爲官方新聞，予以公佈。其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亦附載於協定。「軍調部」於一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開始執行職務，該「軍調部」亦以三人小組爲主體，國共兩方各派一人美方派一人。政府與中共在軍調部執行小組并派赴各地執行停戰命令。軍調部所發訓示命令之戰地小組中，享有同等之代

表權。軍調部三委員一致同意之必要訓示及命令，應以中華民國之主席名義頒布遵行。至於美國之參與，僅以實施停戰命令爲限。

蔣主席根據三人小組會議之協議，頒布下列停火令（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第一道停火令）

「中華民國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民團、非正規部隊，或游擊隊，應即實行下列命令：

一、一切戰鬥調動，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規定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惟對於復員、換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須調動，乃屬例外。

三、破壞與阻礙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交通線之障礙物，必須拆除。

四、爲實行停戰令，應即在北平設一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與命令，應有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前項命令，規定於一月十三晚十二時以前生效，不分何地，一律實行。在上項命令頒佈時，國共雙方並聲明下開規定並載入會議紀錄。

一、雙方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長江以南之整軍計劃，繼續實施，並不影響。

二、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

三、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三節內之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

四、茲同意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項規定下之調動，應每日通知軍調執行部。

雙方並聲明軍事調處執行部之一切協定，建議及指示，只涉及停止衝突所引起之直接問題。

美國參加調處執行部，僅爲協助中國委員（包括國共雙方）實施衝突命令。

軍事調處執行部內設置執行組，包括若干官員，足敷實施監察辦法之實行。

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委員，得各別設置通訊線，足保迅速而無阻礙之通訊。

同時，蔣主席並另致電中國陸軍總司令（南京總司令何應欽爲當時最高軍事機構）各戰區司令、各綏靖公署、各方面軍、各軍長、各省主席，飭「一切切實遵照政府停戰命令」。

蔣主席頒佈此第一道停戰令，國軍部隊當然恪遵奉行，立刻停止戰鬥。奈共軍則依然不時進擊國軍防地，甚且乘機發動猛力攻勢，襲擊國軍。據各地軍事首長報告，計有：

山東方面：韓莊、利國驛、聚莊、臨城、滋陽、聊城、博山，遭共軍攻擊。

豫北方面：汲縣、淇縣、安陽、修武，遭共軍連續攻擊。

豫南方面：共軍繼續進攻經武、郭家河、灣店。

蘇北方面：泰縣姜堰、徐州大廟、海東段、新安鎮，全陷入共軍炮火。

山西方面：榆次、武鄉、汾陽、中陽、交城、曲沃、翼城，國軍被迫後撤。

河北方面：東光、連鎮、泊頭、石家莊、元氏，遭共軍迭次襲擊。

綏東方面：共軍迅速調集，進攻集甯。

熱河方面：赤峯方面，共軍進犯。

由於第一日之停戰，國軍奉行命令而挨打，損兵失地事少，而政府聲譽與士氣之受打擊，則無可估計。而馬帥則認為「暫時不合理現象，或出於共軍之誤會」。仍抱樂觀。

軍調部三人小組，簡稱「軍事小組」，於二月十四日舉行首次會議，至廿五日成立協議，稱為「關於軍事改編及共軍整編為國軍之基本原則」。該協定另規定，「人民權利，應不受軍事干涉」。該協定規定「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被指定為負責監督本協定施行時所需各項命令之執行者。則軍事小組為執行該軍事整編協定所規定之種種辦法，並應於十八個月內完成。」

該協定預計：國軍於十二個月內縮改為九十個師，中共軍隊於同時期內改編為十八個師。繼在其餘六個月內再行縮編，將國軍編為五十個師，共軍十個師，合計全國六十個師，共同編成為二十個軍，每師不得超過一萬四千人。整編程序，規定於第七個月開始，依照協定規定，政府及中共關於復員人員之給養，運送及就業問題，先由政府及中共，各就其所屬人員分負責任，並由政府儘速負擔全部責任。至於整編及佈防，全國分為下列主要區域：

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南，包括臺灣，每一區域駐軍分別規定，至十八個月之限期屆滿時，各區駐軍分配如下：

東北區：國軍十四師，共軍一師，

西北區：國軍九師，

華北區：國軍十一師，共軍七師，

華中區：國軍十師，共軍二師，

華南區：國軍六師（包括臺灣）。

依照該項協定規定，政府及中共，均應於本協定公佈後三星期內，將應保留之軍額（國軍九十個師，中共十八個師）及其最初復員單位之順序，擬具表冊，送交軍事小組。當時政府依限將表冊送達，而中共迄未遵辦，後經催促頻數，終因拖延，致生政府對中共之疑忌與不信任。

關於實施整編及共軍改編入國軍之基本計劃，軍事小組於三月十六日對北平軍調小組發出指示，使其執行整編編組計劃，於該部內另設一小組專司其事，此係參照國共各一員美方一員爲原則，指示內另行規定，務於三個月內先將効力於日本之傀儡軍隊解散（即汪偽之和平軍及其他地方部隊），又規定國共兩軍經編整後，應立即施行訓練，定期十二個星期，又規定另設立一「人力復員委員會」，將其工作與政府中共民衆團體救濟機構及軍調小組連系配合。

第六節 「軍事改編協定」之締訂

爲和平奠定中國統一，基於三個主要步驟，一、軍事改編協定之締訂，「停戰協定」，使國共戰事確實終止，「政協決議」，使政府改組而樹立立憲政體，「軍事改編基本方案」，使共軍改編爲國軍，則原日之黨軍變成爲國家隊伍，即共軍得到五對一比例之承認。

馬歇爾於軍事整編協定簽字時，曾作簡單演說，略謂：「本人認爲此一協定，代表中國之遠大希望，本人深盼

此項協定，不致因少數不妥協份子一味自私，而被破壞，致中國人民尋求和平與繁榮之熱望，受其損害」：

馬歇爾對於此協定會議之初，首先發言稱：「當議訂此軍事整編協定時，予曾強調：中國必須仿效西方之軍事傳統，創立一國家化而無政治性之軍隊，將其用作民主之軍隊，而非極權者之武器，其所達成之協定，係以軍隊應與政治分離之原則為根據，該項將訂協定中，雖未必將此項原則明白列入，但其條款之涵義，必須與此原則相符，此一原則之適用於中國，極關重要。蓋在中國，政府力量，終須依靠軍隊，而軍人時常干預民事行政，甚或充任官吏，以合法地位直接控制行政機構。經此整編之後，希望從此軍政劃分權限，以完成真正民主之實現。」

馬歇爾對該整編協定簽訂後，其報告美國務院稱：「國民黨方面，若干實力派，激烈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而有力軍人則反對整編協定，恐其本身地位受威脅，恐為將來執行之障礙。」

「其他如所傳說：國民黨便衣人員，對羣衆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突加襲擊，警察對少數黨出席政委代表加以干擾，及重慶共黨報社之被擄毀等，令人恐懼，國民黨內部之未能妥洽，將來必至影響各項協議之困難與波折。」

先是美、英、俄三國簽定雅爾達協定，嗣後蘇俄以壓力加於美國，冀於中國簽訂友好互助條約，藉以允諾其在東北之利益。美國不察，以其所受之壓力，轉施之於中國，中國迫於難時環境，不得已與俄簽訂條約。而蘇俄於美國投擲原子彈，而稔知日本必將投降之後，方始提兵進入東北，未費一彈，未傷一卒，而東北遂被囊括。俄軍雖然承諾於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十二月三日將俄軍撤出東北。奈俄軍乘馬帥調解國共合作之際，劫掠東北之全部工業設備，攫奪礦產，並暗中讓中共部隊進入東北，而以日本投降武器，裝備中共。因此故意托辭稽延，復一再延期，經中國提出強硬通牒，始於四月六日撤離。但進行緩慢，使中共得其掩護，得如暗渡陰平，陸續佔據沿鐵路及各衝

要地帶，且使偽滿軍隊交中共收編，迨俄軍於翌年四月廿九日退出東北，而東北全區，已爲中共全部佈滿。於是中共有東北爲其根據地，兵源既增，物資又獲，裝備亦齊，大陸遂致淪陷。

第七節 派遣「軍調小組」赴東北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之停戰協定，除有關國軍調動外，未曾指明中國任何部份不適用其餘條款，且三人小組會議亦未嘗表示東北不包括於停戰協定範圍之內，馬歇爾認爲軍調部應在東北行使權力，以免中國兩大對壘武力，於俄軍撤出時在該處發生衝突與困難，奈俄軍遲遲不撤，陰使中共坐大生根，國民政府因此對俄共在東北之意圖與目的，頗有迫使國民政府不能控制東北之感想。

一月廿四日，馬歇爾因營口發生戰爭，擬即派軍調部執行小組巡赴營口。並決定將來如在任何地區發生同樣事件時，採取同一辦法，此建議得中共贊同，然國民政府不願同意。二月廿日，馬歇爾指出，軍調執行小組可能爲實現停止衝突及爲整編軍隊計劃，確立一基礎，擬再行派遣小組至東北，但仍未獲成功。此項馬氏建議，已爲中共所默許，但國民政府不願東北局勢之惡化，堅持己見。在此階段，馬氏認定國民政府似已決定，關於其在東北之行動，不擬接受任何拘束，而採取絕對以武力佔領該地區，及遇中共阻撓時立予撲滅之政策。但馬氏估計國府軍事力量尚不足以達成此項目的。

馬歇爾基於上述觀點，深不滿於國府不贊同派遣軍調小組赴東北，乃將上開各情，報告於杜魯門要求回國述職面報詳情，並報告一般經濟情況，與剩餘物資，善後救濟總署事務，及船舶之轉讓與對華貸款等等。乃定於三月十

一日飛返華府。馬氏將離華前，國府通知馬氏派小組往東北，但附有若干條件。直至三月廿七日始對小組進入東北一事，商定協議，惟小組職權稍有限制，該小組之力不足以停止戰事，而其發展，反致國軍受到拘束，促成危險之境。

馬歇爾對於國軍，其內心已頗滋不滿，而中共復提出一控訴，謂：「國民政府在廣州之軍事指揮官違犯停戰令，拒絕承認軍調部在其所屬地區行使權力」。馬氏認中共為有理由，同時馬氏認南京最高統帥部不向北平軍調部報告其部隊動向，係違反停戰令特別條款。又在鄂北豫南地區六萬共軍被國軍包圍，已將絕糧，馬氏認國軍更違犯各項協定，緣此種種，馬歇爾從此遂對國民政府發生成見。

國民政府軍隊應於俄軍撤出而開進填防，以恢復東北軍政之主權，此本訂定於與中共所簽訂之「停戰協定」之內。奈當時國軍在察熱等鄰省之軍隊，可以就近立即移轉整補全區者，不過十三萬七千人，殊不足以調遣布防。而由海道直開東北，則俄共不准國軍靠泊大連港岸，及取道營口，由陸路則不許國軍調派鐵路車輛，藉口為「中俄友好同盟條約」所規定。當時國軍以運輸工具缺乏，請由美國調遣船舶及大型運輸機，不圖中共反貽為口實，向馬歇爾提出抗議，乃根據二月廿五日所議定之「軍事改組計劃」內所明定政府軍駐東北之隊伍，只限定五個軍，如美國繼續協助運送國軍，顯係違反此項「改組計劃」之規定。美馬歇爾則謂：「軍事改組計劃」，對於東北駐防國軍之限制，須俟十二個月之後，方能生效，至國民政府軍隊之進駐東北，係依據一月十日之停戰令。」

第八節 中共違反自簽之停火令

俄軍於四月十五日撤出長春，中共即於翌日命共軍昂然入城，佔領該區。中共此項行動，馬歇爾認爲違反中共自簽之停戰令，且引起嚴重後果。此時中共在東北之軍官，跋扈飛揚，任何事務，已表露其不願妥洽意向，且顯示其不再實踐其議定之條約矣。

查馬歇爾於四月十八日來華，中共向馬歇爾提出，「兵力分配、地方政權分治、及改組政制」等之要求。國民政府認爲「停戰令」已明白規定：授權政府軍進佔東北任何地區，以建立主權。此既定之決議實無須再加研討。即有關政治問題之談判，亦須根據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俄條約所載：「鐵路附近之主權建立以後，方可考慮」之條文辦理。

馬歇爾此番來華，胸有成見，以爲蔣委員長有意使用武力奪回長春，俾壓倒該地之共軍。馬氏雖有此想法與表示，但蔣委員長在五月初旬，提出一項建議，一如六星期前中共尚未佔領長春時所提解決東北種種問題相似。並表示中共須退出長春，由國軍進佔後，即將開始談判關於兵力分配及政治改組等事宜。惟長春地區之共軍將領，因獲得中型砲坦克及很多日軍裝備，力量加強，而國軍由於遠道運送，補給困難，加以北進時軍隊距離遼闊，愈進則愈覺力量分散。中共不願蔣委員長提議，反窺伺馬歇爾之閒隙，猜測馬歇爾之心理，周恩來力促馬歇爾停止供給國軍船舶運輸，謂可迫使蔣委員長就範。馬氏雖未從周恩來之請，然美駐青島天津及沿鐵路線至秦皇島之陸戰隊，既不如此前之漁壯聲勢，裝作不聞不問，而長江下流所需燃料孔殷，美方所予協助之運輸，亦漸緩慢而不積極。

中共企圖改變駐東北之軍力分配，周恩來向馬歇爾面稱：「中共方面欲修正整軍計劃所規定十八個月後，在東北共軍保有一個師，國軍保有十四個師之比率，並堅決反對政府增兵東北。」馬歇爾答稱：「美國運送七個政府軍至東北，係美國應履行之義務，實際運送至東北之國軍共計二十二萬八千，而整軍協定十二個月後國民政府駐東北

之軍隊，原規定爲二十四萬人左右。」

馬歇爾向周恩來表示：「余（馬歇爾自稱）以爲雙方立場根本上不同，在於東北之主權問題，主權包括控制，國民政府不佔領長春，則無以控制，蔣委員長已向中共作重大讓步，即共軍如撤出長春，則彼願與中共談判有關東北其他地區之問題，余已不自信，調停可以解決問題，因余正說服政府採取種種行動，以達成和洽共處之際，而中共則又另起變化，新提條件，高索要挾，蓋欲藉長春之佔領以獲得其更大更多之權益。」

當軍調部小組開始執行時，中共方面之代表軍官，顯示其高度合作之誠意；馬歇爾部屬頗受其誘惑。其後美方人員發覺中共軍官慣施阻撓策略，即常理應該採取之行動，亦均爲中共所反對，若破壞鐵路沿線防禦工事問題，迄未獲得協議，而華北局勢，受東北演變結果之影響，以中共之強佔長春，不肯撤退，因此危機重重，軍調小組形同虛設，馬歇爾認爲如此勉強調停，終無裨於事實，表示暫時退出調停。

第九節 馬歇爾偏袒中共

先是，馬歇爾見蔣委員長必強調局勢之如何嚴重，馬氏其後表示：「現存之甚多困難，政府本可及早避免，卒至局勢逆轉，國共雙方完全缺乏誠意與信賴，互認對方之提議必起於不良動機，國民政府阻撓軍調小組進入東北，該項小組可能影響整個局面。中共謂一月十日之停戰令適用於全國，而國民政府則拒絕施之於東北，國軍進入東北時，企圖毀滅腹地之中共力量，委員長之軍事顧問判斷力薄弱，下述各點，國民政府實給予中共以譴責之機會；

一、漢口以東某地共軍被國軍圍困。

二、重慶軍事最高當局違反停戰令，命令其部隊，進迫熱河省之赤峯。

三、廣州軍事當局拒絕該區共軍之存在，同時拒絕軍調部及國府自重慶所發調查該區局勢之命令。

四、國軍陸軍部未曾遵照停戰令，就長江以南之軍事調動，逐日報告。

五、搜查中共人員住宅，關閉北平中共報館。

六、國軍飛機轟炸延安機場。

七、瀋陽機場扣留軍調部共方人員。

以上舉動，馬歇爾認國民政府係無益之愚笨行動，不僅予中共以攻訐之藉口，且更屬嚴重錯誤，難怪中共對國府起疑忌之心。國府在東北可獲致和平之機會，不會予以運用，但中共則利用目前局勢，使其地位日漸強大，國軍由於防線過長，兵力分散，軍事形勢處於險惡地位。

以上係馬歇爾呈報美國國務院之要點，自可見馬氏對蔣委員長批評其爲違反停戰令，及進佔赤峯，而對中共之佔領長春，僅說違反停戰令而曲意爲欲鑿其慾望之調停。蓋一面阿諛順從於當面，反對改變於背裏。一面則正直而恭敬，不苟言笑，不盡情發揮其義理，偶有悖拘，便癥結於懷。甚矣私人好惡之足以害公，誠不誣矣。

馬歇爾將軍擬以軍調部派一先頭小組進駐長春，作爲談判進行前之基礎，俾共軍撤出長春而由國軍於六個月內進駐，最好儘可能予以提早。

上述辦法，除向蔣委員長提出後，馬歇爾復向周恩來提出。周氏謂轉達延安候示，馬歇爾於是對周恩來強調稱：「除非彼（指馬）對共黨在軍事及政治問題之立場，能獲得相當確切之認識，彼不能再作調人。且除非周氏能

相當保證其成功，彼不能參與一項協定，而其中規定係與各種重大或基本爭執，應如何談判一節有關者。」

中共對此折衷方案之答覆，表示：「恐政府一旦佔有長春後，復提出其他如哈爾濱等城市之問題。」中共又表示：「希望在東北有五個師，以變更『整軍協定』所規定之一個師。」

此時馬歇爾每日去見蔣委員長，所商談者，實為關於軍事方案之詳細條款，例如：軍隊重新分配作為頒發停戰令先決條件、長春問題、長春以北地區問題、軍調先頭小組管制長春之暫時辦法等。

五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對馬歇爾說：「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料想政府軍於五月十九日佔領四平街後，或已向長春挺進。我（蔣委員長自稱）擬於五月二十三日前赴瀋陽，以便控制該地局勢。」馬歇爾向委員長陳述，此事不宜拖延，希望委員長能及早回來，以便完成談判。馬歇爾認為蔣委員長此次旅行，乃造成局勢幾乎完全惡化之一開端。又委員長向馬歇爾商借坐機，外界即傳說委員長此行，係出於與馬歇爾之商決，事後馬氏指出，為此借飛機事，使馬氏頗感窘惑。

馬歇爾提出三點達成協議之先決條件，於委員長未起程前面交，同時並送達周恩來，其三點先決條件為：

- 一、中國共產黨必須盡力協助恢復交通。
- 二、任何有關東北問題之協定中，必須以條款規定，限期實行軍事復員及改編計劃。
- 三、執行小組或高級參謀人員，若僵持不下時，最後之決定應操於美方代表。

周恩來謂：「中共可同意三點先決條件之建議，中共代表將與政府代表力謀交通問題之解決。至於決定權賦予美方代表一節，將與同僚再作商量後，答復之。」

五月二十三日，政府軍進佔長春，沿鐵路北向哈爾濱，東向吉林推進，局勢似已扭轉，時委員長在瀋陽計住一天，馬歇爾於此時於無線電廣播中，請政府頒佈停戰令，以爲可消釋中共對馬歇爾之懷疑。

五月二十四日，委員長向馬歇爾提出恢復和平之正式條件，由瀋電京，意謂一月十日之「停戰協定」，二月五日之「整軍協定」，要求執行有關政府收回東北主權之行動自由，共黨尤應不破壞政府機構恢復華北交通，方可昭示共黨守約。主張軍調小組之美方代表有最後決定權，並詢問馬歇爾將軍，對中共執行協議之誠意，能否保證？

馬歇爾復電到瀋，除作上項委員長意見之申明及闡述外，並建議於長春立即成立「軍調小組」，並促請在商討停戰細則時，立即頒令停止軍隊之攻擊、追逐或前進。同時對委員長之詢問能否保證中共之誠意一點，請解釋「保證」二字之意義。

五月二十八日，再電馬歇爾，除重提前電各節外，對於馬歇爾提議賦予美方代表決定權，應有一限制，表示同意。委員長鄭重指出：「關於收復東北主權之方法，國民政府不能放棄該地任何部隊行政權之接收，但或可同意在軍事進展停止後，僅派遣行政人員及維持當地秩序交通，所絕對必需之軍警。至於「保證」一辭，係指馬歇爾將軍規定一期限，使其所簽字之一切協議發生效力，並負責監視中共，務使中共能嚴格履行。」

第十節 中共佔領四平街長春

馬歇爾將軍爲欲國軍停止攻擊追逐前進：請政府頒發停戰令，又於五月廿九日去電在瀋委員長。嗣於卅一日，得知委員長已抵北平，續以前意電平。六月一日委員長覆馬歇爾電，致慰藉之意，並甚願見到馬歇爾派「軍調小組

「前赴長春，展開工作之建議也。」

自整軍協定簽訂後，中共對於應提供之部隊名冊與文件，始終不敢提出。而馬帥係於三月十一日返美述職，中共竟於三月十七日以武力阻撓國軍接收東北，並襲取遼北省會四平街，囚禁該省主席劉翰東。

國府爲接收東北，與蘇俄達成協議後，國軍四千人空運至長春維持治安，準備於俄軍撤退後接管。同時國軍新一軍、新六軍相繼到達，沿中長鐵道推進至長春及大連。先是，國軍於三月廿八日進駐營口，卅一日收復海城，四月三日收鞍山、牛莊。南路國軍已抵大石橋、蓋平線。其向長春前進者，亦於三月卅日至開源，四月二日下昌圖，五日進紮四平街。當時中共重兵盤據於四平街，蓄意阻撓國軍，戰爭遂醞釀而成。

同時中共忽以其主力結集於遼西走廊，在萬家屯藏地雷，北寧路客車被炸。一面突襲山海關外之前所、前街、綏中、錦西、興城，以切斷北寧路，使關外國軍陷於孤立。

國軍被迫應戰，經過十天之周旋，始將遼西走廊打通。自四月十四日俄軍自長春撤退，國軍進駐，長春市長趙君邁、警備司令陳家珍就職視事。而中共周保中部早有覬覦長春之圖，乘俄軍撤往哈市，共軍即於十四日夜自外國進攻，陳家珍率部四千人暨保安隊二千人應戰。共軍向以多吃少，以壓倒優勢，奮力猛擊，於是機場及郊區據點相繼陷落，國軍退入市區困守。共軍向國軍據守點，四處燃火，演成八面火海，國軍駐地亦遭焚燬，四月十七日電訊一度中斷，形勢已瀕危殆。惟國軍新一軍被中共阻隔於四平街，致不能赴援長春，乃抽一部兵力繞道應援，攻入公主嶺，一部則直攻四平街。奈長春守軍至十八日偏促於一隅，且糧械均絕，長春遂告陷落。陳家珍因傷被俘，趙君邁被劫持。

自四月十六日起，國軍爲欲馳援長春，致再啓四平街之戰，共軍林彪親自部署，冀得一逞，雙方戰爭成膠著狀態。另一部國軍於撫順遼陽外圍前進，突在太子河遭遇中共橫襲，國軍爲確保遼陽安全，力與抗禦。中共以本溪爲根據地，翻復攻擊。至是，東北並生兩個主力戰場。

海城由國軍一八四師潘朔端部之兩營守衛。中共爲配合四平、本溪兩地主力戰相呼應，乃開闢中長鐵路南段之另一戰場，突攻大石橋、蓋平、向海城包圍。國軍以衆寡懸殊，不得已突圍退却。詎至柞木城附近又被共軍包圍，經激戰後，一部突圍，而潘師長及一部士兵被俘。

俄軍於四月廿五日撤退哈爾濱。先是，政府代表團董彥平暨松江、嫩江、合江等省政府人員，與長春鐵路董事長萬吳、劉哲等人，於俄軍自長春撤出時，隨俄軍至哈爾濱。茲俄軍又撤出，哈爾濱即爲中共佔據。東北局勢，愈增嚴重而趨於惡化。

五月三日，國軍擊破中共阻力，展開本溪大戰，中共不支潰退而至安東。

國軍在四平街摧毀中共防禦體系，作主力猛攻。共軍集結於四平街者約有十一萬人以上，又強迫農人、工人、難民十餘萬人，驅逼該等平民上戰場第一線。國軍見均係無裝備之平民，不忍加以殺戮，致前進即爲此輩羣衆攔路所阻。五月十七日，國軍攻克西豐，共軍補給中斷，至二十日共軍總崩潰，國軍乃收復四平街。廿二日收復八面城（四平西側），同時另一部亦逾越公主嶺，抵達長春南郊范家屯。廿三日長春重光，并收復遼南之伊通。四平國軍亦進展至遼源、東豐。五月廿八日吉林收復，小豐滿亦掌握於國軍。同日在伊通之國軍，又收復雙陽、磐石，控制吉海鐵路。駐長春之國軍，則收復懷德、德惠、農安各地，前鋒直抵松花江岸。

當國軍全力肅清吉長局勢時，中共又在瀋陽以南，發動攻擊，以圖牽制國軍。鞍山雖曾於五月廿六日一度失守，旋即卅一日即行克復。中共迭次圍攻營口，終爲國軍擊退。迨六月三日國軍增援，開始反擊，一舉而收復海城，四日又攻克大石橋，中共至是，其攻勢頓遭挫折。

先是，（民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國軍陳明仁率第七十一軍由長春進駐四平街。中共使用「人海戰術」向四平街猛攻，晝夜不停，且已佈成包圍，四平街變爲危城孤守。中共慣用「圍點打援」戰術，使援軍步步受阻，至第四十九天，援軍得抵達四平街，圍困始解。

按四平街原有新老二城，「老四平」俗呼「北溝」，距「新四平」城約十餘里，市區及繁盛區域，均集中於「新四平」。而「新四平」又以鐵路軌道爲界，分爲「道裏」與「道外」，遼北省政府及市政府，皆在「道裏」。當四平街防守戰之際，陳明仁以節省兵力，易於防守以待援爲理由，決定放棄「道裏」，而專守「道外」。而遼北省主席劉瀚東認爲欲守四平街，應保守整個四平街，豈有分割而守之理，奈陳明仁置劉瀚東抗議於不顧，突然撤守。而「道裏」之人民未經通知，亦不前知，事出倉卒，致羣起驚慌，爭先逃命，兒啼婦哭，狼狽不堪。復有小部份士兵，趁火劫掠，人民財產之損失甚重，引起民怨沸騰。此一事也。

陳明仁復於「道外」設防地，命令部屬——強拿民間之主糧，大豆、麵粉，當作沙包，以構築工事。甚至連聯合國救濟總署之麵粉，本備存於倉庫，亦同樣不問誰何？攫取使用。不良士兵遂亦私擅盜賣。此引起人民憤忿之一事也。

第十一節 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整編部隊

這援軍攻佔鐵嶺、昌圖，四平街之圍得解。其構築工事之沙包，即大豆與麵粉，除一部份燬於砲火及霉爛之外，四處聚集仍阜積似山，此批物資，物主誰屬？無從查考。（因收集時急促而無紀錄）陳明仁主張出售，將款撥給七十一軍作爲犒賞。經劉瀚東反對，認爲係民間之財物，其款應交與民間所辦之合作社。其後行營以此項價款之大部份予損害最重之商民外，餘則撥給七十一軍作犒賞，及合作社作資金。

當四平街之被圍也，戰事正趨猛烈之際，蔣委員長特親臨上空，並由飛機投下親筆手諭：諭末有：「願孫總理在天之靈，庇佑爾作戰勝利。」經此次激勵，軍心振奮。陳明仁自恃功高，但「四平街」人民向國民政府告發陳明仁縱兵殃民，濫舉事實。政府以佐證確鑿，乃予以「撤職查辦」處分。陳明仁懷恨在心，認爲賞罰倒置，其投靠共黨之心，實已萌於此時矣。

蔣委員長於六月三日自平返京，即晤馬歇爾面談經過，始知馬歇爾日前電文中因翻譯錯誤，以致誤解。馬歇爾至是立即電令成立長春「軍調小組」。委員長並同意頒佈停戰令，不進攻共軍，以十天爲期，以證明共黨有無誠意，且在限期內，中共應與政府完成下列問題之談判：

- 一、關於停止東北全部衝突之詳細辦法。
- 二、限期完全恢復華北交通之確定詳細辦法。
- 三、如何執行二月廿五日整編軍隊之協議，不再拖延。

上項提議，委員長最初提議以七天為期限。馬歇爾認為太過短促，乃改為十天，委員長并告馬歇爾稱：「此為余與共黨交涉之最後一次，現在各地交通受阻，糧食燃料均感不足供應，造成社會不寧與經濟混亂，此種局勢，斷難持久，余被迫而不得不從事全面戰爭。」

周恩來對上開提議，要求延長，因彼尚須往延安一行，最後決定限期十五天。

六月六日，政府與中共同時宣布，分別命令在東北之所屬部隊，停止攻擊追逐十五天，停止全部東北軍事衝突，恢復全國交通，以及執行「整編軍事辦法」不再延宕等情事，政府與中共取得協議。

周恩來自延安回京，即開始商談，首成立恢復交通之協議。至此，正式停止東北全部衝突，總算勉強取得妥協。惟困難之點，厥為復員與整軍，尤其在東北及山東等地之部隊分配工作，最感棘手。同時有關全國各地（多在華北）零星而激烈之戰事。此項行動，發動於一週之前，短期通知，自難使其停止。

在此期內，共產黨惡毒發動反美宣傳及強指馬歇爾支持國民政府之軍事。共黨此舉，有二項企圖。

一、喚起美國之反對派，派遣軍事代表來華。

二、抵銷蔣委員長所提，在雙方意見不一致時，美國軍官代表有最後決定權，在美所生之效力。

當正將成立協議之際，蔣委員長離京赴瀋轉平，同時國軍部隊利用長春而更乘勝進佔，馬歇爾實感狼狽。因馬氏向中共提議退出長春，已獲接受，而國軍進襲不休，使中共藉口馬氏調人偏於國府，甚不公正，即以借座機一事，可證委員長到瀋陽之日，即國軍佔領長春之時，殊巧合也。

因中共佔據東北之長春，並破壞東北鐵路交通，引起國共戰爭，雙方經馬歇爾之居間調停，商定停戰辦法，惟

停戰期限僅只十五天，於此半月功夫，必須將東北全部接管辦法，華北交通全部恢復暢通方法，及整編軍隊與分配之執行辦法，完成妥洽。乃自停戰後，進行遲緩，兩邊均不願於對方尚無表示時先作任何承諾。詎知中共不顧信守，竟於停戰開始，即在山東向國軍進攻，公然違背停戰協議而突施猛烈襲擊，而馬歇爾雖向中共要求停止攻擊，中共則一味用貌作恭順，伴似承諾，以爲敷衍，陰則違反不理，而馬歇爾終被其拖延狡計所愚弄，無可如何，反而偏聽中共一面攻訐之辭，虛偽之語，轉要求國軍不再抗禦。馬氏心理上先入之見，已牢不可移，而國軍礙於居中調停，未便直截否定，但對其詐爲解釋，奈仍未邀馬氏之同情與瞭解。

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者數人，向馬歇爾進言，稱「一面由三人委員會會商軍事問題，一面召開政協綜合委員會討論政治問題」：馬氏答稱：「此事不在渠權力範圍之內，蔣委員長曾說，政府在未佔領東北以前不願商談政治問題，但其後委員長復稱：政府佔領長春以後，自可討論軍事及政治問題。周恩來表示：『最好避免討論政治事項，並保持各地現狀。』各等情，周氏又言，『雖然馬歇爾將軍不願接受解決行政問題，此事可由改組後之政府採取行動予以解決。』」

蔣委員長於六月十七日提出建議，交馬歇爾並轉致中共；其內容：

- 一、中共軍隊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以前，撤出熱河及察哈爾兩省。
- 二、政府軍隊佔領山東省之煙臺及威海衛。
- 三、國民政府在青島增加一個軍之部隊，俾該地駐防之美國海軍陸戰隊得以撤出。
- 四、中國共產黨應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以前撤退其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正午以後在山東強行佔領之一切地。

點，并交出行政權，由政府軍佔領駐防。

五、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政府軍在天津區域增加一個軍之部隊，俾該地美國之海軍陸戰隊得以撤出。

六、關於東北應全面由政府軍隊布防（當時被中共所佔領者有哈爾濱、安東、通化、牡丹江、白鎮等等）。

馬歇爾將上項提議，轉交與中共周恩來。周氏表示：「此項提議，係屬過份要求，使共黨無法接受，除山東省恢復六月七日以前原狀外，其餘各區，皆不值考慮。（此指停戰期內中共在山東所攻佔之地，可以撤出，其餘則均係停戰前所保持之狀態，故不談。）且雙方既已下令於六月七日起，東北所屬軍隊，停止進攻或追逐，則六月七日之期限，應僅止適用於東北。至於中國本部之恢復原狀，應依據一月十日之停戰令，以一月十三日之情狀作根據。」

馬氏將周恩來之言轉陳之於委員長，並聲明中共不至接受提議，亦無意修改。同時馬氏請周恩來赴延安，俾與中共諸領袖商酌，周恩來謂：「曾經與國民黨官員商談，覺得此項提議，確無往延安磋商之理由與必要」。

馬歇爾認中共之怨尤，在於政府欲使共黨所佔領之各省市全部退出，交由政府管轄，致生障礙，又認政府高級官員中，咸欲用武力政策，方能應付局面，並可於短期內擊潰共軍。在馬氏意中，中共所憑藉武力，倚恃蘇俄而竊取各省市政權，政府應允其存在，更不應以武力以解決此割據形勢，馬氏受中共之柔順詐僞狡計所愚，以為中共保「民主革命」？然就國家體制言，縱是真正之民主革命，其在未成以前，原屬違法豈容違法。亂紀分裂之徒坐大。誠如馬氏之意，則將置中國之國體國格國統國法於何地？美國當時只知中國能和平統一，對於美國可以經營商務，取得物資而得到利益。迄未想到中國之傳統文化與歷史，一個國家是不能有二政權存在，執行相反之政體也。

惟在此停戰延長期間內，三人小組之會議進程，似有成功之望，馬歇爾重新商談，關於停戰手續，協議之解釋

與執行各問題，中共雖作讓步，允許美國人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及其小組之內有最後決定權。但前述所謂最後決定權，不適用於三人小組，因此馬歇爾只對協議之解釋，關於其他重要事項，馬氏不採行動，蓋恐美國政府增加責任也。

馬歇爾又鑒於政府官員，不論中央或地方，大都自由發表意見，愈以爲對共黨以剿除殲滅爲宜，不應專賴於談判，因中共詭詐百出，陰險萬分，易墮陷阱。馬氏認爲不應出此，使談判橫生阻礙，氣憤異常。

六月二十四日，三人小組成立一項協議：「關於各執行及交通小組與長春北平軍調部若干紛歧意見之辦法」，將若干權力，授予軍調部及小組之美國軍官，並希望藉軍調部之協助，對於將來發生衝突之地區，能控制其發展，以華北華中之部隊分配，則感最難解決。

六月二十六日，三人小組成立協議，稱爲：「關於東北停止衝突之指示」。此項指示規定一月十日之停戰協定，除現加修改及將來三人小組加以修改者外，應適用於東北，此其一。

規定軍隊密切或戰鬥接觸之隔絕，此其二。

規定各部隊依照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正午以前原有狀態之調配辦法，此其三。

規定一切戰術行動之停止，此其四。

規定不執行本指示之指揮官懲罰辦法，此其五。

規定雙方在本指示生效之十五日以內，應向軍事調處執行部之先頭小組，報告其在東北一切部隊之單位數額及地點，此其六。

十五天停戰令已延至六月三十日，停戰期內應加解決之三大問題，現由上項文件之協議，而將第二問題，予以處置。但各方會認爲：「除非一切主要問題，能與蔣委員長之規定而成立協議，則其他關於個別事項之協議，將無從予以施行」。馬歇爾之此種意見，雖諍諸「各方會認」云云，其實馬氏對蔣委員長之堅定立場，基於國家民族利益，不肯稍事遷就，恐貽後來無窮之患。而馬氏反認爲蔣委員長固執一己之見，甚至視堅決反共之國府官吏爲頑固，且指之爲「反動派」（見前篇），蓋馬氏亦如赫爾利被中共乘順恭維態度所誘惑，誤認中共爲「民主革命」人士而墜入陷阱，而中國之受累深矣！原不僅當時委員長對此調停居間者之感覺不易應付，早已深慮國家人民將遭浩劫，有先憂焉。

國民政府乘勝利之後，爲符合立憲之民主政治，首先辦理復員，華南華西先後進行。爲與中共談判部隊分配問題，華北不但未辦復員，反益增複雜。而東北初則爲俄共所佔領，繼則爲中共所竊據，實屬無從着手。至國府對華南華西之復員工作，措置似極允當，凡某一個「師」，其員兵不足額定者則縮編爲「旅」，使「師」之官兵退役，依據「整編協定」，雙方均應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前之時間內，皆須舉辦大量復員，（部隊定額詳述前篇）。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周恩來提出建議於下：

A、三人委員會應立即制止中國東北及中國本部之戰事，並重下停戰命令，另行規定執行小組中之美方代表應有權執行此項命令，及決定小組須作何種調查。

B、戰事停止後，三人小組應擬具恢復交通計劃，中共願擔保鐵路之恢復，將予優先辦理。

C、停戰後，該小組應擬具中國全境（包括東北）軍隊之改編及復員辦法，雙方參謀人員在美國參謀人員領導之下，應擬具計劃，呈送三人小組批准。

D、三人小組應召開第二屆會議，以討論政府改組，保障人權，及解決民生計等問題，地方政府亦應加以改組并舉行選舉。

周恩來復稱：「蔣委員長之所最關切者，爲軍隊之改編、整合及訓練問題」。並表示：「委員長對於此種事項之要求，使中共發生顧慮，蓋以中共縱使接受此種要求，而對其他種種未討論之問題，仍未能獲得若何保證也」。周氏確信「此爲問題之焦點」。最後周恩來根據以上陳述之理由，建議：「在軍隊改編期內，中共軍隊在共區內改編，政府軍隊在政府區內改編，其訓練事宜，均由雙方所信賴之美國軍官擔任，迨經過此過渡時期後，再將兩方軍隊，連成一體，加以整合。」

馬歇爾對周恩來前述提議，答稱：「六月六日宣佈停戰時，蔣委員長曾作割切而明白之表示：『關於立即執行二月二十五日所訂之中國軍隊復員改編及整合協定，應即樹立一基礎。』委員長提出其建議時，亦曾顧到此點。」

馬氏強調稱：「關於中共所要求之華北軍隊重新分配問題，必須有一確定之了解，此事應在三月及四月中加以決定，屆時中共應已交出其復員部隊之清單。」

馬氏續稱：「國民政府業將此項復員清單交出，而中共始終未見一紙提出，在此類復員清單未徵集前，參謀人員對於華北軍隊之重新分配問題，無法擬具計劃。」

周恩來於聆悉蔣委員長決定延長停戰期限後，同意將華北華中之軍隊重新分配問題列入談判議程。在討論此一

問題時，馬歇爾稱：周氏既提及政府東北軍事長官之態度，則周氏應憶及共產黨佔領長春時，中共軍事長官對馬氏提出聲明，以「情勢變遷」一語，作為種種要求之理由，則目下政府官員亦用此一語而提出要求，兩方殊無軒輊。

六月二十六日馬歇爾通知周恩來，謂：政府徇中共之請，可同意修改東北駐軍之比率，使中共有三個師以對政府之十五個師，中共所擬要求五個師則斷然拒絕。

周恩來提出中共方面之意見：

「軍事之單位，與民事行政無關，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改組以後，共產黨軍隊將集結於共產黨控制區內，政府軍隊將集結於政府統制區內，由於地方自治及選舉之成立，軍隊將與民事行政分離，政府所主張行政權應按彼此軍隊所控制之區域而調整一節，係違反軍隊應隸屬於民政之原則。依照政府提議，政府軍隊在多數情形下，開入共區而更換其民政組織，政府軍隊為復員而開入共產黨控制區，是不啻利用談判而佔領共產黨區域，以作用武之替代。此種方法，殊與政協會議決議及其他議定不符。共產黨甚願由若干地區撤出，以消除政府對共產黨威脅之恐懼，但此項區域應不再駐兵，熱河及山東兩省，大部份為共黨所控制，政府應撤出該兩省，茲反要求共產黨撤出，顯然是不合邏輯。」

六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告馬歇爾稱：

「除非實行軍事重新調整，庶可避免衝突。政治之調整，在此時並非不可能，但甚困難。」至軍事重新調整之若干辦法，如：

一、中共應在十天之內，退出江蘇省北部。

二、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安東省、哈爾濱等區，應由政府軍隊在一個月以內佔領之。

三、中共應於一個月之內退出其應行撤退之地帶，但政府軍隊之開入，可以遲延二三個月。

四、爲表示妥洽計，政府可以接受中共在東北新黑龍江、興安、嫩江等省及哈爾濱之地方官員，作爲臨時辦法，在將來政治改組時予以考慮。

周恩來對於前項提議之意見：

「各地駐軍決不可干涉駐在之地方行政，中共對哈爾濱之調整，以及政府軍隊及共黨部隊在若干地方之駐紮問題，雖願加以考慮，但對於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及其他各地不能接受政府之要求，如政府認共黨部隊駐在蘇北、山東及沿鐵路一帶爲一種威脅，則共黨亦願減少各該地之兵力或全部撤退，但政府軍隊亦不得進入共產黨區，共黨願以少數部隊駐在蘇北，減少二月二十五日整軍協定中之兵力。倘政府同意只駐兵於濟南、濰縣及青島，則共黨可以由膠濟路撤兵，全部共軍可由棗莊煤礦撤出，以開放鐵路線與礦區之交通。至煤礦則設一專門委員會管理之，上述之撤退，不得妨礙共黨在各該地已建立之地方政權。

該項軍隊問題之商談，雙方均採取如下之堅定立場。

政府方面：堅持共軍必須撤出其承德東滿延吉各地，哈爾濱應駐相當數目之政府軍。

共黨方面：堅持共軍撤出之地區，不得由政府軍進駐，且不得妨礙共黨已建立之地方政權。

兩造各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馬歇爾始終以爲中國共產黨係能代表民意，視其地位與國民政府相等，其權力欲與國民政府相並，迄未理會中國之傳統之國體與國格。對於中共之迂迴曲折之取巧手段，冀奪取政權，反如同

情。而視國民政府之明白公正態度爲多事，無非圖把持政權。馬氏自視爲國民政府之救主，芥蒂在心，賺蔽耳目。而不知其實已爲中共作符護。國府之威信亦因之而衰式，爲可慨已！

馬氏擬定一項草案，作爲調解中心之談判基礎，稱爲：「關於修改及執行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整軍計劃之初步協定」。提出時，並希望能於六月三十日正午以前成立協議，俾草案得簽訂爲協定，則可消弭戰爭之再起，該協定之目的，欲得雙方承諾某種諒解，兩造皆得發布最後停戰令。

擬定草案有如下之要點：

一、規定政府軍及共軍在東北及中國本部各特定地點之特定分配。

二、對雙方兵力爲五對一之比率，不加變更。

三、原來所規定十二個月內部隊分駐各特定地點之限期，改爲六個月。

四、除特別規定外，軍調執行部立即決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後，政府軍及共軍在中國本部之佔領區，以及在二十天以內應行撤退該等區域之軍隊。

五、除有特別規定外，軍調執行部立即決定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正午以後，在東北之佔領區，以及在十天以內應行撤退該等區域之軍隊。

六、共產黨同意政府駐兵五千人於哈爾濱。

七、共產黨應集中其軍隊於若干特定地區，政府軍不進入共軍所撤出之區域，現存之地方政府及維持地方自治之保安隊，應許其繼續存在，不加變更。

附件：共軍在指定之若干地區駐紮後，不得擴增與集合（指不再移動）。其撤退日期，留待日後商討。
蔣委員長對馬氏前述之協定草案之表示：

甲、關於第五項，不應僅限於東北。

乙、第六項哈爾濱地位，政府同意派一文職市長而爲共黨所能接受之人員。

丙、第七項完全反對，認爲不獨有損國體，而且鞏固共黨分裂割據之地盤，致大多數人民必被該現存政府之共幹清算與虐待。

丁、至於地方保安部隊之兵力，不得超過原有縣保安隊之名額。

戊、關於政府軍局都佔領蘇北，政府不能接受，共軍應在六星期以內撤出淮安以北，在三個月至六個月以內，撤至臨海鐵路以北。

己、共軍撤退膠濟路應包括沿線之煤礦，尤其賈山（由昌店向南突出一點。）

庚、察哈爾共軍，應在一個月以內撤退承德緯度以南之地區，三個月以內退出承德本身，又安東省應在一個月以內撤出。

辛、政府對該文件，認應添加一項，規定在十天內完成二月二十五日整軍協定之修改事宜。

壬、關於東北部份之附件，已於六月十七日經政府同意，作爲二月二十五日整軍協定修正草案之附件。

癸、東北方面之全部復員整編計劃，應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完成，原定之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之期限應予撤銷。

第十二節 中共慣施邊談邊打狡計

中共周恩來對馬氏前述協定草案，表示意見：

一、共黨雖願只駐少數軍隊於蘇北，但不能接受委員長對該地作例外之提議，又不能接受委員長所定之時限，（其理由爲蘇北方面實際情形未能明瞭，撤退集中，究竟需時若干無從預計。）

二、山東省幾乎全爲共黨佔領，如果撤出膠濟鐵路線，則在京津鐵路線上，應保持若干城市。

三、共黨雖無意駐兵於煤礦，但須共黨完全撤出該煤礦，則不能接受。

四、共黨對承德方面，不能作進一步之讓步。

五、共黨對政府作了許多讓步，其惟一要求，只在東北增兵數師，而彼已請延安方面撤回此增兵提議。

六、關於安東方面，共黨初以爲政府所提要求，係指安東一市而非全省，此事必先商之於延安，始能答覆。

經過周恩來與馬歇爾數度洽商後，周氏表示：「除蘇北在共軍撤退，政府軍佔領後之地方政權而外，共黨對任何提案，均願考慮。對於馬氏所擬之草案，其主體除一二小問題外，共黨幾乎全部可予接受。」

馬歇爾至此，益感共黨對彼提議之能接受顯示共黨之誠意，不知共黨只需控制地方政權，只需駐兵於衝要，更明白政府爲顧全國家大體與中國之傳統政制，斷難承諾，於是周氏樂於使馬氏愜意，而故有此正大作風，而馬氏適墜其狡計而不悟。

翌日，馬氏晉謁委員長，報告共黨承諾情形，委員長表示：

一、承德問題可稍作讓步。

二、蘇北共軍，須於一個月內撤至隴海鐵路以北。馬歇爾答稱：

「就軍事調度言，在一個月撤至隴海路北，其移動輸送頗事累贅，恐非卅天時間所能辦到。共黨對於撤兵後保留地方政權，及保安部隊，十分堅持，本人擬於保留地方政權基礎上，尋求一妥協辦法，包括成立某種特別選定之組織，所以爲修改共黨所堅持者，獲致一解決辦法。」此外，馬歇爾另向蔣委員長提出報告，謂：

「若干政府軍事領袖發表聲明，表示政府將放棄民主辦法而採用武力獨裁政策，本人以爲目前中國軍事領袖所主張之辦法，勢將使人比作日本軍人獨裁，徒促使其國家崩潰。由於局勢之緊張及富有爆炸性，及軍事領袖企圖使用武力之強烈主張，故現時局部停戰之延續，難保不引起劇烈之軍事衝突。」

自六月六日第二道停戰令發布後，國軍在東北之防線，爲：北自遼源縣經雙山縣、農安縣而至松花江南岸。以迄於陶賴昭附近（中長路）。

再循松花江之烏拉街，折向東直抵拉法、樺南縣、海甸縣、河口、清源縣、溫泉寺、連山關、北柝木城，以迄大石橋線。

遼西方面，則在通遼、彰武附近。

熱河方面，保持北票、葉柏葉，平原以西線。

共軍得此停戰令，而得一端息機會，重整舊部，自哈拉海向農安之國軍進襲，陶賴昭附近，大受威脅。至榆樹方面，中共於七日申刻進攻五棵樹國軍。在拉法動員一師以上兵力猛犯國軍。

除東北外，關內情勢更爲緊急，中共於停戰令接到同時，反在山東發動全面攻擊。七日猛攻張店、周村、大汶口、泰安、聊城、德縣各地。八日德縣機場陷落，大汶口、泰安均處危境。九日周村四圍據點盡失，張店陷落，泰安在巷戰中。而膠縣、高密（膠東區）等地戰事又起。蒙莊陷落（魯南）。中共部隊猖獗殊甚。詎於十日午後，共軍竟敢狙擊北平軍調執行部之晏城交通小組，而政府代表雷奮強被擊慘遭殞命以殉職。山西方面：共軍進犯中陽，企圖破壞同蒲路之平遙張蘭段。河北方面：共軍圍攻元氏、永年，並長辛店。

當時東北司令長官杜聿明，對中共違反停戰令而進政拉法事件，立即下令「限共軍於十二日午前退出拉法」。中共置之不理，因此國軍爲奉行最高命令，被迫撤退至孤家子。

魯中局勢，繼續惡化——青島、濟南同時遭受中共圍攻。

第二道停戰令，不啻縛國軍之手足，而受中共挨打。所謂軍調執行部人員，其實爲雙方而努力，孰知於六月廿九日，中共竟又在河南修武，第二次殺死該新組之政府代表郭子琪。

在如此情況下，蔣委員長實不勝其痛苦，而於第二道停戰令十五天期限屆滿之日，馬歇爾又再度迫蔣委員長公開宣佈停戰令展期至六月卅一日。其聲明稱：

「爲予中國共產黨最大之機會，對於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整編軍隊及軍隊駐地問題，期得完滿解決。余刻已命令前方指揮官，對停止前進攻擊之前項命令，其有効時期，延長到本年六月卅一日中午爲止」。

馬歇爾之要求，無非多給中共以調兵遣將，運轉餉械之機會。中共永遠不會遵守其諾言，敵國軍隊日坐困，增加被擊之威脅。所以停戰期滿，晉北之中共立即攻佔朔縣，賀龍則率數萬之衆，迅速猛攻大同。

蔣委員長允許延展停戰令後，同時作如下二點之聲明：

- 一、共產黨應於八月一日以前，撤出膠濟鐵路。
- 二、軍事調處執行部及三人小組所採用之「遇事須一致通過之辦法」，應在六月卅日以前，予以修改。

第十三節 國府再頒第二道停火令

第二道停戰令既延展六月卅一日，屆期共軍仍一本其談則游移，打則凶狠，演成爲邊談邊打，談談打打，手固在打，而口談停。如此情形，中央宣傳部爲澄清局勢，闡明真相起見，於是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詞曰：

「蔣主席於六月廿二日宣布停止前進追擊命令時，延至六月卅一日爲止。在此期間，政府一再忍讓，以期建立和平統一之基礎，乃迄至今日仍未獲得完滿之解決。惟政府對共黨問題，一本政治解決方針始終不渝，尤以我國八年抗戰，人民痛苦，不能使之重見戰禍。而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將軍，爲中國爲世界企求和平之一片熱忱，更不能使之失望。以此，政府仍請馬將軍繼續調解，期得解決。但中國共產黨必須停止其軍事進攻與破壞交通之行動，方足以證明其誠意。並開誠會商整軍實施方案及指定駐軍地區之協定，限期成立。則政府自當屈予容忍。」

此一問題，如不獲具體解決，則其他各種協定皆不能實施。尤其軍隊駐地問題，則雙方軍隊散駐原地，彼此不能隔離，衝突即無法避免。一月十日停止衝突協定之所以未有效果，此乃半年來之事實，爲中外所共覩。

今停戰命令雖已屆滿，政府對於和平統一，絕不變更，除非共產黨進攻國軍。如最近山東濰縣、大汶口，及山西之大同附近等地，晝夜猛攻，則政府不獨爲自衛計，且爲保衛人民生命財產計，而維持地方秩序計，職責所在，

不能不加以抵抗與驅除。

此外，中央軍隊不對共產部隊採取軍事行動，以靜候各項未決問題之解決。深冀此種相忍，爲政府方面求取政治解決之苦心，能促使中共深切反省。進而披瀝誠悃，成立協定，斯政府與全國人民之所厚望」。

前項聲明，假使是另一之對手方，則必能顧全大局，誠意合作。無奈共產黨以攘奪政權爲其目的，根本不知國家，但知驅策奴役人民，以爲其赤化世界之工具。美國政府與赫爾利、馬歇爾不加細察，竟貽今日之大患，真痛心哉！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公佈命令，對政府部隊繼續禁止從事進取行動。

同日共產黨方面，亦頒發同樣命令予共軍各部隊，並以副本一份送達馬歇爾。

馬歇爾對國民政府高級軍事官員所曾發表「放棄民主將代以武力獨裁」之聲明，頗表不滿，馬氏認此種言論，打擊其調解之努力，是時上海方面突發生學生工人騷動事件，馬氏亦深以反對美國二會正在討論之租借法案爲憾，且歸咎係政府特務人員所組織而暗中煽動者。

第十四節 馬歇爾先入共黨之說

當時共產黨向馬歇爾表示，據馬氏向美國務院報告稱：

「根據中共方面陳述，據云：中共認爲美國援華措施，以及華盛頓官方之各種聲明，皆可證明，國民政府無論是否願與中共解決軍事政治爭執辦法，美國均將對中國政府加以經濟及軍事援助。中共認爲美國國會正在討論新援華法案，實係加強國民政府對中共擬採用武力之趨向，因此助長全面內戰。同時若干政府核心中之國民黨守舊份子

，亦利用美方措施爲根據，敦促委員長推進軍事行動，藉以消滅中共。然而此輩守舊份子與國民黨極端份子之勢力，似又參加反美運動，其理由、爲美國之經濟壓力，使舶來之美國貨物代替中國產品，中國工業家爲之破產，妨礙中國經濟復原。關於馬歇爾將軍及其助手，勸告國民政府勿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一節，此輩守舊派與極端派亦均表反對，甚至使用與共黨反美之同樣論調，俾使國民政府不受美方牽制而從事激烈反共行動。各派系由此項舉動所發出之煽惑及宣傳，遍見於各項民衆大會、新聞攻勢及暴徒行爲。此類事件有一次涉及上海之和平代表團，該團包括教育家、商人、學生、勞工代表，其中尚有婦女團體代表。此代表團於六月廿四日欲赴南京，公開聲明其目的在請求政府避免內戰，乃於鐵路車站內，遭遇一隊有組織之國民黨秘密警察阻其啓程，並將各代表關閉室中，經過數小時之紛擾，予以毆打，使彼等身受重傷，須往醫院醫治。當事變發生之初，在場之政府警察，未加干涉，旋即離去，代表等在數小時之後，始被救出。一

上述報告，馬歇爾係依據中共陳述之長篇語句，馬氏依樣葫蘆轉呈於國務院，遂形成下列之印象：

- 一、馬氏對政府有欲用武力對付中共一點，認係違反美國民主政策，且與其奉命以和平方法統一中國之令相背。
- 二、上海勞工學生顯係中共所煽動騷擾，中共譏過於政府官員，馬氏信以爲真。
- 三、中共假設國民黨分守舊極端兩派，而該二派均爲顧到中國經濟而仇視美貨引起反美，中共此計欲使美國停止援華，美國政策原建立於經濟之上，一旦涉及此問題，馬氏更以爲中共爲不謬。
- 四、中共誣指政府官員之所以反美，爲欲脫離美國之羈絆，馬氏證之以高級軍事領袖之聲明，益覺可信。

因此種種馬氏對政府已起不良反感，而對委員長則生懷疑。如果委員長能控制其部屬，則高級官員之聲明，似先得到委員長之同意，如果委員長權力不能控制其部屬，任令部屬如此橫行，則政權亦將趨於崩潰，馬氏遂將中共所報告者轉報於國務院，而國務院中爲共黨服務者，復據爲打擊國民政府之絕好資料，故此一文件，實漸啓美國對華政策演變之初步。

第十五節 先談恢復交通

至七月五日，馬歇爾致電各執行小組並長春先頭小組，告以：「政府與中共均曾宣佈，在談判未得結果以前，全國應繼續停戰。」宣調小組各代表得悉後，指示各該軍事指揮官，均應避免侵取行爲，包括前進追逐攻擊等在內，但無幾時而軍政形勢，再趨惡化。

當馬歇爾爲國府與中共之和談作調人，組設軍事三人小組會議。政府原派張羣爲代表，時張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無暇兼顧，乃改派軍委會政治部主任張治中繼任代表。旋又改派軍令部長徐永昌專負軍事方面之談判，惟徐氏素有心疾，不宜於舌戰，致未克表達政府方面意見，於是另選交通部長俞大維爲代表。在徐氏任期所談者爲整編軍隊事項，而俞氏任期，則著重於恢復交通，以俞氏熟諳軍事，且與馬帥向有友誼，爲最切當之人選。

關於恢復交通之談判，共方周恩來觀點不在如何恢復其路線之暢通上說話，而專指政府路政廢弛，并提出膠濟鐵路之大小橋樑，枕木損壞等等數字。馬帥聞之，認爲路政如此損壞，何堪通車運輸。而俞大維不面加斥責，反謂：「果屬如此損壞，殊覺嚴重，但仍應歸咎於戰爭」。言畢，請周恩來將詳細數字，重說一遍，詎周氏二次復述其

枕木損壞若干支，大小橋樑損壞若干條，與首次所宣佈者完全不同，且相錯很遠。因周恩來講述其數字時，前後均經俞氏紀錄，俞氏遞與馬帥請予比較，馬帥閱後，不覺相顧而笑。此雖無關宏旨，但可見共方之信口雌黃。

俞大維出席會談時，帶有助手交通部航政司長李景璿、軍令部辦公廳長郭汝曉、參謀馬同經。共方周恩來則帶英文祕書章文晉，延安鐵道部長滕代遠二人。於翌日會議時，周恩來忽提出「撤回」昨日所宣布之言詞，或宣告無效。而俞大維則以會議已有紀錄，且經分別送達三方，倘使撤回，則信義何從保證。詎竟觸周恩來之怒，在議席上大肆攻訐政府，甚至越出範圍，破口大罵，俞大維觀此橫發，徐徐以黑眼鏡戴上，不予理睬。

共黨破壞交通，經馬帥調處，政府趕行搶修，而共黨復加破壞，如此修復而又遭破壞，破壞而再修復，若是循環不已，交通根本未曾修復暢通。共方所破壞者包括津浦、膠濟、平漢、隴海及鐵路。

津浦線所破壞者：

泊頭——東城段：共方要求先拆除路側碉堡。

泰安——兗州段：共黨自願修復，應由共黨管理路政。

大漢口——新泰段，共方曾修南村至華豐一段鐵路，收益爲共方截取。

兗州至利國驛段：政府修抵運河橋時，被共方阻止，經交涉後續行北修。

前項各段，修由政府，毀由共方，軍調部方接收復之報告，不旋踵而破壞之報告又至。

膠濟路所破壞者：

張博線經政府修通，惟原任路局人員，爲共方驅逐或監禁。

蔡家莊——蝦蟆屯段：共方拒予修復。

譚家坊——張店段：該段原有共方拆毀路軌九十公里，經政府搶修後，又被共方拆軌毀橋。

平漢線所破壞者：

元氏——安陽段：全被共方拆毀，共軍劉伯承聲明白願修復，拒絕政府修理。共方成立該段「鐵路管理局」，逮捕原有員工。軍調部特派安陽執行小組實地交涉，終無結果。

隴海線所破壞者：

洛陽——潼關段：陝州——洛陽段：汴——徐段：（該段本於抗日時拆除，勝利後修復）均經共黨破壞無法通車。

此外如平綏路、同蒲路，皆先後遭共方破壞，而軍調部努力商談，卒至商定而仍受破壞，徒見其勞而無功而已。當第二道停戰令頒布，且復經展期後，中共之軍事行動，變本加厲，蓋藉國軍停戰，以遂行其到處竄擾與攻城略地之陰謀。其實共產黨有一套「會議戰術」，而馬歇爾即被贖於中共「會議戰術」之詐欺手段。中共乘二次停戰之良好機會，華北方面、魯西方面，蘇魯交界方面各地之衝突小戰，幾於到處烽火。即在中原之共軍，西向而進擾隨察。馬帥認此種動亂，皆出於「整軍協定」之共軍駐地及編制未能達到中共所滿意之階段所致。乃由馬帥邀約政府方面在勵志社作中美兩方面商量之舉。

馬歇爾不知中共之「會議戰術」乃戰爭之另一項手段，故在會議上有堅韌不讓之「膠皮戰術」，有粗暴兇狠之「威脅戰術」，有柔和委婉之「諂媚戰術」，於破裂邊緣自行收帆轉舵，使會議不致破裂。於接近時忽另提條件，

俾議題扯開，總之會議上之進退屈伸，莫不有其戰術運用。馬帥不責中共之毀約背信，而專向政府方面施壓力，最巧合者其第一第二兩道停火令之頒佈，皆在中共軍事失利之時，而馬帥向政府要求，不替替中共解其困厄，便有喘息機會，重謀叛亂。

六月間，中共計窮力蹙，又獲得國軍停戰，馬帥又欲對共讓步，冀圖調處得順利達成協議。某日，馬帥約政府方面在勵志社與之舉行雙邊會談。政府出席代表爲俞大維、國防部第四廳廳長郭汝琬、皮宗國等，馬帥相見，即急不及待，手持木棒，向壁上指點，並提出「折衷方案」，堅決要求政府再作讓步，則駐地分配與整編，必能獲得中共之同意。馬帥辭意誠懇而又堅決，一若政府如不答應此「折衷方案」，則談判決裂之責，將歸咎於政府，言下似帶有感迫。政府在無可奈何下，再一次重大讓步。馬帥滿以爲此次「勵志社妥協商談」之結果。必能邀中共之同意。詎知中共竟認馬帥係一廂情願，不允所提之折衷方案。

第十六節 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

按此次勵志社中馬帥與政府之商談，實際上係商量——如何將「整軍協定」可使中共滿意？查「整軍協定」中共所議定而簽字於其上，中共既推翻其自己決定之方案，而馬帥乃屈予折衷以鑒其愆，又誰知爲中共所否定，馬帥至是始驚覺共產黨根本無所謂信義公理，僅憑其本身之利害而爲轉移，豈能與之講道義法理者哉！

吾人對馬帥調停之苦心與不辭煩勞，殊表欽佩，惟其所會議所商談者，既無一定題目與專案，但於發現何事時即作爲會議及商談之資料，東扯西談，演成爲事事未了，語語未結，在旁觀者，但見其庸擾而已。

馬歇爾惱怒於蔣委員長左右之堅決反共，不願與共妥洽而欲以武力弭平叛亂，因稱之謂「反動集團」。認定此輩「反動集團」？於委員長能作決定性影響，故馬氏將此意報告於其國務部。且推舉北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爲駐華大使，以司徒住華多年，熟悉中國情形，而其個人品格無虧，堪爲馬氏努力調解中之助。尤以馬氏時與周恩來談起司徒雷登，而周氏則常表示其對司徒之尊敬意向，馬氏爲使調解多得助力，故盡力推薦。杜魯門接納其所謂，於七月十一日，經美國參議院通過，以專門從事於教育宗教而素乏政治經驗之司徒氏出任大使，於七月廿六日至南京視事。

周恩來此時，突表示積極，主張政府與中共立刻無條件發出停戰令，此其一。同時將六月間商談中所擬定之各項措施，即付實施，此其二。政府與中共代表會同司徒大使，初步會商關於改組政府及地方政府等問題，此其三。將成立之任何協議，應送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委員會備核認可（因政府改組應得各黨派同意），此其四。

由此觀察，則馬氏之推薦司徒，實受周恩來之影響爲多，今司徒得真除出任，適獲中共之心，故不待司徒席捲，而有此種頻發連珠大炮之振謗，馬氏又墮中共之計。惜乎中國國家及人民該受苦厄矣！而司徒氏未任大使之前，似早已得偏聽之辭，更有司徒氏之左右，每個人均作不滿政府之言論，自以爲知識份子目空一切，因所求不鑒其慾望，懷恨在心，於是從中播弄，表面上奉大使之命而行事，實際上勾結中共，此種僞裝君子，作欺世盜名之勾當，斯國家之所以到茲地步，殊深浩歎。

馬歇爾於司徒雷登接任後，首次報告美國務院，其內容：馬氏強調時局之嚴重性，認爲最重要之損失，爲蔣委員長威望之低落。因蔣委員長代表中國之最偉大一種資本，委員長之顧問向委員長所供獻者，爲狹隘與偏頗之建議

，以致時局無望。委員長之軍事指揮官，正導致一不可控制之境地，當此一局面具體實現時，各該指揮官或將呼籲乞援，而援助勢將無着。馬氏復強調：美國勢不能助長中國之內戰。

馬氏末稱：政府所採之策略，一面努力防止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製造有利於共黨政權之條件，彼以現行之財政及經濟情況爲例，既內戰又混亂之經濟，乃予共黨以良好機會。

第十七節 安平事件

按馬氏此種見解：一則曰委員長威望低落，再則曰委員長接受其左右狹隘偏頗之建議，軍事指揮官不服從停戰而好大喜功，必致失敗，該時來乞援助，美國不能相援，而標榜以「不助長中國內戰」爲辭。所謂「助長內戰」，原係中共責備美國軍經援助政府之語，馬氏援用其詞，至此成見更深，以爲中國搞到如此地步，乃政府高級顧問及軍事指揮官之責，而非中共之叛亂，因使委員長受其左右矇蔽？馬氏如此調停，純屬不問是非曲直，斯無異於向攔人勒索之匪徒，談判贖款，馬氏亦過矣！至其報告所以諉過於蔣委員長之左右，而不敢直指委員長本人，無非礙於國家元首面子，不敢直道，亦猶不責太子讀書不勤，而責其師傅之教導無方也。

按蔣委員長於七月十四日赴廬山，馬帥與司徒大使亦於十八日跟踪上山，此爲首次上山。司徒大使循外交禮節，即在廬山呈遞國書。當時俄駐華大使彼德洛夫見馬歇爾、司徒二氏上山，乃亦追縱而至廬山。十九日蔣委員長邀馬、司二氏遊覽山水，二十日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以地主作東道請二氏，並講述名勝古蹟。馬、司二氏原擬在廬山少住爲佳，但接獲報告，知津浦南段共軍發動猛烈攻擊，晉南、鄂北之亂擾情勢嚴重；周恩來突然離京前赴開封；依

據種種狀況，馬帥自不得不趕返南京。

此爲馬帥第一次上山，名曰陪同司徒大使呈遞國書，祇爲外表冠冕之詞。而其著重則因中共在東北之林彪，違反「軍調部」之意旨，致執行小組無從着手。其次則爲在蘇北之中共陳毅，有暗渡長江，南圖京滬之勢，情勢嚴重，故專誠見蔣委員長面談，其下山時態度，頗呈樂觀氣象，因情勢略見和緩，惟陝南方面，忽又告急。馬帥在廬山之樂觀氣氛，陡變烟消雲散。鑒於與蔣委員長在廬山所談者，委員長極願企求和平，而此次所發生衝突行動，純出於中共所掀起。於是竭力向中共關說，俾得重拾「調解」舊題，再作商談，乃有「太原會議」之提議，執意中共對該「太原會議」本贊同於前，突然又另生枝節，一面拖延會期，一面加緊備戰，且積極訓練民兵，大有擴展作亂地區之趨勢。蓋中共不能否定自己之「太原會議」之定義，只有另謀藉宕手段。馬帥不察其中奧秘，接到中共允開「太原會議」之函件，如已獲得停戰和平之願望者然。「蔣委員長核閱，作重開談判之商榷。乃復於七月二十六日上廬山，冀與蔣委員長再作商量。詎到廬山未幾，獲悉中共又大舉進攻，企圖包圍華北，夾攻大同。於是馬帥不得不急回南京。孰知剛至南京，忽接緊急報告！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平津公路，距北平東南卅五英里之大小沙河，突遭共軍襲擊，結果，死美國軍官一人，士兵一人，重傷四人，輕傷八人。另一軍官及一士兵因襲擊時汽車失事受傷。此即馬帥來華後之「安平事件」。

第十八節 馬歇爾三上廬山

馬帥立即電令北平軍調部速派特別小組，前往肇事地點履勘調查。該小組由美方亞歷山大上校、政府方面吳能

定中校、共方雷任民三人所組成。經實地澈查；共方不但不承認其責任，且謾稱「美海軍陸戰隊先行開火！」並歪曲事實，過失均推於美軍。而司徒大使僅表示其「重視」而已，主張避免情感用事。蓋恐影響於其致力之和談耳。

「此爲馬帥二次下廬山時之突發事件。而中共對馬帥之意見，表示願意接受調解。在東北之中共首領林彪派其代表李敏然，要求見馬帥，與談東北問題。李敏然告知馬帥：「林彪已經同意馬帥主張，停止衝突」。馬帥聞悉，心境似稍獲鬆弛。誰知中共之忽緊忽弛之策略，使牽引馬帥像抱圓柱而疾走，團圓轉而不自覺。中共根據其本身利害，造成若是局勢，完全欲謀擴大叛亂。例如晉北方面之談妥開「太原會議」者，反向國軍進攻。

東北方面林彪之代表李敏然說話猶在耳，而再次發動對國軍之攻擊，與破壞全東北之交通線。以此一時空氣，緊急萬狀，馬帥心境不轉瞬而又變爲緊張衝動。遂與中共周恩來作祕密商談，因談停止衝突，結果得周恩來之種種「承諾」，「太原會議」即可如期實施。于是馬帥乃於八月三日，匆匆作「三上廬山」之行。馬帥認爲中共已經承諾停止衝突？奈中共乘馬帥上山之際而實行猛攻徐州，及包圍大同。是則馬帥又墜中共騙術中矣。

八月三日，司徒雷登與馬歇爾三上廬山見蔣委員長，彼二人之意，以爲委員長不能同意立即頒布停戰命令，擬從另一角度以接近此問題。當時戰事正在華北逐漸增長，且有蔓延東北之勢，且懷疑委員長利用「中共襲擊美海軍陸戰隊汽車事件（按即安平事件）」以延擱其停戰，司徒與馬氏乃向委員長提議組織一「特種委員會」，包括政府及中共代表，而以司徒爲主席。此特種委員會有類於「國務會議」。實際上可形成一種之立法行動，以控制或指導政府。彼二人并強調組織「國務會議」之重要性。

八月五日，委員長同意組成一「小型非正式之五人小組」，包括政府及中共代表，在司徒大使主持之下，覓致

「國務會議」之協議。

八月六日，委員長擬定下列五項之初步條件：

- 一、蘇北共軍應撤至臨海鐵路以北。
- 二、共軍應由膠濟鐵路撤退。
- 三、共軍應撤出承德以及該城以南之熱河省之其他地區。
- 四、共軍應退入於東北兩個半省（新黑龍江、嫩江、興安）。
- 五、共軍應退出六月七日以後佔據山西及山東省內各地。

馬歇爾謂上述條件，比六月底僵局形成時，更為苛刻，但仍轉告中共，中共答稱：

「國民政府未提及地方政府問題，且共黨之拒絕政府要求，接收中共撤出區域之地方行政，以致引起六月底之僵局，殊與「政協」決議不合。中共贊成政治軍事同時談判，而不接受政府提出之五項條件，為商談政治之先決問題。」

八月十日，司徒與馬氏聯合發表聲明，期使國共雙方及中國民衆有所認識，并希望激起民衆壓力，以停止戰爭，聲明中指出：「戰事已有不能控制之虞，經濟情形極為嚴重。」聲明中又強調指出：「政府最高當局與中共領袖均願戰爭之終止，惟若干爭點，未獲同意，軍隊之重行分配即其重要之一端。」又反覆說明：「如果軍隊分配獲得協議，則地方政府之性質，尤為基本爭點」。

馬歇爾向委員長陳述：在委員長未到牯嶺之前，彼曾向委員長陳述關於局勢之趨勢，至今日幾乎皆不出彼之所

預料。政府如在此時從事戰爭，徒使中共乘機擴大，而俄共得藉口作公開之支持中共，對於中國有損無益，結果可能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諸委員長注意遼遠之交通線，及其地勢，均有利於中共游擊之運用。馬氏續向委員長表示其作調人之目的，乃欲使中國和平統一，而委員長之顧問，謂「調人之努力，係欲使中共獲得政權，」此說實含有污蔑之意！倘若委員長仍聽從左右顧問之軍事計劃，則反導致中共以控制中國之機會。馬氏最後謂：得自各方可靠之情報，對於委員長之威望，似漸衰微，是不啻將國家僅有之資本，而被自己方面所削弱，寧不惋惜。言時耳赤面紅，頗露怒容。

司徒與馬氏在廬山與委員長幾經洽談，委員長表示願與中共成立協議，組織國務會議，但非到其所提出之五項條件實施，不願同意停止戰爭。蓋中共一向口是心非，言與行違，在會議時一片大道理使人娓娓動聽，迨會議後則必橫生枝節，玩弄花巧，掩蔽其罪惡，而佯裝僞善。馬氏至是尙未曉然其奸詐，故委員長對馬氏說：「此一讓步甚屬重大，可能使政府遭受軍事危險！」馬氏當面即表示「不以爲然」。

馬氏痛恨於委員長左右之軍政決策諸官員，甚至向委員長當面陳述，委員長亦未加辯明。因委員長自思，假使予以開導，確非左右之誤，則反受袒護袒屬之嫌，或自承爲愚昧而易遭譏飾。蓋馬氏之偏見，愈久愈深。

八月十三日，蔣委員長發表聲明：首先聲明談判經過及中共之橫梗阻撓，無理取鬧；次闡明其政策如下：

一、結束訓政階段成立憲政政府。

二、接受「政協」決議。

三、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各黨黨員及無黨人士，以實行「政協」之國家和平建設計劃。

四、接受一月十日之停戰協定，惟中共必須退出其「威脅和平阻礙交通」之區域。
五、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但中共須擔保其履行各項業已同意之協定。
六、人民及其財產之保護及安全，以除去任何對於和平之威脅。

第十九節 戰事重起馬歇爾五上廬山

八月十五日，馬帥偕行政院長宋子文四上廬山，馬帥專機剛抵九江機場，即接獲娘子關激戰之報告，娘子關即董澤關，在山西省平定縣北，河北省井陘縣西，相傳唐平陽公主統娘子軍駐此，故名。明嘉靖時築城置戍，與其南之固關，唇齒相倚。

除娘子關戰事外，共軍又於隴海路東段發動總攻，大同又趨於危急，兩地形勢險惡，於是馬帥於八月二十日又匆匆下山遄返南京。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來表示：「中共願意參加五人小組會議，討論關於『國務會議』之組織問題，關於該問題爭執之點，在於：

一、各政黨及無黨派人士在會議應佔之席次。

二、對改組後政府執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之一國家和平建設計劃時，該「會議」之否決權問題。

馬帥聆周恩來之言，復於八月二十三日，偕同柯義上校五上廬山。此次僅休息五天，而同蒲路上共軍突展開轟湧攻擊，形勢危殆。馬帥遂於二十七日飛回南京，再事調停。

至三十日馬帥重到廬山，此爲其第六次。其夫人循例携捧鮮花至小天池迎迓，除答覆新聞記者詢問外，巡見蔣委員長有所商談。

按馬帥會五上廬山，外間多不明其「五上廬山」究爲何事？本文已敘其端於前。馬帥建議設「五人會議」而由司徒大使主其事，以覓致組織一有各黨派參加爲委員之國務會議。誠哉蔣委員長之言曰：「中共所能代表者，不過代表其黨員。中共黨員之數字，若與全國民衆相較，則少之又少。若謂有共黨參加，即可視爲民主？若謂中共有武力而始與談商，得中共一言而視爲決定，則無異藉武力以分配政權，是與真正民主頗不相類。……」

如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之言，實爲天下之公道與真理。不圖竟以此真誠之語，而觸馬帥之怒。其心地之沉重可知，因有司徒大使之「和平希望」之聲明。幸正在此時，橫行於蘇北隴海以東，長江以北，津浦鐵路沿線兩側之中共部隊，經國軍反擊，聲勢頹衰。而李先念部亦告瓦解。中共此時又改變其以前之強硬常態，向馬帥及司徒表示「誠意」，願意參加馬帥所主張之國務會議。因於八月晦日「六上廬山」。時司徒大使留京。與中共留京代表周恩來、王炳南交換意見。而該時中共對於「五人商談」之擴大「國務會議」一節忽爾變卦，不願參加。與馬帥向蔣委員長報告，中共「願意參加」之事，適相背謬。馬帥得司徒電告，不得不專程回京，與中共再作商談，可笑中共如此反覆，在馬帥前已不知有多少次數。總之，允諾而復否認，否定而又承諾，馬帥毫不見怪，獨於委員長正大光明之詞，則抱憾莫釋，甚矣！成見在胸之難於移易也，有若斯者。

第二十節 蔣委員長答杜魯門函

在此同時，中共向馬歇爾表示：認國民政府之目的在於消滅中共，必用武力解決爭端，談商是一種掩飾。中共爲防衛計，已發出總動員令。

八月終，委員長同黨建立五人小組，以爲組織「國務會議」張本，並同意該小組結論，依據「政協」決議，送「政協」綜合委員會採納。同時聲明，對於前所提出五項條件作爲先決條件，並未更改。周恩來表示：「委員長此五項條件，則對於組織「國務會議」，不過予民衆一虛僞之鼓勵。蓋既有此五項條件之存在，將何以促戰事之停止？是時司徒與馬氏仍努力於「國務會議」，以爲至少可作爲改組政府之確定步驟，而能產生相當力量，爲停戰建立基礎。

委員長告知馬氏稱：「一切關鍵，必須中共遵守一月十日之停戰令之條款，始得停止戰爭。」此時國民政府由蘇北攻勢，得以肅清膠濟鐵路之共軍，八月二十九日收復熱河省城承德，而中共軍隊是於八月初沿隴海線徐州、鄭州發動。另晉境共軍，又圍攻大同。

杜魯門總統之來函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美國杜魯門總統以私人函致蔣委員長，其大意略稱：

「美國對中國惡化之情勢，及國共雙方極端份子之自私行動，表示關切。」又述及一種日見加強之信念，認爲有人正企圖對於解決主要之社會問題，寧願訴諸武力，而不願採取民主方式。美國政府與人民仍堅決希望協助中國，在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完成永久和平及穩定之經濟。但除非能於短期內提出確切證明，使人相信，對於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已獲實在進展，則美國政府將有重定美國立場並向美國人民解釋之必要。」

按此函發自馬歇爾報告之後，其函中所稱：「國共雙方極端份子」云云，係即馬氏所指委員長之左右顧問堅決用武力消滅中共，乃頑固之反動派。茲言雙方，乃外交辭令中之陪襯。又稱：「有人正企圖……不願取民主方式」等語。係暗指中國政府之決策，而其後段，頗暗示將改變其立場相脅，此函出之於國家元首與另一國家元首，殊非禮貌上所應有。

蔣委員長八月二十八日答覆：

首述國共之所以未能協調，係中共陽奉陰違而又狡計百出，次述中共企圖以武力顛覆政府、奪取政權，以建立其專制集權政體，而惜乎國際間均被其矇飾，雖再四解釋而終未肯一顧此言。堅認爲民主改革者，中共究竟只能代表其本黨，共黨黨員之數字來比較全國民衆之總和，不過少之又少，勢不能以爲共黨參加即可視爲民主。若謂有其武力而始與之談商，得中共一言而視爲決定，則無異於借用武力而分配政權，則去真正民主遠甚。至於政府僚屬犯有過失，或亦難免，但不足與中共昭著之破壞行爲相比擬。政府對違令之部屬已嚴予處分，對於擴大政府組織，容納無黨無派人士參加之政策能否成功？端視中共對政府之呼籲所具之誠意如何而定。

第廿一節 馬歇爾七上廬山

杜魯門接委員長復函，認爲頗不圓滿，而國共兩方談判繼續僵化，未能打開，因此，八月三十一日，特再致函蔣委員長，強調必須藉政治統一之方式，以迅速結束中國內戰，方能便於美國實行援助中國，復興工業與農業經濟之計劃。

按該函已暗示，如果政府再不接受司徒及馬氏之調停，美國將停止對華之援助，其要挾性與壓力，實堪浩歎。九月三日，國共雙方提出出席五人小組之代表名單，中共堅持「政府應擔保小組獲得協議時，頒發停戰令」，馬氏乃告知中共代表稱：

「此項建議已送達蔣委員長，委員長表示此非一有效方式，因中共必將提出其他新問題，使討論更加複雜。」馬氏又稱：「彼曾告委員長，僅於討論『國務會議』時，司徒大使始克任該小組主席，若提出其他問題，司徒大使立即退出討論。」

「彼盡其一切力量，以求打破難關而獲得停戰，至於中共之公開攻訐，政府方面之反對，均置不問。」中共對非正式五人小組之態度，大致如下：

「必須政府保證設法停戰，並保證對小組關於改組政府獲得協議時，政府即撤回其五項條件，中共方參加小組。」

「當戰爭正在進行時，中共不擬提出充任國民政府委員之名單。」

「若果將停戰辦法，留待國務會議討論，則政府再加上青年黨，於表決時將佔多數，而任何停戰辦法即受政府支配，希望由三人小組處理此事。」

「綜簡言之，中共於協議基礎遲延時，即發停戰令，參加五人小組討論，中共希望頒布無條件停戰令，或由三人小組立即會商此一問題」。

九月六日，馬帥七上廬山。對於前項周恩來之意見，向蔣委員長陳述，並徵詢意見，詎共軍在大同竟施用毒瓦斯，馬帥聞悉深感不安，於十一日趕回南京。遲與周恩來單獨會見，俾解決毒氣事件。奈周恩來僞稱：「並不知有

此事。」一味狡賴，馬帥無可奈何，乃於十四日八上廬山，與蔣委員長繼續懇談。奈斯時共軍猛攻平漢路北段，圍迫保定。馬帥爲執行停戰起見，除聽取蔣委員長意見外，不得不黯然而返南京。此乃第八次之下山，嗣後，廬山不再見馬帥之蹤跡矣。

關於馬帥「八上廬山」之經過，與蔣委員長會作二次長談，其談話記錄，當日「紐約時報」業經詳載，並加以評語云：

「中共不肯誠意謀和，而一再在停戰問題上狡賴與延宕，實屬別有用心。」

其語雖允當，但終未能瞭解共黨之戰術與戰略。要知共黨欲顛覆政府，奪取政權，中共以部隊爲其資本，倘將此資本移撥而歸公司共管，是不啻摧毀其所欲達之目的。假使「軍隊國家化」，中共將復有何種憑藉，可以奪得政權，赤化中國。美國冒干涉盟國內政之嫌，於不能調解之事，而強欲調解，且逼令中國政府就範，結果，轉而助長中共之掩有大陸。豈不痛心！

國共和談之經過，美國發表白皮書，冀誘過於國民政府。殊不知「調解」之基本主張已錯，而所「調解」者又皆爲「不能調解」之事，所謂調解云者，正中中共下懷，彼共黨有一套會議戰術，彼乘「會議」而實踐其屈伸進退，縱橫捭闔之術，作爲沙場戰爭之助。戰勝時則打，戰敗時則談，致演成打打談談，邊打邊談之局面。時人評隲，馬帥徒成爲中共之工具，其後待馬帥醒覺而已鑄成大錯矣。

蔣委員長經馬歇爾往牯嶺與之數日會商後，表示接受若干條件，委員長謂：

如果中共同意使三人小組對於該小組六月間所討論之各項問題採取行動，則解決停戰之軍事問題交三人小組決

定，不必經由「國務會議」。所謂各項問題，包括恢復交通，停戰條件，東北軍隊之重新分配，軍隊改組及共軍駐防地點等。並同意將地方政府問題押後交「國務會議」討論，委員長希望五人小組獲得協議，其結論交「政協」綜合委員會通過以後，使憲法審議委員會恢復工作，惟在停戰令頒發之前，中共必須提出中共之出席國民大會名單。周恩來對委員長之言，認為除五人小組討論組織「國務會議」之外，其他政治程序，均與「政協」之決議相矛盾，因此，中共要求立即召開三人小組，以覓致停戰令之頒發。

馬歇爾對周恩來之意見：中共所提，不啻使六月底司徒與彼二人企圖藉改組國務會議之提議，予以打破難關，重行恢復。

至是，中共代表仍堅持下列二點意見：

- 一、政府應保證予中共在「國務會議」中足額之票數，俾該黨能否決任何修改政協決議之提案。
- 二、提早發布停戰令。

蔣委員長表示：「除非五人小組開會成立關於組織「國務會議」之協議；否則不能同意召開三人小組會議。至於國民大會一節，共黨所需之唯一行動，應先提出其代表名單。」

委員長又表示：「五人小組中之政府代表，如於五人小組會議，正式召開之前，先作非正式討論「國務會議」之問題，亦不表同意。」但復表示：「五人小組對於「國務會議」之席數分配及否決權二項，自可同意加以討論及解決。」

九月十六日，周恩來由京赴滬，行前，向馬歇爾提出三件備忘錄：

第一件備忘錄：列舉美國對於中國政府之援助，認爲係助長內戰，並抗議美國政府將剩餘物資售予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政府，在中國內戰未解決，和平及統一未恢復，聯合政府未成立以前，凍結剩餘物資協定內之物資供應及運輸。

第二件備忘錄：要求召開三人小組，以商談停戰令之頒發。

第三件備忘錄：告知周恩來赴滬，謂如三人小組開會，周氏可立即回京。

馬歇爾將此項中共所送達之備忘錄，向蔣委員長報告，委員長立即表示：不能贊同召開三人小組會議，必須促成五人小組開會，並同意馬歇爾所提關於「國務會議」席數分配之折衷建議。按此建議，使中共對於防止修改政協決議之否決權，僅差一票，蓋預料必有思想自由而無黨派之國民政府委員一人，將自由投票。此時往返磋商，調解工作形成膠着狀態。

司徒及馬氏，以爲政府堅定召開五人小組而中共決意須開三人小組，經調人之努力，擬以三人小組與五人小組同時召開。中共表示其立場：

「若三人小組討論停戰問題與五人小組同時召開，則中共可參加五人小組，但停戰問題之解決，爲參加五人小組討論「國務會議」之先決條件。」

五人小組對「國務會議」問題之基礎，獲得協議時，委員長應撤回其五項條件。」

「國務會議之組織，即使已獲協議，如停戰令仍未頒發，則中共拒絕提出參加政府之代表名單」。

「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委員會，應討論改組行政院問題。」

中共之最關切者，厥爲停戰及保證政協決議不予修改。其提出否決權，據謂爲後者之保證不予修改而發。中共認爲共黨之安全，繫於政協決議之維持。

政府之立場反應如下：

「戰爭之責任，明明起自中共之佔據東三省，及正在商談之際，突然侵襲而進佔山東，故停戰令無須頒發必要，應先由中共先停止其攻擊政府軍之陰謀。」

「關於停戰及各地問題之解決，皆應由國務會議討論。」

如五人小組達成協議，且爲政協綜合委員會所接受，政府可同意召開「憲法審議委員會」。

「中共如不提出國大代表出席名單，則政府不同意頒發停戰令。」

「在國民大會未召開前，不擬改組行政院」。

「在五人小組會議前，不贊成作非正式之會談」。

以上爲國共雙方距離之意見，至是，馬歇爾與司徒雷登乃將調解經過，報告美國務院，其中一段略謂：

「國共雙方立場，無法協調。因此吾人企圖藉成立五人小組以打破僵局，作爲停戰之先聲，故不辭跋涉廬山，向蔣委員長施重大壓力，冀得其同意此項建議。但又遭中共拒絕參加此五人小組會議，中共宣傳攻勢一如往昔，欲破壞調人努力之因素，却造成混亂與誤會。其最尖刻凌厲者，爲反對美國剩餘物資之轉讓，中共對於任何人向不信賴，且復慣於曲解及抹煞真相，掩蔽事實。故其卑劣手段之作用，指轉讓剩餘物資，乃助長中國內戰，而事實真相，適與相反。」

第廿二節 馬歇爾擬退出調停

上述云云，係馬氏呈報美國務院第一次批評中共，語雖中肯，但馬氏之行動則仍側重於爭取中共，故七上廬山之目的，無非欲對政府施壓力，迫使當局就範，以爲藉此可以達成和平統一。孰知共產黨玩弄馬氏，專致力於攫取政權，縱使事事依從中共，一轉瞬必又枝節橫生，在馬氏徒勞無功，而中國之罹浩劫矣！假使無美國調停，局面早已改觀，決不容中共橫行無忌，日日催逼政府停戰，使軍事處處牽掣，反予共黨以可乘之機，豈真國家劫數之不能逃歟！

九月十九日，馬歇爾將政府對於召開三人小組之意見，徇中共駐京董必武之口頭請求，通知旅居上海之周恩來，而周氏因此另提出一新「備忘錄」，提出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否則，中共將被迫公佈，自六月停戰期間以來所談判之一切重要文件。馬氏據此，乃告中共駐京人員謂：「由於中共之惡意宣傳，攻訐馬氏，而中共私下一再請求馬氏繼續調解，馬氏堅決聲明，對於中共此種方式，決不能再事容忍，倘認馬氏調解爲不公平，則望明白見告，馬氏可退出調停。」云云。

馬氏向政府高級官員稱：「目下局勢非常微妙，倘戰事繼續惡化，中共迫而尋求外援，依靠蘇聯，使和平工作更加困難。」

委員長由廬山回京，請馬氏表示關於公開聲明之意見，九月廿七日馬氏建議如下：

「由政府提議召開五人小組及三人小組，其任務爲履行六月間所簽之協議，由三人小組決定有關軍事改編及整

理之協定問題。政協綜合委員會應承認五人小組所達成之協議，一切地方政權問題，由國務會議解決，停戰令發布之同時，中共應提出參加國民大會出席代表名單。」

馬氏以爲上列之提議，如中共同意，應先頒發停戰令。而委員長以爲馬氏之提議，均應於停戰令未發布之前先行完成，但委員長旋表示發表公開聲明。

九月卅日，中共周恩來向馬歇爾提出一新「備忘錄」，報告政府軍進攻張家口，張家口爲中共軍事之重要中心，如不停止進攻，中共認政府「全面分裂」、「放棄和平解決辦法」，並鄭重聲明，政府停止進攻張家口，爲中共參加三人小組五人小組之先決條件。

十月一日，馬歇爾會見中共代表時，告知其下開之意向：

馬氏對於中共及政府之行動，均表不滿，目下形勢，使彼不能繼續調停，兩造既互相詆毀，一方提出一建議，另一方又一反建議。馬氏續謂：當調人尋覓解決之路徑時，中共不顧及政府之地位。當馬氏與政府磋商，如何可使中共接受條件時，中共忽又表示拒絕提交國大代表出席名單。當馬氏與中共討論，如何可使政府達成協議時，政府忽公開宣稱進攻張家口。馬氏嗣後對中共，只轉達文件，不再作口頭代爲陳述。馬氏認爲政府之「局部軍事行動」已逾三個月，美國殊難繼續擔任第三者作調人。

同日馬歇爾遞呈一備忘錄送達委員長，節稱：「余僅願聲明，除非雙方不再作牽連之建議或反建議，而對停戰獲得協議基礎，否則，余將建議杜魯門總統將余召回，並將美國調解工作終止之。」

十月二日，委員長向司徒大使口頭說明：「政府瞭解馬將軍處境之困難，政府對於張家口之佔領，不獨爲國家

利益所必要，亦所以阻遏中共之再事軍事擴張。」

馬氏認定委員長之發此言，益信其自身不必再作調人，馬氏稱：「委員長顯係利用延宕之談判，從事其既定之武力政策，回溯六月間委員長固已允許中共保持張家口。」

十月二日，委員長對馬歇爾備忘錄之答覆「政府坦誠相告，對於目前問題之解決，願作最大限度之讓步：

一、關於國民政府委員席次，最初政府曾同意予中共八席，民盟四席，現願另讓一席與一由中共推薦而得政府同意之無黨派人士，如此，即可使中共滿意之國府委員共有十三席之多，該黨應即提出其國府委員及國大代表之名單。

二、在整軍方案規定之下，中共之防地應即指定，並依原約定之時間，中共軍隊進駐防地。上述措施，由三人小組決定，在軍調部監督下執行之。

中共如贊同此項建議，雙方即發布停戰令。」

十月五日馬歇爾報告華府，略稱：

「本人以爲目前中共正作惡意之曲解宣傳及苛刻之攻訐，對司徒大使所主持之五人小組，伴作態勢，拒不贊同，結果造成延宕。美國政府究不能在舉世注意之下，仍令本人續作調人。本人相信此乃唯一方法以停止軍事行動及糾正政府軍事領袖之觀念。彼等以爲實行軍事行動，即可將美國拖進漩渦。茲擬就函稿一件，建議以美總統名義發致蔣委員長。」函稿原文如後：

「馬歇爾將軍建議結束其調解任務，並由余召其回國。彼曾同閣下釋明，大規模及富有進取之軍事行動，現正

不斷進行，在此種情況下，由其繼續從事調停，將使世人對其所代表政府所採之行動是否正大一節，發生疑問。余對其爲中國覓致和平之努力，遭受失敗，深表惋惜。但其所採之立場及行動，原代表美國政府之崇高目的，此點絕不容懷疑，余以遺憾之心，決定將其召回。」

司徒大使將馬氏呈報華府請求召回一事，透露於委員長，委員長立即表示：將張家口之軍事行動停止五日。如美方對人堅持更長時間，亦可照辦。惟中共爲參加三人小組及五人小組，必先商討張家口爲條件。委員長又於翌日清晨，邀約馬氏司徒會商，馬氏乃再呈報華府，請求杜魯門總統擬致蔣委員長之函暫緩發出，繼續其調解工作。

第廿三節 因收復張家口馬歇爾停止軍援

在第二道停戰令頒布後，使蔣委員長與馬歇爾將軍之間，發生分歧之意見，且引起馬帥向華府建議，停止對中國之軍事援助，此即張家口事件是也。

初，蘇俄進兵東北時，因會取道張家口，故張家口亦被同時佔領，迨一九四六年俄軍撤離時，便將此軍路要點，移交予中共駐守。中共當時會決定以該城作爲首都，以代替延安。按張家口爲中國北陲要隘，又爲通西伯利亞之衝道，中共自知無法保守，乃向馬帥提出要求，「如果國軍向張家口推進，則顯然破壞停戰，而無誠意和平談判，並請馬帥速予制止，否則，中共與政府所有種種談判，一切均宣告破裂！」等情，而政府方面，以中共於是年八月初即將山西省之大同，圍困得水洩不通，自不得不迅爲赴救，直指張家口亦解救大同之另一方法。

九月卅日，中共正式聲明：「大同之圍，業已解除。」並再向馬帥聲明：

「設若政府對張家口不停止軍事攻勢，則中共將被迫認定政府已公開表示全面分裂及放棄和平解決方式。」中共又另作口頭聲明：「政府停止對張家口之進攻，爲中共同時參加三人小組與五人小組會議之先決條件。」

馬歇爾依據中共之請求而向蔣委員長陳述，並要求將張家口仍由中共佔有。蔣委員長不予同意。馬帥續稱：「政府在六月間，曾同意張家口由中共佔有，該時政府之軍事局勢，遠較目前爲劣——承德現被佔取，河北及察哈爾省大部份皆被佔領，國軍已拓展至距北平甚遠之地方，現復即將佔領赤峯、多倫。目前之形勢，顯係軍事行動而非和平談判。」云云：

蔣委員長以爲九月廿日中共在張家口強迫軍事調處執行部人員之退出，中共此一舉措，不僅破壞停戰協定，而且企圖割裂我熱、察領土，並威脅我平、津重鎮。政府爲保障平、津免遭威脅，不得不對集中於張家口周圍之共軍作戰，而此項割裂熱、察，威脅平津之共軍，皆以張家口爲根據地，政府對張家口之行動，乃實迫處此者。」

周恩來藉口張家口事件，由京赴滬，以表白其談判破裂，不再商談之姿態。而馬歇爾以蔣委員長未能接受其要求，加以中共代表一走不談，馬帥受此刺激，惱羞成怒，竟施行其唯一法寶，斷絕對華軍援。（自一九四六年八月份起算）此後八個月間，美國禁止一切軍事物資運至中國。該項禁運，實爲國軍之致命傷！蓋國軍使用之武器、皆係美製，一旦禁運，則彈藥中斷，如此毒辣手段，實無異於繳國軍之械——解除國軍武裝，其削弱國軍戰鬥力，即等於壯大中共部隊，論失大陸之原因，此爲最嚴重之一端。

且美國之對華軍事禁運，不祇由其政府實施，更禁止及於美國之市場。中國現持有之軍械，既係美國出品，其彈藥、配件，亦非美製不可，斷不可以向它國別求所需者。若是，則國軍雖武器若何精良，一旦損壞，或彈藥告罄

，遂形同兒童玩具，可觀而不可用矣，共軍之猖獗，有由自矣！

美國於翌年（一九四七）雖由其國務院撤銷前項禁運令，但亦僅指彈藥可恢復供應而已。惟彈藥既可供運，中國急欲得其所需，而美國則遲遲其來，第一批所獲得者，已在一九四八年後期，此時國軍軍事情勢，已被中共壓倒，亦猶病入膏肓，縱有靈藥，實不堪挽救矣。

當前述禁運，尙未實施之前，美國務院更有不利於國民政府之行動。副國務卿艾契遜，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八日，在華府論及馬歇爾二度來華之使命時，及於另一項公開聲明中宣稱：

美國對中華民國與中共，係一——公平無私——吾人無法對此政府（指國民政府）作過多之期望，吾人對中國之經濟援助，皆通過一充份及真正代表中國各重要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之政府，作為媒介。

艾契遜先於此項聲明之前數日（六月十九日），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作供時，證稱：

「中共領袖們會要求，並獲得馬歇爾將軍之同意，於彼等（指中共）之軍隊，與其他軍隊（指國軍）合併前，應先獲一短時期之美國訓練，及獲得最低限度之美國裝備之供應」。「吾人現在知道，中共從未曾有意——使其軍隊與國軍合併——而其企圖在獲得美國訓練，美國軍火——幾乎成功其陰謀。因美國已經派遣協助中共訓練其軍隊之美國軍官六十九名，前往上海，聽候國務院命令。後遭國會反對，致未克前往中共地區。」遂罷其議！

觀上開證供，再參看禁運事件，則美國在表面上支持國民政府，而其實際，則為培植中共。在此種決策下，怎不造成中國禍亂，至於失去大陸也哉？試再舉美國訓練裝備中共與訓練裝備於國軍者，兩相對比，亦可見美國決策者，衝動與猶豫。

美國於一九四五年向國民政府提出——訓練及裝備國軍卅九師之保證——稍後時間，又向國民政府承諾給予國軍八個半大隊空軍之保證。并隨帶裝備及護養零件。翌年春（一九四六）美國復同意供應國軍海陸空三方面所需之護養零件，并給予國軍於二次大戰後，所留存於中國之一批美國軍用舊車。凡上列所擔承之允諾，美國皆在杜魯門八月十八日禁運令之下，全部取消。反加嚴限制，使國軍一無所得。甚矣，禁運政策之有害於中國也！

第廿四節 馬歇爾始發覺中共詭詐

馬歇爾承赫爾利之一般見解！以爲中共係可代表中國人民爲要求「民主」而出以武力，視國民政府爲一黨專政之獨裁政權。從此種觀點，則對中共之存在，認爲乃社會上之正當團體，緣是其談判方面必以雙方並重，而以相對等之地位給予中共。故當調停之初，即循此途徑作其出發點，絕未計及國民政府爲中國全民之所倚重。因其將共黨與正式政府相提並論，共黨地位居然增高！而其稱兵叛亂之咎戾，反被掩蓋，致中共趾高氣揚，竟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此調人之誤解一也。如果以國家綱常法紀而言！則共產黨以人民團體作建議條陳爲政治改革之要求則可，其自建武力則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所不許。誠如共黨所宣：「武力應歸國家、軍權不能操於黨派」，然則中共私自組成之武力，應作如何解釋？此調人之誤解二也。「中共並不隸屬國際共產」！偏聽赫爾利之說，而赫氏又誤認莫洛托夫爲眞言，此調人之誤解三也。馬歇爾得委員長之允許停戰，認爲可以鑒中共之求矣，不料中共又提出責難，復表白其態度，馬歇爾至此，始憬悟於中共之狡猾詭詐，然已悔之已晚，於是復萌退出調停，結束談判之意。

中共所指責馬氏者，計爲下列數點：

一、美國政府既任調人，爲何又以「租借法案」而援助國民黨？而共產黨方面則不予援助，同係黨派，何爲厚此薄彼？則所謂調停，無非替國民黨出面說話，其所調解，顯然不足公平與正直。

二、政治協商會議之成員，係多數偏向於國民黨者，中共僅只幾人，假使不賦予共黨以否決權，則此會議，無異於國民黨一方面說話，其所決議，必有利於國民黨者，試問共產黨接受國民黨之支配乎？

三、國民黨所提條件，純然以勝利者自居，中共軍隊必須規定其防地，而國民黨軍隊可以自由調撥移動，豈得謂事理之平？

四、國民政府必須永遠停止進攻，否則即視爲有意造成全面分裂！

中共周恩來並對馬歇爾提出軍事方面之要求如下：

甲：所有中國本部之軍隊，恢復至一月十三日之原駐防地之位置。

乙：中國東北方面，恢復至六月七日之原駐防地位置。

丙：直至着手改編軍制，所有軍隊駐防地點，應加確定。

丁：所有政府軍隊在一月十三日以後所移動者，仍應退歸其位置。

關於政治方面亦提出多項意見，所有「三人小組」「五人小組」及「政協綜合委員會」等問題，使調人感覺枝節橫生，在甲問題得一端倪時，而乙問題又開始發生，迨乙問題似可解決，則丙問題接踵而起，致調人疲於奔命，迄無得一成果。馬氏因對周恩來直截而言曰：「委員長計劃停戰，並非故意稽延，以爭取其軍火之充實，裝備之補給，與隊伍之調動。這才周先生所說，余以爲余之調解，確已勞而無功，更無良好辦法，以阻止『伏波乍去』而不

意「橫逆旋來」，何必再作此虛無裨益之調停！」馬氏繼又對周謂：「余早已向足下表白，倘若足下對余之調解，或懷疑而不信任，或已失去中間之公正立場，請即直告，余願立即退出。」

周恩來鑒於馬歇爾之忿怒狀態，乃轉而陪笑相迎，並立誓「自馬氏出任調人彼並無一言批評，致損馬氏尊嚴？」並云：「中國共產黨對馬氏任勞任怨作調人，謹代表中國人民一致向馬氏表示其誠懇之感激與謝悃」。馬氏聞言，氣似平復，蓋人之欲聞善言，欲聽諂媚之語，天下皆同也。

周恩來乃於十月九日提出『備忘錄』，其綜括意旨：「政府應停止張家口之進攻，倘使政府能永久停止攻擊，則中共極願參加三人小組與五人小組及政協綜合委員會，同時討論停戰及政協決議。」蓋亦以答復委員長十月二日之備忘錄耳。

蔣委員長常以中共爲俄共之子黨，且爲其工具，共產主義之本質建立於永恆之鬥爭，所以中共談和，即其鬥爭之手段，亦即戰爭之延續。因爲在其本身戰略上需要喘息機會，以部署其戰術。試看每次中共戰爭不利時，彼便裝模作樣說盡好話以覓求和平。及其軍事形勢有利，彼則立即改換面孔，非堅持某一事項，即另生枝節，不問其所提出者有理無理，終以破壞談判爲目的。但及其既已破壞，又必設法拖一尾巴，作爲重作談判預留地步。委員長又解釋稱：「馬將軍或許對共產黨未盡瞭然於懷！共產黨之主義與其所作所爲，完全不相符合。共產黨之言語與其行動，尤爲相背互異。其所以然者，共產黨人自己明知其行動爲社會人羣所不喜，但必須騙取人民同意。中國人有傳統諺語：『王莽學周公，外恭順而內陰險。』彼輩認爲宇宙間萬事萬物，均屬相對，相對即認係敵對。既係屬共黨之敵對，則非絕滅其敵對，不足以謀其本身之發展。共產黨對於不同情者，不喜好者，視爲反對派，指爲反動派。在

居間調停解紛者自付已具極大忍耐，然可以預見將來之周折與困難，其主因，由於共黨之地位與政府相比擬。換言之，即共產黨現在所成立之僭號竊據，與在南京之正統政府相埒。調解人本此觀念，以衡量政府與中共，中共遂得而坐大。彼認為世界強國亦以我中共為合法，而應承認中共之地位，則中共對國民政府，當然出以輕藐藐視。以如此而求合理之解決，縱極大讓步，中共不停止其擾亂！除非全中國為中共統治，否則，前途殊頗黯淡。」但續謂：「雖然中共如此，國民政府為顧及國家元氣與人民痛苦，無論如何，必欲以和平方法取得協議，以免生靈塗炭，中國人民對於美國誠意出任調停，齊表感謝之忱」。

一九四六年（民卅五）十月十日國慶紀念，蔣委員長發表文告，茲摭其要點：

「在最近三個月經過調人之調停，而中共反對國民政府之建議，及拒絕馬歇爾將軍司徒大使之停戰建議，但無論若何，政府仍一秉和平解決之政策，希望能繼續以洽商與調解方法，覓致解決。」

「政府為謀中國之統一，曾幾次要求中共，放棄其樹立地方政權，停止其以武力分裂整個中國之版圖，希望中共與其他黨派，共同參加政府，合力以謀中國之復興與繁榮，國民政府希望中共及各黨派提出（一）關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之名單，（二）關於出席國民大會代表之名單，（三）關於國內戰事希望永遠停止。」

第廿五節 國府重頒第三道停火令並發表聲明

當雙十節委員長發表上開文告，而中共所佔據之張家口忽於先一日撤退，於是政府軍得以安全進佔張家口而只遭些微抗拒。此其一。

蘇北地區，亦於同時由政府軍佔領較多城鎮。因共軍感覺蘇北地區有孤軍久困之慮，驟行向徐蚌一帶撤退，其意圖阻斷或威脅隴海與津浦兩路交通及險要，並欲攻佔符離集之戰略重點。此其二。

國民政府國防部發布實施兵役法，用全國徵兵制，以辦理復員整編遣散後之消失兵力，而重建新生兵源與兵力。此其三。

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正式頒發公告：「國民大會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此其四。

基於上述各點，於是各黨派如「民主同盟」，附和中共，大加責難政府，認爲：「停戰爲和談第一要著，政府允諾停戰，又何以攻佔張家口？更爲何於蘇北發動戰爭？而徵兵制已在勝利後停止，何忽又重新辦理？是政府根本上在以戰爭消滅異己，決無停戰誠意！」

至國民大會召開日期一節，早於四月廿四日各黨派代表與委員長取得協議，對於國民大會之召開，應由各黨會商決定。故原擬五月五日召開之日期，至是遂由政府決定展期，於是和談之形勢，更趨黯淡。是時孫哲生（科）本爲政府方面之國民黨人，彼則以私人立場，日常周旋於中共民盟與調人之間，惜不知其原意云何也。

馬歇爾偕同司徒大使晉見委員長，意欲關於和談一事，以目前情勢之演變，應有所修改，馬歇爾首謂：「情勢演變，其中癥結仍爲停戰，縱使中共受軍事壓迫而承認各項協定，但對改組政府一節必多阻礙，則難於獲得健全結果。中共易生惡感，常懷仇恨，時時存報復心理。」委員長答云：「對於政府改組事宜，中共必須對人民及政府領袖提出保證，保證改組之舉，必須有利於人民，否則，政府不能無條件同意停戰。」中共對於國大代表名單之提出，卽其一例。

馬歇爾向委員長陳說：「委員長前曾謂對付中共應先嚴厲，至某一階段，然後逐漸放寬，始克達成協議。斯言也，委員長想未忘懷，現在政府既已佔領重要據點，履行前言，恐已至其時乎？」委員長點首，但云：「停戰之前，政府定須獲得優勢」。

馬歇爾與司徒大使草擬一項聲明稿件，送交委員長核閱後，擬請委員長發表，此項稿件係基於九月廿七日馬氏向委員長提出之初稿，加以修正，乃委員長面囑馬氏所撰擬者。委員長在該時之意，以為政府建議屢為中共否決，然則，如何方可使中共接受？請調停人居中起草，只求不違反國家綱常法紀，不損害人民與政府利益。馬司兩氏撰稿列下：

甲：「五人小組」與「三人小組」在下列各條諒解之下，同時舉行。

乙：「三人小組」在六月談判所成立之暫時協議應付諸實施。關於東北軍隊重行分配之計劃，應予承認。

丙：長江以北，政府軍隊繼續其現在所佔領地點，直至「三人小組」對軍隊之重行分配改編及復員時為止。

丁：「政協綜合委員會」對「五人小組」所獲得之諒解，應予認可。

戊：地方政府問題應由新組之國務會議解決之。

己：「憲法審議會」應即重開，將其通過之提案，提交國民大會，作為基礎。

庚：中共應同意參加國大，並宣布其出席代表名單。

上述程序得中共同意後，政府立即發布停戰令。

蔣委員長研究該項草稿後，經於十月十六日提出八項建議，其間與草稿不同之點：

- (一) 關於六月所成立協議雙方軍隊隔絕接觸一點，刪去（包括於（甲）項）。
- (二) 關於地方政府問題，指明東北除外（參看草稿（戊）項）。
- (三) 關於東北軍隊重新分配問題所成立之臨時協議，應立即執行。（參看草稿（乙）項）。

中共方面提出之答案：

中共接得蔣委員長八項建議後，立即反應，認爲國民黨仍施其故技，以遂行其專政與獨裁，延安廣播首先提出指摘！時周恩來在滬，各黨領袖紛紛亦到滬相晤，如沈鈞儒黃炎培等，其對外揚言則謂「催促周恩來返京」？其實暗中商討對八項建議之對策。各黨派欲附和中共，以冀提高其自身之地位，作爲取得政權之先著。而中共則利用各黨派之同情擁護，以壯其共黨之聲勢，同時各黨派要求國民政府派遣高級官員來滬，與中共及彼等會談，作爲初步之協議，然後再共同偕周恩來來京，以與委員長面作決定。而馬歇爾確對調停感覺厭倦！乃表示美方調人應暫退一旁，由中國人自行解決，而以調停之重任，試讓由第三黨派擔任，或於事較有裨益。但經政府官員到達上海，幾經會談，迄未得到協議。惟中共周恩來已允許於十月廿一日回京，則談判之門，似又重啓。

先是，蔣委員長原定於十月廿日由京飛臺灣，少作視察，其通知馬歇爾云：「赴臺僅作三四日勾留，倘和談必須余親到，則余可隨時飛回。」但聞周恩來答允來京及各黨派人士與之俱來。至二十日委員長並未起程，蓋欲俟周氏等到京面晤後再行動身。由於周氏等暨各黨派人士抵京，則美方之調停，與第三黨派之斡旋，局勢似較平定而具希望。然而中共及各黨派仍以參加國民大會問題作爲要挾，多次商洽，卒無成議。周恩來於十月廿四日正式通知馬氏與司徒，提出答案：

「國民政府八項建議，中共無法接受」。當此時期之中，東北情況，似較平靖，但共軍對各道路之交通線破壞，實屬厲害；因此頻生軍事接觸，然無大規模戰爭。

華北方面，共軍沿平漢路大肆活動，以配合在冀南區域之總攻擊。其目標亦全在破壞交通。而國軍爲欲保全兩大鐵區以謀華中工商業之接濟。

東北之哈爾濱，熱河之齊齊哈爾，共產黨煽動工人學生之羣衆，大力掀起示威運動，要求「美軍撤離中國」，要求美國「勿干涉中國內政」。

在上海、南京、重慶之共產黨要人，請求馬氏商借美國軍用飛機撤往延安，藉以引起社會混亂與不安。

馬帥調停所遇到之困難，全在於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整軍基本方案，及第一第二兩次停火令之協議，悉遭共方全部推翻。但由於全國人民仰望憲政之早日實行，則國民大會勢在必行。因此，國民政府爲表示極大忍讓，乃於十一月八日，再頒發第三道停止衝突令。希望共產黨懸崖勒馬，火速停止破壞，並參加制憲國民大會。

停戰令之原文：

「自去年敵軍投降以來，政府一貫方針，在祈求和平統一及民主建設。依政治途徑解決國內糾紛，關於國民大會以前，奠定國家復興之基礎。雖因共軍對國軍到處進攻，迫不得已實行自衛，然對政協決議方針，始終一貫。是不惜再四忍讓，遂有本年一月與六月間兩次停戰令停戰，及國大召開之延期。茲爲昭示政府貫徹原定方針，特再頒發停止衝突命令。望迅速轉知所屬，務於十一月十一日正午起，全國軍隊一律停止戰鬥，各守原防，以示忍讓之至意，仰恪遵毋違爲要。中正戊齊手啓。」

蔣主席聲明詞（原文）

「本年十月十六夜，余曾發表政府關於處理目前時局的聲明，並包括八項，作爲停止衝突協議之基礎的提議。原冀此項聲明能得到中共之答復，俾達全面停戰之目的。今當國民大會開會之前夕，余特重新聲明政府一貫之政策，在促進國內和平，全國統一，以求達到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目的。……爲實現此願望，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爲防守現地所必需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依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原應於本年五月五日召開。但中共與各黨派拒未提出其出席名單，復於七月四日政府宣布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俾各黨派可於四個月期間作一切商討與準備，各黨派表示異議，謂政協所同意之改組政府步驟尚未實行。……此半年來一般情勢大有變遷，關外東北嚴重戰事，旋又蔓延於華北。中共軍隊迄未依照協議七案履行，政治協議，未獲結果。現國民大會依法選舉之代表均已如期報到，國民大會實不能再予延期。……余在十月十六日之聲明，實已表示最大忍讓，希望中共予以接受。政府對於中共期待其與各黨派，同循民主之軌轍。而在軍事上則必須使任何政黨不得擁有軍隊，均應爲國家之軍隊。」

「因此，政府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之名額，仍望其隨時制憲。希望中共立即派代表參加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商討停止衝突、駐地分配、整編統編等問題。」

「關於國府委員會之改組，望能早日獲得協議。至於行政院在國大未閉會前，不作重大變更。政府擬向國民大會提出憲章審議會，以修正未完成之草案。國大閉會六個月，依照憲法舉行普選……國民大會對憲法如有修改意見，儘可依法提出修正。」

「此數周內實爲關係國家盛衰之重要關鍵，……吾人必須克服任何偏見猜疑與仇恨之情緒，並應超脫一切困難，以貢獻於全民之利益。……以和平方法達成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目標。」

第廿六節 馬歇爾退出調停離華返美

民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七日馬歇爾將軍對國共調停任務，自承失敗，宣佈回國，出膺其國務卿新職。臨行，發表聲明，仍表示其自信——國府必須以政治協商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並另行提出一項新見解——認爲在中共領導階層內，存在着一個「自由份子」集團，可與此等人士，達成民主安排。

吾人固無意將中國大陸淪失，歸咎於馬帥，或美國之政策。在如此錯綜複雜之局勢中，絕無一單獨因素，應負全部責任。故於馬帥先一日白司徒雷登大使陪同，向蔣委員長告辭時，司徒大使之一段記載中，可見中、美兩國之友誼：至今敦睦同盟，益見團結者，蓋非倖致。而我蔣委員長豁達大度，其對馬帥不以利害成敗爲衡，而以品格幹材作評。誠寬仁而克己者也。司徒大使之言如次：

「馬帥率杜魯門總統召回國，接替貝爾納斯而任國務卿，我們於下午同往拜訪蔣主席，告以馬帥即欲離華返國，而未言將任國務卿也。是日蔣主席坦誠直言，對雅爾達協定，頗滋不滿，因簽約之前，與簽約之時，均未徵詢中國同意，蔣主席說：他本人雖然可以原諒那些負責的人，可是中國人民對此不公的待遇，深爲痛恨，他希望馬歇爾將軍能把這一點，報告杜魯門總統。」

「蔣主席詢問馬帥，肯不肯回到中國來？作他自己的最高顧問。蔣夫人擔任了傳譯，我們同意於明日下午，四

人再度會商，然後蔣主席設宴餞別。

「翌日踐約會晤，蔣主席再度以誠懇而殷望之態度，向馬帥提出——敦聘爲最高顧問——深望馬帥繼續爲中國服務，且以坦白而出於衷情之態度，表示其本人願以自己所有之權限交予馬帥，且願與馬帥作最大之合作，同時請馬帥考慮，是否還有對中國和美國，更爲有價值之工作？他（馬帥）是否應當幫助他（蔣主席）使中國成爲——中國人和美國人都同樣要中國成爲那一樣的國家？照他（蔣）看來，馬帥不僅是能够控制他（馬）手創的軍事顧問團，而且也可以控制全體文員的美國顧問。」

「馬帥聞言之下，頗爲感動。惟因馬帥任國務卿之新命，按例未能於其政府未公布前，先行向別國元首報告，故馬帥只得答謂：

「感謝主席所給予之尊嚴，和這偉大之機會，容我（馬自稱）詳爲考慮。」

「馬帥於回寓途中，託司徒大使向蔣主席前代爲陳情，其所以婉辭有實權之高等顧問之緣由。惟對蔣委員長臨別之如此誠摯之情感，與夫其用人唯才唯賢之良猷，翻使馬歇爾回想過去一年內對於蔣委員長之態度，殊感未妥，益覺內疚與自愧。司徒大使以馬帥膺國務卿新命，對華政策，提出三點建議：

- 一、積極大量援華，以爲改革之需。
- 二、退出調停，坐觀發展。
- 三、完全退出，不再過問。

但迄未能影響馬帥對華政策，仍主其「聯合政府」舊路，且幻想共產陣營中已潛伏右派，而東方狄托之臆測與

謬說，或亦引發於馬帥臨行之聲明。

第廿七節 魏德邁來華調查

自馬歇爾返回美國任國務卿，國民政府對中共之和平商談明知已瀕破裂邊緣，但仍不放棄其一貫之和平願望，再度作最後之努力。而中共則恰恰相反而醉心於軍事決勝。蔣委員長於一月十六日（民三十六年即一九四七年），派遣新疆省主席張治中（時方接前主席盛世才任），前赴延安，與中共恢復和談；政府表示願照下列基點，進行談判：

一、停止敵對行動，雙方軍隊各留守現有陣地。

二、整編軍隊。

三、恢復一切交通。

四、對地方行政問題作公平合理解決。

奈延安方面對上項提議，不予理會，且進行其軍事攻擊，不稍鬆弛。

國民政府於接獲張治中報告：中共無意和談後，時最高國防會議於一月十八日通過——全國總動員令——及戒嚴條例——授權政府立即執行。認定中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為共產國際之爪牙，其部隊為叛國亂紀造反之奸究匪幫。於是國軍唯致力於征剿與戡伐，戰事遂蔓延而不可收拾。

蔣委員長確信——在肅清東北共黨勢力之前，必須先行保持各鐵道之交通線，及自北平至南京間之政治權力。

正當華北局勢，動盪不定之際，美國再次向中國政府作其友好干涉！

美國務卿馬歇爾鑒于中國局勢之愈劇惡化，深感驚愕。經衆議員周以德力促，馬氏要求總統指派魏德邁赴中、韓兩國，爲調查事實之訪問。以魏氏之親身發現，具報華府，作爲其釐訂政策之參考。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正式公佈魏德邁之任命。

魏氏抵華後，與政府當局接觸，並晤見其他黨派人士，及訪問南京以外之幾個城市。魏氏於八月二十四日公畢返美，發表一公開聲明，其聲明中要點：彼發現——「在許多人士中，存有漠不關心及麻木不仁之態度。」在當時魏氏有此評論，被認爲係對蔣委員長之不滿。又謂：復興——需要有強有力之領導。「該位使節再度重彈濫調：指摘『政府腐化』。此係共黨及『民盟』所長期鼓吹者。末謂：『目前之中央政府，若能撤免現在政府內位居要津之許多無能與腐化之人，則可獲得大部份之中國人之一致熱烈支持。』

但在四年後，美參議院外交、財政兩委員會，於取麥克阿瑟免職案之證供時，魏德邁被邀作供，魏氏自認在一九四七年發表此種聲明，係一種錯誤批評！魏氏說：「我認爲首先是馬歇爾，次是總統，發表之聲明，其用意是要中國自力應付局面。因此，我之建議係配合此種根據。我現在可以說：我們只是削弱中國之利益，而產生有害之影響。」魏氏不解美國政府，爲何對其他腐化現象之國家，仍予繼續援助？爲何獨對中國如是堅決，急待援助而反久予停止？無怪魏氏向其政府提出「五年經濟援華計劃」，不被杜魯門、馬歇爾所採取。蓋美國堅持——中國政府必須實行馬歇爾一九四六年所提出之主張——否則，中國休想美國再有一些援助云云。

按一九四六年馬歇爾主張，即指國、共合作組織「聯合政府」是也。

第廿八節 馬歇爾何如朱爾典

馬歇爾來華使命既失敗，鎔羽而歸。實緣馬帥對中國現勢存有偏見，遂鑄成大錯！當日余在重慶本報，曾以「馬歇爾何如朱爾典？」爲題，對於政治協商今昔作一比較，茲錄原文如下：

「馬歇爾何如朱爾典？」

誰爲協商會議最成功者？

以民生有基礎建立民主。

因「一黨制」而形成「三位一體」之反響，于是有「軍民分治」、「軍黨分立」、「黨政分工」等之要求，殆所謂「天道周星，物極必反」，「窮則變，變則通」者也。

若在閉關時代，此一正一反之必須經過多年流血，爲不可避免之事。今則「天下一家」，因原子能之發明而更形「雞犬之聲相聞」。每一國家或民族，在世界上猶居生存單位，鬥爭單位，和平單位之一，不能自外于世界，已成鐵的定律。

世界不容有戰爭存在，以「協商會議」，代流血革命，遂應時而興；于是有政治協商會議之創舉，在世界革新史上，不能不佔一頁之光榮，而在中國，尤有傳統之歷史，辛亥革命實開其端。然非協商者之因勢利導，與被協商者之見機而作，安能不勳鑒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記者於此，不能不首向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諸君子致其慰勞之赤誠者也。

在昔辛亥革命，以種族相號召，誠有流血漂杵，積骨成山之恐怖，乃因英國公使朱爾典爵士居間調停，北以唐紹儀，南以伍廷芳爲代表，構成南北和議局面，而溥儀因之退位，開革命不流血之一例。爾後效法英美國會制度採取兩黨制，行之十二年，軍閥弄權玩法，征戰無虛日，法統之爭，與兩黨制相終始，是爲朱爾典爵士之所不及料者也。考其民主努力有功無果原因如左：

(一) 英國政府對遠東政策，不因中國革命而改善。

(二) 以南北雙方當事人爲對象，甚至左袒北方，不以全民福利着眼。

(三) 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用非其途。諸如教育、交通、生產基本大政未曾顧到，且根本未想到。

自國民革命軍於十五在北伐，採用以黨取政，以政制軍之一黨制，而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舉全國之人力、財力、物力，投之于安內攘外戰爭中，「民亦勞止，汽可小休」，今抗戰贏得最後勝利，而中外輿論，咸以多黨制相期，潮流所趨，不能不由一黨制返於多黨制，而美國總統杜魯門闡述對華政策曰：

「美國固知今日之中國國民政府爲『一黨政府』，並相信此政府之基礎，如能擴大而包含國內之其他政治分子，則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是爲其主流之一。馬歇爾元帥步朱爾典爵士之後，爲中國民主改革而努力，更爲吾人所欽感弗置者也。

惟戰後中國，民窮財盡，社會經濟凋竭如此，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惟救死不遑，奚暇治禮法，問政治！任執途人而問之曰：「麵包與選舉孰重？則以麵包爲重者十人中至少得九人焉。人民對於政治，自外如此，固知忽視民生，不足以言民主，欲言民主，必先改善民生。若以英美眼光視中國政黨，鮮有不謬誤者。中國政黨首推國共

兩黨，皆擁有兵力與地盤，故其權能超乎政黨之上。此外或糾集小數同志，坐而論道，政黨條件，未之俱備，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而人者，雖無顯赫之勢，但守政黨之典型，而社會方崇拜現實，孰肯毫毛之捐，以濟無兵力無地盤之政黨乎！此所以居今之勢，守法政黨，難乎有爲者也！

凡茲所言，不足以盡政黨虛實之十一，不儘馬歇爾元帥甫抵重慶之未周知，即起朱爾典爵士於地下而問之曰：「多黨制不收效於中國，究爲何因？」亦難爲正確之置答也。外乎此者，更不足以語之矣！

政治協商會議所編致之人物，除國共兩黨外，有各黨各派無黨無派，陣容不可謂爲不整齊，按諸實力，則判若天淵，但介於國共兩大之間，亦自有調和之作用，其功效亦不可盡沒。自開幕以至閉幕，雖分政治、軍事、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小組討論，綜合起來，距預期之目的，實不在遠。

在此推誠協商之際，風雲人物之一言一動，橫則影響世界和平，縱則決定百年大計，以今日政治協商會議之時代背影，與辛亥當年南北議和及民九南北善後相比較，誠不可同日而語。

吾人覆讀辛亥南北和議與民九南北善後之條款，不難想見當時列席之腹笥，除權力祿位而外，一無所有——主權實在北方政府，而未會憶及如何立國？如何建國？

民國十五年，今國府主席蔣公繼承國父之大業率師北伐，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大時期而以一黨治國御軍。甫告統一，而抗戰軍興，八年苦戰，始獲受降東京。距意中共突起，中共軍事雖處於劣勢，而政治把握主動，以攻爲守，東西馳突；舉國惶急，莫知所措。而蔣主席先國家之急，始終堅持政治解決，蓋國民政府爲中外共同承認之政府，而蔣主席之領導全國，爲全國所共同擁戴，任何人不能顛覆其領導地位，如以北方政府擬國民政府迥爲不倫，於是

政治協商會議因之而誕生。執政黨之實力，雖較辛亥時北政府爲強大而充實，但其時代背影，今昔不同。外交決定內政之壓力，不因位列四強之一而減輕，而共產黨雖彷彿當時革命軍，但其組訓民衆，短長互見，聲勢似較當時革命軍爲浩大。馬歇爾元帥以世界元勳，調停其間，其任務方諸朱爾典爲艱鉅。惟美國有整個鼓勵中國富強民生統一和平之國策，而馬歇爾非以私人資格乃以美國特使出而斡旋，其輕重已不可以道里計。況有朱爾典舊事爲其課本，則初步成功，確無問題。爾後中國民主政治如何？殆將視協商雙方之是否誠意，以及是否建築民生基礎之上以爲衡。馬歇爾欲求完成其歷史的使命，尙須廣其接觸，周諮博訪，于致力民主政治之外，尤當援助中國復興經濟，安定民生爲己任，是則記者敢自附於良友之列以獻一言者也。

附錄 美國人自我批評：「我們為何失去中國？」

余寫「馬歇爾來華使命因何失敗？」篇既畢，特選美國人 COSEPH ALSOP 所著「我們為何失去中國？」一文，作爲附篇，以互相印證。原文載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之「週刊觀察」第三期，茲譯述如下：以鑒讀者。

孝威註識

「我們為何失去中國」？ JOSEPH ALSOP 著（仲則譯）

JOSEPH ALSOP 最近在星期六晚郵報，連續發表了三篇內幕文章，題爲「我們為何失去了——中國」？這是一月廿一日刊出的最後一篇，在我們看來，是最重要的一篇，因爲他揭穿了「中美——關係白皮書」發表以來而形成的一股美國對華歪曲宣傳。他對「史迪威日記」的片面——記載，也予以無情的打擊。同時本文特別指出，由於參謀總長任內的馬歇爾，沒有重視過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國的睿智建議，使他自己的出使中國，也注定了失敗的命運。主宰美國命運發展的上蒼，有時好似幾乎令人震驚地漫不經心。舉例說：史迪威將軍在一九四四年，只差一點兒，就可以在中國掌握最高軍事統帥權。假如他能掌握到這個大權，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在戰爭結束時，他可能已使中共執掌大權。可是，只是因爲發生一點隨人性而生的怨憎，就阻止了美國官方在亞洲的一個重要陸地區域，支持起一個共黨政權。

然而，由於同一事件，史迪威將軍不僅失去了出任最高統帥的機會，而且被從中國戰區調回。由史迪威的被調

回，隨而產生一種麻痺現象，隨此而影響到我們對華的整個政策決定。美國政策的這種麻痺，終於開闢途徑，讓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得勢。

總之，史迪威這一幕中的這個危機，在喪失中國的故事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有關的一些事實，在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中，完全一字不提，因此在這裏必須得加以一述。

以下是往事的概述：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派赫爾利少將到重慶去，負有力勸蔣委員長將大權交付史迪威的使命。總統爲史迪威所要求的，是無限制地統率中國境內的一切軍隊，包括共軍和政府軍。新的任命，挾有對中國政府和共黨分配美國援助物資的重大權力。史迪威存有偏見，對蔣委員長憎恨，但對共黨表示熱誠的羨慕。共黨以前沒有從美國得到任何援助，因此極願將他們的軍隊交給史迪威統率。但蔣委員長並不願意將自己的命運，付託予他的敵人手中，這原是很自然的。但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時，蔣委員長對於美國的援助需要至切，他對於羅斯福總統，並有一種強烈的個人信心。赫爾利現在是代表羅斯福總統和他商談。九月十六日，蔣委員長在每一點上，都和赫爾利商獲協議。第二天，他們兩個人去到重慶山間的蔣氏一所小別墅中，草擬書面協定，這個協定，將使史迪威爲中國前途的決定人。史迪威本人沒有能參加蔣委員長和赫爾利所進行的大部份協商，因爲他和蔣委員長的關係，是不愉快的。或者他不知道他熱切的希望，就將如願以償。一方面，他並且想到辦法，要美國陸軍部要求總統（指美總統）對蔣委員長加以更有力的敦促。這乃是總統向蔣委員長發出有重大意義電報的唯一可能的解釋。這封電報，由史迪威轉交，史迪威在重慶收到的時候，赫爾利和蔣委員長在別墅中，安靜地完成他們的協商工作。蔣委員長和赫爾利，同意史迪威出任中國最高統帥的任命，將依照美國的方式。赫爾利正在房間裏大步來回走

着，高興地，述他所記得的一些話「我深知閣下，因此特加信賴……」有一個僕人來報告說，史迪威將軍到。僕人說史迪威想先和赫爾利單獨一談。赫爾利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就走到走廊去，從那裏可以俯瞰長江一帶。史迪威高興地拿出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他稱這是「一束辣椒」！友好相處的兩國政府元首之間，很少有比這更粗暴的電文往來。這一封電報對蔣委員長個人諸多指摘，尤其是華東方面夏季的失利。

這方面的遭遇，事實上大部份是受了史迪威軍事政策的影響。電中直率指出蔣委員長由於他本人的決定，將招致進一步的災禍。美總統的電報，並粗魯斷言中國大局的唯一可能「救星」，乃是史迪威將軍。末了，且要求蔣委員長將事實上已經移交的若干權力，交付史迪威。赫爾利驚訝不已，他告訴史迪威說「你已經勝了」。並警告這封電報，可能弄壞一切事，他請史迪威將電報壓下。但史迪威一心想看蔣委員長受窘，這在他的「日記」中已有說明。他憤怒拒絕赫爾利的建議，於是兩人一同去看蔣委員長。

在習慣上，例有的進茶和道好完了後，史迪威宣佈他接到一封羅斯福總統給蔣委員長的電報。他接着要蔣委員長的傳譯官朱世明將軍，將電文高聲宣讀。赫爾利頓時覺察到史迪威這一手，是企圖在中國官員方面前，使蔣委員長難堪！赫爾利急於要解窘，於是從朱將軍手中，取走電文交給蔣委員長本人看，他只是說讓蔣委員長自己看，可以節省時間。

蔣委員長看完了電報譯文，面不改色。他對史迪威說：「我知道了。」說完，他慢慢地蓋上茶杯。史迪威久已明白中國的一些習慣，他覺察到這是中國北方人要「不受歡迎」的客人辭去的舊有表示。史問道：「這在文雅的中

國社會中，仍是會談終了

不久將再約見他的貴賓。客人們於是次第走出，蔣委員長本人靜靜地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史迪威即時回到他在重慶的住所，把剛才的一幕寫爲短詩。造成痛苦的愉快可能很強烈而甘美，但有時也是危險的，這一次就是這樣。客人們剛離開蔣委員長，就約那時他的首要顧問宋子文來看他。宋走進時，蔣委員長在沉思，過了一會兒，感情才恢復平靜。他拿電報給宋子文看，對他說，這樣一來，他同意由史迪威出任中國最高統帥的許諾，自當取消。他嚴肅表明，他現在決定，要求將史迪威即時自中國召回。宋子文指出要求召回史迪威，可能促成中美關係破裂。蔣委員長痛苦的回答說：「中國仍然是一個獨立國家！」他誓言已作決定，無可改變。結果，宋子文的預料，實際幾乎成爲事實。馬歇爾元帥利用他的全部龐大威力，保留史迪威的在華職位，置蔣委員長的請求於不顧。這種發展，只有促成中美關係的公開破裂。但賀浦金斯指出，一個戰區司令官乃是不爲外國政府承認的本國外交代表，難於迫使一個盟國元首加以接受。赫爾利機智地建議說：兩個人既連談話都不可能，希望中美作戰努力能够順利進行，乃是不可能的事。蔣委員長的立場堅定。十月中旬，羅斯福總統終於同意，召回史迪威，改派魏德邁二級上將赴華。

本文的前一部份，已表明史迪威的被召回，怎樣阻礙了一種可能扶助中共得勢的計劃。另一個幾乎更重要的結果，在國務院白皮書對於一件事件的極欠正確的報道中，得到極好的說明。據白皮書說：「以後似乎並沒有作真正的努力，任命魏德邁二級上將統率中國一切軍隊。」事實上，是蔣委員長自動表示願意將史迪威以前所謀求的一切權力，交付給魏德邁，事實是馬歇爾元帥，現在強烈拒絕接受蔣委員長的表示。

白皮書繼續說：「應記得到年底時，中國的軍事形勢已大見緩和。」

附錄 美國人自我批評：「我們爲何失去中國」

事實是，馬歇爾元帥對作這個驚人決定所說明的原因，乃是中國局勢嚴重危殆。蔣委員長並獲得特別的說明，據說，不容許任何美國司令部對中國的局勢肩負「責任」。這一個字被使用了。因爲自從失去史迪威後，中國的情形弄得如此紊亂。魏德邁二級上將所接獲的正式指令的措辭，也有這種含意。史迪威本可出任最高統帥幾乎擁有獨裁的權力，但魏德邁却被限於被動的範圍，只能贊同或不贊同中國對美國軍事協助的要求。想法似乎是，假如史迪威將軍不能改革中國，中國的基本改革當不可能。採取這種態度的人，乃是馬歇爾元帥，這是具有意義的，他不久將成爲我們對華政策的主要決定人。

從另一點看，這種論斷更具重要性，因爲避免擔負建設性的責任，乃是此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主題。這種改變方位的許多可悲後果的首一影響，隨之接踵而來。蔣委員長除願以最高統帥權付於魏德邁外，還準備從事一種主要的改革，作爲對新任美國將領的歡迎。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去職，由中國最優秀的將領陳誠將軍繼任。魏德邁和陳誠，將可獲得全權對中國軍隊作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乃是中國最迫切的措施，但當美國政府暗示對蔣委員長的作爲並不再予關切後，蔣委員長在可以和魏德邁諮商以前，就把軍政部長易人一事，暫予擱置，魏德邁因限於指令的指示，拒絕表示是支持何應欽還是支持陳誠。何應欽因此仍長軍政部，中國軍隊的改革，「只此一樣就可能有助於中國」，也就從沒有被加以認真的考慮了。

然而魏德邁統帥部設駐中國，具有極大重要性。他所面臨的各項問題的滋味，由他到任的最初經驗，也許可以觀察出來。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日軍在華東區的攻勢到達最高潮，一般認爲，甚至重慶都已受到威脅，魏德邁在飛抵中國的一刹那，因而很自然地要看看中國作戰計劃。史迪威走後，代行職權的參謀長赫恩中將，回答他說現在

已經遲了，晚飯就要開，飯後有一部特別好的電影可看。魏德邁只有悶着氣，跟赫恩吃吃看看。後來他又向赫恩要他的新統帥部作戰計劃一看，暗示當夜他想看一下，這次赫恩簡單地答覆，說他很抱歉，沒有作戰計劃，也從來沒有任何這種計劃。事實上，史迪威總部因中國戰區一度吃緊，使蔣委員長喪失近五分之二領土和近五分之三的兵力後，曾不得不擬訂了一個綜合性的唯一計劃，這也就是被撤出重慶計劃。所以造成這樣驚人的局勢，還不只是由於無能，還有一套主要是失敗主義的推斷，認為中國軍隊沒有美國人領導就不打，和各種改革在中國行不通等等。這些推斷，控制了史迪威和他的幕僚的行動。（舉例說，假如所有中國軍隊都不行，談什麼防衛重慶乃是傻事）甚至更重要的，是這些相同的推斷，在華盛頓也被普遍接受，馬歇爾元帥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

魏德邁出任統帥的重要性，乃是他不贊同所有這些推斷。他和蔣委員長建立了一種理想的關係，以後並表明蔣委員長信守了他所提供的每一諾言。他給低級階層中美人員間的關係帶來諧和和理智。一九四五年春，魏德邁的努力開始相當生動地產生效果。日軍恢復他們一九四四年的攻勢，向貴陽東南的一個重要據點獨山，發動猛攻。這是由中國的普通軍隊防守的，沒有美國武器，沒有受美式訓練或美軍軍官。美國情報人員仍受史迪威時代推斷的影響，預料獨山必失，並且表示重慶將相繼失陷。但中國軍隊因受魏德邁的鼓勵，並獲得空軍的有效支持，竟給日軍以重創，使日軍遭受慘敗。史迪威的推斷，因此而突告破裂，但故事到此，並沒有完，在那年夏季，日本投降以前，魏德邁將他被假定是被征服的戰區的形勢，大予改觀，中國戰區當時已一致準備發動收復廣州的大規模攻勢。

睿智的美國領導，在中國可以收獲什麼效果？終於因此而得到說明，願意看看這種效果的人，已可以看到。魏德邁本人，從他的經驗中得到正確的推論，這在後面將予提到。但不幸的是，這種表現，華盛頓並沒有注意到，華

府方面，史迪威過去時代的幽靈，對我們政策的影響，遠非魏德邁當前時代活生生的現實，可以比擬。這種情形的一個原因，乃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冬季，在重慶史迪威前政治顧問戴維斯、謝偉志、和盧登（他們在史迪威被召回後仍在華供職）與赫爾利將軍（他同時機高思任美國駐華大使）之間，所進行的奇妙角逐，史迪威的政治顧問們，曾協助草擬一項計劃，根據這項計劃，中共可能已掌握大權！史迪威雖被召回，但他們有一度仍繼續致力，企圖依循同一方針，發展美國的政策。他們和赫爾利之間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國共聯合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擺開正文，稍予一提。

正當的一種聯合組織，在中國始終是需要的，然而首先，蔣委員長領導的政府，必須革新並增強力量，俾在聯合以後，不致被共黨吞併。其次，中國共產黨除最堅硬的內部核心外的一切份子，都可以獲得參加新政府的機會。然後，堅硬的共黨核心，被剝奪愛國而趨向溫和改革的同志後，就將失去一切勢力。這乃是言之成理的理論。事實上，美國政策策劃者，從沒有承認革新並增強國民政府的重大需要。赫爾利繼任大使後不久，蔣委員長請他從事中國政府機構的根本改組工作。蔣委員長許諾赫爾利全權處理，但國務院對任何這種危險的負責行動，加以否決。赫爾利顯然對蔣委員長所建議進行的龐大微妙而複雜的工作條件，具備不夠而無法進行。可是，國務院的迅速否決表現出現爲我們對華政策中心部份的怯懦否定主義。國務院對重慶政府的重要革新，不表關切，但仍訓令赫爾利加緊促成中國聯合政府成立。

赫爾利運命辦理，陷入兩個有決定性的錯誤：赫爾利的首一錯誤，是沒有能看到當時的情形，共黨萬不會在任何聯合政府中，接受一種附屬的地位。他的又一錯誤，是沒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性質，他一直說「中共不是真

正的共黨」，因為史達林曾對他如此說。在這兩點上戴維斯表現出比赫爾利為佳的判斷。國務院的白皮書，對這方面說了很多，但完全遮蓋了在其他兩點上赫爾利和戴維斯意見不同的事實。赫爾利認定在共黨參加一個滿意的聯合政府以前，不以美國武器供給共黨。他也反對在有利共黨的條件下，迫使蔣委員長參加聯合政府。戴維斯的意見，則與此相反。戴維斯企圖和魏德邁聯合，而繞過赫爾利。在人事規定上，他本隸屬魏德邁節制，魏德邁於是將當時實際發生的情形，通知赫爾利。同時，戴維斯和駐重慶的其他美國外交官員，並繼續力請國務院接受他們的政策。

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終於發生無可避免的衝突。盛怒的赫爾利，使所有以前的史迪威政治顧問和大部份大使館官員，自重慶被調返國。其後赫爾利便稱心地進行，力促國共組織聯合政府的工作。但在華盛頓，那些被他調回的人員，却遠比他有效地在努力，在很多方面散佈他們的特別觀點。要使不懷疑這些事件和作戰期內最後而迄今保守祕密的發展之間的某種關係，實在是件難事。

這時，史迪威在沖繩島統率美軍，那裏的戰事已告結束。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於是向魏德邁和蔣委員長建議，由史迪威率軍在華北登陸，以美國武器供給該區共軍，並協同共軍驅逐北方的殘餘日軍。任何人可以預料，史迪威將因此以直接協助給予共黨的結果。史迪威後來曾寫道：「他盼望能攜着步槍，和朱德並肩前進。」在魏德邁總部中，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建議，事實上被稱為「征服蔣介石的計劃」。結果，在魏德邁有力的抗議下，這個奇怪的計劃終被擱置。但最初這項計劃的竟被提出，已足以說明當時美國決策者心理。華盛頓的這種心理由日本的投降而變得極重要。日本的投降，迫使美國當局對華長期政策作各項基本的決定。讀者或會驚異，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提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所舉行以劇烈爭論為主題的雅爾達會議。然而實際說來，如果羅斯福沒有以中國東北的

特別地位向史達林行賄，西伯利亞的蘇軍，事實上也會強行佔據那些地方。所謂雅爾達會議中的出賣勾當，對於中國事實上遠不及會議的另一面所具的意義。事實是自雅爾達會議召開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簽約後不久，史大林和莫洛托夫，直在表明使中國和波蘭相等！換句話說，他們似乎聽從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組織中國，正如他們預期盧布林政府在蘇聯支持下組織波蘭。國務院的一位有地位的蘇聯問題專家，就是根據這樣的觀點去解釋史大林拒絕中共。史達林對於支持蔣委員長所作的保證，以及這段時期中他的其他行動，這種解釋如屬正確，接着就可以下一個重要的結論。

美國如能對華採取一項勇敢的政策，將不會冒使蘇聯涉入中國，因而導致一種隱諱的大國鬥爭（如一九二九年至三九年西班牙內戰）的任何嚴重危險。而相反的事實上，蘇聯更可能因美國採取軟弱政策而干涉中國。這應該是那些日本投降時被迫作對華決定者一項重要考慮。

這時魏德邁在他極具重要性的報告（白皮書只是提了一筆）中，也向華府當局概述美國怎樣開始對中國採取一項勇敢政策的建議。魏德邁在這個報告中說：中共是真正的共黨，不是「民主的土地改革者」，他認爲這種解釋，乃是欺人之談。他預料國共聯合將證明爲不可能，內戰就將爆發，他說明中國政府的弱點，並說這些弱點，可能阻止蔣委員長在缺少美援的情況下控制中國。另一方面，魏德邁肯定地指出，假如蔣委員長能得到得當的美國協助，中國政府就一定可以獲得並據守整個中國，最少可以控制及並包括東北邊界。在軍事方面，魏德邁認爲得當的美國協助，乃是繼續業已完成的體制，根據這種體制，美國和中國人員在各階層都已通力合作，自最低層以至魏德邁本人和蔣委員長的合作。這種體制，誠然涉及一種美國對中國的臨時約束。但蔣委員長是因爲明白中國政府的缺點，而願

意並甚至期待依照這種辦法，由美國予中國以協助，這時，他再計劃極爲需要的軍隊改革，包括裁除不能作戰的軍隊，軍隊定期發餉和建立健全的訓練和行軍組織，魏德邁的報告，雖沒有涉及政治問題，但在政治方面的趨向，也是一樣的。宋子文爲當時的行政院長，但有同樣龐大的任務有待進行。蔣委員長因政治原因，乃保留大量無能的官員，這些人必須裁除。許多有新思想的中國傑出人物都因嫌怨而極其相左，必須使他們歧見冰釋，而成爲政府能够延用的人才，參加政府工作，一個有效政府最低限度的主要條件，必須即時具備。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極其坎坷的，幾年的苦戰，所造成的淒苦局面。所有這些事，都是可能的。但爲要予以完成，魏德邁所計劃的制度，是絕對重要。蔣委員長事實上缺乏力量切實執行軍隊的有力改革工作，除非他得到龐大的美援計劃的助力，因爲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蔣委員長同樣缺少確切執行軍事改革的技術運用，並且缺少堅強的意志抵制左右反動的軍政大員，要不然，他就得獲得像魏德邁這種人士的積極合作。同樣的規則適用於政治改革的範疇，並且有幾乎更大的力量。在政治方面，蔣委員長也願意接受美國的建議。但如沒有美國的堅持確使建議獲得實際施行。蔣委員長最初的一腔良意，就注定要被其親近者的成見所勾消。總之，一切有待於美國的努力，美國的決斷以及願意負責採取決定。就正常情形說，這些決定可能被認爲祇是中國一方面的事，縱使這些因素具備，中國事實上也不會變爲一個進步的樂園，但中國至少可以不被共產黨所乘。

魏德邁或任何其他人士，從沒有建議派美國軍隊到中國國土上作戰，以拯救中國。雖然艾奇遜在白皮書的導言中，一再痛斥這個莫須有的人，但爲了要做必須要在中國做的事，華盛頓方面，必須首先決定中共的勝利將是美國的災害，繼而作必須的努力，以阻止這種災害發生。甚至是第一點，也一度爲國務院的遠東司所爭論。在遠東司，蘇

聯帝國主義的教訓，現已牢不可拔，但這是經過極長時期的灌注，才能這樣根深蒂固。在馬歇爾元帥準備離美出使中國時，遠東司一時情急，預先揭露了一點我們的決策態度，牠藉口要刪除不必須的贅辭，而將對馬帥的指示，加以改寫。結果，是太有利於共黨，以至馬帥的幕僚，最後不得不出而干預，在遠東司的重擬訓示，被過早地認爲是最後決定以後，將它撕毀。然而在大部份美國政策策劃人中，採取對華勇敢政策的真正阻礙，似乎是史迪威時代成見的頑固存在。中國不能完全置於不顧，但沒有人願意予中國政府以真正協助。每一個人，尤其願意避免進一步負擔對中國直接負責的責任。很容易走的另一條路，乃是再致力促進國共聯合。因爲假如只要能促成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內戰就不會發生，除此，而再沒有任何理由要美國被困於中國的難局。因此，杜魯門總統要馬歇爾元帥，以他無比的威望，致力新的聯合努力。馬帥本已煩於戰時的辛累，但終擺脫一己的私意，而接受了這項任命，準備負起這個聞名的使華任務。

魏德邁報告的所以完全被人忽視，美國所以再重作努力，促進國共聯合，乃是這種神祕過程的唯一合理解釋。當時和談希望絕對渺茫，魏德邁並特別警告說，聯合乃是幻想。馬歇爾元帥一到上海，魏德邁就向他重提這項警告，並加以詳細說明。但有一年功夫，馬帥仍繼續他辛勞而沒有希望的努力。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共黨在華北擊斃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兩名，馬帥自己的幕僚，那時乃促請他面對政治現實，對於這件事表明他的立場，並宣佈美國現將積極支持中國政府。但遲至是年夏季，馬歇爾實際地阻止並減少我們仍予中國政府的軍事協助，以使共黨相信他是一個誠心誠意，沒有偏袒的聯合協商仲裁人。在這裏，實無須敘述馬歇爾使華和不愉快結果的一切事件，馬歇爾的失敗，本是無可避免。

在馬歇爾離華返國受任國務卿職一些時後，他顯然在考慮採取一項新的政策，派遣魏德邁將軍赴華再度就地檢討中國局勢。結果，是魏德邁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久被扣壓的報告。這一項報告，可說也就是他一九四五年秋所提報告的重述。他雖然指出中國政府的一切累積的缺點，但最後結論，是必須有效協助蔣介石政府，而且是可如此的。但他同時建議，東北應暫時託付美、蘇、英、中四國的「保護」。國務院遠東司的官員和其他人士，本就反對有效協助中國政府，至此，乃捉住這一點不放，爲這一點而苦做文章，直至魏德邁的主要建議被人遺忘。因此，中國就得不到「有效」的協助。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戰事結束後，沒有繼續得到許多有價值的美國裝備，沒有得到大量輜糧和其他經濟協助，或馬歇爾對進一步軍事援助蔣介石的否決。最後，在國會逼迫下，無可奈何地不予取消。許多錢都落入無底洞，正如魏德邁前已提出的極明白警告，他指出這種情形，是可能發生的，假如對華協助沒有採用密切共同處理的制度，他對於這一點始終堅持。馬歇爾使華任務失敗後，長時期內的局勢，在倫敦「經濟學人」雜誌對國務院白皮書的深入評論中，有極好的綜合說明。

「經濟學人」雜誌說：白皮書中最饒興趣的文件之一，是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巴大維將軍，對於軍事行動所作的報告。那篇報告，明白指出接受美國的建議，就可能使中國政府避免在戰略和作戰計劃方面，再犯嚴重的大錯。但巴大維將軍只奉命根據一種「非正式而機密」的原則，提供建議，國務卿馬歇爾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指示如下：「我不願意我們爲中國的戰略計劃和軍事行動接受責任，我相信你會同意，我們接受這種責任，牽涉所及，定必深遠而嚴重。這種責任在邏輯上，和權力是分不開的。」（美國政府害怕擔負這種責任，因而極力壓抑自己，只以若干億元撥給中國，對於這些錢的使用，只是在旁觀望。）美國當局，從沒有解釋爲什麼對於希臘同意接受這種責任

，而對中國却一口予以拒絕。據曾在中國的最有資格的觀察者說，直至最後一刻，如採取有力行動，局勢還是可能
有救。魏德邁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曾明白這樣說過：白皮書雖完全省略重要的事實，司徒雷登大使却繼
續這樣說，直到一九四八年年底。挽救中國最後機會，被祖魯地加以拒絕，以前的一切機會，也是如此遭遇。在嚴
重失利的最後時日中，司徒雷登大使曾從中國發回報告，說許多國民黨領袖，又開始在和共產黨進行和談。司徒大
使要求國務院對此有所指示，馬歇爾即時禁止司徒大使肩負任何阻止國共商談的明顯責任。但他接着表示（司徒大
使自然應不忽視強調東歐國家成立聯合政府後所產生的那種吞併情形的機會）如能知道司徒大使是否遵照這項訓示
，和他的中國聽衆，對於美國對共黨聯合危險的反應如何？誠然是有趣的。但馬歇爾國務卿給司徒大使的訓示，已
是這段可悲歷史的適當結論，和最後的諷刺了。

第三篇 戰時通貨膨脹與戰後經濟崩潰

第一章 通貨膨脹循環不已

抗日戰爭結束前之最後數月，中國已瀕臨民窮財盡之邊緣。政府僅有之貯存物資以及市場上一切消費品，皆已用於生死存亡的鬥爭中。國家徵稅人員及士兵之巧取豪奪，使農民生活維艱，滿腔激憤，而逃兵人數亦與日俱增，由於通貨膨脹之影響，全國已臨民心渙散士氣崩潰之境地，如果勝利不如期到來，則中國經濟勢將迅速瓦解。

戰事結束之際，中國面臨的復興任務。遠較當初之想像為艱巨。數約五千萬流浪失所之人民亟待重歸家園，數百萬畝良田荒蕪經年，毫無生產之可言。國內交通情況，陷於難以修復之景況，南方許多戰略地區之鐵路，在嚴重破壞下陷於寸斷。徙置難民，重整飽受破壞之農業地區，重建沿海地區之工業，以及供應必需之設備及原料，使工廠得以恢復生產，皆需要天文數字之巨額資金與資源。

此兩大障礙，使中國無法進行其復興任務。一如國民政府無法與共黨達成協議，一九四五年底時之談判論調顯示，即使要與共黨妥協，亦有諸多困難。混亂局勢與恢復公開衝突之陰影，籠罩全國，因此政府必須保持戰時之龐大軍隊，對修復鐵道線及其他交通線之工作被迫稽延。在金融方面，龐大的軍事開支，繼續形成對經濟的重大壓力，使物價有增無減。復興工作遭遇的另一障礙，係由於民眾在長期抗戰中深受物資缺乏之苦，一旦勝利來臨，對國產及外來消費品之需求量大增，因而造成一股使經濟趨向不穩定之重大力量。投機商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及其他在國難期間斂聚大量財富之人，此時皆推波助瀾：搶購物資囤積居奇。外國供應之物資雖源源而來，亦難以抵

銷此種促成通貨膨脹之壓力。英等國亦需要有一段喘息時間，才能恢復其和平時期之生產能力，而中國只是無數飽經戰亂亟需工業大國予以支持的國家之一，故仰賴外國援助，勢難有成。

中國政府，過高地估計了勝利對於鞏固其政治及經濟地位之影響力。政府錯誤地認爲勝利所產生的有利心理因素，高度工業化的東北及臺灣之重歸故國，大量黃金與外匯儲備以及恢復對外貿易，可以有助於增加消費品之供應，並由於民衆消費能力之增加，可有助於經濟之發展。正因爲政府高估了此種趨向穩定的自然趨勢，故認爲長期來的戰時管制措施，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對於物價以及物資調配與運用之一切管制，皆告撤銷。

另有一些其他因素，促成政府撤銷管制措施。政府希望以撤銷管制來爭取民心。蓋政府在戰時之無力制止通貨膨脹，使政府聲望大受影響，故亟望能以撤銷管制來重獲民心。同時由於友邦皆亟力主張自由貿易，亦成爲政府撤銷管制措施之一項重要因素。在中國之外商，尤其美商與英商，皆認爲中國政府管制之技巧，不足以造成有效之管制，且認爲中國政府對物價及物資流通之控制，足以阻撓國際貿易之發展。當時政府正與友邦談判，希望獲得外國貸款以協助復興大業，因此政府盡力避免引起外商之不滿而影響此種談判成功之機會。

戰爭甫告結束之際，政府即過份樂觀地推行一些大規模計劃，諸如恢復編制龐大的行政體系，全面提高公務員生活水準，以及對前淪陷區進行大規模的救濟及建設工作。而同時，必須支出龐大的軍事費用，使軍隊保持高度戰鬥力。在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最後一季，政府所支出的現款數額異常龐大。但在華北地區之復興計劃及重建交通計劃，皆因內戰之爆發而受阻，各省之間的貿易，亦始終無法恢復正常。由於鐵道系統之癱瘓，華北地區所產之棉花及煤，無法南運，由於軍隊大量採購糧食及棉布，使這兩種主要生活必需品之價格突飛猛晉。其結果，使政

府之赤字日益增加。此種情形下，政府在戰後立即增加了大量開支，而不是創造使經濟發展應具備之條件，以致使物價進一步上昇。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二月，即戰爭結束後之最初四個月，中國經濟會有暫時的穩定。當時確有理由使政府對物價的趨勢持樂觀態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份的最後一星期，全中國物價突然大降。許多收藏多年的消費品突然湧進市場，甚至不乏半價出售現象。勝利之突然來臨使全國人民在精神上，頓然鬆弛，影響所及，使螺旋形上昇的物價暫時回跌。在上海，黃金價格下降百分之十，重慶金價頗降百分之四十，在重慶外匯市場上，國幣與美元之兌率，保持官價。重慶的批發物價總額由八月份的十七萬九千五百元降至九月份的十二萬二千六百元，至十月份再降至十一萬八千四百十七元。同時，上海的批發物價總額，亦由八月份的四萬三千二百元（偽幣折合國幣之數），降至九月份的三萬四千五百零八元。但此種下降趨勢，祇保持一段短時期，上海物價在十月份之後開始急遽上漲，重慶物價亦在十一月份開始逐步上漲。十二月份上海批發物價總額，已激增至八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元，較八月份漲逾一倍。

進入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後，通貨膨脹的惡性趨勢即告全面恢復。經濟穩定之好景無法持久，係有數項原因：

政府為恢復對淪陷區之控制，必須先控制其經濟，政府當務之急為收回流通在淪陷區內之偽政權紙幣，以恢復幣制統一。在戰爭結束後十九天，政府頒佈偽幣與國幣之兌換率為：中儲券（流通華中及華南淪陷區之偽政權紙幣）二百元兌國幣一元，聯儲券（流通華北淪陷區之偽政權紙幣）五元對國幣一元。此項命令規定以四個月為兌換期，同時規定任何人之兌換總額不得超過國幣五萬元。在這四個月內，偽政權紙幣與國幣可以在市場上同時流通。此

種安排之後果是異常不幸的。

偽幣的幣值受到強制抑低，國幣幣值受到不合理的抬高。根據八月份上海與整個抗戰中國的批發物價總額比較，上海爲中儲券八百六十四萬元，抗戰區爲二十四萬五千五百零三元，其幣值對比應爲中儲券三十五元對國幣一元。若以上海之批發物價總額（中儲券八百六十四萬元）與重慶（國幣十七萬九千五百元）相較，應爲四十八比一。而以華北淪陷區之批發物價總額（聯儲券十萬零四千八百六十八元）與抗戰區之批發物價總額比較，聯儲券與國幣之比例應爲一比二。

偽幣之兌換幣值遭受强行抑低之結果，使國幣成爲奇貨可居，而同時又允許偽幣與國幣在四個月內可以按官定兌率同樣流通，其結果，使淪陷區人民競相使手中握有的偽幣儘快脫手以換取物資，因而使物價飛速上漲。同時由於規定淪陷區人民，每人兌換國幣之數額不得超過五萬元，使淪陷區人民在搶購之餘，更競相搶兌國幣，形成國幣供不應求之勢，使政府必須增印國幣以應急，國幣流通額大量增加之結果，亦使物價爲之上漲，因此，過低之兌率，過長之兌換期，兌換額之硬性規定以及在兌換期間兩種貨幣之同時流通，使這四個月內發展了急速的通貨膨脹。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物價飛漲之另一項因素，係由於一般估計上海勢必恢復中國首要金融市場之地位，故內地之消費品及流動資金，大量湧向上海。當國民政府與共黨之關係漸趨惡化之際，由於上海不受內戰威脅，流向上海之游資更爲增加，游資紛求出路，競相投資與搶購，成爲刺激通貨膨脹之一項重要因素。而上海的確已成爲全國金融中心，故上海物價一漲，全國亦隨之而漲。

中央銀行於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之後，在東北地區發行之特殊貨幣（按：此種東北幣在民國卅五年

(一九四六年)發行二百七十五億三千萬元，一九四七年增至二千七百七十三億元，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再增至三萬一千九百十八億元)，亦助長通貨膨脹。當初發行此種紙幣之宗旨，係為在戰後恢復東北政府軍控制區內之工農業，同時就地應付在東北之龐大國軍部隊之開支。此種紙幣雖只能在東北使用，但可以帶入關內兌換，最初之兌率為國幣十一元四角三分對東北券一元，後來改為十對一。由於東北券之無限制發行，亦加速通貨膨脹之惡化。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造成通貨膨脹之最主要原因，是政府預算赤字之不斷增加，以及因此而發生的貨幣發行額之不斷增加，戰時之經驗，已使工商界人士對赤字及貨幣發行額特別敏感，他們從這兩項數字中，窺測未來物價之上漲幅度。由於戰後赤字立即增加，使工商界人士在勝利之初對國幣之信心一掃而空。戰爭後期之通貨膨脹，雖在勝利之初一度戡正，但此種好景迅即幻滅。

政府在民國卅五年之支出，較上一年度增加三點二倍，而政府之稅收，祇及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七，不足之數唯有以拋售黃金、外匯及留產以資彌補，儲備之金鈔既日趨減少，政府唯有印發大量紙幣應急，紙幣流通額之增加，更刺激物價上昇，使政府開支更為龐大，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循環不息。

從下表可窺見惡性通貨膨脹之一斑（每單位為國幣一百萬元）：

年 份	國幣發行額	政府開支	政府稅收	政府赤字
民國卅四	1,031,700	238,085	1,331,369	1,106,666
民國卅五	3,776,100	7,574,790	2,876,968	4,697,823
民國卅六	3,186,500	43,393,895	14,064,883	29,339,512
民國卅七	374,762,200	65,471,087	230,995,475	42,475,613

政府對於剿滅共黨叛亂實無旁貸，然在此種惡性通貨膨脹之威脅下，政府欲實現其戡亂目標却日趨艱難。爲遏止共黨在東北及關內之擴張，政府不得不將其全部經濟力量用於維持龐大之軍隊，而爲恢復前淪陷區之經濟，政府又不得不毀法從軍費中儘量撙節，其結果使軍隊既無法獲得充份之經濟支持，前淪陷區之經濟，又無法獲得充份之恢復。與共黨之和談破裂後，由於內戰復起而使軍費開支大爲增加，民國卅五年之軍事開支，佔政府全部開支的百分之六十，民國卅六年政府開支雖增加約九倍，而軍費仍佔全部開支的百分之五十五。貨幣之大量發行，刺激物價不斷飛漲。爲維持公務人員最低限度之生活，公務員之待遇依照生活指數按月調整，這使政府之行政開支，亦如軍事開支一樣，逐月激增。民國卅六年之行政開支，較民國卅五年增加五點七倍，而收入則較民國卅五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二，這係由於政府之金鈔儲備量減少，在民國卅六年內，不得不減少拋售金鈔彌補收支赤字，同時可供出售之敵產，亦已在民國卅五年售賣殆盡，至民國卅六年下半年，幾已無敵產可售。民國卅六年的政府財政赤字，幾佔全部開支的百分之七十。

晉入民國卅七年後，財政局勢更急轉直下。軍事開支增加到佔政府全部開支的百分之六十四，政府不僅必須繼續大量印製國幣，且須增加對土地之徵稅，並實施強迫徵糧之政策。此種政策雖已證明在農業地區內增加民衆對政府之不滿情緒，但政府已勢成騎虎，若不繼續實行此種政策，將加速經濟崩潰。

在對待公務員及農民之政策上，政府皆無可奈何地施行挖肉補瘡的政策。公務員之待遇逐月按生活指數調整，政府對公務員雖談不到「仁至義盡」，然已盡全力照顧公務員之生活。但生活指數，係根據上一個月之物價昇漲幅度編製，而下一個月之物價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上個月，這使公務員之待遇始終追不上物價，其結果，使公務員生

活普遍貧困，政府雖已盡了最大努力，但公務員對政府之不滿情緒，却與日俱增，在對待農民的政策上，政府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中國農村經濟，本來已經在八年抗戰中瀕臨破產邊緣，而政府為力挽既倒之經濟狂瀾，不得不增加對農業地區之徵稅，這種農民生活百上加斤，農民對政府之不滿，自亦逐日增加。此種情勢皆為加速共黨勢力擴張之主要因素。

戰後之惡性通貨膨脹，始於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已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政府面對此種險惡形勢，被迫在民國卅六年二月，實施物價管制政策，希望對通貨膨脹有所補救。但這種管制政策，早在戰時惡性通貨膨脹開始的一年（一九四二年）已經實施過，結果完全無效。一九四七年時物價上漲的速度較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年）時更快兩倍，但政府除了重新採用此項不幸的經驗之外，別無他法。

第二章 物價管制與搶購狂潮

在重新實施物價管制政策之前夕。國幣流通量平均每月增加百分之十，在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市，物價平均每兩個月增加一倍。在貨幣流通量增加之同時，物資供應却告減少，這係由於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實施限制進口措施，此措施之用心良苦，旨在制止外匯大量外流，但在通貨膨脹之既成事實下，任何良好的措施亦皆必然產生不良後果，限制進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外匯外流，惟因此而造成之物資缺乏現象，更刺激物價上昇之幅度。

任何具有經濟知識之士，皆知道欲以限制物價來制止通貨膨脹，其希望係微乎其微者。但政府在別無良策之萬不得已情況下，終於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頒佈一項緊急法令，對數項主要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麵粉、棉紗、布疋、燃料、鹽、糖及食油）制定了價格限額。此政策首先在上海及南京兩大城市嚴格執行，繼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施行，同時，實施的是限制工資政策，全國公教人員及職工之薪資，皆凍結於一九四七年一月的生活指數標準，且規定不得藉口提高底薪而作變相之增加薪資。黃金與外幣之買賣，亦皆被禁止。

全國各城市之物價管制機構及地方機構，雖皆切實執行此項緊急法令，但此等緊急措施真正有效的壽命尙不及一個月。在四月初，各大城市的黑市美鈔買賣已普遍恢復，且較以前更爲活躍。緊急令之崩潰，使各種商品在黑市市場之價格急遽上揚，政府若繼續限制價格，只有使商品全部流入黑市市場，政府在別無他法之下，只得於四月中旬提高限價，並於五月份起撤銷凍結工資法令，隨即取消限價。上海市的批發價格指數在五月份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而在此緊急令實施前的一個月，上海市的批發價格指數只上漲百分之十九。

政府的經濟政策全盤失敗之際，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任命了一位新的中央銀行總裁。這位新總裁力圖挽回經濟狂瀾，希望根本解決造成通貨膨脹之基本因素。彼向蔣主席及當時之財政部長提出一套開源節流之方案，以「月度預算」代替「年度預算」，逐月削減政府赤字，一方面提高稅收，一方面減少開支。中央銀行總裁向政府最高當局承諾：祇要政府願意實施這套方案，則中央銀行願負責彌補政府之赤字，新總裁還提出其彌補赤字之基本原則，在開源節流之下，剩餘的赤字由發行公債及拋售一部份庫存金鈔作彌補，停止以印刷國幣來彌補赤字，這樣就可以制止造成通貨膨脹之基本因素。

鑒於以往的一切經濟措施及財政措施之失敗，中央銀行新總裁指出此等措施皆係治標不治本之計，他的新方法係針對通貨膨脹之根源對症下藥，但要使此方案得以實行，必須獲得政府各首長之同意及支持。

惟這位新總裁之一番苦心，並未能夠實行。財政部長首先表示異議，也許係出自不得已之苦衷，總之財政部長表示他無法拒絕增加軍事開支，而財長之觀點受到最高當局之默許支持。因此政府在事實上已採取一項寧可聽任通貨膨脹局勢繼續惡化而必須以全力支持軍事行動之政策。

在中央銀行與財政部之間仍在商討此項新方案之際，央行當局為阻遏通貨膨脹局勢之繼續惡化，已迫不及待先行按照此方案進行，一方停止印刷國幣，一面發行了兩種公債，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首先發行了「一億美元的「美金公債」」，規定用美元購買，並在到期時按美元計息歸還。相隔不久後，再發行三億元「國幣公債」，規定以國幣購買，但在到期時按照購買日之國幣與美金之比例，折算償還日的國幣與美金之比例，計息後用國幣償還。譬如某人購買國幣公債十萬元，當時美金一元合國幣五百元，到償還時，美金已漲至每元合國幣一千元，則到期可領取國幣二

十萬元，另加二十萬元之利息。

這兩項公債極收成效，在發行後四個月，美金公債已售出二千五百八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美元。國幣公債在發行後購買者雖然較少，但在發行後的最初兩個月，其收入足以彌補政府每月赤字之百分之十五。惟當此種成就正在對通貨膨脹產生抑止力量之際，財政部拒絕中央銀行的方案之消息已傳至市面，雖經政府在該年二月頒佈的緊急令絕對禁止一切黑市買賣，但由於此消息之傳出，益增人心浮動，使黑市金鈔買賣迅即重新出現。手中握有美鈔之人，發現在黑市買賣中可以獲得之利益，遠較購買美金公債之利息爲大，致使購買美金公債者却步。而國幣公債之遭遇更慘，由於黑市之恢復，使國幣幣值日落千丈，不僅無人再願購買國幣公債，且已經購買者，寧願削價在黑市市場中脫手，致使中央銀行迫得停止國幣公債之發行。

這兩項公債相繼失敗後，中央銀行已自知力弱，無法再與市場勢力相匹敵，惟有儘力減少市場對通貨膨脹之不利影響。故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央銀行廢除固定的官價外匯兌率，根據國幣與美元之購買力，逐日按照經濟指數確定外匯牌價，雖然中央銀行之牌價通常較黑市市場之價格略低，但由於中央銀行之牌價係公正估定，故在市場上亦產生了一定的信用，對於勒住如野馬奔騰般的黑市物價，多少起了一點作用。同時，在中央銀行支持之下，上海等大城市之地方財政當局，得以向央銀透支購備一些日用必需品（主要係糧食），一方面爲保障市民之生活，另一方面爲防止黑市之操縱及抬價。對信用貸款之限制，亦告恢復，銀行利率提高，旨在吸收存款，對中央銀行的信用貸款之控制權，由央銀當局轉移給一個由央行及商界代表組成之信貸委員會，使商界人士對於央行之信心更爲增加。

此等措施，對於緩和物價上漲之幅度，產生了相當良好的後果，在此等措施於七月份實施之前，上海的批發指數在五月份上漲百分之五十四，六月份上漲百分之十二，七月份上漲百分之十五，至八月份已緩和至僅上漲百分之八，但是央行與市場在這一回合的鬥爭中所取得之勝利，並不能消除通貨膨脹之根源，由於兩項公債之失敗，政府的財政赤字再度需要依靠大量印發紙幣來彌補。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內，中央銀行上繳給政府的收入較上一年增加五倍，但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內印發的紙幣，較上一年增加了十倍（按：一九四六年紙幣發行額較一九四五年增加僅三倍），這使中央銀行的一切努力幾乎皆係徒然的，央行的一切開源節流措施，皆被日益擴大的軍事開支所抵銷，更且入不敷出，使政府赤字有增無減。通貨膨脹之惡劣形勢仍在進一步惡化！同時由於前線軍事連遭敗績，更使大量資金逃往香港及其他外國地區，更增加了政府應付財政局勢之困難。這一些情況，在相互影響及互為因果之下，使國幣幣值大為下降，黃金美鈔價格不斷飛漲，通貨膨脹之惡性循環，已使中央銀行束手無策。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市的批發物價指數，已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五百。

戰後之中國貨幣制度，遠較戰時難於控制，上海之貨幣市場，於一九四六年初恢復活動，而對上海貨幣市場之控制問題，遠較戰時財經中心之重慶市為複雜。蓋戰時之重慶係中央政府所在地，對一切財經活動便於控制，且非官方之財經團體（如交易所之類）數量有限，其活動並受政府之嚴密監督。而戰後之上海，財經局勢異常複雜，華資及外資之銀行、保險公司金鈔交易所、日用品交易所以及票股交易所等等。數量不勝枚舉。此等非官方財經團體之牟利活動，皆助長通貨膨脹之趨勢。同時，上海之貨幣市場與外國之各種財經團體在業務上有密切之聯繫，每當戰亂前線傳來軍事失利之消息，即有大量資金逃避到國外，這使政府為制止通貨膨脹所必需之經濟力量遭受重大打

擊。而此種棘手問題在抗日戰爭期間根本不存在，蓋各盟國皆對中國私人資產採取凍結措施，消除了中國資金外流之危險。

除了這些重要因素之外，在戰後之中國銀行界還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點，而此種特點，皆對於政府控制貨幣市場之努力產生抵消作用。中央銀行之權力僅能影響政府屬下之各銀行（主要係中、中、交、農四行）及有限的數家有悠久聲譽之私營銀行。中國銀行界之一般業務準則在戰時已受到嚴重破壞，許多小銀行之業務已不能用正常之銀行知識來理解，此種小型銀行幾乎完全不辦理通常之銀行業務，而是在銀行的幌子下利用其資金進行投機倒把之活動。戰後，此種問題更爲嚴重，尤其是因財政部對於批准成立銀行之尺度放棄，任何新銀行申請成立，只要有少量之資金及其種人事關係，幾乎有求必應。故在戰後之上海，小銀行之設立如雨後春筍，而此種小銀行大多係以投機活動作爲其主要業務，這使貨幣市場中不受政府銀行控制之部份更爲擴大，而政府對貨幣市場之控制亦更感難於應付。

第三章 金融市場之混亂

話分兩面，這些小型私營銀行之活動固然對國家經濟穩定產生重大的破壞作用，但中央銀行以及政府當局亦不能辭其咎，在這段時期內，中央銀行採取不符現實之利率政策，助長了這些小型私營銀行之活動，在民國卅五年一月，中央銀行不顧物價上昇之幅度，而硬性規定存款利息爲月息一分八厘（每月利息百分之一點八），同時規定各私營銀行訂定之利率必須獲得中央銀行之批准。中央銀行所批准之私營銀行利率爲年息八厘四（每年利息百分之八點四），任何私營銀行皆不得超過此項規定之利率。當時中央銀行採取此種硬性規定之目的，係旨在吸收游資存入國家銀行，譬如有一萬元存款，若存入國家銀行，每年可得利息二千一百六十元，而存入私營銀行，每年僅可得利息八百四十元。然而此種規定却完全不顧現實，蓋物價之上漲速度，遠超過國家銀行之利益，若以一萬元購買布疋或其他日用必需品，在一年後可值五萬元左右，因此中央銀行硬性規定利率之政策，既引起了私營銀行之一致反對，又未能收到吸收游資之實際效果，相反地，此種政策使游資望銀行之門而却步，大量湧入投機市場中去，游資充斥之結果，使投機市場之風浪更爲險惡。但手中握有現款者，並非皆能從事於投機活動，彼等既不願把錢存入公私銀行，又不能從事投機活動，其結果產生黑市存款吸收者，許多小銀行雖然懸掛了中央銀行所規定的利率牌價，但在暗中却以高利息吸收游資，（有高達年息百分之二百者），此種黑市利息在民國卅五年四月以後，已公開存在，有劃一之「牌價」（雖然從不掛牌），且隨時根據物價之上昇幅度而調整，故能經常吸收大量游資，此等游資彙集到黑市存款吸收者之手後，其出路不問可知是投入投機市場。中央銀行此後雖曾數度提高利率，但所加有限，與黑

市利率相比始終望塵莫及。中央銀行最後被迫放棄對私營銀行之利率限制，事實上大部份私營銀行早已在暗中不受此種限制之約束，中央銀行之宣告只是一紙官樣文章而已。在私營銀行的利率解禁後，湧入私營銀行之游資更爲增加，實際上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已不再是中交農四行，而是這些擁有大量資金的小型銀行。

這種種因素，使中央銀行的實力，在民國卅五年後已大打折扣。而政治力量之滲入國家銀行業務中，亦係削弱中央銀行地位之一項重大因素。例如在民國卅六年時，政府所設之「國家銀行聯合管理局」，拒絕把官價利率提高至現實程度，彼等係代表國民黨之意見，而與職業銀行家及各政府銀行主管人員之意見大相逕庭。此種硬性規定之利率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已見上文。中央銀行始終無法堅持執行控制貨幣市場之政策，亦係受制於此種政治干涉。

因此戰後政府之銀行政策中，存在一項基本矛盾，政府賦予中央銀行之任務爲控制各銀行之信用貸款，使各公私銀行所發放之貸款保持一定限額，以避免市面上出現通貨泛濫現象，同時確保各銀行所發放之信用貸款，係用於生產事業上而不是用於投機事業上，但由於貸款之數額受到一定限制，無可避免地便發放給工業界的貸款不敷生產之需要。同時，中央銀行無法控制在黑市市場上之貸款活動，不論中央銀行對自身業務控制得如何嚴密，投機者仍能從黑市市場上以高利吃進大量頭寸。在此種情況下，投機家可以獲得所需之資金，而工業家所得之貸款却不敷應用，若向黑市貨幣市場借款，必使工業家虧本。因此，真正需要貸款以發展生產之工業家，紛紛向政府提出申訴，政府迫得使中央銀行放寬對貸款之限制，而中央銀行却始終沒有切實的辦法，得以變通所貸出之款項的最後用途，究竟係在生產方面抑或投機方面？

政府一直對勝利後之心理影響及自然經濟力量，抱有樂觀的信心，認爲足以制止通貨膨脹。因此政府在民國卅

五年初，採取一項擴大貸款之政策，希望藉此以刺激工業及貿易之恢復，從下表可以看出自勝利後至民國卅七年八月（發行金元券之前的一段時期內）政府銀行的貸款、存款及國幣發行額之增加情況（每單位為國幣一百萬元）：

年 份	存 款（註一）	私人貸款（註二）	上繳國庫（註二）	國幣發行額（註三）
民國卅四	四三、六二六	三三、六六一	一、〇四三、二五七	八四三、四〇〇
民國卅五	四、八九三、九四〇	一、〇七三、四八三	五、五二三、六七〇	二、六四四、三〇〇
民國卅六	二〇、四二三、九五三	一六、二一九、七五一	二七、〇七五、〇三三	二九、四六三、四〇〇
民國卅七 （上半年）	二六、一〇一、八九四	一五、四九六、三三六	一六六、一八五、六七四	一六三、三三三、八〇〇

（註一）根據中央銀行之紀錄。

（註二）根據財政部統計局之紀錄。

（註三）根據中央銀行之統計。

在民國卅五年間，政府銀行所發放的貸款增加情況，較同年內物價之增加情況更快二點六倍。這係由於政府具有上述之樂觀信念，認為物價上漲可以制止，因此不準備發行大量紙幣應急，希望藉貸款來鼓勵工商業之復興，以解除物價所受之上漲壓力。政府一面要增加發放貸款，一面又不願大量印刷紙幣，唯一辦法，當然是拋售庫存金鈔以收回市面上之國幣，用以發放工商貸款，由民國卅五年三月開始拋售金鈔，至同年七月止，此種拋售及貸款措施顯示對制止物價上漲產生了相當良好的效果。但從七月份起，由於中央銀行拋售黃金後收回的通貨再度以貸款方式

大量流回市面，市面銀根鬆動之結果，使物價恢復急速上漲，這使政府認識了國家銀行擴大貸款所造成之不良影響，故自九月份開始，政府即實施對銀行貸款之新限制。但此種新限制實施後，對控制物價並無實際效果，而國家銀行繼續發放的有限度貸款，對通貨膨脹局勢繼續產生刺激作用，直至政府在民國卅六年二月十六日頒佈緊急法令（見上文）後，才完全停止發放貸款，金鈔拋售措施亦於這一天起停止執行。蓋政府此時已認爲到通貨膨脹之惡劣形勢，絕非「樂觀之信念」所能消弭，拋售黃金及扶植工商業發展，絕無法彌補浩大之軍事開支。

爲應付前線之浩繁開支，單靠拋售金鈔與發展工商業無補於事，而必須印發大量紙幣，印發大量紙幣之結果助長物價之飛躍，其結果使政府拋出之金鈔無法再照原價收回。且工商業同時受到摧殘，政府若繼續拋售金鈔，唯一結果，只是使國庫枯竭。

但在緊急法令實施後不久，政府又發覺此項新法令無法行得通，必須改變銀行政策才能使新法令生效。蓋此項緊急法令規定物價之限額及凍結工資，如果政府無法向市場提供足夠之消費品及工業品，勢難使物價之凍結政策生效，而要增加商品之供應，必須使工業界增加生產，而欲使工業生產增加，必須先使工業界獲得政府貸款以增加生產，故在停止貸款後不久，政府再度開放貸款，且鼓勵工業界向政府借款。

在短短一年餘時間內，政府之財經政策再三變更，這一方面固然是日趨惡化的經濟局勢之影響，但同時也反映了政府之缺乏堅定及有遠見之政策。政府在開放貸款後，又就心私營銀行向國家銀行取得之貸款轉手借給投機商人，故對國家銀行之發放貸款手續加以許多限制，往往在申請貸款後半年才能獲得所申請之款項，不僅無法應急，且在獲得貸款時物價已經跳躍數倍，使貸款無濟於事。

由於國幣在民衆心目中之信用日漸下降，政府爲挽回國幣之信用，企圖抽緊銀根，以人爲力量來恢復國幣信用，故對貸款政策再度改變，自民國卅六年八月起，只限於發放給一些規模宏大的工廠，並監督此種貸款只限於用在生產而不得流入投機市場。政府此舉用心良苦，蓋唯有縮小貸款範圍才能使政府進行切實之監督，但實際上最需要政府以貸款扶植者並非此等大廠，而是一般之小廠。故政府此項措施雖然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

至民國卅六年十二月，政府下令禁止國家銀行貸款給任何私營銀行，並宣佈不遵照官定利率發放貸款之私營銀行將予以嚴懲。同時，並制止大量資金逃往國外及加強對貨幣市場之控制，政府設立一個「銀行監督局」，此機構之設立，意味政府不再通過中央銀行來對各私營銀行進行間接之監督，而對各私營銀行採取更直接及更嚴峻之控制。

至民國卅七年一月初，物價開始狂漲，平均每兩個月增加一倍，政府爲應付開支，不得不更大量印刷紙幣，但印刷機跟不上物價之跳躍，國幣流動量平均每四個月增加一倍，因此使政府之財政赤字繼續不斷增加。此種急遽惡化之情況，終於使最高當局親自出而干涉銀行制度，下令停止發放一切信用貸款。此時正值農曆年關，這是中國商場上傳統的清理債務之期，當局突然抽緊銀根，使商場大起混亂，使大批中小工商業倒閉。這使中央銀行以往爲扶植工商業所盡的努力毀於一旦。

此項禁止貸款之法令延續達三個月之久，在市場銀根奇緊的影響下，使二月份的物價上漲速度受到了相當的阻力，但這顯然祇是一種暫時的好景，由於政府預算之赤字不斷增加，政府不得不乞靈於印鈔機，故使國幣之發行額不斷激增（見上表），市面之通貨再度泛濫，銀行之停止貸款不僅無法制止市場之投機活動，且使投機活動之範圍

更爲擴大，蓋手中握有現款之人，皆不敢藏鈔票過夜，幾乎皆在獲得現款後立即換取物資，故投機活動已成爲「全民性」，各階層之人民皆直接或間接參加了投機市場的活動，此時私營銀行若遵守法令營業，唯有坐以待斃，故「銀行監督局」此時亦已無法再阻止各私營銀行之非法活動，此等銀行已半公開地不再遵照官定利率而進行放貸業務，且介入投機活動以求自保。

至民國卅七年三月底，政府承認此種嚴峻措施之失敗，又一次開放信用貸款。政府此時之政策，已放棄平息物價之希望，而改爲儘可能使物價上漲之速度趨向緩和。因此在四月間，中央銀行宣佈放棄硬性規定之利率，而把短期存款之利息提高至與黑市利息相等，此項大膽之措施實有及早實行之必要，這是政府使市面現鈔回籠之唯一明智之舉，也唯有如此才能夠使中央銀行與黑市市場對抗。但此措施已實行得太晚，市場之人心已經浮動，央行利率提高後的短時期內，尚能收回一部份通貨，但不久黑市利率即再度跳昇，使央行再度被拋在後面。

在投機活動已經「全民化」的形勢下，市場對於貨幣之需求永無止境，不論央行利率提至多高，黑市利率必超過央行，故使貨幣回籠之目的難以達成，央行若無休止地跟隨黑市市場提高利率，將使國庫難以支持。

第四章 新通貨——金圓券之發行

民國卅七（一九四八）年五月，內閣爲急遽惡化之經濟局勢所拖垮，新的行政院長上臺，同時中央銀行總裁亦告換人。通貨膨脹仍在繼續，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在六月份增加百分之二百六十，在七月份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黑市外匯價格在六月份增加百分之九十八，七月份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從下表可以看到外匯價格狂昇之程度，從而可窺見國幣貶值之一斑。

在新內閣上臺後的最初幾個月內，黑市黃金價格亦與黑市外幣價格看齊，每月增加數倍，而國幣流通數量亦每月增加數倍。這一連串使人震慄的財政崩潰形勢，終於迫使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宣佈幣制改革，但此次改革並未帶來良好結果，反而是加速了政府之全面經濟崩潰。

在一九四七及四八兩年間，財政界領袖們會一再呼籲政府以拋售物資及停止印發紙幣等合理措施來穩定經濟，從而鞏固國幣幣值。但新任財政部長却持有不同見解，他不願這些警告，認爲在鞏固幣值之前無法使經濟穩定。他認爲可由改革幣制來使幣值穩定，從而可使政府預算平衡。因此他提出了幣制改革之計劃，此計劃獲得最高當局之全力支持。在此計劃付諸實施之前，財政專家們曾指出：國幣幣值雖然一落千丈，但至少仍爲民衆所接受，而新幣發行後是否仍能爲民衆所接受，則尚在未知之數。但這些專家之反對未爲當局所接受，蓋當局認爲此種「書生之見」過於正統，不適合中國當前之不正常情況。

在新任財長之策劃及最高當局之同意下，幣制改革終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明令頒佈。新幣每元以純金零點

二二一七公毫爲本位，而以紙幣代表，此種紙幣之名稱爲「金元券」，政府訂定之新舊幣兌率爲國幣三百萬元對金元券一元；政府由庫存之全部黃金、白銀及外幣中，撥出百分之四十作爲金元券之準備金，並有法律明文規定金元券之發行額爲二億元。所有物價皆凍結於八月十九日之水準，未經政府當局批准不得隨意提高或降低。政府同時頒佈法令，禁止民衆私藏金銀及外幣，一切私有之金銀外匯必須向國家銀行兌換金元券。此外，政府還採取一系列相應措施，諸如改善稅收制度，控制信用貸款，降低利率，以及以嚴厲措施鎮壓在幣制改革期內興風作浪之商人。

日 期	一美元與國幣之官價兌率 (註一)	一美元與國幣之黑市兌率 (註二)	上海批發物價指數 (註三)
民國卅五年六月	二、〇二〇	二、六六五	三七八、二一七
十二月	三、三五〇	六、〇六三	六八一、五六三
民國卅六年三月	一一、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三八六、五九三
六月	一一、〇〇〇	三六、八二六	二、九〇五、七〇〇
九月	四一、六三五	五〇、三六五	四、六三五、七〇〇
十二月	七七、六三六	一四九、九一五	〇、〇六三、〇〇〇
民國卅七年三月	二一一、五八三	四四九、六二〇	三二、五七六、九〇〇
六月	一一、二七三、〇〇〇	二、三一、二五〇	一九七、六九〇、〇〇〇
八月	七、〇九四、六二五	八、六八三、〇〇〇	五五八、九〇〇、〇〇〇

(註一) 根據中央銀行資金調查委員會之統計。

(註二) 根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之統計。

(註三) 民國卅五及卅六年之數字係根據財政部預算局之統計，民國卅七年之數字係根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之統計。

政府在上海、天津、廣州三大重要地區，分別派駐一位高階官員，其官銜爲「經濟督導員」，除全權執行上述一系列控制及監督措施之外，並具有行政及指揮警察之權力。政府對上海地區之控制尤爲嚴峻。

幣制改革後之最初六星期，全國投機活動中心之上海市，在經濟督導員雷厲風行地執行管制政策之下，各方商賈心存顧忌，未敢輕舉妄動，日用品價格保持於八月十九日之最高限額，惟高貴消費品及舶來品之價格則難以穩定，即使在嚴格管制之下仍起波動。最使政府關心之金鈔黑市買賣則已完全受控制，黑市市場事實上已不再存在，此點不得不歸功於上海市經濟督導員之努力，單在上海一地，向政府銀行交兌之民間金銀外匯，總數共達一億七千萬美元之鉅，事實上已遠超過政府所聲言之金元券發行額，爲收兌此批金銀外匯，政府在上海一地已發行金元券約六億八千萬元。政府勝利地宣佈幣制改革完全成功，但是民間對於通貨膨脹局勢之暫時遏止仍具戒懼之心，對未來之經濟動向普遍抱持觀望態度。上海市之批發商人幾已全部停止營業，蓋在限價之下無利可圖，這使市場物資漸呈匱乏，且迅速呈現物資嚴重缺乏之現象，經濟督導員所面對之最棘手局面爲：民衆對於物價之是否能長期保持穩定，缺乏真正之信心，督導員之措施愈爲嚴峻，民衆愈認爲眼前之物價穩定係出於高壓而非出於經濟局面之好轉。而如果經濟督導員放棄高壓，則限價之堤壩勢必立即爲市場之狂瀾沖毀。

正值上海之通貨膨脹形勢被暫時遏止之際，在其他各未有經濟督導員設置之地區，金元券之幣值漸趨下降，物

價再度如脫韁之野馬狂奔濫跳。

同時，緘亂前線軍事失利之消息接二連三傳來，一方面使後方人心大起波動，另一方面使政府必須動用更多之財力應付軍事局勢，以致須發行更多之金元券彌補軍事開支，此情形一如國幣貶值之過程。

在幣制改革開始時，財政部長曾表示政府之預算赤字可由百分之七十減少百分之三十。但事實上，並未能達成此一目標：在十月份，預算赤字曾一度降至百分之五十，而至十一月間，赤字又回升至百分之七十五。十一月份之實際赤字數字高達金元券五億零三百萬元，而九月間之實際赤字爲金元券一億三千八百萬元。

十月中旬，上海市突然出現搶購狂潮，經濟督導員公署雖仍在限價防線上負隅頑抗，但市民已寧可出高價搶購物資，商店櫥窗皆已被搶購一空，而黑市商販則仍不敢過份活躍，致使物資絕跡，市場恐慌現象得未曾有。零售商皆把物資收藏，不僅不願照官價出售，甚至不願以稍高之價格售與甘願出高價搶購之顧客，蓋市面已對金元券漸失信心，愈認限價一旦撤銷，物價勢必猛竄，屆時擬有物資者將有厚利可圖。甚至所有餐館食府亦皆拒絕顧客，寧可虧蝕店面開支，蓋若以限價饕客，勢必虧蝕更巨。

在中小城市之地方官員，有些對中央政府之政令不甚了了，有些則對此等政令根本心存疑慮，一俟上海物價高漲後，彼等皆有藉口放棄執行中央政府之條例。至十月底，通貨膨脹已成既成事實，政府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放棄對物價之限制。

十月底，金元券的實際發行數字，已較政府揚言之最高限額（二億元）超過八倍以上，軍事開支之繼續不斷增加，顯示紙幣發行尚需更加快速度。

至此，保障幣值之兩項基本因素，紙幣發行之限額及物價之限額，至此已蕩然無存。

今日吾人檢討金元券之失敗根源，使人清晰看到一項事實；當初反對改革幣制而主張發行大額國幣以延長國幣壽命之經濟專家們，所持之見亦非完全正確。蓋事後之事實證明，金元券是可以成功的，只是因為措施之失當，而使金元券重蹈國幣覆轍。最主要之一項失策，係政府在發行金元券之初，只命令民衆把私有之金鈔兌換金元券，而未申明可用金元券兌換金鈔。事實上，當時政府若大膽（並非冒險）以庫存金鈔公開支持金元券，允許民衆持金元券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鈔，則可以完全穩定金元券之價值，且使民衆對金元券之懷疑一掃而空，當時國庫確有這樣的能力，從下列具體數字中可看出政府當時的確有能力使金元券無限制兌換金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戰前夕），國幣之發行額爲十四億一千萬元，其價值約相當於同等數額之美元。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國幣發行額雖已高達天文數字，但即使按照官價兌率，其價值亦僅及三億一千四百萬美元。此時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及外匯共值約一億三千萬美元，而在發行金元券時根據政府法令由民間繳兌給中央銀行之金銀外幣共值一億七千萬美元。換言之，在金元券發行之初期，政府手中握有之準備金共達三億美元之譜，用以兌換價值三億一千四百萬美元之國幣，係綽有餘裕者，若政府在此時宣佈金元券可隨時向國家銀行兌換金銀，不僅無捉襟見肘之虞。且可於一開始時即建立金元券牢不可破之信譽，政府在此方面之猶豫不決及缺乏自信而未採取此種果斷措施，無疑是造成金元券失敗之主因之一。

第五章 國府頒發「經濟改革計劃」

在中國經濟崩潰之過程中，美國曾力圖予以挽救。民國卅六（一九四七）年底時，中國之政治、軍事及經濟局勢日漸惡化，引起華府當局之密切關注，美國國務院宣佈準備向國會提出一項「對華經濟援助計劃」。美政府於同時宣佈：若中國國民政府欲獲得充份之美國援助，必須採取經濟改革政策，首先穩定其經濟，在自助原則下輔以美國之援助，如此，方能對中國危急之經濟局勢有所裨益，否則任何外援皆將難收預期效果。美政府並指出：唯有在中國當局採取有效的經濟改革政策並發揮相當效果之情況下，「美政府之對華經濟援助計劃」，方有可能獲得國會之批准。

中國政府在此種勸告及壓力之下，於民國卅七（一九四八）年初，宣佈經濟改革之十點計劃，此等計劃係在美國之建議下制定者。其中最主要之兩點爲規定削減政府開支及改進稅收制度應採取之步驟。事實上，此等措施早在六個月前已由當時之中央銀行總裁提出。但爲當時之財政部長所拒絕，財長認爲此措施皆係「無法實現」者。

政府在美國當局一再催促之下提出此項關於經濟改革的十點計劃之際，通貨膨脹之進度已在加速，且軍事局勢亦已日趨惡化。美方曾表示希望中國當局整編軍隊及精簡行政機構，以裁減冗員，節省開支。此兩項亦列入是項十點計劃之內，惟政府無意裁減軍隊人數，蓋深恐被裁減之兵員會投向共黨軍隊中去，政府在抗戰勝利後解散偽滿軍隊之事件中，已獲得沉痛教訓，當時被解散之偽滿軍隊幾全部爲共黨派入東北之林彪部隊所吸收，致造成日後東北之危局，故政府不願再重蹈覆轍。同時，政府亦不願在政治上冒險精簡行政機構，蓋公教人員生活清苦。對政府已

有諸多不滿，若在此時再加大舉裁員，勢必引起公教人員之普遍惶恐不安，其結果祇能造成政府區之進一步動盪與混亂。由於是項經濟改革計劃祇係獲取美援之條件，故政府雖加命令公佈，惟始終未付諸實施，事實上政府亦根本無法實施。

政府公佈此項十點計劃後，美國國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通過「援華法案」，授權美國政府贈予中國二億七千五百萬元，指定用於購買美國之剩餘棉花、汽油、食品、建築器材以及其他日用品；另外再贈款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規定作為今後十二個月內購買美國軍用物資之用。

這兩筆經援及軍援之總額共為四億美元。此數額使中國當局大失所望，蓋在美國國會通過此法案之前，中國政府人士曾認為由於中國所處之重要戰略地位，美國必將大規模援華以抵抗共黨擴張，而現在美國國會僅通過撥款四億美元，其中經援部份為二億七千五百萬元，此數字遠不足以應付中國當前之經濟需要，若要使中國恢復經濟穩定，必須先所有中國工廠獲得必需之原料，在交通運輸方面有能力的把物資運往內地，在政府收入方面有能力保持預算平衡，而這筆經濟援助之款項，顯然還不足以應付這三大需要。同時，即使這批經援及軍援物資，能在短期內全部運到中國，也不足以改善華北地區之軍事形勢及全國之經濟局勢，蓋未有充份之運輸工具能使前方軍隊及內地居民獲得美援物資。因此，美國此項援助所能產生的唯一效果，只是使上海、南京、廣州等後方大城市獲得大量基本日用品，諸如棉花、燃料、食品等等，而對於制止通貨膨脹則根本未能發揮任何作用。

瞭解了此種情況，現在且讓我們再來敘述金元券之遭際：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政府宣佈取消物價限額後，通貨膨脹形勢再度如野馬脫韁，狂奔亂竄，在取消限價後一

星期內，上海物價狂漲十一倍。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瘋狂之物價上漲形勢，而在東北與華北之軍事形勢亦急轉直下，政府聲望陷於新的最低潮。中央銀行庫存之金銀外匯亦已減少至最低點，此時中央銀行擁有之黃金僅二百萬盎司，白銀共一千五百萬盎司，外匯總值共僅美金七千六百萬元，中央銀行若欲以此區區之數用於和通貨膨脹搏鬥，勢已完全沒有可能。政府至此亦已迫得放棄制止通貨膨脹之希望，唯一可採取之途徑爲如何保持這批僅有的資產，以及如何最好地運用這筆僅有的資產，政府已放棄了稍早所公佈的一切制止通貨膨脹之措施。

政府在十一月中旬採取了一項重要的新措施，正式宣佈金元券貶值百分之八十（實際的貶值遠不止此數），並允許民衆得以根據新的幣值自由向中央銀行兌換黃金。

第六章 通貨貶值與金銀自由兌換

數天後，中央銀行宣佈新的存款方式，凡把金元券存入中央銀行滿一年者，在到期時可根據存入銀行時（即一年前）金元券與黃金之比例收取黃金，若存戶希望以銀洋或白銀作標準，亦可於存款到期時以銀洋或白銀作為本息一次提取。此措施旨在吸收貨幣回籠，以遏阻通貨膨脹形勢之進一步惡化。但由於中央銀行「底子」有限，若照貶值百分之八十之比例推行此項措施，中央銀行勢難應付。因此在宣佈此措施之同時，再把金元券貶值百分之五十。此時，金元券幣值之金本位，已下降至僅及八月十九日發行時之十分之一，金元券一再貶值之目的，係為保障中央銀行庫存之金銀外匯。

但是，由於十一月份在市面流通之金元券數額，已較八月十九日金元券面世時之流通額增加逾十倍，故金元券之幣值雖一再經當局明令公佈貶值，但中央銀行仍無法提供足夠之金銀供民衆自由兌換。而政府既經宣佈民衆可持金元券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銀，中央銀行就不得不挑起此項難以負荷之重擔，故使中央銀行庫存之金額面臨「一掃而空」之威脅。

政府此項自由兌換命令，在民衆引起強烈反響，民衆眼看金元券逐漸步上國幣覆轍，爭先恐後競兌金銀，更何況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銀之價格遠較向黑市購買金銀為廉宜，即使無法收藏金銀，在一轉手之間亦可獲得數倍利潤。尤其是手中還有大量流通資金之工商業家，立即發現向中央銀行兌換黃金再轉售與黑市，所獲利潤較任何事業更為豐厚，致使上海等大城市掀起擠兌狂潮，此等不法商人及惡勢力組織，雇用大批失業者徹夜輪候瘋狂搶兌，更有不

少工廠商號之僱主，暫時停業，出動全體職工前往中央銀行搶兌黃金。此種瘋狂局面，使政府所採取之自由兌換政策不僅無助於穩定經濟，且助長市面之混亂，故政府迫得更改法令，由財政部長宣佈凡向中央銀行兌換金銀者，必須先填具申請表格，經當局批准後於指定時間前往指定地點兌換，並限制兌換數量，規定每人在三個月內最多兌換一兩黃金及四十九枚銀洋。此種措施在理論上可以遏止搶兌狂潮，但在付諸實施時，立即產生更狂暴之混亂局面，當申請表格在十二月初之一天開始分發時，在上海中央銀行門前聚集之申請者多達六萬人，不論是正當之兌換者或黑市之操縱者，皆奮不顧身向狹隘之銀行大門衝去，人羣互相踐踏搏鬥，銀行被迫關起大門，致使門外之民衆發動暴動，死傷達數十人之衆。

政府趁此機會宣佈暫時停止兌換。至十二月底，更頒佈一項新兌換措施。此項新措施規定：今後仍可自由兌換，但兌換之價格係根據國外之滙率，假定今天在紐約市場之黃金價格爲每兩五十元，而紐約對金元券之滙率爲八萬元對美金一元，則是日向中央銀行兌換一兩黃金需繳金元券四百萬元，若明日紐約黃金價格未變，而金元券與美金之滙率變爲十萬對一，則在國內之中央銀行內兌換一兩黃金，需繳金元券五十萬元，簡言之，此項新措施實際上就是承認黑市金價，官價隨着黑市牌價而變動，雖然黑市價格有時較官價稍高或稍低，但大致上不會相差太遠。政府事實上已放棄用全面自由兌換或局部自由兌換方式來加強金元券信用之一切努力。

惡性通貨膨脹至此進入新高峯，政府已不再具有對物價加以控制之任何措施，政府對控制物價已無能爲力，物價上漲幅度完全「聽其自然」，致使全國經濟迅速趨向徹底崩潰。

至民國卅八（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值徐蚌會戰一敗塗地後不久，財政部採取了最後一次企圖遏止經濟

崩潰的努力。財政部宣佈發行一種短期公債，以二百萬兩黃金作後盾，共發行公債二百萬份，即每份為一公兩黃金，以兩年為期，按月抽籤發還本息，債券價格以上述之變相黑市官價為根據，以保障購買者之利益。但此項措施為時已晚，共軍正大舉南下，北平已危在旦夕，民衆對國民政府之信用已喪失殆盡，故在此種短期公債發行後，幾乎無人問津，二百萬份公債在二月中旬時只售出不足四千份。雖然購買此種公債絕不會吃虧，到期時可按當日黑市黃金價格收回成本，另有利息，但民衆顯然已認識到政府無法再支撐兩年。此項「最後的努力」即在無聲無嗅之中被撤銷。從下表可以看出金元券在問世後八個月內的驚人貶值程度（金元券在民國卅七年八月十九日面世時的發行額為二億元）

日期 民國卅七年	金元券發行額（每單位百萬元）	一美元與金元券兌率		
		官	黑	市
八月卅一日	二九六・八	四	二八	四
十一月卅日	三、二〇一・三			四二
民國卅八年				
二月廿八日	五九、六〇三・五	二、六六〇	二、九八〇	
四月廿五日	二、〇三七、一〇五・七	二〇五、〇〇〇	八一三、八八〇	

（註）圖表數字皆根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之統計。

在民國卅八年二月份之第二星期，蔣總統宣告引退，國庫之全部黃金儲備，皆遷移至臺灣及廈門。代總統李宗

仁之政府，曾企圖利用留存在京滬之庫存白銀作爲準備金，以穩定經濟。至二月二十四日，李代總統正式宣佈以白銀作爲物價標準（此政令從未爲民衆所重視，蓋黑市市場上一切仍以金價爲標準），並且宣佈銀洋可在市面正式流通，物價可以銀洋爲標價，並可以用銀洋作買賣。這是民國廿四年以來，「大頭」與「小頭」首次在市面公開流通。李宗仁政府撥用庫存白銀的百分之五十，作爲同時在市面流通的金元券之準備金，換言之，即把金元券由金本位而改爲銀本位。這項「最後的實驗」存在着一個先天性弱點，從一開始即註定其必然失敗，蓋每枚銀洋所含之純銀爲略少於三分之一兩，當時黑市之銀洋價格爲每元值金元券三百二十元，亦即每兩白銀值金元券約一千元。此時在市面流通之金元券發行額已將近六百億元（見上表二月十八日欄），若要穩定金元券幣值，需有六千萬兩白銀作後盾，而事實上國庫所剩之全部白銀及銀洋共值二千五百萬兩，李宗仁政府撥出半數作爲金元券之準備金，共僅一千二百五十萬兩。

京滬相繼陷共後，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已近尾聲，經濟崩潰亦已進入最後階段，李宗仁政府於遷抵廣州後，曾要求美國借貸白銀以穩定幣值，遭美國政府拒絕。金元券在七月卅一日時之發行額已達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億三千七百二十萬元（一二五、一二四、六三七、二〇〇、〇〇〇）事實上在共軍尚未抵達之政府區內，已無人再願意接受金元券，於是進行了政府在大陸時代最後一次的「幣制改革」，宣佈發行銀元券代替金元券。政府此時在大陸之統治已臨岌岌可危，銀元券在問世時，即遭遇金元券垂死時之命運，無人願意接受，故銀元券實際上只發行了二千萬元，這是國民政府歷史上發行者最少的一種貨幣，但却是最不值錢的貨幣。民國卅八年十月政府遷到重慶時，銀元券共發行了二千五百萬元，不久即隨着政府之撤離大陸而成爲廢紙。

第四篇 剿共軍事著名戰役之回溯

第一章 陝北延安之戰

經過上述之長期惡性循環通貨膨脹之後，加以華北各地軍事逆轉，局勢危殆，軍用浩繁，政府開支無法緊縮，使經濟與軍事兩者互爲因果。至民國卅八（一九四九）年二月，蔣總統引退，繼而京滬淪陷，軍事倒退，政府南遷，而經濟亦同時陷入全面崩潰險境，不可收拾矣！

論者或曰：抗戰勝利後，苟非國軍剿共之戰，連年失利而影響士氣民心，則經濟崩潰之禍，當不致陷於絕境，容有挽救之術。此亦似是而非之論耳。孰知經濟崩潰危機，早已隱伏於抗日戰爭後期，勝利後即使無國共之戰，一切能順利復員，經濟情形亦非經過長期間培養，無法恢復。況自馬歇爾調解國共失敗之後，政府連年剿共之戰，亦非全挫，如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之役，同年五月孟良崮之役，七月南麻之役，翌年（一九四八）二月宜川之役，六月東北白旗寨之役，十一月華東碾莊之役，黃伯韜將軍壯烈戰死，七月至翌年（一九四九）四月，山西太原保衛之役，最後守軍五百完人於彈盡援絕，壯烈成仁。此均爲國軍克服城池，追奔逐北，或則與城共存亡，可歌可泣之史實，豈容抹煞？爰就時間順序，略述各戰役之梗概，以資本章。

中共所誇稱二萬五千里長征——自江西井崗以至於延安。延安古河套地，東臨黃河，西瀕洛河，叢山峻嶺，懸崖峭壁，中共遂作爲其僭竊之根據地，稱之爲「紅都」。自民國二十三年建此赤化中心，迄於抗戰勝利，初則假抗日之名以取得第十八集團軍之番號，後則藉俄共之力竊據東北。於是蓄意擴大叛亂，復利用由國際調處，乘機作政

治滲透，軍事進攻與內奸反側，無所不用其極，遂至氣餒高漲。自卅五年至卅六年初，中共竟違反自行議訂之停戰協定，連續三次，致軍事調處執行部無法行使職權。尤以卅五年尾，中共在洛川、宜川、正甯等地區，以小部隊不斷襲擾國軍，並修言發動——「春季攻勢」——向國軍襲擊。政府爲安定人心，伸張正義，始有攻略延安之圖。

按延安雖作赤化中心，但僅有通洛川之公路一段，其他皆係古老式之亂叢羊腸。漢唐時爲朔漢要衝，曾樂受降城於此。宋爲韓琦、范仲淹經略之地。岡原斷裂，無從攀登，其延川以北，壑谷盤澗，河流引成溝洫，兩岸紅黃土，壁屹立聳時，遠望一如平地，近則斷絕不通，雖兩崖可面對談話，然欲親近，非環繞迂迴至數小時，決難到達。其間無道路，只有溪徑，沿溪而行谷縫，騾馬行動困難，遑論車輛。矮林密佈，浮塵厚積，晴則乾裂，雨則溼滑。城鎮村落，皆瀕河流，居民鑿穴而居，飲水不易獲，物資奇缺，尙保有古來初開化時代之氣象，自中共蒞止，人民生活，一仍舊貫，惟毒化青年，使其對政府懷仇恨之念，故當日國軍攻伐延安，雖未獲居民一些助力。

民卅六年（一九四七）三月上旬，中共分佈於陝北之部隊，藉以拱衛延安者，共有三個師又十三個旅之兵力，約計五萬七千餘人，另有居民七萬餘人。其指揮機構：「陝甘寧邊區總部」——「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野戰指揮所統戰部」，朱德任總指揮，綜攬軍事發號施令。構築防線四條，依次而設，自謂爲——「東方馬奇諾」。其兵力分配——第一線約二個旅——在大小勞山線約五個旅，每旅人數不等。

中共既在東北得手，津浦、平漢兩鐵路交通亦爲其扼制。迄卅五年（一九四六）秋，國軍第二戰區防地廣遠，而兵力單薄。當中共大舉南犯晉南時，國軍第一戰區部隊遂次東調應援，轉戰於晉南各地，惟中共部隊到處流竄，此剿彼起，難竟全功。況國軍橫跨黃河作戰，後方補給，全賴陝西供應，而中共在陝北又滿佈部隊，倘自宜川南

下，則國軍運輸交通，易被切斷。於是國軍不得不向延安進攻，以摧毀其共產之神經中樞。

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部於卅六年（一九四七）二月十九日，先分兵三路，一舉收復馬欄、柳林等地，以排除西安之威脅，掩護大軍之迅速集中。一面將河東主力漸次西調。至三月七日，第一軍轄三個師七個旅，已集中於宜川——龍泉關地區。第廿九軍轄兩個師四個旅，集中於舊縣洛川——堡子頭附近地區。

按國軍分左右二兵團，以第一軍軍長董釗爲右兵團指揮官，由宜川以北之平陸堡——龍泉關地區向延安進攻。以第廿九軍軍長劉戡爲左兵團指揮官，於洛川西北地區沿洛河東岸，攻佔茶坊、甘泉，向馬家莊之線進出。以卅六師副師長顧錫九爲隴東兵團指揮官，於攻擊前二日，開始分向安塞、延安、甘泉各附近，行擾亂攻擊及威力搜索。空軍作戰略、戰術之偵察與轟炸，以主力助右兵團，而分一部助左兵團。三月十二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親赴宜川、洛川，召集各級官佐，指示機宜。

右兵團陣前之佈置

該兵團以第一師、第廿七師、第九十師爲第一綫，於三月十四日由平陸堡、莫旺、龍泉鎮等地，向臨真、劉村、舊治城之綫前進。廿七師當面之中共部隊，抵抗甚烈，且工事堅固，卒賴空軍之助，於是日十八時，始克復西瓜要險，岳家寺、標家臺以上之綫。十五日續向臨真、金盤灣、馬坊之線攻擊，與空軍協力下，於是日十四時佔領臨真（廿七師），十八時佔領金盤灣南十華里高地（九十師）。

十六日，共方第三旅主力及其三五九旅先頭部隊，已到達延安，延安共方各機關，均散遷於四鄉，朱德總部亦遷至城西北壩園。國軍P 04、P 51空軍飛機連番轟炸，卒於十六時摧毀其陣地，攻佔金盤灣、馬家山、馬坊以南各地。

十七日，國軍於十八時克孫家砭以北地區（九十師），進佔蒲化溝（第一師），一師四七旅亦推進至月山坪。十八日，第九十師六十一旅編組四個突擊營向共方陣地鑽隙攻擊，第五三旅由金延大道以東地區進攻，是日十七時攻克楊家畔。第一師七八旅攻佔楊家畔以西高地。

十九日，國軍各部隊攻抵延安城郊，共方賀龍指揮其警四旅等部數千人，向國軍猛力反擊，同時延長地區，另結集三個旅，亦準備向國軍突襲。國軍爲迅速摧毀共方政治中樞，一方面爲解除側面之共方橫襲，乃懸獎——令行急攻，士卒用命，益見奮勇。國軍第一師師長羅列，督勵所部進展神速，該師第一旅之突襲隊首先進入延安；第一六七旅攻佔寶塔山；第七十八旅攻佔燎兒山。而第九十師亦攻佔延安飛機場及清涼山。兵團預備隊第廿七師第四七旅，隨戰事之發展，亦推進至七里浦。

左兵團陣前之佈置

該兵團第一綫爲卅六師、十七師。三月十四日由黨家原、街子河等地，向牛武鎮、茶坊攻擊。第卅六師另以其所轄一部迂迴而出共方陣地側背。主力由正面果敢突擊，十時攻佔韓家原、牛武鎮之綫，並前向回莊追擊。第十七師於攻佔共方警戒陣地後，共方新第四旅據守茶坊，憑堅強工事頑抗。經國軍第十二旅奮勇衝殺，七時克交道鎮，十二時佔領茶坊。復前追擊，十五時再略取鄜縣。至此，國軍兵團預備隊亦隨得勝部隊，推進至交道鎮駐守。

十五日，國軍第一綫部隊續向榆林橋，經激戰後，於是日十五時進佔至一四二〇高地，復激戰二小時，始佔領榆林橋。第一三五旅控制交道鎮各高地，以掩護國軍左側背之安全。

翌日，國軍獲可靠情報：「共方賀龍準備於大、小勞山地區，與國軍決戰，不獨安排就緒，且調晉南共方部隊

結集三個旅於翼城、絳縣以東地區，將犯候馬、曲沃，藉以策應陝北之戰之企圖。一各等因。於是國軍乃以第十七師第十二旅之一團守備茶坊，餘部推進至榆林橋。第卅六師續向板橋屯推進，詎共方猛烈抵抗，卒於是日十四時，經第一六五旅攻佔單腰梁高地之綫。第一二三旅攻佔道佐鋪，仍向麻子街方面進擊。兵團預備隊第一三五旅隨進展至小原子。

十七日，國軍第卅六師續向前進，其一六五旅遭共方之一二〇師之獨立旅，相與鏖戰，終賴空軍轟炸之力，攻佔黑龍山、伏陸山。國軍第一二三旅亦佔領審店子、東岳山。國軍第十七師第十二旅主力，推進至麻子街，任交通要點守備。至於國軍兵團預備隊第一三五旅進駐板橋屯。

十八日，國軍第卅六師得空軍支助下，其第一六五旅由楊莊科向大勞山側擊，（該地曾用日俘建有地下工事），佔得該陣地山頭十二個，並其要衝高地。其一二三旅於攻克甘泉後，復前向小勞山攻擊。

十九日，共方部隊之獨一旅、第八旅、新四旅、警一、三旅，一二〇師之七一四團在大小勞山固守，但國軍第卅六師猛攻與空軍猛轟，卒被國軍攻佔，並克湫雁山、三十里鋪。

國軍攻克延安後，將右兵團集結於延安之東北，左兵團集結於延安之南。而共方部隊已向安塞方向，退至保安。總之，此次攻克延安，雖為左右兵團之力，然而空軍實有極大之戰果，而隴東兵團之呼應防堵，亦發生重大效力，使共方兵力牽制而又難於流竄，其功有足述者。

延安之戰，共方傷亡其旅長以下之官兵計一萬六千九百〇六人，生俘一萬〇一百八十九人。國軍傷亡營長以下

官兵一千〇卅人，其比例爲十六比一。國軍獲勝！

共軍雖撤出延安，但所謂中共中央書記處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仍停留於「陝甘寧邊區」。至四月中旬轉到安樂靖邊之王家灣、高川一帶。中共爲保密起見，甚至用「李德勝」之姓名以呼毛澤東，用「胡必成」之姓名以呼周恩來。蓋該時共軍只一警衛團，乃按其編制分四大隊，以三支隊名義統一指揮，以任弼時爲司令員，陸定一爲政委。直至六月，國軍劉戡率部掃蕩至此，中共軍幾遭擊破，共軍迫得迴竄於小河。七月毛澤東在小河召集一軍事會議，彭德懷、賀龍、陳毅、陳賡都會參加，八月劉戡部又北進小河，中共急遽退至綏德、米脂方面流竄，爲防空襲，乘夜行軍，由米脂城郊至黃河沿岸之李家溝，不過二十餘里，竟行八夜始到。突聞國軍劉戡部隊又將追至米脂，而毛澤東堅持不渡黃河，周恩來強之同渡，中共軍乃匆促擄取老百姓家之門板木材，並拉夫役幫助，立即搭成浮橋，倉皇渡過。翌日彭德懷部之許光達率二旅到達葭縣與米脂之間，與國軍遭遇，發生激戰。自此共軍源源集於邊區，暫時形成膠着狀態。

中共毛澤東等住於葭縣朱官寨，於九月一日擬定了「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當時中共另一部份之劉少奇、朱德等則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執行毛澤東命令。毛澤東之「第二年戰略方針」略稱：

「第二年基本任務：是以主力打倒國軍區域！由內綫作戰轉入外綫作戰，也就是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其規定之計劃如下：

「晉冀魯豫野戰軍對平漢路北段之國軍發起攻勢作戰」；

「東北野戰軍緊接合東北夏季攻勢之後，從九月起在長春、吉林、四平地區和北寧線，錦西至義縣地區，發起大規模之秋季攻勢」；

「形成了共軍全面進攻的總形勢」。……「此爲共軍戰爭之轉折點，標誌著戰爭形勢之根本改變」。（毛澤東選集四集第一二一七至一二三〇頁）

按當時共軍之形勢：「晉冀魯野戰軍」已於六月卅日在魯省西南地區強渡黃河，八月上旬越過隴海綫，挺進至大別山。又其所屬之「太岳兵團」，八月下旬由晉南渡過黃河，進至豫西地區。「華東野戰軍」進駐於魯省西南地區。其所屬之「山東兵團」在膠東方面發起攻勢作戰。「西北野戰軍」轉入反攻。共軍之軍事情勢，既如上述，所以美國方面，對延安之攻克，其意見以爲：

「在西部國軍會一舉攻克赤都延安，此役中，國軍所用之兵力，多至七萬五千人，此事雖經國民政府宣揚爲一偉大勝利，然就實際言之，不啻一浪費而空虛之勝利。因共軍所取之方法，迥異於政府，並不欲爭一毫無軍事價值之城市，以貽誤其健全之軍事策略。國民政府深陷於貧瘠陝西之泥淖中，反須負擔補給之重任」。（見美國白皮書第一八六頁）

觀於美國白皮書所發表對延安之戰之看法，卽就軍事觀點而言：根據克勞塞維茲兵學大師之言：「只佔領土地而不能殲滅敵人主力，不得謂爲勝利」。「只殲滅敵人主力而不能消滅敵人戰鬥意志，亦不得謂爲勝利」。「延安乃中共盤踞十一年之神經中樞，作爲赤色偽都，一旦傾覆其巢穴，觀其狼狽遁逃及毛氏不肯渡河之狀，足見其戰鬥意志，已瀕摧毀，竟能於佔領土地之外，復能殲滅其一部主力，消滅其戰鬥意志，此正合乎克勞塞維茲真正勝利之所

得成果，謂爲浪費與空虛，似嫌未當。惟國軍雖能掃穴犁庭，而未能生擒毛澤東及其餘黨，爲可惜耳！

抑又有不能已於言者：推原國軍之所以進攻延安者，蓋有不得不然之故在也。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迭被阻撓，而國府請求和平，已無處著力。軍事調處執行部之停戰協定，橫遭破壞，則國府希望統一之舉措，終成泡影。且國民政府於是年元旦公布憲法與實施程序，中共竟行拒絕接受。美特使馬歇爾特發聲明：認爲國民大會通過此一民主憲法，何況與政協會議所決定之原則相符，深以中共之不參加合作爲不幸！等語。馬氏遂爾返美。蔣主席提出恢復和平談判，復爲中共方面所拒絕。於是美大使司徒雷登迫得爲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發表聲明，從此美國所擔當之調處工作，無形中遽告停止，即派駐延安之聯絡人員亦被撤回。而中共之駐京人員全部撤返延安。如此勢成尖銳敵對，已屬無可挽回。其他如民社黨、青年黨及社會賢達諸君子，僉以國家若是分裂，亟謀團結挽救，正擬改組政府機構。孰知中共翻乘隙而大事竄擾，掀起隨地戰爭。

民卅六年一月，共軍攻陷江蘇之邳縣，後又攻陷甯莊，進逼臨城，更荒謬者爲國府修築黃河堤岸，而中共竟堅阻黃河之堵口合龍。時郝鵬舉率部五萬人反正，效命國府，防禦晉南，不幸被共軍所俘，慘遭殺害。（此皆在美國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前之事）其後共軍在亳縣（皖）、臨沂、曹縣、定陶、嶧縣、柘城、滕、費、鄒各縣及大汶口、泰安等地（魯）攻掠不已。國府不得已將陸軍總司令部移置於徐州，以資鎮攝。軍事之情勢既若是，而政治上之和平民主統一亦已絕望，則國軍收復延安之戰，爲情勢上必不得已之舉，亦擒賊擒王之意也。

迨延安既已收復之後，人心振奮，國府致力於行憲，決定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各黨各派人士，健全組織，先行增設國民政府副主席一員由孫科擔任。於四月十六日由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達成協議，簽署「國

民政府施政方針」，十八日國府明令公佈：

一、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二、選任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張羣、張繼、鄒魯、宋子文、翁文灝、王寵惠、章嘉呼圖克圖、邵力子、王世杰、蔣夢麟、鈕永建、吳忠信、陳布雷、會琦、陳啓天、何魯之、余家菊、伍憲子、胡海門、戴翼翹、莫德惠、陳輝德、王雲五、鮑爾漢等廿八人爲國民政府委員；三、選任張羣爲行政院長，孫科爲立法院長，戴傳賢爲考試院長，居正爲司法院長，于右任爲監察院長。

廿四日又明令：特任張厲生兼內政部長，王世杰兼外交部長，白崇禧兼國防部長，俞鴻鈞兼財政部長，李璜兼經濟部長，朱家驊兼教育部長，俞大維兼交通部長，左舜生兼農林部長，谷正綱兼社會部長，谷正倫兼糧食部長，薛篤弼兼水利部長，謝冠生兼司法行政部長，李敬齋兼地政部長，周詒春兼衛生部長，翁文灝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劉維楨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常乃惠、李大明、蔣勻田、繆嘉銘、彭學沛、雷震等爲行政院政務委員。同日裁撤國防最高委員會。

觀上述國民政府之種種措施，具見其以政治的新貌，彌縫外交的低潮，以軍事的高潮，抵補外交的真空，故延安的克復，足以刷新政治，激發士氣，振作民心，而正國際視聽，促成國內團結。然而終不能挽救大陸淪陷，究其原因，實在於當時未將「中美兩國聯盟」作爲基礎，猶未培根，而枝葉難榮，後之謀國者，其以此爲鑒戒可。

第二章 孟良崗之戰

初，中共新四軍因破壞抗日戰爭，襲擊友軍，反啓日寇以可乘之隙，造成國軍不利地步，政府不得已予以解散。該軍陳毅率其餘衆，潛伏於蘇皖地區，收容殘部，重行組建，仍沿用新四軍番號，假借抗日名義，以瞞騙鄉民。惟該時尚爲日軍盤據時期，故人民易於起同情，而便藏匿，從事擴展蔓延，愈聚愈衆，亂源漸以釀成。迨抗戰勝利，中共將新四軍改稱爲「華東野戰軍」，其竊據地盤，及於魯省中部。而以其主力，威脅中央政府之南京。當時該野戰軍轄有九個縱隊，估計二十四萬四千人。分佈於蘇、皖、魯各省。

民卅五年秋，國軍以該共黨部隊，逼近京畿，國軍整編第七十四師原負拱衛京都之責，令其渡江截伐。乃直指蘇北，不數月即下兩淮（淮陰、淮安）。淮陰固共黨在華東之政治中心，主力所在，攻討不易，該師能一舉而收復，頗得最高當局之嘉許獎勵。嗣後，克連水，蕩平沭陽、泗陽，進取贛榆，遂趨魯境。國軍鋒銳，共軍惟退竄而已。乃遁入沂蒙山區躲藏，冀與華中之共方劉伯承部互相呼應，企圖以「後退攻勢」，作其持久之消耗戰。

民卅六年一月中旬，蟬聯戰鬥後，國軍即以第三兵團會同第二綏靖區，對中共野戰軍前後夾擊。第三兵團克復臨沂後，由濟南南進之李仙洲兵團孤軍深入，於二月下旬在吐絲口以南地區，爲共方所乘，致遭挫折。國軍爲徹底消滅陳毅所領之「華東野戰軍」起見，乃於四月上旬，先將盤據「梁邱山區」之共方陳光中部肅清，然後揮軍前進，直搗陳毅之共黨巢穴——「沂蒙山區」。第一兵團第七十四師，先得攻略坦埠，遂即展開壯烈之孟良崗戰鬥序幕。

戰事未展開前之一般情況

中共利用抗日以培養其本身兵力，穩固其本身地位，實行其——七分發展，二分應付（指對國軍），一分抗日——之政策，企圖乘機坐大，以遂其攫奪政權之陰謀。爾時新四軍陳毅部潛伏魯中後，即以沂蒙山區為根據，乘日軍無暇後顧、國軍鞭長莫及之際，乃大事活動，發展組織，控制民衆，儼然自立機構，掌握政權。山東全省幾全為赤化。所贖者僅濟南、兗州、濰縣等各據點而已。政府政令已無法推行矣，共方且更捏造謠言，誣謗政府，使無知青年對國軍起敵視觀念，蓋已被其洗腦改造所使然。

作戰地區之狀況

山東省——魯中，位於黃河、獨山湖之東，濰河、沭河之西，膠濟鐵路之南，臨沂之北。全境叢山聳嶺，而泰山山脈又綿亘於沂山、蒙山，且四周崗壟複疊，形勢險要，共黨山東省蘇維埃政權，即設於此。其他如徂徠山、梁邱山區，亦為共方盤據，孟良崗在垛莊東北六公里，沂蒙山脈自西北環繞東南，其中以孟良崗、萬泉山較為高峻，足以俯瞰臨沂，控馭沂蒙。惟該孟良崗與萬泉山，均為礮响岩石所結成，童山濯濯，礮研石筍，防禦工程，確非易築。倘砲彈擊石，則火花與石片紛飛，誠利於攻而難於守之地也。

孟良崗之東，沂河蜿蜒由北而南，經臨沂注入運河，岸平而水淺。孟良崗之北則有汶河，自西而東貫於沂河，春則水涸，秋則陡漲，兩河同然，行軍殊感不便，更不宜於機械裝備之部隊。

至於魯中地區，本公路交叉而暢通，自共方潛伏於沂蒙山區建立政權後，所有——沂臨——臨莒——蒙沂——麥萊——博新各幹綫，均被共方破壞無餘。惟臨沂至蒙陰之臨蒙公路，中經垛莊為該戰場之交通樞紐，又自垛莊至

坦埠，向未設有公路，必須通崎嶇起伏之山嶺地帶，匹馬輕車，亦覺無法通行，遑論機械部隊，是時津浦鐵路已遭共方破壞，兼爲其部隊所截斷。

國軍與共方部隊之比較

國軍——在孟良崗之軍力：整第七十四師、整第二十五師（一部）、整第八十三師（一部）。合計兵力三萬人。

共方部隊——攻孟良崗爲第九、第四、第六、第八之四個縱隊。總計十二萬人。

蒙陰至新泰間——國軍整六十五師（主力）、整十一師。合計五萬五千人。

共方部隊第一縱隊。計三萬人。

桃墟至垛莊附近——國軍整第二十五師、整第六十五師一六〇旅。合計三萬人。

中共部隊第三縱隊。計三萬四千人。

湯頭河陽荆山附近——國軍第七軍整第四十八師合計四萬人。

中共部隊第七、第二縱隊。合計六萬人。

綜計——國軍共計十三萬五千人。

共方部隊共計二十四萬四千人。

國軍戰略：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五）春，國軍最高統帥之戰略要旨，爲：

徐州綏署（主任薛岳）負責進剿共方華東野戰軍陳毅。

鄭州綏署（主任顧祝同）負責進剿共方華中野戰軍劉伯承。

主力保持於魯中方面，擬先解決陳、劉二共部隊，俾可打通津浦、平漢兩鐵路，然後分期分區肅清關內之共軍，再集中主力掃蕩東北。是年三月撤銷徐、鄭二綏靖公署，而以陸軍總司令部分設徐州司令部及鄭州指揮所。由顧祝同以總司令名義，負責統一指揮。自共方退據魯中沂蒙山區後，最高統帥部深知共方將作無休止之機動持久戰，乃命令陸總及徐州司令部，其要旨如下：

一、陳毅主力已退集淄博一帶，企圖機動持久戰。

二、加強濟南方面兵力，限五月廿日以前攻佔莒縣、沂水、南麻、博山、淄川、周村等，逼其決戰，包圍而殲滅之。

三、第一兵團以五個師攻佔莒縣、沂縣、沂水並以一部經坦埠，分向沂水、南麻掃蕩。

四、第三兵團即以主力攻佔南麻。

五、第二兵團副司令官邱清泉指揮第五軍及整八十四師、整七十五師攻佔淄博。

六、整第九師攻佔濟南，並由該方面抽出一個軍攻佔周村。

上述命令到達陸總徐州司令部後，立即由顧祝同轉行第一兵團司令官湯恩伯。先是，該兵團爲便於指揮起見，將該兵團區分爲四個縱隊。

第一縱隊——轄：整第八十三師、整第七十四師。（該師於五月二日暫歸第四縱隊黃伯韜就近指揮）以整八十

三師師長李天霞任縱隊司令。

第二縱隊——轄：整第二十八師、整第五十七師，以整第二十八師師長李良榮爲縱隊司令。

第三縱隊——轄：第七軍、整四十八師，以第八綏區副司令張淦兼縱隊司令。

第四縱隊——轄：整廿五師、整六十五師，以整廿五師師長黃伯韜任縱隊司令。

第一兵團司令湯恩伯奉到前令，以共方之第十縱隊由博山南竄。其第二、七、八、九各縱隊仍在莒縣、沂水、坦埠各附近。而國軍之第二、第三兩兵團主力，正向萊蕪進剿中。湯氏乃發出命令如次：

甲、兵團於五月十一日開始，先行攻路坦埠，爾後與友軍協同，求敵主力而殲滅之。

乙、第二縱隊以有力部隊，續向黑林鎮附近搜剿。

丙、第三縱隊續向夏莊、蘇村、界湖之綫，威力搜索。主力集結葛溝、湯頭間，準備機動。

丁、第一縱隊，（欠整七十四師）作本兵團預備隊。

以一部向界湖、牧馬池之綫威力搜索，主力控置於青駝寺以北地區準備機動。

戊、整七十四師、整二十五師爲攻擊部隊，由第四縱隊黃司令統一指揮。除一部控制孟良崗、北桃墟之要點外，主力於五月十一日攻略三角山、水塘、楊家寨、黃鹿寨、黃斗頂山、盧家山坡、鳳凰山各高地。十二日攻路坦埠而佔領之。整六十五師仍鞏固蒙陰防務。——第一兵團司令官湯恩伯。

作戰經過

湯恩伯既頒發攻路命令，並指定以整七十四爲主攻部隊，而以整廿五師輔之，並撥一部以掩護七十四師左翼。

七四師師長張靈甫奉令後，於五月十一日以主力於垛莊附近進發，通過孟良崗附近，向坦埠進取，其作戰指導，爲

一、師以兩旅並列，分由泉橋子、劉三莊向坦埠機動，以一旅爲預備。

二、以輸送團（完成步兵訓練並武裝）留置垛莊，掩護後方。

三、機動前，先遣一部佔領孟良崗附近高地，掩護兩旅進出。

四、第一線兩旅通過汾河後，並列向坦埠攻擊，右翼旅截斷敵通沂水退路，左翼旅任主攻奪取坦埠。

五、爲確保汾河安全與暢通，第一綫兩旅各以一部佔領牧虎山、南河東附近，以資掩護。

五月十日七四師第五八旅令一七三團以一部佔領雕窩、蘆山及孟良崗各高地。第五一旅令一五一團以一部佔領孟良崗以西高地，搜索敵情，並掩護進出。

同日整廿五師令第四十旅以一部攻黃斗頂山、鳳凰山，備爲兩師作戰境地，協議定爲丁旺莊、官莊、西謝莊、山南頭相連之綫，線上屬七四師。

十一日晨，七四師以五一旅居左，五八旅居右，爲第一綫。第五一旅於董家峪、峴山與共方部隊遭遇，經一小時戰鬥，共方潰退。第五八旅亦僅遭遇共方零星散兵，無有接觸。惟山路崎嶇，車馬擁擠，運行困難，迄日暮，第五八旅才達代莊附近，第五一旅亦止於馮家莊附近，師部令加強搜索，準備於十二日晨依原態勢，繼續向坦埠前進。

十二日晨，繼續前進渡汾河，水淺沙陷，跋涉不易，至午始濟。至西南官莊、盤山莊，有小股共方部隊，經肅

清後，第五八旅第一七二團即向牧馬池進攻，共方不支潰退。該團乃復前推進至董家莊、窩溝、王山莊之共方陣地壓迫。共方頑強抗拒，卒於黃昏時，爲國軍佔領。

第五一旅渡汾河，由一五一團向孤山、三角山進攻。一五二團向水塘壩、黃鹿寨、楊家寨之綫進迫。與共方戰至黃昏前，均得先後克復。此時第五七旅隨師部進至唐家峪、柳行沒附近。綜計是日之戰況：

一、共方第九縱隊，仍在太衝、桃花峪、馬山。與國軍七四師對峙。

二、第一兵團先滅當前之匪，向莒縣、沂水方向進出。

三、國軍第三縱隊（張淦）以第三軍佔領苗家區、界湖間地區，向蘇村、朝陽莊、魯家莊、鳳凰山搜剿。並策應七四師作戰。

四、國軍第一縱隊（李天體）整八三師以一個旅確實控制盤龍山、大老峪、牧虎山、孟良崗高地。並向大安子莊、青陽行、團圓慢之綫搜剿。主力置於鼻子山區，準備機動。

五月十三日，七四師第五八旅向太衝、桃花峪。第五一旅向馬山、佛山之綫。第五七旅佔領艾山、李家莊、硯山等要點，掩護師側翼安全，師部推進至高家岩麓指揮作戰。

共方第九縱隊陸續增援，據險頑抗。國軍右翼第五八旅於午刻取得太衝、桃花峪仍在相持中。國軍左翼第五一旅第一五一團攻抵馬山東西之綫，共方兵力突增，砲火猛烈，該團得師部砲兵支持，遂得掩護，一舉而取得馬山。其一五二團亦以步砲協力佔領佛山。國軍既於黃昏前後，掌握太衝、馬山、佛山三要點，距目的地坦埠不過五六

共方不甘失此三地，不斷增援，向國軍反撲，澈夜劇戰，尤以馬山陣地，共方不惜以數倍兵力火力，不顧犧牲，志在奪回。至黎明，共方因傷亡過重，無法支持而被殲滅，生俘共軍五百餘人，死傷二千餘人。但據共俘供稱：「共方第一、三、四、五、八各縱隊，均已開到戰場」。而該師左右二翼之友軍，正在與共方作熾烈戰鬥。該師宜乎重行檢討戰略，報告上峯。張靈甫師長未作如是打算，當夜進兵於拂曉前抵達先羅山。

十四日，第七四師推進之後，仍按照原計劃繼續攻擊，詎發覺師行所止過於突出，情況驟變，蓋已形成四面受脅態勢。

一、「正面」：共方部隊數量增加，全力猛撲。

二、「右翼」：共方強大部隊由牧馬山、隋家店向南進犯，與國軍第十九旅之一團激戰，侵入盤龍山、荆山等處。

三、「左翼」：共方結集重兵，與國軍整廿五師在黃斗頂山、堯山激戰。共方另股沿汶河西岸南進，侵佔天馬山、覆浮山。

四、「後路」：垛莊附近，發現共方部隊，阻礙公路交通，幾瀕阻斷。

張師長報告湯司令官後，即向孟良崗附近轉進。遂以五七旅佔領汶河南岸高地，擔任掩護五八旅及五一旅就原態勢部署轉進。李運良副參謀長率師部工兵營、輜重第二營及司令部先遣人員，向垛莊西側之東長命附近紮營。

各部奉令，開始行動，第一縱之五八、五一兩旅，各以一部留置陣地以資掩護。第五七旅佔領艾山一帶高地。掩護師部轉進。九時許，共方於天馬山附近東擾黃斗頂山，其後續部隊，更向東南行動。十一時許，師工兵營、輜

重營及師部人員，進至東小峪東側，被共方襲擊。五八旅進至塘子莊、李家庄附近。五一旅進至石山坡、寶石城東側，與共方遭遇，經奮勇衝殺，始得前至賈家庄。

時在右翼之萬餘共方部隊，以一股向萬泉山東麓，以一股向馬山。左翼之共方部隊，已至石山坡、羊祥子。另共方部隊佔得天馬山、覆浮山後，亦派一股分向界牌、王家嶺、東小峪竄擾。於是國軍七四師與垛莊間之交通連絡，亦被截斷。迄午，該師五一旅於羊祥子、蔡家峪之麓與共方第五縱隊相遇，戰鬥劇烈。同時五七旅正面亦發生戰鬥。共方企圖強渡汝河，國軍用猛烈砲火阻截。但由盤山莊南犯之共方部隊，對國軍艾山陣地，用熾盛砲火攻擊。下午三時，國軍五一旅進至馮家庄，五八旅進至南官莊（孟良崗北麓），師司令部亦移至孟良崗高地。張師長欲得垛莊附近各要點，令五一、五八兩旅出擊，以衆寡懸殊，計不得就。是日下午六時，率兵團部湯司令官電令，略謂：「鍾紀軍自界湖向西，王陵雲、胡璉兩師經蒙陰向東，以找敵而予以夾擊。貴師爲全局樞軸，固守孟良崗，以一部佔領垛莊，以收戰果。」七四師張靈甫師長，因作如下之部署：

- 一、第五八旅主力佔領雕窩、蘆山、孟良崗五四〇高地。
 - 二、第五七旅佔領南官莊——劈綳市子之綫。
 - 三、第五一旅佔領焦家峪、石旺崖、馮家庄一帶。
 - 四、師工兵營、輜重第二營佔領葉家溝、楊家庄、大山場之綫。
 - 五、第五八旅一部（二個營）控置爲師預備隊。
- 入夜，中共部隊之後續部隊增加不已，向國軍陣地猛撲，澈夜不停，尤以南官莊、劈綳市子、雕窩等處，戰鬥

更形劇烈。第一七一團第一營營長湯任遠、一七〇團一營營長夏存實，暨第一、二兩連連長均壯烈殉職。至一七二團二營四連之離窩陣地，反復爭奪，旋得旋失者五次，該連士兵全部殉職。時中共部隊之另一股已開至泉橋子，全力攻擊國軍第八十三師第十九旅第五十七團據守之萬泉山陣地，平旦，國軍終至移轉於椿樹峪、橫山一帶，與七四師第五八旅取得聯系。是役中共被殲官兵二千餘，而國軍傷亡自營長以下官佐百餘名，士兵一千餘名。馬縣五百餘匹，散失於山麓，走失與消滅殆盡。

五月十五日，國軍淪失萬泉山、桃源北壩、梁莊。七四師陷於孤立，又被中共層層包圍，而又集中猛攻。張師長報請湯司令官給予空投糧彈。湯氏電復：「孟良崮必須固守，空軍即日來助，黃伯韜、李天霞兩師向東出擊，三凌雲師亦同時出擊。希望奪回萬泉山，俾可確保全局。」繼又續電：「本兵團決於梁莊東側攻敵主力，第一、三兩縱隊主力進出孤山、磊石山之間，與黃伯韜縱隊，協力解七四師之圍」。該師奉令後士氣一振，乃以孟良崮為核心，集中兵力，分守四隘。是日共方進攻澈夜不休，盧醒、周少賓二旅長負傷，官兵傷亡近七千人，共方之傷亡則加倍。

該七四師連戰四晝夜，共方可以輪流或間歇攻擊，出於主動。國軍則處於被動，傷亡既衆，即併僚屬、雜役均編隊應戰，其能行動之傷患，亦仍作戰未退。其五七、五一兩旅以糧彈俱盡，士兵愈少，不得已退守山腹。該山係巖石積體，無法構築工事，官兵以死屍作牆，以溺尿解渴。山腰嵐霧瀰漫，共方以熾烈砲火相向，石巖爆裂，片塊亂飛，守兵幾無一不受傷於石。共方藉砲火掩護，復疊擁登山，該師一面肉搏，一面退守山巔，終不稍屈。至十三時許，雖尙收到湯司令官電告，援軍前來，但援迄不至。因中共一貫戰略，為「圍點打援」。就是既被包圍，乃從

容應付，以待國軍之糧彈俱盡。同時大力打擊各路援軍，使國軍勿克前進支援，無從聯系。

當時各分守四隘之營連，均以傷亡殆盡，又以糧彈已絕，羣軍殘餘向孟良崗集中，至十九時許，孟良崗山嶺已在混戰。七四師師長張靈甫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乃與副師長蔡仁傑步出巖穴，聲言：「本師已盡最大努力，惟有捨身成仁，以報黨國」。乃從容舉槍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蔣主席萬歲；

復入指揮所內，自戕成仁。五八旅旅長盧醒，及其團長周少賓，見師長成仁，亦高呼萬歲而悲壯成仁。其他如代參謀處長劉立梓、五七旅副旅長明燦，見師長若是壯烈，而中共部隊已如潮擁至，遂舉槍手刃敵人而復自戕。孟良崗之戰，第七十四師全體官兵，至此全部犧牲。吁！烈矣哉！

檢討孟良崗失原因

一因叢山崎嶇地區，新式重裝備，無法活動以發揮威力，翻成累贅無用之物。一因孟良崗山係巖石結成體，無現代器械，不能構築防禦工事。一因中共排炮連續不斷轟擊，石巖爆裂，碎石橫飛，不傷於槍彈，多傷於石片。

一因當時共方「圍點打援」之戰略，尚未瞭知，致不能做到應援。

一因七四師當時未遵照最高統帥三角形配置，致形成孤軍突出，而有此失。

一因中共以數倍兵力，以大吃小。

然各將官均能發揚武德，壯烈成仁，固足以照耀青史，而式來茲，則斯雖敗猶能扶持國家軍人之正義正氣，爰述其大略如右。

第三章 南麻之戰

戰地形勢

南麻——爲沂蒙山區之狹長盆地，汶河、沂水、彌河交錯其間，夏秋水漲，惟青紗帳起，極利於隱蔽潛伏，四圍巖山複疊，石骨嶙峋，草木不生，構工困難，若遇炮火觸着，則石飛砂舞，震撼全山。此卽沂蒙之核心地區，尤爲該區交通之樞紐。東南經東里店而至沂水，東北出臨朐而至濰縣，西北通博山而達明水，西南越張莊而迄新泰，東毗蔣峪、馬站，西連萊蕪、泰安。凡此各路，非大路，卽公路，但已爲共方破壞。

該地區於民國卅二年，早爲共方假抗日之名，以游擊方式佔據。並設「蘇維埃山東省政府」，屯糧儲秣，號召流亡，爲久居之計。

共方部隊

民國卅六年五月，共方陳毅部被國軍迭次剿伐，重創之後，退守南麻以爲整補。並作現代梁山泊企圖！分其第二、第七縱隊以防臨沂、新泰方面。令其第十縱隊配合共方區部隊以堵泰安、濟南、萊蕪方面。以其膠東軍區之新五、新六兩師以監視濰縣。陳毅自率第一、三、六、八、九各縱隊爲機動部隊，祕密集結。然每故示移動，以眩惑國軍。另以其魯南軍區張光中部改編爲魯南縱隊，相機憑藉地形，以鑽隙對進之攻勢戰略，各個擊破國軍。

共方在該地區配置十二個縱隊約卅萬人，魯中及濱海軍區民兵約廿萬人，由陳毅統一指揮。

國軍狀況

國軍鑒於卅六年五月十六日孟良崗失利後（整七四師），於南京中央軍官訓練團另設「研究班」，召集擔任魯中戰事各級將領，研究共方戰法，檢討過去得失，及今後打仗計劃。同時變更部署：以李延年兵團配置於臨沂、湯頭、河陽地區。

歐震兵團配置於青駝寺、蒙陰間地區。

范漢傑兵團配置於蒙陰（不含）、新泰地區。

整十一師胡璉、整六四師黃國樑爲中央縱隊配置於新泰、蒙陰樂地區。

整五師邱清泉爲左縱隊，配置於顏莊、萊蕪地區。

整九師（第二旅）楊寶毅、整七五師沈澄年爲第二線兵團，控制於新泰、白馬關地區。

整四五師陳金城配置於濰縣附近。

整八師李彌，位於安邱附近。

國軍對共方沂蒙山區，已形成包圍態勢。惟陸總徐州指揮所願祝同預計共方有與其魯西、膠東部隊有連系呼應企圖，同時或將有向東西分竄之意向。乃以范漢傑部爲主力，由沂蒙山區共方軍政核心之南麻作錐形突破。

攻路南麻

卅六年（一九四七）六月廿七日，國軍范漢傑兵團由蒙陰、顏莊以雁行隊型向南麻作錐形突破。整十一師作錐形尖端，居中央；整廿五師、整五師依序向左梯次爲左翼；整六四師、六五師、九師依序向右梯次爲右翼；另以整八五師、七五師、五七師控制於萊蕪、新泰、蒙陰各附近；待機行動。進攻開始：先由整十一師藉左右梯次之掩護

，經大張莊、蒼涼峪，向南麻攻擊前進。

共方靠山高谷深，陣地堅固，戰鬥愈戰愈烈，致國軍進展迂遲，迨六月卅日夜，始攻佔永興官莊高地。翌日昧爽乘勢猛攻，國軍遂下高莊。七月二日進入南麻，俘獲甚衆。國軍分一部向悅莊掃蕩共方殘部，主力即在南麻構建工事，準備固守。此時左翼之整廿五師、整五師亦擊破當面敵人，分別進至魯村東西地區。右翼之整六四師、六五師先後進抵賈莊。

同時國軍整八師由濰縣出擊，以威脅共方側背，策應正面。該師夜行奇襲，於七月一日進佔臨朐，並擬前進，嗣悉南麻已得，向濰縣轉進。

共方陳毅於淪失南麻後，實行其「對進戰術」，即所謂：「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共方第三、第八縱隊自南麻撤出，乃北經博山會合其第十縱隊向國軍後方泰安方面流竄。陳毅則率所部第二、六、七、九各縱隊分佈於蔣峪、馬站間保持機動。

國軍爲堵截西竄共方部隊，除以十一師固守南麻外，整廿五師、六四師會攻東里店，整九師攻沂水，其餘部隊分別向泰安、黃縣各地追擊。

固守南麻

共方陳毅探得國軍西移追擊，遂回頭而圍攻南麻，集衆力以圖遂行其「大包围」、「小突破」、「以大吃小」，及「各個擊破」之戰略安排。

國軍於佔領南麻後十餘日來，防禦工事亦已竣備，嚴陣固守。共方用突擊連、以突擊、伏擊各方法流動於國軍

陣前。共方終不得逞，但死傷枕藉。

七月十九日，共方向關山及南北布東陣地猛撲，國軍沉着應付，共方卒退。

廿日晨，繼續猛攻，正在酣戰激烈，黃伯韜所指揮之整廿五師、六四師由東里店兼程增援，已進至南麻附近。而空軍得天氣晴朗之利，羣飛助戰。南麻國軍振奮異常。

廿一日晨，共方變更攻擊方向，重點指向南麻、高莊間高地，計欲截斷國軍聯絡。高莊西北側屹然無恙，惟南側共方却先向沂河南岸國軍前進據點進攻，勢甚猛烈。國軍五三團第二連浴血苦戰，而眾寡懸殊，傷亡殆盡。該連長馬千里負傷，以電話報告團長與陣地共存亡，茲際腹存十餘人，用卅餘枚手榴彈向來攻共方擲拋，馬連長與共方官兵同亡於手榴彈之陣上。該五三團失去南側屏障之高莊，該團遂陷於共方之包圍中。

至南麻南側之南馬頭嶺之國軍前進陣地，係國軍五二團第七連所駐守，共方以爲國軍必以大部防守，乃用其第十八師全師猛撲，激戰至三晝夜，終以寡不敵衆，全部陣亡。共方復乘勝前攻至一三二高地，經守軍卅三團第九連憑險固守，五三團第三營營長陸志家，率兵親臨增援，經內外夾擊，共方以傷亡甚重而退却。

南麻高莊間之北端，爲國軍一一八旅工兵營，南端爲卅一團第三營，雙方均受共方攻擊，第三營尙能支持，但抽調預備隊援工兵營。旋得本團第二營之援，始得兩面解圍。南麻交通始終確保。

廿二日，國軍各路援軍已到，共方反處於被包圍之勢，遂即於廿三日撤退。戰事遂告終結。此次戰役，頗得國軍空軍支助，否則前攻後守，均不得若是成果也。

第四章 山東與東北兩戰場之呼應

民卅六年（一九四七），國軍對東北與山東兩戰場，係採取主動之攻勢方略，此可舉前篇——孟良崗——南麻二戰例，以證明之。

按孟良崗——南麻，同在山東省境內之沂蒙山區；而時期又均在是年夏秋之交，先後相距，僅月餘耳，皆由國軍以主動而進行決戰，故雖失之於孟良崗，但終能收之於南麻。南麻——固共黨之僞「蘇維埃山東省政府」之神經中樞也，茲掃穴犁庭其僭竊山樂，打擊其戰鬥意志，是不啻與克復延安之意義，同其作用。因此國軍得乘勢而收復煙臺。

煙臺既已收復，與東北戰場，隔一渤海，而呼吸相通，遙相聯系。更無形中阻斷中共運輸之重要路線。而東北戰場，國軍方解長春之圍，得四平街之大捷，於是會師於吉長鐵路。剿共軍事，已見功效。

觀於孟良崗、南麻之戰，國軍士氣之激昂旺盛，其效命疆場，誓死克敵之精神，充份保持我國傳統之正義浩氣，況復陸、空二軍又能通力合作。而東北戰場又一樣而獲得輝煌戰果。假使美國於此時能維持其軍經援助源源不斷，相信剿共軍事，定能奏功。

按「毛澤東選集」（四卷一二四九——六〇）其綜述一九四七年形勢文中指出：「國軍力量薄弱，及其心理恐慌，和喪失信心……」「共軍在各戰場，陸續由防禦而轉入進攻」等紀錄，顯見其爲顛倒誇大之宣傳！試一徵之於美國對華「白皮書」之記載，足證毛酋之言爲不足取信。「白皮書」對於評論與見解，難免偏執乖謬，但其各項報

告文件，則據實騰錄。其述民國卅六（一九四七）年山東軍事趨勢，有云：

「中共軍大量吸收青壯少年及民兵，因此在數量上，愈聚愈衆。尤以在東北，更取得地下與北韓游擊隊之結合。」又云：

「是年國軍，一舉而攻克延安。山東戰場之大部份，業爲國軍佔領，且既克復煙臺。在山東之共軍，遂用流竄方法，向南越臨海線，出之以滲透之方式，而非大規模之運動，擾亂於長江以北。察其意向，中共似已預知國軍之企圖與實力。抑亦深知國軍不欲放棄陣地戰，其戰線必將無限延長。且政府必須維持其威望，將不致撤退，或結集其兵力。中共遂到處奔流，隨地竄擾，更出沒於津浦、膠濟、隴海、平漢各鐵路沿線，截斷交通，各路均被分隔至數段之多，遂至華北交通運輸，形成分段行車，無由暢通，致國軍忙於維護鐵路，南段方通，則北段又遭阻塞；東段始通，則西段復遭截斷；中共軍零散忽又變爲集中，集中忽又變爲零散；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大規模之攻勢，或圍剿而殲滅之。」

依據上述美國人對中共之紀錄，則毛澤東所指國軍之「力薄」、「心慌」、「失信心」等語；無非欲貶損國軍，以誇揚共軍。毛曾指出「中共在民卅六年（一九四七）轉入進取攻勢」；可見非中共之取攻勢，實係中共之流竄擾亂；茲特辨而明之，以瞭解其當日之實際情況，使毋爲毛澤東選集之言之所惑。

至論是年東北情勢，在夏秋以前，共軍失利，亦不過在瀋陽、榆關間之流竄，阻截交通而已！惟國軍在東北設有行轅，主任熊式輝與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政見未能協調一致。或謂：一主外交接收，一主軍事措施。雖私人情感保持和洽無間，然而在同一方面，兩長官見解紛歧，政策發生矛盾，當此赤禍瀰漫，究非國家之福。國

府調參謀總長陳誠，以爲之繼，使熊、杜二氏之裂瀝，得以彌縫，在當日固爲一賢明之措置也。

陳誠於是年九月一日任東北行轅主任，邀楚溪春偕行以爲佐。楚氏出身保定軍校第一期，曾任該校第八期隊長，而陳氏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八期，故與楚氏之交誼，爲介於師友之間。楚氏爲堅守大同名將，時聞錫山以電激勵楚溪春，只云：「只許成功，不許成仁，援軍即到。錫山」。楚氏不獨能恪盡厥職，堅守不渝，及援軍一至，翻能擊敗圍攻共軍，共軍潰奔，遂轉攻豐鎮。時國軍爲傳作義部，共軍集其主力於卓資山，雙方苦戰，精銳盡聚於此，突見國軍國旗飄揚卓資山之最高頂峯，共軍以爲國軍已佔領此一戰場要地，於是共軍倉卒潰退，潰湧如潮，無可阻遏。其實此一國軍軍旗，係國軍某一排長，登山觀地形所豎立，初不料中共一見而驚惶失措至如此也。因此引起駐守張家口之共軍，亦急遽而自大同退豐鎮，退卓資山之潰兵合而撤出張家口。迨國軍到達，已聞無共軍一兵一卒，國軍始行進駐張家口。其時馬歇爾調停，偏聽中共，妄指國軍攻佔張家口一面之詞，堅迫國軍撤出，即指此也。此亦因楚溪春保衛大同而連帶所見之成果也。

最高當局以楚溪春保衛大同，頗著功績，因即召見，面予嘉獎以示優異。陳誠乃留楚氏駐京，任中央軍官訓練團副教育長。故陳氏赴東北，視楚溪春如左右手。任楚氏爲東北行轅總參議，兼瀋陽城防司令。接事之初，首先裁撤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一職，而將其作業與職權，歸併於行轅，調杜聿明與鄭洞國任行轅副主任（時杜聿明就醫於北平協和醫院）。於是，東北九省之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均集中於東北行轅，統一指揮。東北氣象，爲之一新，國軍士氣，爲之一振。蓋東北共黨之長成，早在熊、杜二氏任內，至陳氏接任之際，共黨滲透整個東北，已如遍體癰毒，潰爛全身。其尤甚者，行轅以下各機關，被共黨幹部滲透於其間者，竟達五百餘人之多。若非當日楚

漢春任城防司令於視事之初，即行澈底查究，嚴予法辦，恐東北之失，更爲提早。緣楚氏追隨閻錫山日久，其於反共方法，別有心得，故陳氏下車伊始，在政治鬥爭上，首先獲得勝利，則亦楚漢春襄贊之力也。

陳氏爲中央第一大員，甫自參謀總長調任，其調兵遣將，幅度較廣，主持東北，頗爲適合。惟其時國家情勢，處在外交孤立，經濟危機，政治過渡，（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惡劣環境下。而東北中共，則在蘇俄羽翼之下，獲得日軍放下之武器，以誘惑威脅而收編偽滿軍隊及地方團隊，中共初到東北用青天白日國旗及國軍軍旗，地方民兵及偽滿部隊，誤認以爲國軍，率先歸附。而偽滿軍隊在俄共指示下受其改編。迨後各該部隊，知係共產黨，逃亡者有之，離散者有之。中共從此在東北長成而生根矣。當熊式輝任行轅主任時，關於收編東北偽滿軍隊及地方團隊一事，未經儘速爭取，其或格於財力之不足，或因勢力之所不及，或被牽制於俄共之阻撓，亦未可知？但吾聞曾任事於東北者之言，謂：「熊氏原有此腹案，以免反受共產黨所利用。因其返重慶述職時，頗多流言，冠熊氏以『東北王』頭銜，熊氏恐因此而生中樞之疑而不諒，故對編組偽滿軍隊及收編民兵游擊隊之議，未敢上陳。」云云，此或亦出於中共及同路人之中傷，致熊氏不敢提出建議。此爲共黨一貫之冷戰手法，熊氏難免墜其術中耳！倘使此時能立予執行，以東北各種部隊嚮心於中央，未嘗不可以挽回危局。迨陳氏接任，雖爲時已晚，而東北中人以爲尙有可爲，建議於陳氏，或可渙散中共已經收編之土著官兵。奈限於預算中未列此一項目，終未實施。而此時瀋陽——榆關間之北寧路線，時被中共破壞，同時感於兵力之不足，陳氏即調王鐵漢軍及侯鏡如兵團出榆關，進入東北。按毛澤東之南滿基地計劃，指榆關至瀋陽一帶，以其新編之所謂：「民主聯軍」佈於北寧鐵路沿線。有所謂：「讓出大路，分佈兩廂」之戰略。（已詳前篇——東北之接收）故該鐵路時被截斷，尤以是年八月十五日開始爲烈

。王鐵漢部在前（一個軍），侯鏡如兵團（時任天津警備司令）在後，正在運輸途中，突遇共軍截擊，王部起而與抗，共軍佯敗，急退百餘里，王氏還自以爲共軍脆弱，不堪一擊。似有趾高氣揚，未免疏於防備。詎料，翌夕共軍大部以數倍之衆傾巢猝至，國軍不及交鋒，遂被切爲數段，分別圍攻，各個擊破，終至全軍無法保全。後派王鐵漢爲遼寧省主席。

陳誠氏出任東北行轅，自卅六年九月一日至翌年二月衛立煌繼任時，爲時僅四個月半之時間耳。三十七年春初，陳氏因積勞病重，體力不堪支持，故不得不南下赴滬就醫於國防醫學院。

十月卅一日，國軍會師於公主嶺，與十一月一日即會師於長春、四平街，而被圍十八日之永吉亦經克復。當日國軍在東北之劣勢，實已扭轉。同時隔一渤海之山東境內之津浦鐵路——自濟南至浦口段，亦恢復通車，現呼應相通之象。惟突於十二月十五日，共軍又引起遼西走廊之第七次大規模總攻，戰事瀕非常緊急之勢。而瀋陽外圍亦於十二月十九日發生激戰，戰至廿五日，始獲傳作義部空運瀋陽到援，才得擊退。

吾人觀於陳氏主持東北，雖在短暫時間，裁撤各區保安司令，蓋在熊天翼任內，原計劃成立若干區保安司令，每司令轄保安團三團，終因無養保安隊經費，遂爾中途擱淺，但保安司令人選已發表，陳以此爲空頭無兵司令，故予裁撤。黜陳明仁於行陣，全軍皆震懼。擊退共軍第七次攻勢，東北粗安。其雷厲風行，實所得多而所失少。楚氏襄佐之功，亦有足述。而毛澤東選集，但言共軍如何取勝，誇大其詞，此種宣傳，美國——對華白皮書——早有陳述，深望世之論事者不爲所蔽云。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一月十七日，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卸職，衛立煌繼任。同時設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奉

由衛氏兼任。二月一日，最高統帥電令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厚岬因馳援瀋陽（民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而扭轉戰局之魯英驤、李銘鼎二將軍家屬，並獎勵有功將士。」而東北剿總，亦於是日正式辦公。詎至二月九日，因共軍第七次之猛力攻勢，致遼陽陷落，東北形勢，益趨緊張。時東北元老莫德惠，任國民政府委員，向最高統帥建議：「起用東北耆宿名將，組織東北地方廣大武力。」同月廿一日，東北共軍突襲鞍山，以十倍之衆，盡擁包圍，國軍被逼撤離。

第五章 西北宜川之戰

東北形勢，既若是不利。華中方面，雖收復漯河，蘭封解圍。而西北方面（豫東），因國軍固守延安，無懈可擊。共軍流徙於外國親伺，遂於卅七年二月廿四日，發動宜川地區之攻勢。此一進攻，關係於西北整箇局勢，特爲專文以述其始末：

民國卅七年春初，共方以失去延安，發動「春季攻勢」，冀圖奪回其政治中心。知國軍於延安守備堅強，不易攻取，以延安之外圍宜川，物資充盛，而守軍單薄，遂有先便宜川之計。共方用其一貫之——「先圍其點、繼打來援」——戰略，於是慘烈戰鬥之序幕，復啓於宜川。

宜川，爲延安府屬，東帶黃河，西望洛水，南接西峙山區，北毗陝北盆地，其地形勢，向爲古來之戰場。尤以宜川西面之王家灣附近，叢山複疊，登高縱橫，爲行軍困難之處。

作戰前兩軍之態勢

卅七年二月中旬，共方軍事部署如下：

彭德懷部——第一縱隊張宗遜部獨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第三縱隊許光遠部野戰第二、五兩旅。第六縱隊羅元發部新四旅、教導旅，共約四萬餘人。踞於米脂、綏德、延川附近一帶。

其第四縱隊王世泰部游擊第一、第三及騎兵第六等合三個旅，約一萬四千衆。踞於保安、安塞附近一帶。其直屬之新一、新二兩旅，約八千餘衆，踞於延安東南地區。

其在晉南之第二縱隊王震部三五九旅、獨立第四旅、教導第六旅，約萬餘衆，踞吉縣附近。彭德懷之司令部設於米脂、綏德間。

國軍方面

- 一、整十七師何文鼎部守備延安。
- 二、整十七師廿四旅張漢初部守備宜川。
- 三、整廿四旅七二團駐守韓城。
- 四、整廿七師王應尊率卅一、四七兩旅駐守郃縣、洛川一帶。
- 五、整九十師嚴明率五三、六一兩旅駐守中部黃陵。
- 六、整廿九軍軍部駐洛川。軍長劉勘負責整廿七、九十兩師之整訓。

戰鬥開始

卅七年（一九四八）二月廿四日，共方彭德懷部第一、三、六各縱隊計四萬餘人，將宜川包圍。國軍整廿四旅僅一部兵力困守宜川，其餘兩團主力本駐守韓城，乃移於宜川郊外，與共方對抗。是日十七時國軍二十九軍開始向宜川以西舊縣地區集結，軍部即設於舊縣，以九十師位置於舊縣，而以廿七師把守舊縣郊東北。廿五日共方進攻宜川，激戰數日不停。是夜國軍廿七師四七旅一四〇團之第三營向宜川西北方之觀亭方面搜索，遭遇共方千餘人伏擊。該營即憑一小山咀與共方激戰，營長陣亡。最後殘餘一連，該連長三亡三補，血戰竟夜，終至一卒無存。

國軍馳援宜川，奈宜川城郊守軍已不支，退入城垣，繼續抵抗，勢甚危殆。旋共方探悉國軍將從觀亭東來，顧慮

，遂移其主力於龍泉鎮（宜川觀亭間要衝）公路南側，不獨阻遏國軍前進，且欲拼力打擊，此實行其「圍點打援」之故技。此廿六日事也。是夜國軍依照原定計劃赴援宜川，經紅樹梁，曾遇幾次阻撓性之小接觸，及抵達端盤，正擬宿營，經派隊搜索，獲悉共方有萬餘人集結於龍泉鎮、金盆灣地區，其指揮部似在觀亭。劉勦軍長得報後，深慮如果仍照原議向宜洛公路進發，頗有受北側敵軍埋伏突擊之可能，乃改變向東北前行。巨耐砲兵、車輛對該線狹窄路程，無法通過，不得不直衝宜洛公路以赴宜川。詎知共方「但求困點，重在打援」，宜川城垣守軍，反得鬆弛。

廿七日晨另在晉南禹門口之共方第二縱隊王震部，已暗渡黃河，迫近石村、高家灣（距宜川廿里）。同時在金盆灣、觀亭一帶之共方部隊，亦既佔領宜洛公路北側之險要山脊。國軍應援部隊，寸步阻截，小戰小鬥，形同沿途受到擾撓，於夜才進至瓦子街西之張顯地方宿營。

廿八日早，共方王世泰部主力萬餘人，由保安方面疾馳東來，而國軍爲赴援前進計，不得不向瓦子街攻擊，初時猛力抵抗，忽然急行却退，國軍見而追擊，共方始竄入左側山地。此時劉勦軍長發覺當面形勢，有急切變化，因另作打算，重行部署。是日戰況如次：

國軍整廿七師方面：在宜洛公路東進之四七旅於左側山脊，遭遇伏擊，傷亡慘重。已撤至南面山脊，勢難支持。其卅一旅亦中伏兵，傷亡頗大，亟需整補，無法前進。

國軍整九十師方面：在宜洛公路右側主要山脊上攻擊前進之六一旅，稍有進展，但共方抗禦較猛。

迄至十七時，整廿七師之卅一、四七兩旅不獨進攻無功，且受重大傷亡。而共方更番向卅一、四七兩旅猛攻，該旅已呈被迫續行南退之勢。整九十師六一旅得南翼山脊傾斜地形之利，第一線已進至高家灣，宜川城之槍砲聲清

嘶可聞。同時四七旅之北正面受共方壓迫，其後方交通線將被切斷。而共方又新增其新一、新二兩旅八千餘人之生力部隊，國軍受壓，愈形嚴重。況天寒飛雪，道路泥濘，重砲車輛，無法登山。國軍此時，唯有與共方作一決戰，方能達解宜川被圍之目的。

入夜，共方將宜洛公路要點瓦子街攻陷，國軍後方交通線被切斷，一切補給運輸遂告斷絕。廿七師二個旅正奮勇與共方戰鬥，冀奪回左側主要山脊，卒因共方以人海戰術反撲，國軍只得仍守原陣地。六一旅與共方逐山爭奪，限於仰攻，終能佔領王家灣南方主要山脊。五三旅則在王家灣以西與共方相持中。至於空軍更因天氣惡劣，朔風舞雪，視界不明，不能盡偵察效能，雖時有轟炸，但共方損失不大。

廿九日上午，王家灣附近各處制高點，大半爲共方攻佔。王家灣西側形勢逆轉，下午共方發動全面攻勢，如潮水洶湧。國軍四七旅旅長李達少將手持步槍，裝上刺刀，腰繫手榴彈，陣前督戰。忽然彈中胸部，臨死猶對部屬謂：「總統的教訓，我已做到了，兄弟們——你們再幹罷！」卅一旅旅長周由之少將亟起高呼：「替李旅長復仇，替國家滅匪。」繼取腰間酒瓶痛飲，乃從容取日記簿而題，曰：「領袖至仁，居友唯義，爲國盡忠，死何擇地」。題畢，手持卡賓槍，繫手榴彈，卸下濕透之雨衣，於風雪中督戰。

是夜共方以人海作戰，國軍四七旅，兩陣已近咫尺。卅一旅受兩面夾擊，周由之旅長於砲彈閃光下，見共方已裝上刺刀，乃即高呼：「弟兄們——跟我衝出去」。肉搏衝殺之後，共方始休。但未及一時，共方又以人海猛撲，卅一旅卒不能支，周旅長中彈陣亡。

同一時間，九十師六一旅陣地，東、南兩面受襲。五三旅亦遭共方迂迴襲擊。國軍在公路兩側之驛馬驛重，損

失頗大，而陣地亦愈縮愈小。劉勛軍長欲與西安綏署通話，因風雪故障不通，急以電告戰情。綏署立派魯崇義兵團北上赴援，並由空投糧彈補充。

三月一日，共方由晉南渡河之王震部已至王家灣，與共方第二、四縱隊合圍，向國軍六一旅猛攻，戰至肉搏，陣地卒被共方攻佔。共方即直撲國軍九十師司令部，師長嚴明，親率特務營抵抗。後雖得五三旅支援，嚴師長身中五彈，猶臥地指揮，不肯後退。劉師長即派參謀長劉振世用擔架救回，惟尙能作書致綏署胡宗南將軍。書至「決以身報國」，力不能支側臥，一衛士取毛毡欲蓋其身，嚴師長一伸手就取得衛士手榴彈，李副官欲攔手奪取，嚴師長已砰然一擊，三人同時殉國。師部陷落，五三旅亦受攻擊。此時國軍九十師之六一旅已無兵卒，僅餘五三旅之剩餘隊伍，在王家灣西南兩面作戰。

廿七師之四七、卅一兩旅浴血戰鬥，戰力實已耗盡。劉軍長召集官兵會議於土堡。劉軍長講至：「領袖不是早就告訴我們——我們今天就是要爲繼起的生命創造出生命的意義」：繼謂：「各位有什麼要說的，請盡情對我來說」，其部屬即同聲一詞：「我們要打到底！殺盡共匪！軍長到那裏，我們到那裏」。正在斯時，土堡南面，近軍直屬部隊陡起喧聲，劉軍長即令集合之官兵百餘人散開，臥於陣前，首先發槍，於是槍聲齊作。而共方直向土堡仰攻，立即殲敵數十人。

該土堡——位於王家灣西側附近山坡上，地勢較高，堡下爲公路，其後有小坪，坪上有礮石，後有青松六株，冰雪壅封，具凜厲貞潔之氣，坪後似有徑通大山，已被雪蓋不見，劉軍長槍聲起處，敵必應聲而倒。奈西南面共方攻勢突然加劇，劉氏始知五三旅方面已生變化，情況嚴重。而堡下公路，共方部隊蓋湧而至。堡上國軍官兵百餘人

但憑手榴彈、刺刀以殲殺仰攻之敵。劉氏雖欲令五三旅不必保護軍部，速向右南面，逆襲公路；怎知電話失靈，堡上同志，倖存無幾。是時劉戡軍長急轉入土堡後小坪，取出日記簿，及軍人手牒，豎起領袖肖像於石上之雪塊，整衣冠，向像肅立，三鞠躬，默念移時，即命侍從「請參謀長、王師長、李副師長。」詎衛士一轉身，去未數步，劉氏用二枚手榴彈同時爆炸，砰然巨響，血肉滿地。蓋具軍人殺身成仁之精神，時三十七年三月一日下午三時也。當斯霎那，堡上國軍官兵，僅餘十三人，而共方仰攻益烈。彼等將所餘手榴彈，盡數向來攻敵人拋擲，共方死傷甚衆。而此十三人各持一步槍一刺刀，向劉軍長屍前環跪，似有所禱。適整廿七師兩旅陣地以衆寡懸殊，共方輒用「以多吃少，以大吃小」方法被其攻破，於是衝上土堡，賸餘之十三人全行自殺，吁！誠烈矣哉！

然而整五三旅仍在宜洛公路西側與共方激戰，以傷殘之餘，當數十倍之衆，彈盡援絕，卒至潰敗。鄧宏儀旅長重傷失踪，副旅長韓指鉞陣亡。賸餘一五九團殘存，轉移於附近一高地。

先是，第一五七團除一營留守洛川、舊縣間擔任守備外，餘二營則隨軍。該駐洛、舊之一營，奉命參加於一五九團作戰，該營於被困時向南突圍至此王家灣、瓦子街之應援宜川軍隊，援未應而先受殲，戰鬥亦告終止。

共方既達到「打援」目的，於是進而往圍宜川（圍點）。三月二日，雙方竟日激戰，駐守宜川城之國軍，本不足兩團，夜十二時，共方以兩旅壓倒優勢之數倍兵力，攻入城內。國軍抵抗與之逐屋爭奪，屍骸塞於巷衢，三月三日晨國軍全部壯烈犧牲。宜川亦告陷落。

依據共方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二八九頁稱「這次我們『西北解放軍』突然包圍宜川『敵軍』一個旅，（按即國軍整廿四旅張漢初部）胡宗南令其廿九軍長劉戡馳援，當到達宜川西南地帶，自二月廿九日至三月一日，全部被

我殲滅。劉戡本人及其師長嚴明等人亦被擊斃。接着於三日攻入宜川，殲守敵五千餘人。此役在西北戰場上是一個大勝仗。」又云：

「繼此而後，『西北野戰軍』於四月十二日發動西府、西安以西、涇渭二河之間，臨東之戰，挺進涇水渭水間廣大地區，截斷西蘭公路，並且於四月廿二日收復延安」。勝利者的誇大，果如是其甚耶？

第六章 民卅七年春季後之軍事形勢

吾人追述剿共戰事，覺卅七年上半年，尙能保持主動，政治爲高潮，下半年軍事入於低潮。綜論事績，宜先明瞭中共方面之軍事佈置與部署，究爲如何？茲依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二九三——一三〇一頁所稱：（自民卅六年七月至翌年三月止）

甲：劉伯承——鄧小平之「晉冀魯豫野戰軍」七個縱隊，自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秋起，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建立——鄂豫——皖西——桐柏——江漢等根據地。

乙：陳毅——粟裕之「華東野戰軍」八個縱隊，打擊國軍在山東重點進攻之後，即挺進魯省西南，與豫皖蘇之三角邊區，孤立國軍之戰略要點——開封——鄭州。

丙：陳庚——謝富治之「太岳兵團」二個縱隊又一個軍，由晉南強渡黃河，挺進豫西。建立豫陝鄂——陝南根據地。以孤立國軍之重點洛陽，威逼潼關。

丁：林彪——羅榮桓之「東北野戰軍」十個縱隊又十二個獨立師，自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民國卅七年三月十五日在東北四平街——大石橋——中長鐵路沿線，又自山海關——瀋陽——北寧鐵路沿線，發動空前規模的冬季攻勢（指第七次攻勢），連續作戰九十天，攻佔國軍堅強設防之戰略要點——四平街及其他城市十八座。營口國軍一師叛變來投。吉林國軍棄城退向長春。因此國軍在東北之佔領地區，喪失面積百分之一。長春——瀋陽——錦州——途均陷於孤立。

戊：聶榮臻之「晉察冀野戰軍」五個縱隊，於民國卅六（一九四七年）九月初至十一月中，先後攻佔——大清河以北地區——清風店地區——石家莊，使「晉察冀野戰軍」與「晉冀魯豫野戰軍」之佔領地帶相連接。

在上述同一時間，「華東野戰軍」由許世友——譚震林率隊進行「膠東戰役」，攻復十餘城市，山東整個局面，被共方扭轉。

同時蘇北方面，「華東野戰軍」進行鹽城——李家堡戰役，佔領蘇北廣大地區。

己：民國卅六年十二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徐向前率部，會合「西北野戰軍」一部，攻佔運城，山西省西南地區，已無國軍。於是國軍駐守之臨汾，陷於孤立。

庚：彭德懷——賀龍——習仲勳之「西北野戰軍」在民國卅六年夏，參加陝北作戰之主力部隊，爲兩個縱隊又二個旅。至民國卅七年春，參加陝北作戰（指宜川）之主力部隊增加爲五個縱隊，發動西府（西安以西涇渭二河之間）隴東之戰，截斷西蘭公路。

按上述毛澤東之紀錄，可見東北、華中、西北、及山東、蘇北等地，幾爲中共蹂躪追逼。尤以隨處流竄，忽進忽出，旋來旋去，致國軍大部份部隊，爲其吸住。而交通阻斷，變爲各個孤立。於是國府政治民主雖達高潮，而剿共軍事則趨於低潮。亦即共軍軍事，由劣勢而扭轉爲優勢。但究其所以演變而成此局勢？毛澤東何以能將軍事作其如上述之安排？追根窮源，其所以釀成之因素？厥爲中美兩國，不於抗日時，又不於勝利時作「聯盟五十年」之先著。此其一。美國「親俄疏華」政策中之「長期計劃」爭取俄共。此其二。美國所承擔國府之軍經援助，斷不給予。此其三。調停國共，強使組織聯合政府。此其四。蘇俄盡力扶植中共，使其長成生根於東北。此其五。馬歇爾堅

持發布停戰令，組設軍調小組，此其六。凡斯皆受美、俄兩國之影響者也。

至於華中、華東、華北、西北，中共既如狼奔豕突、隨地流竄，而東北之中共既已根深蒂固，則當日國軍，僅有兩途，可資抉擇：

一、儘量「大增援」，或起用地方武力，以圖因並擊滅東北之共軍。

二、先自作有部署之全部自東北「大撤退」，以保持實力而別圖於關內肅清共軍。

按美國「白皮書」中，雖曾提及。假使美國能將允諾於前之經援，照數撥付，則大增援兵，或起用地方武力，固屬易於辦到。又假使將協定之軍援運來，裝備彈藥俱全，則國軍手中所持之武器，何至於可觀而不能用，形同玩具也哉！則又焉用其全部撤退也哉！

若論東北大撤退問題：

先是民卅六年七月廿二日美魏德邁將軍以杜魯門特使來華，鑒於東北局勢，曾向我最高當局建議：「撤退東北國軍」；至九月十九日魏德邁回美，致其「訪華報告書」於其總統杜魯門，報告書內容未經發表，只聞魏德邁之建議爲：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托管」。（按第二次大戰結束，我國已躋五強之列！東北爲中國領土之一部，斷不能把自己國土，而委人托管。何況東北爲中國國脈所系！無東北，卽無華北；無華北，則中國半壁被削，門戶自開，藩籬自撤。不特顯背憲法，抑爲全國人民所不許。故此項建議，雖出諸外國人之口，而我中國斷乎其不可行。蓋有違中國傳統之立國精神也。）杜魯門接此建議，與國務卿馬歇爾磋商，結果：未被接納而擱置，且祕不宣布。據「杜魯門回憶錄」所記載謂：「魏德邁之建議，因馬歇爾國務卿之反對。馬氏認爲前者——五強監護東北

——之建議，不僅將受國共兩黨之反對，即蘇聯亦爲反對。至於後者——由「聯合國託管」——會把聯合國拖垮。馬歇爾又以爲此種「共管」與「托管」，必須有一個國家負起主要任務，如戰後盟國之對日本亦然，實際上是美國單獨負責，如果實施魏德邁之主張，主要責任必要落到美國身上，美國不願負此仔肩。」此即杜魯門不採取魏德邁建議之理由與真因。然而魏德邁「報告書」中，其結論却有很切要之警告：

「聯合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以制止中國東北之戰事，以免東北成爲蘇聯之「衛星國」。因此，建議：「中、美、英、蘇、法五強，在聯合國名義下共管東北。假使，蘇俄拒絕參加，應由大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組織一個「托管委員會」。倘若不立即採此行動，不管美國如何援助中國，東北疆域，終將落入於蘇聯之版圖；中國將永遠失去其國土——東北。」云云。

語雖中肯而又具警惕性，無奈杜魯門偏聽馬歇爾不願擔承東北方面之共管或托管責任，致錯鑄成今日之局面，同時吾人始瞭解魏氏勸中國大撤退之建議，實爲其回國建議——共管，托管之張本。

但魏德邁將軍在美國所發表對華政策之意見及在美國參議院作證，則謂：「願請美國政府應即援助中國國民政府，支持蔣主席之領導政府」。此先後於卅六年（一九四七）十月十六日又十二月十七日之言也。惟至卅七年夏初，東北局勢，益趨低潮，遼陽、鞍山、四平街等重要據點，相繼淪失，國府對上年魏德邁之建議，乃提出重予檢討，故於卅七年五月五日，始有「辰微」大撤退之電令，到達東北。

初，衛立煌於抗日勝利，挈其新婚未久之夫人韓樞華出國考察。當陳誠出掌東北，病體加劇，堅辭就醫之際，衛氏業已回國，最高統帥命承乏陳誠，衛氏請辭，令諭勉爲其難。當時衛氏親友有阻其行者。衛夫人固出身爲某大

學校花，頗富學識，以爲衛氏在外國考察。既有心得，自宣布其所長，爲國效力，何可畏縮，況復最高統帥之識拔，當亦應感恩知遇，鼓勵其夫毅然赴東北，其抱負似甚豪也。及自二月一日成立東北剿總，軍事處於逆勢，未能施展其材，迭請辭職。迨「辰微大撤退」之電令到後，衛氏深感——「既定撤退，何必定需本人」，乃召集軍事會議。廖耀湘以次，僉以：「無東北即無華北，無華北即無中國」，一致主張請中央收回成命，並公推趙家驤爲代表，赴京向最高統帥陳明。會議業已決定，最後，趙家驤起立發言，謂：「承諸公見愛，咸推家驤前往請願，義不能辭，惟自維份量不够，無論在官邸，在國防部、參謀本部，關係均屬欠深，應請各位，另選有較適當之人物，前往陳訴，庶免貽誤。」云云：於是大家又公推廖耀湘，及另一某將領，增爲三人同行，當即起程。

最高統帥對於上年魏德邁所建議：原以爲係消極而非積極，係中策而非上策，當令出之後，其耿耿於心中者未嘗釋然，經趙家驤、廖耀湘等之陳訴，與評衡東北目前局勢，及國軍實力之估量，而戰地將領抱此滅共決心。復有參預謀略者之相互探討，故撤銷前令，作再接再勵之計。

而當時國民政府之政治動態：一、中華民國憲法——早於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命令公佈施行。卅七年二月十三日，國府委員莫德惠向最高統帥建議起用東北舊宿名將，組織地方廣大武力。同月廿九日東北代表向國府請願——勿放棄東北。三月廿九日，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四月十九日，選舉蔣中正爲總統。四月廿九日，選舉李宗仁爲副總統。四月卅日，通過全國動員戡亂案。五月十八日，行憲後民選之立法委員，選舉孫科、陳立夫爲正副議長，正式開始立法院會議。五月二十日，蔣總統就職。由此以觀，則國民政府之政治，方始結束訓政，實行民主憲政，此爲中國五千年以來之歷史，揭開最輝煌之一頁。故政治雖達高潮，惜軍事處於低潮，其趨低潮之原因，總而言之，

被美國政策錯誤所影響者至鉅。而我國軍各地將領，或有輕敵之心，而乏哀兵之氣，亦一失也。

然而自「辰徽大撤退」之成命收回，則國軍所可行之路，惟有「大增援」，「增援之方法，無法展開，而國軍爲挽回此軍事低潮，於六月十四日，遂向共軍作「白旗寨」之攻擊，激戰至六月十九日，國軍該時雖未得增援，竟能於低潮趨勢之下，得成就輝煌之戰果，是不可以不紀也。

第七章 東北白旗寨之戰

戰地形勢與軍情

白旗寨爲東北撫順鐵區之外圍要地。位於撫順之東，營盤之正北，與鷄冠山、黃旗寨形成鼎足。而白旗寨尤足以控撫順及營盤往李家臺之衝道，居犄角之衝，處重山之中，頗爲共方游擊部隊潛伏之佳處。

誠以撫順鐵區必須保守，則白旗寨更爲保守撫順必需之點。不特此也！撫順東經營盤至於海龍，西達瀋陽，北通鐵嶺，南達本溪。（本溪爲共方「南滿軍區」根據地）。撫順崇山環繞，地勢險要，不獨屏障瀋陽，且爲東北九省之政治、經濟、軍事之重要地區。該地河流交汊，除渾河外，其他均係淺灘激澗，概可步涉以過，不必舟楫以渡也。

民卅七年（一九四八）春，共方林彪部隊在東北經過第七次攻勢後。國軍東北行轅，令第六軍集結撫順整訓。而共方部隊，不時向營盤、關門山等外圍竄擾，陰圖伺機猛攻。國軍第六軍於是年六月十四日，令二〇七師組織一混合戰鬥團，準備向共方在白旗寨之獨立第一師主動進攻。

先是共方對東北九省，分爲四個軍事根據地。

所謂「東滿根據地」：指中長路瀋陽至長春線以東之吉林、西安、安圖、延吉、敦化等地區。

所謂「北滿根據地」：指哈爾濱、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區。

所謂「西滿根據地」：指中長路瀋陽至長春線以西之齊齊哈爾、洮安、開魯、阜新、鄭家屯、扶餘等地區。

所謂「南滿根據地」：指中長路瀋陽至大連以東之安東、莊河、通化、臨江、清原及瀋陽西南之遼中地區。

由於毛澤東之如此布置其部隊，故共方於卅七年春季解凍，開始紛向國軍主要陣地——瀋陽、長春、錦州作騷擾性之蠢動，移其主力於遼北地區整補。共方爲實行其堅持「南滿鬥爭」，其第七縱隊、十二縱隊、獨立第三師，分別進擾佔據通化、興賓、五龍口、運山關。其東北方有獨立第一師盤踞黃旗寨、白旗寨山谷中，不時向營盤、關門口出擊國軍。此共方當日軍事情勢也。

至於國軍方面：第一九五師駐於瀋陽。第二〇七師（轄第一、二、三各旅）駐撫順。該師另以一部兵力擔任二伙落、東社、小東洲、營盤等各外圍據點之守備。

國軍作戰準備

駐守撫順正在整訓之第六軍軍長羅友倫，以共方獨立第一師盤據白旗寨，頗不利於瀋陽與撫順。乃派二〇七師第二旅旅長王啓瑞爲指揮官，中該師選調四個步兵團，及所需之支援部隊，編組爲進剿部隊。並作如下之指示：

一、進剿部隊官兵，應本生死與共之精神，互信互助，毋負領袖之所望。

二、進剿應以周到準備，祕匿行動，收奇襲之效。

三、爲使祕匿不露，該師應在撫順舉辦一大規模之軍技競賽運動，以掩蔽作戰準備。

四、王旅長應准予病假二周，揚言「赴瀋醫療」，即着王旅長赴下哈達隱居。旅長職務交由副旅長周中峯代理。撫順城防司令職務，由副旅長楊龍潛代理。

五、進剿任務完成後，迅速脫離戰場，保持主動，準備爾後任務。

六、包圍匪軍時，應集中兵力火力，殲滅匪軍。

七、對投誠或俘獲之匪軍，應予優待。

八、凡退逃出匪區民衆，應助其脫險。

九、匪偽政權應予摧毀，匪方公糧分配民衆。

十、作戰事宜由王旅長獨斷執行。

其進剿部隊之任務與行動，分爲總隊及中左右三支隊，其分配如次：

甲、右支隊：步兵第一團自營盤出發，沿高麗營向白旗寨攻擊前進。

乙、中央支隊：步兵第二團、步兵第五團及支援部隊自下章溝沿下哈達、關門山向白旗寨攻擊前進。

丙、左支隊：步兵第四團自撫順沿西哈達、年馬洲、古唐勾、葉爾星向雞冠山急進。

丁、突擊總隊：自二伙洛沿山道繞過白旗寨，向四五五高地攻擊前進。

戰鬥經過

六月廿日國軍各攻擊部隊受命後，積極準備，並以營盤、下哈達爲基點，用盡各種手段偵察白旗寨方面之共方部隊狀況。至六月廿八日黃昏，各攻擊部隊，分別開始行動，以戰備行軍比賽之姿態，按照預定計劃，分別向白旗寨前進。翌日拂曉，國軍各部隊在秘密行動下，先後進抵白旗寨附近。驅逐碾子溝、哈爾遜、雞冠山及四五五高地之共方哨站後，立即向白旗寨展開攻擊。

共方對國軍上述行動，事前毫無所知，晨操之際，突聞槍炮聲起，即倉皇應戰，叵耐四周各要點，盡被國軍佔

領，雖圖據寨力抗，但已成癰腫釜魚，無法抵禦。國軍在勢盛氣旺下，一鼓而下白旗寨，共方官兵滅亡殆盡。此卅七年六月廿九日上午十時也。

國軍既得白旗寨，共方部隊殲滅無餘，於是乘勢奮勇前進於黃旗寨，原駐該寨之共方部隊，因戰起倉卒，一無準備。況白旗寨僅數小時而即陷，軍心衰竭，不獨無還擊之力，即欲完整而循序之撤退，亦不容有此喘息。故雖曰急促後却，亦惟有出於狼狽遁逃一着，齊向李家寨方面逸去。迨國軍抵達黃旗寨，共方部隊已空寨他往。白旗寨之戰，遂告結束！

是役也，共方獨立第一師幾全被殲，僅黃旗寨方面倖脫。國軍以任務完成，遵令脫離戰場，於廿九日廿二時回至下哈達宿營。慶凱旋焉！

此次作戰之效果，在於迅速、秘密、掩蔽、機動、集中、安全各緣由所造成。決非偶然，更非僥倖，堪爲作戰之一模範，誠足式也！

第八章 濟南之戰

中共在東北，本如蔓草生根，延遍全境，故中共雖在白旗寨慘敗，仍到處爲患，而國軍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仍受威脅，處於孤立形勢。至於山東戰場，自「民卅七年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八日之間，中共山東兵團——先後進犯膠濟路西段及濰縣。至此，山東一省，除濟南、青島、臨沂、兗州各據點外，大都爲共軍所佔。

當在東北白旗寨國軍得勝之日，即白崇禧在漢口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之時，亦即中共劉伯承、陳毅、徐向前三部潛流於黃泛區，集結卅萬兵力，襲擊國軍之際。此民卅七年六月廿九日事也。至七月五日，山東方面，國軍收復泰安、肥城。但蘇北方面則連水失守。而共軍在黃泛區大敗，劉伯承部潰退於冀南，陳毅部回竄於魯西。詎知蘇北方面，泗陽又告失陷。湖北之襄陽，於七月十七日被共軍攻佔，第十五區綏靖司令官康澤下落不明。至八月四日方得收復。七月二十日，國軍在蘇北收復泗陽。八月一日，駐守太原之國軍反攻出擊，收復重要據點榆次、晉源。八月十一日，東北國軍由遼東以水陸夾攻營口。而於八月十七日中共則大舉進犯熱河西部。十九日，中共又分途進攻錦州、秦皇島。但從此時起，一個月內，僅小接觸而無戰爭，至九月十六日濟南之大戰以起！

在上述戰事期間，蔣總統以黃泛區戰爭激烈，曾於七月二日飛徐州有所指示。旋於同月廿二日，親赴太原與閻錫山商討防務。於八月九日始往廬山上牯嶺。八月廿三日，國府發行金圓券。戰事之演變始於此，國軍失利之線亦始於此。共黨乘間而爲擾亂活動，致社會被煽動淆惑，釀成囤積搶購風潮，經濟崩潰之機，已伏於此。同時學生及民衆團體亦因中共之煽動，而掀起政治風潮，更猛烈無所顧忌，國脈動搖已萌於此。吾人書此，實不勝感慨系之！

其果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吾既陳述於前矣，茲則但爲戰事上之回溯，試再言濟南之所以失陷？

濟南之戰，果因何故而失陷？未見之於官書發表，而私人稗官類之紀述，又言人人殊，不敢據採以爲實錄。上年本報曾載——濟南失陷真相——一文，後得當時任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第三處作戰科科长李泉（或李泉敬）君及七四師五七旅一七〇團砲排排長黃劍超君之來函補充，始獲知當日濟南作戰之確實真相。拋磚石而引得身歷戰場戰友之報導，當然較耳聞者爲準。因參照各種紀錄之可信，及美國對華白皮書之所紀者，彙而成篇，蓋亦本乎取材務期於真實，敘事必求其徵信之一貫主旨。

濟南之戰，已成過去，但推斷民卅七年九月間，中共方面，似有如下之部署？以爲叛亂全國之張本。

一、「華東野戰軍」？擔任進攻——濟南——蘇北——豫東——皖北——各大小城市。

二、「中原野戰軍」？擔任進攻鄂、皖、豫若干城市。

三、「西北野戰軍」，進攻陝、甘、寧地區。

四、「華北徐向前，周士第」，擔任進攻太原。

五、「東北林彪」。配合羅瑞卿楊成武兩兵團擔任進攻北平、平綏、平承、平保各鐵路綫，除北平、天津、瀋陽以外之城市。

此則中共於用兵在山東半島時，而必以遼東半島之軍事部署，互相呼應。中共欲向濟南動手之前，復先有瀋陽之戰。攻佔瀋陽，即爲進攻濟南之一大試驗，瀋陽既失，濟南之陷，殆已先定。此美國軍事人員之意見也。而毛澤東之「圍點打援」之戰術，實起於——「圍濟打援」而來。共軍是以「華東野戰軍」之七個縱隊組成「攻城集團」

，以八個縱隊組成「打援集團」。九月十六日晚共軍開始對濟南發動攻擊，經過八晝夜連續戰鬥。嗣後各次戰爭，共軍引用之爲公式。

濟南之失，衡諸事實，完全出於吳化文部突然叛變，有以致之。無充分兵力以供使用，而援兵不能及時趕至，亦是一因。蓋濟南該時已形成孤立，觀其被圍進攻之際，奮勇抵抗，這巷戰開始，國軍士兵，皆能奮不顧身，慷慨捐軀。以賸餘兵力，而禦十五縱隊之衆，補給則以機場失守而中斷，援軍則以截路而難達，空運又以叛變而不能降落，孤城孤軍，同其存亡，有足多者。而王耀武之陷共，論者多以其調遣不善，情報不靈相責備，即美國白皮書中，亦頗有不諛之辭，因其責任之難逃耶！獨恨吳化文以汪偽政權時之部將，國軍優容予以收編，宜如何爲國盡忠，奈何突然叛變，觀顏降共！或以爲吳化文爲馮玉祥舊部，倒戈乃衣鉢真傳，況復馮玉祥爲共黨，投共更有其由來。然而貽誤整個戰局，其罪有不容誅者矣。

濟南居津浦鐵路之要隘，爲膠濟鐵路之起點。乃山東半島之中心地帶。當時濟南之第二綏靖區司令部，其所屬部隊：

- 一、整編第二師（守西正面）
- 一、整編第八十四師吳化文部。（守西正面）
- 一、第十二軍霍守義部（守兗州）
- 一、整編第八十三師第十九旅………守東正面
- 一、整編第七十三師………守東正面。

一、整編第七十四師第五十七旅……守東正面。

國軍以濟南之西面與北面，環繞黃河。當時以整七十三師，附整七十四師之五七旅，又整八十三師之十九旅，擔任東正面防守。

以整八十四師、整二師擔任西正面防守。（整八十四師守備飛機場及通往泰安之津浦路）。

陰曆中秋前夕（九月十六日）中共「華東野戰軍」陳毅部向濟南東正面猛攻四里山，尤以城東南之馬莊，爭奪極爲慘烈。激戰五晝夜，因步砲協同，復得空軍低空掃射，共軍用五個縱隊兵力卒不得逞。十七日中央即由徐州剿總抽調七十四師二個營，空運到濟，下機即參加戰鬥。十八日中共用排砲轟擊飛機場，致由徐州空運而來之援軍，未能下降，迫得折回徐州。但七十四師五十七旅一七二團一營之一部，冒砲火著陸。十九日東正面部隊與中共激戰，喪亡過半。於是縮小防線，退守外城。所能倚靠者，只西正面部隊之吳化文部，因該部三日來尙未與中共接觸。王耀武對吳化文倚望正殷，而吳化文突於十九日中午陣前向中共靠攏降附。濟南防守戰，遂面目全變而勿克支持矣。

吳化文既已率部投附中共，而其部下不乏深明大義之人，不肯向國軍進攻，於二十日即向黃河北岸開去，讓出濟南正西面之防地。廿一日中共改向西正面猛攻，由商埠方面掩至原日綏靖公署所在地之郵政大廈及火車站，進而爲爭奪戰。廿三日傍晚，中共調集快速部隊並排列砲火數百門，集中向內城重點攻擊。午夜，南門氣象臺被共軍奪佔，小東門爲共軍突破，展開巷戰。城牆上之手榴彈，街巷中之肉搏戰，第七四師五七旅旅長楊晶，以所部大都壯烈犧牲，大勢無可挽回，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拔槍自殺，被其副官奪去手槍，未果成仁。而營長徐

受良，砲排長黃劍超則因傷重，抬入陸軍醫院，是時五七旅與十九旅，可謂已全部覆滅矣。

至廿四日晨，綏署第三處作戰科，發出最後一次戰報。是日晚，濟南只餘城之北角一隅，尙爲國軍錢伯英部第七七旅據守。至廿五日晨戰事遂告結束。

按濟南之失陷，其主因實由於吳化文之叛變，但吳化文之叛變，王耀武事前既疏於警覺，調遣更失於檢點。事緣吳化文部原防守兗州，吳化文係汪偽政權時代之和平軍，勝利後所收編者。而吳化文與其部屬，久戍兗州，家庭及財產皆集於此。當濟南形勢吃緊，王耀武即調吳化文八十四師全部至濟南接防。但吳與其部屬，內心實不願撤離兗州，蓋留戀其身家財產，此種心理，上自師長下至士兵，莫不皆然。故世之論吳化文者，以其無軍人氣魄！夫家庭財產之顧慮，在屯田制下之承平時，未嘗不可；但在大敵當前，且將壓境之際，而猶以此介懷，不滿於調遣，殊失軍人「國而忘家」之體統。如果說吳化文叛變之因，造於此點，實非軍人所應有所慮爲者也。馮玉祥於民十三年在北平耀武揚威，該時由邵鳳萍、徐謙之介，加入共產黨。厥後，國軍中之叛變者，多係馮部改編者，馮玉祥雖死，而流毒至于如此。

王耀武派第十二軍軍長霍守義守兗州。而中共探悉調遣情形，一面攻圍兗州，一面伏兵中途，以打援軍。兗州告急，王耀武又急調吳化文回師兗州赴援，行至半途，共軍攔路腰擊，吳部於此役中，損失一旅之衆，竟中共軍「圍點打援」之計。兗州因援未至失陷，共軍乃放棄與吳部之戰而他去，吳部遂再返濟南。吳化文忿王耀武之調遣不當，謂：「如果兗州應當保守，則猶何必將我八十四師全部調離？既調我部至濟南矣，尤何必再令我回師援兗？」可見吳化文滿腔憤恨。吾人以爲吳化文指王耀武調遣不善則可，若果以私人關係而出此批評，則不可。迨吳化文部

回至濟南，又派其防守飛機場、車站爲外圍作戰，因而引起吳部更怒不能平。中共得乘隙而策動吳化文叛變。

綜觀濟南之戰，在國軍爲防守而非攻擊，茲以美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所提出之報告，作爲評論該一戰役之借鏡：

「此役國軍之指揮官，錯將其兵力自主要戰場，撤往該城東部。迨欲再撤退時，其部隊即遭殲滅，而彼亦被俘。」

「當濰縣戰起之際，國軍自青島、濟南馳援，但援軍並未遭遇阻遏，奈進行遲緩，終至濰縣陷落，援軍退回其原防。凡此皆指揮官未能熟知其軍心，與指揮之不靈也。」

「指揮官對地方團隊，派在最前線，使地方團隊懷疑其有故意使彼等先遭犧牲之嫌，即吳化文部下亦同有此感。」

「國軍墨守成規，一味保守，匿諸城牆之後，以待敵人」。

「他如情報不靈，缺乏主動攻擊之精神，不知於共軍集中之前，出擊以亂其陣腳。」各等語。在軍事觀點上而言，當亦有見地而非苛責之辭也。

獨惜國軍經此戰役之後，陣前降敵之惡風，遂以傳染。中國傳統之軍人魂湮沒無存，所謂「只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之敢死氣魄，不可復覩矣。

吳化文以僞軍降將，已懷貳志，今因派其外圍作戰，懷疑王耀武故意致之死地，則其不肯效命，故在意中。夫國家陳兵養士，用在一朝，尤應效命殺敵，誓死疆場。國家不究吳化文之劣績，原冀其戴罪圖功，孰知因吳化文叛

變，一髮而牽動全局，自此國軍情勢，每况愈趨低潮，則吳化文之罪，誠百死不足以蔽其辜矣！李陵戰至士卒已盡，隻身降胡，漢朝且不加諒，况率部以投共乎？吾知作史者，必予吳化文以誅伐，願與今之爲將官者共唾棄之，而又互勉勵之。

昔李闖造反，縱橫於黃河南北，所向無敵，至寧武關，該關守將周遇吉，奮力抵抗，及至糧盡援絕，身中數箭，而又不肯罷休，其英雄節烈，照耀千古。當時李闖亦歎贊周遇吉之英武，謂：「老子自出兵，未遇勁敵，今遇到一周遇吉，已覺無法應付，倘以後再碰上幾個周遇吉？老子便休了」。可見捨身成仁，即匪賊亦起敬愛，至今周遇吉在武聖廟中，俎豆千秋，眞萬古流芳矣。附及之，以爲保衛國家之健者告。

若論王耀武之防守濟南，因兗州之失守，而第十二軍亦同時隨之而失，則其所能調遣之兵力，實不足以資分配。而中共則以十倍之衆，復以「全體性之全面進攻」此孤立之濟南城。在寡不敵衆之形勢下，更突遭內部叛變，致國軍籌碼，愈覺短少，不得不縮短防線，防線愈縮愈小，縮至巷戰，城遂陷落。此實由於山東方面戰場，「逐次使用不充份之兵力」，造成此後果。而「逐次使用不充份兵力」，固兵家之大忌，而王耀武不幸犯此錯誤，卒至身敗名裂，後之用兵者，其戒諸！惟王耀武任封疆大吏，受國家深恩，因濟南之失而牽動全面，則王耀武未能與濟南城共其存亡，而反觀顛覆事仇，其將何以對歷史以交代耶？

濟南既失，繼之而陷落者，則有：新安鎮、運河車站、曹八集、嶧縣、張莊、臨城、韓莊、邳縣、臺兒莊、臨沂等地。不獨山東半島，幾全淪失，即皖北、魯西、豫東之各戰略要點，亦不能保，足見濟南一失，影響之大有若是者。

第九章 錦州之戰

中共在民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九月，對於戰事，取遼東與山東兩半島，遙相配合，呼應作戰。當其於濟南發生鏖戰之際（九月十六日），正錦州揭開戰幕之時（九月十二日），迨濟南失陷（九月二十七日），而錦州之戰鬥遂隨之更趨激烈。

中共此項作戰計劃，原在九月七日發布於各野戰軍，而對於東北之錦州，尤特別注重，其作戰指導，大概如左：

中共對錦州至唐山一帶，置主力於該線，而置長春、瀋陽於不顧；並準備打斷由長、瀋前來援錦之路。因爲這樣使錦、榆（關）、唐（山）三點各自孤立。此爲「攻錦打援」之詭計。

中共又密令其部屬：認爲，如果把主力置於新民，及其以北地區，則長、瀋方面國軍援兵可能不出。並再三叮囑，另外要顧到葫蘆島方面國軍的快速來援。

錦州之攻戰，中共集中十二個縱隊，一個砲兵縱隊，連同地方武裝共五十三個師，七十餘萬人。其分配如下：

甲、一個縱隊，七個獨立師，繼續圍困長春。

乙、六個縱隊，一個砲兵縱隊，一個坦克營，圍攻錦州。

丙、二個縱隊，配置錦州西面之塔山、高橋地區。

丁、三個縱隊，配置於黑山、大武山、彰武地區。

上列兵力，分別阻擊由錦西、葫蘆島、瀋陽等方向來援錦州之國軍。

中共於十月十四日，對錦州開始進行總力圍攻，距其自發動錦州大戰，已閱一月。在此期內，從事於東阻瀋陽，北遏長春二路之援兵。西則盡力以截斷錦、榆、唐一線，而使之分割。但其重點則置於塔山、高橋。蓋塔、高爲通葫蘆島之樞紐，若果塔、高爲國軍據守，則國軍可藉海運而源源增援與輸送補給，故論錦州之戰，其得失全在於塔、高之能否掌握。國軍在長春，在瀋陽，本已形成孤立，萬一錦州失守，則長、瀋便無出路。因此錦州之戰，尤爲東北九省全局之所系，宜乎國軍最高統帥之重視，親臨前線，鼓勵將士。奈種種未能配合適當，卒至錦州失，而東北隨之俱失，可勝浩歎！

時國軍之在東北者，長春由鄭洞國駐守，轄有三個軍。瀋陽由廖耀湘駐守，錦州由范漢傑駐守，其所轄部隊

一、第六兵團邱濬泉九十三軍三個師。

二、關漢鵬五十四軍三個師。（一師駐葫蘆島，一師駐錦西，一師駐錦州整補）。

三、新八軍沈向遠三個師，（內一師係遼西保安隊改編不完整）。

四、新五軍劉雲翰三個師。（分駐北寧沿線自山海關、北戴河、秦皇島等地，地廣不足以分配，無法抽調）。

試就兩方兵力比較，中共多出數倍，衆寡之勢，先輸一著，何況中共以主動而來攻擊，國軍以被動而處防禦，主客之分，又輸一著。當中共調兵遣將之時，國軍探知其攻錦意向，九月二十五日，國軍最高決策機構，密令東北剿總衛立煌：「令立即向西攻擊，使錦州不致被包圍。」令中並規定「至少以十五個師兵力，突行出擊以解錦州之

「國」。詎衛立煌身負東北剿匪全責，錦州被圍，「屢彼之責任，奈竟將如此緊急命令，延遲至十月九日方始執行。最高統帥囑其以十五個師出擊，又僅調派十一個師，其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致錦州戰局，國軍益趨困難。

九月下旬，共軍集結十一個縱隊之兵力，突攻錦西。國軍一九七師拚力相搏。錦西北郊之青龍眼高地，爲戰略上所必爭者，因錦州機場即平鋪其下，國軍卒以衆寡懸殊，至三十日，青龍眼陷落，自此機場即爲共軍射擊目標，跑道盡燬。但機場守軍，至錦州失陷時，方始撤離，亦可謂盡其職守者矣。共軍緣此而得渡過大凌河（錦州東南）形成包圍形勢。錦州外圍之大小紫金山、南山、雙龍山等爲共軍用排砲，夜以繼日，不斷轟擊。而國軍亦以排砲還擊，如此隆隆之聲，震撼山岳，各該山頭如火龍飛舞，戰況之烈，可以想見。而共軍對於塔山、高橋係通葫蘆島之必經之路。假使塔山、高橋爲共軍所得，則國軍後援，又將斷絕，茲所可通者，惟此一路，故共軍必欲得而甘心。按高橋地點，以係戰略要點，於日本佔據時，築有永久堅強工事，難攻易守。國軍爲調整防務，令駐軍新舊交替，固耐接防者未到，而原駐防者，竟先行擅自撤離。共軍乘隙而進塔山、高橋佈防，共軍未付出一兵一彈之代價，安然而得此戰略要點，厥後追究責任，該擅撤師長謂得自軍長許可，軍長則不認有此，乃置該師長於法，然而錦州之後援絕矣。

是時也，蔣總統飛往北平巡視，並召集高級將領會議後，於十月二日飛瀋陽，隨行者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郭懌、電務局長俞濟時等。三日返北平。四日巡視蘆溝橋。五日巡視天津、塘沽新港。八日再由平飛滬。九日回京。至十六日復飛瀋陽，即在飛機上舉行軍事會議，遄回北平。由此以觀，蔣總統在此半個月中幾席不暇暖，其勤勞爲國之精神，迥非任何人所能及。其於第一次飛瀋陽時，曾親蒞葫蘆島，以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駐葫

蘆島任指揮官，定議奪回高橋以通錦州，調閔漢騫軍負進攻之責。或有主正面進攻者，或以爲高橋防禦工事堅強，應迂迴繞道高橋之西北者。最後決定，終採取正面進攻，不圖損傷達八九千人而未能克復高橋，葫蘆島一路終被壅塞矣。

自青龍眼陷落後，范漢傑在錦州，已與錦西失却連絡。（九月廿九日）時九十三軍各部，連續戰鬥，傷亡甚衆。新八軍之暫編五十四師扼守錦東——暫編第五師堅守機場——一〇八師拱衛南門——邊區總部之警衛團二營，榮譽六團一營——均參加戰鬥序列，惟待援軍之速至。東北剿總衛立煌，奉命以十五個師兵力由瀋陽西向出擊，自十月九日起，其部隊迄未出至瀋陽百里以外，僅空運九十七師一團至錦州增援。

錦西陷後，駐葫蘆島閔漢騫之第八師、第九十師，與共軍相持與高橋附近。第六三軍二個師該時亦由秦皇島至葫蘆島，而高橋之戰，演成膠着狀態，未獲進展。中央爲大力援錦起見，命第七兵團司令侯鏡如率九十二軍援錦，從塘沽海運至葫蘆島。中共方面，探悉國軍舉動，以其精銳第四縱隊，協同第十一縱隊，並組織民兵，強拉民伕，趕築高橋以外之附近山崗，構成堅強防禦工事。侯軍猛力進攻，遭共軍猛力抗禦。侯軍不顧犧牲，繼續仰攻，共軍深溝密壘，據高下擊。雙方作點面之戰爭，而不見國軍轟炸機作立體之制裁，致國軍侯部二次進攻，終不能克復高橋。

共軍自十四日起，併力轟擊錦州城，至十九日在中央銀行國軍范漢傑司令部，其屋頂中炮彈，范氏在二樓被濃烟窒息，暈倒於地，其衛士中彈片受傷。第六兵團司令部在上海路勝利大廈，亦中彈起火。共軍用燃燒彈，警備司令部亦着火而焚，全城火海，共軍自南門蘆溝而入錦州城，是時各部官佐與士兵，爲各自逃生計，均被共軍所俘。

范漢傑逃匿後，與邱濟果率特務連突圍，但共軍包圍圈已縮至最小，當被生俘。錦州之戰，至此終結。」

第十章 瀋陽外國遭遇戰

前編詳敘錦州之失，觀其所以致失之由，首在於瀋陽之援不至。瀋陽之援兵，何以不至？在共軍方面，固施其「圍點打援」之故技。而國軍在長春之不穩與變化。瀋陽之兵先遭襲擊，不特不能赴援錦州，甚至瀋陽亦瀕危殆。此就戰事方面言之也。其最大原因。則爲東北剿總衛立煌，其初不即遵奉統帥部之命令行事，中央派員赴瀋，面陳機要，衛氏猶疑未定。中央特由參謀總長到瀋指示，仍以爲困難重重，懷疑不克執行。最後，經最高統帥親飛瀋陽，國防部第二廳長指陳一切，衛氏至此理屈辭窮，始勉強從命。然而因此而耽誤時日，卒至赴援兵出，而錦州失陷。其果誰應負此咎責耶？蓋東北與華北唇齒相依，互爲呼應，而影響至大。假使東北能守，則共軍林彪何能抽調其十一縱隊之大兵，分三路入關，以壓迫平、津？要知華北之堅守，足以決定東北之安全，而東北之堅守，亦可決定華北之安全。該時，濟南雖失，而華北依然克保，則共軍猛攻錦州之際，衛氏能及時援錦，未始不可以克保。今竟執拗違令抗命，終至東北全失，遂影響於華北不保。書至此，殊不勝其遺憾！

溯自民卅七年二月一日，衛立煌成立東北勳總，纔九日耳，而遼陽失陷，東北形勢轉緊。至廿四日，不幸瀋陽以東之鞍山又失。同時營口告急，於廿六日亦陷。三月八日共軍攻四平街，城郊展開激戰。雙方鏖戰至十三日共軍進入，發生巷戰。吉林形成包圍，於是不得不先將吉林之軍民，搬往長春。三月十五日四平街陷落。迨八月十一日，國軍用水陸夾攻營口，未能得手。是月十八日共軍則以大軍猛攻熱河，不得逞，乃復折回東北，因此長春受重圍包圍，董原欲包圍吉林者轉而包圍長春矣，迨九月十二日，共軍將長春——「圍而不打」。將瀋陽——「隔而不圍」。

山。力攻錦州，又另分二路——錦西——以國軍從瀋陽增援。——錦南——以堵國軍由葫蘆島增援。共軍施其兩面「截擊打援」之一貫狡計。

時國軍駐瀋陽部隊有：新一軍（軍長潘裕昆）、新六軍、七十一軍（向鳳武部）、新三軍、五十三軍、二〇七師，合計五個軍、一個師。連同地方保安團隊，約近二十萬人。蔣總統於十月二日偕空總周至柔、聯總郭懌、侍衛長俞濟時，親臨瀋陽，召集東北高級將領會議，並面詢敵我雙方情形甚詳，並錦州態勢。三日回京。最高統帥部按照當時情勢，復按辰微大撤退舊案，乃有「向敵撤退」之決定。立派參謀本部第三廳（負責作戰）副廳長許朗軒，專誠赴瀋，面達命令予衛立煌。在中央此項方策，其主要目的在解錦州之圍，錦州之圍能解，瀋陽或能挽回。故對瀋陽雖有撤退之令，但另一增援錦州部隊方由華北水空並運至葫蘆島。與瀋陽援兵同一作用。

衛氏接奉前令，立即召集各將領會議，中央來員許朗軒亦列席。經各將領研討後，其總結意見，認爲：「向敵撤退」戰術，事實上有二種困難：

甲、值此農曆秋季，河水未冰，無法羅致交通運輸工具。

乙、向敵作攻擊撤退：自瀋陽至葫蘆島，中間隔有三道河流，無法完成此項任務。

衆議僉同，拒不受命。一面呈復中央，瀝陳「向敵撤退」有不能克服之困難。一面衛氏則作敵後撤退準備。許朗軒即回京覆命。中央又派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專程到瀋，重申前令，並嚴辭責令衛氏，務須照令執行。衛氏亦堅持前呈困難情形，無法遵辦。中央乃由參謀總長顧祝同來瀋面授機宜，多方督促。但衛氏之部屬拒絕接受命令，且轉情中央收回成命。至此，蔣總統爲顧到全盤大局計，不得不親飛瀋陽，當面解決此事，其隨從爲新任第三廳廳長羅

澤蘭等。在空航中，蔣總統曾與諸從者開一幕僚會議，對「向敵撤退」之策略，是否正確？既至東北剿總，立即召集緊急會議。除由衛氏報告困難情形外，東北各將領多提出意見，申述「向敵攻擊撤退」之種種困難與危險，羅澤閣於此，詳加解釋指示，力排衆議，使在會將領皆無詞以證實所謂撤退困難之所在，於是皆無語而默認。其後，蔣總統向各將領面說：「此一命令，經討論終結，本屬正確可行，就是這樣辦，一切我負責。」至是「向敵撤退」之議既定，衛氏即開始奉命執行。但散會後，衛氏將預先擬定之辭職呈文，向最高當局面陳，作第八次之辭職。此種臨陣辭職，在中國將帥，罕有前例。而蔣總統已往對衛氏七次辭職，屢予優容，此次則不予置理矣。

統帥部「向敵撤退」之方案；將瀋陽方面兵力，向西出擊，以打通錦州之東北路線，並解錦州之圍。同時與在葫蘆島之國軍，向北出擊，攻取高橋，表面上對圍錦州之共軍，作兩面夾擊。實際上，爲瀋陽撤退之國軍開路也。

按軍令如山，軍人以服從爲天職，而衛立煌以封疆之方面大員，竟敢對中央命令，拒不接受，一次不受，二次不受，迨出令之參謀總長前來面命，不特不受，且要求收回成命。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以衛氏之違反節度，畏難不前，致延遲執行，至稽誤日期達半閱月之久，翻使錦州不克救，而自身轉遭厄運，則衛氏之罪，豈容諉卸。誠以「美國對華白皮書」之紀錄中，亦云「當時瀋陽國軍指揮官衛立煌於九月二十五日奉命解錦州之圍，遲至十月九日始率其一部份兵力離瀋，途中與敵遭遇，被其各個擊破，永不能到其目的地……」等語。可見衛氏不趁時機，不赴事機，遂致貽誤戎機，如此行徑，豈不顯悖軍人赴湯蹈火之義哉！

十月九日，衛氏令第九兵團廖耀湘由瀋陽向西出擊，以趨錦州。在進行中，諜報彰武縣有共軍大批補給，絡繹於途。廖耀湘命一都北向彰武出擊，詎共軍不予抵抗而退。廖兵團集結于黑山——大虎山之間之東面，以胡家窩棚

爲兵團司令部爲其行軍之神經中樞。蓋共軍於攻錦州之初，早調七個縱隊，佈防於黑山——大虎山據點，原爲預計打擊瀋陽往援錦州之準備。國軍欲赴錦州，必先攻破黑山之障礙，方得西行。廖兵團用排炮以最熾烈之火力，向黑山猛攻，經兩晝夜之轟擊，卒不能前進一步。正在猶疑，忽得錦州失陷之訊。因廖兵團出發已逾十天，錦州既失，黑山之共軍又若是堅強，不得不變更方略與路線。爲避堅攻瑕，以求得一通行道路計，乃改換部署，擬向盤山、遼中方面進行。此十月二十日事也。

東北國軍，剩餘三據點：北爲長春，中爲瀋陽，西南爲錦州。現在錦州才於十月十九日陷落。瀋陽正在攻擊撤退中。而長春久處於圍困。三點孤立，互不相顧。此時之長春，得悉錦州失陷，而瀋陽戰事正烈，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原屬滇軍，東北氣候嚴寒，士兵不能耐冷，況久戍於外，困於圍城，食糧將絕，故一經共黨滲透于內之特務人員之游說煽動，致有投共之舉。而第七軍軍長李鴻，則中了共謀之美人計，於是共黨「圍而不打」之設計，藉其特務工作而得就。

先是長春之成爲孤城困守，在民卅七年（一九四八）春初。在此之前，雖已與瀋陽隔絕，然北有永吉，南有四平，尙可成爲長春犄角之勢。況永吉爲小豐滿電廠所在地，長春之電力向資於小豐滿，國軍艱苦支撐至卅七年三月上旬，四平街被中共攻佔，無數難民，擁入長春市區。四平既失，長春南翼，遂告截去。延至三月十二日駐永吉之國軍，亦告撤退，北翼同時斫掉。自此，長春孤立無倚，而全市所仰賴之電流亦隨之而斷絕。又因市內增加十萬以上之難民，糧食恐慌加重，尤以長春外圍據點放棄已盡，長春猶如駭浪怒濤中之一小島。守永吉之國軍爲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滇軍），與吉林省主席梁華盛，未能協調，永吉撤守，六十軍調駐長春，政府深恐曾、梁不能合作，乃

將梁華盛他調，以鄭洞國繼其任。恐慌之人心，稍得安靖。

惟長春之防禦工事，葺治堅固，全城周圍築有護城壕，深十五尺、寬十五尺，沿壕起建碉堡羣，每堡均儲存守軍糧食半年以上，碉堡與碉堡間，掘有交通暗道，每五碉堡互相聯系，設一醫務室。每堡駐守軍一連，並於每一堡外之壕內，掘有水井。如此設備，尤稱完善。

長春原由新七軍駐守，自第六十軍退自永吉，合二個軍，另有地方保安團隊，共計五萬餘人。長春距瀋陽七百里，如此危城孤守，在戰略上似非善策？但長春係偽滿時代之首都新京，況係東北主要城市，保守長春，所以象徵整個東北之存在。且可藉長春之存在，便能吸住大部份共軍，使之消耗力量。俟軍力可及時，即可由長春直搗哈爾濱，置此，為收復東北之基地。

中共鑒於國軍防禦工事之堅強，如打硬仗，則所付出之代價，即取得長春不足以抵償，又預知國軍糧食無多，加以如許難民，統計長春全市之軍民人口，不下八十萬，究有多少日子可以維持？故決定持久圍困。第一步先遮斷國軍交通，其次則在長春四郊，建築外圍塹壕，塹壕深廣各丈餘，如篋櫛鱗次而一道一道排列，滿佈如密網，使坦克、裝甲車輛，無法越過，並無法發生威力。中共若是圍困，翻如防守性之圍堵。

越四閱月，長春市內糧食、燃料業已罄盡，人民瀕飢餓線上，國軍亦早經減縮食糧。市參議會不忍觀人民罹此慘劇，乃向國軍建議——「重新估計長春之『戰略價值』，值得守則守，不值得守則退，請先顧全數十萬軍民之生命」。同時防守當局，呼籲人民疏散，惟人民一至中共防線即不能通過，人民哀號跪求，迄不准許。僅有二小女學生，因病經羣衆懇求，始允通過，此為唯一幸運者。

中共又利用特務，混入長春市內之學生羣中，煽動學生暴動，在若是飢寒交迫中，軍民均能苦守，正以見中國人之民族性與正義感。然而在長春陷落中，中共所以圍而不攻者，蓋其有特務工作者在進行其顛覆活動，事雖出於私人紀載，要亦不失其真實性，緣紀載者係東北人又係接收東北要員之一，當非拾齒餘而臆說也。

新七軍軍長兼長春警備司令李鴻，在一次晚會席上，邂逅一風流綽約之女郎，與之語，知爲吉林中學音樂教員馬女士，儀態溫文，談吐雅緻，一笑一顰，韻味幽嫻，且時以秋波流盼，情意婉轉，頗露友好而莊重，忽又纏綿而殷勤。李軍長一見，便如張解元之風魔，以至於寤寐以求。從茲款曲時通，往來頻數，兩情相縈，如水投乳，李、馬二人卽於此岌岌之孤城中，成其眷屬。馬教員遂變爲軍長夫人矣。

李軍長以共黨間諜作夫人，以其愛之切，於是信之深，由形影不離，漸至於參與軍機，李軍長未嘗或疑也。而外圍之共軍，對市內之國軍之一動一靜，對上之報告，對下之命令，任何密令，瞭如指掌，則馬教員之諜報也。迨長春危在旦夕，而李軍長適患惡性瘧疾，吟呻床褥之際，馬教員乃自揭其假面具，以嚴厲之態度向李軍長曰：「你知道我是什麼人？老實告訴你！我是犧牲肉體來做工作的共產黨員，你應該老老實實的表示態度，向共產黨立功，否則，你什麼都完了！」

李鴻突聞此言，猛然警醒，半嚮不出一語，但以雙目瞪視馬女士。有頃，李鴻以喘急而斷續之聲調，答馬教員道：「我抱歉得很。」

長春原有之二個軍，六十軍曾澤生既已叛變，第七軍軍長李鴻又掌握女共諜之手，一轉變間，共軍進入長春，鄭洞國於是亦被俘於共軍手中矣。是十月廿三日也。

廖耀湘率十一個師，二個旅，作重新部署，改變正面，當其立定旋迴軸而運轉其旋迴翼之時，詎於當晚（十月廿五日）其兵團司令部——胡家窩棚，受共軍襲擊。而其所屬部隊，雖分別在黑山、大虎山之間，因其調動，致爲共軍隔離，各自爲戰，不能會合。翌日（廿六日）自晨迄午，與瀋陽之電訊中斷，廖兵團被共軍七個縱隊，由黑山北翼，會結大虎山南翼，合圍於此兩地之間，激戰二晝一夜，至十月廿七日，轉戰至新民地方（瀋陽西、大虎山北）廖氏所率之十一個師二個旅全部潰敗。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軍長李鴻、白鳳武、鄭廷笈均被俘。僅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得脫險歸隊。

瀋陽對廖兵團電訊既斷，情況不明，而前方潰退之散兵，源源進入瀋陽。立召瀋陽警備司令胡家驥。商洽收容散兵辦法，並作背城借一之謀。廿八日晨龍廷武、潘裕昆二軍長自前方敗退，歸入瀋陽城。乃召集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及胡家驥、趙家驤，與龍廷武、潘裕昆（方退回）、副參謀長姜漢卿、宋子英等，商討防守、收容等問題。該時，瀋陽守軍尚有五十三軍又另一個軍，議定：進入外圍、附廓兩道防線，此外尙有三個飛機場——東塔、北陵、渾河——在掌握中。衛氏本人擬欲另設一「東北善後總司令部」以專責處理善後事宜。而屬意於胡家驥，胡堅辭，以爲警備司令部亦有此職責，不必另設機構。議遂寢。

廿九日起，前方退回士兵，愈聚愈衆，傷殘雜沓，秩序混亂，收容已非軍紀所能維繫。未幾，七十一軍師長戴海容率所部四個營，回至瀋陽，胡家驥商同戴氏率部參加防務，孰知戴氏向胡氏當面唯唯，而竟率其所部，不知去向。下午，外圍第一道防線，發現敵人，五十三軍之防線，缺口達九華里之長。而附近人民，多從福臨街逃往八家子。幸卽由該軍趙副軍長派兵兩團堵塞缺口，驅逐共軍。至晚，瀋陽各機關更變爲雜亂與各不相聞問，甚至電話亦

時通時斷。

卅日晨，瀋陽市面，尙能維持。惟東北各機關人員，則紛向警備總司令部，要求運輸飛機，此時不獨警總無法派機，即剿總亦無機可派。而當時在東北之政治工作人員諸大光、朱瀚、崔世光、夏松等，未能予以事先撤退之準備，向警總部接洽。按政工人員，理應早有安排，足見衛立煌之處置無方。警總胡家驥不得已陪同至剿總請示。下午三時，剿總辦公廳惟賸滿地字紙，與凌亂器物，閱無一人。胡家驥遂逕赴衛立煌宅，入門見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及李幹鵬、高惜冰、徐良、董文琦、董佩青、吳瀚濤、姜漢卿、宋子英等多人，面面相覷，默無一語。胡家驥欲見衛氏，適衛氏自樓而下，面色沉黯而帶嚴酷，面見胡氏，不言不理，逕自出門登車而去。在座各人，遂相率驅車隨後，街道變爲一片蕭瑟，各處橫路別巷，均經塞堵，迨車抵渾河機場，胡氏始知爲最後撤退。

此時東塔機場，已在共軍炮火射程之下。惟在渾河機場，僅有運輸機五架，然欲登此機者幾近千人，而機場上又堆滿箱籠什物，爭先恐後，大小雜沓，攘奪座位。衛氏遂不入渾河機場，面囑汽車司機轉赴北陵機場，既入內，衛氏與地勤人員作耳語，入候機室。旋有一飛機盤旋而下，蓋由渾河機場所抽調者。隨即由衛兵把守機門，胡家驥要求搭機同往，衛立煌但點首示允准意，胡氏亦得隨之登機。其餘由副參謀長宋子英點一名入一人，最後至吳翰濤、彭濟羣二人則以座位已滿，無法插足，被攔不得上機，吳翰濤乃拳機大哭，卒遭落於瀋陽，起飛離瀋陽爲十月卅日下午五時。六時抵達葫蘆島，杜聿明早在機場迎候。其在渾河機場之四機，則係軍事次要人員，逕飛北平降落。

當衛立煌驅車赴機場時，有董文琦所保薦之某保安司令，已被共黨收買。密謀於衛氏及其隨從一行，擬在中途截住扣留，作爲投共軍之立功資本，惟爲董文琦所悉。立即勸阻，保安司令切勿妄動，幸得逃出此關，然而衛氏

終於投奔大陸，則亦何惜此一截留，不過遲早時間而已！

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而錦州之失守，由於瀋陽援兵久而不至。瀋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觀於中共方面，則施其狡計者，爲：對長春——「圍而不打」，以間諜滲透與美人計，以自內潰爛。對錦州——「圍點打援」，先打通錦西走廊，再攻佔錦東義縣，乃置重兵於高橋，以阻遏國軍自葫蘆島而來之援。又置重兵於黑山、大虎山之間，以截斷國軍自瀋陽而來之援。及待國軍自瀋陽出兵，不獨錦州即陷，而長春亦以變色聞矣。而瀋陽之兵，遂局限於黑山、大虎山之一地區，即爲共軍集結地區，大敵當前，赴錦之援既已改變，則戰事形態，又必須轉變，在此轉變之進行中，共軍猛攻其迴旋翼，卒至潰退。蓋共軍一貫之戰術，每在於乘國軍行動之隙，以多吃少，奮力圍攻，此亦一例也。

溯自東北淪失，華北局勢，突然改觀，中共遂得提在東北之共軍，長驅直入於華北。此連帶性之戰爭，終演成華北局部之變色，亦其造因之一端也。然而錦州之戰，及瀋陽外之黑山、大虎山之戰，除被俘之官長外，所有帶兵之實際戰鬥者均能勇敢轉戰，頗多光榮犧牲，尙能保持軍人之正義與浩氣。但終因此，將東北主戰場移至平、津，蓋唇既亡，而齒未有不寒者。深望後之負抗俄反共戰爭之責者，必一矯過去之弊，以爲鑑戒，是則幸甚——東北之戰之原委也。

第十一章 徐蚌會戰

南京之能保守否？決於徐州之能否克保！徐州之能屹立不動與否？決於徐蚌會戰之勝負！而徐蚌會戰之關鍵，決於邱清泉兵團之運用是否得宜？時徐州剿總主帥爲劉峙，杜聿明副之，參謀長李士正，祕書長劉子青。茲先言徐蚌會戰共軍方面之總括情勢：

徐蚌會戰以徐州爲中心，東起海州（連雲港），西止商邱，北起臨城，南達淮河之廣大地區。共軍參加是次會戰之部隊計爲：「華東野戰軍」陳毅率領十六個縱隊，「中原野戰軍」劉伯誠率領七個縱隊，又「華東」、「中原」兩區之地方團隊，及「華北軍區」與冀魯豫邊區之地方武裝，計七十萬人。共軍先以二個縱隊攻駐防臨城、韓莊之國軍李彌部一個旅，力求攻佔臨城、韓莊。使徐州北面，受到威脅。另以一個縱隊，滲雜地方團隊，由魯省西南，以側擊徐州、商邱段。另由鄧小平率部攻擊鄭州至徐州一段之隴海線，以牽制孫元良兵團，再以二個縱隊活動於宿遷、睢寧、靈璧地區，以牽制李彌兵團。外以六個縱隊，用流動式作「阻援」、「打援」。即以五個縱隊擔任攻勢。其餘七個縱隊，專作斷線、圍點，環伺徐州外圍。

至國軍方面：除黃伯韜兵團被圍於碾莊外，尚有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及三個緩靖區部隊，及自華中調來之黃維兵團。雙方兵員籌碼，已覺懸殊。

徐蚌會戰可分三個階段：即自卅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同月廿二日新安鎮、碾莊陷落，爲第一階段。自十一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廿五日在宿縣西南雙堆集黃維兵團，被圍而俘，與孫元良兵團潰敗爲第二階段。自卅八年一月六日至同

月十日，在永城之北陳官莊邱清泉殉職，杜聿明被俘爲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以前，共軍先已攻佔運河車站、曹八集、嶧縣、甯莊、臨城、韓莊、沈陽、邳縣、郟城、臨沂等。在第二階段前，亦先行政佔海州、新浦、連雲港、灌雲等地區，藉以防堵國軍第五十四師，第卅二師自青島由海運進入蘇北地區增強。

當日國軍以黃伯韜兵團爲東翼，馮治安部爲北翼，孫元良兵團駐守徐州之西南側，李彌兵團拱衛徐州市郊，邱清泉兵團主力沿津浦路以東地區（包含鐵路線），向南攻擊前進，搜剿徐、宿間共軍；另以一部向東警戒，防止側翼共軍活動。

先是，共軍以三路進侵徐州。甲：正面由陳毅率其第一、四、六、七、八、十等縱隊，由北南竄，直叩徐州大門。乙：共軍第二、十一、十二等縱隊，與淮南、淮北獨立旅，又與從臨城而來之第九、十三、新七等縱隊，結集於徐州東側。丙：劉伯承指揮其九個縱隊，會合徐州之西面。此時國軍邱清泉兵團，尚在徐州之西，由夏邑、碭山間地區，向徐州集中。蓋軍中有一句流傳之語，就是：「劉瞎子一怕對「邱缺咀」，「逢邱不打」之傳說。則共軍對邱兵團之重視，當係事實。故劉伯承親自對付。在劉伯承之計劃，趁邱兵團尚未結集於徐州之前，猛攻之於行動之中，使中間截擊，遮斷邱兵團通往徐州之路，邱兵團便將孤立於徐西。此爲共軍之一貫戰術；「只打運動中之敵，不打駐止中之敵」之故技，併力阻遏進行中之邱兵團，橫施截擊。但因邱兵團早有準備，共軍雖有劉伯承七個縱隊與陳賡兩個縱隊之實力，猛撲國軍於黃口，卒被邱兵團擊敗而潰退，共軍於是進擾宿縣。此十一月十七日邱兵團在徐州西翼之態勢也。初，黃伯韜兵團渡過運河後，共軍大隊掩至郟城，黃兵團方得駐足於新安鎮，倉卒出而應敵，共軍不支後退，流轉至徐東八義集。十一月十一日，國軍守將劉聲鶴師長以敵衆我寡，因守與戰，終至壯烈殉職。

。追國軍援軍繼至，向共軍攻擊，始得收復八義集。此黃兵團在徐州東翼之態勢，十一月十四日也。

在斯期間，東北之瀋陽，才於十一月二日撤守。十一月六日中樞決定實行總體戰。而徐蚌會戰，亦適開始於此日。十一月廿日共軍於徐東八義集敗退後，得其自魯南增援部隊，乃捲土重來，冀獲一逞，於是魯東戰事，趨於激烈。同日共軍於徐西黃口戰敗後，轉徙而圍攻宿縣；至是，宿縣告陷，徐南屏障，遂呈露缺口。而在轉戰於魯東之黃伯韜兵團因殺敵深入，後援未繼，致成孤軍，被困於碾莊，招致十一月廿二日黃司令官，及六十三軍軍長陳章等壯烈殉職，演出一幕戡亂史中可泣可歌之悲壯事績。

先是，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秋冬之交，中共以東北得手後，即企圖陷河南鄭、汴、亳縣，佔山東兗、濟，乃進而蠶擁南下，先擊徐蚌，再而越江淮而窺南京。誠以國軍之徐州勦匪總司令部兵力雄厚，斷非可以正面力爭，必出以詐詭流竄，隨處擾亂，方得倖逞。於是陳毅、劉伯承兩部乃匯成一流。陳部自兗州經汶上，越微山湖而進擾魯西。劉部則自豫南而進擾商（邱）毫（縣）。希圖雙方合圍以夾擊，先圖徐州。

作戰前之共軍態勢

共方陳毅部主力集結於山東之兗州，分其第八、第十，「兩廣縱隊」經汶上越微山湖南進，以牽制國軍第二兵團（邱清泉，該兵團在徐州以西黃口地區）。另以一部南流於懷陽、宿遷地區，以分散國軍兵力。卅七年十月中旬，共方原在蘇北之第二、第十二縱隊及淮南之淮南獨立旅各部，四出竄擾，積極破壞津浦路南段，隴海路東段交通。在兗州之主力由臨沂、嶧莊南移，進逼臨城、滕縣，致徐州外圍已受威脅。

共方劉伯承部原踞豫西一帶，自國軍自動撤守鄭州、開封後，劉部於遂平、舞陽留置一部份整補，其主力由開

封、蘭封陸續東向南移，進出於商邱以東地區。冀與陳毅部以分進合擊外線作戰態勢，包圍徐州圍擊國軍。

陳毅又以在蘇北之第二、第十二縱隊，由泗陽北上，企圖與魯中南下之陳部主力，夾擊新安鎮之國軍第七兵團（黃伯韜、掩護東海第四十四軍撤退後，即向運河西岸，徐州以東地區集結）。

總計共方軍隊，「華東野戰軍」轄十六個縱隊，（陳毅部）「中原野戰軍」轄七個縱隊，（劉伯承部）另合「華北軍區」所屬冀、魯、豫軍區之地方武裝，共計六十餘萬人。

作戰前之國軍態勢

國軍於濟南失守後，爲縮短戰線，集結兵力計，乃於十月中旬先將鄭州方面之第十六兵團（轄四一、四七、九各軍）撤至蒙城、懷遠一帶，至下旬，開封第四縱區（劉汝明轄五五、六八各軍）向蚌埠撤退。第三縱區（馮治安轄五九、七七各軍）守備運河。第七兵團（黃伯韜轄廿五、六三、六四、一百各軍）位置於新安鎮。第二兵團（邱清泉轄五、十二、七〇、七四各軍）位置於碭山附近地區。第十三兵團（李彌轄八、九兩軍、又卅九師）控制徐州東郊。第九縱區（轄四四軍）守備海州。交警第二、第十六總隊守備宿縣。

當時第七兵團之任務，爲掃蕩蘇北，策應徐州、海州部隊作戰。其部署如次：

第廿五軍（欠第一四八師）駐於新安鎮以東阿湖地區，擔任守備暨策應海州部隊作戰，軍長陳士章，轄第四〇師師長曾正我，第一〇八師師長李世鏡。

第一百軍駐於新安鎮至阿湖之中間地區，擔任守備。軍長周志道，轄第六師師長盛超，第四十四師師長劉聲鶴。

第六十三軍、六十四軍駐紮新安鎮附近地區，擔任守備。並保持機動。第六十三軍軍長陳章，轄一五二師師長雷秀民、第一五八師師長張澤深。第六十四軍軍長劉鎮湘，轄第一五六師師長林亞人，第一五九師師長鍾世謙。兵團總司令部設於新安鎮。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當時以固守徐州、鞏衛京滬確保長江南岸與東南安全爲鵠的，依預定作戰計劃，結集兵力以阻遏共方部隊之南侵與東擾，爰作如下部署：

- 一、第七兵團：（黃伯韜）掩護四十四軍自東海撤退，即向運河西岸，徐州以東集結。
- 二、第三縱區：（馮治安）扼守濉兒莊、韓莊、運河之線。（徐州以北）確保賈汪煤礦等地區。
- 三、第二兵團：（邱清泉）集結徐州以西黃口地區。
- 四、第六（李延年）、第八（劉汝明）兵團，包括交警總隊，擔任徐州以南，津浦鐵路及淮河之守備，準備機動作戰。

- 五、第十三（李彌）、第十六（孫元良）兵團，所轄兵力，擔任徐州城區及九里山之守備。
- 六、第十二（黃維）兵團，由平漢路東調，加入徐州戰場作戰。

關於第七兵團，因由東海撤來之第四十四軍，如無有力掩護，在西進途中，頗有被共方圍攻突襲之危險，除電四四軍火速向新安鎮進並通知應援情形外，決定部署於次：

- 一、第一百軍（周志道）推進至阿湖、海州間之城頭地區，接應四四軍，主力沿公路向徐州推進，到達運河鐵橋，即佔領該橋東岸以北地區，掩護兵團主力渡河。

二、第六十四軍（劉鎮湘）即行向西轉進，通過運河後，立即佔領臨海路南側地區各要點，掩護兵團後續部隊之轉進。

三、第廿五軍（陳士章），以一部向阿湖以北地區掃蕩，主力掩護第四四軍，第一百軍之一部通過阿湖後，向徐州方向轉進。至大許家（張莊西）結集待命。

四、第六十三軍（陳章），於新安鎮附近之適當地帶佈防，掩護第四四軍（王澤濬）、第廿五軍通過新安鎮後，沿臨海路南側，向密灣方向轉進，負責兵團在進行中之左側安全。經密灣過河後，向大許家附近地區集結待命。

五、兵團部隨廿五軍轉進。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八日，國軍第七兵團，先後由新安鎮附近轉進，該兵團黃司令官於出發前召見六十三軍軍長陳章，囑其「務必於共方部隊未到達前佔領密灣渡口，以掩護四十四軍之通過。旋驅車巡赴運河車站，視察部隊通過鐵橋情形，立即發現除部隊於河邊壅塞外，尚有難民兩萬餘人，奔走呼號，擠迫於橋頭，此等難民因曾受共黨暴虐，因頓恐懼，乃下令讓難民儘先快速通過，而同時又獲悉李家莊，馬頭鎮及鄭城附近等地集結之共方陳毅部隊主力，緊隨國軍南下，守備鄭城之國軍王鴻九部，於七日已遭共方圍攻。又共方在淮南之獨立旅並與其地方團隊，亦正星夜北進中。顯係欲乘國軍半渡之際，突襲夾擊。第七兵團乃作更周密之部署，藉以防堵來犯之敵。是夜，黃伯韜借必要人員進駐砲車，接第九軍報告：

「共方第二、第十二縱隊刻星夜北向密灣，似為搶佔運河渡口。」黃氏急求與六十三軍作電訊聯系，竟呼喚無應。木擬告知該軍促其兼程前進，搶得渡口，並佔領有利地區，終未能達。

國軍各師於八日十四時先後抵達目的地，構築工事，準備警戒。該時已有零散共方部隊出現，不時發生接觸。黃昏後，共方開始猛攻，激戰遂啓。黃伯韜親蒞第一〇八師師部督戰，官兵益加奮勵，浴血苦鬥。從俘虜口中，始知參加之共方部隊有第六、七、八、九等縱隊番號，並謂：共方傷亡慘重……云云。而國軍一〇八師亦受相當損失，該師第三二二團傷亡達一營之衆，第三二四團團長唐克鋒身負重傷，副團長邊立楨、營長李仲元等陣亡。黃伯韜竟夜未睡，蓋就心於六十三軍之與共方遭遇，及一百軍之渡河情形也。

翌晨，兵團部進駐碾莊。兵團主力陸續過運河鐵橋西進，情況仍擁擠紊亂。原派之廿五軍工兵營，不足以維持秩序。而此運河以西，趙墩以東鐵路沿線，已被共軍竄擾佔據，並發現共方第二、第十二縱隊番號。同時守臺兒莊、韓莊之第五十九軍、七十七軍，突於九日叛變。

十一月廿七日，國軍八十五軍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率該師兩個團，計兵力約五千五百人，於安徽羅集降共，十一月十三日，孫良誠（第一綏區副司令兼一〇七軍軍長），率軍部和一個師，共五千八百人，於江蘇睢甯西北投共，十一月十八日，趙璧光（國軍四十四軍第一五〇師長），於碾莊地區率殘部二千餘人投共，十二月，黃子華（國軍八十五軍廿三師師長），率該師兩團殘部於安徽蒙城之雙堆集投共，致國軍第十三兵團，原在運河西岸大許家、曹八集等地之守軍，亦爲應變起見，倉卒撤至徐州。因此原在該方面之共方部隊，得以抽出，繞道而至碾莊之西北面地區，不惟遮斷國軍西進道路，實對碾莊形成包圍態勢。黃司令官於是日午間，偕廿五軍副軍長楊廷宴，親至橋頭指揮渡河，並令集汽車趕運已渡河之部隊，集中於碾莊附近，直至黃昏時，四十師及一〇八師，已到達運河西岸，始回部隊。又徐州剿總會配黃兵團，僅有之一架重架橋營，該營曾在沂河架設橋樑兩座，本擬將沂河之橋拆遷至

運河，詎早被共方奪取，無從再行取得。孰知安裝於運河鐵橋上之炸藥，竟被共方砲轟擊中，鐵橋遂告燬損，在運河東岸掩護通過鐵橋之一〇〇軍，無法重返西岸。

斯時國軍因連日行軍與戰鬥，毫無休止，顯感疲乏，不得不予以休息，同時藉作整理補充，惟六十三軍情況不明，電台迄未收得消息。

十一月十日晨，黃兵團繼續西進，途中接奉徐州剿總轉達國防部命令，其要旨：

一、碾莊與曹八集中之交通，已被敵遮斷。通過不老河之敵已迫近碾莊。

二、兵團應即以碾莊為核心，行內線作戰，待援決戰。從速部署，並轉知六十三軍俟過河後，參加兵團作戰。

黃司令官乃遵上開命令，召集各軍長會議，認為此次可藉如此局面，引敵方主力於運河西岸平闊地帶與之決戰而殲滅之。各軍雖有損失，但士氣旺盛，必可一戰，以爭取豫東會戰更輝煌之戰果。於是重作部署：

一、第六四軍在碾莊以東——王家莊、三里莊、沙墩、亓大興莊線，佔領陣地。

二、第廿五軍（欠一四八師又三三二團）在碾莊以北——尤家湖——倪莊——亓家樓線，佔領陣地。

三、第一百軍在賀台子——彭莊——亓王莊之線，佔領陣地。

四、第四四軍在後板橋——碾莊車站——新莊——亓梁莊之線，佔領陣地。

五、兵團司令部（兵團直屬部隊，及廿五軍直屬部隊、三三二團）位於碾莊。

部署計劃既定，各軍分別遵令分佈陣地，黃伯韜指定廿五軍副軍長楊廷宴任地區指揮官，統一指揮橋工警戒及作戰事宜。

十一月十日之夜，國軍陣腳未定，共方已向國軍六十四軍陣地數度攻擊，其他各方面均有零星戰鬥：澈夜未停。

十一日晨，我空軍凌空助戰，共方稍退。國軍即乘共方攻擊間歇之際，在空軍掩護下構築工事，並不時派一班或一排或一連之突擊隊，向共方攻擊，實行威力搜索與支援戰鬥。是日黃昏前，各部陣地工事已大致完成，但共方攻勢則更甚。同時兵團部接一百軍報稱：

「該軍第四師先至曹八集，遭共方第十三縱隊圍攻，勢甚危殆。亟待援至。」

由此電推斷，則第六三軍必遭失利，若果六十三軍已得渡河西來，曹八集應不至遭遇攻擊。乃作積極處置：

一、立即抽調一加強團，馳援曹八集。

二、飭通信參謀務想盡方法，與六三軍謀取連絡，催報近日情形，並告知曹八集情況。

三、兵團部署及戰況，速報徐州剿總。

兵團派赴曹八集增援部隊，中途得悉四四師，已於當日全部犧牲，師長劉聲鶴戰至最後自戕殉國，並囑侍從將其屍體焚化，免淪敵手。其悲壯激烈，殺身成仁，真足扶持正氣，激動軍魂。

先是第六三軍掩護第廿五軍通過新安鎮後，即向密灣前進，但碾莊與密灣一段交通，均係村落小路，車輛通過困難，以致行動遲滯。

泊十一月八日，第六三軍遭共方截擊，乃先派兩營渡運河至西岸以作掩護，不意共方第二、第十二縱隊主力已跟蹤掩至，襲佔密灣渡口。於是過河兩營，被共方第九縱隊圍困，翌日，共方全面進攻，傷亡慘重，戰至十一月十

日，該兩營全部犧牲。至十一日，共方向六三軍猛襲，但未獲逞。

十二日，共方集中兵力，向小東門以重點進攻，遂被突破。而其他各方面之陣地，亦先後陷落，該第六十三軍已傷亡殆盡，軍長陳章自戕殉職，與劉聲鶴先後成仁，誠烈矣哉！

是晚，第七兵團接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來電：「本兵團奉命於文（十二）日在大許家（徐東四十里）集結完畢，即向貴兵團馳援，預計於刪（十五）日可以會師。」等情。

由於曹八集之陷落，及六十三軍之失利，共方得以集中兵力圍攻碾莊，發動全面攻勢。

十三日，共方向國軍第四四軍重點進攻，國軍瞭解共方「找弱點用重兵」，乃令第六四軍、第一百軍，各以一部向四四軍正面之敵左右翼出擊，並以砲火集中支援，同時與空軍配合出動轟炸。共方傷亡慘重，但仍用波狀攻擊戰術，繼續猛撲，增援不已，七兵團抱堅忍犧牲決心，一面靜候援軍，一面強毅應戰。

十四日拂曉，第四四軍軍長王澤濬以親身指揮，頭受重傷，各據點相繼陷落，勢將逼近碾莊核心陣地。但廿五軍之四〇師一八團佔領碾莊南端無名莊，掩護四四軍餘部，移轉至碾莊西北之小牙莊。重予編組，繼續作戰。孰知此一移轉，適足以便利共方砲隊，利用鐵路路基高地掩護，向前轟擊前進。各軍後方之威脅更大。又共方之第一、第四、第七各縱隊主力，轉向廿五軍一〇八師陣地秦家樓，及四〇師陣地倪莊，併力猛撲。卒賴官兵沉着應付，暫告擊退。共方另股第四、第三、魯中、魯南各縱隊則向國軍一百軍賀家台子、彭莊、王莊各陣地一再猛攻。周志道軍長除飭令堅守外，並抽派部隊，向共方逆襲，共方遂退。黃伯韜以共方必將重來，且勢更加猛，令廿五軍一〇八師加意策應第一百師作戰。另抽派部隊主動攻擊來犯共方之側翼。

十五日十四時許，參謀總長顧祝同飛臨碾莊上空，與黃伯韜以密語通話，垂詢戰況，並轉達總統對黃伯韜之關懷與期望，指出此一戰鬥，關係全局，囑能在增援部隊到達前，沉着應付，堅忍固守。復詢以有何困難？黃伯韜答謂，職業蒙總統教誨培植及鈞座之知遇，早已以身許國，此次戰鬥決不顧任何犧牲，固守待援，完成引匪就殲之任務。目下兵團除補給問題外，無他困難。彈藥、給養、砲彈、衛材，望能多予空投補給，援軍望及早到達。」顧總長除慰勉外，對於補給及援軍當立即飭令辦理。黃氏將上述情形通知各軍各級，一時羣情振奮，士氣倍增。此時碾莊以東，共方之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快速縱隊主力，向國軍六四軍方面猛攻，集中砲火，排列轟擊。入夜更以步兵衝鋒，王家莊據點遂爾陷落，秦家樓亦同時失守。

十五日黃昏，共方推進至鐵路沿線，其砲火向國軍李家莊、無名莊第廿五軍四〇師一一八團陣地集中射擊，掩護其步兵進攻。於是白刃相接，反覆爭奪，迄至翌晨，陣地失而復得者四次。國軍傷亡士兵約千人，第一一八團團長向福綏重傷，該團營長顧席儒陣亡、營長李世卓重傷，戰況慘烈，驚心動魄。旋共方得強大增援，國軍漸呈不支，該二據點，終淪於共黨之手。碾莊南部，遂直接受敵。

十六日拂曉，國軍第一百軍與共方部隊激戰，傷亡過重，軍長周志道及其六三師師長盛超均負重傷，賀壽子、彭莊、王莊等據點，先後陷落。廿五軍一〇八師自秦家樓撤至大牙莊增防，並接援一百軍餘部轉移至黃灘繼續作戰。是時，碾莊之西南方面藩籬盡撤，東北兩面外圍陣地，亦多缺口，兵團部為謀減少守備空隙，免為共軍所乘起見；即令廿五軍四十師放棄倪莊據點，抽調該師一一九團加強碾莊核心守備，歸併地區指揮權由楊廷宴統一指揮。

是夜共方復來猛攻黃灘，周軍長盛師長襄傷臨陣指揮，卒因衆寡懸殊，陣地失守，僅餘之官兵撤至碾莊重行編

夢。周軍長斯時以流血過多而昏迷，及醒，始知身在兵團部附近，驚顧左右曰：「吾尚可殺匪，何爲來此？」司令官有何指示？」適黃伯韜親來探視，即慰之曰：「一百軍官兵已盡最大努力，兄可無愧，亟盼安心靜養，爲國惜身！餘由伯韜及健在同志負責，一俟援軍到達，吾人必獲最後勝利！」

十七日礮莊西、南兩面均已直接與共方部隊接觸，黃伯韜判斷：共方將傾全力來犯！遂令第廿五軍趁白晝空軍掩護下迅速調整部署，加強守備，是日午刻起，迄至黃昏，共方連續發砲約計萬餘發，整個礮莊已被轟成瓦礫堆，塵硝彌天，血肉橫飛，內外交通，因是遮斷。共方乘此機會，派步兵分向西、南兩門猛衝。楊副軍長親率所部奮勇堵殺，劇戰至十八日黎明，共方始行暫退，總計激夜被共方衝入南門三次，經國軍候其進入而聚殲之，共方士兵屍骸填塞道路，而國軍之傷亡，亦極慘重。第廿軍副軍長楊廷宴身負重傷、第一零八師三三三團副團長趙文來負傷、營長劉光仁陣亡。

十八晨，楊副軍長血凝征衫，向黃伯韜報告戰情後，出語同僚曰：「司令官一身繫全兵團安危，望大家能盡力維護，並勸司令官善自珍重」。左右答稱：「司令官已晝夜不睡不休，惟聽取戰報，指示機宜。昨夜住處被匪砲轟中，勸之不肯他移。且笑謂曰：『匪爲我開窗，此室才見光明，目前無一寸乾淨土，吾人唯賴正氣屹立』。」

於此同夜同時，共方對國軍第六四軍、第廿五軍各陣地，發動另一猛烈攻擊，尤以六四軍所轄之一五九師四七六團第三營據守之三里莊、沙墩之據點更爲激烈。所連系各該據點之線，均被共方以壓倒優勢兵力，切割爲數段，形成各個孤立。共方翻覆攻入，每被逆襲而退。詎該營以竟夜戰鬥，傷亡殆盡，營長周錦元環顧陣地忠魂，累積如山，決心拚流最後一滴血而自戕殉職。蓋與一零八師三三三團營長劉光仁同時壯烈成仁，於斯具見武德軍魂之未泯。

也。

十八日，共方部隊已在碾莊西南面作業，距離兵團部僅二百餘公尺，戰況已近短兵相接階段，共方復以火海、人海戰術兼施，直向莊內猛撲。黃司令官復作如下之緊急措置：

一、令兵團部警衛營長苗樹仁，將兵團部之警戒部隊，儘量減少，集結兵力，聽候使用。

二、飭苗營長抽調兵力一連，至碾莊西面擔任防堵。

三、重新編併尙可作戰之各旅餘部隊以備應戰。

四、令六四軍劉軍長、廿五軍陳軍長，務趁晝間空軍有力支援下，整頓兵力，重予調配。

按廿五軍一〇八師原係據守大牙莊，但自黃灘失守，大牙莊即被圍困。共方於十八日夜忽然對大牙莊猛烈攻擊。該師長李世鏡督勵部屬，抵死固守，並不時派隊逆襲，擊退來攻之突襲部隊，僵持近曉。是役壯烈陣亡官佐，有：第三二二團副團長楊振青、營長彭自現。第三二四團代團長張新安、營長朱海菊、特務連長應春荃、第一〇八師師部副官王化西。

該師傷亡官佐如是之衆，士兵倖存亦寥寥無幾，而共方之後援有增無已，大牙莊遂告淪陷。

是夜，第四〇師之尤家湖據點，亦同時遭共方猛攻，師長曾正我親率有力之一一九團向共方逆襲，一再出擊，會師長雖腿部三處受傷，尤負創忍痛甚，仍飭人扶持，親臨前線督戰。眼見其部屬一一九團營長晉德安、李學陶亦負傷不退，會師長在陣前自忘痛苦，轉向晉、李二營長撫慰有加，士兵被此情景激動振奮，一齊忘身狠鬥，卒退來犯之敵。

該兵團在此孤立困守，破碎零落之際，其較有力部隊，亦祇廿五軍及六四軍各一部，且官兵多已負傷，彈藥所存無幾，尤以守備空間愈縮愈少，空投補給，益感困難，碾莊之內，無處不橫臥傷患，其慘慘不忍目覩。政治部主任閻毅少將率同政工同志，竭抒精誠，多方安慰，歿死扶傷，並奔走陣前，鼓勵士氣，激發軍魂，終因奮不顧身，而殉職於疆場。

十九日晨國軍待空軍臨空助戰，共方攻勢稍戢，旋空軍離去，共方重來砲轟。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就心北面兵力單薄，向黃司令官請調兵團部警衛營增援，該營轄步兵三連，機槍一連，雖有損失，然仍為有力部隊。黃司令官囑該營向廿五軍報到，聽憑指揮，營長苗樹仁報稱：「現本營僅控制一個連，備聽司令官必要時使用，其餘均在周圍擔任警戒，在碾莊之西，本已有本營一連任防，贍此一連，再予抽調，則兵團部何人擔任護衛？」黃司令官徐謂之曰：「警衛營不宜輕用，汝意固善，惟須體會余此時之意圖，與平日之抱負，望汝能全力作戰，確保陣地以待援至，兵團部只留二人可矣。」云云：苗營長感動淚下，初擬遵令前往北面，適南門告急，乃又奉令趕赴南門增防。

是日十九時，共方集中砲火，還向碾莊猛擊，連續至廿四時，國軍核心陣地悉被摧毀，汽車、汽油、彈藥、房屋，均着火燃燒，濃烟蔽空，一片火海。國軍亦用砲火向共方密集還擊，但砲少彈罄，難生威力。俄而砲聲倏止，共方以密集隊形，猛向西南二門衝鋒，陣地為之突破，頓成混戰狀態。爭殺之烈，震撼天地。共方之後續部隊擁擁而至，國軍繼續與之巷戰。楊副軍長奔走駭汗，右臂被手榴彈所傷，頭皮亦受彈片劃破，但仍裹傷奮戰如故。時共方部隊已入碾莊中心，苗營長為護衛黃伯翰，擬抽調北面一排警衛營回兵團本部；為黃氏所阻，且斥責曰：「如此

緊要關頭，尙欲顧我個人，應確保軍人人格，不得擅離。」

黃氏目覩戰況若是惡劣，即抽調第六四軍一營前來接應，一面顧左右人員而言曰：「僅留可以隨身攜帶之重要文件，且作必要時銷燬之腹案」。語訖偕楊副軍長親赴北門觀察，路見士兵蓬首垢面於頽垣瓦礫中，猶凜凜有威風與勇氣，面囑「火力若是猛烈，應求隱蔽身體」。士兵均感動。

時廿五軍陳士章軍長，傷及項部，仍率所部作戰，四四師師長曾正我仍守原據點。一零八師師長李世鏡傷足部。黃氏據報，始悉：警衛營長歐陽費民陣亡。四零師一一九團團長彭惠、營長白珩戰死。一零八師三二二團團長李林馨殉職。其負傷者爲：兵團部警衛營營長苗樹仁、一一九團副團長鄭祖興、營長史克俊、焦太照、廿五軍砲兵營長曾連生等。碾莊之內已無完整之一排，甚至一班之部隊。各處皆屬零星官佐士兵，各自爲戰。俄頃，黃司令官欲回兵團本部之路亦經截斷，戰勢危急已至極點。而黃氏向李世鏡師長表示謂：「當黃泛區帝邱店劇戰之時，我之準備是否正確？」李師長知其意指在：不成功，即成仁。抱必死之心，而答云：「今日情況不同，司令官爲團體需要，尤爲領袖所需要」。黃氏自語自言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更能體會領袖平日訓示之真義矣」。是時官佐士兵正在圍困中之間歇休息。平明，第六四軍第一五九師四七六團副團長潘吉屏中校，率一加強營至，而稟劉軍長之意：「請司令官速至大院上再作處置」。適突入之共方部隊已迫近，潘副團長乃分一部兵力護送司令官等至大院上軍本部，自率主力向共方反擊，以爲掩護。

當黃氏離去前，分別囑咐陳士章軍長、曾正我、李世鏡兩師長：「再就餘部迅作調整，務要堅持到底，終有成功之希望。」同時潘副團長與共方格鬥，衆寡懸殊，遂陷重圍，幾經衝殺，犧牲將盡，潘氏自身亦受重創，戰至最

後一人，自戕成仁。

至于廿五軍小牙莊陣地，先已被共方攻佔，只留北門據點，又被突破，礮莊遂告陷落！

關於村落中之兵團部駐地，遙聞殺聲震天，歷久始息，蓋負責警衛之戰士，均在其崗位上戰死。噫——烈已哉！此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十九日事也。

十一月二十日礮莊失守之後，第七兵團賡有礮莊以東第六四軍第四零師之尤家湖各據點。斯時，第二兵團（邱清泉）、第十三兵團（李彌）之解圍部隊，進抵大許家南北之線。共方部隊之一貫戰術爲圍點打援，即對增援部隊施以重重牽制，阻撓達成增援任務，使被圍者困守至於糧盡彈絕，士氣衰頹，便可一舉得手，濟南之前例俱在。故國軍兩兵團沿途連遭截擊，一村一莊之通過，必受阻撓，非付出代價，斷難前進。何況地形河流交叉，岡陵起伏，偷襲橫截，遭遇困阻，不獨使增援部隊，行進遲緩，且於沿途應戰，傷亡頗重。而終不能抵達第七兵團困守之礮莊。

是日，大院上各據點，各自對付共方之進攻，失却呼應連絡之效，且糧彈斷絕接濟，實屬無法久守。而共方忽而叫喊誘降，忽而猛撲急攻，實行孤立圍攻，搖動軍心。黃司令官考慮及此，憂慮第四零師之尤家湖將難於聯繫，必先轉進吳莊始克接近，乃冒彈雨之險，偕楊副軍長蒞臨吳莊部署，以備堅持而待援至。

廿一日，共方果然採用個別孤立各個擊破戰術，分別向大院上、吳莊、尤家湖、大興莊各據點、隔離環攻，國軍各據點之連絡，遽爾隔絕。在吳莊之官兵，聞司令官親來督戰，士兵多抱傷復起，參加戰鬥，黃司令官立處，子彈時有墜落，楊副軍長勸之稍避，漫應之，不稍移。楊副軍長身先士卒，同時暗囑隨從，加意保護。隨從恐其自殺

，乃潛取黃氏手槍，黃氏發覺，即厲聲斥責之曰：「汝之愛我，我深感汝，惟此乃大義正氣，請速交回，設或不早自處，我豈甘受辱於敵人？」

廿二日，共方自曉迄午，各別圍攻，援軍未至，困門已屬無力，於是相續陷落。獨吳莊繼續作戰，至十八時許，士兵已無多人。而共方則因憐於各地猛力抗禦之餘威。不敢輕於衝入。

黃司令官認爲已至最後關頭，從容謂楊副軍長曰：「我承總統之培育，總長（顧祝同）之愛拂，授命統率大軍，以期滅匪。刻惟汝我相對，將何以報唇峯而慰部屬？戰事之得失，固無足以論成敗，惟吾人應保軍人氣節！非敢以死自白了。」黃氏語畢，即向楊副軍長取名片一紙，立書：「黃伯韜，楊廷宴精忠保國」十字。交楊氏且告之曰：「所以併書君名者，因兄雖不即死，乃爲余交付汝之任務，用明其義則一也。」又曰：「君已多處受傷，血漬遍體，混傷患中，或易脫險，務將本兵團之實況，面報總統及總長，望能用爲今後參考，講求改進，常獲勝利。此爲兵團全體戰死官兵之英靈共同所望者」。楊副軍長急奪黃氏手槍涕泣而言：「兵團雖遭覆敗，司令官實可無愧！廷宴所以始終隨侍左右不避艱險者，乃自司令官言行中得見軍人精神。總統將如何需要如將軍者！若云死節，廷宴請先」。黃氏即慰之曰：「余深受國家重寄，轉戰南北，原冀滅此朝食，平亂救民。今糧盡援絕，身爲革命軍人，決以一死報國。以期無負總統之培育，無愧死難之弟兄。事急矣！無暇詳論，你我多年患難，今得共同殉職，固所願也。但諸事不得上達，則有負官兵對吾人之期望。汝務須完成余最後交付之任務，將來之責任尤重，願兄好自爲之」。

黃司令官言訖，取出手鎗，端正衣帽要楊副軍長同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從容自戕。此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廿二日十八時事也。噫！「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如黃將軍者，可以名垂青

史而無憾矣！

當黃伯韜之初被圍也，徐州剿總劉峙，急調方始結集於碭山之邱清泉兵團前往碾莊增援。邱兵團即起程東向，旋得先遣部隊報告：「在大廟、虎頭山、陳莊、王家園一帶之共軍，爲第一、第十、兩個縱隊，工事堅強，有縱深配備」。另有共軍第四、七、兩個縱隊，集結在鼓山附近，每一山頭，每一村莊，都有共軍構築工事」。邱清泉接獲此項報告後，即邀集所屬軍師長以上會議。有提出：「我們應以迂爲直，繞過當面的匪軍，迅速到達碾莊，以打擊包圍部隊，才能解救黃兵團的脫險」。其參謀長則謂：「匪軍在羣山複疊地帶，構築堅強工事，向其正面進攻，是患攻堅之忌，傷亡必多，時日必緩。萬一黃兵團再不能持續固守，那麼犧牲雖大，恐怕來不及到援，任務反不能達成了」。邱清泉以爲「後方補給不安全，甚至有被匪截斷危險。倘使情勢有一個逆轉，我們可能遭遇和黃兵團相同的命運」。至此，邱司令官作出決定：「打擊當面的敵人，就是打擊圍困黃兵團的匪軍。只要我們能勝利做到這一步，第二步就容易了」。邱氏又指出：「陷宿縣之匪軍，已有一股北竄；我們後方交通安全，沒有把握，很可能也陷被包圍的危險。」邱氏乃派其所部第五軍在左，七十軍在右，擔任主攻，其餘部隊，只擔任側翼掩護，或預備隊。

共軍施展「圍點打援」之故技，爲遲延邱兵團之增援碾莊，因竭其最大之力，阻遏邱兵團於中途。蓋第五軍，素爲共軍所畏也。當邱兵團進攻時，係兵力集中，火力集中，但用之於山岳地帶，未免虛耗。共軍備於「打援」之部隊，本多於包圍之部隊，邱兵團用盡火力兵力，終未能奪得鼓山而前進。最後，戰鬥演至短兵相接階段，由於作戰地區之高低懸殊，國軍處於仰攻，用力多而奏效微。結果集中排砲射擊，連續不休，至於鼓山石飛沙舞，共軍守

兵，無法安身立足而退出鼓山。然而其前仆後繼之傷亡，實甚重大。鼓山克復，由鼓山而望碾莊，已可指點其村落。國軍只加強守備於鼓山而已！欲俟南翼一九三師、北翼第五軍推進後，再繼續向前攻擊。曾有電致黃伯韜將軍於四日內到援碾莊。此十一月十一日事也。

當第五軍向鼓山推進時，突遭遇大隊共軍，以人海戰術猛撲，自小邱山至高莊山之間，卒受制於第五軍之火力，國軍得進入劉莊與高莊。邱兵團在鼓山一仗，調整部署，忽已至十三日。下午七時，接徐州第一百軍急電：「匪軍六個縱隊，突向我猛扑，攻擊飛機場，擬截斷我軍後路」。因此邱氏電復，駐守該地之第一百軍及七十四軍，沉着應戰，一面抽調七十軍之九十六師馳援。因邱兵團自由礪山向東赴援時，以一百軍及七十四軍爲殿後，即在徐州南郊，與李彌兵團取得聯繫者。共軍以鼓山已失，邱兵團可能迅速前進，遂驅大軍以斷其後路，並徐州南面亦趨危急。於是鼓山戰鬥之高潮，乃移至徐州南面之機場。雖然邱兵團得一輝煌戰果，最高統帥賞賜有加，然而黃伯韜兵團之命運，則不能救矣。

邱清泉接得後方吃緊報告：立即回至後方，用：「平面三層火網」之配備，與共軍決戰。共軍不知國軍邱兵團之一百軍已與李彌兵團取得會合，又不知國軍邱兵團之七十四軍與七十軍直接連爲一條陣線。共軍只知專攻七十四軍與一百軍之接合處，以爲最弱一點，作爲攻擊目標。共軍進攻時，國軍火力，熾烈無比。而共軍不顧生命，仍驅使地方團隊以人海戰術，不斷前進，至於踏屍而前，終至屍積遍野。

司令官以共軍如此殘酷，而第一線之武器使用時間過長，令第一線在第二線火力掩護下撤防。共軍以爲被它擊潰，便放肆前進。不料第二道防線，突然勇猛出擊，共軍猝不及防，傷亡甚大，急遣其援軍併力再攻，國軍又按照

第一線方法，由第三線火力，掩護第二線轉進。迴旋至第三線後方，佔領預備陣地，準備隨時適應情況而出擊。共軍雖已蒙重大傷亡，但目覩國軍撤防，料必有不能戀戰之因素，不趁此機會予國軍以重創，更待何時？於是命令共軍奮力前進猛攻。

國軍以第三道線爲主力陣地，共軍自黃昏戰至翌晨黎明，不獨毫無尺寸進展，甚至傷亡不可勝計。正在攻勢最烈之際，國軍陣地忽然呈現不支之勢，共軍以爲時機已至，遂拚命作孤注一擲之大舉進犯。

詎知此乃邱清泉司令誘敵深入之計，國軍陣地形勢變更，以原居第三線之七十四軍爲主力，第一線撤下之部隊迂迴於左，第二線撤下之部隊迂迴於右，佈成袋形陣勢以待共軍深入，施以箝制痛擊，使之進退維谷，死傷枕藉，贏得一時共軍有「逢邱不打」之虎威！

是役，邱清泉之能獲全勝，其於共黨所慣用之狡詐伎倆如：佔面、斷線、打點、圍點、打援、讓開大路、退踞兩廂、圍而不打、以多吃少、等等，可說均已洞悉其奸，故此次邱清泉之徐南大捷，堪稱戰亂戰役絢爛之頁！故最高統帥卽於得勝之翌日（十一月十八日）撥給銀圓二十萬枚，以資犒賞。

共軍徐南既敗，藉其士兵之衆多，復揮軍而東，以臨於鼓山再逞以多吃少之故智，以冀挽回徐南敗績頹勢。蓋當邱兵團後方危急之秋，調兵西向，守鼓山之員額無多，共軍又乘隙而攻佔鼓山，待邱氏回師再赴援礮莊，則鼓山已失，無法直趨以援黃伯韜兵團，又不得不致力以攻鼓山，俾打通礮莊之路。孰知魯南共軍，傾巢而來，竟得與徐東之礮莊方面共軍匯流。因憐於「邱缺嘴」之聲威，共方兵力已增至數倍之衆，企圖與邱兵團對抗，並阻滯其解黃兵團之危，而共軍此一伎倆，又爲邱氏洞察機先，乃乘黑夜之間，先遣輕裝部隊躍至鼓山共軍之背後，另一隊預伏

於東側，阻遏共軍增援，以主力突然暗中撲索上山，屏息以臨其鼓山陣地之後，另一主力，由正面襲擊。共軍以突然遭受襲擊，陣後各處環受衝殺，勢呈不支，卒在鼓山之上各自奔逃，國軍遂復二次奪得鼓山。

當鼓山陣地再度被共軍奪去時，國軍馮團曾有一部份被俘。至國軍重得鼓山，整理戰場，發覺馮部士兵屍體，均雙手反縛，或全身細綁，於是共軍殘殺戰俘之事實，昭然於世，是則共軍直成獸兵矣。

共軍以鼓山復失，料邱兵團必迅速前進，以解黃兵團之圍。更集較多之兵力，以壓倒優勢，向邱兵團併力猛撲。邱兵團知其又用「人海戰術」，乃沉着應付，共軍不能得逞。於其攻勢稍敗之際，邱司令官接徐州剿總電知：「黃伯韜兵團已於十一月廿二日晨全部犧牲」。又以「劉伯承部又在宿縣方面結集，沿津浦兩側，直向徐州進犯。令邱兵團立即沿津浦以東地區，向南迎擊共軍」。於是徐南大戰，又揭一幕。

邱清泉兵團，爲赴援張莊，解黃伯韜兵團之圍，終因共軍施其圍點打援之狡技，復因回救後方而致延遲不前。現在於二次攻佔鼓山，大敵當前之頃，又奉徐州剿總電令回師西向，以阻遏自宿縣北向攻徐之共軍，面南迎擊。於卅七年十一月廿九日邱兵團前鋒，已經到達褚蘭、大王廟之線。（距宿縣不遠）

先是，徐州剿總劉峙，已率參謀及聯勤人員，南遷蚌埠辦公。其他工作人員及軍略物資，由副總司令杜聿明留守。當邱兵團於徐州東面作敵前後撤，已費盡最大氣力，得全師無恙，積極遵令西南向行動，剛進軍至褚蘭，忽又接徐州剿總杜聿明急電：「剿總決定撤出徐州，該兵團儘速到徐，掩護撤退，並儘可能向西南靠近黃維兵團，以打擊包圍黃維兵團之共軍」。於是，邱兵團行進指標又轉向徐州。但凍於黃伯韜、黃維兩兵團於行動中，遭到包圍，又鑑於迭次戰役中，國軍輒於行動中吃其大虧，故不得不格外慎重，以掩護徐州之撤退。

按黃維兵團，原駐防於河南、鄭城。奉令調遣參加徐蚌會戰，在行程中。急遽向固鎮進發。黃維兵團裝備之優良，士氣之蓬勃，並不遜於邱清泉兵團，惟其所經之路線爲黃泛區，淮河支流交叉，沼澤遍布。事前既乏架設橋樑之準備，全憑士兵逐步搭架，逐段跋涉，縱有機動工具，無法施用，輜重捆載，益覺艱難，遂致耽誤日期，固鎮先爲共軍捷足而得。而黃維兵團原奉令向宿縣之西共軍進擊，詎因固鎮之失，被迫改向東北行，卒在安徽蒙城東北之雙堆集被共軍包圍待援。而邱清泉兵團既負掩護徐州撤退任務，復須兼顧馳援黃維兵團。然而與蒙城相距既遠，且受澗河、渦河、濉河阻隔，終因在蕭縣路上不能前進。但黃維兵團，在被圍中，候援不至，於十二月十六日共軍猛施「人海戰術」，將鄉民之老弱婦孺，趕至前線，以消耗國軍火力，並鞭策民兵俘虜爲前鋒，冒國軍砲火，被逼前進，雖爲黃維兵團所擊退，然卒因受該兵團八十五軍第廿三師師長黃子華率其部兩團叛變之影響而致喪師失地，僅兵團副司令胡璉率部五千人突圍而出，且戰且退，予共軍之追擊者以重創。

邱清泉既率掩護撤退徐州命令，邱氏本人認爲實屬策之下者，其中策則爲固守徐州，打擊來犯匪軍，乘勝收復宿縣。其上者則爲以徐州爲基地，連繫蚌埠方面友軍，以南北夾擊宿縣附近地區之匪軍。但亦明瞭上峯放棄徐州之政策，係不願再把機動部隊拘束於一個孤立之據點。時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於十月卅日邱清泉到徐後，即與會商撤退部署，飭各部儘量領取彈藥、汽油、糧食及各種裝備，一面將後勤人員二千人，傷兵二千人，及全部軍眷，除分由五十架運輸飛機撤出外，其餘撥乘火車至浦口，轉至京、滬、杭各地。是爲卅七年十二月一日，三日徐州全部撤完，杜聿明同邱清泉兵團同時向蕭縣進發。

徐州至蕭縣有公路可通，惜乃屬泥土填就，邱兵團之機動部隊，無法使之快速，且只此一道可通，既需行車，

復需行人，途中壅塞不堪，只能慢行緩進。至十二月三日中午始抵蕭縣。正待打尖，向永城前進，詎無數難民，扶老携幼，人如潮湧，此一條蕭永公路，全被擠得水洩不通。於是該兵團便令士兵，分列於公路兩側步行，而將車隊向公路行駛。車隊中有汽車、砲車、輜重車及牛車馬車，每車除駕駛員或御者外，均派有武裝以護衛車輛。而該等車輛乃行駛於沿途之難民之夾縫中，偶而有一車損壞不能前進，其後續車輛亦即隨之停頓而不能前進。於是車輛變成像蠕動之爬虫一般。致士兵在前而車輛落後。自蕭縣出發，在進程中，已臨夜色，不敢略事勾留，詎突遇共軍竊路襲襲，槍彈橫飛，護車士兵，立即下車，以車爲防禦掩蔽，羣起還擊。此批共軍對截擊車輛毫無經驗，僅在相當距離外，向車輛射擊而已。杜聿明、邱清泉得報，當派第五軍後衛隊，回向蕭縣，以援被截擊而受阻滯之車輛。迨第五軍到達，車輛有因擊中車頭，或油箱而起火者，有因共軍擁擠上前，搶掠車上輜重者。經擊退後，檢查損失，不可勝計。乃整修清理，擬立即駛離。正在斯時，左翼第四十五師亦遭共軍襲擊。

緣邱兵團行軍，向分三縱隊行進，以掩護主力安全。行進中，第四十五師之左翼一個團兵力，突遇共軍射擊，其初尙能一邊還擊，一邊前進。稍後，共軍大隊掩至，以壓倒優勢，向之猛撲，迫得該左翼部隊，立即就地抵抗攻擊，並立即構築工事，希望能支持時間，以待來援。奈事有湊巧，該團之電訊器具，剛被共軍砲火所燬。同時四十師主力，亦逢當前大敵，該師張師長因左翼無報告，諒屬安全，乃專心於對付當面之敵，戰至天明，共軍攻勢已到尾聲，張師長又記起左翼丁團長，立即回師接應。

同時七十軍、七十二軍、一百軍各部位，無不遭到共軍之分別攻擊，但打打退退，不能阻遏國軍前進。共軍所採取者爲：「逐段猛打，逐段躍進」的戰法，共軍是每次等到國軍前進時，又集結兵力追擊國軍。而國軍則每次等

到共軍接近時，用火力擊退，再行前進。惟其如是，遂致國軍前後左右不能相顧，致落在後面之部隊，因失去了互相掩護呼應之效能，每變爲孤立無援。輒被共軍個別吃掉。統計國軍在自宿縣起程途中，有：徐州地方團隊之暫編一個旅、卅二師之一個團，被擊敗而傷亡殆盡。至於輜重方面：其彈藥、糧食、裝備、車輛，大部份都被共軍劫奪以去，其殘存者少之又少及戰車部隊而已。

國軍且戰且行，行程迂緩，又以各部隊均經戰鬥，亦需整理。時前鋒到達陳官莊，距永城尚有百餘里，邱清泉恐往後情勢，更有演變，宜先恢復原狀，再圖前進。於是擇陳官莊附近一帶爲集結地區，俾資整理，當日陳官莊尙無共軍威脅，只南面有共軍作擾亂性攻擊。

四十五師之丁團，既遭在後面爲共軍所圍攻，但仍奮力抵抗，不稍示弱！其與師部連絡被遮斷，不過數十里之隔，恢復連絡呼應，並不困難，却因沿途遭受共軍阻擋與侵擾，經一日一夜之不斷行進與反擊，卒能把丁團援救出圍。於是，變更行軍次序，改丁團在前作前衛，張師長親自率衆殿後，追向友軍與之會合，不料共軍仍圖窮追，迭經激戰後共軍始退，該師終集結於陳官莊。

共軍於偵悉國軍重兵集結陳官莊，於是，急調駐在符離集、商邱、以及黃泛區方面之部隊，施以重重包圍，並沿着村莊點線深溝高壘，構成層層密密火網，圍困國軍。

國軍稍事整理，即欲西向永城。但自陳官莊起往永城之公路，已破壞不能行車，動程之時，共軍不時向之射擊，乃一邊修築道路，一邊抵抗共軍，行進速率，極爲滯緩。於是邱清泉令：「七十軍向西南、第五軍向西北，作試探性前進。與邱兵團同時由徐州撤出，同道而行至陳官莊者，尙有李彌兵團、孫元良兵團。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

明亦在焉。第五軍向西北方進攻，正前驅時，見到共軍各村均築有堅強工事，且村與村相連絡，溝與溝相暗通，錯綜而又縱橫，共軍固守於溝壑，未嘗輕出，七十軍熾烈砲火，自下午三時至翌晨天明，始終未得攻下一個村莊。邱清泉以此種實情，報告杜聿明請示。杜聿明以爲趁西北方共軍防禦工事未經築成，料共軍在東與北方面不會置有重兵，我們應先向北打，打出包圍以後，再回復原方向續進。」邱清泉認爲「邊打邊走，我們損失將必重大」。杜聿明云：「共軍既已圍困黃維兵團，又要包圍我們，我們有力量把共軍擊潰」。乃令邱清泉以第五軍、七十軍協力向共軍重點所在之西南攻擊。繼謂：「打蛇打頭，擒賊擒王。」

於是由第五軍居右，七十軍居左，以通永城之路線，作爲作戰目標，攻擊前進。此爲陳官莊被圍四天後一次最大戰鬥。戰鬥開始之時，邱清泉鑒於共軍構築工事之堅固，非先予以破壞，不足以赴事功，於是僅速組織「破壞隊」，攜帶各種破壞器材，並引火物件，利用地形地物，匍匐前進，施行徹底破壞。兩攻擊部隊，隨之於後，詎知共軍早有戒備，破壞組人員還未爬到壕溝，先多被共軍射殺。而國軍攻擊部隊完全暴露於共軍前面，劇戰因而展開，共軍以壓倒多數兵力，復憑藉工事據險頑抗，邱清泉乃派戰車（按在途中汽車、卡車雖多毀損不堪使用，惟戰車因共軍不知破壞，得乃保存。）掩護第五軍七十軍，開路衝入共軍陣地。共軍全部避入壕溝之內，國軍乃集中火力，摧毀共軍防禦工事，同時施放煙幕彈，使共軍無法張目，前進部隊，始得接近壕壑，再以手提衝鋒槍、卡賓槍、手榴彈，直接向共軍廝殺，共軍前無去路，後無援兵，三萬餘人，全被國軍殲滅。

其間經過三日三夜之戰鬥，七十軍佔領王莊、李樓。（陳官莊南面）第五軍佔領陳官莊一帶之共軍陣地，（陳官莊西面）。翌日，七十軍由李樓再向南面之徐莊攻擊，共軍負隅頑抗，七十軍攻勢銳利，共軍抵死苦守，一個縱

隊將被殲滅，而後續縱隊又進入陣地相繼抵抗。由是，國軍每殲滅共軍一個縱隊，共軍又增加一縱隊，如此更番增補至八九次之多，而國軍亦已耗去大量彈藥，同時在陳官莊西面一帶之第五軍，亦傾力向共軍猛攻，而共軍之抵抗，一如李樓方面同出一轍，兵力傷亡增換補充，亦連續達七八次以上。共軍鑑於士兵之傷亡慘重，其在陳官莊者幾全歸覆沒，欲自他處調集，則又遠不濟急，於是欲挽救其危急命運，而有不擇手段之殘酷毒辣方法，以對付國軍。以人道主義立場而言，世界戰爭，且禁用毒氣，而中國共產黨竟甘冒不韙，用以殘殺同胞，真慘無人道之尤者矣。當時京滬各報，競相報導，但中共方面，竭力否認，蓋恐受國際指責也。

受到共軍毒瓦斯彈，連續至三枚之多者，爲鄧師馮團。因不防共軍有此殘酷一著，一聞到芥子氣味，強烈觸鼻，在戰場上既無急救方法，只得急用濕毛巾掩鼻，但已有很多士兵中毒。急報兵團部，立令各部隊注意預防，一面調在王莊之吉團，替馮團接防，戰事遂爾暫告沉寂。

邱清泉向杜聿明報告。杜聿明正待邱氏到來研究對策。杜氏一見邱氏，即謂：「你的第一步計劃，我看已是失敗了。現在，我們來研究次一行動罷」。邱氏認爲：「照目前情勢，惟有暫取守勢，以待匪軍來攻，則還以極大創傷，乘機轉爲攻勢突圍，殊較穩當。」杜聿明認爲：「假如匪軍只取圍困政策，而不及時採取攻勢，則我們擴日持久、糧食彈藥消耗，將無法支持，萬一到此地步，要突圍必更吃力，且更無把握矣。」杜氏並表示：「已命令孫元良、李彌二兵團今晚突圍。時卅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也。」

是晚，李彌兵團因向西突圍，適共軍在西方與西北方，置有重兵，致未能打開通路，無法突出青龍集一步。孫元良兵團，則向北面突出，以爲北面共軍不至集結重兵，但事情恰不如此。因共軍知國軍有三個兵團，故其包圍青

龍集之兵力多出國軍數倍，故四面八方，無隙可乘。當孫兵圍突圍之時，由西、北二方面攻擊，同時，李彌兵團亦開始行動，結果，孫兵團有一部突出，孫元良隨帶少數警衛團，爬過大壩而脫身，但其全兵團部隊除死亡外，均被俘虜，且警衛團因在爬壩時，被共軍覺察，立施射擊，約有百餘人被追迫仍回陳官莊總部。

關於此次突圍經過，筆者限於資料掌握無多，難免不無掛一漏萬之虞，殷望現在之孫元良、以及現在臺灣之李彌二將軍，不吝具告當時戰鬥經過，揭露共黨罪行，不特將來軍事反攻，可作借鏡，即未來之史實，亦可存真，區區所請，未識孫、李二將軍其能肯肯乎？

當孫兵圍突圍不成，反遭潰敗之際，邱清泉益堅其固守信心。其時各部隊之防守情形；大抵以一個團據守一個村莊。邱清泉乃命各部隊，各就村內建築核心工事，再沿村野通路，挖掘壕塹，復於壕塹內外，擇要築起堡壘，使之構成交叉火網。再順著子堡兩側射孔內線，延伸出去之射線，栽著鹿砦，使每根鹿砦，皆有火力封鎖。鹿砦以直徑一至二寸，高七八尺之樹木枝幹作成。以二個子堡之間之交射線之交又點，挖掘一條狹深之小溝，溝中用樹枝交叉而相互斜豎，遂形成網型，網形上再覆蓋一大樹枝，橫互其上。然後蓋上泥土，塞滿樹根，鹿砦甚爲牢固。而子母堡上，亦均用樹枝掩蓋。每一母堡中有反射擊設備，以防敵人衝入母堡至核心陣地時可從前後反射。母堡外另有深溝與高壘。至於核心工事，除設交叉平面火網外，另在房屋之屋基，屋壁，屋頂，構成立體火網三層。屋與屋間及橫巷小弄，一齊有牢固之障礙。邱兵團之北面爲孫兵團，因突圍而已成缺口，只東面李彌兵團未曾變動，南西北三面則大敵當前。

青龍集、陳官莊中之二個兵團，因輜重在途中損失，至此時糧彈皆將告罄，爲孫兵團因突圍會在北面激戰，迫

孫兵團戰事結束，探得共軍在北方包圍之兵力，已較他方面爲薄弱，此一隙罅，正可乘此向外攻擊。邱兵團立令第七十二軍、第七十四軍，集中全力，以迅捷行動，出其不意，突向北方發動猛烈進攻。此時，共軍以爲孫兵團突圍不成，料邱、李二兵團不至再向北突圍，正爲其戰後整補事務。驟聞國軍又向北攻，欲調兵派將，已非時間上所能辦到，計惟有倉皇應戰。加以國軍自被圍後，未嘗一戰，不特實力因以保存，且以久困重圍，士氣磨礪以待，攻擊一旦開始，其銳自不可當，卒使共軍無法抵擋。雖曾不斷增援，冀圖勉強挽頹勢，終因戰鬥形勢，趨於下風，不得不急行後撤。國軍遂得佔領青龍集北面之張莊、林莊。是役共軍傷亡慘重。此爲邱兵團在青龍集陳官莊被包圍後之第一次出擊。

同時，邱兵團之第五軍、第七十軍，原駐守陳官莊南面，忽見共軍因北面之戰，在南面調動頻繁，雖深知共軍防禦工事之堅強，却利用士兵因受共黨圍困控制之積怨心理，勢必與之冒死一戰。故於南面出擊之際，即配合步、砲、戰車協力猛攻，卒使共軍無法抵抗。共軍見其部隊死傷枕藉，又隔於火力之猛烈，雖仍負隅還擊，卒被國軍殲滅。於是國軍在南面又攻佔徐莊、丁莊。使南北兩面，均得推進一步。

國軍邱兵團得此次勝利，又增加其堅守信心，再次與杜聿明商榷，電呈中央，請求空投彈藥糧食。恰遇嚴冬氣候酷寒，士兵雖食不能飽，衣不能暖，但絕未因凍餒而稍緩鬥志，惟日盼糧彈之濟困，士氣之雄，實亦戰亂戰役中，值得歌頌之一頁也。

惟每天所需糧食，大米在卅萬斤左右，即整天食粥，也非十萬斤不可，僅憑空投，斷難達到全軍糧食所需，何況還須兼顧運輸彈藥。事實上一天所投下之糧食，只能每人配給大米二兩。一天所空投之彈藥，亦只够應付一天之

消耗。

詎奈天不造美，瀾天風雪，連綿不止，中央運輸機，甚至冒此惡劣而切忌飛行之天氣，時亦不斷空投。却因風力過大，而雙方陣地，距離相隔咫尺，每受風力影響，往往因此落於共軍陣地，如此空投，不啻源源予共軍以彈藥、糧食補給。尤有甚者，共軍方面且能清楚紀錄空投飛機幾架？投下糧食幾何？彈藥幾何？均能洞悉無遺，益堅共軍使用「圍而不打」之惡毒狡譎辦法，以待國軍糧盡彈竭而打擊之，一面致力於截擊國軍援軍，同時更施以陣前「喊話」，藉以動搖國軍軍心，其方法如：

一、用無數傳聲筒，高聲喊叫：「同志們，太冷了，不要停在戰壕裏，我們要打的對象，不是你們，這裏煮好了飯，等你們來吃……」

二、用紅綠色的紙張，寫些謊言調語，乘風飄進國軍陣地，作其虛偽宣傳。

三、利用香烟、麵包、一包一包乘夜暗中送至國軍陣地附近，使國軍隨手可取。

四、將被俘之國軍士兵，經過洗腦，分批放回，責令其做策反工作。最後一批老弱殘廢，個個手持共軍之勸降書，勸降國軍士兵。（上面均有各部隊軍、師、旅、團、連、排、班長姓名，皆得自被俘士兵之口）

五、共軍陳毅所部第一縱隊復以班級爲組，分成若干組，携有步槍、輕機槍、擲彈筒等，乘黑夜通過共方警戒線，偷偷向國軍哨兵僞稱投誠。但，此一詭詐，已爲國軍軍方洞燭其奸，邱兵團對此批投誠者予以訓練監視，詭計終未得逞。

綜觀共軍之種種方法，雖云「兵不厭詐」，然亦徒見其心勞日拙矣。

卅八年元旦，邱清泉、李彌二兵團仍在共軍包圍中。而杜聿明正值舊病復發（心臟病），此日精神較佳。邱氏以爲：「如果天氣良好，再有十天空投，國軍就有够用糧彈，可以大舉攻擊，突破重圍」。惟因經過幾次戰爭，共軍於被俘之國軍士兵口中，已經明白國軍之佈防情形與各部番號，爲配合準備突圍行動，自有另行調整部署之必要，邱氏乃作全盤統籌，分別將計劃通知各部隊定於一月三日夜十二時執行。

事緣原駐之國軍五九八團防地，交一三五團接防。五九八團毛團長，曾於當夜七時致電本團各營，詎毛團之傳令兵一名，未從徐州地方團隊中補充而來。於九時團部晚點名時，該傳令兵不知去向，以爲逃亡亦未注意，詎於是夜十一時，共軍得傳令兵之情報，搶先向五九八團之前哨一營，冒充爲國軍一三五團接防，且胆敢逕見該團毛團長，毛團長察知其詐，即急電其他二營注意，勿墜冒充計狡時，共軍即以手槍威脅，毛團長不屈，竟被殺戮。當共軍以假冒營長去至團部時，該五九八團一營尙以爲真來接防，未加防禦，遂爲共軍所乘，致國軍防地，又開一缺口。蓋共軍之入五九八團係該傳令兵，領導路線，於毛團長被殺前，忽出現於團本部。

一月四日夜，（毛團長殉職之夜），共軍另用一套手段，在徐永公路（徐州至永城）上之國軍二八八團陣地前，忽有一羣綿羊，蠕蠕而動，夜雲密佈，昏黑異常，國軍認爲如此黑夜，何來羊羣？何由而進陣地，自必別有蹊蹺？國軍喝問是誰？回答者謂「老百姓驅羊赴徐州趕集」。國軍即開槍，而羊羣回槍，立用機槍掃射，羊羣即應聲而倒。迫近檢視，始知共軍乘隙，築地下隧道，直通至國軍陣地。該羊羣乃由此種隧道，進至國軍陣地相近處，乘前哨疏忽之際，偷爬走上徐永公路，共軍士兵將棉服反穿。此次偽裝未成，而國軍反得明瞭前哨陣前，共軍已遍築隧道，縱橫交叉，以阻遏國軍戰車，使之陷入泥中而不能動。次日，國軍已令全體官兵，對陣前被共軍所挖掘之掩

截壕溝，作迅速掩土與填平工作。

共軍目見國軍作奮勇填壕工作，於五日下午五時，集中大小砲數百門，一齊連續射擊國軍二八七團陣地，火力之瘋狂，連續達九十分鐘之久，未嘗稍歇。二八七團士兵，終無法出壕一步，而鹿砦與壕溝，均被摧毀，則全部士兵不死於彈雨，即死於礮擊之木石泥土崩壓。是時，電話線早斷，傳令兵一出門，便飲彈而死。二八七團犧牲後，共軍遂伸延其砲火射程，同時藉熾烈砲火掩護下，共軍如潮湧入國軍陣地。於是國軍大砲失去效用，輕重機槍又缺乏子彈，二八八團亦遭同樣命運。

一月六日第六十四團、四一五團等均相繼而被殲滅。至八日共軍仍依原來方法，必於下午五時半開始，戰至天明，用連續不停之砲火，配合「人海戰術」，卒至國軍數個團又被吃掉，而始停止。邱兵團當日爲著擴大飛機場，以便小型飛機降落，及易於接受空投補給起見；曾將戰鬥部隊布置於第一線，因而形成「蛋壳形」式防禦，但在「蛋壳形」內，廣有非戰鬥部隊與各級指揮機構，並無預備隊之部署。至其陣地，各團據守各村，各村自築堦溝，故當共軍用排砲熾烈猛攻時，致各自爲戰，不相聯繫，僅憑本團之力，以對抗十餘倍之共軍，則焉有不爲以多吃少者所吃掉。而共軍之戰術，則恰恰相反，用聯結之力量，佐以步砲壓倒優勢，以攻擊國軍互不相顧之某一據點。當破圍之初，國軍逾二十萬人，共軍用其各個擊破之成法，巨奈國軍之設防，適爲各自孤立，致被既吃掉一個團，再吃掉一個團，此不能不謂當日安排防禦體系之失著也。

九日夜八時，戰至「蛋壳形」線，而「蛋壳」已被打破一個缺口。既有缺口，共軍之人海一擁而入，邱清泉在時間上調配之，實來不及以補此破洞，「蛋壳」遂爲共軍踏進。共軍目標，在於首先奪得飛機場，使國軍空投之降

終斷，故併力以攻第一三九師。該師獨立擔當，而共軍後續部隊源源增加至十倍之衆，卒被圍而吃掉。由是，國軍補給之路斷絕矣。而邱兵團雖勇敢，其命運至此已成定局。

徐州剿總副總指揮杜聿明，與邱清泉皆駐陳官莊親自發號施令，該莊位於飛機場之西南角。陳官莊即青龍集之一村落，又居於周圍卅里包圍圈之中心。共軍明知杜邱二氏之在陳官莊，所以攻擊方法，更趨猛烈，而該莊所受之炮轟，幾已全村屋宇燬壞殆盡。此時杜、邱二氏得衛隊之掩護，轉移至第五軍陣地，繼續指揮其各部作戰。

李彌兵團在青龍集東面，與邱清泉兵團之聯絡已被遮斷。李彌見情勢惡化，亦立即突圍，因共軍致力於邱兵團，且東面較差，故李彌得以脫出重圍，但所部已潰散不堪，而杜聿明請病假，中央已電知派機來接，但是飛機場已落入共黨之手，縱有飛機來接，亦屬枉然。至邱清泉以爲目下已到危急存亡之一霎那，每凜於共軍必趁國軍行動而被吃掉，仍力主堅守，不可輕舉妄動以突圍。但是戰事情勢，已處於混戰階段。惟共軍既得陳官莊，料杜、邱等必在第五軍部，本其一貫之「挖心戰術」，連續不斷向第五軍部進攻，鋒焰高張，國軍仍忍飢耐寒，奮勇抵抗。終因衆寡懸殊，第五軍部又告陷落。杜、邱二氏於軍部失陷時，冒火網撤出。此已是一月十日晨三時矣。

各部與邱清泉失却聯絡後，因邱氏事先有「至必要時各自相機轉移」之命令。因此賸餘之第五軍向西北方移動。七十軍向西南方移動。一百軍向北方移動，七十四軍向南移動。邱氏率二百師，連同戰車部隊，保衛杜氏向西方攻擊前進，沿途遭遇強烈阻撓，傷亡甚重。邱氏行至外圍，遇到共軍早期所挖掘之大戰壕二道，深約丈餘，闊約三丈，壕外密植障礙物，戰車與人越過困難，況在共軍熾烈火力轟擊之下。而七十軍尚有二千人亦於此時趕到第一道大壕。該軍鄧代軍長，以爲只有進沒有退，乃跳入壕中，士兵一齊跳下，再攀援而出第一大壕，然後再過第二大壕。

正行進中，以爲可望突出重圍，不料共軍掩至，士兵四散，鄧代軍長卒未脫險。

邱清泉因帶有戰車，無法越壕，由士兵跳下壕中，作人梯以過壕，誰知共軍偵知，向四面攻來。不得已，以杜、邱二氏爲核心，把部隊繞成環形陣地，以戰車臨前衝殺。共軍愈聚愈衆，杜邱二氏已身陷重圍，進退維谷，共軍復施以人海壓迫，國軍戰至彈盡援絕，邱清泉乃向杜聿明謂：「大勢已去，我深感有負國家重託！」杜聿明答道：「時也！勢也！非戰之罪也！」邱清泉又喟然嘆道：「沒有消滅共匪，是我終身遺憾！」於是，取出自佩手槍慷慨激昂而言曰：

「本兵國血染徐蚌，恨未能消滅共匪，非戰之罪，實天喪予……」稍歇又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

邱氏語畢，即舉槍自擊，繼張靈甫、黃伯韜諸將軍而成仁矣！

杜聿明目擊邱清泉自戕，但未曾佩槍，俯拾一枚共軍擲來之廢手榴彈，自行猛擊其首，頭破血流，暈倒於地。被共軍抬上汽車，疾馳而往共黨之指揮所。

此卅八年一月十日，徐蚌會戰，至此告一段落。

余追述對共戰爭，自東北之失，以至於徐蚌之失，不禁對當時有些行政當局，既唱「局部和平」，又唱「全面和平」之謬，曲意附和。甚至對堅強對共鬥爭之領袖，橫肆詆譭，妄指爲「和平」障礙，用盡種種卑劣手段，必使蔣總統退避而後已！遂致大陸淪於共黨之手，而釀成今日大陸同胞淒慘之命運，何以言之？

蓋當日蔣總統於一月二十一日引退離京，而北平傳作義之「局部和平」，於十日後（卽一月卅一日）方見實現

。而共方提出「和平八條」，係在代總統李宗仁於一月二十七日致電毛澤東，承認爲「和談」基礎。因此引起全國軍民之淆惑，而領導主腦之去留，影響民心士氣，尤深且鉅！觀於蔣總統在位時，各級軍事幹部及首長之團結奮鬥，慷慨成仁，爲國捐軀者，頗不乏人。迨蔣總統退位以後，除太原之五百完人外，未聞有取義成仁之軍官矣。斯時、西北有胡宗南與馬步芳之雄踞，而長江以南諸省固安然無恙也。即使徐蚌失利，華中剿總白崇禧之部隊，尙屹立於鄂北豫南皖西之各前線，正有大部河山，足資堅守，則軍事未嘗不可以恢復。奈竟蔽於「和平」談判之佞說「聯合政府」之謬論，卒淪大陸於沉溺，甯不痛心！

第十二章 平張鐵路大戰與津沽棄守

泊民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二日瀋陽之失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國軍撤至秦皇島、榆關。而在此同時（十一月二十二日）黃伯韜兵團覆沒於碾莊。翌日保定亦告失陷。十二月十四日，共軍進抵豐臺，直逼北平。重以城之西郊發生戰事，於是平津之戰幕，又開一面。

十一月間，共軍包圍張家口、新保安、國軍十六軍相與激戰，希圖突圍未果。而國軍之第一〇四軍則被困於懷來。共軍四縱由西南向東北切斷南口與北平間之聯繫。共軍楊羅庚所部，以九個師包圍國軍第卅五軍三個師。共軍五縱隊守南口附近，其分佈之陣形如下：

甲、共軍三縱開至北平以東，通縣以南。（與四縱、五縱、十一縱隊對北平城包圍形勢）。

乙、共軍第六、七、八、九、十縱隊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以玉田、武清，爲中心連同「砲縱」分別割斷上列各該包圍點之聯繫。）

丙、根據在義縣、錦西、錦州、興城、綏中、榆關、灤城各線作戰方法。

丁、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以待完瓜部署後，各個擊破。

戊、共軍限其部屬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部署。攻擊次序：第一塘蘆區。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區。第四天津、張家口兩區，最後北平區。此爲共軍之行動態勢也。

溯平津之戰失敗，其所由來，在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國軍第卅五軍二個師在新保安損失。及二十四日在張家口國

軍第十一兵團之一個軍七個師潰敗，開其先河。

先是國府於民卅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三十日，發表傳作義爲華北剿匪總司令，稍後，翌年春楚溪春亦離東北而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傅楚二氏，皆山西閻錫山舊屬，乃連袂飛太原，爲平津戰守等問題，就商於閻氏。閻氏乃與晤談於太原南門外訓練部，縱談二十四小時，天已破曉，閻氏囑略事休息，待卯刻再談。具見閻氏如此高年，有如此精神。且其所談者，無非對付共軍之策略。傅氏擬以機動戰術保守北平。而閻氏則昭示傅氏以三策：

上策——築堅強碉堡一萬個至二萬個，密佈於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線。

中策——退出北平，守張家口至包頭一線。與山西及河西（黃河）之馬家軍（甘、甯）成犄角之勢。

下策——堅守北平。（北平爲千年文化所在，更不當自我破壞，如果守北平爲下策之尤。）

閻氏略謂：「聶榮臻在北平西山游擊，我方籌碼多，以機動對游擊，雖可奏效於一時。但林彪在關外，號稱五十萬，縱使少估爲卅萬，以碉吸收其來攻，假使每個碉堡，能消耗敵軍一百人甚至可能二百人，是爲最有效之辦法。能若是，則東北來犯之敵，不費大戰，無異打了一次勝仗。假使共軍來攻碉堡，使陸續消耗其兵力，至一較大整數，即此種背水列陣戰之成功。（按太原之能久守，亦賴此碉堡），傅楚二氏於翌日十時告別，閻氏送至大門。既行復喚使回，再三叮囑之曰：「速作唐山至塘沽、天津之間，築碉堡一萬個至二萬個」。作義唯唯稱是，閻氏更以堅決之語氣告之曰：「共軍欲進關內，非攻碉堡不可，既可吸住其不能前進，又可消耗其實力，倘使得了幾次勝利，則何患美援之不至，美援一至，剿匪之功，便可成矣。不這樣做，恐死無葬身之地了。」

閻氏於抗日勝利時期，立飭築堅固碉堡一萬個於太原成郊，足見其老成謀國之忠靈焉！

傅氏之任華北剿總也，當時北平行營尚在，行營對華北軍事亦不再指揮，統交由傅氏專責主持，最高統帥復賦予傅氏以五省生殺予奪黜陟賞罰之權，信任不可謂不專，倚賴不可謂不深；有無限權力，得便宜行事。宜可以支撐危局？況復當時美國人以爲傅氏頗有可爲，徵諸過去事蹟，爲欲阻遏共黨，遲與傅氏簽訂援助契約，美國允諾以美金一億六千萬元之裝備。此種外國政府與地方官直接行動，在中國殊存春秋「大夫無私交」之義，但美國於七月間，除已給付傅氏一千六百萬美金外，又於十一月間以船運戰略物資至天津，其數量僅及美國所承諾者十分之一弱，且不合用者有之，機關槍無另件者有之，有槍械而無彈藥相配者有之，真成有其名而不得其實惠矣。傅氏本人心理頗受打擊，而其部屬聞美援一到，士氣一振，旋聞不能使用，則其部隊希望落空，士氣一衰，遂至於竭。

當時華北剿總，其戰鬥序列，除傅氏本人外，副總司令則有：李文、宋肯堂、馮欽哉、上官雲相、陳繼承、吳奇偉、馬法五、郭宗汾、鄧寶珊。參謀長李北屏。其他如梁述參、鄭曉嵐、賈文符等。

其直轄之基本部隊：暫第三軍軍長安泰山、暫第五軍軍長魯英馨（涇水自殺，由郭景雲繼任）新五軍軍長袁慶雲、騎兵總指揮孫嵐峯（轄一師四旅）。保安旅八旅。另（日本時期皇協軍改編）一軍、綏遠主席董其武地方部隊一軍。此爲傅氏之直屬者。

第四兵團司令李文：轄第十六軍軍長袁樸、第九十四軍軍長朱敬明（接奉廷芳任）。

第十三兵團司令石覺：轄第十三軍（石兼軍長）。

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轄六十二軍軍長林傳德，八十六軍軍長劉澤翰。九十二軍軍長黃翔，另第八十七軍軍長段濬（青年軍改編），直轄第五師師長張伯權。

上述隊伍，係傅氏任剿總時之實力。在瀋陽未淪失前，傅氏坐鎮華北，支持東北，顯有力以剿伐共軍。及至東北改觀，共軍迅速長驅直入華北，則雙方實力，便相差懸殊。其初傅氏未能聽從閻錫山之籌畫良策，以爲北平爲故都，係華北神經中樞，務需克保。倘能如閻氏所指，遍築碉堡於唐、津一帶，撤至天津作背水列陣之戰，後路補給，海運暢通，共軍破壞交通，不足置吾於死地，按兵以守，得機則出而攻擊，進退自如，固爲上策之尤。奈傅氏竟取其下策，否則，毛澤東之自我誇張，尙有置喙地哉。

溯自傅氏就任華北剿總不久，因瀋陽告急，即派其最精銳之安春山、魯英譽兩部馳援，克奏援效。此爲第一佳聲。惜後另又發生一不愉快事；緣三十五軍軍長魯英譽率二師，在高易支路（高碑店經涞水、易州、至梁格莊，謂爲平漢鐵路支線）之涞水，猝與共軍大隊相遇。時共軍以易水爲基地，出沒於平漢鐵路右側，破壞交通，匿跡山區，忽去忽來，忽多忽少。共軍見國軍大量而過，則避之惟恐不及，一見小量即奔馳掩至，藉此無常出沒之機會，乘隙以多吃少，瘋狂襲擊，三十五軍措手不及，野山砲二十餘尊被奪，傷亡更相當慘重，軍長魯英譽即拔槍自殺以殉。

東北方面又傳來錦州、長春、瀋陽淪失之訊，同時，鄭州、包頭亦相繼撤退。對於北平屏障之保定，勢頗危急，傅氏至此，始有將保定安全撤退之擬議。三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傅氏飛京請示機宜，於六日回平，即令剿總副總司令兼第四兵團司令兼北平警備司令李文，親自率部前往保定，圖作敵前安全撤退之舉。李文率第十六軍並汽車四百輛，推進至徐水以南，距保定三十里之河邊，展開猛烈攻勢。共軍以事出突然，倉皇應戰，於是保定安全撤退，卒達目的，此十一月二十三日事也。適在黃伯韜殉職張莊陷落之後一日也。

華北剿總之防區，既已縮短，傅氏返自中央，曾有下列三項之全盤計劃：

一、所有中央軍及傅氏所部，分路向山西太原轉進。經營南打開通路，與胡宗南部聯合一起，以免各自孤立。

二、所有中央軍及作義所部，掃蕩集中天津、塘沽。與來自東北熱河、察哈爾、保定方面之共軍，作一大會戰。戰勝則恢復所有。不勝則遵海而南，參加徐蚌會戰。

三、傅氏率其所部回察綏，所有中央軍歸李文指揮，集中待命。

傅氏雖有此計劃，但於保定撤出之後，張家口、新保安，被共軍楊羅庚所部包圍益困，危急殊甚。北平之西則聶榮臻部騷擾不休。北平以東，通縣以南，則有共軍第三、四、五、十一各縱隊，威脅日甚。其他如豐臺、宛平、（涿縣、良鄉已被共軍佔領）塘沽、蘆臺、開平、唐山，均成爲受攻目標，有包圍之虞。傅氏面臨若是情勢，其對前述三種，採取何一計劃？迄未作出決定。惟其兵力分佈則爲：袁慶雲之新五軍，與孫嵐峯之騎兵四旅守張家口。安春山之第三軍駐鎮懷來。郭景雲之三十五軍爲策應馳突。傅氏鑒于目前戰局，決定將張家口棄守。無如張家口各民意機關與各民衆團體，推派代表請願堅守。傅氏順應輿情，不得已轉而令飭第三十五軍用汽車急運赴援，張家口之危得解。援軍既入，張家口父老歡迎祝捷，班師之期，延遲二天。詎三十五軍正行進至花園站（平綏鐵路新保安西），突遇共軍兩旁出而攔路截襲。該軍卽下車步戰，戰至天黑，便宿該地。不圖翌日共軍調集數縱隊大軍，在新保安途中，潛伏腰擊，遂圍成包圍，三十五軍裹在中心，苦戰不能突出。

傅氏聞訊卽調第三軍馳援，攻擊共軍三晝夜，終不能與三十五軍會合。不料另一批共軍（林彪部隊自東北分三路入華北：一股自北寧線西進，經唐山、塘沽以至天津。一股沿平榆公路經薊縣抵北平。一股經熱河由古北口入長城斜刺康莊）。林彪部隊自延慶直撲康莊，（南口之北、懷來之南）第三軍又遭到腹背受敵。傅氏又派第十六軍以

救第三軍。而共軍方面又增加兵力三倍。於是平綏線上之南口、康莊、懷來、新保安皆成孤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三十五軍戰至彈盡糧絕，屍橫遍野，軍長郭景雲自戕殉職。第三軍殺出重圍向鐵路西側退去，軍長安春山被俘，伴充伙夫，遂得脫險歸隊。幸第十六軍尚未深入，所損不大，退守居庸關。是役也，影響於張家口之失陷，爲十二月二十四日相距僅二天耳！國軍守軍爲第十一兵團之一個軍部七個師，計損失五萬四千餘人。第五軍軍長袁慶雲被俘，僅騎兵指揮孫嵐峯率騎兵千餘人突出重圍。

自張家口之失，則新保安、懷來、南口、各戰略要點，早陷於孤立而又包圍，不得不突圍或撤離。至此戰事更局限於平、津矣。傅氏自京回平後之三點計劃，更無從措手。故論傅氏果有經世之才，則應聽從閻錫山氏之最初忠告之上策，亦即傅氏所持之三點計劃之第二點，又爲華北剿總副司令上官雲相之鄭重建議，今雖欲取而行之，而爲時已晚矣。

共軍得勢後，聶榮臻指揮總部自蔚縣移駐張家口，留二縱隊守之，而以七個縱隊之衆，沿平綏路南下，俯瞰北平。另以兩個縱隊越平漢線至豐臺。設指揮所於北平萬壽山。

林彪部隊自東北分三路直入華北後，以兩縱隊攻略塘沽，兩縱隊攻略天津，另有七個縱隊傾注於平綏鐵路之會戰。新保安、張家口戰事終了前，林彪先抽兩縱隊斜刺而南，切斷北平與天津間之交通。此時則率五個縱隊移至北平，設指揮所於通縣。

北平之外圍：正北——清河鎮、清華園、西面——萬壽山。正東——通縣。正南——豐臺等地，皆爲附郭戰略要點，現在四面八方已均落入共軍掌握，北平遂被層密之共軍包圍。

天津周圍九十華里平原地帶，河流縱橫交叉，倘有相當兵力，與地形配合，而以塘沽爲據守重點，採閻錫山昭告傳作義之上策，未始不可久守。蓋塘沽爲海河吐納港，富有海灘陣地之優越條件。津沽防守司令爲侯鏡如，其所**有**兵力：基本之九十二軍已由黃翔統率馳援北平。以六十二軍林偉儀、八十六軍劉雲翰駐守天津。八十七軍段澤井交警一旅，駐守唐山煤礦。其守塘沽者僅獨立九十五師朱致一（新任）一師，及九十二軍補充第三一八師，又保安團二團而已。然津、沽亦在被圍中矣。

在此種形勢下，侯鏡如負防守津沽之責，「以爲兵力不够分配，頗有顧此失彼之弊。且以塘沽有海運可通，地雖佔漁鹽之利，而土鹼質終，不毛之地，四望無際，易於發揚火力，縱用人海戰術，於該地無可施技，是火海戰術以抵制人海戰術最理想之戰場，不如放棄天津，集中兵力於塘沽，以求決戰之勝利。」分別呈准國防部及華北剿總准可，國防部特派李及蘭過飛天津，協助侯鏡如實施。無奈時間已不許可。

詎共軍於平綏線得手後，平、津兩地，各自孤立，惟津沽尙能會合。聶榮臻、林彪各抽調一部份兵力，移駐寶坻縣一要鎮，出擊唐山與塘沽一帶。國軍駐唐山之八十七軍段澤，不俟共軍合圍，先自動引退，沿途節節戰爭，迨抵達塘沽，損失已重，立足未穩，而共軍大量掩至。當時共軍之戰術：「對北平則圍而不打。對天津則隔而不圍」。「對唐、塘間則斷線打點」。因此塘沽受其猛撲。際此突然猝至之攻擊，侯鏡如以衆寡懸殊，而應付銳不可當之共軍，勢難維持，幸得駐渤海之國軍海軍艦隊，在司令馬紀壯指揮下，迅速瀕海登陸塘沽，作成灘頭陣地，協同侯鏡如作戰。共軍屢施猛攻，不能進展，遂用人海戰術，蠶擁前進，怎知塘沽爲斥鹵之地，雖在嚴冬地凍，澤滑難行，共軍深入泥淖，初尙跋涉，繼即深陷而不能拔足，共軍後部見前部如此，不敢續進，而共軍陷於泥淖中不能動彈。

者，則受國軍火力掃射以死。共軍乃知不可力取，不得不退。

天津面積五十四方里，人口一百八十萬，爲北方商埠。地跨五河注沽河之會口。五河（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運河、北運河）交會於天津，總稱沽河。北寧、津浦二鐵路，輻輳於此。其附郭要區：南有八里臺。（聶士成與八國聯軍鏖戰處）北有北倉。（馮玉祥與李景林激戰處）均爲軍路要地，足堪固守。其時津沽防守司令侯鏡如常川駐守塘沽，惟以電話遙領，負責實際防守責任者爲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儒副之。當塘沽戰爭正在激烈進行之時，天津有丁❖❖等四人，自稱爲天津市人民代表，發起局部和平運動，擬向共軍方面請願乞和，陳長捷以雖事關民意，難免影響軍心，即以電呈華北剿總請示：是否應予禁止或取締？傳作義電覆：「不加干涉」。

共軍林彪，本在寶坻設有指揮所（天津之北），原置兩縱隊於天津之外圍，鑑於塘沽之攻擊失敗，即由塘沽移轉二個縱隊，及從北平南下之兩個縱隊，約共六個縱隊。同時津浦鐵路早經共軍截斷，今則該線全由控制。林彪深知天津國軍兵力單薄，採取避攻塘沽之堅，而移其力以攻天津之瑕。於是林彪分五路向天津進兵。該時雪地嚴寒，沽河結冰，行軍障礙減輕。其進軍之五路，爲：

一、沿沽河兩岸進攻；二、自恒糧城沿北寧路攻天津東站。三、自楊村進北倉，攻總站。四、直撲飛機場。五、自楊柳青沿津浦鐵路攻西站。

共軍由第五路先行著手，以該一路地面開闊，可以用較大兵力施展。塘沽之大捷，足以鼓勵天津士氣，但其數量與兵量，實無力以抗衡數倍之龐大共軍。況其他四路，亦相繼進攻，來勢猛烈，抵擋不住，陳長捷不得不縮短防

線。因此防守司令部與各機關，及跑馬場之飛機場，都在重砲及野山砲射擊之內。共軍砲兵掩護步兵，波浪潮湧，至此國軍無可抵抗，激戰至二十九小時，共軍進至東馬路，陳長捷猶全副武裝守住司令部崗位，卒至被俘。副司令林偉儀、天津市長杜建時、亦同時被俘。時三十八年一月十四日也。

天津既失，塘沽候鏡如奉命撤退。國防部派運輸司令陳璧璽，負責督辦海運。惟冬令已成冰港，即用破冰船擊冰開道，停泊可資撤退者，只有三隻輪船，而待來之船，又緩不濟急。一面共軍有二縱隊監視塘沽，今天津戰事既已結束，則其中津調回塘沽，自在意中，故撤退務求迅速。運輸司令於無辦法中，乃得一辦法，祇此三輪船，而應撤退者五萬餘人，究竟誰應先去？誰願後去，倘一開始，勢必互相爭先。又有如許堆積之戰略物資，如何處理？立即徵集所有民船、躉船。在未撤退前，先將重要物資，儘速搬往長山列島先行儲存，一面將兵員依其各部隊番號，分配民船、躉船，使各部隊均得同等待遇，同得撤退機會，火速將徵用之船舶，能機動者加油加煤，升火即發。用帆船者則拖繫於機輪之後，各輪皆駛長山列島停泊，再事整理，迨由上海、青島而來之輪舶一到，將在塘沽徵用之民船，全數發還駛回原地。塘沽之撤退，有秩序、有安排，全師而退，物資完整，具見中央倉卒之頃，運用得宜。而閻錫山再三叮囑傳作義之上策，於此可以徵明其高瞻遠矚，老成深算，爲足式也。天津失陷於十一月十五日，而塘沽撤退則在十一月十七日，兩日之間，竟能迅捷安全若是，若非國防部參謀本部聯勤總部設計之周密，曷克臻此。

當卅七年九月，東北局勢，因衛立煌奉命解錦州之圍忽忽職責，遂致惡化。二十七日，山東之濟南，又告失陷。關內外二戰場，均呈現不利情勢。蔣總統於九月三十日過飛北平，翌日召集華北高級將領會議。又明日（十月二日）轉飛瀋陽巡視。三日回平指示機宜，四日親蒞蘆溝橋察勘。五日至天津，並履勘塘沽新港。宿天津面授方略。

七日始返北平。再與華北將領商議。八日下午由平飛滬，聽取治安及經濟等報告。九日乃抵南京，處理萬機。計自離京十日，行色匆匆，席不暇暖。在斯險峻環生於東北，局面震撼於徐蚌。錦、瀋如何保？平、津如何守？加以八月廿三日金圓券發行以來，各商埠市場，經濟金融大起波盪，最高當局，不畏險阻，挺身奔走於軍事倥傯之區，不避艱苦，朝夕運籌於道路之間，其憂勤國是，負責任勞，由其事實之所表現者，可以徵明。自有歷史以來，國家元首，未有如蔣總統之憂勤辛勞者也。

迨十月十六日，蔣總統復飛瀋陽，即在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議雖定，而其心仍懸懸於錦州之戰，將飛機折返瀋陽，指示衛立煌以決策，然後轉往北平。駐節於北平者幾半月，至十月三十日，才離北平而至南京。其期間內，曾於二十四日在平邀集各大學校長及經濟專家，聽取對當前經濟趨勢之意見。二十七日，專機飛承德巡視，召集熱河省省主席孫渡與當地軍政負責人員會議。蔣總統自此次回京後，雖未如上月之奔波不休，但共軍之叛亂，愈見猖獗，重要之城市據點，多落敵手。而蔣總統以堅毅卓絕之精神，支撐危局，忍辱負重，不稍諉避。詎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宗仁、程潛等，乘軍事逆轉之機會，倡導與共黨「談和」。報紙公開揭露，京滬謠言，盡變為「和談」資料，更演變而為攻訐政府，侮辱元首。蔣總統坦誠昭示天下為公之旨，而對個人出處，毫無牽掛。故廿九日傳作義來京覲見，蔣總統表示始終對國家負責與個人進退無關，再三囑傅氏以國家為重，克保平、津。

蔣總統受各方面之壓力甚重。卅八年元旦文告，呼籲和平。並聲明不計個人進退。一月十二日，行政院會議以「備戰謀和」為方針，程潛、白崇禧等均表贊同。於是「和平」氣氛瀰漫，政潮醞釀激烈，蔣總統乃於一月二十一日宣佈暫時引退，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自蔣總統之引退也，國軍士氣，立即消沉，羣高唱「和談」，則

士無門志，至一月三十一日，傅作義所謂「局部和談」既成事實，而北平遂爲共軍佔領。

初傅作義之在平也，政府方播遷廣州，閻錫山估計傅氏，只有二條路可循：一突圍。二、與敵同歸於盡。至於傅氏投降，則出於意料之外。不圖傅氏因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之牽線拉攏，終走上閻錫山意料之外之路。傅氏降共後，電告在廣州之中央政府，時傅氏被迫安撫舊部在綏遠。中央猶望傅氏係出於一時環境所迫，將能重爲國家效力，故立派徐永昌專機逕飛綏遠，並隨携現款七十萬元交傅氏。傅氏迎之於飛機場，即在機場晤談一小時，傅氏急催徐永昌速行，臨行向徐氏曰：「目前行動，迫於環境，他年心跡，自可表現。」現款七十萬元收下，又催徐氏上機，且謂：「遲恐不便」云云。按傅作義過去事績，尙有可觀，其晚節不保至此，爲可惜耳。

第十三章 太原保衛戰

太原之防守戰，爲剿共戰役中，最爲可歌可泣，保持國家正義，民族正氣之輝煌史績！田橫五百人，義士耳！而太原之五百人，堪稱爲——個個張睢陽，人人周遇吉，其忠烈丹心直貫日月而照耀千古！

按太原爲古并州，五代時，北漢王劉崇僭號於太原，領十州、四十一郡，其統帥爲劉氏養子劉繼業（卽楊業世稱楊令公）善將兵，遼兵不敢南侵。迨趙宋立國，結束五代，兼併十國。南漢劉鋹先降，其後次第平西蜀，下江東、江南、吳越、閩、楚，獨北漢屹然不可犯。開寶二年，趙匡胤提兵北伐，勿克而還。用李光贊議「傾兵於晉陽（太原舊名）外圍，援春秋時鄭莊公之術，夏搶割其麥，秋刈其禾，以圍困北漢而絕其糧糈」。而絳縣人薛化光條陳：「宋應陳兵於太原外圍之石嶺山、靜楊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要隘，在北東南三面建築城寨砦柵。駐重兵於雁門關，以絕其通遼之路。將上開各地人民，全部徙置於洛陽至襄陽一帶，堅壁清野以伺其隙，則太原可下矣」。至匡義太平興國四年，已越十載，上述建議，顯無效果，而太原依然巍然而存。乃用曹彬計，遣使與劉繼業密談，許繼業爲代州節度使，把守雁門以防遼，不調離其部隊，議定，而繼業降宋，乃復其原姓——楊（父名楊信仕）去其名之「繼」字，因名楊業。故太原爲古來最難攻略之地。而此次以糧盡援絕卒至陷落，然被圍最久，破城最遲，後於華北各城。猶演出驚天地，泣鬼神之碧血丹心義烈之舉，足見燕趙多慷慨義烈之士，信不虛矣！

在未敘太原之戰之前，所以書此一段史實者，蓋指出太原之被圍，似有類於李光贊、薛化光「伐木而先去枝葉」之故技。但今昔形勢環境迥異，五百完人者，獨能支撐危局，至於中央遷粵之後，固已盡其最大最後之努力矣。

吁，國家之正義、民族之正氣、賴太原五百完人得以維繫於不墜！國軍在戡亂戰役中，彼叛變之徒，如吳化文等，大都係馮玉祥舊部，馮氏素以倒戈而倖進，且早投附於俄共，是其本人與部屬大抵均受斯作爲所影響，故不能善其終。至國軍將領則多係被俘，而非投降。李陵雖縱有乘機報漢之心跡，至百世後，猶不相諒。終不若顏杲卿，被俘而求死。蔡懋德自刎於沙場。其對國家民族之盡忠盡節，彪炳青史、千秋景仰。願吾國軍將領，至必不得已時，亦必步太原五百完人之遺蹟，以保武道而盡天職是已。

山西省會太原、西瀕汾河，東屏太行山脈，其主峯有幃山、老虎山足以控制全城。城北有周家口，地勢險要，扼北面咽喉。城西呂梁主峯之石千峯山，堪爲四面屏障。城南則一片平原，藉武宿村爲築鎗。

太原爲正太、同蒲兩鐵路之交會點，城廓周圍設環城鐵路。山西全省公路約二千餘公里，皆以太原爲中心，或始點、或終點，或過宕點。黃河支流之汾河，繞太原城西，舟行通新絳、臨汾、涇水、沁水。但自河口鎮以下，則不能徒涉，爲天然屏障。

戰前共方部隊之態勢

當晉中戰事方酣之際，共方楊得志（城東指揮部）、楊成武（城西指揮部）、彭紹輝（城北指揮部）各部隊，已於太原城之東、西、北三面，其南則爲姚喆部隊（城南指揮部），形成包圍態勢。迨國軍復於榆次、太谷、徐溝三角地區失利，主力尚未集結撤回之前，而共方以五個旅爲挺進隊，自交城、清源，沿汾河西岸，入晉源附近，進襲太原。其主力亦進抵鳴謙鎮、鳴李、東西溫莊、小店鎮之線，準備圍攻太原。共計正規部隊十五萬人，地方部隊十三萬人，民兵八萬餘人，總共卅六萬餘人，由徐向前爲總指揮。有乘國軍部署未完成前，一舉而攻下太原之趨勢。

國軍方面，得悉共方欲圖太原，即將文水、交城等地國軍撤回。並將各縣民衆自衛軍調集整訓，以備補充。當時國軍僅九萬餘人，保安團隊一萬五千餘人，及守碉堡之民衛軍四萬二千人，總計兵力不過十四萬七千餘人。以第十兵團司令官王靖國守備城東南兩面。第十五兵團孫福麟代司令官守備城西北兩面。並控制有力部隊作爲機動使用。另以一部兵力守備忻縣（太原北）晉源等外國據點。

國軍之部署與指導

一、第十兵團轄第十九軍溫懷光、卅三軍韓步洲、四三軍劉效曾，確保楊家堡、椿樹園、馬莊、淖馬、牛頭寨、風閉梁之線。機動部隊分別控制雙塔寺、臥虎山附近地區。

二、第十五兵團轄第卅四軍高倬之、六一軍趙恭，確保陽曲、欄崗、呼延村、化七頭、白家南堰鎮之線。機動部隊分別控制於新城、東社鎮附近地區。

三、兩兵團作戰地域之劃分：以東北角經享堂村、東坪、西黃水、趙莊、城晉驛之線屬第十兵團。由城西南角經小南關、老軍營、沿汾河東岸之線，屬第十五兵團。

四、第卅軍戴炳南轄第廿七師許德厚、第卅師第八九團王健民（卅七年十一月九日後加入戰鬥），又獨立第八總隊趙瑞、獨立第九總隊郭殿春、獨立第十總隊武玉山、第二七四師（機槍師）宮子清、第二七八師（迫擊砲）賈毓芝、裝甲車作戰隊梁吉慶、榴彈砲兵營馬慶厚、工兵廿一團程繼宗爲總預備隊。由太原綏靖公署直轄，即在現地保持機動。

太原保衛戰，自民國卅七年七月十七日起至卅八年四月廿五日止，爲期九個月另九天。在此作戰期內，共方增兵三次，向太原總攻七次，圍以上爭奪戰計一百二十六次，圍營級之戰鬥，則無日無之。茲將戰事分四期詳述如后：

（自民國卅七年七月十七日至同年九月卅日止爲戰爭之第一期）。

戰爭開端

國軍趙承綏兵團失利於晉中三角地區，正擬集口整補，詎共方以其第十三縱隊全部之三旅兵力，及其晉中軍區第一、二兩旅，合成爲先遣部隊，沿汾河西岸向太原進襲。七月十七日零時，國軍駐守之大佛寺、南堰鎮、義井等陣地，直至小王村沙溝大井峪之線，被共方突破。該線距太原城僅三千公尺。國軍據守大王村、小井峪、義家山各點，阻遏共軍前進。共方對大王村施以波浪式衝鋒，連續達十四次之多，企圖攻佔以直薄太原城垣。但均未得逞！國軍第六一軍軍長趙恭率所部併卅四軍第二七九師，與迫擊砲師之一個團，由三角地區之榆、太、徐方面趕回太原，進入城西預定陣地。其他各隊部亦按照指定地區抵達。

是日午後，共方部隊取東、北、南三面包圍態勢，全力猛撲。國軍應戰至於黃昏，迫於情勢緊急，乃集中排砲，轟擊來犯共軍，是役發彈幾近萬發，共軍攻勢因之稍戢。

十八日，國軍第六一軍配合二七九師於凌晨四時，藉砲火掩護下展開反攻，共方以銳勢難賞後却，而傷亡甚重矣。戰至七時，共方冀挽頹勢，着其第十五縱隊由嘉節村，西渡至大佛寺以北地區，加入戰鬥，向國軍六一軍猛撲。共方第八縱隊、新二縱隊及呂梁軍區、太行軍區等八個旅團攻武宿村飛機場。另共方新四縱隊及北岳軍區計六個旅攻磚井村。此外城東之大峪口、胡家煙、郭家莊、常峪村，城北之城昔驛、沙流村、西盤威等處，共方亦發動牽

制性之攻擊。國軍第卅九師副師長賈紹棠即於城北黃寨鎮激戰時陣亡。

是日十七時許，共方晉中軍區第一、二兩旅向國軍河西陣地之左翼據點，分兩路進攻，一路由神堂溝、經寨溝，而直趨聶家山。一路由神溝、經冶峪、西峪而取趙家山、箱子裏。是處先行陷落。至十九日，共方兩路匯合協攻聶家山，且以平射砲及炸藥破壞碉堡。聶家山係土山，坑道陣地易致破壞，戰至二十二日，聶家山陣地，全被摧毀，國軍仍堅守於斷垣殘壁中，共方以波浪式衝鋒二十餘次，國軍第七二師第二一五團全體官兵，傷亡殆盡，聶家山遂告陷落。

當聶家山行將陷落之日（七月二十二），蔣總統飛臨太原，對該省軍政大計，多所指示。軍民歡呼，士氣大振。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氏，宣示總統手令，軍隊更爲激壯，故其後太原雖失，而仍能保持中國傳統之取義成仁美德，成爲五百完人者，無非皆出總統此次蒞臨感召之所致也。

二十三日，共方於夜間以二千餘人進攻白家莊南山各碉堡，另兩路各以三千餘人分攻九院東南及大虎峪以東與白家莊北山各碉堡。同時思西村、喜鵲梁、連山坡、五料等處，共方用牽制之襲擾，激戰二晝夜，國軍陣地僅餘三個碉堡，屹立無恙。

二十五日，國軍六一軍一部得空軍支援下，向白家莊南山反攻，激戰至二十七日五時，共方傷亡枕藉，一部退至聶家山，一部向西南回竄，國軍遂得收復白家莊、南山、九院等陣地。

二十八日晨，國軍六十九師之一部及第七十師之第二〇九團，向聶家山進襲，因係仰攻，到處受共方火力壓制，未獲進展。

三十一日晨，國軍工兵第廿一團及第七十師之第二〇九團得空軍協力，進攻聶家山，戰鬥猛烈非常，卒將共軍擊退，仍歸掌握。共方分向西峪、大佛寺後撤。共方之首次總攻擊告終。

共方對於太原之攻勢，既未得逞，乃將其主力撤至榆次、太谷一帶整補。並作種種訓練，如爬坡、鑽穴、爆破碉堡、跳越障礙物等等。一面向民間徵集木板、蓆袋等物，作進攻之需。復調集其第一、第三、第四縱隊，綏蒙縱隊，共四個縱隊，以增強兵力，準備向太原重作總攻擊。

國軍預測共方將必再行大舉來犯，爲作先發制人計，遂於十月一日，以第二八三、第二七九、第八十師及第七二師之一部，分向城南之小店鎮、南畔、東西溫莊、鳴李車站等共方陣地突擊。共方第卅八旅暨榆壽獨立支隊，陡受國軍優勢突襲，不支向南退却。國軍遂得收復各據點。惟在鳴李車站方面之國軍繼續前攻，至十月四日共方於得大量增援後，復向國軍形成包圍態勢，國軍自感過於突出，急速縮退，但已蒙相當損失。

五日，共方作其第二次之全面總攻——「城南方面」，由其第十五總隊攻國軍小店鎮、南畔。其第四、新二之兩縱隊攻國軍武宿。第八縱隊攻磚井村。「城東方面」——共方新四縱隊攻和合寺。另以其呂梁軍區之第一、二、三各旅攻桿山、虎頭山。又太行獨立第一、二、三各支隊攻壺壑。「城北方面」——共方第七縱隊攻黃寨鎮。復有北岳軍區之第一、二、三各旅攻周家山。「城西方面」——共方以晉中軍區之第一、二、三各旅攻馬頭水、西嶺。太行軍區之第七、八、九各旅攻石千峯山；共方另撥五個縱隊作四面接應之預備隊。

五、六兩日，共方向武宿猛攻。七日主力轉向於小店鎮、南畔，該兩地無工事憑藉，國軍不易強守。乃用機動及機械化部隊迂迴而攻武宿及小店鎮、南畔之側背。七日十五時共方不支向南潰退。國軍乘勝攻佔東西溫莊，續向

小店、南畔之共方部隊痛擊，共方急起抗鬥，其預備隊擬加入戰爭，奈被國軍阻於外圍。全線激戰二晝夜，國軍得空軍助力，共方以波浪式衝鋒，連續十八次，皆爲國軍熾盛砲火擊退。至雙十節九時共方全線潰退，更遭國軍伏兵截擊，共方損失嚴重。是日晚間戰事遂告沉寂。

上述係共方對太原第二次總攻之結束，茲述其第三次總攻。

共方鑒於國軍主力在於城南地區，堅不能克，乃避重就輕，轉攻城東。十月十二日黃昏共方以營團級兵力數股，向風閣梁前進陣地之各據點攻擊。同時城南、北亦發生戰鬥。十三日國軍方才發現共軍集結於東方，但未料及其作第三次總攻也。是日廿三時，共方第七縱隊及北岳縱隊秘密移至風閣梁相近地區，將該處國軍陣地，嚴密包圍，並截斷後方部隊之增援。按風閣梁爲國軍東翼之支撐點，兼以屏障國軍空軍基地——該陣地計有碉堡十一座，當時國軍把守該陣地僅卅軍一個團（欠一個營），山頂陣地僅二個連，預備隊在山之西溝。

共方雖先截斷在西溝之預備隊通路，但已有一個連，增援山頂。共方一面以炸藥破壞碉堡。山頂國軍合計三個連，倚碉堡與共方對壘激戰，但碉堡被共方炸毀十座，國軍固守賸有之一座，共方幾度猛攻，依然屹立山頂。共方乃移轉主力於西溝，至十四日晚國軍山頂與西溝全部壯烈犧牲。國軍第九縱隊馳援，爲共方所阻，風閣梁卒告陷落。

十五日拂曉，國軍卅軍之三個團及第九縱隊三個團，配屬山炮五十門、重炮五門、迫擊炮一團、機槍一團、飛機十三架，分由李家山、風閣梁北面，向共方反攻。國軍第四三軍由榆林坪直取小山崗頭，以截斷共方退路，並阻止增援。九時許國軍用連珠排炮，掩護卅軍往共方陣地接近。共方不予還擊，企圖以兩翼包圍國軍進擊部隊，均爲

國軍分別擊退。俟國軍進至衝鋒距離時，突然見共方猛力反擊，國軍以自動火器支援，炮兵猛轟，空軍輪炸，步兵英勇衝殺。共方反復反擊至廿五次，終爲國軍步兵衝入其陣地。共方據核心陣地抵抗。此時國軍第九縱隊由風閣梁陣地北面攻入。國軍第四九軍亦將小崗頭攻克。共方見援路已絕，遂向東南撤退。國軍分三路追擊，共方三個旅潰不成軍。風閣梁始爲國軍恢復掌握。

太原城南之北營、武宿，原爲扼守正太、同蒲兩路之要樞。爲雙方所必爭！共方第二次總攻既又失利於城南，於是轉移目標於城東。而國軍亦將主力調至東線。致武宿、北營只有一營駐守，共方以一個縱隊爭奪六次，卒仗國軍機動部隊及熾盛火力所擊退。十五日共方趁東線戰爭酣劇之際，復以一個縱隊對北營、武宿作第七次猛撲，國軍不暇抽調援軍，該兩處守軍一營之衆激戰三晝夜，傷亡已盡，遂陷入共方之手。

至於磚井村方面，先於十二日國軍主力增援風閣梁時，共方挾兩旅之衆猛攻。守軍一營憑工事堅守，並予還擊，共方傷亡慘重，屍填外壕。孤軍無援，激戰數宵共方越壕衝入，且用黃色炸藥爆破碉堡，國軍寡不敵衆，全營竟爾壯烈犧牲。此爲共方第三次總攻。

十月十八日，共方第十三、十五兩縱隊進攻黑龍。另一部攻上莊。其第三、九兩縱隊攻李家山、風閣梁。其重點指向於牛駝寨。共方於是日二十時集中炮火掩護步兵，用大量炸藥，炸毀牛頭寨門，蜂擁衝入。國軍駐守第二八六團（欠一營）團長張國勝、機槍師營長張長松，奮勇抵抗，集中所有火力，掃射共方衝鋒部隊。共方前仆後繼，踏屍擁進，與守軍展開白刃戰。俟國軍援軍到達時，只見火海一片，屍橫滿地，守軍張團長、張營長，率僅有官兵廿餘人堅守最後一碉。國軍第十總隊附衝鋒槍團分向兩翼衝入寨門，俘共方三百餘，餘皆殲滅。翌日，共方在炮兵

掩護下以密集隊形分三路向國軍猛撲，國軍除重機槍一營（四十五挺）、步兵重迫擊炮一營（廿四門）反擊外，並以剪子灣、臥虎山之山野重炮支援。更派二七九師增援，至該師抵達時，共方已業受創後退，該師乃轉而追擊，至二十一日共方全線攻勢已經挫折。國軍復乘機出擊，以第十兵團機動部隊之二七五、二八〇、七一各師，由上莊西方高地出擊，以截斷共方退路，會同國軍第九總隊（在楊家峪）前後夾擊。將在上莊之共方第十三縱隊之卅八、卅九兩旅除被俘五百餘人外，全部為國軍殲滅。

在審頭之第十兵團機動部隊，對西嶺之共方陣地實施側擊，共方傷亡甚重。

按共方此次總攻，前後共計三日，除東家窪、孟家井、榆林坪諸據點陷匪外，至於捍山方面，由榆林坪滲透之共方第四、第七兩縱隊，侵略孟家井後，其主力攻城東各據點，以一部約三千餘人切斷國軍據點守軍歸路，圍困一週，企圖糧盡彈絕迫其投降，但守軍堅守如恆，共方乃急施猛攻，激戰經過十晝夜，守軍三百十二人全已陣亡。該地陷落，是十一月九日也。自此各據點國軍與共軍，雙方構築工事，相距不過五六百公尺之間，嚴陣對峙，此則現代戰場所不多見者。斯為共方第四次總攻。

共方部隊對太原作四次總攻後，傷亡則在十萬人以上。既得不償失，復師老無功，但野心不死，其欲奪取太原之計，益趨積極。爰調河北、山東、察綏及晉北各地抽調地方團隊八萬六千餘衆。至其綏蒙軍區之殘餘部隊，仍調回原防整補。

國軍亦由西安綏靖公署調八十三師一萬人，至太原參加保衛戰。

共軍鑒於國軍火力熾盛，趁新來士兵不明陣地情況之際，搜刮民間猪牛羊酒大事犒賞，藉以激勵，於是第五次

總攻遂於十一月九日開始。共方全面總攻之兵力計開：

- 一、城南方面——第二縱隊攻霸賢村、楊家堡。呂梁軍區第一、二、三、四各旅攻椿樹園。
- 二、城東南方面——第一、八、十五之三個縱隊攻黑駝、馬莊。
- 三、城東方面——第十三縱隊攻淖馬、松莊。第三、九兩縱隊攻四畝屹坦、牛駝寨。
- 四、城東北方面——第四縱隊攻下嶺、西嶺。第七縱隊攻李家山、風閣梁。太岳獨立旅攻會溝。
- 五、城北方面——北岳軍區第一、二旅攻黃樂鎮。呂梁新八旅、太行獨立旅攻周家山。靜陽第一、二支隊攻老爺廟。

六、城西北方面——忻靜支隊攻關口。

七、城西方面——道榆壽支隊攻東西嶺。平介、汾陽支隊攻石千峯山。

八、城西南方面——太行軍區第七、八、九各旅，太行獨立第一、二、三各支隊攻南偃鎮、神堂溝。

按上列之共方包圍太原之兵力部署，可謂已無間隙，而其進攻重點，則於東山之黑駝、淖馬。此次共方志在必得太原，故不惜任何犧牲。首先欲奪取郝家溝，冀圖直達太原城垣。且可孤立城南廿里內之國軍各據點，況郝家溝地形較高，居高臨下更易得手。但欲得郝家溝，則必先攻佔溝南、溝北之高地。而溝南高地即以黑駝爲主地，因此共方必傾全力以爭取黑駝。

國軍此次得新來援軍第八三師，與共方展開猛烈激戰，連續九晝夜。除淖馬東面之虎頭上被共方佔領外，餘皆屹立無恙。詎共方於進攻技窮之下，遂施用毒氣彈，國軍雖傷亡甚重，然把守陣地，未嘗有一步退却，共方之第五

次總攻，始自動休止。

共方對太原以急攻不得逞，乃改採持久圍困策略。國軍爲欲久守計，惟多築機場，使空運得保持繼續不斷，以維持其補給。除原有二飛機場外，擬另增設第三、四，兩鋼筋機場，又四個臨時機場，其中便於使用者爲「紅溝機場」。共方見發動大量軍民趕築機場，不得不出而阻撓，遂發動第六次總攻。

共方於十二月十七日，以新編第二、四及十五各縱隊，又呂梁軍區三個旅配合民兵三萬餘人，繞道太原城西，於趙家山、狼坡、官地、兔兒坪、南峪一帶，展開戰鬥態勢。並以一部略取廟前山，對石千峯山實行圍而不攻。另於九院、小虎峪陣地，用波浪式衝鋒，國軍堅強抵抗，翌日拂曉，國軍八十三師附重機槍一團，迫擊炮一團、炮兵五個營，又連同綏署之噴射器連到達，共軍即退至原陣地。是夜共方仍圖猛攻，卒以國軍火力熾烈，又因黑夜民兵互相踐踏，共軍死傷慘重。據被俘者稱：「共黨指示民兵於攻擊太原時，每人持竹籃一個，蔬菜兩個，或帶煤油筒及鞭炮，以備應用。」等語；蓋爲偽裝手榴彈，偽作槍彈聲以給國軍耳。

自此次總攻無所施其技，共軍乃轉用政治攻勢。利用國軍俘虜，向國軍官兵各別送信，藉以搖動國軍軍心。國軍指揮部查悉後，盡行收拾，付之一炬，統計不下萬餘封。國軍則用播音器，向共方士兵講話，同時並揭破其陰謀與暴行。共方又以大批豬牛羊肉擲至國軍陣地。國軍亦以糖果、罐頭傳單投送共方陣地。並令飭嗣後共方有送物者，立予射殺。雙方用盡各種心理戰鬥之實情也。

太原之陷落

當太原被長期圍困之中，是時適爲東北戰事結束，北平因「局部和平」而易守。同時政府忙於行憲，選舉總統

之際。共方遂得向東北抽調林彪部所屬兩個軍，聶榮臻部所屬三個軍，並傳作義部四個師，炮兵五個團，共計二十三萬餘人。齊集於太原附近地區。並向晉、冀、察、綏調民兵十餘萬人，連同原有攻城者共約六十餘萬之衆，改由彭德懷任總指揮。

太原守軍則爲七萬五千人，幾近乎十與一之比。四月一日，太原綏署主任李政府召至京。四月九日，共方以第十五兵團置城北，第廿兵團置城南。原進攻部隊則調至城東。四月十四日共方於城南、北同時猛攻。翌日共方突破陽店陣地，並向左席捲，切斷欄崗、陽曲之國軍後方連系。至西南方面，亦被共方將南堡鎮突破，以圍點滲透方法猛攻大王莊，國軍六一軍軍長趙恭是役陣亡。國軍於是放棄城外各據點（西北兩線）以鞏固城垣郊地。十五日所有屬莊、椿樹園碉堡四十餘座皆被擊毀，飛機場亦全陷落。

共方以強烈之火藥力與十倍之兵力四面合攏，國軍浴血抵抗，戰至廿一日所有雙塔寺、剪子灣、臥虎山、煉鋼廠先後攻陷，國軍大部犧牲。

四月廿四日，共方用毒氣彈向城內放射，國軍中毒倒地，共方遂進入城之東南隅，與國軍展開巷戰，一街一巷，一礮一堡，逐步被殲，國軍以至各自爲戰地步。於二十五日十八時，巷戰停止，國軍守城官兵又大部殉國。國軍第卅軍軍長戴炳南、軍管區參謀長張鳳翔、太原綏署參謀長趙世鈺被共方所執，誘降不屈，壯烈成仁。

當巷戰時，所有城內國軍及政、警等公務人員，於巷戰迫至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女士，在省府鐘樓下從容服藥自殺。並於自殺前囑焚燬屍體。警察局長師則程與其妻史愛英於巷戰中自殺。特種警察徐端三等三百餘人（內女員十餘人）及第四區專員尹遵憲等百餘人，亦於巷戰至大樓時集體自殺。並以汽油

將樓焚燬，同歸於盡。國家以其爲國捐軀，稱之爲五百先人，立衣冠墓以表揚民族正氣。

爲甚麼失去大陸

五六八

第五篇 蔣總統引退與復任

民國三十七年歲暮之際，由於前線軍事之一再失利，在政府內部逐漸形成一股「主張與中共講和集團」之態勢，此「和平集團」之領袖，為時任副總統李宗仁氏，惟在此「集團」形成之初期，李宗仁並未表現其「和平」意向。

先是「和平行動」開始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時駐漢口之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將軍致電蔣總統，促請政府立即與中共進行和談，其電文中有云：「軍心代表民心，民心反映士氣，今將不用命，兵不能戰……五千年歷史，從此而斬，數百萬方里版圖，從此變色」。並提出建議：「一、邀請英、美、法、蘇四國大使，斡旋和平。二、國共雙方就地停戰。三、國共雙方推派代表商談和平」。斯時也，共軍雖遍佈於長江以北，但桂軍第十兵團徐啓明部第四十六軍仍扼守蕪湖至安慶一帶，沿江設防，而着重於長江要口之江南采石磯，江北之無為州。及平漢鐵路南段花園、孝感一線之第七軍方得勝仗。而宋希濂、魯道源等兵團亦受白氏指揮。并陳明仁、張軫兩部，其所轄部隊不下五十萬人，似有舉足輕重，獨支大廈之勢。

與此同時，湖南省主席程潛發出一項態度曖昧之通電，要求蔣總統下野，並立即與中共進行「和平解決」。事實上，程潛此時已為共謀包圍，此項通電之目的，僅在騷亂政府區人心，並為其本人在未來之共黨政權內謀取一席容身之地。

稍後之報導證明，與白崇禧及程潛發出通電之同時，另一「桂系」要員黃紹竑，正代表李宗仁在香港進行活動。

，與共黨尾已組織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進行頻繁接觸，以試探與共黨謀求「和平」之方式。

此等或明或暗之活動，在國民黨上層引起連鎖性之不良反應，「失敗主義」情緒瀰漫一時。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亦在幕後支持以李宗仁爲首之「和平集團」。以爲蔣總統下野爲勢所必然，且爲李宗仁借箸代籌，秘密準備飛機，供李氏隨時乘機飛漢口或桂林，靜待時局變化，作以退爲進之安排。因此漢口、桂林兩地機場，一再施行戒嚴。

孫科出任行政院長後不久，司徒雷登大使之華籍顧問傅涇波氏拜訪孫科，向孫科表示「蔣總統之下野，係促進和平所必需者」。

孫科院長於翌日面詢司徒雷登，要求司徒雷登明確表明傅涇波之意見是否係代表彼本人者。司徒雷登以外交詞令答覆謂：「作爲美國政府之代表，彼不願表示正式意見，惟在個人意見上，彼全心全意支持和平行動」。傅涇波則與李宗仁副總統之政治顧問甘介侯密切合作，全力醞釀促使蔣總統引退。

「和平運動」之積極推進，逼迫蔣總統下野益趨明朗，甚至指蔣總統爲「和平」之「障礙」，且有勸蔣總統「出洋」者，抑若蔣總統剿共戡亂之政策，完全錯誤？於是蔣總統遭到各方面之要挾、反對、攻訐、誣蔑、中傷、譏諷、漫罵、侮辱，無所不用其極。而蔣總統惟以忍耐與緘默，考慮如何可以挽此狂瀾？縱使下野其後果將如何？但因上述白崇禧主張「和談」之電，則士氣消沉，已無鬥志。至程潛迫蔣總統「下野」之電，則政治基礎動搖，經濟命脈斷喪，蔣總統不得不作引退後，對可能發生之情勢，有如下之判斷：

、共軍南下，渡江進攻京滬。

二、共軍陳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組織聯合政府，受共方操縱。並派兵進駐南京。

三、暫停軍事攻勢，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後各個宰割，不戰而佔據全國。

四、李宗仁主政後，撤換各地方軍政要員，或由共方收買，使彼等屈服投降。

五、或對蔣總統個人極端污蔑、侮辱，使其無立足餘地，不能復爲反共救國之革命領導中心。

六、李宗仁被迫，放棄南京，以遷都廣州爲名，割據兩廣，希圖自保。

七、美國對華政策，暫取靜觀態度，停止援助。

八、俄帝積極援共，補充其軍費，建立其空軍，使我南方各省軍政，在威脅之下，完全崩潰，無法抵抗。

觀蔣總統對當日局勢之分析，純基於國家民族之立場，而作其如上之觀念。惟於其個人之進退問題，更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絕未想及個人利害關係，但求國族利益之所在，決不計個人之害處。若就「進」方面而言；

甲、勉強支持危局，維繫統一局勢。

乙、等待國際形勢之轉變。

丙、靜觀共黨內部之變化。

至就「退」一方面而言：

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澈底整頓與改造。

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

丙、另起爐灶，重定革命基礎。

第五篇 蔣總統引退與復任

由此益見蔣總統之「進」，無非爲國族利益着想。即其「退」也，亦何一而非爲國族利益打算。在如此四面楚歌，惡劣環境之下，或進或退，趨向固屬不同，而其奮鬥之目標與方法則相同。故並不作諉卸革命仔肩，逃避革命責任之想。

繼白崇禧、程潛二電之後，李宗仁、甘介侯輩復提出「和平」主張之五項要求：

- 一、蔣總統下野。由李副總統繼承大任。
- 二、釋放政治犯。
- 三、言論集會自由。
- 四、國共兩軍各自撤退三十里。
- 五、劃上海爲自由市，政府撤退駐軍。並任命各黨派人士組織「上海市聯合政府」。共黨與政府代表在上海和談。

至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發其第二次「主和」電。同日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通電：「要求總統毅然下野。」斯時蔣總統之忍耐已至極限，一面電覆白崇禧、張軫，一面作三十八年元旦文告。

蔣總統向以國家民族爲前提，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如果國民黨內之大部份領袖主張與共黨和談，彼將不願使自已成爲「和談之障礙」。惟蔣總統洞悉共黨陰謀，深知和談絕非救國救民之道，徒使同胞成爲共黨俎上魚肉，故彼衷心主張與共黨作戰到底，即使共軍迫臨長江，政府亦可退到華南重整旗鼓，消滅共黨之可能性雖微，但據守一隅保持國脈待機反攻之可能性依然存在。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蔣總統準備頒佈其一年一度之元旦文告之際，將其文告草案公諸黨內各領袖，徵詢各方意見，蓋文告內有一段關係重大之字句：「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繫懷，而取決之國民之公意。」蓋蔣總統欲按既定計劃，主動引退，且暗示軍民作心理上之準備也。

此項文告發表前，蔣總統邀集約四十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在其官邸共進晚餐，要求在座者坦誠發表意見。當詢及李副總統之意見時，李氏表示「彼本人絕無與總統相背之見解」。另一些國民黨要員在發言中，則表示反對在文告內列入此段字句，表示此種主張者有谷正綱、谷正鼎、張道藩、王世杰及王寵惠。

在討論中途，蔣總統曾向在座者發言：「我並不要引退，但你們這些國民黨人要我下臺。却並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國民黨內的某些人壓力，使我不得不產生去意。」當會商尚在進行之際，蔣總統斷然下令發表此文告，包括此段在黨內引起不同意之字句在內。

蔣總統對於自己引退之後，對桂系領袖們所採取之措施並未存有任何幻想。故在此項元旦文告發表之前，已採取某些必需之妥善安排，任命陳誠將軍為臺灣省主席，並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蔣總統以非凡之遠見，洞察臺灣之重要性，決不容許此寶島落入親共分子之手，不論大陸之遭遇如何？臺灣必須堅守，作為政府最後立足之地，以待反攻復國之時機到來。同時，軍隊亦必須置於政治上可靠的將領之手，故在其去意既決之際，仍決心整頓國軍之部署，將最重要的京滬地區之軍事，置於湯恩伯將軍指揮之下。

在具有歷史性之元旦文告內，蔣總統慨然道出衷曲：

「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討論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

「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够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切的保障，人民能够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

「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繫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此文告有兩項目的。一方面是向共黨表示國民政府願意進行和平談判之最低條件；另一方面，是使李宗仁副總統得以在此種綱領之下，於總統引退之後與共黨進行和談。

蔣總統於卅八年一月二日分別覆張軫、白崇禧二電，表示其自己出處及對和平之態度，並望其齊一意志，鞏固基礎，以期可戰可和。其復河南省主席張軫電云：

「亥卅電悉，中正意旨，已詳見元旦文告，如共匪確能悔禍謀和，國家生存，民族生命，獲有保障，則固中正寤寐以求！個人進退，自非所計。惟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如不能熟權利害，團結意志，而先自亂步趨，則適中共匪分化之陰謀，將陷於各個擊破之危局。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國族之存亡繫於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繫於是。中正愛護袍澤，始終無間。尙望兄等深思熟察，共挽艱屯，祇須吾人信心堅定，則一切困難可克服，光明之來必不遠也。」復華中剿總白崇禧電云：

「亥敬、亥全兩電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胆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日吾人既已盡吐精誠，重啓和平之門，假令共匪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生民塗炭；對當前國是能商得合理合法

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惟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乃可化除共黨赤禍之野心？以達保國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雨之陰謀？以免戰禍再起之害。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劃，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今大計雖已昭明，而前途演變，尙屬微妙。望兄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期齊一步趨，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運用自如，而不爲共匪所算，則幸矣！」

按覆張軫之電中，其「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之語，既沉痛而又適切，足以清醒盲談和平者之頭腦。至覆白氏之電，則有——如何乃可化共黨赤禍之野心？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雨之陰謀，是明告「談和」者，宜提高警惕，知所戒懼。可見蔣總統對國家絕對負責，而對出處絕對光明。際此嚴重關頭，具見其謀國之忠，而品格之純篤尤有加焉。

卅八年一月八日，蔣總統以垂中白氏「有禮貌之抗命」，雖經電復，尙覺未妥，乃派張羣專誠赴漢，面晤白氏，傳達總統重要意旨！

一、余（總統自稱）如果「引退」，對於「和平」，究竟有無確實把握？

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動。

經過張、白二氏懇談後，結果，通力合作抗拒共軍。惟張治中於返回蘭州任所，途經武漢一宿，與白氏促膝深談，張治中表示：「對蔣總統失去信心，已不能有所作爲，強調——除非蔣總統下野，由李宗仁出與中共和談，別無補救之方。」白氏因此發生重大影響，却擬用「偽裝和平」以爭取時間。便與湘、鄂、贛、桂、滇、黔聯系，得到一較長時間安定。

蔣總統文告公佈之後，「和平集團」開始公開施行壓力，促使蔣總統正式下野。此時被高唱入雲的一些口號中有：「除非蔣總統下野，否則共黨不願和談」、「除非蔣總統下野，否則無望獲得美援」。事實上，李宗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的確是南京美國大使館人員所喜愛之人物，故使人認爲蔣總統所無法獲得之美援，李宗仁將可獲得。當時確有許多人對此種說法深信不疑。

桂系領袖一面以此種政治活動，促使蔣總統讓權，一面則以軍事行動相威脅，若蔣總統不允讓權，桂系軍隊將撤出武漢地區，聽任共軍橫渡長江，在此種局面之下，蔣總統始行決定「不加過問」，予桂系領袖們以試圖求和之機會。

歷史事件常會重演，智者泰然處之，愚者重蹈覆轍。猶憶民國十六年北伐期間，正是此等桂系領袖，亦會迫使蔣氏暫時隱退，彼等自稱能更有效地應付當時之危機。惟彼等一無所成，故在極短時期後，全國同胞皆亟亟於召喚蔣氏重掌大權，現在歷史重演，但蔣總統處之泰然，深信命運之神仍會向他招手。

同時，行政院在蔣總統同意之下，授權外交部長吳鐵城通知美、蘇、英、法四國大使，說明政府對剿共戰爭，力主結束，與恢復和平之決心。希望其能從旁協助，但不要求其斡旋或調解，以免陷干涉中國內政之嫌。此即蔣總統在對內方面，已從衆意而許其作「和平商談」，而對外方面，亦公然表示其嚮求「和平」之誠意。惟蘇俄大使並未參加此一會談。是日午刻，鄭介民自北平以慰勞北平將領，事畢返京，報告北方局勢之嚴重性，天津近郊發生激戰。蔣總統乃決定：將北平部隊，由空運撤至青島，避免無謂犧牲及損失。詎於翌日（一月九日）國軍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殉國於永城之陳官莊陣地。溯自上年十一月廿二日黃伯韜將軍在張莊殉國後，戰事便節節失利。於撤離徐

州時，國軍所有之化學砲彈，未經燬滅，竟反資共，轉用之以殺國軍，蔣總統止在派飛機擬接杜聿明、邱清泉等出險回京，孰知其已經壯烈犧牲矣。蔣總統在其日記中對此亦有記載：

「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爲匪消滅，聞尙有三萬人自陳官莊西南突圍，未知能否安全脫險？憂念無已！我前之所以不能爲他人強逼下野者，爲此杜部待援，我責未盡耳！」

黃紹竑由南京飛漢口，與白崇禧晤談後，即轉香港，續與共方代表洽商和談步驟，並提出兩項具體意見：

一、蔣總統下野後，一致對蔣，以防其再起。

二、共方與李宗仁進行全面和談。

蔣總統鑑于大勢所趨，不得不作最後反攻復國之基地着想，乃派蔣經國赴上海，與俞鴻鈞接洽，將存儲於中央銀行之現金移存於臺灣，以策安全。

一月十一日上午空軍偵報謂：「昨夜國軍突圍部隊，尙在包圍圈外卅里處，分路戰鬥。但今晨則蹤跡已杳，不知下落。蔣總統見此敗局，當即研討對蚌埠部隊南移計劃與日期！決在蚌埠、臨淮各留一個兵團，構成據點留守，掩護撤退。餘部皆絡繹南撤，至北平部隊，則由空運撤至青島。」

是日，天津近郊戰況更趨慘烈。而臺灣省各人民團體，通電擁護蔣總統元旦文告，並電共方毛澤東呼籲和平。而華北民意代表於本日集會，通過——「呼籲和平」宣言，主張「立即放棄戰爭，就地停戰，謀取和平」。至十二日，行政院會議：張羣報告往漢口、長沙洽談情形。詳述備戰謀和方針，中央與地方步驟一致。白崇禧、程潛亦同此態度。而天津方面共軍指揮林彪，用人海戰術猛攻市區，守軍勢甚危殆。

北平部隊空運青島計劃，於十三日開始實施，但北平城外共方砲擊機場，阻礙甚大。此時平津人士李燭塵等醞釀地方性先期妥協。另有華北七省市參議長在平洽議，促進「和平運動」。十四日蔣總統召集陸、海、空、勤各將領會議，指示以戰求和之方針，應提高警惕，免爲共匪所乘。同日共方毛澤東忽提出其和平條款，一般「和平」份子，雖從夢中驚醒，但其對於假「和平運動」以作別有企圖之陰謀，殊未能罷手。共方條款如下：

一、懲處「戰犯」。

二、廢除一九四七年之憲法。

三、廢除中國現有之立法制度。

四、以「民主原則」改組政府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反動派」不得派代表參加，由此會議建立一「民主聯合政府」接管南京政府及其下屬機構之權力。

此種「條件」一經傳來，對「和平集團」猶如當頭棒喝，惟彼等操之過急，已有騎虎難下之勢，消息傳到南京，食以共方所提出者，不但要壓迫國民政府作城下之盟，無條件向共方投降，且對全國人民之愚弄與侮辱。蔣總統以共方如此狂妄，除將該「條款」公佈，使全民瞭解共方之談和絕非誠意，以判明戰爭責任之所在外，即於十五日

下午，召集會議。大家認共方無「和談」誠意，但政府爲求內部團結起見，暫不予以置答。一面徵求各省黨政人員意見。蔣總統並接見美大使司徒雷登，告以共方「條款」及政府意見。是日天津失陷。

十六日蔣總統約晤張君勱、左舜生、張羣、吳鐵城、張治中、邵力子、陳立夫、王世杰等晚餐，並交換共方「和談八條款」。席間，邵力子主張接受共方「條款」。又有所謂——「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同時通電：「雙方迅取和平，即日停戰，開始商談」。內外情勢，至爲紛亂。而行政院會議決定——「發行短期黃金公債」。蔣總統約見俞鴻鈞、席德懋，商定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要旨。十七日、國軍撤離塘沽。十八日、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毛澤東所提「條款」及其廣播。會上會有人對蔣總統大加誹謗。同日立法委員要求政府迅速派員與共方談判和者達五十餘人之多。而機關之公務人員，要求行政院加發遣散費，甚至包圍官署，毆辱首長，政府局面，頓現一片混亂。十八日、國防部發表臺灣省主席陳誠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彭孟緝爲副總司令。

一月十九日，行政院發表一項公開聲明，聲言政府「願與共軍先下令同時停火，再雙方派出代表進行和平談判」。

行政院令外交部通知各國使節：聲明政府遷往廣州。行政院任命朱紹良爲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爲江西省政府主席。

蔣總統於是日上午，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之意，在李氏似有實獲我心之感，其態度較前和善，並表示：「一切以總統之意旨爲意旨，即接任時間，亦由總統自行決定」。

二十日，政府由外交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謂：「四強已答覆我方四月八日之照會。四國大使咸稱：

「甚願中國早日恢復和平，但在目前情況下，礙難出任媒介」。由是以見政府對「和談」問題，在外交上已表示其誠意與努力。

至此，唯一須立加解決之問題即爲蔣總統退休問題。蔣總統在官邸與李宗仁連續三次會議，對政府所日趨惡化之局勢交換意見。終於一月二十一日，總統發表宣言聲明引退。

宣言指出：「余真誠祈求能使共黨充份認識國家當前所面臨之嚴重局勢，並下令停火及同意開始與政府進行和談。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維護國家之精神及物質元氣，保持領土完整及政治主權，從而使國脈得以延續，社會秩序得以恢復，人民生活自由得以保障。」

在此最後一刻，此偉大人物其耿耿於懷者並非其個人之得失，而是維護中華民族有悠久歷史之生活方式，此種生活方式，正遭遇唯物政權者史達林主義之野蠻威脅。

一如其於民國十六年及民國二十年之兩度隱退，蔣總統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後，亦離開南京回到其浙東故鄉奉化。在這寧謐恬靜之故園，靜待國人再度召喚其起而領導。

二十一日、蔣總統既決定引退，但仍對北方局勢，未能釋懷，乃邀徐永昌（次辰）持其親筆函飛北平，面致傅作義，函告以：

「余雖下野，政治情勢，與中央並無變易，希囑各將領照常工作，勿變初衷」。

此爲蔣總統引退日之最後所發之文件也。午間，蔣總統邀約五院院長，下午二時，又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卽席報告：決定引退。其與李副總統聯名宣言，略謂：

「中正畢生從事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由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行民主爲職志」。……「先後二十餘年，只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爲國從事，斑斑爲世所共見」。……「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並囑勉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副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前項宣言之文字，原經李宗仁同意後而提出者。於下午四時十分，蔣總統即乘飛機離南京赴杭州，駐節於笕橋空軍學校。

在漢口之桂系人物中，見到中央社電訊，蔣總統擬發表之文告稿，大起反對，要求李宗仁提出必須修正，否則，李氏將不簽名於聯合文告。經張羣以長途電話報告在笕橋之蔣總統，即將原稿中之「既不能貫徹戡亂政策，以冀定永久和平」等字句刪去。上述文告，蓋已經刪改者。是晚，蔣總統宿於空軍學校。

短時期之引退，並非意味着蔣氏完全擺脫總統職務。我國憲法內並無關於總統辭職之規定。蔣氏係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將其職權移交與副總統李宗仁。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職權」。

蔣總統根據此項條文之規定宣佈引退，並要求李副總統根據此條文之規定代理總統職務。「引退」不同於辭職，亦不同於永久性之退休，蔣氏從總統職位上引退後仍保持國民黨總裁之職。

是日，行政院呈准蔣總統明令：准宋子文辭廣東省政府主席，由薛岳繼任。余漢謀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發奎爲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朱紹良爲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羣爲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爲京滬警備總司令。李宗仁副總統發表文告，宣佈就代總統職。同時共黨方面；對行政院所提出之和平意見，由其發言人表示拒絕，並主張「先談條件，然後停戰」。

蔣總裁以廿二日上午離杭，歸家鄉奉化，其對此次失敗，作如下之檢討：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當此新舊交替，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持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國家失去其靈魂，焉得不爲之失敗。」

李宗仁就任代總統之第一日，企圖用「脚踏兩頭船」之手法利用美蘇兩國。

首先，他向蘇俄駐南京大使羅申聯繫，試探在蘇俄及國民政府之間建立諒解之條件。此等試探性會談之結果，使李宗仁與羅申之間，對下列三原則達成協議：（一）中國同意在今後美蘇之間可能發生之任何衝突中保持中立；（二）儘早消除美國在中國之勢力；（三）應建立蘇俄與中國之間具體合作之基礎。會後，羅申攜帶此項初步協議返莫斯科，交其上級研究。

在等待莫斯科答覆之際，李宗仁異想天開，認爲可獲得美國對國民政府加以支持之保證，以利用美國來對抗蘇俄。他於一月廿三日，派遣一位代表往訪司徒雷登大使，宣佈與羅申談判之經過，並要求美國公開保證支持國民政府，美國國務院對於此種離奇的要求之反應，來得異常迅速。甫在一個月之前，蔣總統無條件要求美國作支持國民政府之保證，但爲美國所拒絕，現在李宗仁竟挾蘇俄以自重，要求美國作此種保證，自難爲美國所接受。因此國務

院訓令司徒雷登大使拒絕李宗仁之要求。

同時，李宗仁仍熱中於進行與中共之和談試探。一面電邀李濟琛、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一面任命一個五人委員會，作為國民政府之和談代表。此五人爲：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

李濟琛等五十五人發表「時局聲明」，響應共黨於卅七年五月一日所提出之召開「新政協」，主張解決國是。共黨方面則在石家莊發出答復黃紹竑之意見：「略謂：蔣已下野，第一點無須再商，白崇禧將軍如願望和平，可與劉伯承將軍直接談判」。

二十三日滁縣撤守，國軍在浦口佈防，蘇北放棄揚州，改在瓜州設防。邵力子卿李代總統令，赴上海與黃炎培、羅隆基、張瀾等聯絡。同時共方發表如下聲明：

- 一、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乃因其尙控制若干軍隊。
- 二、談判地點，俟北平「解放」後，在北平舉行。
- 三、反對彭昭賢爲南京政府代表。
- 四、戰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此時共方正在石家莊舉行「新政協」會議。而國軍却主動從長江以北各據點撤退。

二十四日，李氏向共黨表現妥協姿態。令行政院撤銷民國三十六年頒佈之「全國總動員令」，「取消戒嚴法」，「釋放政治犯」及「停止特工活動」。二十五日，外交部通知各國使節，我政府決定南遷至廣州。二十六日共軍竄擾浦鎮，浦口難民紛紛渡江逃至南京。美國務卿艾契遜特發聲明：「對華政策不變」。

時蔣總裁在奉化原籍，聞傳作義在北平作「局部和平」商議，對於國軍將領李文等，既爲傳作義所賣，應思補救之法。明知傅氏變節，但仍冀收萬一之效，乃作處理方針，交參謀總長顧祝同遵辦。

甲、中央各軍，分途突圍，作九死一生之計。與其坐任共匪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發揮革命精神。

乙、如（甲）項已不可能，則要求傅氏負責照原定計劃，先護國軍空運南撤。

丙、如（乙）項亦不可能，則必須將中央軍各級官長空運南撤，而將全部士兵與武器交傅氏編配。

丁、爲實行（丙）項方針，其意即寧可全軍交傅，而不願由匪整編，以保留國軍革命之人格。此爲對傅最低限度之要求。

戊、如（丁）項亦不可能，則要求其將師長以上各高級將領，空運南撤。

至二十七日，代總統李宗仁明瞭政府內部之不同意見，擅自致電毛澤東，聲言政府接受其八點建議作爲和談之基礎，並要求毛澤東派出共方和談代表。

李宗仁此項行動，既未與行政院磋商，亦未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磋商而逕自獨斷進行，故立即引起尖銳之歧見。行政院院長孫科在事前未被諮詢，對此項通電大不以為然。並聲明李代總統之政策，行政院無法向立法院負責。

此項分歧發生後不久，孫科即離南京前往廣州，二月五日，宣佈遷都廣州，一切政府部門除代總統府之外，皆在廣州執行職務。所有外國使館，亦皆被要求遷往廣州，但僅爲蘇俄及其他數個小國所響應。自此時起，直至和談失敗，李宗仁本人亦來到廣州時止，政府內部之分裂日趨嚴重，除立法院外，所有政府機構皆集中於廣州，且拒絕受命之代總統所設之政令機構。

二十八日，岡村寧次判決無罪，當予開釋。共黨方面提出戰犯名單，要求拘捕岡村寧次重予審判。是日共黨另發一篇聲明，略稱：

「南京的先生們要求和平談判，那樣緊張熱烈……我們老實告訴你：你們是戰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們。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逮捕一批內戰戰犯，首先逮捕我們十二月廿五日所提出的四十三人戰犯，你們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絕不姑寬」云云。

共黨於二月二十六日發表之聲明，顯示其對和平之真正態度。共黨電臺廣播四十五名所謂「戰犯」之名單，要求李宗仁代總統把他們交給共黨以加懲處，這無異是證明共黨對和談之「無誠意」。此名單包括所有國民黨領袖，諸如蔣總統、蔣夫人、何應欽、張羣、宋子文、陳立夫、王世杰、湯恩伯及蔣經國等。

至卅一日，傅作義北平「局勢和平」實現。國軍將領李文、石覺，迫得離平至青島，傅作義總部遷至北平西郊。共軍開入城內，並與傅氏簽訂十三項協定。傅氏本人即飛綏遠。尙有一函致蔣總裁，謂爲「大局打算」也。是日，李宗仁代總統由中央通訊社發表文告，略稱：

「華北方面爲了縮短戰爭，獲致和平，藉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礎與文物古蹟。傅總司令作義曾發表文告：宣佈自一月廿二日上午十時起休戰。平市國軍，大部當即遵從總部指示，先後撤離市區，開入指定地點。」文告又稱：「綏遠、大同兩地亦將實施休戰。」

同時中共方面也發表文告，針對李宗仁答允以毛澤東所提出之八條件，節稱：「你們既然同意，以我們的八個條件，爲雙方談判基礎。……八條不是抽象之條文，要有具體的內容。……按照這八條件，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

：你們通訊社的公告，你們已經承認，這件工作是做得對的。這就不但替和平談判，準備了地點，而且替南京、上海、武漢、西安、太原、歸綏、蘭州、迪化、成都、昆明、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臺灣、海南島等地的和平問題，樹立了榜樣。」

二月一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成立。二月二日，中共方面正式拒絕李宗仁所派和平代表顏惠慶等五人，否認代表國民政府前往北平。李宗仁爲決心和談起見，由甘介侯領銜組織「李宗仁私人代表團」：其代表爲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凌憲揚、歐元懷、侯德榜六人。詎知中共方面對此「私人和談代表團」，發出廣播，只許以「私人資格」赴平「參觀」，惟對甘介侯指爲「販賣和平份子」拒絕赴平。

甘介侯說：「共黨反對我去北平。他們視李代總統及其同僚如孩童。當我首次祕密赴華北時，係應中共之邀請。共黨現在對我不滿，係因李代總統未實行他們提出的全部迫降條件。共黨要李氏出賣蔣總統之軍隊，要使桂系軍隊去消滅蔣總統之軍隊。共黨提出要求，謂如果桂系軍隊支持和平，應自華中撤往京滬地區，讓開平漢粵漢路，使共軍得以取道華中直薄廣州。共黨保證若李氏指揮其軍隊與國民政府之其他軍隊作戰，則共軍將不進入廣西省。」

前項所稱，出諸李宗仁的密友之口，再沒有比這些話更足以顯示共黨之狡猾手法，企圖利用李宗仁之求和心理，來瓦解政府區。

李宗仁以爲中共已應允其私人代表赴平，迨二月八日，顏惠慶等六人動身時，孰知又被中共拒絕。中共初則不承認國民政府，因拒絕政府代表。復不承認李宗仁爲代總統，故又拒絕其私人代表。李氏不得已乃另改爲「人民團體代表」，於是有所謂「上海和平代表團」出現，以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爲代表，於二月十三日飛平，至廿一

日轉赴石家莊晤見毛澤東，於二月廿七日回南京，聲言：「和談可於下月在北平舉行」云云。

行政院院長孫科，以政府遷廣州，業已竣事，於二月六日在廣州招待中外記者，強調和平主張，必將貫徹，政府遷地辦公，並非放棄和平等語。時立法院尚未南遷，準備於二月十九日在南京復會。李宗仁於次日直飛廣州，於行政院長孫科、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吳鐵城均先後返回南京，於三月一日李宗仁發表「和平籌備委員會」，委員十人，以孫科爲主持，邵力子、吳鐵城等爲委員。

三月八日，行政院長孫科提出總辭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在廣州對中外各記者聲明稱：「蔣總裁無復總統職之意，其居住則完全自由。三月十二日，李代總統咨請立法院同意何應欽出長行政院。立法院投票通過。同時，中共一面公開拒絕李宗仁和談要求，一面在東南各省，強姦民意，製造和平空氣，發動——湘、桂、贛、皖、豫、閩、鄂、漢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進聯合會」，在漢口作爲期三天之會議。盡力散佈和平空氣，卻不讓對方作和平商談，此實爲中共之狡猾計策，以淆惑民心。又同時中共自三月十二日起，在長江以北發動攻勢，中共陳毅部全數陳兵於長江北岸之蘇、皖兩省地區。毛澤東則通令其部隊準備橫渡長江，佔領首都南京。廿三日，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副院長賈景德，各部會長官則爲：內政李漢魂、國防徐永昌、財政劉攻芸、交通端木傑、教育杭立武、經濟孫越琦、司法張知本、蒙藏白雲梯、僑務戴愧生、外交傅秉常、（未到職）祕書長黃少谷。

蔣總裁自息影奉化溪口，怡情養性，靜思補過。但頗有友好前往問候。南京救國日報突刊登：「蔣不出國，則和談無望」之社論，對蔣總裁大肆攻訐，連日不休。並捏造消息，指吳忠信赴溪口謁蔣，係勸蔣出國。且指蔣總裁當日之引退，出於吳忠信之游說勸告，而非由蔣總裁主動也。

蔣總裁在家鄉遊山玩水，閻錫山先生特於二月十七日親至溪口訪晤。二老交換黨政軍各項意見，閻先生認爲當前迫切需要：「應整飭紀綱，惟效用人」，以提高行政效率。又云：「中央政治委員會代委員長應在國府與政院之外，另選一人擔任，使能調劑府院，不生衝突」。蔣總裁以爲：「立法院地點仍設廣州，行政院重要部會主管應駐南京。但其機構仍在廣州。李德鄰既有意調換孫院長哲生，與其另找人選，協調府院，倒不如釜底抽薪，由李德鄰自己決定行政院長人選，使彼能完全負起責任」。

二月十九日，劉爲章來，蔣總裁深知其爲人，但仍以部屬相待，且直告而無隱，謂曰：

「李宗仁以毛之八條件爲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何能言整頓紀律？振作人心？並囑轉告白崇禧，現在係李當政，彼爲李之切近左右，更應擁護中央，遵守法令，作爲倡導。以鞏固中央組織，建立總統威信。否則，上行下效，何以爲人長上。」

先是，三月三日，李宗仁派張治中持其親筆函往溪口，函爲商量「和平條件與限度」，徵求蔣總裁意見。張治中面稱：「中共雖已微開和平之門，但前途困難重重」。白崇禧亦於三月九日派袁守謙實函謁蔣總裁於溪口。至三月廿九日。張治中電告前來溪口：到後，謂「即將前往北平，報告政府所定對和談腹案」。蔣總裁聆之而已。初，蔣總統未引退前，張治中曾央人向蔣總統陳情：希望蔣總統「早日出洋」。其提出理由爲一、可避免攻訐目標。二、卸去和戰失敗的責任。三、使一般將領減少依賴性。四、可以增長見聞。蔣總統當時明知其爲中共借箸代籌，亦惟笑聆之而已。

三月廿五日，李代總統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六人爲和談代表，而以邵力子爲

和談首席代表。翌日中共廣播稱：關於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舉行和平談判事宜，中共「中央」決定：一、談判定四月一日開始。二、談判地點在北平。三、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等爲代表，以周恩來爲首席代表。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方面所派代表團，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對時局的聲明，以及所提八項條件，作爲雙方談判基礎。四、上述各項，將經由新華社廣播電臺，即日通知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按上述地點、時間，派遣代表團，攜帶毛澤東八項條件之必要材料，以便舉行談判云云。

卅日在廣州舉行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國民黨執監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議決：一、停戰須在和談以前。二、國體不容變更。三、修改憲法須依法定手續。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須保障。五、土地改革可以實行，但反對以暴力進行土地革命。

中共幾經藉口拖延，和談終於四月一日在北平開始。政府代表團與一月間所任命者略有變更。參加此談判的政府代表爲包括以邵力子爲首之五人。共黨代表團內包括以周恩來爲首之五人。共方向政府之談判代表提出一項已擬就之草案，除以毛澤東之八點建議爲基礎外，還提出二十四點附帶要求，並要求政府必須全盤接受。政府代表一連數日要求共方對此草案加以修改，而共方除作無關重要之極小讓步外，堅執不允改易一字。至四月十五日，共黨向南京政府提出最後期限，聲言政府必須在四月二十日之前，接受此草案，期限絕不展延。而這些條款却無異是要求政府無條件投降。

由於毛澤東在四月四日發表之一項聲明，使政府更難於接納此等條款。毛澤東之聲明稱：「一旦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將與蘇俄並肩對美國作戰」。

此項消息，由黃紹竑帶回南京，黃紹竑指出：接受共黨之此等要求，不僅意味政府軍之全部投降，而且無異是協助共黨使政府軍解除武裝並加以改編。黃氏更報告其在北平所獲得之印象，此即不論政府是否接受此等條款，共軍必將橫渡長江。

四月五日在和談中，中共經過第三方面代表對李代總統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依據中共八條二十四款，不易一字而答允簽字，以十二日爲限期。中共對李代總統「隔江分治」之要求，立予拒絕。並聲明不論和談成功與否？共軍必須渡越長江。首次正式和談在於四月十三日，十五日第二次正式和談，中共氣焰益見囂張，故十六日黃紹竑回南京報告。山西之太原，共軍亦於是日併力猛攻，勢甚危急。李代總統對中共之限期要求，電請展期簽訂和約，重申共軍不需渡過長江之議。而中共堅決先渡長江爲先決問題。

共黨提出之此等無理要求，使李宗仁處於異常爲難之境地。當彼向毛澤東頻送秋波之際，曾不惜犧牲政府及國民黨內部之團結。因彼估計共黨會作重大讓步以換取政府之屈服。他認爲共黨會同意以長江爲分界線，由國共兩黨分治中國，政府之權力在長江以南地區得以保存，而至是，彼所面臨者，則是共黨對全中國志在必得之野心。至此，始認識自己已受共黨之玩弄，共黨只是視彼爲一件工具，用以削弱政府之鬥志。

如果不是其主要助手白崇禧將軍，在此緊要關頭全力反對共黨之最後通牒，則李宗仁極可能爲求和而同意共黨之此等橫蠻要求。白崇禧自漢口以長途電話請李代總統曰：「凡發出安撫妥協論調者，應首先格殺」。雖然張治中及邵力子，皆從北平發出緊急呼籲，要求李宗仁接受共黨之條款，但李氏終於接受白崇禧之意見。

至四月十七日，李氏致電在奉化之蔣總裁，要求蔣氏恢復總統職務以領導戡亂戰事。至四月二十日，李氏下令

在北平之和談代表團，拒絕共黨之提案，則戰火之全面重燃。乃必然者。國共和平談判，至此才告結束。

當此等事件正在進行之際，蔣總統並非完全不加問聞。在引退後抵達奉化之初期，的確曾有過一段清閒時期。他把其幕僚人員減至只剩兩名。爲應付其日常開支，被迫向中國農民銀行借貸金元券一百萬元，約合美金一萬元。

在引退之初期，每逢晴朗天時，經常在其長公子蔣經國氏陪同下漫步田野，尤喜遊覽童年時常隨其太夫人所到之天潼及妙高臺。閒時常與鄉間父老閒話桑麻。其故友及舊屬來訪，皆下榻於蔣氏私人所辦之武嶺學校內。只有極少信件及電報能抵達其手中，此等公文只需一位秘書已能應付裕如。

他在奉化之初期，拒不會見當時正在執政之高級官員，甚至代總統李宗仁要求來訪亦遭拒絕，白崇禧求見亦未獲接見。唯一例外是張治中，張氏中企圖取悅蔣總裁，報告謂毛澤東會表示願意把蔣氏之名從「戰犯」名單中取消，但蔣氏對此未置一詞。

蔣總裁引退期間，始終追隨左右之蔣經國氏，曾談述總統在奉化期間之心情：

「總統在奉化所消磨的一段時期，是極爲重要的，不應加以忽略。以往，他在擔任政治領袖期間，猶如一個破落家庭的家長，每天爲其家人籌措柴米油鹽而不得脫身，一方面要抵抗外來侵犯，另一方面要解決內部困難，沒有餘暇顧及家庭生活及培養子弟。而引退期間，他可以擺脫這一切困擾問題，有時閒得以研究政治發展之趨勢及尋求國家應走之道路。」

但是國家在此生死存亡之危急關頭，蔣總裁無法長期擺脫國事。蔣總裁爲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對於李宗仁集團欲向共黨求取「光榮和平」之努力，並未寄予厚望，在全國渴望和平之際，認識到有試圖進行和談之必要，但已

預見其結果必爲失敗無疑。由於對李宗仁之行動缺乏信心及擔心李氏過份屈從共黨，因此決定在李宗仁嘗試失敗前，必須有所行動以保持國家元氣。

蔣總裁在二月間採取一項保護國家資產之重要行動。由於預見大陸必將淪喪，他以國民黨總裁地位，下令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把政府庫存之五十萬兩黃金祕密運往臺北，以免落入共黨手中。俞鴻鈞立即執行總裁命令，於二月二十日完成此項轉運工作。當李宗仁獲悉此事時，已來不及阻止。蔣總裁有理由懷疑這筆黃金若落在李宗仁手上，可能成爲與共黨媾和之犧牲品。

但在另一件事上，蔣總裁未能成功。有價值一百萬至二百萬美元之敵國珠寶鑽石，存放於中央銀行內，蔣總裁亦要求俞鴻鈞運往臺北，惟爲李宗仁所阻。當共軍佔領上海後，此批珠寶全爲共黨所得。從而可證明蔣總裁之遠見，使五十萬兩黃金得免落入共黨之手。

在共黨所提最後通牒期限屆滿前七小時，共軍於四月二十日開始以巨砲猛轟長江南岸。當夜，共軍陳賡部隊在南京西南八十哩之處渡過長江。翌日，共軍陳毅部隊在南京以東之江陰渡江。首都夾攻之下無法保衛，政府決定撤退，共軍於取得南京後，分兵兩路，一股包圍上海，另一股直撲杭州。共黨挾其百萬大軍，如入無人之境。

南京失陷時，蔣總裁奉國家之召喚，重新恢復政治活動。

四月二十二日，李代總統及繼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之何應欽氏，自南京飛抵杭州，與蔣總裁會談。戡亂戰爭進入新的階段。

蔣總裁結束其在奉化之引退生涯，飛抵杭州會晤李宗仁，參加此會議者，尙有何應欽、白崇禧、張羣、王世杰

、陶希聖及吳忠信。與會人士一致同意發表如下聲明：

一、政府決定爲國民之自由及國家之獨立作戰到底。

二、在政治上，政府將團結全國愛好民主及自由之同胞共同奮鬥。

三、在軍事上，何院長將兼任國防部長，全權指揮集中於上海、漢口及廣州之國軍部隊。

四、將採取緊急措施，以加強國民黨之內部團結，及加強黨與政府之間的合作。

李宗仁在會上提出蔣總統復職問題，但蔣氏堅持應先解決黨務之急。杭州會議獲得重要成就之一，是決定今後決不再浪費時間尋求與共黨之和平，並決定動員全國一切力量，阻遏共黨攻勢。會後，蔣總裁返溪口小住，然後赴上海坐鎮，而李宗仁則返桂林小休兩星期。

廣州政府之代表，曾赴桂林訪問李宗仁，要求他赴廣州以便使政府之一切活動，集中於新首都。李氏重申希望蔣總統復職，若蔣總裁拒絕，則李氏將繼續代理總統職務，但必須實現下列條件：（一）本人（李宗仁）應有全權任免軍事人員；（二）一切運往臺灣之金銀外幣，必須運回大陸，以供李氏之政府調度；（三）運往臺灣之一切美國軍事裝備及軍火，必須運回大陸，依照政府之決定分配給各部隊。（四）一切軍事單位皆須服從國防部之命令；（五）國民黨對政府之政策，不得作任何決定，只能提出參考意見；（六）蔣總裁必須出國以尋求外國援助。

此等要求，旨在完全消滅蔣總裁在政府內之權力，並使蔣總裁及其他有遠見的領袖賴以爲最後復國基地的寶島臺灣，處於毫無防衛力量之境地。致使蔣總裁與李代總統之間，陷於公開及無可彌補之衝突。

當李代總統與中共和談，未正式開始前，中共態度，雖表面咄咄逼人，但鑒於橫渡長江，究非易事，且需付出

極大代價。而華中方面尙有三十萬大軍梗斷於長江干流。雖誇大口，其內心未嘗不想和談。惟正在此時，共軍將領，陳兵於蘇北之粟裕，祕密前往北平，向毛澤東報告：「對策反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業由楊虎父子之出力，戴戎光準德陣前「起義」，以作隔江迎接之應。緣此，毛澤東態度立時變成強硬至無可挽回地步。李代總統代表：黃紹竑、劉斐親聆毛氏如此囑強固執，氣餒屈服，贊成張治中主張。所謂張治中主張：即依照中共所提出之八條二十四款，一字不易而簽字。邵力子素以親共著稱，其妻傅學文爲留俄之道地共產黨員。章士釗仍不脫書生結習，原無主張。同時毛澤東對章氏故示以禮待，而囑章氏速組一個政黨，毛氏願全力支持，備爲參加將來「聯合政府」之需。章氏受寵若驚，亟與荆嗣伯在首都飯店密商組黨計劃，不再提和談。李蒸與張治中一鼻孔出氣。如此代表團，非代李代總統去作談判，而是作其自己進身紅朝之橋樑。故毛澤東願破種種，斷然拒絕李代總統劃江而治之建議。

先是，三月底，李代總統代表團起程赴平。南京傅厚岡李代總統官邸，突趨冷落。代表們在北平與毛澤東接洽，但接見而無事可洽，蓋毛氏堅決不允修改一字也。各代表惟有住於北平六國飯店，等閒度日。而南京傅厚岡官邸，却平添三位祕密賓客。三客行蹤詭秘，既入官邸，未曾出門一步。係中共所派來之「行人」，一爲「中國國民黨革新委員會」中委李民欣。乃李濟深之左右。一爲「民主同盟」中委朱蘊山，人稱爲「仁丹鬍子」者。另一即爲自稱爲「民主人士」劉子衡。

此三人只攜帶代表們之報告，並以游說語調，詳陳利害，委婉曲折，冀圖說服李宗仁簽字於八條二十四款之上。李氏答以茲事體大，焉能個人擅主，必提出會議，方可行之。而此三人要求李氏致函毛澤東：「重申和平誠意，表示不惜任何代價，求取和平協定」。李氏即表同意，乃由朱蘊山代爲起草，其致毛氏之函曰：

「宗仁自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心謀和，徘徊之忱，諒貴黨及民主人士所共亮。今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遵蕩平，協商問題，亦已接納貴方所提八項爲基礎。宗仁凍於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鑒於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乘已饒已福之懷，更進一步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願一身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期化干戈爲玉帛，登斯民於衽席，耿耿此心，猶如白水，特函布悃，諸希亮鑒」。

此函發表後，全國大嘩，食責以「卑躬屈膝以求和」！尤以「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一語，是否與遺囑原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即謂爲聯俄、容共？假使確是聯俄容共，則前次容共而至聯共，今日終至降共，一面倒向蘇俄，此即喪失中華民國立國條件，拋棄民族獨立精神，便作爲帝俄之附庸，則李氏等於無條件投降。

李民欣等三人離去，李代總統即電邀白崇禧來京，共商對策，經與何行政院長研討，而華南、西南各將領，對中共之若是囂張，極端不滿，先後來電，主張強硬到底。白崇禧以爲李民欣等係中共工具，不知廉恥，冀圖將國家出賣爲帝俄附庸，若輩倘再如此主張，誠「國人皆曰可殺」之人，殺之以謝國家人民。白氏義憤填膺，再三勸李代總統勿作千古罪人。獨湖南省主席程潛，函勸李氏忍讓以免生靈塗炭。蓋程潛自競選副總統失敗，主政湖南，早因劉建緒（前福建省主席）之居中牽線，與該省駐軍將領陳明仁、李默庵，有默契，其後，果皆叛國。

時李代總統接獲我駐美大使顧維鈞來電稱：「南京外交部吳部長轉呈李代總統何院長鈞鑒：四、五兩號電陳」

美援新法案」要點，計達。美政府於附送之說帖內，關於「對華政策說明」，大致如下：現在中國局勢……故長期援華方案，無法編製。……但由此混亂時期，美對華政策，仍可以若干原則爲指歸：一、美繼續支持尊重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原則。二、美國人民願與中國人民繼續經常經濟與文化上關係。因之美政府擬維持其在中國之各代表機關。並樂意見各種美商私人組織，繼續其在華之代表與工作。三、美於情況所許可而適當之範圍內，願繼續其對華現行之經濟援助。再此項說帖，美方向守祕密，請政府暫勿宣佈。

由此以見美國是取觀望態度，不願再爲國共作調人，自可於司徒雷登大使所著——「在中國五十年」一書中證之。司徒大使謂：

「代總統李宗仁，在一九四九年以全副精神應付和談……我接到最明白之訓令「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幫助，組成一個共產黨在內之聯合政府」。而此中共之所謂聯合政府，是以共產黨爲主而且受其控制之政府」。

至此，李宗仁實至無路可走之境界，蓋當其代總統之時，因其有獲得美援之希望，今日美援已無從獲得矣，美援既不能獲得，則局面即無法維持。其次，李氏初以爲可以「隔江分治」，今日已被中共堅決拒絕矣。既不允「隔江分治」，則「和談」即無從說起。中共所提出八條二十四款，誠如司徒雷登所言：「他們（中共）已經起草了冗長文件，要命令政府領袖們（代總統五院院長），在那文件之空白處簽字。……政府領袖們要自己承認罪行（戰犯），要謙卑地以個人資格請求准許復職。……到那時候，國民政府將自動地不復存在……」此即李代總統若果允許中共之條件而求和平，等於無條件投降之最明確解釋。

當李代總統之和談代表之赴平也。其針對中共所提出之八條，携有對案，以便提出討論。其對案：

一、「戰犯」係國際戰爭之專用名辭，現在係國內之戰，且戰之勝負未分，殊談不到「戰犯」，更談不到懲辦。

二、關於「軍隊整編」問題：雙方為整編問題，屢不能決，每至分裂。為免蹈前轍，擬各自編組整理，只要把隊部數目決定，互不派人監督。（明知不健全，為適應環境，只好如此。）

三、「就地停戰」：國共雙方「劃江而治」。長江北岸，由政府統治之少數城鎮，暫維現狀，形成南北自治局面。以和平競賽，達到和平統一。

四、「土地改革」：決照中共所提四原則辦理。但不得使用暴力，而以和平手段，收歸國有，再行分給予貧農僱農，以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張。

五、對中共所標榜之「清算」，沒收豪門資產，完全同意，惟不以流血手段完成任务。

六、「聯合政府」委員，為南北各地方政府推選，名額由雙方選定。

上項對案，先徵得和談代表同意後，交彼等帶往北平提出。自李民欣、朱蘊山、劉子衡返北平後，認為有再向李宗仁游說必要，於是公推黃紹竑回京，向李氏進言。黃紹竑得毛澤東、周恩來之許可，於四月十七日抵京，下榻於李宗仁官邸，而白崇禧已自漢飛京相候。黃紹竑對李、白面稱：

「現在美援不至，戰既無力，唯有「和」之一途。中共條件雖然苛刻，總比打敗投降，較勝一籌」。又謂：

「離平前夕，率毛澤東召見，二人密談。毛氏保證，如李代總統願簽訂此八條二十四款協定：一、未來之民主

「聯合政府」中，李代總統爲當然副主席之一。二、華中總部所轄各部隊，仍由白長官統率，退回兩廣，共軍絕不開進粵桂兩省。三、兩粵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由「聯合政府」公平處置。四、桂系幹部照常留用，作爲新政府官員。

黃紹竑復誇說，毛澤東如何睿智聰明，實漢武唐宗之所不能及，誠爲中國之明王。最後且自詡有功態度而對李、白云：

「此條件，亦算爲優厚，只要李代總統肯簽字，那末江南各省可免戰禍兵災，即「桂系」數萬幹部有了歸宿，而仍可保持副座之位。」

李氏聽其鼓如簧之舌，低頭沉思，而默不作聲。白氏則面青筋脹，以冷酷之容，問黃紹竑曰：「所謂和談條件，只許一面提嗎？」「爲什麼理由，一定要接受其條件呢？」「交給諸位帶去的對案，爲什麼不提出去呢？」「照你這樣講來，豈不是向共產黨投降嗎？」白氏一句句問，而黃氏迄未置答一句，惟垂頭而以手拍額。有頃，自謂：「血壓高升，即赴鼓樓中央醫院留醫」。翌日，白氏着程思遠特備晚會，以調劑黃氏情緒，惟黃氏未赴約即離京。而帶留北平之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劉斐、李蒸於四月十九日來電，聲明「不再回京」。意即卸除「和談代表」之名義與責任。二十日，李代總統召集何應欽、顧祝同、白崇禧等會議，以應付共軍突然行動。一面發表聲明，撤銷「和談代表」，一面派員專程往奉化，徵詢蔣總裁意見，一面飭各院部會之政府機構，迅速撤離南京——首都。

四月二十一日午，中共朱德發總攻擊令。毛澤東廣播指出：

一、向國民黨地方政府集團宣佈「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凡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可依此案簽訂協定。

二、共軍包圍南京之後，李宗仁及其政府逃避不及，困居危城，仍願簽「和平協定」者，共軍再予最後一次機會。

此中共一手用刀斫殺，一口高喊和平之技術也。

當四月二十日和談破裂，英艦「紫水晶」在長江中行駛，為中共在皖北沿岸之共軍砲轟。二十一日駐守江蘇江陰要塞之國軍戴戎光叛變，引致在長江北岸荻港、六圩、以至口岸之共軍，安穩渡過長江。其在皖北裕溪口以至無為州一帶共軍，亦以國軍一部叛變，致駐守蕪湖、當塗之國軍楊幹才部向宣城方面後撤。沿途共軍與土共會合，而國軍九九軍又不能配合作戰。南京遂受兩面夾擊，有不得不棄守之勢。此四月二十三事也。而在山西太原之國軍，孤軍困守，為時最久，亦於四月二十四日，自省主席梁敦厚以下文武官員五百人全部殉國。此一悲壯事蹟，實至沉痛而可炳丹書於史冊者也。四月二十四日中共進入南京，至二十六日，中共派其幹部，包圍美國駐華大使館，搜查各項文件，大使館便凌亂不堪。繼且至駐華美大使司徒雷登之住宅，亦同樣予以搜查。美國駐華人員至是，不得不自行撤退。初，政府南遷時，曾通知美大使館及早遷粵，而司徒大使僅派一代辦至粵，蓋對中共仍寄有若干幻想。至此，則如大夢方醒矣。二十七日，蔣總裁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其中有云：

「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

並呼籲愛好自由之同胞，要認識：

「共匪之需要非『和平』，而為戰爭。更要重振抗日時期之決心與勇氣，為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民主和平而

奮鬥。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

是日蔣總裁即離開其故鄉溪口，乘「太康」艦逕赴上海。翌日，復乘「太康」艦往廈門。當日浙江之吳興、吳興、江蘇之宜興，均告陷落。第二十軍軍長楊幹才在安徽之宣城至屯溪之公路間，與中共作殊死戰而殉職，至於中共方面對李代總統所派遣之和談代表，不予放歸。

和談之破裂，使蔣總裁在溪口歷時三月之寧靜引退生涯告終。在一月間初抵溪口時，已有一種預感，似不至就留太久。蔣經國氏回溯當時之情景稱：「我們抵達溪口之當天，父親對我說：『我們將在這裏住三個月。』及於四月二十五日離溪口時，恰爲三個月」。

蔣總裁乘砲艇離溪口時，一般僉信將前往當時尙遠離戰線之廈門或臺灣。但事實上，却令座艦駛往上海。

蔣總裁親臨人心浮動之上海，實有必要。共軍已在江陰渡江，保衛京滬線之國軍已被迫退至蘇州崑山間，挽救上海命運之希望微乎其微，但爲維繫士氣及民心，必須一戰。

由於李代總統與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之間日益增加之歧見，使上海保衛問題更趨複雜，李宗仁下令湯恩伯撤銷京滬地區之戒嚴法令，又命令湯氏將其精銳部隊，自上海調往江西及皖南，以支持白崇禧在武漢地區集結兵力。湯恩伯拒絕此兩項命令。

蔣總裁以在野之身，曾力謀調和此等分歧。故在上海逗留十一天，最初住於復興島，其後移居市區。此時共軍雖已佔領蘇州及宜興，並正向上海迫近，但蔣總裁仍以其一貫無所畏懼之精神，在市內來往，既不帶衛隊，甚至並無第二輛汽車追隨護送。並未有人對他加害，這顯示在大難將臨之際，上海民衆仍對之有無限忠誠。留滬最後數天

雖會抱恙，但仍不顧病痛，繼續參加連串會議。

離滬前夕，蔣總裁答覆李宗仁在桂林向廣州政府代表提出之要求。李宗仁要求之原文，係由何應欽在廣州派專機送來者。李宗仁在此項要求中，主張蔣總裁出國尋求外國援助。蔣總裁對此嚴加拒絕，惟對李宗仁之強調改革提出質問，指出任何改革不論是如何良好，皆不可能在短時期內，一蹴而就，並不同意李宗仁所要求消滅國民黨對非常委員會之影響，蓋此事係在杭州會議中所決定者。蔣總裁指出，如果赴國外而無法獲得援助（鑒於當時美國輿論之趨向，是極可能之結果），則豈惟受國人之指責，並且受政府領袖們之譴責。

促請李宗仁注意一項事實：促和談失敗的責任是在共產黨身上，李宗仁不應附和共黨，把責任歸咎於政府。

蔣總裁鑒於李代總統之誤會與猜疑，如此其深，乃函覆何應欽院長，首請李代總統速蒞廣州領導政府，並說明無復職意，其答覆李代總統六項要求之前五項如下：

- 一、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
- 二、前在職時，爲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曾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儘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
- 三、美國軍械之存儲及分配，爲國防部職責，引退之後，無權過問，簿冊羅列，亦可查核。至於槍械由港運回，此乃政府權限，應由政府自行處理。

- 四、國家軍隊，由國防部指揮調遣，凡違反命令者應受國法之懲處，皆爲當然之事。

- 五、非常委員會之設立，爲四月廿二日杭州會談所決定，當時李代總統曾經參與，且共同商討其大綱，迄未表

示反對之意，今李既欲打銷原議，彼自可請中常會複議。惟民主政治爲政黨政治，黨員對黨應有遵守決議之責任。黨對黨員之政治主張，有約束之權利。此爲政黨政治之常軌，與訓政時期以黨御政者，自不可混爲一談。

蔣總裁答覆李代總統關於出國問題，節錄如下：

「若謂中正不復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始終一貫爲中國獨立自由而奮鬥。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正竟無立身之地。

在溪口時，曾對禮卿（吳忠信）兄言：『前次他們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現在若復迫我出國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慘之境遇』。今日所懷，仍復如此。」

「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正又將負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處容身。中正爲民主國家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中正自引退以來，政治責任已告解除，而對革命責任，仍自覺其無可逃避。故德鄰（李宗仁）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但決不敢有任何踰越分際，干涉政治之行動。」

「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正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爲牽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避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問聞。」

此等信函往還，反映此兩位中國最高領袖之間裂痕之深。當蔣總裁寫此覆信時，並不知道當時李宗仁正在背後向美國玩弄之手法。

李宗仁鑒於當時美國對蔣總裁之諸多責難，除在國內進行其政訃，蔣總裁之一項祕密活動，一方面歪曲渲染蔣總裁在任期內之「缺點」，一方面企圖博取華府當局對其本人之好感。由於美國國務院此時正力主在中國進行某些改革，故李宗仁力圖使國務院認其本人即爲此適當之「改革家」，李氏與華府交往之函件中，強調對其本人在蔣總統任期內之一切措施，諉卸責任，並表示不容其過問。

時美國國務院於一九四九年夏季，公佈李宗仁在是年五月五日，寫給杜魯門總統之信，李氏之暗中勾當，突然揭露。此時正值蔣總裁在上海對抗共黨瘋狂攻勢之緊要關頭，而李宗仁却在背後施放冷箭，李氏函中，其談到馬歇爾之使命時稱：

「鑒於當時政府及中共雙方皆缺乏誠意，此一切努力（按：指馬歇爾之努力）皆不幸一無所成。雖然如此，貴國仍繼續擴大對敝國政府之援助。其令人遺憾者是：由於當時敝國政府未能物盡其用，且未能使用此種援助，於進行適當之政治、經濟及軍事之改革，以致貴國之援助未能產生預期之效果。此種失敗使敝國陷於目前之困難境地。」

李宗仁此函之用意，是要把共黨在中國之勝利，完全歸咎於蔣總裁個人，李宗仁竭盡其獻媚之能事在自吹自捧之下，却並未能得到華府方面對李氏以援助或好感。

此爲五月初事也。當時，居正、閻錫山、李文範、白崇禧等飛赴桂林，邀請李代總統蒞廣州主持政務。而浙江之杭州適於五月三日失陷。中共對外又努力拉攏，與緬共、韓共簽訂互助協定。五月八日，李代總統始至廣州，並發表談話，略謂：「共黨無心悔禍，政府力謀革新。」十日，立法院在廣州開會，而京滬路戰事，國軍已從崑山、嘉定後撤至上海市區，於是戰事即在上海市郊進行。十三日，立法院通過「政府作戰到底案」。十五日，國軍放棄

武漢三鎮，馳援南昌。十六日，共軍發動四十萬人圍攻上海。至二十日國軍撤出西安。廿一日，李代總統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堅決反共。同時關中（陝西）之戰況，亦異常激烈。新疆部隊以後路截斷，無法調回，上海市郊戰至廿五日已到空前慘烈境地。國軍不得不於廿七日主動撤出。何應欽於卅日提出行政院總辭職。翌日李代總統提名居正爲行政院長，經立法院否決。次日（六月一日）李代總統另提閻錫山爲行政院長當經立法院投票同意。至六月十日，閣閣組成，其副院長朱家驊、內長谷正綱、外長葉公超、財長關吉玉、教長杭立武、法長張知本、經長嚴家淦、交長陳良、蒙藏委員長周昆田、僑務委員長戴愧生。張羣、吳鐵城、陳立夫、黃少谷、萬鴻圖、王師曾、劉軌琛爲政委。閻氏自兼國防部長。

在此事件發生之前，何應欽將軍已因大局無望而請辭行政院長之職。李代總統接受其辭呈之餘，設宴招待在廣州之各位立法委員，要求同意居正出任行政院長，李宗仁對立法委員面稱：「他（指居正）有辦法對付那些妄自尊大之將領。」所謂「妄自尊大之將領者」，係指在臺灣之陳誠、在西北之胡宗南及在福州之湯恩伯。值此強敵壓境之際，李宗仁竟仍念念不忘於「對付」內部之異己者，深爲立法委員們所不齒，故在翌日立法院投票時，否決了居正之任命。李宗仁接着提名閻錫山將軍爲行政院長，獲得立院批准。

先是，五月初旬，蔣總裁接到美國魏德邁將軍函，陳述中美關係甚詳。爾時蔣總裁因得估計美國援華關係究爲如何？

「美國會已發動調查美對華政策運動，其國務院內親共份子，無論如何設計阻止援華，惡意中傷，顛倒是非之舉動，只要忍耐持久，終有水落石出，虛實大白於天下，決不至沉冤莫白也」。

此爲 蔣總裁對美國之態度，擬以忍耐持久爲原則。其所自記者也。

蔣總裁駐滬期間，曾於五月七日乘「江靜」輪自復興島起碇，出吳淞口，南駛至甬江口外之長山列島。按長山列島爲鎮海縣沿海各島嶼，如金塘、澀港、大榭、岑港、六橫各島，與舟山羣島相毗接。蔣總裁先至大榭島，大榭與鎮海縣南穿山僅一渡之隔，故蔣總裁除親自察勘形勢外，對兩地之水深、潮汐、塗灘、特別注意，因日本人曾在該地登陸，全軍覆沒故也。翌日至澀港，爲漁民聚處。正在鎮海大決江之口，岑港爲一長堤，居民以開採海中石礦爲業。蔣總裁登岸觀察各要口後，復登輪東駛至岱山。岱山爲大島，係著名之產鹽區，（供給江蘇五屬浙江三屬），亦爲黃魚之叢集區。經登岸巡視後，即轉赴衢山。岱山、衢山、舟山、普陀、金塘，稱五海山。蔣總裁遍歷各島，因與江蘇海外之嵎泗列島相銜接，而上海淪陷爲勢所不能免，蔣總裁此行，純爲研究下一步戰略，在如何此等列島以封鎖上海。蔣總裁一方面觀察形勢，一方面在「江靜」輪行駛途中，則考慮政治問題，不但對軍隊中政工若何儲備？幹部如何組訓？並草擬後期革命之準備計劃。預定：

「以定海、普陀、廈門、臺灣爲幹訓地區。建設則以臺灣爲着手之起點。實行訓練幹部，編組民衆，計口授糧，積極開墾，在社會上不許有一個游民。實行二五減租，保障佃戶。施行「利得稅」，「遺產稅」，籌辦「社會保險」，推進勞工福利，推廣合作事業，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是以民生主義社會建設及其政策，實施爲要務。更擬推行土地債券，士兵與工人的保險制度。」

蔣總裁又親自擬定：

「必須選訓大批新幹部，加以組織，並使之深入社會各階層，組織基層羣衆，嚴格執行紀綱，提高組織尊嚴。

軍政幹部應痛改過去鬆懈散漫之惡習，以羣衆力量，來維護法紀。且保證每一幹員都應服從革命的領導，執行革命的綱領，剷除空言不實，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風。而代之以實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義，嚴正不苟，是非分明，賞罰公允的新作風。

蔣總裁復經歷梅山島、石浦島（浙江南田縣）等地，擬赴馬公島乃改乘飛機，沿途俯瞰三門灣、海門、樂清、雁蕩、永嘉、平陽、三都澳、及閩浙交界各點，緩行低飛以察看，至馬公島降落。蔣總裁接中央方面電勸「打銷遁跡久隱之意」。駐馬公島八日，始赴臺灣，寓高雄壽山。李代總統函託于右任、閻錫山飛臺，晉見蔣總裁面陳一切，並邀蔣總裁親蒞廣州主持大計，俾免國家陷於羣龍無首，紊亂不安狀態。

當時蔣總統雖在引退時間，但仍爲國民黨總裁。李宗仁所作之許多重要決定，皆曾向他徵詢意見。在何應欽辭呈被接受之前，李宗仁派一代表團包括于右任、閻錫山、吳鐵城、陳立夫及朱家驊。前往臺北，與蔣總統磋商並提交一封函件。信中論調，似可反映朝野人士對李代總統之失望及對蔣總統東山復出之殷切期望。李宗仁之信，其大意略稱：（譯自蔣總統集英文本）

「我們在杭州會後，我深受鼓舞。由於我的能力有限，未能實現你的期望，而且無所作爲。在此緊要關頭，仍獲得你的不斷鼓舞及同志們的支持，但我感到我不能逃避任何責任，預料未來的局勢，將更爲惡化。在你的偉大領導及團結一致的犧牲精神之下，我堅定地相信局勢將轉危爲安，並且必將獲得最後勝利。我們在此間的所有同志，皆希望你前來廣州領導我們，我本人亦衷誠地希望能每天獲得你的面諭和指示。」

李宗仁信中並要求蔣總裁提名行政院長何應欽的繼任人選，蔣總裁答以對此事不作任何抉擇，並表示如在必要

情況下，他願意隨時前往廣州。

離滬前夕蔣總裁曾有意飛赴四川，組織內地之抵抗力量以阻遏共軍狂飆。但經八日海洋之經歷作重新考慮其計劃後，認為中國欲進行最有效之抗共，必須以沿海地區為基地，蓋此等地區可使我國繼續保持與自由世界之聯繫。上海於五月二十五日陷落時，蔣總裁已抵達臺灣，他的臺灣之行嚴守祕密，連廣州之政府其初亦未知其行蹤。迨抵達臺北時，省政府曾邀請下榻於前總督府。但蔣總裁以引退之身，僅係國民黨之領袖而並未擔任官職，故對省政府之盛意加以婉拒。他終於選擇臺北郊區以北八英里之一山區村莊「草山」為其居留之地，此即現在之陽明山。當時下榻於草山臺糖公司之賓館。在臺灣的這些年來，一直以此賓館為其官邸，至後來復任總統後，有一部份時間住在臺北之總統府內。

以臺灣作為自由中國最後基地之決定，並非匆促達成者。早在華北易手之後，政府已考慮以臺灣作最後基地。雖然蔣總裁及其幕僚仍希望能在大陸上保留一部份地區，但萬一在大陸無法立足，則臺灣無疑是最利於國民政府防守之地區。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相隔寬約一百英里之臺灣海峽，且在每年深秋至春初，臺灣海峽風濤洶湧，使海空力量異常薄弱之共軍，難以窺犯。臺灣有肥沃之土地及豐富之農產，使政府得以自給自足，以伺機反攻。

但蔣總統抵臺後的最初幾個月，政府各部門及國民黨各機構之主要活動，仍集中於廣州，臺灣仍只是一個次要的戰略中心。

七月一日，中央軍官學校各期同學在廣州成立非常委員會，志在團結反共。蔣總裁去電勵勉全體同學、立志、努力、雪恥、復仇，且謂：

「我和你們的生命是整箇的，成敗榮辱也是一致的，我的恥辱也是你們的恥辱」。

其對黃埔同學之期望，殊至殷切。七月四日，蔣總裁接見美國國際新聞社遠東總經理韓德曼，及斯克利浦霍華德系報遠東特派員范智華，並答覆其問題。

「中國反共戰爭，倘不得及時之支援，則民主國家將來所付之代價，恐將不止百倍。吾人倘不能在中國防止共產主義，則共產主義，必將蔓延於亞洲。如果亞洲爲共產主義所控制，則另一次世界大戰，更無法避免。」

七月七日，中共在上海將美國副領事歐利文加以逮捕拘禁。同日中央政府與社會賢達及海內外各黨派領袖八十餘人，共同簽署一項「反共救國宣言」，茲節錄其大要如下：

「……吾人深知，中國若爲共黨所統治，一旦淪入共黨國際之鐵幕，遠東安全與世界和平亦受莫大威脅。……吾人生死與共，個人決無恩怨。民族之存亡所繫，黨派決無異同。國家領土之完整，主權之獨立，一日不能確保，人民之政治人權與經濟人權一日不能獲致，則吾人之共同努力，即一日不能止息」。

是日蔣總裁接見駐菲律賓公使電告：「菲總統季里諾先生對總裁訪菲，極表歡迎，並已準備一切。」云云：蔣總裁對其黨務會議發表意見，認爲「政黨不僅爲純粹之民主政黨，其性質應定爲革命政黨」。「此時一切必須以重新做起爲要旨，尤其著重於一點，即由小處做起。不必爲外物及現象所眩惑。故對於各事，應以制度與人事爲根本要圖，必不斤斤計較一時之得失與成效。」九日晨乘機飛福州，晤省主席朱紹良，即乘原機，轉平潭島而回臺北。十日七時，直飛菲列賓白沙機場，轉赴碧瑤、季里諾總統，親來迎接，華僑列隊佇迎，夾道歡呼，沿途彩牌林立。旅菲僑領向蔣總裁建議：「鞏固軍心，挽回民心。」又提：「禁吃空額，公平兵役。」蔣總裁以其切中時弊，頗爲

感動。翌日以國民黨總裁身份，與菲總統季里諾發表聯合宣言。號召遠東各國組織「同盟」，以遏制共產主義之威脅。再與菲總統面商「聯盟」第一步驟之進行方法，即電韓國總統李承晚徵求同意。十二晨乘機返臺。

蔣總裁由於李代總統、閻行政院長一再電來敦促赴穗，於七月十四日飛抵廣州。十六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成立，對閻錫山所提之一批轉時局方案，原則通過。十八日行政院會議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任命陳誠爲長官，轄蘇、浙、閩、粵、瓊（海南島）五省區。十九日湖北省之宜昌失守。是日蔣總裁接見美駐華公使克拉克，明告以：

「美國不肯積極負起遠東領導之責任，我等不得不自動起而聯盟耳。」

適大韓民國李承晚總統邀蔣總裁訪韓。蔣總裁爲欲商談聯盟事，決定應邀一行，乃作訪韓準備。吳忠信謁蔣總裁，其進言曰：「以後用人，應以願幹、敢幹、能幹爲主要條件。其不願、不敢、不能者，勿再強其所難。」旋與余漢謀、暨在粵高級幹部，商討東南政局與保衛廣州計劃，決定大綱，指示要略，直至十二時始畢。蔣總裁最後提議與會者：「此間人事複雜，要注意於『人和』。」再三叮囑而散。廿一日南昌失陷。蔣總裁乘「華聯」輪離穗。先與李代總統懇談，關於東南政局及廣州保衛策略。廿二日午抵廈門，住鼓浪嶼黃奕柱寓所，靜心研究閻錫山院長所著，「保衛臺灣、瓊島之各種方案。」認爲頗有見地。廿三日召見湯恩伯總司令及閩省主席朱紹良。下午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召集閩南各軍師長以上，討論防衛方法。是日湖南方面戰事全面展開。七月廿四日，蔣總裁由廈門飛返臺北。決定成立「革命實踐研究會」，又擬定挑選黨、政、軍幹部之標準，人數以二千人爲限，訓練以半年爲期。課程分：軍事、黨務、哲學、軍政、經濟、教育、人事制度，及革命理論與目標等等。當日得報：「湖南長沙外國

爭奪戰，益趨激烈。至廿七日，李代總統自福州飛抵臺灣，蔣總裁親至機場迎接。」

行政院會議決定：任命馬鴻逵爲甘肅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任西北軍政長官、李及蘭兼廣州衛戍總司令。株州失陷。中央銀行限制銀圓券兌現。自此蔣總裁連日與李代總統作數度長談。李代總統於七月卅日飛離廣州。

蔣總統在草山沉思熟慮之際，在廣州之李代總統仍負大陸之軍政全責，但戰局急轉直下，漢口與九江皆於五月間與上海同時淪陷。政府會希望能在湖南紮住陣腳以阻共軍攻勢，抗戰時期日軍曾三度在湖南省被阻。湖南之地理環境，係利於守而不利於攻者。只要堅守湖南，則廣東與廣西兩重要省份，亦可保持不失。

附共之國民黨叛徒再度使共黨坐大漁利。八月五日，領導湖南省之程潛與陳明仁同告叛變，使共軍不發一彈擄取長沙，並使廣州至漢口之防線全面崩潰，白崇禧將軍及廣西軍隊被迫退向衡陽。

按湖南方面，於六月初旬，共軍已逐漸迫近長沙，程潛之叛象已明，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態度曖昧。黃杰、鄧文儀對此情形，擬盡力以挽此危局。乃連袂飛長沙與陳明仁懇談，希望以私人情感，勸止陳明仁之投逆。陳明仁自東北四平街之戰以後，自以爲受屈莫仲，耿耿不能去懷。迨其後出任武漢警備司令、第一兵團司令，華中剿總白崇禧對之，可謂深資器重，大可消除宿忿。當陳明仁自武昌撤至長沙時，迭電請求赴臺覲見蔣總裁，蔣總裁固不知陳明仁內心積憤。况復湖南戰事正在緊急，負責防禦之將官，焉可離防？乃電復以「無庸來臺」，於是陳明仁大感失望，以爲抱怨而再無伸雪之時，憤與恨交織於心，以爲以後出處，更覺爲難，悶鬱異常。程潛探知其情，乃加以種種煽惑，陳明仁不堪其誘惑，遂決心投共。惟於白崇禧最後撤離長沙時，陳明仁親自伴送，使白崇禧得安然起飛。蓋陳明仁部下已爲共黨所迷醉，擬於機場劫持白氏，作爲向共黨立功之資，即爲陳明仁所力阻，故白氏得化險爲夷耳。

蔣總裁居住臺北市郊陽明山（草山），於八月一日設立「辦公室」，下設八組，另設一「設計委員會」。八月二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南京返國。同日湖南方面國軍，自淶口轉進。三日蔣總裁飛赴定海巡視，宿於普陀山文昌閣，四日宿天福庵。是日，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湖南省政府主席陳明仁在長沙叛變，正式聲明，投降共黨。政府立即發佈通緝命令。

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爲其「對華靜觀政策」作辯護，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蔣總裁對此事，認爲：

「美國國務院此種措置，不僅爲美國痛惜，不能不認其主持者缺乏遠慮，自斷其臂而已。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自求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爲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爲最後之國恥！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漸雪也。」（此段記載，見蔣總裁日記）

美國政府對中國事件採取袖手旁觀立場之決定，繼續使中國朝野人士深感沮喪。艾契遜國務卿宣稱：「美政府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等待亞洲之「塵埃清除」。

蔣總裁雖曾一再受到美國之不諒解，但仍未放棄美國改變其態度之希望，他認識到美國有一些重要的輿論機構不同意政府此種對華政策。蔣夫人當時仍在美國，曾與美政府之某些要員會談。

蔣總裁決定進行一項新的努力。共產主義席捲東亞之浪潮，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韓國、中南半島、緬甸、馬來亞以及菲律賓。如果所有這些國家皆能聯合成一個「東亞反共聯盟」，將可影響美國之決策，以阻遏共產主義之擴張。蔣總裁相信，此種地區性計劃，不論對中國或美國皆有重大之戰略價值。

爲進一步推展此計劃，蔣總裁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之邀，飛赴碧瑤舉行會議。季里諾總統熱烈地接受「反共聯

盟」計劃。會於七月十一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亞洲所有的非共獨立國家，組織一個「反共聯盟」。故於訪菲之後，蔣總裁應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之邀約，始於八月六日自定海（舟山）飛往韓國鎮海，韓國李總統夫婦親來迎迓。經過隆重禮節，與李承晚商談，爲「亞洲反共聯盟」事以及兩國經濟、軍事、文化合作問題。尤著重於海上、空中之合作。至八月八日，發表「聯合聲明」。下午三時返回臺北機場。

在韓時，曾與韓總統李承晚以連署函件，致菲總統季里諾，函中略稱（譯文）：

「我們在韓國海邊鎮海市進行了歷時兩天的會談，對組織亞洲或太平洋國家同盟的問題充份地交換了意見。我們愉快地聲明此次會談獲致下列協議：

「我們皆認識到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係人類自由與民族獨立所無法容忍的，必須加以消滅。爲對抗此種共同的威脅，我們必須進行集體的奮鬥，同時也進行個別的奮鬥……」

「我們充份同意季里諾總統與蔣介石大元帥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瑤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所包含的建立一個同盟之觀念。」

「我們皆進一步同意，應要求菲律賓共和國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便此項擬議中的同盟得以實現。因此，我們要求季里諾總統於最近將來在碧瑤召開一次預備會議，以決定建立此組織之具體措施。」

按此計劃推展甚爲順利。但當季里諾總統於八月間訪問華府之後，他和李承晚總統皆突然失去對蔣總裁所提出地區性同盟計劃之進一步興趣。季里諾始終未召集此項預備會議。直至艾契遜國務卿發表一項聲明，宣稱：反對在現階段締結一項太平洋國家之公約，並引述印度總理尼赫魯之反對作爲理由。

至於美國國務院擬將中國大陸之淪失歸咎於中國國民政府。於是發表其所謂「白皮書」，該書長達一千頁，由P·C·傑薩普爲首集七十名專家編纂。在此項文件中，蔣總裁及其政府被描述爲腐化無能。

艾契遜國務卿於該「白皮書」發表前數日——七月二十九日，任命一個三人委員會，全面檢討美國之「遠東政策」，並提出改革意見。此舉顯示美國遠東政策仍未定型。此委員會之首腦亦爲傑薩普（按係太平洋學會祕書），另兩位委員爲福斯狄克及凱斯博士，皆係美國傑出之教育家。彼等研究之目的，計爲向國務院提出一項新的長期性政策。傑薩普博士在完成「白皮書」後，到南太平洋地區訪問，與亞洲各國領袖進行會談，並搜集各種資料。

「白皮書」立即產生後果之一，是李宗仁對蔣總裁之反對更趨公開。李宗仁之心腹甘介侯，當時正在華府，甘介侯並不經過中國大使館而逕自訪問美政府之官員。甘介侯向李宗仁提出之意見稱：美國政府「已不準備再援助由蔣介布控制之政府」。李宗仁自認爲可獲得美國之支援，故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偏與蔣總裁抱持敵對態度。

蔣、李兩領袖不久即對防守戰略問題，發生背道而馳之意見。蔣總裁認爲僅剩之政府部隊應集中於防守廣州、海南島及臺灣。然而李宗仁則力主全線作戰，堅守湖南及廣西兩省。他力促把在臺灣之空軍部隊及孫立人中將訓練下之新軍調往衡陽地區。結果，蔣總裁所主張的加強臺灣防衛力量之意見獲得勝利。但在加強海南島防衛力量之問題上，蔣總裁之主張則未被實現。當時在廣州之政府官員，極少具有遠見，因此皆無法認識到臺灣及海南島將是中國最後之自由領土。

另一項意見衝突，是在對儲藏於臺灣的國庫資金之運用問題上。

廣州政府於七月間，廢除已貶值之金元券，而改採以銀元爲本位之銀元券。但民衆及軍隊已對紙幣失去信心，

只要硬幣。爲滿足他們的要求，政府在改採銀元券後的最初三個半月之內，使用了價值逾一億二千萬美元的黃金、銀洋及外匯。這一切基金，皆取自在臺灣之中央銀行庫房。此種無窮盡之消耗，將使政府之財力枯竭，而且此種措施無補於防阻廣州之陷落。

蔣總裁從未同意此種錯誤之財經政策，但亦無權力制止此種政策之推行。

是時，中國大陸之局勢；西藏全境戒嚴，聲稱係「反共產主義之佛教戰爭」。江西贛州前線戰事甚爲吃緊。八月十二日，行政院頒佈「國民反共公約」及實施辦法。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前赴青海塔爾寺，主持第十世班禪坐牀典禮。吳鐵城由臺北飛赴東京，訪晤麥克阿瑟元帥，及日本朝野。至十五日贛南展開激烈戰爭。同日「東南長官公署」成立（詳前），陳誠就長官職。八月十六日，我國對美國「白皮書」發一簡短聲明，既不承認，亦不否認。十七日國軍撤出福建省之福州。而共黨劉伯承之軍隊逐步逼近廣州。在西北地區之政府軍，又遭遇全面崩潰。緣甘肅及青海兩省效忠於政府之回族領袖馬步芳將軍，在華北淪陷後仍堅守西北，但此時他在共軍步步進逼下，已感窮於應付。他飛抵廣州，要求政府對他的總部所在地蘭州進行空投支援，但廣州當局愛莫能助。馬步芳只得飛返西北，放棄蘭州，接着又放棄他的最後據點青海省會西寧。具有現代化機場的蘭州之陷落，是毛澤東的一大勝利，使中共與蘇俄有了更簡捷的空運聯繫。

繼蘭州淪陷之後，共黨又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包頭及整個綏遠省。投共之傅作義，號召他之老巢綏遠省之舊部全體投共。在這連串不幸事件下，政府在北方之勢力已被完全消滅。

西北全面崩潰，而廣州又危在旦夕之際，西南地區又遭遇嚴重威脅。

蔣總裁對廣州戰事，至感關切，認廣州爲最後成敗之一戰。乃於八月二十三日，由穗飛至廣州。立即與李代總統、閻行政院長洽談。並接見顧祝同、薛岳、余漢謀、劉安琪等十餘將領，其主要目的，在瞭解已往錯誤，及實施情形。尤希望勿將劉安琪北調，毋使廣州成爲真空。二十四日即由穗飛渝，與駐重慶諸軍政要員張羣以下會談。至二十七日約見宋希濂，聽取對湘川鄂邊區之軍事報告，並約見川中人士，談商四川省自衛委員會與省府糾紛。此時蔣總裁並電約雲南省主席赴渝會晤，而盧漢不肯來渝面見，心滋不安。因派李彌赴滇，對於滇事，作初步佈置。一面與胡宗南談穩定滇局辦法。八月二十九日，召集西南各省開會；川黔康、陝甘鄂湘各區均到，獨少滇省之盧漢。會議決定：以隨南、陝南爲決戰場，拒共於川省之外。

共軍雖尚未抵達四川大門，已有跡象顯示政府在此省份內已難立足。在李代總統與中共進行和談之際，四川一部份軍閥及政客，包括鄧錫侯、劉文輝等，已向毛澤東頻送秋波，試探「局部和平」之可能性。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及重慶市長楊森，則力主抗共到底。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夏季，四川省局勢急轉直下，廣州當局深知唯有蔣總裁親自出馬，才能制止四川之離心趨勢。因此在八月二十四日，總裁毅然飛赴重慶，因仍在引退期間，係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主席之身份前往四川，此委員會事實上已成爲戰時最高內閣。

蔣總裁抵渝後，開始與地方領袖舉行一連串會議。張羣鑒於四川省之大勢已去，向蔣總裁請辭。蔣總裁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陪都之重慶居留多年，深受蜀省同胞之愛戴，當其重蒞斯境之際，受到熱烈之歡迎，猶如一位長者重返其暫別之故鄉。復使沮喪之四川人民重獲鼓舞。

但共黨破壞四川同胞對蔣總裁歸來歡愉之情。重慶民間社團定於九月三日舉行十萬人之反共大遊行，歡迎蔣總裁光臨。但在九月二日，共黨特務在市中心各處放火，市區一片火海，燃燒徹夜。蔣總裁對於重慶市民所受此項慘重打擊，深滋感傷，當晚派其公子蔣經國至市區分發大批銀圓救濟災民。

蔣總裁在重慶期內，曾計劃把無法撤往沿海地區之部隊，以西康作最後基地。由於西康羣山起伏，既無鐵路也無現代化公路，係最理想之游擊基地。同時也發現西康之不穩定，蓋在西康擁有重兵之劉文輝，與西康省政府軍司令賀國光將軍發生齟齬。雖然西康之許多部落領袖保證效忠政府，但在蔣總裁離開西南地區時，西康問題仍未能解決。

九月三日，西北方面馬步芳與中共激戰於寶雞之燕門關，又告失利後，其軍長馬繼援隻身來至重慶，面見蔣總裁報告其所領之五萬餘人軍隊全部潰散，只剩騎兵兩團突圍而得保存。九月六日，蔣總裁在渝接見黃杰將軍，黃氏由越南歸國，報告留越忠貞軍民生活情況，及此次撤軍經過。

至於雲南局勢，則更爲緊急。該省位於廣西及貴州兩省之間，並與印度支那半島接壤，一向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但此時突然顯示出親共姿態。左右雲南局勢之兩名重要人物，一係當時之省主席盧漢，另一爲前省主席龍雲，後者於民國三十四年爲蔣主席黜免，當時正居留香港，但在雲南仍有重大潛力。盧漢於徐蚌會戰後，已公開流露親共姿態，並拒將滇省稅收上繳國庫，國立雲南大學之學生公開進行共黨活動，昆明報紙連篇累牘登載「新華社」之報導並散播失敗主義情緒，在昆明之一些著名反共人士，皆紛紛逃往香港。

雲南一旦投向共黨，將使整個南方之戰略局勢，爲之改變。蔣總裁力圖挽回狂瀾，召盧漢至重慶面談，盧漢經

數日考慮後，終於九月六日飛抵重慶。盧漢向蔣總裁表示其本人並無投共之意，但桂系領袖們正在滇省醞釀暴動以推翻其統治地位，他爲自衛起見，必須有所行動。盧漢之此項申訴，並非毫無根據者，但蔣總裁向彼保證，如果彼能平息昆明之共黨宣傳活動，廣州政府將對盧漢加以全力支持。

蔣總裁對滇局之憂慮，經再三考慮後，最後決定：

「解決雲南問題之原則，應以政治爲主，避免流血。」

「蓋如此時對滇用兵，難免人心浮動，後方動搖，而影響前線對匪作戰，故務必全力避免軍事解決也。」

當盧漢向蔣總裁，剖析苦衷，矢誓精誠，流淚者再，豈其良心發現而真情流露？抑其有意嗚咽吞聲而故作偽裝耶？蔣總裁又約盧漢晚餐。席間又提起共黨近情，盧漢要求增編滇省部隊六個軍，並另索取銀圓二十萬枚。蔣總裁指明政府財政之枯竭，恐難勝此負荷，即在廣州之中央政府斷難允許，且無實力辦到。而盧漢之語氣中，似認爲蔣總裁仍可以任意支配也。此時雲南問題，實爲國家存亡、革命成敗之關鍵，如能兵不血刃而解決，殊爲幸事。況中夾入滇與駐滇各軍，亦無取勝把握，故不問盧漢若何狡詐？蔣總裁抱「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旨，予以相當滿意，使彼有所感悟。蔣總裁與盧漢懇談達二小時之久，申之以道義，勸之以利害，結果盧漢表示領悟接受。六日下午，行政院長閻錫山自穗飛渝，詢李代總統命令，擬扣留盧漢，勿使回滇，蔣總統表達其處理對滇解決方針，故未予執行，而盧漢於九月七日下午返滇。

九月十日衡陽失守。而綏遠、寧夏、新疆等省亦相繼淪陷。

盧漢承諾改變其態度，但蔣氏對其誠意未能有充份信心，盧漢返抵昆明後，於九月十日開始進行一項突如其來

之大整肅，一舉逮捕千餘名共產黨份子及「和平份子」，以前曾遭盧漢杯葛的銀元券，亦開始在雲南省流通，同時滇省恢復向國庫上繳稅收，同時解散雲南省省議會，而與共黨勾結之楊杰，則潛逃至香港，盧漢之表演，似頗逼真。

九月十三日蔣總裁由渝飛成都，下機即前往考試院長戴季陶墓前致敬獻花，蓋篤於故交也。十四日，盧漢仍繼續其清共工作，駐昆明之中央軍余程萬軍隊亦未與省保安隊衝突，情況頗爲順利。蔣總裁在成都至中央軍官學校對全體員生訓話。並接見軍校同學非常委員會代表六十餘人，以及空軍軍區司令部負責官員，予以指示並鼓勵。旋參觀華西大學，並在該校療治牙疾。

同日，美國大使館祕書師樞安，向我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聲稱：「美國政府在國際會談中，未提及臺灣問題，亦無意干涉臺灣內政。至將來臺灣問題之發展如何？此時自難逆料」云云。九月十六日，聞傅作義已由北平抵綏遠，蔣總裁特電傅氏，謂：「派徐次長（永昌）將軍飛往綏遠包頭與傅氏晤談一切。因對傅作義尙存有一線希望，乃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是日接孫嵐峯電稱：

「傅作義及各軍師旅長一體要求『和平』，彼已失去統馭力量矣。」

九月十七日，蔣總裁在蓉，上午召見王治易，向傅義、劉文輝、鄧錫侯等個別談話，並切囑劉文輝徹底清除其所掩護下之共匪份子，以維信用。另接密電，知劉文輝業已與反動份子勾結，不勝駭異，則決定設法不令其從政，免致影響川康大局。蔣總統遂返重慶，並發電徐永昌，囑以：「在西安時對共匪問題所得之教訓，轉告傅作義，不可再蹈過去覆轍」。

蔣總裁對傳作義不以孫嵐峯之電告，而失去希望，故終着徐永昌將軍冒險北行也。至十九日，中共已由青海民樂，突入張掖與武威之間，而我駐張掖部隊已星夜西撤。此後我新疆部隊，將更孤懸萬里而無法東調，則此塞外十萬健兒勢將束手待擒。董其武於是日離綏遠。蔣總裁得徐永昌來電：「謂綏遠局勢，無可挽回」。孰知此一日竊建方面之平潭島，亦為共軍佔領，而原駐守之國軍，則不知去向。至是，蔣總裁有：「真不知如何善其後」之歎。

九月二十日，第四屆「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幕，我國代表團提出控蘇俄案於大會。但同日中共在北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在盧漢表演上述姿態以後，蔣總裁仍對雲南局勢深感不安。其所獲得之情報顯示：共黨隨時可在雲南發動暴動。在此種情況下，蔣總裁之親赴雲南訪問，將有極大危險性，然為使盧漢繼續效忠於政府，前往雲南一行實有必要。當時雖無政府之一兵一卒駐屯昆明，但蔣總裁終於在九月二十二日，毅然從重慶飛抵昆明。先一日，命其公子蔣經國同龍澤澐於二十四小時之前先抵昆明，而並未將其尊翁之行程通知盧漢，直至蔣總裁抵步前兩小時，盧漢才獲悉總裁駕臨。

蔣總裁於九月二十二日午刻下機，即與迎迓之盧漢，同至其家午膳。並在盧宅召見在滇各將領，會商保衛西南大局。蔣總裁在昆明僅逗留五小時，即於當日飛赴廣州，在此數小時之內，盧漢可輕易重演西安事變之翻版，作為向共黨邀功之人質，但盧漢並不如此，大家進行懇切會談，盧漢於會談結束時，保證仍効忠政府。當盧漢在機場送別蔣總裁，向蔣總裁行九十度鞠躬，以表示其敬意。盧漢終為蔣總裁之威嚴及果敢所懾服。

其後，即派遣政府軍之第八軍及第九軍進駐雲南，使滇省局勢一度轉趨穩定。蔣總裁對於廣州內部情形複雜，

故於由渝返臺途中，經廣州暫停，當召集余漢謀、顧祝同、薛岳、李及蘭諸將領晤談，勗以精誠團結，至再至三，並提出保衛廣州計劃，墊發工事經費，與上述調遣部隊至滇等等。希望如期完成。

九月二十五日，接陶峙岳自西北來電，報告新疆省情形，謂：「所部無法東撤或南移，惟待張治中前來收拾。」結果，陶峙岳亦降共。西北全部淪亡，至爲痛心。至卅日立法院在廣州復會。蔣總裁「保衛廣州計劃」，「將中央兵力形成幾個重點，而以廣州附近作重點之一，求與匪決勝。」

據報告：英、美政府，近已商定所謂「臺灣地位問題」：聲明「承認臺灣爲中國之領土」。美國對華政策，至此又開始轉變。至我國向聯大「控訴蘇俄」之提案，亦獲聯合國大會通過，此亦我國外交上之一轉變。同時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援助中華民國區域七千五百萬美元法案，並決議對「遠東反共聯盟」之贊助。此即蔣總裁訪非、訪韓之奔走辛勞，得到友邦之支持之成果。與前次艾契遜聲明：「不需要有此遠東聯盟」之說，恰恰相反。

此後數星期內，政府軍繼續退敗。湖南及江西兩省，已爲共軍佔領，保衛廣州之重任，已落在撤至衡陽之白崇禧部隊身上。

四川及西南地區防衛之責，落在胡宗南之三十萬大軍身上，胡部剛由陝南撤至蜀北。但因西北防地之崩潰，已使胡部軍心渙散。在西北地區與馬步芳及馬鴻逵軍隊作戰之共軍，在馬家軍得手後，其主力撲向胡宗南部隊，四川省之大會戰已迫在眉睫。

政府尚剩餘之此三支部隊，一爲白崇禧部，一爲胡宗南部，又一爲由上海撤至福州及廈門地區之湯恩伯部隊，負責保衛東南沿海。

當此三支軍隊面臨最後決戰之際，代總統李宗仁却再度表現其門戶之見。白崇禧部隊從衡陽敗退之際，李代總統面臨兩項抉擇，一係將白崇禧部隊調來保衛廣州，一係調白部赴廣西省保衛其桂系之基地。李宗仁必須在此兩者之中選擇一項，蓋白崇禧部隊之力量不足以同時保衛此兩地區也。

值此重要關頭，李宗仁竟遲遲不作決定，而浪費數週寶貴時間於迫使行政院長閻錫山放棄其國防部長之兼職。如果李宗仁成功地使白崇禧出長國防部之後，將有何作為，固無從揣測。第閻錫山當初之同意出任首揆，係因便於協調蔣總裁與李代總統之關係，而此種關係之癥結存在於軍事問題上，故閻氏拒絕將國防部長交給白崇禧。李宗仁以黜免閻氏相威脅，但閻氏則拒絕讓步。

李宗仁及白崇禧當時認為：如果把所有軍事行動置於白崇禧統一指揮之下，美國將會給中國重大之軍事援助。美海軍上將柏克與白崇禧之會談中，使白崇禧產生此種印象。白氏在接見記者時，直接呼籲美國作最後之援助，但像以往中國當局之一切呼籲一樣，白崇禧之呼籲也毫無結果。

至此時，蔣總裁與李代總統之間之裂痕已愈為擴大。由於李宗仁之優柔寡斷，使身為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首腦之蔣總裁不得不增加對軍事局勢之過問。又使蔣李間發生進一步不睦原因之一，即李宗仁與湯恩伯之間之爭執。亦由於湯恩伯對蔣總裁之忠心耿耿，使李宗仁拒絕任命湯恩伯將軍為福建省政府主席，甚至在國防部及行政院已批准湯恩伯之任命後，李宗仁仍加以否決。

李宗仁堅持在對各地地方長官之任命中，他本人應有最後決定權，但行政院堅持此種權力應屬行政院所有。在權力爭執中，李宗仁更進一步抗議以蔣總裁為首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過問政務，當共軍步步進逼之際，李宗仁仍斤

斤計較於個人權力，以致政府內部分歧日深，造成民心士氣之更爲渙散。此種僵局，更使湯恩伯處境維艱，蓋廈門地區正面臨共黨大軍壓境之際，湯氏之職權却遲遲未有規定。

蔣總裁深信此種混亂情況必須予以澄清，因此在非常委員會之下設置三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處理三方面之危機，一係軍事小組委員會，一係外交小組委員會，一係財政小組委員會。蔣總裁親自兼任軍事小組委員會主席之職，此小組委員會之其他三名委員，爲行政院長閻錫山、參謀總長顧祝同以及白崇禧將軍。爲協調內部團結，蔣總裁通知白崇禧，謂一旦廣東省之軍事行動完成後，他將立即任命白崇禧爲國防部長。

在建立此三個小組委員會之後，蔣總裁實際上已建立了一個新的政府結構，以代替搖搖欲墮李宗仁之行政，任何人皆明白李宗仁已無能爲力。

共黨於十月一日宣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都」於北平。在發佈此項聲明之前，先在北平舉行其所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有十五個受共黨操縱的小黨派以及民間宗教團體之代表參加此會議，以作出「聯合政府」之姿態。會議所通過之決議，實際上皆係中共政治局之決議。

會議所通過之政府制度，係一種極權獨裁制度，而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名義上，「中央人民政府」係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實際上，參加這「政府」者所有非共人士，皆是毛澤東的應聲虫而已，中共政治局仍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者。

美國一些所謂「自由份子」却感衷心愉快。（按即太平洋關係學會，及共黨與其同路人）早在馬歇爾使華期間，彼輩就主張不支持蔣總裁，此後一直主張支持民主同盟等一些「自由份子」。現在，民盟以及其他許多所謂「

第三勢力」份子，皆已在北平政權中粉墨登場，彼輩自認爲中國已有了「民主」。

毛澤東在其獨裁政權中，儘量利用這些所謂民主人士。三名非共人士出任「副主席」，這三人是宋慶齡、李濟深及張瀾。美國左派人士以前建議取蔣總統而代之所謂「民主力量」之三名代表者，即此三人也。另一名曾被毛澤東準備加以利用的「民主人士」是馮玉祥，然馮氏在中共勝利前夕，於黑海航程中之一艘蘇俄輪船上突被燒死，其遺孀李德全出任了北平政權「衛生部長」。

毛澤東於十月二十一日宣佈成立新內閣，由周恩來任「總理」，在內閣中包含許多所謂「民主人士」？曾爲司徒雷登大使所偏愛之北平降將傅作義出任「水利部長」。民國卅六年因貪污工會經費被國民政府革職的工會首腦朱學範出任「郵電部長」。邵力子、黃紹竑、程潛、羅隆基等出任「政務委員」。

毛澤東故意利用彼輩熱中做官之人，以向西方世界表示新政權是中國「反蔣人士大同盟」？而並非共黨一黨專政，使西方人士對中共政權仍寄有「民主」之錯覺。

中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義，成立偽政權。全面倒向俄共，毛澤東效石敬瑭、劉豫之奴顏婢膝醜態，成立傀儡政權。改國號，易國旗，造成中國歷史遺臭萬年之醜惡罪行！俄共在此之前，其駐華大使羅申，在在以中華民國政府爲締交之交涉對手，自十月二日起，俄共在莫斯科聲明承認「中共政權」，立即召回其在廣州之代辦。蔣總裁認爲：

「俄帝之承認『匪偽政權』，實乃既定之事，且爲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蓋以我在聯大控俄案通過後，彼不能不出此一著，以作報復之行動耳。今後俄帝必與共匪訂立軍事同盟，助匪建立海軍與空軍，則我爲勢更劣

，處境更艱，此爲最大之顧慮。

同日李代總統發表「告全國同胞及世界友邦人士書」。外交部聲明與蘇俄斷絕邦交。並呼籲聯合國應充份注意蘇俄之侵略我國，威脅遠東。而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至於我國駐俄大使館，接俄共政府通知：『要求該大使館與我中央政府斷絕關係』。足見俄共傾施其陰險狡詐之伎倆。該日蔣總裁乘機離穗，逕飛臺北，甫下機場，颶風掩至，得免於險。十月五日，外交部又發一聲明，係與共黨附庸之波蘭捷克兩國，斷絕邦交。至此敵我雙方，壁壘分明，即妄人亦再不作『和平』談判之幻夢矣。

是日湯恩伯總司令，由廈門來電，以李代總統會發表「反對行政院任命湯恩伯爲福建省政府主席」之聲明，致湯氏喪失威信，無法指揮部隊。故不再駐廈門指揮作戰，「決自今日遠行」云云。蔣總裁以湯氏正當面與共軍作戰之際，焉可「陣前易帥」，再三勸慰，勉其繼續作戰。

六日，湘中青樹坪與共軍展開決戰，此爲白崇禧將軍撤離長沙後之一次大捷。惜芷江同日失守。而舟山羣島與長山列島間之金塘島，國軍亦告撤出。蔣總裁爲湯恩伯之任命問題，心滋不安，決意親自與湯氏面談，乃乘華聯輪由臺前往，兼欲部署閩省軍事也。翌日粵省之韶關，突告陷落。八日國軍又撤出衡陽，依舊向西退却。蔣總裁對湯恩伯部屬商討防守金廈事畢，轉赴馬公島巡視後，轉乘飛機回臺。接洪蘭友電告：「廣州危急，李代總統有知難而去之意。」復得顧祝同電告：「粵省西北與湘黔軍事，已趨劣勢，請毅然復總統任，長駐西南。」十月九日于右任、吳忠信二人至臺北。惟有一英勇事蹟，足以興反共抗俄之心。緣有毛昭宇等六人，當寧夏陷失前，不及離去，致落入共方手中。共方一面威脅，一面誘降，惟決定先解往北平，由偽當局處理管押甚嚴。當飛機即將起飛之一霎

那，毛昭宇等乘押解監視偶一他顧之頃，立即奪取槍械反擊，封持飛機，駛回臺北。經 蔣總裁面加獎譽。至於吳忠信見 蔣總裁，報告與李宗仁談話經過，並代述李宗仁希望 蔣總裁復任之意。吳氏並稱：「一旦廣州失守，政府遷往重慶，則情勢必更形混亂，倘蔣先生不允復總統之任，重行東山再起，將使國家前途，陷於不可收拾之絕境云。」

由於東北、華北、西北、中原相繼失陷，西南情勢杌隉，海南島與舟山羣島兩地，頗有孤立無援之慮。今後對此兩地之運輸補給，尙在其次。而以衆寡之形勢懸殊，有終難保守之感。十一日接報：「舟山之六橫、蝦峙各島業已放棄，致金塘島陷落」。蔣總裁當日飛往舟山羣島。十二日李代總統宣佈「政府遷往重慶辦公。」同時令緊急疏散。而在湘之共軍，積極自韶關南下。先是，蔣總裁以堅守廣州，經非常會議通過。至十月四日，亦即 蔣總裁離廣州赴臺北之翌日，李宗仁又復召集一次軍事會議，以決定是否保衛廣州？會議決定將此事留交在前線帶兵之白崇禧將軍決定。身爲桂系大員之白崇禧，決定在廣西省而不是在廣州地區作最後抵抗。至十月七日，白崇禧麾下之二十萬大軍自衡陽撤往廣西，此行動意味著廣州已成爲不設防城市。

由於廣東省內已無守軍，使共軍得以長驅直入，政府之某些機構，已撤往重慶或臺北，李代總統及行政院閣院長，於共軍進入廣州前不久，飛往七百哩外的重慶。十月十五日，共軍未遭有效之抵抗，傲然開入廣州市，正如「紐約時報」所說，「這個城市在無聲無嗅之中陷落」。

原駐廣州的零星部隊共約八萬人，在撤退之前，進行了一些破壞工作，珠江大橋被炸，電力廠被毀，機場設備皆被焚燬。他們大部份撤往廣東省之內地，另一部份撤往臺灣及海南島。

廣州之陷落，不論在戰略上或政治上，都是對政府之一項重大打擊。此意味着共黨勢力已由中國最北端之海岸伸展到最南端之海岸。福州及廈門雖仍在政府軍之手，但因廣州之陷落，使該處海岸亦勢難持久堅守。

國際輿論也由此而轉變。迄廣州陷落時止，在國外仍有人希望在以廣州爲中心，就華南地區建立一非共之南中國政權。但此時希望已告煙消雲散。當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時，大部份國家仍承認李宗仁爲首之中國爲合法政府，並有許多國家之大使館，隨政府遷往廣州。但現在，無一國使館隨李宗仁遷往重慶。

正如陳納德將軍當時所指出：「在廣州陷落之後，國民政府仍控制着中國的四分之一地區，如果獲得軍火援助，仍能據守一隅之地，一如抗日戰爭時期之所爲。陳納德將軍並在美國試探建立一支類似戰時「飛虎隊」之國際空軍以與中共作戰之可能性，但反應不甚熱烈。當前之美國，雖然心有不甘，但却認爲承認共黨勝利之事實，似若無可避免者。」

初，蔣總裁於十月十一日至定海，與駐守該地舟山羣島之軍政長官桂永清、石覺、周磊協商防衛計劃。不料至十三日得悉廣州撤離，而福建沿海之大登島爲共軍所佔領，於是金門大受威脅。又李宗仁亦於此日赴桂林。至十四日，蔣總裁回臺北，而李宗仁則至重慶。十月十六日，中共與俄共簽訂「哈爾濱協定」與「莫斯科協定」，規定中共之經濟與軍事，均須受蘇俄控制。中共爲俄共附庸及爲俄共之工具，已進一步實行矣。是日廈門戰事似屬緊急，而所獲報告，又含糊不清，但終至撤出廈門，退守金門。

十月十八日，蔣總裁爲出處問題，與張其昀談商後，即召集中央設計委員會會議，研討復行視事對國家之利弊。蔣總裁認爲：

「一個人的出處事小，國家的存亡事大。此時應研究，應該不應該再起？不能問再起後之利害得失。只要對人民軍隊與國家有再起的必要！即不必研究外交或其他關係問題。一切只有自立、自強，始能獲得外援。倘自己內部無可救藥，即有外援，亦無能為力。」

當經大多數主張 蔣總裁復行視事。即晚復與丁惟汾、于右任、吳忠信等重商此項問題，衆認必須李宗仁出於至誠，自動退職，再行復任。

十月十九日，舟山羣島國軍撤至桃花島，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親臨主持，至翌日始安。廿一日汕頭駐守之國軍亦告撤出。至於由廈門撤至金門之國軍，以對大陸，僅隔一衣帶水，在共軍以爲威脅甚重，在國軍有此前哨陣地，對政治軍事有莫大意義。蔣總裁得報，知共軍猛攻金門，即電致該地作戰之湯恩伯將軍，告以「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

蓋以孤島作戰，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惟共軍攻勢洶銳，已被登陸，得國軍奮勇抵抗，卒於十月廿六日，轉敗爲勝，俘獲共方高級軍官多人，其登陸共軍約二萬餘人全被殲滅。此爲國軍退守臺灣後，對共軍戰爭之第一勝利，且爲國軍反攻復國之轉捩點。

十月廿九日，雷州半島發生激戰，東南軍政長官陳誠飛海南島。蔣總裁召見桂永清總司令，面諭：海軍之急務與海南島榆林港之重要性，並著將劉安琪部隊調往海南島，或舟山（舟山羣島中離大陸最遠者）。旋得報，以劉安琪正在陽江對共作戰而失利，遂罷其職。

十月卅一日爲蔣總裁六三壽辰，總裁携子孫遊憩於臺北郊外之田野村落間，後至宜蘭縣境，迨夕陽始返。其在

途中口吟自箴一首：

虛度六三，受恥招敗。毋惱毋怒，莫矜莫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獨蒙神愛。惟危惟艱，自警自覺。復興中華，再造民國。

具見蔣總裁之念茲在茲者，唯爲國爲民耳。而其是日之自記，更可知其「唯精唯一」之誠焉。

本日爲余六十三歲虛度生日，過去之一年，實爲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然自問一片虔誠，對上帝，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有加無已，自信必能獲衛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耳。

李宗仁突採取一連串出乎意料之行動，使政府人士大感惶惑。李宗仁曾力促蔣總裁赴重慶，羣策羣力建立臨時首都，僱蔣總裁於十一月十四日飛抵重慶時，李宗仁却不來重慶，而於前一天飛赴廣西省之南寧，蔣總裁一再要求李宗仁前來重慶共商大局，但李宗仁始終拒絕前來。而李宗仁更有出人意料之舉，先於蔣總裁蒞重慶之前，在十一月三日突然飛赴昆明，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舉行冗長之密談。

有甚多跡象顯示，李宗仁當時正密謀組織一個地區性自治政府，由廣西、廣東及雲南三省之軍隊聯合支持此自治機構，從而與中共追求單獨媾和。此種行動，無疑是出賣仍在四川省及廈門地區拚死作戰之國軍將士。

有一項事實，足以證明李宗仁在進行此種勾當。在他與盧漢會談後不久，雲南省當局突奉李代總統之命，釋放九月十日逮捕之一千名共產黨員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人員。同時，盧漢突宣佈放棄雲南省主席之職，並申請出國護照。

當時曾參預李宗仁此項計劃者，有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及廣西省議會議長李任仁。李宗仁又另派要員前赴香港與共黨人員洽談「和平」條件。同時盧漢亦派遣雲南財政廳長林南洋（譯音）赴香港與共黨洽降。李宗仁則親赴海南島與海南島軍政首長陳濟棠、余漢謀及薛岳洽談。

由於白崇禧將軍之堅決反對，終使李宗仁之此項陰謀難以得逞。白崇禧深切瞭解與共黨絕無和平可談，除非對共黨投降及使廣西軍隊被共軍併吞之外，絕無其他條件可談，白崇禧爲進一步粉碎此項陰謀，迫使陰謀派辭職，並任命主戰之李品仙將軍繼任廣西省主席。

先是：旅美僑領周錦朝於十月廿五日回國抵達臺北，向蔣總裁呈獻金劍。數日後，由臺北至香港，以其與李漢魂爲摯友，聞李漢魂隨同李代總統飛往昆明，周錦朝因有飛昆明之行，周氏以彼向蔣總裁呈獻金劍，登諸報端，則對李代總統不得不有所呈獻，乃在港製就錦旗，赴昆面獻。李代總統延見周錦朝，且以李漢魂之介，知周氏與美總統杜魯門有交，已懷好感。及周氏當面恭維李宗仁，「美國對李代總統具有希望，但對蔣總裁已感失望，不願再予支持」。「倘使代總統有命，周某自願效勞，並可向杜魯門以私交說以加強援華」。周錦朝之結論：「則爲李代總統最好赴美一行，對美援有把握，即把握軍政之實權」等語；因李宗仁到昆與盧漢等洽談後，對於所主張之地區性三省聯合政府，亦因抵觸滋多，窒礙難行，尤以白崇禧將軍反對建立與共議和之地方政府，致李宗仁深感徬徨之際，突聞周錦朝之建議，認爲唯此路可通，假使能握著美援，則正可作其代總統美夢，縱然不成，也可藉此機會而卸却重擔，李氏赴美之計，于焉決定。乃于十五日離昆明而直飛南寧。

蔣總裁仍不斷催促李宗仁赴重慶，而李宗仁却覆電蔣氏，藉口胃病轉劇，必須再在南寧休養數天。至十一月十

九日，白崇禧飛赴南寧與李宗仁會談，李宗仁在此次會談中，表示準備離國前往美國治病，並聲言要在離國之前，發表一篇譴責蔣總裁之聲明。

經長時間爭辯後，白崇禧雖未能打消李宗仁赴美之意，但終於使李宗仁同意不發表此篇「反蔣聲明」。

十一月二日，國軍克服廣東南路之電白、陽江。四川之巴東失陷。川東則形勢告急。十一月三日，共軍乘黑夜偷襲東南海外登步島，舟山羣島之外圍，緣此爆發激戰。至六日，登陸登徒島之共軍七千人被殲，全軍盡墨。造成國軍自金門後之第二次捷報。然而湖北方面之恩施，則於七日陷落。至九日，中國航空公司，與央航之兩負責人，率叛徒駕駛十二架客運機飛往北平投共，（致各線空航，立即停頓。十一月十五日，貴陽失陷。十八日美總統杜魯門聲明：爲美駐瀋陽總領事華德被捕事，斥責中共。及廿四日桂林、綏江相繼失陷。廿九日，重慶展開保衛戰。行政院率各部會均遷成都。翌日重慶淪陷，蔣總裁亦撤退至蓉（成都）。

保衛重慶之成敗，端視於國軍扼守四川東北及東南兩處入蜀孔道之能力。四川省之北部與陝西省接壤，胡宗南大軍甫自陝西退守川北，且有天險之助，足資固守。南方之入蜀孔道係與貴州省啣接，一九四四年，日軍之最後一次攻勢，即在黔省受阻。只要貴州能够確保，四川之安全即有屏障。

由於在貴州省之國軍未能有效地阻遏中共攻勢，遂使重慶之防守成爲不可能。李宗仁在副總統任內之最後一項過失，係他未能命令白崇禧將軍之廣西部隊開入貴州，制止共軍向四川推進。國防部擬訂之戰略計劃，把白崇禧部隊部署於貴州省，若與共軍決戰後不幸失敗，則退入西康及雲南山區，建立永久性之游擊基地。惟白崇禧部隊在李宗仁之授意下，拒絕放棄廣西省，遂使此項計劃完全無法執行。

由於白崇禧部隊之拒絕進駐黔省，遂使貴州境內之國軍防守力量，只有一個軍（第八十九軍），在共軍進攻之下迅即潰不成軍，貴州省亦隨之而易幟，共軍佔領貴陽後，使蜀省南方防線之大門洞開，共軍得以長驅直入。

當李宗仁由滇飛南寧之先一日（十一月十四日）蔣總裁蒞渝，即電李宗仁，略謂：

「送承吾兄電囑來渝，共扶危局。昨聞貴陽危急，川東告緊。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同時致白崇禧將軍電：

「昨聞貴陽垂危，川東吃緊，已於本日抵渝，甚望德鄰即日飛渝。策劃全局，請力催命駕。」李氏於二十日由南寧飛香港，置若罔聞。一面託白崇禧將軍飛渝，並携致蔣總裁函，及其所發聲明。其私函及聲明，均未提及職權問題，但云：「胃病復發」，以「國家元首名義，出國就醫」。翌日中央選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赴港，面致蔣總裁親筆函，勸速回渝。廿七日國民黨常委委員會開會，蔣總裁雖以會中一致主張復任，蔣總裁發表其意見如下：

「對外關係，尤以我國在聯合國之代表地位問題，極關重要。如果李宗仁長期滯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復行視事』，則各國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爲我國已無元首，成爲無政府狀態，則不得不考慮僱僑北平政權之承認。此外，對內尚有維繫人心之作用。此時舉國上下，人心動搖，如雲南之盧漢等，已明言：李既出國，而蔣總統又不肯復任，則國家無人領導，尙何希望之有。因此，不得不作『復行視事』之準備，惟時期問題，尙須加以研究」。

會議決定，再派朱家驊、洪蘭友，二次赴港，促請李代總統回渝主持。至十二月二日，朱、洪二氏返自香港，並携李氏致行政院長閻錫山函，表示其決定出國。朱洪二氏並謂：「美國務院已允李氏入境之便利，彼即變卦，又

不肯卸去代總統名義，反欲利用此種名義，提高其身份赴美」。蔣總裁以爲：

「今日國家危急，已至千鈞一髮之際，何忍見危不救，避嫌卸責。只有光明正大，決心復行視事，爲不二之道。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

閻錫山、張羣認爲國家如此危急，存亡瀕於瞬息，焉可無領導之元首，更易引起國際誤會我政府已到瓦解土崩狀態，但必先完成法定手續，應亟著手準備。」云云；十二月四日，李代總統於出國赴美之前，發表談話：仍以「胃疾復發，赴美就醫」爲理由，而其要旨則謂：「一俟短期內病愈後，續返國負應盡之責」等情。當時輿論，頗以李氏「臨難苟免」，談話中未嘗涉及國事，愈認李氏所謂「病後續來負責」，然則在此治病期間，將由何人來代李氏挑起此副重擔耶？旅台之國大代表及立、監委員，分別聯署電成都蔣總裁，立即恢復總統職責，迅速重行視事。蓋李宗仁既係代理，今代理者稱病出國，不負責任。

（按：蔣總裁之總統名義與職位，在李氏代理期間，亦依然存在而未嘗改也。）

同時民社黨代表蔣勻田，青年黨代表陳啓天，請蔣總裁復行總統事，並電白崇禧一致敦促。是日美聯社記者慕沙，訪問蔣總裁，蔣總裁發表談話，稱：

「此次入川，係應李宗仁之邀，余爲國民一份子，並負責領導國民革命，惟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險，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鬥。」

十二月六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電稱：「美國政府正在接洽並告知有關各國；在我國於大陸上繼續作有組織之抵抗共黨期間，美國不擬考慮中共問題。」十二月七日，中央政府遷至臺灣辦公，並在西昌設大本營，指揮作戰。

蔣總裁約劉文輝、鄧錫侯面晤，避不相見，且函稱：「王方舟（慶基）主席與其爲難。」其實劉、鄧已決心投共，無所顧忌，乃故作掩飾之詞以搪塞。而滇省盧漢之靠攏共方，形跡亦漸顯露。既不願大本營常駐昆明，又不肯接受滇黔剿匪總司令名義，其用心與劉、鄧已同出一轍矣。蔣總裁既已親破盧漢、劉文輝、鄧錫侯等降共勾當，其在成都，殊成險境，其所以不即離者，深知彼一離去，則盧、劉、鄧等可能立即聯合聲明公開投降。而胡宗南部部署尚未完妥，乃仍留蓉，俾可鎮攝一時，然蔣總裁終不放棄最後機會，圖使盧漢，翻然回頭，於是派張羣赴昆明，安撫盧漢。一面設立「成都防衛司令部」，以示決心防守。並知照王陵基主席收回銀圓券，免民衆持有人吃虧。胡宗南正踰越秦嶺，長途跋涉，轉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與敵對峙之正面轉進，至一千餘公里長距離之目的地，而竟能於半個月之時間內完成，且主力毫無損失，亦戰敗中之奇蹟也。翌日，張羣返昆，報告：「盧漢正在戒除鴉片煙癖，態度反常，著部屬搜刮羅掘，冀肥私囊。公誼私情，皆所不顧」。云云：蔣總裁心知有異，時余程萬暨李彌、龍澤澐均由滇到蓉，蔣總裁面諭：「務必保衛雲南，以確留此反攻基地，切不可作撤退西移之想。並囑轉告盧漢，堅定執行既定部署，軍費由中央設法撥付。余、李、龍諸將軍皆同意是項決定，獨盧漢既態度如此反常，故再由張羣與余、李、龍三將軍同赴昆明與盧漢面洽。此十二月九日事也。午間得報，謂：「張羣等之飛機，到昆後即被扣留」。蔣總裁至此始知禍生肘腋。但初尚可與張羣通長途電話，知其尚未與盧漢晤面，迨及晚間，昆蓉各項電訊告斷，情勢益趨惡化。同時據報成都方面之劉、鄧二氏亦正與共方連繫，有所企圖。至十日早晨，昆蓉電訊，忽告復通，而第一封電報，係盧漢致劉文輝電。要求劉文輝會同鄧錫侯與四川各將領，扣留蔣總裁，以爲投共之首次立功。蔣總裁賺得其情，立即約見王續緒，囑其轉告，劉、鄧、二氏：

一、著速入城來見；

二、令彼等所部速離成都周圍。

一面令胡宗南迅速解決劉部，尅日進佔雅安，爲西南基地。並召集胡宗南、王方舟、楊子惠、蕭毅庸等研討軍事之處理方略，及蔣總裁之行止。

在座各將領，異口同聲，請蔣總裁迅速離蓉回臺，勿先飛西昌。於是總裁於是日下午二時至鳳凰山上機。行前再三叮囑胡宗南而別。至六時卅分始安抵臺北。按此次蔣總裁在成都，險象環生，實不下於昔年西安，當其搭機起飛。爲禍爲福，聞不容髮，冥冥太空，留斯國老，以爲殲滅共黨之領導，抑亦有數存乎其間者。蓋蔣總裁脫離成都虎口之日，亦卽共酋毛澤東第二次朝餞之日。而次日則爲蔣總裁西安蒙難十三周年紀念日也。十二月十二日，蔣總裁接西昌告急之電，爲之就憂不置。旋接張羣來電，報告脫險，已安全到達香港，乃爲之欣慰。

蔣總裁抵臺後，致力於建立臺灣爲反共基地。並擬緊縮中央各機構，改組臺灣省政府。十六日接胡宗南電：「樂山前方戰事危急」。同時胡宗南由蓉飛至海南島榆林港，成都情形不明，西南軍事，遂成絕望矣。十七日，胡宗南報告：「樂山已失」，今後川康戰局，將陷於被動而益趨逆勢，十八日，川北劍閣失陷，軍事更無能爲。緬甸政府首先承認中共偽政權。十九日在滇國軍報告佔領昆明機場。二十日，胡宗南部決定放棄成都。至廿三日得報：「李彌將軍不知下落。霑益、曲靖二地陷落。張羣由港抵臺北。第廿六軍電臺，已二日不通，去電詢余程萬亦無消息。大陸戰事，到此已近尾聲。二十五日耶穌聖誕節，亦爲蔣總裁西安蒙難十三週年之脫險紀念日，蔣總裁曾有下刊記載：「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教

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如余仍能持志養氣，貫徹到底，則應澈悟新事業，新歷史，皆從今日做起」。

二十七日，國軍撤出成都。二十八日，我外交部宣布承認印度尼西亞政府，是日雷州半島失陷。卅日印度聲明承認中共偽政權。我外交部發表聲明，撤回我國駐印度使節，與印度斷絕邦交。卅一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繼續援華法案。

蔣總裁此次之蒞臺，自與任何一次蒞臨不同。一年前，自總統引退後，曾至臺灣，當時滿擬扭轉逆勢與危局，然此番重臨斯地時，則大陸已淪入共黨之手。而其以後所獲得之消息，非盧漢、劉文輝等之投共，即何處之陷落？與何軍之潰散？如此悲慘國事，接踵而至，若非涵養功深，成竹在胸，縱不張皇失措，亦必束手無策。蓋蔣總裁早已料到有此一日，故預已佈置其最後基地。具在苦悲痛之心旌，作會稽薪膽之準備，豈不愧然臨難苟免，拋撇江山，遠飛天外之人也哉！

蔣總裁平生每逢重大之危機或失意時，輒作短期之隱居以作深遠之自我反省，此次重蒞臺北後，亦認為需要有一段如此靜思檢討之時期。於是摒除一切，僅攜同其長公子經國及數名侍從衛隊前往日月潭。以領略此明媚之風光，忽於斯時接獲大陸防務最後崩潰之電報，既無憤怒，亦不燥急，但不言而靜坐幾達一小時之久，然後率經國下山散步。拾級而下，一路未有交談，來到湖旁後，蔣總裁始打破沉默，謂欲同往日月潭內釣魚。經國乃向老漁夫租得一艘小船及大網，當經國返山上取錢付租時，蔣總裁單獨與老漁夫划船至湖中，撒下漁網。蔣總裁正在內心思索間突然發現漁網躍動，舉網，則見長達五尺之大魚已被捕於網中。老漁夫不知坐其旁者為誰？驚嘆曰：自余在此湖打漁已越二十餘年，從未見過如此大魚，此大吉大祥之兆，臺灣其將興乎？

蔣總裁在此隱退靜思時期內，其所致力者，厥爲如何確保此最後基地？如何對抗共黨？如何周旋國際？如何安排人材？

有此千頭萬緒之事，錯綜複雜之情，故自卅八年十二月十日自蓉到臺，其深思焦慮之憂國，勤勞甚矣。然至今日能留存此堅強反共基地與力量，皆從此一短暫日期所繪成之藍圖而得之。

卅九年元旦，蔣總裁發表告全國人民之文告。而美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發表五點援華意見。至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繼續經濟援華。翌日美國務卿艾契遜重申美國決不承認共黨僞政權。因英國工黨政府爲欲保持其在中國之既得利益與其財產及貿易，繼續向印度之後，而承認中共，故也。我外交部不得不撤回駐英使節，與之斷絕邦交。同時我駐印度大使羅家倫亦奉命回國，對印度人民發表慷慨激昂、沉痛懇切之告別詞。一九五〇年（民卅九）一月十一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俄共提出「要求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安全理事會」案！當經安全理事會否決。至一月十四日俄共再度提出：「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代表退出安全理事會」案：又遭安全理事會否決。此爲我國在聯合國席位發生問題之首次，其後每一年度，必有一次在議席上之鬥爭，而中立者與恐共者，又從而爲之張目。世無公理，只問利害，實深浩嘆！

美國無任所大使吉塞普，由琉球於一月十五日抵達臺北。次日蔣總裁接見之，交換反共問題意見。吉塞普並與我政府軍政當局交換援助臺灣問題意見，於十七日離臺。十八日美國務卿艾契遜又再鄭重聲明：「不考慮承認中共政權」。是時也，國軍之留川者，以川省地方各部隊之投共，退出西康，進入草原。（按該地共黨時曾進踏過，死傷於水土氣候者大半，周恩來且在此患病。）而國軍之留滇者。亦以地方部隊隨盧漢而投共，撤退蒙

自。廿五日美國務院發表文件，爲蘇俄侵華證據。美國記者請見蔣總裁，詢問關於中共以後的趨向，及東南亞之情形。蔣總裁以堅決之口吻告記者稱：「中共將來必向東南亞侵略，毫無疑問。」書至此，頗有感觸。蓋蔣總裁對共黨之行動，知之最真最切，其歷次勦共，每功虧一簣，實皆出於種種掣肘與外來壓力，終未能徹底執行其決策。

即引退之時，苟無和平集團之作祟，卒至賸餘之大半河山，斷送予共。東南亞將被侵略之預言，真能洞燭幾先者矣。一月三十一日美國參眾兩院議決通過：「繼續援華案」。我外交部發表聲明：「俄共與毛酋所訂任何條約、協定，對中華民國絕不發生效力。」

至於中央政府遷至臺北後，依舊行使職權，一面縮小組織，撙節開支，一面整頓政治，力求配合當前局勢，一面甄選人員，唯材是尙。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局部改組：谷正綱長內政，嚴家淦長經濟，陳良長交通，顧祝同代理國防部長。同時行政院公佈：「反共保民總體戰動員綱要」：作爲行政綱領。

二月二日，監察院提糾舉案：「政府官吏不得逗留於香港、澳門，持有出國護照者，應予查明弔銷」。三月國民大會代表，連署代電蔣總裁，請蔣總統儘速復行視事。九日美國政府宣佈對華政策：「繼續援助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毛澤東之共產政權。臺灣之現行地位，絕對不容變更。」同日我外交部通告各國：「擴大關閉淪共區之各港口。一

先是，蔣總統決定以臺灣爲最後反共基地，即預有安排。

因而政府有其最主要之資本，即是安全撤退臺灣之大量陸海空軍戰士。斯則全拜蔣總裁遠大眼光之所賜。蔣總

我在預見大陸已無可防守時，即將其精銳調至臺灣以保存實力。且早在一九四七年時，蔣總裁即授權孫立人將軍在臺灣訓練新軍。到一九五〇年初，總計自大陸撤下及臺灣就地訓練之陸軍，共達八十萬之衆，但其質素參差不一。其中可用於第一線作戰之軍隊共約三十萬人，另有一支強大之裝甲部隊，擁有戰車七百五十至一千輛，由蔣總裁次公子蔣緯國少將指揮。

在共黨尚未擁有空軍之際，臺灣之空軍係一項重要之軍事因素。在一九五〇年初，臺灣空軍所擁有之戰鬥機、運輸機及輕轟炸機共約三百至六百架，全部雖可使用者，但皆係舊式飛機，且缺乏零件及汽油，只有極小一部份空軍可供隨時使用而已。

臺灣軍事力量之第二項要素爲海軍。在撤離大陸前後，絕大部份海軍官兵矢誓效忠政府。最嚴重之一項叛變事件，係巡洋艦「重慶號」之投共。政府遷至臺灣後，共有可用於作戰之艦艇七十艘，包括六艘美國製驅逐艦、一艘日本製驅逐艦，以及許多掃雷艇及登陸艇。海軍人員共約四萬五千人，包括兩團海軍陸戰隊在內。

上述陸軍雖在大陸飽受創傷，裝備殊欠完整，但就臺灣之防務而言，則不可輕視，當大陸軍事潰敗之際，身爲代總統之李宗仁與擔任非常委員會主席之蔣總裁之間，曾對保存軍事實力問題發生激烈之幕後鬥爭。事緣李宗仁迭次要將臺灣之精銳部隊及空軍調往華中戰場，使白崇禧將軍之部隊，可以抽調，以保廣西。李宗仁之自私打算，將使此最後之實力，消耗於零星而無望之戰鬥中。蔣總裁堅決主張保存此贖有部隊，足以保衛臺灣。若依照李宗仁之主張行事，則在大陸崩潰之餘，臺灣尚有可守之部隊乎？更尙有此最後之反攻復國之基地乎？中華民族勢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在臺灣保存此強大之國軍，就當時言，雖不足以反攻大陸，但足以封鎖沿海口岸及施行空中突襲，使共黨無法對新佔領之沿海城市進行有效之統治。在民國三十八年整年內，留駐臺灣之國軍封鎖上海及東南沿海城市，使共黨之經濟無法平衡，並使共黨無法恢復對外貿易。

共黨於佔領上海後，曾企圖向外國大量輸入迫切需要之物資及軍事供應品，尤其像石油，用以穩定大陸之經濟及加強共軍實力。英國及某些美國廠商，只顧眼前之利益而不顧久遠之影響，正企圖與中共進行大規模貿易。英國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承認中共政權。其主要動機，即為貿易利益着想，香港已堆滿待船運往共區之物資。

美國官方對與中共貿易之問題，起初亦係甚為曖昧者。美政府雖不願繼英國之後承認中共，但在貿易問題上，並無明確表示，而美國之輿論則大多主張與中共修好。

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宣佈共黨佔領下之上海、杭州、寧波、天津及青島為貿易禁區，中國海軍得執行其權利，攔截及扣留任何駛入距此等港口三哩以內之中國領海的外國船隻。不久後，當共軍佔領福州、廈門、汕頭及廣州後，此等沿海城市亦皆列入禁區。

西方國家對國府此項聲明之反應不甚良好。美國務院於一月二十八日向國府提出一項照會，聲稱「美國不願承認此項封鎖」（國府之聲明會避免使用封鎖字樣），蓋根據國際法之原則，任何封鎖必須有效執行才得加以承認，否則將會對各國產生厚此薄彼之弊病。此項照會，顯示美當局不相信中國海軍有力執行封鎖。但美照會並未威脅要使用美海軍加以干涉。英國亦繼美國之後發出同樣聲明。

事實上，國軍之海軍實力雖不强，但在此等列入禁區之港口附近皆有離島基地，使封鎖得以充份有效地執行，

對天津之封鎖，係由山東省蓬萊以北之島嶼執行。對上海、杭州及寧波之封鎖，係以舟山羣島爲基地，早在上海淪陷後，蔣總裁即赴舟山視察，以決定未來之封鎖措施。國軍在舟山羣島之定海島上，建有强大海空軍基地，最強盛時曾保持十五萬兵力。僅次於舟山之另一重要離島爲金門，執行對廈門及福州之封鎖，當時金門島上有駐軍七萬人。另一在福建省沿海之基地爲東山羣島，再向南，用於封鎖廣州之基地設於珠江口之萬山羣島。

蔣總裁初赴臺灣後之隱退時期內，最爲關切者，即爲利用此等戰略基地佈置封鎖網之問題。蔣總裁對敵我雙方之軍事實力洞察秋毫，深知此等戰略島嶼無法加以全部固守，但不論局勢如何演變，臺灣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固守。其次重要者，即爲金門、舟山羣島及海南島。

自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最重大之任務，即爲執行對上海之封鎖。政府之海軍實力原不足以對此港口執行有效之封鎖，但利用舟山之基地，配合空軍巡邏，使巨輪絕對無法漏網駛入上海。海軍於一九四九年底，在長江口遍佈水雷，使對上海之封鎖更爲有效。

英國對於國民政府封鎖上海之舉，幾乎不屑理會，其結果，使大批英輪爲國府海軍所截留，使中英關係頗臨決裂點。惟由於英國已在外交上不承認中華民國，故對此問題未能採取外交上之行動。但美國仍與自由中國保持外交關係，故必須對美國船隻企圖突破封鎖之問題作出決定。首先提出此問題者，係一家名爲「伊斯布蘭遜」之美國輪船公司，該公司係新介入對中共貿易之船務公司，由一羣「中立」之美國公民所經營。國務院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正式答覆該公司，謂：「美國船隻可以進入上海或其他已被封鎖之港口，惟一切危險須自行負責」。

該公司立即派遣巨型貨船兩艘「飛行獨立號」及「飛行商人號」駛赴上海。該兩船皆於九月二十二日爲國府海

軍截留，押往舟山羣島，並沒收船上之全部貨物。政府發出警告謂：「伊斯布蘭遜」公司之船隻，若再度駛入禁區，將予射擊，但該公司竟不理此種警告，再度派遣「飛雲號」及「約翰·佛蘭克林號」兩船企圖突破封鎖線。此兩船先後於十一月十五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遭國府海軍砲轟受創。美國之輿論亦對該公司之作爲深感不齒，而該公司竟向國務院呼籲要求派美海軍保護，惟國務院表示該公司係咎由自取，翌年一月，該公司再度派遣一船企圖駛入上海而受阻後，終於放棄此種冒險活動。

但美國務院對此封鎖問題不易索解。艾契遜閣務卿於十二月初向國民政府提出一份照會，抗議對美國船隻之攻擊，並且堅持必須禁止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同月十七日，美政府向所有美國船務公司及航行人員發出警告，謂上海係危險區及「絕對不適宜航運」之地區。在間接壓力下，華府當局企圖說服美航業界人士勿以上海爲貿易對象。但同時，美政府却繼續避免正式承認此項封鎖。

此項封鎖，執行以來，頗著成效。惜以中國海岸線之長，島嶼之多，海軍之補給太遠，而實力亦甚單薄。苟遇外來攻擊，則此項據守之島嶼，有不得不撤退之勢。故其後因海南島、舟山羣島、萬山羣島，終於先後撤出，封鎖因之自動停止。但國際間對中共之看法，亦較明瞭，遂由西方諸國議定「自行對中共禁運」之舉措，繼封鎖之後，而自動封鎖矣。

二月十二日，監察院院會全體會議，提議「李宗仁代總統自稱其居美遙領國是」案：決議李宗仁措施錯誤，提請國民大會彈劾。十三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以李代總統宗仁自稱「於一個月後，重返國門」；未能遵守其諾言，議決聯名速電李代總統，促其尅日回國。遂於二十一日發出一最後通牒之電，堅持李氏必須於電到三天之內，返回

臺北，否則即作放棄代總統職守論。電文略稱：若李宗仁在三天內不返臺北，將要求蔣總裁復任總統等語。非常委員會十二名委員中之九人，在此項最後通牒內簽署，未簽字之三人爲李宗仁、孫科及蔣總統本人。

急電已逾三天，仍未得覆，因此立法院於二月二十四日集會，在臺之三百三十一位立法委員一致通過要求蔣總統復職。至此，蔣總統已義不容辭，乃於三月一日復任總統。

蔣總統在復任宣言中，其詞有曰：

「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際此存亡危急之時期，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爰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抗戰勝利結束至今不及五年，而國事演變至此，中正領導無方，彌用自責。惟有鞠躬盡瘁，補過去之缺失，策未來之成效，所望於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三軍將士砥礪奮發，各級官吏竭誠奉公，爲恢復中華民國之領土主權，拯救淪陷同胞之生命自由，維護世界之和平安全，同心一德，奮鬥到底。務期掃除共匪，光復大陸，重建我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全國同胞幸共鑒之！」

蔣總統復職時所面臨之任務，係異常艱鉅者。在蔣總統復職之同日，共軍頭子朱德在北平向「臺灣解放同盟」宣稱：「消滅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已成爲全國最迫切的任務。」朱德又聲言「已集結強大的軍事力量」準備進攻臺灣。一切跡象顯示自由中國將面臨其最後的考驗。

總統深具信心，唯有恢復自由中國人民對政府之信心，才能拯救人民於水火。當李宗仁擔任代總統期間，由於連串之失當措施，甚至棄職離國，已成全國國民對政府之信心喪失殆盡。華南及西南之土崩瓦解，與其說是軍事上

之失敗，毋寧說是基於此種「失敗主義」之作祟。在此種情況之下，唯有奇蹟出現才能拯救中國，而在國民黨內唯有蔣總統一人能使此種奇蹟實現。

如果蔣總統祇爲其個人利益打算，在此時大可不必東山復出重負艱巨，早已享到一切最大之榮譽及功績，按照中國傳統哲學所謂之「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正可優游林下，安享餘年。何必在最危急之際挺身而出！具見其平生於個人得失利害，未嘗縈心，其所耿耿於懷者，厥爲國家民族之前途。故毅然不顧將來歷史作何評價？決定在此最後關頭負起他人所不願負之重任。其對國家民族之真忱，於此可見。

總統復職典禮，在臺北總統府內舉行，歷時僅七分鐘，周圍在旁者：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以及白崇禧將軍，甫自美國歸來之蔣夫人。總統府外，萬千國民歡呼慶祝。儀式雖簡單，但其象徵經過十三個月之災難與混亂後，自由中國終於重趨團結一致。

五天後，在星期一晨之總理紀念週時，蔣總統以國民黨總裁身份蒞會，向與會之二千名黨內同志發表演說：「將大陸之失敗歸咎於其本人，但宣稱此種錯誤決不容再犯。並指出今後欲求生存，必須團結、合作及犧牲個人利益，爲求取未來之勝利，國民黨及政府必須大力進行改革。最後復稱：『若能達到此目標，我確信最後必能擊敗共產黨』。」

第六篇 結 論

余著「爲甚麼失去大陸」一文，既竟。綜其時，越二年又二閱月。計其文，都四十餘萬言。但就事績以鋪陳，未作褒貶之論斷。蓋爲紀實之篇章，備將來史家之取資而已。當著筆之初，可藉爲參考取材者，外國之檔案紀錄，反多於我國之書籍文件。故其間有需補充者，有須改正者，有應刪除者，則有待於將來之校訂矣。

「爲甚麼失去大陸」？此一問題，不獨中國人所皆欲知，亦亞洲人之所皆欲知，即全世界全人類何一不皆欲知也。蓋中國大陸淪失於共黨之手，豈惟中國五千年歷史之唯一大變，更爲全世界所從未見之唯一大變。以共黨意圖征服全世界之野心，及其企求控制全人類之特權，已昭然若揭，而到處燃火，幾遍於僻壤角落。苟不瞭解於爲甚麼而失去？則無以窺破中共竊國之詐術，更無以得抗禦之道，尤無以進而爲收復大陸。殲滅共匪之謀。無怪美國輿論，早有：「中國是自己倒下的呢？還是被人推倒的呢？」（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可見共黨係世界性之侵略，中國不幸，而首當其衝，遽遭其殃而已！因此中國大陸之失去，等於自由世界之失敗，中國雖失去大陸土地，然而自由世界實失却抵抗共黨之世界侵略，最前線最緊要之堡壘與基地，中國大陸一經失去，即撤去自由世界之屏障藩籬。中國固應自負其咎，但自由世界亦不能諉卸其責任。

然則，何以竟至淪失於共黨之手？檢討既往事實，大抵可歸納爲下列因素：

一、關於國際方面之鄰邦主因：

甲、俄共有一貫之東邊政策：其處心積慮，自尼布楚條約開始，三百年來迄無休止以實行其侵略目的。

乙、日本有其傳統之大陸政策：其處心積慮，自甲午戰役以還，六七十年來，中經二十一條、濟南慘案，其侵略終至於二次大戰。

中國北有俄共，東有日本，虎狼窺伺，時被噬嚙，始終受此兩國之夾攻，而處於困境中。日本凶焰高張時，俄則藉調停而插手。兩者侵略之目的相同，但每因其相反而轉相成，變爲上下其手，使中國難於應付者也。

二、關於國際方面之友邦助因：

由於自由世界——「重歐輕亞」：與「親俄疏華」之兩謬誤政策，交織之下，鑄成大錯。此其一：

由於雅爾達協定之締訂，使俄共有所藉口，提兵長驅而入東北，中共從此得俄共扶植而長成，以至於坐大。此其二：

三、關於國內之主因：

甲、由於聯俄容共：自民國十三年起至民國十六年七月清黨，爲第一個時期。民國廿六年至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爲第二個時期。又民國卅四年至民國卅八年爲第三個時期。以上各期之容共，在政府原冀在國內獲得和平發展，共圖國是。而結果卒至俄共利用國際間矛盾，助長中共及所謂中立主義之發展。第三期中共利用美國調處，假借停戰協定，以掩護其軍事擴展。

乙、由於執政黨以外之黨派，除青年黨、民社黨外，其他如民主同盟及諸小黨派，因不得要其所求，未得掌握政權，於是興風作浪，攪成政治不定，人心不安，從而附和共黨，以至於投靠共黨。此不得不謂爲聯俄容共政策之失敗也！

四、關於國內之助因：

由於知識青年，不滿現象，乃歸咎於政治之不良，希望能得另一美滿之政府，以爲自身可得進身之階，遂盲從投共附共。此其一：

由於反共方法，尙欠周密，致經濟金融政策，被其破壞。而幣制貶值，使民生經濟，飽受摧殘。於是抱怨政府，希望另換一個新政府，以爲可得到安定。此其二。

由於黨政之內部門爭，竟假外力，造成國家元首被迫引退，演出逼宮、受禪一幕。立見士氣渙散，民心頹喪，國脈動搖。卒至拋撤江山，拱手讓共，大陸淪失，此其三：

綜上各點，乃就反共方面之事實根據而言。而共黨方面：究用何法？操何術？以竊據大陸？須知吾人之失大陸，即共黨之得大陸。吾人所以失去大陸之原因，即共黨攫得大陸之詭計。自大陸淪失以來，此反共抗俄之問題，已由關係中國一國之存亡問題，而擴大爲全亞洲以至全世界之安危問題。時至今日，倘仍舊用舊時戰術與戰略來對付共黨，則未有不全被赤化者矣。知大陸之所以淪失，則其他地區可免繼續淪失。前車既覆，來軫方道。今之當局者，其鑒此過去，以免重蹈覆轍，是則余著此書本意之一端也。惟是共黨侵略之步驟，至今日觀之，與十餘年前，仍無變更，不過運用上略有差異而已。共黨之手段，可分三個步驟：

依據過去事實，俄共培養中共，其第一步驟，爲號召「聯合政府」：當時中共取得在野黨地位後，在外形上利用「新民主主義」之理論，提出「聯合政府」之口號，來聯合其他在野黨派，使政府處於孤立。在實質上，從民主鬥爭中發展階級鬥爭，製造武裝暴動，以爲顛覆政府，控制人民之用。其第二步驟：爲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其

第三步驟：即爲將中國共區歸併於蘇維埃而消滅其國界。共黨之暴行，已昭昭在世人耳目，無庸贅述。然則有此可怕之事實，而自由世界之諸大國，仍存在着諱疾忌醫之作風，恐終貽姑息養奸之禍患。是則余著此書本意之又一端也。

吾知世人所皆欲知者，首先爲共產黨之侵略手段究竟爲何？根據事實，後簡括概述其使用在政治鬥爭中之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之方式，萬變不離其宗者，其綜合戰術爲——「退却」、「防禦」、「攻擊」、「施之於任何戰爭與鬥爭，總不離此三部曲也。但其進程序，則先之以「中立主義」、繼之「統一戰線」，然後用其「孤立戰術」。有時將「中立」、「統一」並用，「有時分用」。而「孤立戰術」之中，又包涵「反孤立戰術」。所謂：「既鬥爭，又聯合」者是也。至其運用上，則有「攻心戰」、「矛盾戰」、「接觸」、「滲透」之「組織戰」與「羣衆運動」。復有「貿易戰」、「基地戰」。更有——「偽裝」、「奇襲」、「詐騙」之「宣傳戰」。其後藉「和平談判」以取得「合法地位」，進而參加「議會政治」，組立「聯合政府」；則其目的達矣。其慣施之狡計，則爲和談認真嚴肅，及協定簽訂，彼獲利而散，一旦發現於其本身不利時，立即扯毀。及見到尙有利用價值時，又提出而譴責對方遵守。於是演成——「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之局面。甚至乘協議停戰之便，人已遵議而停，彼則反趁機而打，此種事實過程，倘能加以分析探討，當知余言之不謬。願今後懷於共黨之威脅者，應以「蔣總統著『蘇俄在中國一書』爲藍本，而以梁敬鐸著——『開羅會議與中國』及拙著本書互相參證，庶不至如中國大陸之遭淪失，是則此書本意之又一端也。

共黨之侵略，固有其全球性之目的，則中國大陸之失去，自然國際性重於國內性。而西方諸大國之政策，足以

影響於各國之反共行動，尤其是對於中國之反共行動。中國之反共，首起於民國十六年之清黨，後此十年期間，中國不斷針對共黨作軍事與政治之圍剿，迫使共黨縮處延安一隅，瀕於消滅。惜其後因抗日戰起，共焰復燃！追根溯源，實起於西方之「重歐輕亞」之政策，按「重歐輕亞」之政策，創自一九四一年「ABC——」計劃之決定。艾森豪對此政策之草擬人。該年十二月「亞開第埃」會議中，重申「對德戰爭第一」之旨。其時麥克阿瑟、金，二上將，雖持異議，而既定之策，始終未變。一九四二年六月，美軍部之「波里羅」計劃，遭受英內閣之反對後，馬歇爾、史汀生曾建議——「移師東亞，與日本先作一決戰於太平洋」；而爲羅斯福所反對。羅斯福所持之觀念：「擊敗日本，並不即擊敗德國。但擊敗德國，或可不費一彈而擊敗日本」之戰略，遂永爲美國軍事政策之準繩。此就美國方面而言也。

若就英國方面而言：中英兩國之邦交，似乎失調，其基本原因，英國爲其自身利益計，當然主以擊敗德國爲先着，而中國當然先以擊敗日本爲得計。若果以整個全球策略而論，則麥克阿瑟、金、馬歇爾、史汀生諸將軍之見解爲上策，茲不採上策，而行此「重歐輕亞」政策，致中英兩國爲爭取美國而至於意見不能一致。

蓋邱吉爾在二次大戰中，倚美國爲長城，深知羅斯福「反俄親華」政策，固爲邱相所惴惴不安於心，倘使其他國家希圖增加租借物資，或游說「先亞後歐」，更爲邱相所深惡痛絕。故蔣總統夫人於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在美國之成就，尤使邱相十分嫉妬。由此可知英國對中國有忽相助忽相負之舉措，就表面觀之，貌似矛盾，就實質而言，皆爲一貫。何以言之？民國卅年（一九四一）英以美國捲入漩渦，深獲我心，故其破壞「日美之臨時措施」，（即日使來栖與美所欲擬訂之暫時條約）名爲有助於中國，實則欲助其自身。至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英頗以與

美併肩作戰於太平洋爲得計，故破壞南緬夾攻之成約，名爲負我，實亦自助。因此中英兩國有心人士，謀兩國之趨於協調，尤以中國方面之「中英文化協會」之主幹者，斡旋不遺餘力，但卒因英國之基本國策所繫，致中英同盟之門，未能敲開。斯亦雅爾達協定之後，所欲補其罅隙而不可能者之一失也。

戰後之戰略：所謂只顧目前而遺其日後，欲贏得目前之戰爭，而必需更贏得戰後之和平，是則余當年有：「會師東京」之建議，以爲可以既贏得戰爭於目前，復贏得和平於戰後。

先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余薄遊菲律賓，止於其首都岷尼拉，當時美國正與日本進行其戰略物資之貿易，而對日本與德義之軸心組織，預作全球性侵略之企圖，尙未注意。而日本侵華，則正氣餒高漲。余憂心於美國之助長日本凶餓，擬如何喚醒美國：勿以爾所售予之戰略物資，轉而向爾攻擊，日本恐將持爾兵器以殺爾。此項論據，爲「菲僑抗敵後援會」所讚許，因而有與美國駐菲上校以上全體軍官之座談會之安排。即席美國軍官提出卅五問，余立行一一回答。經此座談，得進而與美國駐菲陸軍總司令格蘭中將之會見。對德義日之全球戰略，尤對日本太平洋戰略，闡發分析甚詳，由菲僑領袖楊啓泰先生之妹倩陳道楨君任英文紀錄。而「抗敵後援會」以是項座談與談話二次紀錄，實具價值，足以鼓起美國人當時不關心與貪利而忘義之風氣。乃由時任外交部顧問，現任駐聯合國代表之徐淑希博士爲之整理纂輯，成一小冊，題曰：「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之英文本，時任蔣委員長顧問端納爲之作序。印發美國，一時風行，現在該冊子尙存於美國國立州立各大圖書館。蓋能引起美國對太平洋將來之發展加以重視。余受此鼓勵，於是始有「擴大租地售艦」之建議，得羅斯福總統之採納。當日德義日同盟協定之締成，國際論壇咸目爲攻美之先聲。余則判斷爲：「德攻蘇先於攻美，日必進窺南洋」。爲理由。希望美國自任爲民主國家之兵工

庫，因而羅斯福有提請國會，成立「租借法案」。凡此雖余個人作國民外交，國際宣傳之開始，然而攸關於美國政策，影響於國際戰略，故附帶及之。厥後舍感羅斯福之知己，謝之以詩，一時名士，如楊雲史、吳稚暉等三百人之，得詩詞三六三首，編爲「羅斯福總統租借法案倡和集」。

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對俄宣戰。至十二月八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則余所建議於羅斯福總統者，言皆有驗而羅總統且飭屬具書道謝。自此余縱未得政府支持，而余之勇於爲世界爲國家之氣魄益壯，遂復有「會師東京」之長篇演辭，在桂林發表，譯成英文逕寄與羅總統，計一萬三千餘言。時香港已陷於日軍之手，天文台報及三萬餘冊書籍同付於兵燹，隻身至桂，作此建議，時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四月也。其寄羅總統之演辭附函中之警語爲：

「戰敗日本，會師東京，先於德國柏林，可贏得戰爭，贏得和平。」

「擊敗日本，會師東京，後於德國柏林；則贏得戰爭，失去和平。」

余之所以提出前述會師之先後，乃基於：「戰時戰略」與「戰後戰略」，每相牴觸。因戰時戰略，其目的爲求贏得戰爭；而「戰後戰略」，其目的則求贏得和平；故在戰爭初期，必執行其「戰時戰略」，務求贏得戰爭之勝利。及一旦戰爭之勝利必屬於我時，則「戰後戰略」，應即繼「戰時戰略」而代之。蓋可贏得真正之和平，余寄此函於羅斯福，在美國捲入戰爭之後，美國一經參加，彼德義日之敗象，已呈現而無疑。

此時正可適用戰後戰略之際。而領導自由世界者，竟對戰後之戰略，不加理會，但求勝利，誠如英國學人傅勒所言：「美國人視作戰如賽球，錦標一得，收隊歡呼，抑若萬事全定也者」。其描摹美國人之性格，刻畫入神。然而俄共得在歐亞二方面，真得左右逢源，一言以蔽之，由於美國之養癰貽患。而美國所以認敵作友，不獨放縱之，

而又資助之，究其真因，則在於美國人對克勞維茲之戰爭哲學，太少研究故也。美國以「戰爭爲政治之目的」，而未能領悟「戰爭乃政治之手段」是已。視爲目的，則勝利即達到目的。不視爲手段，致戰後之戰略，未嘗想到提及，遂致有「雖然贏得戰爭，實際失去和平」之失著，今日國際形勢之如此板蕩蟬蟬，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可勝慨歎！

「重歐輕亞」之失，既如上述。然則，「親俄疏華」之錯誤政策，果自何而生？「重歐輕亞」已足釀成共產黨之雄視世界，而「親俄疏華」，更足以鑄成淪失去大陸之大錯。時美國軍火分配委員會副主席貝恩斯，爲美軍兵工署署長，乃霍泊金之助手，素負分析俄共政策之名。其於軍火分配上建議於羅斯福曰：「美國不但在戰爭中，需要蘇聯，在戰後尤必須仰賴蘇聯。蘇聯成爲美國除英國外第一之盟邦。」一九四一年，美哈里曼與俄米高揚所訂之十億元貸款購料草約。翌年羅斯福令飭所有物資之輸出，應儘先運往蘇聯，與運往英國相並行。此即「親俄」之一端，而「反帝」亦爲「親俄」之一端。至於「疏華」，則因美國國務院內已爲共產黨滲透，致有種種阻撓與不愉快事情發生，而美軍部方面偏聽史迪威一面之辭，又因共黨同路人戴維思、謝偉志等之煽動作梗，亦因而漸生隔膜。自此對華政策，遂變而爲有「長期計劃」與「短期計劃」之雙重政策。

所謂「長期」者；指大戰勝利後，中國將由土地改革者（指中共）統治，故不如早與聯結，以相爭取，以爲日後對華利益之保障。所謂「短期」者；指在大戰期間，必須利用蔣委員長以爲擊敗共同敵人之日本。在大戰未了，視蔣委員長有利用價值，故虛與委蛇。始則於「開羅會議」之前，尊「蔣委員長爲中國之唯一領袖」。嘗中國爲戰後最有希望之國家」。許「中國有參與遠東事件決定權」。列「中國於四強平等之盟邦」。聲明「對華政策以國政

政府爲唯一對手」。此美國執行其「短期」計劃之表現也。詎會幾何時？勝利來臨之後，美國棄其「短期」計劃，而執行其「長期」計劃。於是昔日之蔣委員長爲中國之唯一領袖者，一變爲「如摩洛哥之酋長」。（羅斯福致馬歇爾原函語）其譽爲最有希望之國家者，一變而爲「須再經五十年之教育。」（用羅斯福告邱吉爾語）其許爲有遠東事件之決定權者，一變而爲遠東戰時、戰後各事件之被擯、與被出賣者。此可於雅爾達、波茨坦、魁北克各會議，中國皆未被邀出席，可爲明證。其一系列爲四強平等之盟邦者，一變而爲三強協議之犧牲品。如旅順、大連、香港，以及中東南滿路等事件之代作決定，不容中國置喙等皆是也。若謂對華以國民政府唯一對手者，一變而爲在延安設置聯絡站，無形中在二次大戰中，承認中共爲「交戰團體」矣。此點，美國迄至今日而仍未變易其兩面手法。蓋美毛華沙談判，一如延安時代之留有尾巴。此吾人之所以扼腕而不勝其憤慨也。

在自由世界領導者，有其「重歐輕亞」：「親俄疏華」之兩大政策，以及對華政策之「長期計劃」與「短期計劃」之執行，中國之受壓迫，幾至無從申說，究其原因，實出於戰爭已逞勝利把握之際，奈仍不採取「戰後戰略」，以冀「贏得和平」遂致造成今日之世局。當余草擬如何挽救厄運，填補「雅爾達祕密協定」之錯失，以及企圖打消「長期」、「短期」計劃之謬妄；主張「中美同盟五十年」之時，不圖羅斯福總統突告去世，不得已乃將此項建議，逕陳之於赫爾利大使轉呈美國務院。時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德軍尙未投降，余致赫爾利大使函中有云：

（上略）「竊以爲世界性政治軍事之策略，自迥異於局部之策略。羅斯福總統曾謂：吾人不僅須『贏得戰爭』，更須『贏得和平』……下走以爲最善莫若先進軍東京，次及柏林，最低限度亦應對歐亞兩戰場，同時並重。三年之前，余曾著：『會師東京』一文，有所論列。一九四二年七月又著：『開闢第七戰場』一文，強調盟軍發動對日

作戰，與歐洲登陸同時並進。而以全方向滿蒙進擊。良以吾人苟欲『贏得和平』，務必對敵四面合圍，包圍作戰。蘇聯亦當如其他盟友，兩面作戰。捨此，則戰後或戰事行將結束之際，將發生不可思議之後果。茲者，柏林將陷，東京指日可下，然則吾人距『贏得和平』途徑，似仍遙遠……」

將軍深知，苟欲『贏得和平』？必先使中國於八年抗戰，犧牲慘重之後，得到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包括蒙古、新疆、西藏、東三省）否則，『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竊以爲必須中美兩國，密切合作，方克臻此。中美如能訂立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互助同盟協定，則未來之世界大戰可免……（下略）」

茲更將函中之建議「簽訂同盟條約五十年」之包括幾個特點，節錄於次：

一、指責「重歐輕亞」政略戰略之失當！隱伏戰後世界失其均衡之禍機，因而即使「贏得戰爭！」亦將「失去和平。」

二、指出當面敵人！德國與日本於久戰疲敝之餘，成爲強弩之末。惟蘇聯與中共相勾結，將成爲戰後世界最恐怖之敵人。

三、暗示爲求中美兩國免於彼此孤立！不得不曲徇美國之意，忍痛追認雅爾達祕密協定，但須以中美兩國同盟五十年協定，爲交換條件。

四、確言中美兩國同盟必須以絕對互惠平等爲原則！以我所有，供彼所需；以彼所有，補我所無！蔚成爲太平洋兩岸兩大國互相依存之體系。

五、斷言中華民國戰後，將失去東三省、蒙古、新疆、西藏（假使不執行「戰後戰略」而言）。

六、直言戰後世界必將「贏得戰爭」；「失去和平」，匪惟東亞不能和平，即世界每一角落，亦不能和平。

七、面對上述情勢，只有中美兩國締結同盟五十年，才能「贏得戰爭」，「贏得和平」。

自茲建議送達之後，賴爾利大使返國述職。在羅斯福生前，余有條陳建議，遲早輒有音息，此次卒如泥牛入海，影響全無。此纔朝之所以有「吾謀適不用」之慨也。「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幸能於十年後，（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三日）由中國之傑出外交人才之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美國唯一能幹之國務卿杜爾斯所簽訂，雖時已嫌晚，但尙能確保亞洲安定至於今日，未始非此「同盟條約」所由致也。惟其簽訂之前，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余又舊話重提，以爲非中美同盟斷不足以反共抗俄，斷不足以安定亞洲，故復有「十請中美防衛協定」之呼籲於中美雙方當局，至再三而至於十請，蓋余之觀點，鏗而不捨者，至於協定訂定而後已。故當年致賴爾利之七點，實鑑於羅斯福雖有一「贏得和平」之口號，確未履行其「戰後戰略」，而「親俄疏華」愈趨明朗，至今思之，苟能採此七點芻議，則目前形勢，非復如今日者矣。

從本書所引述之事實以觀：可見當年中國內外情勢之險惡，與當局應付艱危之苦難與忍耐。而八年抗戰之犧牲，其所換得者，竟只是戰後孤立之形勢，最爲痛心。此種孤立形勢，始見於中蘇間之疑忌，次見於中英間之隔閡，結果所至，只餘對美之「孤注外交」。「孤注外交」，在本質上失去彈性，在折衝上易受脅逼，致演成當年之一筆勾消，孤立無援，終至於失去大陸。此皆由於兩大政策——「重歐輕亞」：「親俄疏華」所形成之兩種世局。

在「重歐輕亞」之政策下，對德戰勝，必在對日戰勝以前。於是德國柏林投降之日，即將爲中國東北門戶大開

之時。日軍未去，蘇軍先來，中國之兵員，方偏促川滇黔桂之間，將以何術以阻俄軍之東下？此其一。在「親俄疏華」之政策下：美必不肯因我而開罪於蘇俄，於是俄共橫眉露刃之時，亦即將爲美國袖手旁觀之候。中國犧牲之餘，元氣未復，又將何術以阻遏大陸之淪失？不寧唯是，而美國又有所謂「雙重計劃」者，「長期」與「短期」。當馬歇爾使華之時，其「雙重計劃」仍未變也。中國抗日軍事既告結束，按照其「雙重計劃」之說法：蔣委員長既已失去「短期計劃」中之利用價值，則便成爲「長期計劃」中之頑梗之障礙。於是調停國共和談之工作，便不得不以迫逼蔣委員長爲其基礎，逼迫之計不遂，則不得不對蔣委員長消極遺棄之手段，進而爲對中共毛澤東積極討好之代價。此美國經援軍援之所由停止，白皮書所由發表，美國坐觀大陸之失去與赤化也。

余言至此，不願爲周以責人，而約以責己。蓋過去之事實，已成歷史之陳跡，所望者，在今日局勢之下，一誤不容再誤。余深慮於世界態勢之演變，將來「主戰場」與「主力戰」，所謂「戰時戰略」，與「戰後戰略」，勿重蹈前轍起見，特致函美總統甘迺迪，有所論略。譯成英文，寄發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因趁美國共和紀念日也。文長四千餘言，茲節錄其重要之一段如次：

「幸威深慮世界態勢之演變，將來之「主戰場」，當在歐洲。而遠東方面，將來之「主力戰」：倘使在中國大陸，則自由世界，勝算在握。否則，「主力戰」如在中國大陸以外，則自由世界絕對不利。此爲鐵般真理！惜主持世局者，未聞注意及此，殊深浩歎！現在遠東之禍亂，莫不造因於中共，而遠東諸國中，所能制裁中共，且具有先勝而後求戰之充份優越條件者，唯中華民國一國。貴國自羅斯福總統以還，迄未視中華民國爲遠東主要角色！今日中華民國雖僅擁茲四島，在蔣總統領導之下，但仍爲大陸上六億人民希望之所寄託。故備具有以順伐逆，以仁伐暴

，以少許勝多許之條件。何況大陸飢餓流亡，達最高潮，爲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經見，雖百個毛澤東，豈堪爲六億人民之一擊乎？故遠東「主力戰」，若在於中國大陸之內？同時以中華民國得貴國之支持，扮演爲主要角色，以相配合，則擒賊而在賊窠，搗其巢穴。「主力戰」與「主要角色」配合的當，其不操勝算者，斷無是理也！且以貴國防，介乎兩大洋，大西洋彼岸，有同種同血統同文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爲其犄角。太平洋彼岸，安可無強大與國？求其主義同，思想同，政體亦同，土地、人口、資源，亦相伯仲，足以勝互相倚存之任者，舍中華民國外其將誰屬？況乎兩國友誼，始終誠篤而不渝者，又孰堪與中華民國比？是則貴國應重估中華民國對貴國所具備之價值！既已失之東隅，尚可收之桑榆，豈止擴大，延伸現有之「共同防禦條約」，以爲已足乎哉！

「或者以爲日本之工業潛力，與印度之人力相和，即足與中共相抗衡，此大誤也。倘使於遠東戰爭時，日印二國派兵深入中國大陸腹地，是反予中共以口實，徒使大陸人民將原有抗共決心，轉移爲抵抗外來侵略。按之元、清二朝先例，反客爲主，貽患無窮。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未起，而第四次世界大戰之禍機先伏，此又不視中華民國爲主要角色之一大錯也。」

現在世界戰略，應以歐亞兩主戰場並重。其上策：亞洲方面，應以中國大陸爲「主戰場」。尤應以中華民國爲「主要角色」。若得貴國軍經援助，特予加多，使中華民國能擴充其海陸空軍之作戰部隊，增至一百萬名以上，形成非核子之主力部隊。一旦遠東有事，則貴國握有較多籌碼，不獨可以運用裕如，且可減少貴國——青壯之死傷，與減輕軍費之負擔，減免物資之消耗，縮短戰爭之時間，而戰爭可引至於貴國之遠東防線之外，誠一舉而數善備焉。果若是，如南亞釁起，則聯越南共和國以同赴。北亞釁起，則聯大韓民國以合力。萬一世界釁起，則貴國軍隊

與中華民國軍隊在協同之下，並肩作戰於中國大陸。吾可保證！「直搗天山，將必先於會師烏拉山」。玫瑰則堅者環，有其裨助於歐洲主戰場者，何可勝計哉？」

基於上述理由：其爲貴國策劃「兩個中國」之議者，或爲貴國策劃「中蘇國」之議者，徒見其爲敵張目，降低中華民國地位，更使貴國自毀遼東防線之長城，尤毀由由世界之堡壘。（下略）

余之此函，所以矯過去之失著，希望甘迺迪總統能加以考慮。而余之所最不解者，爲美國仍在華沙，與中共駐「波蘭大使」作幾年來之長時間談判。在中共雙屈延安時，美國於延安設置「聯絡站」，以爲調停兩方之聯系，以執行「雙重」——長期、短期計劃，原屬謬妄已極！奈何今日中共明目張胆，高呼美國爲其第一號敵人。而美國青壯死傷於中共之手者十萬餘人，而反視爲友人而大談特談，密談細談，是將置中華民國於何地？復何以對中國六億人民反共之願望？而美國本身究取何一政策？有何一解釋？對此華沙談判將生何種效用？是誠不可以已矣乎？深願美國勿再作「兩面外交」、「雙重計劃」，而有噬臍之悔，迅即停止，澄清立場。當年美國政府之政策，被共黨與其同路人所壟斷，目下豈復有恐共者所左右，此則請美國賢明當局之立予糾正矣！試舉一例以爲證：中共爲扯謊能手，在華沙會談中，竟捏造中華民國之種種荒無故實之事件。據傳：中共謊報某某人士擁有私財至數十億美金之鉅，分存於世界各銀行之謠言。美國當局偏聽一面之詞，遂亦憑其天真想法，大事調查，遍及於世界各銀行，杯弓蛇影，引起疑團。然則何來有此數字？卽此一端，可見華沙談判，徒資爲中共造謠中傷之場合，如此無中生有之言，美國尙輕信之，則有百害而無一利，爲不可否定之事實。附及之以徵余言之不謬耳。

抑又不能已於言者：中國於八年單獨抗戰之餘，正宜於禍亂後，致力於善後與復興，藉以撫輯流亡，安定社會

，恢復元氣。奈因美國「重歐輕亞」政策，遂有雅爾達協定，有此協定，俄軍昂然進入東北，卒釀成中共倡亂。致中國政府對政治、軍事、經濟、財政、政工等等失其調節。依據中國歷史，凡經亂戰亂頻仍之後，往往對政、軍、經、財、等等失去調節，但仍能保持其力量，充其極，不過由一統而流為偏安而已。東晉與五胡，南宋與遼金之史，續可稽也。今不獨失其調節，甚至失其控制，終至於崩潰於大陸，則又何哉？是則在於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挾其對華之「長期計劃」，以壓迫中國政府，遂演成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之把戲。使中共之氣餒愈張，亂力愈大，社會愈紊，民心愈惑，終至失去大陸而後已。苟非然者，政府雖失其調節，但尚可依據地理形勢，隔黃河或長江而相持，又何至演成五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鐵幕，而出現此悲慘之局面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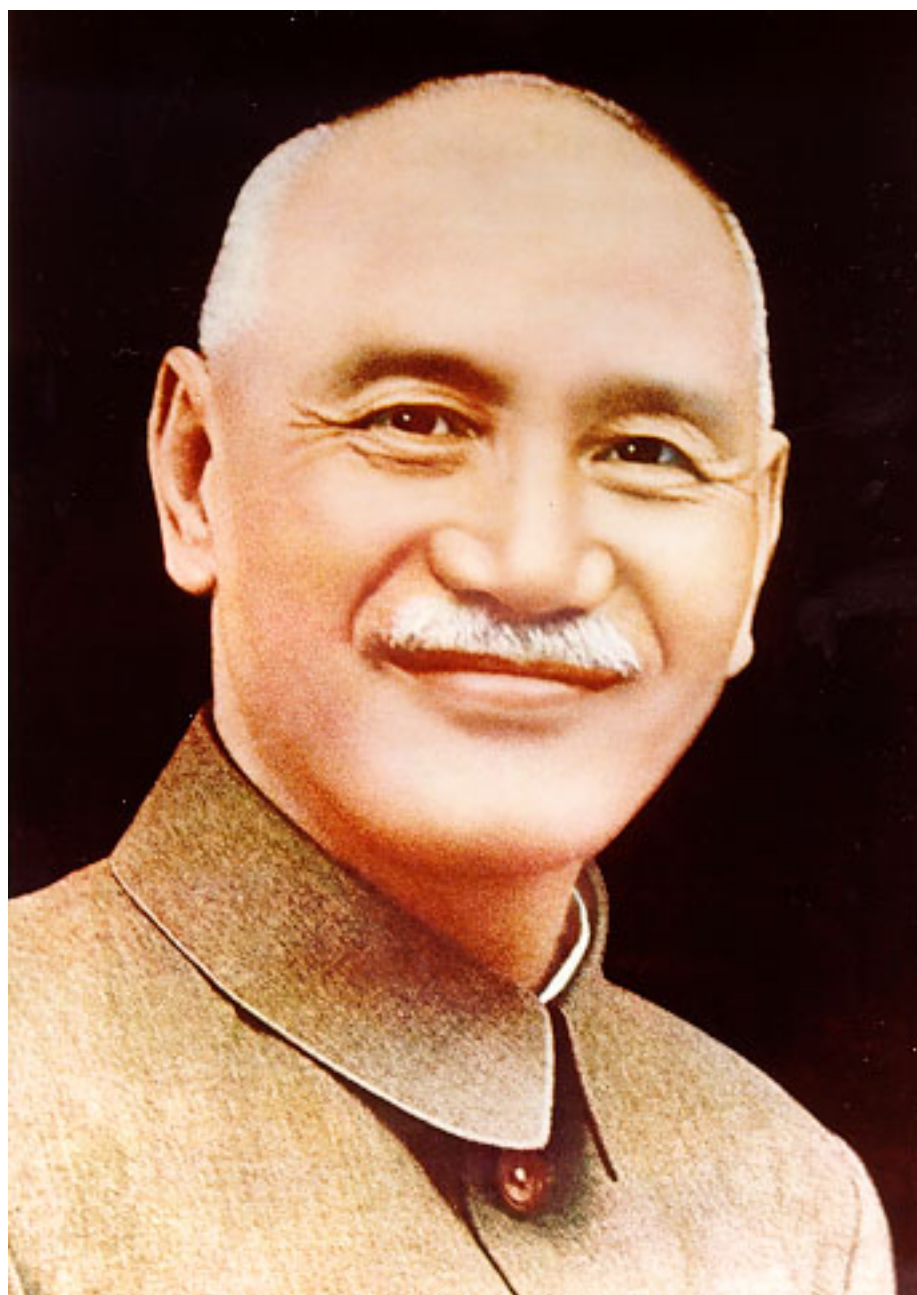
至論吾中國，現在已屆反攻復國之行動階段，凍於過去國內失敗之主因而助因，現在復國基地之臺灣，已可稱為政治修明，人民康樂。惟上下一心，為反攻復國必不可或少之條件。反攻復國之必成，吾可預言，亦可保證。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日之政績，其對於軍事，吾無間言，其外交與經濟，尙有待於更進一步之努力。始，余於民國四十二年冬回國訪問，得與行政院長陳辭修學長作一長談，語中所鄭重提出者：「為求現一代之團結，為下一代而鋪路……」其要旨為：

「使後一代人才，遠勝於前一代。下一代人才，遠勝於現一代。人才輩出無已時，以與現一代之團結更配合。敢保證反攻必勝，抗俄必成。」等語。當時余所憂慮者，為政府與人民之合作，未能臻於「努力之協成力」，恐「努力之總和」亦未做到，於是方有此項談話，茲言于八年之前，而八年後之今日，雖仍未臻於「努力之協成力」，但「努力之總和」，似已在望。蓋蔣總統為今日臺灣人民與海外僑胞，甚至於國禁於大陸之五億人民，所共同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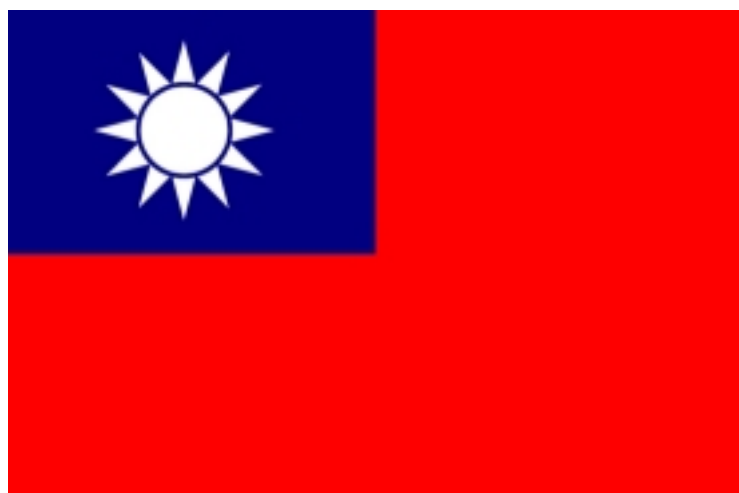
之希望，且有其無比信仰與信心。故中華民國國運之隆替，繫於此天降之一老，但願其與山河同壽。然而政府與人民之「努力協成力」，與余所提出者：「求現一代之團結，爲下代而鋪路」之說，至今仍能稍予忽視，則中華民國之復興與重光，固指日而可待也。

之希望，且有其無比信仰與信心。故中華民國國運之隆替，繫於此天降之一老，但願其與山河同壽。然而政府與人民之「努力協成力」，與余所提出者：「求現一代之團結，爲下代而鋪路」之說，至今仍能稍予忽視，則中華民國之復興與重光，固指日而可待也。

之希望，且有其無比信仰與信心。故中華民國國運之隆替，繫於此天降之一老，但願其與山河同壽。然而政府與人民之「努力協成力」，與余所提出者：「求現一代之團結，爲下代而鋪路」之說，至今仍能稍予忽視，則中華民國之復興與重光，固指日而可待也。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